



書名：邱會作回憶錄

Memoir of Qui Huizuo

作者：邱會作

作者簡介：

邱會作

(1914-2002)

江西省興國縣人。1955年被授予解放軍中將軍銜；曾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總後勤部部長，中共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1981年1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確認」邱會作是「林彪反革命集團主犯」判有期徒刑16年。1987年刑滿。2002年7月18日病逝於北京協和醫院，享年89歲。

《邱會作回憶錄》目錄

下冊

第二十五章 零點得救

大人物上任全軍文革組長

江青批准「紅縱」殺回北京

徐帥的命令

造反派的刑法

零點得救

全軍文革支持三座門靜坐

周總理送我回總後

正確對待造反派

第二十六章 軍委辦事組成立前後

「五一三」事件

「七二〇」事件

新的軍隊日常辦公機構

楊成武時期的軍委辦事組

第二十七章 楊成武倒臺

楊成武倒臺的自身原因

楊成武是軍隊的臺柱子

楊成武問題的內幕

江青要把邱會作、楊成武同罪

抄楊成武的家

「三二四」大會

棄楊留吳的問題

第二十八章 黃永勝時期的軍委辦事組

軍委辦事組改組

批判軍隊「二月逆流」

辦事組的主要工作

「反江青俱樂部」

反江青的兩個不同時期

李必達事件

文革往事

第二十九章 八屆十二中全會

總理的開場白

全會的任務

我在小組會上的發言

主席在閉幕會上的講話

林總的長篇講話

林彪、江青的矛盾

第三十章 九大縱觀（一）

關於起草文件的問題

開幕式

大會討論和發言

毛主席談兩條路線鬥爭問題

毛主席談關於文化大革命和清理階級隊伍的問題

毛主席談關於準備打仗的問題

毛主席談關於選舉的問題

上海幫批判陳毅

江青要當接班人

第三十一章 九大縱觀（二）

軍委辦事組退選舉名額

大會選舉

三人小組

黃永勝堅決不當常委

主席在全會上的講話

江青進入政治局的影響

附：《加強後勤工作的戰鬥化》

第三十二章 廬山戰火

不設國家主席目的就是給林彪留位子

主席通過江青拉我們

吳法憲與張春橋的爭論

高高興興上山

政治局常委會

開幕式上林彪的講話

山上的熱鬧

整個廬山都狂熱起來

第三十三章 風雲突變

晴天霹靂

林彪的態度

吳法憲檢討

黃永勝上山

《我的一點意見》

會議的最後幾天

毛澤東的苦澀

汪東興與華北組六號簡報

第三十四章 「甩石頭摻沙子挖牆腳」

關於中央政治局生活會的方針問題

吳法憲、葉群向毛主席寫檢討報告

全軍批陳整風

毛澤東「甩石頭」（三十八軍的報告）

毛主席「挖牆腳」（華北會議）

軍委座談會

江青一夥的威風

軍委辦事組整風

我們的檢討報告

毛主席第一次接見

北戴河之行

毛主席第二次接見

會場上的交鋒

會議給我們下結論

批陳整風匯報會之後

第三十五章 毛主席南巡

不在乎，又在乎

林總的態度

毛主席為什麼南巡

在武昌的談話

在長沙的談話

林彪是冤鬼

第四篇 我的晚年

第三十六章 「九一三」事件——林彪死了

十三日凌晨的政治局緊急會議

緊急善後處理

九月十三日至九月二十三日略記

第三十七章 淚別周總理

北門解迷

周總理的談話

三相信

永遠懷念周總理

第三十八章 在順義的日子裏

改天換地

「特殊首長」

四組同我的關係

第三十九章 中央專案組的審查

沙河機場的兩次審問

沙河機場的第三次審問

關於組建基本建設工程兵

關於國防工業問題

陝西省委常委在京舉行擴大會議問題

關於「九六」問題

第四十章 在秦城的日子裏

押進秦城監獄

老幹部的歸宿

現代黑店

監獄裏的鬥爭

黑暗中的星光

子女探監

第四十一章 中紀委的審查

審查的重點

關於廬山會議的問題

關於攻擊朱德的問題

關於搞葉帥材料問題

關於反擊徐向前的問題

關於總政的一些問題

關於醫療保健問題

關於羅瑞卿的治療問題

關於陳老總的治療問題

關於賀龍的搶救問題

關於徐海東的醫療問題

關於傅連璋的問題

所謂迫害幹部和群眾的問題

萬毅的談話

中紀委審查小組最後的話

第四十二章 移交高檢與預審

補辦逮捕手續

「反革命主犯」問題

確定我為「反革命」的證據

遞交起訴書

第四十三章 「公審」鬧劇

宣讀起訴書

第二審判庭

五次出庭

判決

難友合監生活

走出秦城

第四十四章 空前的大冤案

公審是大倒退

所謂「林彪反革命集團」

造反派消滅革命派

惡毒株連是冤案的一大特點

哭老戰友黃永勝總長

說幾句閒話

第四十五章 全家株連

母親餓死在醫院

老伴受到殘酷至極的迫害

五個子女無一倖免

第四十六章 在西安的日子

安置西安

生活問題

有期等於無期

百感交集

落難中的情誼

代後記

邱會作將軍生平簡歷

照片索引

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澤東主席接見軍隊高級幹部

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在天安門城樓上

一九六八年，在文化大革命中時任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

一九七〇年周總理參觀我軍新研製的 69 式 40 火箭筒打坦克表演

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在九大開幕式上

總理說：「中央政治就是處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關係。」

九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開幕式上講話

「鬧來鬧去，把帽子給我們扣上了，可憲法草案上...」

林彪對黃吳李邱說：「你們照常吃飯，照常睡覺。頂多做個彭德懷第二。」

一九七〇年，陪同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接見朝鮮軍事代表團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陪同周總理、李先念副總理會見羅馬尼亞政府代表團

一九七一年「五一」節

有口難辯。在一九八一年「公審」中

黃永勝總參謀長

胡敏拜見黃永勝陵墓

胡敏看望老首長李作鵬

邱會作的母親

一九八〇年，經過近十年的磨難，兄、弟、妹五人第一次在北京見面

和京京、新平一家合影

路光一家合影

和承光一家合影

和光光一家合影

和小光一家合影

光光、小光同在一個部隊、一個城市

一九九五年，胡敏和老戰友項輝方在西安家中

胡敏和林立衡（豆豆）在一起

一九九九年，和老戰友李作鵬在一起

二〇〇七年，胡敏看望老首長李作鵬

真情實意

邱會作將軍銅像揭幕

人民總理周恩來的評價

邱會作回憶錄

邱會作 著

(下)

MEMOIR OF QIU HUIZUO
VOLUME 2



第二十五章 零點得救

大人物上任全軍文革組長

江青是下決心要利用文化大革命抓住軍隊的。但她知道，自己抓祇能抓到虛的。祇有在軍隊找到適當的代理人，才能抓到實權。對軍隊有些人，她認為他們還不夠「成色」。她經過認真考慮之後，突然向林彪提出了對徐向前的使用問題。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初，有關軍隊文化大革命，江青連續上林彪的門。最後一次，江青直接了當地說：「要搞好軍隊的文化革命非有元帥昇帳不可。我提議徐帥任總政治部主任，並任全軍文革組長。」對此，林彪感到非常突然，圍繞徐的任職，林彪向江青進行了巧妙的鬥爭。

林總說：「徐帥是一個指揮打仗的人，搞政治工作恐怕不合適吧。同時，他身體不好，也不能勝任這樣繁重的日常工作。」

江青說：「很合適。政治工作、文化大革命都是領導貫徹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問題，日常工作可以讓別人去做。他身體不好，對任職毫無妨礙。」

林總看到江青的意見很堅決，江青走後，立即親自向毛主席報告了。他向毛主席提出：「在當前的情況下，徐向前同志任全軍文革組長是可以的，軍委的日常工作仍由葉劍英同志負責。」毛主席完全同意林總的意見。

新任全軍文革組長的任職已經批准，傳閱件已經到了林彪手裏。林彪即派葉群去向江青報告，葉群說：「林彪同志同意江青同志的意見，軍委徐副主席兼任全軍文革組長。」

徐帥對上任全軍文革組長，開始有點受寵若驚，一方面新官上任三把火，另一方面也很動心計，他提議江青任全軍文革顧問。他認為江青

是主席夫人，消息來得快，同時有事一起擔當，這樣，江青插手全軍文革的局面就「落實」了，軍隊的大災難開始了！不過，徐帥也是祇知其一不知其二。徐帥剛當全軍文革組長時，我以爲分了葉帥的權，去安慰了葉帥幾句，沒想到葉帥哈哈大笑，說：「這是主席、林副主席關心我，讓我好好掌握部隊，讓他去當文革組長，挨炮轟。」徐帥積極了一陣子，開始明白了一些，就開始「有病」了，後來也給他戴了一頂「二月逆流」的帽子，再後來全軍文革也倒臺了。

在徐帥上任文革組長的第一次會議上，他提出了軍隊文化大革命的三條方針：一是不要怕亂；二是要徹底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三是老幹部不要害怕群眾，要自覺革命。這三條核心的就是要正確看待一個「亂」字。全軍文革熱烈地擁護這條方針，並且提出了：「在徐帥指揮下，徹底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軍隊的造反派對徐帥的方針如獲至寶。

一九六七年一月間，軍委常委在京西賓館舉行會議，到會的有各總部、各軍兵種、院校和各大軍區在京的首長，會議由葉帥主持。

會議開始時，徐帥講了話。他除了講了他的三條方針之外，並對向地方造反派學習做了充分的發揮。他說：「現在害怕群眾的恐懼病是主要的，此病不治就搞不好文化大革命！」徐帥特別點到蕭華是膽小鬼。大家對徐帥的講話氣憤極了！

這次會議很特別的是，沒有人講話，大家祇是喝茶、上廁所。在冷場很久之後，陳老總用調侃的語言說了兩句話：「徐帥今天說不要怕群眾的話，我們是理解的。過去你也同我們害一樣的病吧？現在你的病好了。」聶老總說：「我確有病，但我決不怕死！」他們兩人說了幾句話之後，還是一個講話的也沒有。葉帥祇說了一句話：「今天的會到此結束。」他說了這句話，起身就走了。

那天的會開的空前的短，大約祇有一小時。會議冷場情況，是對徐帥最好的諷刺！

新的全軍文革成立後，即向江青匯報軍隊的文化大革命情況，得出的主要結論是：軍隊的造反派沒有發揮作用。新的全軍文革立即建議，調幾個造反派來幫助軍隊機關搞文化大革命，中央文革立即批准了。不出兩三天各路的造反派都到了北京。

各路造反派到了北京之後，徐帥在全軍文革歡迎各造反派頭目的會議上發表了長篇講話。他說：我們執行江青同志的指示，請大家來幫助機關搞文化大革命。現在的革命有兩條不同的路線。一條不怕亂的路線，一條是怕亂的路線。一個「不」字之差就代表了是不是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我們新的全軍文革執行毛主席不怕亂的路線，由大亂到大治，文化大革命也就搞好了。

造反派對徐的講話，快要捧到天上去了！會後造反派通宵遊行，「向江青同志致敬！向徐帥致敬！」的大標語貼滿了北京城。全軍文革就成了江青在軍隊不折不扣的最得力的代理人！

在新的全軍文革領導下，軍隊的文化大革命確實出現了「新的局面」。全軍院校，從亂到徹底垮掉了；省軍區以上的機關，除總參機關沒有亂之外，其餘的都亂了，有的亂透了；作戰部隊也有部分亂了；高等軍事學院兩派對壘，戰火不息；三座門持久靜座；總後機關成了全軍大亂的典型；測繪學院造反派殺進葉劍英元帥的住處。

全軍文革組長同江青確實沒有什麼歷史關係，江青選中這位組長為軍隊的得力代理人，是文化大革命的新問題。江青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頭面人物之後，她要搞亂軍隊、趁亂插手軍隊唯一的障礙就是林彪，她對林彪才確實是當面說好話，背後卻根本不聽。江青在軍隊是毫無地位的，她要直接插手軍隊是不可能的，祇有用找代理人的辦法。從當時軍隊的實際情況來看，葉帥、聶帥都不會買她的賬的。在六六年八屆十一中全會徐帥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之後，他的情緒變了，江青也注意到他了。

江青批准「紅縱」殺回北京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毛主席、林總出席了在人大會堂召開的中央碰頭會擴大會議，到會的有幾十個人，各大軍區、各省市在京西賓館「躲反」的領導幹部，如宋任窮、陳錫聯、李井泉、黃永勝、韓先楚等都到會了，當時，我在北京西山養病亦得到了通知，也到會了。到會的有幾十個人，在會場上的人們如同過去開幹部會一樣的談笑風生，尤其部隊的幹部，老粗多，見面就開玩笑。

會議開始時，毛主席對著李天煥說：「給你戴高帽子是錯誤的，我是反對這樣搞的。但是，大家不要怕到群眾中去，頂多就是戴高帽子。經過較量，好人、壞人就會清楚的，搞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也就在這裏。」毛主席這些話，中心意思是告訴大家都不要怕文化大革命，都要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的講話是以一種隨便談的方式講的，總理、林總、陳伯達、康生等都插了不少的話。林總說：「毛主席號召我們要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正確對待群眾，現在還要加上一條，要正確對待高帽子。」周總理還特別講了黑龍江哈爾濱市商業局局長文化大革命開始就被戴上了高帽子，還畫了花臉。他不和群眾搞對立索性戴著高帽子上下班。

會議正在進行的時候，總參作戰部的值班參謀來向江青報告說：「上海二醫大有個叫錢信莎的學員，要求同江青同志通話。」

我聽到值班參謀的話之後心裏很納悶，為什麼錢信莎能夠直接給江青打電話，她又敢同江青打電話？其中的奧妙，我當時是不知道的。

江青接完電話，回來後對著徐帥說：「你們全軍文革建議，要調造反派來京幫助機關搞文化大革命，這個建議很好。上海二醫大『紅縱』要求盡快到北京來，春橋要錢信莎直接向我請示報告。」徐立即表態：「感謝江青同志關心軍隊的文化大革命！」江青接著又說了一句：「老將怕小將是沒有理由的！」

「紅縱」為什麼又來北京，至此情況就算清楚了。一九六六年十月軍隊院校來參加國慶活動，在機關鬧了一陣子，但沒有鬧出大名堂來。學生回校之後，機關的文化大革命，在黨委領導下進行得很正常。不僅如此，各機關對造反分子都進行了打擊，例如空軍一高專的造反派頭子彭謙（是一個教員），帶一些人造空軍黨委的反，並在駐京各單位到處煽動造反，彭謙是軍隊造反派的總頭目。因為彭謙鬧得太兇，引起了軍委的高度重視，葉帥親自和吳法憲、余立金到前門打磨廠空軍招待所找彭謙



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澤東主席接見軍隊高級幹部。前排左起：江青、李富春、聶榮臻、康生、陳伯達、毛澤東、周恩來、陳毅、徐向前、李先念、葉劍英。二排：左一陳明義、左二葉群、左三粟裕、左四謝富治、左六杜平、左七陳再道、左八袁昇平、左九皮定均、左十一丁盛。三排：左一楊成武、左二蕭華、左五李成芳、左八曾思玉、左十王恩茂、左十一李作鵬。四排：左三王新亭、左六黃永勝、左七楊得志。五排：左一汪東興、左二吳克華、左三張震、左四李天佑、左五李天煥、左六江文、左八張池明。後排：左二許世友、左三王力、左四戚本禹、左五關鋒、左六吳法憲、左八韓先楚。邱會作因在西山養傷未有出席。

談話，彭謙仗有中央文革和全軍文革的支持，竟揚言有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支持我決不回頭。葉帥大為動怒，當即下令把他抓了起來。

中央文革對軍隊的文化大革命有批評，全軍文革很著急，全軍文革組長提出，搞文化大革命要是怕亂則一事無成，建議中央文革批准調幾個軍隊院校造反派來帶動北京各機關的文化大革命。其實質是依靠造反

派炮轟各總部、各軍兵種的黨委和主要領導幹部！「紅縱」是全軍文革培養起來的主力軍之一，自然是必定來京的。

二醫大「紅縱」由上海乘火車於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到達北京總後大院，他們一進總後大院就把機關的辦公室、俱樂部、禮堂都控制起來了，並且佔領了院內的招待所。在「紅縱」到達的當天晚上，全軍文革副組長李曼村向「紅縱」交代任務時說：「總後的問題就是邱會作的問題，你們祇要解決了邱會作的問題，一切問題都解決了。」可見調「紅縱」來北京，並非「幫助」總後機關搞文化大革命，而是來打倒我的。

爲了打倒我，二醫大「紅縱」於一月十八日凌晨在總後系統造反派的會議上宣佈了三條方針：一要認定邱會作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二要打破群眾對邱會作的信任；三要發動群眾和幹部同邱會作劃清界線。

一月十九日，「紅縱」發表了很長的造反宣言。其中心內容是：「文化大革命的歷史任務，讓我們走上了階級鬥爭的第一線。我們要就是打倒邱會作，要就是被邱會作鎮壓。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我們要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爲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而戰！」

中央軍委同中央文革、全軍文革直接指揮的造反派在搞亂總後的問題上進行了一場嚴重的鬥爭：全軍文革要揪邱會作，中央軍委要保護邱會作。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全軍文革爲院校造反派樹立了八個左派組織和提出了要批判四個高級領導幹部（邱會作、李天佑、李天煥、杜義德），邱會作是要受批判的頭一名，軍委未予理睬。葉帥在軍委常委會上說：「文化革命是新鮮事物，很難不犯錯誤，我是軍委秘書長，比他們四個人犯的錯誤還多，如果要批判典型的話，應當對我進行批判，才是公正的。」

全軍文革碰了釘子，一肚子的氣。《緊急指示》下達時，全軍文革鼓動葉帥出來講話，由於軍隊造反派鬧得太不像話，葉帥對造反派徹底轉變了態度，葉帥兩次在工人體育場講話，對造反派非常不滿，還對總後的造反派發了火，這之後全軍文革又鼓動造反派糾纏葉帥，葉帥是很聰明的，當時既不能冒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又要把學生搞回學校，葉帥於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在京西賓館小禮堂進行了約二十分鐘的自我批評。此後，軍隊院校的學生就基本上回校鬧革命去了。

全軍文革亡我之心不死，積極策劃，搞亂總後機關，對我要下更大的毒手。

徐帥的命令

一九六七年一月，「紅縱」在張春橋的建議下，江青批准他們捲土重來。這次他們來，如同受了傷的老虎，特別的兇殘，他們到總後大院之後，首先是搞白色恐怖，當然，主要目標是對準我的，也把總後機關徹底搞亂了。

「紅縱」是打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軍醫大學紅色造反縱隊的旗子進入總後的。在隊伍的前面有十幾個標語牌，其中寫著「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邱會作」，「同總後革命群眾在一起，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打倒邱會作解放全總後」等等。

「紅縱」到處煽動遊說，「中央已經決定把邱會作打倒，不能回總後了（當時我還在西山養病）」，「中央文革定邱會作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林副主席把邱會作一腳踢開了」，「毛主席，周總理再也不保邱會作了」等等。這些謠言，既狂妄又惡毒。

「紅縱」在總後機關把大字報貼滿了各個角落，抓了數十名各級領導幹部關在辦公樓裏，設了臨時監獄，被關的人受盡百般折磨。凡是不同意「紅縱」觀點的幹部都被抓起來批鬥。被抓的人中，極大多數都是堅決與之鬥爭到底的。

「紅縱」捲土重來之後，雖然用盡了各種毒辣手段製造白色恐怖，但機關還是亂不起來，這時「紅縱」很著急，全軍文革更著急。全軍文革院校組召集「紅縱」的頭頭開了一個會，經過研究得出的結論是：不把邱會作抓出來示眾，總後的文化大革命就搞不起來。就是在這一指導思想之下，他們策劃了徐向前對我下命令的事件。他們的步驟是李曼村先向徐帥匯報，然後「紅縱」立即要求徐帥接見，圍攻、糾纏徐帥不放，直至把邱會作交給「紅縱」為止。

全軍文革院校組組長李曼村向徐向前匯報了總後文化大革命的所謂情況時說：「江青同志調造反派來，幫助部隊機關搞革命的決策是非常正確的。二醫大『紅縱』對總後的局面已經打開了，但機關還很穩固，大

家再看上面對邱會作的態度。邱會作住在西山，對總後的保守派進行遙控。」

徐向前發問：「你們說，對邱會作應當怎樣辦？」

李曼村即說：「要邱會作到『紅縱』去三同（同吃，同住，同搞革命）是最好的辦法。」

「林副主席、葉副主席以軍委的名義安排他在西山養病，現在要他出來，還要報告軍委批准。」

「你也是軍委副主席，可以下命令嘛，領導幹部到群眾中，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號召的，是中央文革再三強調的。」

徐向前回答說：「我同江青同志商量一下。她是中央文革的領導，又是全軍文革的顧問，對軍隊的文化大革命很關心。」

徐向前和李曼村談話以後，「紅縱」就闖進了徐帥的接見室，糾纏徐帥不放。

以上這些話是李曼村被關起來之後交待的。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下午五時，我在西山接到了徐向前親自打來的電話，我是有史以來第一次接到他的電話。他對我的身體情況如何連一個字都沒有問，就直截了當地對我說：「你還住在西山是很不合適的，總後系統的革命群眾對你的意見很大，你應立即回去參加文化大革命。關於你的問題，江青同志都認為你的問題不簡單，你是頑固執行了劉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現在你立即下山，回總後去參加文化大革命。我現在不是以全軍文革組長的名義和你談話，而是以軍委副主席的名義向你下命令，你必須堅決執行命令，立即回總後去！」我一聽也就起火了，祇回答了一句：「堅決執行命令。」既然徐向前是對我下命令，我也沒有說話的餘地了。

我接了電話之後，立即向秘書說：「晚飯後，回總後！」晚飯後我即步行下山，去軍事科學院葉帥的家中辭行。我原以為葉帥知道我要回去，便對他說：「我這就回去了，看葉帥還有什麼指示。」

「你到什麼地方去？」

「回總後去！」

「『紅縱』在總後鬧得很厲害，你現在不要回去。過幾天看情況再說。」

「不行呀葉帥，徐向前以軍委副主席的名義向我下了命令，我祇有堅決執行命令。我不怕造反派！」

「啊！有這回事嗎？我根本不知道！」我把徐帥命令的全部內容說了一遍。

此時，從來不說髒話的葉帥脫口而出一句「他媽的！」他皺了一下頭眉並歎了一口大氣說：「我打個電話問一下情況。」一會，葉帥從內間出來向我說：「你說的情況屬實。現在就這樣辦吧，其中的微妙你是會想得到的。你回去之後的事就由我來管了，我就叫傅崇碧做具體的佈置。」接著葉帥就要他的秘書通知西山管理科長杜海舟把我的秘書、警衛員、司機等帶到葉帥家裏來。葉帥說：「我要向他們交代幾句話。」我的工作人員到了後，葉帥對大家說：「邱部長回機關去領導文化革命，你們隨他回去，對這個問題，你們要正確對待。毛主席，林副主席、周總理，還有我們幾個對邱部長是心中有數的。如果造反派搞到你們頭上，你們要站穩立場。」

同葉帥分別的時候，我緊緊握著葉帥的手說：「我什麼都不怕，請葉帥放心！要是我被『紅縱』打死了。也算革命到底了！不過，徐向前給我下命令的實質問題，並非命令我個人，是發出了一個信號，林總、葉帥叫各大軍區的領導到北京『躲反』，徐帥做的相反，是把大家往虎口裏趕，我看軍隊要亂了。請葉副主席要十分注意自己的處境。」葉帥心情沉重，一句話沒有說，祇是眼眶濕潤地站在門口，看著我走去。

在回總後的途中，我向秘書呂玉潤、警衛員蔣平安、司機張自貴說：「你們回去，要做遭殃的準備。運動來了，你們該怎麼辦就怎麼辦，我有缺點錯誤你們可以揭發，沒有關係。文化大革命之後，對有意整我的人，我一個也不要。」我的話他們都記得很清楚。

到了五棵松的時候，總後文辦派司令部戰勤處長魯智在那裏等候，攔阻我不要回去。我向魯智說：「不要緊，我要回去！我要讓徐向前看看毛主席、林總、周總理的兵是啥樣子？我不能給他們丟人，更不能做膽小鬼。」

魯智勸我說：「部長，不是膽不膽小的問題。你回去有生命危險！另外，總後日常工作量這麼大，任務這麼重，機關一亂，你再出意外，那總後就全完了！」

「你說得對嘛。徐向前他對我負不負責是小事，對總後不負責是大事！不過，我就要看看徐向前究竟能把我怎麼樣？不要怕。走！」

在五棵松，魯智還說：「你現在不能回去了，徐帥的命令一傳開，機關大亂了，機關二級部長、副部長以上的幹部很多都被『紅縱』抓起來了。」

我毫不猶豫地回答說：「我的部下都被抓起來了，我更要回去。」我同魯智開玩笑說：「造反派祇打我，就不打他們？我的肉打了就痛，他們的肉打了就不痛？刀山火海，我去闖一下嘛！」

正在這時，葉帥的秘書帶著衛戍區的幾個幹部戰士，趕到五棵松堵住了我，說葉帥還是叫我馬上回西山，全軍文革也要聽軍委的，請部長不要意氣用事。我很冷靜地說：「請轉告葉帥，我謝謝他。我不是感情用事，我是顧全大局，已經牽涉到元帥們的關係了，我必須顧全大局。」那時的情景，真是含淚而別。

我要魯智先回去，告訴文革辦公室向廣大幹部和群眾轉達三點：「一，我們要相信毛主席、林副主席、黨中央，大家不要為我擔心；二，大家要團結起來，同違犯黨紀國法的行爲鬥爭到底，三，黑暗是暫時的，別有用心的人是打不倒我的。」到了機關之後，我有意繞到東門（生活區）進機關大院，車開得很慢，我看到禮堂門口到處都是戴著袖章的造反派，這時我乾脆下了車，走路回家，機關的幹部看見我回來了，並徒步往家走，都大吃一驚……到了我的家附近，到處都是三五成群的人，手持棍棒「恭候」我並跟著進了我家中，我剛坐下，造反派就說：「現在請你去同我們一起搞文化大革命。」我還未見到家裏任何人，就被帶走了。「紅縱」預備好了一輛大卡車，把我拉到衛生部辦公室三樓關起來了。我通過辦公區時，看到各個辦公樓燈火通明，裏面吵叫聲很厲害，原來各個辦公樓都關了不少幹部。

在我的房間裏，有六個人同我「同住」。大約是十九日晚上九時，即把我關起來之後不到一小時，「紅縱」的高音喇叭就播送了他們的戰報，內容是：「在徐向前副主席的命令和全軍文革的支持下，邱會作被捉拿歸案了。這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勝利，總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

我關起來之後，心裏非常坦然。第二天下午起，就讓我觀看「紅縱」和機關的造反派押著幹部戴高帽子在遊行，我記得起來的有饒正錫、羅

文、傅連璋，陳龐，王用久等人。造反派要傅連璋邊敲鑼邊說：「我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他們這樣做，既是在糟踏幹部，也是在做給我看的。看管我的人問我說：「你對他們受到應有的懲處有什麼看法？」我回答了一句話：「按照毛主席的教導造反，才算有理。」從第二天晚上起，造反派每天晚上都要對我審訊一次，每次的時間都在四小時以上。他們的審訊，除了謾罵什麼內容也沒有。

一月二十一日晚上，「紅縱」押我去工人體育館「觀看」了一次批鬥大會。那次主要是批鬥劉震、劉志堅、廖漢生、成鈞等人。劉志堅自己「左」了一番，現在也成了造反派的階下囚。我親眼看到了造反派的法西斯暴行，造反派對革命幹部的殘酷真是空前未有的。批鬥大會（實為武鬥大會）由「紅縱」的副手汪志杰主持，在批鬥開始時他指著我說：「邱會作你老實一點，他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同我一起陪鬥的有還有黃志勇。批鬥開始不久，有人斷了電，批鬥就被迫停止了。

一月二十二日，我的孩子承光，以爲我換衣服爲名闖到我的房間裏來了。孩子進來之後，看到我真像個囚徒一樣，祇是流淚，說不出話來。他在手掌上寫好了幾個字：「上頭態度好，很快解決。」他伸開巴掌給我，但我花眼，看不到。我即要孩子給我剪手指甲，孩子理會我的意思，再次伸開手掌，也就看清楚了。孩子知道我看清他手中的字，他也就走了。

一月二十三日上午，看管我的學生想請假出去，他們的小頭目沒有同意，他問：「不是二十八號再開批鬥大會嗎？」小頭目說：「聽李部長說，上面要保，我們要爭取主動，提前開會，連續作戰。」

一月二十三日下午在總後禮堂和二十四日上午在總後機關大操場，二醫大「紅縱」分別對我搞了各達四小時的殘酷批鬥。

批鬥大會開始之前，即把我由衛生部辦公樓押進了會場。會場沒有搞什麼佈置，祇是在舞臺上掛著一條橫幅，上面寫著「解放軍第二軍醫大學紅色造反縱隊批判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邱會作大會」。會議將要開始時，全軍文革副組長謝鏗忠帶著兩三個工作人員來到會場，坐在人群之中觀看批鬥。

批鬥大會開始時，「紅縱」主要頭目錢信莎在臺上大喊一聲：「把邱會作押上臺來！」頓時，兩個兇手要把我拉上臺去，我掙脫了他們的挾

持，毫無畏懼地走上臺去了。此時，臺下的人鴉雀無聲，都在睜大眼睛看我的行動。

我上臺之後，錢信莎走到我跟前，一手把我的領章、帽徽扒掉了。同時一個高大個子的人用勁搗了我一個耳光子，我不由隨即側身倒下去，臉部恰好磕在臺前的梗子上，當時我祇覺得頭上嗡的一聲，就不省人事了。他們用一杯水潑在我的臉上，我醒來之後，爬不起來，還是那個打我的大個子把我提像東西一樣地提起來，我站起來之後，感到頭暈、半邊胸部疼痛，口腔也很痛，嘴裏往外流血，此時，全場還是鴉雀無聲，恐怖氣氛籠罩著會場。錢信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大聲宣佈：「批鬥開始！」

造反派的刑法

幾個劊子手兇狠狠地來到了我的跟前，他們是來執行法西斯的八大刑法的。

(1) 向毛主席請罪。這要兩腿併攏，兩手垂直下伸。用細鐵絲在脖子上掛一塊二十多公斤的鐵牌子，鐵絲嵌入肉裏，疼得難以忍受。這還不算，劊子手還要把鐵絲左右拉動，每三、五分鐘拉一次，鐵絲嵌到肉裏鮮血直流。開始拉鐵絲的時候，疼得難忍，後來麻痺了也就不知道痛了。

(2) 向「造反派」認罪。這要雙腳跪下，兩個人將我雙手反擰，頭低下，掛在脖子上掛的那塊大鐵牌子，下端還不准挨地（因為鐵牌子挨地重量就輕了）。在難以忍受時鐵牌子自動落到地上，他們就會把我的頭髮向後一揪，牌子也就離地了。

(3) 向「造反派」致敬（噴氣式）。這一刑法要六個人協同動作，四個人把我的四肢各持一肢，抬到空中起來，前面站一個人揪著我的頭髮，後面一個人推著屁股，揪頭髮的人叫出口令：放！六個人協同一致地把我向前一拋，整個人猛地懸空落在地上。

向「造反派」致敬不容易做好，指揮官是總後政治部文化部俱樂部主任申茂功，他們爲了達到應有的效果，在武鬥之前曾經領著打手練習過多次。

其他的刑罰還有：

(4) 打倒鎮壓「群眾」的劊子手。

(5) 打倒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6) 打倒「反革命分子」。

(7) 「造反派萬歲」。

(8) 向「革命」群眾請罪。

這次武鬥，從開始到結束在四小時以上。「紅縱」對我執行每種刑法之後，劊子手們都要對著我喊三句口號：一、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二、祝願林副主席身體健康；三、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邱會作。

在對我搞了三次噴氣式之後，我也就昏厥過去了。他們把我拖到後臺，我醒來後，他們叫來事先在後臺值班的三〇一醫院的心臟病專家黃宛給我做檢查，黃摸了我的脈搏和聽了我的心臟，我當時眼睛直盯住黃宛，向他示意：不管我的心臟有問題還是沒問題，面對殘酷的武鬥，你祇要說聲「有問題」，我也得救了。我畢竟是你的部長呀，你們這些專家是我費了多大的勁，才要到總醫院來的。但我的想法落空了，黃宛竟說了兩個字：「無妨」。這樣，我又被拉上臺，繼續向我進行武鬥，我很快就又不知人事了，待我清醒之後，是躺在地板上的。我不能動了，「紅縱」的三、四個人把我抬上一個三輪板車，拉到總後衛生部辦公室三樓。

一月二十三、二十四日，是我遭受最大災難的日子。

二十四日上午在總後大操場的武鬥，基本上同頭天下午在禮堂上是一樣的。劊子手給我剃了一個陰陽頭。這一刑法，除了醜化人之外，沒有增加疼痛。

那天中午，吃飯的時候，看管我的人，又在用上海話在互通情報，我能聽懂一些。一個人從門外氣沖沖地進來說：「李部長批評我們祇是打人，不注意擴大政治影響。今天連夜要把廣場上的舞臺加大，要鬥得像個樣子。」從他們的話裏，可以知道一場更兇殘的武鬥明天就要來了。

本來，我對生死根本就無所謂了。但二十四日下午一個人躺在地板上，思緒萬千，我突然悟到了：「我現在死了就是做了野心家的犧牲品。我要爭取活著，祇有活下去才能同他們鬥爭到底！」爲了活著，當即採取了兩個措施：一是向毛主席、林總、周總理求救；二是爭取晚上回家一趟，設法搞點防身的用品。

當時，我是由總後保衛隊的戰士看管的，看管我的造反派從外面回來時，看管我的戰士回去吃飯了，他看到祇有我一個在房子裏，以爲保

衛隊把人撤了。於是，他們立即打電話到總後保衛隊，要派人來值班。保衛隊的人真是聰明，他們派的人，恰好是我的警衛員蔣平安，我告訴保衛隊的人真是聰明，他們派的人，恰好是我的警衛員蔣平安，我告訴小蔣，我要給毛主席寫信，小蔣很機靈，他在樓道裏轉了一會，找來一個大前門的煙盒和一個鉛筆頭。我的右手被打得不能動彈了，左手還勉強可以動一點，於是，我用左手給毛、林、周寫了一封很短的信。信的內容大意是：「每天對我武鬥。明天死活難測，請救我一命，我會同過去一樣，跟毛主席革命到底！」信寫好之後，小蔣立即把信藏到棉帽的夾層裏，他回去換班時，跑到我家裏把信交給我的炊事員劉玉勝。劉在解放戰爭中就是我的炊事員，我們有幾十年的革命友誼，他立即把信交給我的兩個小兒子光光和毛毛並叮囑他們把信轉送到通信兵部胡敏那裏去了。

我的家被造反派抄了多次並被霸佔，成了「全軍批判彭、黃、賀、羅造反聯絡站」的辦公室。胡敏被趕到通信兵去了，她當時是通信兵衛生處處長。通信兵與總後是一牆一路之隔，總後武鬥現場的大喇叭不斷傳出揪鬥我的情況，胡敏心急如焚，不斷到處打電話求救。當時通信兵主任江文同志，通信兵後勤的郭政委，軍委一號臺的同志們，還有胡敏的兩個助理員，都盡了最大的努力幫助胡敏。

胡敏首先打電話到楊成武處，他知道我和楊關係很好，但趙志珍接了電話給推了。這也可以理解，因為楊還沒有聽到毛、林、周的聲音，在那樣混亂的情況下，說錯一句話就可能導致自己的垮臺。胡敏祇得把電話打到葉帥處，值班秘書很負責、很著急，叫胡敏不要放電話，立即用另一部電話找葉帥，但一時聯繫不上。胡敏又打電話到京西賓館的黃永勝處，警衛員說：「首長在上廁所，請等一會再打。」黃聽到後，沒有上完廁所就跑出來接電話，胡敏說：「能不能請黃司令給徐帥求求情，叫造反派不要把邱往死裏鬥。」黃說：「徐那裏我不便去，去了也未必能講通。你不要急，我馬上想辦法找到葉帥，並親自到葉帥那裏去。」黃果然找到了葉帥，葉帥當機立斷，一方面命令衛戍區準備搶人，同時火速到毛家灣向林總報告。此時，我的求救信也到了胡敏手上。說來也巧，我的信到時，胡敏剛好要通了林辦的電話，林辦秘書郭連凱一面安慰胡敏，一面說馬上派人去取我的信。這樣我的信送給林彪辦公室了。

葉帥到了毛家灣向林彪一報告，林大為震怒，立即說：「備車，我要去接邱會作！」葉帥和葉群一聽就急了，好生相勸。葉群馬上要通了總

理，總理甚為著急，他說：「我正在大會堂接見群眾，等到會完了就誤事了。我讓伯達同志立即趕到毛家灣。」周總理在大會堂就立即報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說：「我是保邱會作的！」總理心裏就更有底了。

陳伯達到毛家灣後，林對陳說：「你是文革組長，對群眾有說服力。你立即通知造反派放出邱會作！」陳可能是第一次見到林彪下命令的樣子，有些緊張，馬上用紅藍鉛筆在一張紙上寫下：「立即放出邱會作，陳伯達。」葉群拿著陳伯達的手令，火速趕往總後大院的武鬥現場。葉群正在途中，葉帥派去救我的衛戍區指戰員早就趕到了總後機關偵察情況，準備搶人。

零點得救

爲了應對更大的武鬥，我要求回家去了一趟，擦擦有血跡的身子。晚上警衛員扶我回到家裏，令我慘不忍睹的是，我的家已被造反派糟蹋得不成樣子了，全家的東西被搶劫一空，房子被造反派霸佔了。全家的人，兩個小男孩光光和毛毛由老炊事員帶著躲在灶房，小女兒被老戰友接走了。我看到家裏這種情況，更加鼓起了我的鬥爭勇氣，我決心爭取活下去。爲此，我要阿姨用小孩的舊棉褲給我做了兩個厚的護膝，還增穿了棉衣。這是爲了保護心臟和膝蓋骨所採取的措施。我臨走時，兩個小男孩躲在灶房裏跑出來，叫我爸爸，造反派擋住不讓我們父子相見，我也祇有忍心走了。

我回到衛生部三樓之後，盡量控制自己的思想活動，爭取睡好，以應付明天的苦難。在我睡得尚好的時候，有人用急促的聲音把我叫醒了，並說：「快起來，有急事。」

「到哪裏去？現在就去批鬥場嗎？」

「毛主席、林副主席派人接你來了！」

當我聽到毛主席、林總派人來接我這句話時，十分驚喜。我當時走路已經很困難了，是衛戍區兩三個戰士把我由三樓背下去的。當時，在一邊扶著我下樓的戰士很激動地對我說：「我們奉葉副主席的命令，在這裏幾天了，是在這裏保護你的。」我祇有向他們點頭致謝！我上了汽車之後，先是順著太平路一直向西走，兜了個圈子，再向東把我送到翠微路五號院去了。

到了五號院之後，葉群已經在那裏等候，葉群向我宣佈：「我是奉毛主席、林副主席、周總理、陳伯達組長、葉劍英副主席的命令來搶救你的。現在，我完成了光榮的任務！」葉群又說：「這是楊代總長暫時住的地方，你現在就在這裏休息。你以後到什麼地方去，葉副主席已有安排。」我祇有點頭致謝，心裏感激的話，一句也說不出來。

不久，衛戍區的幹部和總參管理局嚴俊政委的夫人丁超到通信兵把胡敏和我的大兒子路光接來了；緊接著路光又帶著衛戍區的幹部及幾個戰士偷偷摸到總後保衛隊把冒著危險給我送信的警衛員小蔣也接了出來。

二十五日上午，楊成武夫婦到我的住處來看我。楊成武在樓下就「老邱呀！老邱呀！」喊我的名字，我身子動不了，我躺在床上也激動的喊：「老楊呀，我在這裏。」他們上樓後，楊撲到我的面前，抱著我邊哭邊說：「老邱呀，我們來晚了，你受了大罪。」我向楊指著我的傷，並指著我被剃的陰陽頭，楊氣憤地說：「一群暴徒，一群暴徒！！」他們爲我流下了滿腔的熱淚，向我表示了真實的感情，我是永遠感激的，永遠不會忘記的！

晚上，葉副主席派身邊的工作人員杜海舟科長帶了三輛汽車來把我接回西山去了，我住在21號。我們的車還沒有到，葉副主席、聶副主席和西山的工作人員，已在我住的房子等候我。當把我由車上抬下來之後，有的工作人員哇哇地哭起來。葉帥摸著我的手（傷勢過重，不敢拉手）向我慰問，一直把我送到床邊。聶帥一個勁罵造反派：「法西斯！法西斯！這就是法西斯！」這是革命家庭的溫暖，這是首長對下級的愛護！這也是長者對晚輩的關心。

二十六日下午，劉伯承副主席、汪大姐來看我。劉帥的眼睛不好使了，祇能聽我講和用手摸我的全身。當摸到我身上的受傷處我有反應時，他把手勢放輕，並邊摸邊說：「這不是文化大革命，是壞人利用文化大革命害好人的。毛主席察覺到了問題，斷然派人去搶救你。這既是對你的關心，也是對部隊幹部的關心。」接著，蕭華、劉志堅、黃永勝、陳錫聯和正在葉副主席處開會的各軍區、各軍兵種首長都來看我了。

二十七日，葉帥親自叫來了軍事科學院門診部主任、醫生、護士給我治病並親自主持議定對我的治療方案。葉副主席自己用的一點人參、三七藥也給我用了。以後，葉帥幾乎每天早晚都要來看我一次，有時來幾次。我被打得傷殘，是在葉副主席的關心之下，得到了及時治療的。

更爲可貴的是，葉帥每天都會向我傳達中央的一些時政消息，這對我是極大的鼓勵和安慰。

毛主席、林總、周總理、葉帥救了我一命，我是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的救命之恩的！

全軍文革支持三座門靜坐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凌晨我被接走，對造反派是一個極爲嚴重的打擊。如果說，一月十九日下午，全軍文革給我下命令，是用突然襲擊的手段給革命群眾一個嚴重的打擊，那麼，時隔不到一個星期我被搶救走，也是用突然襲擊給造反派以及支持他們的全軍文革一個嚴重的打擊。全軍文革組長下命令，天塌了；邱會作被搶救，天晴了。在新的形勢下，這幫造反派恐慌萬丈，預感到末日的來臨。

我被救出後，李曼村嚇唬錢信莎說：「你們把邱會作幾乎打死，他要是保下來，你們就真正犯了大法。」「紅縱」認爲李曼村言之有理，祇有一不做二不休，再一次拚命把我拉下馬。

一月二十七日起，二醫大「紅縱」在三座門製造了震驚中外的「靜坐」事件。這是一次同毛主席、黨中央相對抗的事件！把文化革命醜化到了不能再醜化的程度！

一月二十五日凌晨，把我搶救出去的當天晚上，徐向前在京西賓館禮堂一樓會議室，接見了「紅縱」召集來的總後系統各路造反派代表五百人。這次接見，全軍文革再次不惜犧牲老幹部，倒向造反派一邊去了。

錢信莎：「徐帥，你不是支持批鬥邱會作嗎，爲什麼又要保邱會作？」

徐向前不說話。

錢信莎：「請你說一下，保邱會作的理由是什麼？」

徐向前：「我不保他，有人保他就是了。」

錢信莎：「我們要求徐帥再次下命令把邱會作交回給我們繼續批鬥。」

徐向前：「你們不是有『四大』的權力嗎？要批判誰都是可以的，至於我再次下命令就沒有人執行囉！」他不久就藉故身體不舒服，就宣佈接見結束了。

造反派正在惶惶不安，不知所措的時候，一月二十五日晚，全軍文革派人同機關「造反總部」、二醫大「紅縱」、後勤學院「星火燎原」，在

總後禮堂化妝室開了一個秘密緊急會議。會議的中心問題是：毛主席保了邱會作，造反派怎樣辦？李曼村首先說：「徐帥是支持你們的，這點你們聽懂了。現在你們要考慮的是怎麼樣達到你們的目的。」

錢信莎說：「毛主席、林副主席都保邱會作，這就難辦了。」李曼村說：「辦法還是有的，你們可以在機關搞簽名運動，在三座門全軍文革門口組織靜坐。這些辦法，都是表示群眾的意願和力量。毛主席是最相信群眾的。」「紅縱」完全接受指示，立即照辦。

三座門靜坐是全軍文革一手策劃的，參加靜坐的人數多達幾千餘人。靜坐「前線」的總頭目是二醫大「紅縱」錢信莎等人，後勤學院「星火燎原」管對外聯絡，機關「造反總部」負責全部的支援保障工作。歷時二十多天的靜坐，耗費了大量的資財。造反派從上至下對靜坐是全力以赴的，機關造反總部成了支援靜坐的「後勤部」，在領導幹部中，李耀副政委對靜坐的造反派給了極大的精神支援，他們每天要去慰問一次前線的「戰士」。

三座門是在一個三岔路口上，靜坐的造反派就在路邊安營紮寨，嚴重妨害了交通，造反派還把大標語刷在故宮的牆上，造成了惡劣的影響，群眾都說「解放軍鬧起來比老百姓厲害多了，還讓我們學習解放軍呢！」錢信莎他們靜坐的目的就是讓徐帥再一次把我交給「紅縱」。

周總理、葉帥密切注意三座門靜坐。在靜坐四、五天之後的一次中央碰頭會上，葉帥提出了用衛戍區部隊強行解決，陳伯達不同意。毛主席最後說：「讓他們鬧去吧，三座門鬧跨了，再蓋一座就是了。」

在實在鬧得不像話的時候，徐帥和陳伯達再次接見造反派時，都不同意他們的做法。陳伯達的話當時是管用的，造反派由三座門灰溜溜地撤走了。回來之後，就轉入地下活動，垂死掙扎。

周總理送我回總後

我被搶救出來後一直在西山養傷，我的肋骨被踢斷了，肝部被踢腫了，牙被打鬆了三顆，兩臂的韌帶都被撕裂了，鼻青臉腫、被剃陰陽頭就更不在話下了。由於總後的具體事情多，在那麼混亂的情況下，不少事情其他領導不敢做主，如總理辦公室問到的一些外援情況他們也不太瞭解，很多事情又轉到我這裏，我是躺在床上處理的。經過一個多月的

治療，我能下床了，但雙臂還抬不起來，有時總理來電話都是警衛員拿著話筒，我對著話筒講。

有一天，葉帥對我講：「主席非常重視外援工作，很多情況都在你腦子裏，你再休養一段時間能不能堅持工作？」我毫不含糊地說：「現在讓我回去，我也堅決執行命令。」葉帥聽了很高興。不久，由葉帥主持，總後團以上幹部在京西賓館開會，為我回總後工作創造條件，聶帥、蕭華、楊成武、葉群等人都參加了，他們都發表了講話，表明毛主席、林總、周總理對我的看法。聶帥說得更具體，他要求「科級幹部要找兩個人談話，處以上幹部要找三個人談話，把毛主席、林副主席保護邱會作同志的指示認真落實，確保邱會作同志能順利回總後主持工作。」林總、葉帥、聶帥對我的關心我是永遠銘記在心的。

我當時雖然傷勢還較重，胳膊還吊著繃帶，但因工作需要，我即奉命回總後主持工作。六七年三月三十日，總理打電話讓我先到釣魚臺集合，到了釣魚臺，江青在那裏，那時我還沒有和江青面對面說過話，總理看見我的手，忙對江青說：「邱會作同志手還抬不起來，沒有辦法給你敬禮呀，你能參加今天的大會，大家都很高興！」說完周總理一行就前往總後禮堂。

周恩來、葉劍英、江青、蕭華、楊成武等出席了大會。總理在後臺休息室對大家說：「總後像個小國務院，邱會作同志幫我做了不少事情。」臨開會前，總理看見我還吊著繃帶，就對我說：「會作同志，您能不能把身上的吊帶取下來，我們也要展現革命者的風采嘛！」總理說完，我立即叫警衛員把掛在脖子上的吊帶取了下來。大會一開始是葉帥主持的，然後葉帥突然對我說，這個大會還是由邱會作同志來主持，這時總理帶頭鼓掌，全場也鼓掌。我非常激動，沒有講什麼，就即請總理講話。周總理在大會上發表了熱情洋溢、感人肺腑的講話。總理說：

同志們！首先，讓我代表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代表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向你們問好！

因為今天是你們的部長邱會作同志身體的健康在開始恢復的時候，回來主持工作，我們借這個機會講幾句話。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場大風浪中，任何人，都是如同我們林彪同志所指示的，在這場大風浪中，要學會鬥爭。當然，我們的矛頭是對準我們黨政領導機關和其他的單位中間那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同時。也是要徹底批判在過去一個時期內執行過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那些人，這樣來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更堅持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來進行這樣的兩條路線的鬥爭。

在解放軍中進行這個鬥爭當中，我們每個解放軍指戰員同志們，都要如同林副主席所指示的，我們既要參加這個鬥爭，成為革命的一分子，同時又要把自己做為革命的對象，就是要去掉我們思想中的一些私字。……實際上在大風浪中，有時我們這些負責同志，即使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也就是說毛主席、林副主席司令部的人，也免不了要經過一些風浪，這也是考驗我們。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覺得你們的部長，我們的戰友邱會作同志，是經住了這次考驗的。

我們要識別幹部嘛，不僅要看幹部的一個時期的工作，而且要看整個歷史。在這個階級鬥爭中，我們要區別兩類矛盾嘛！究竟是敵我矛盾，還是人民內部矛盾；是資產階級當權派，還是執行了一個時期的錯誤路線，或者是其他的嚴重錯誤，要區別這個矛盾嘛。同時，要看我們幹部的整個歷史，不要看一個時候的錯誤。從這個意義上說，許多革命的小將，在中央和中央軍委十月五號緊急指示的號召下，起來在解放軍內部來鬧革命，特別是軍事院校，後勤工廠，醫院，以至文藝隊伍，實行大串連，允許他們到北京來，除了接受我們偉大的領袖接見以外，自然他們也要到我們解放軍各個地方看看。後勤所管的軍事學院、醫院、工廠、文藝部隊，他們也要到後勤大院來看一看嘛。所以你們這裏住滿了人，就鬧了一場大的風波。……這樣，當然你們後勤大院最高的負責同志——邱會作同志，他就要首先變成了一個鬥爭的目標了。……這些小將們他也不清楚整個歷史，也沒有辨別兩類矛盾，有的就做得有些過了。但是呢，我們負責的人、指導全軍的人，應該站出來給他們解釋。……現在，許多院校回去了，他們

自己整風，就會把兩類矛盾，一個領導的整個全面地來觀察，他們就會得出應該得出的結論。毛主席號召每個人要獨立思考嘛，在鬥爭中是站在哪一邊？是站在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邊，還是站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邊？是挺身而出，敢於指出別人的錯誤，也敢於承認自己的錯誤。是敢於向小將們講清道理，幫助他們，還是不管是非，就那麼隨便地煽風點火？那麼我們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應該煽風點火的，比如說，煽社會主義之風嘛，點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火，這是必要的，也是對的，但是，也不要有些時候去煽陰風，點陰火，那就不許可了。這都是考驗，這場鬥爭考驗每一個人。……這就要求我們總後系統的後勤部門工作人員要繼續學習，繼續參加這個鬥爭。我相信，邱會作同志健康開始恢復，重新來領導我們後勤工作，一定會做得更好，因為他有了經驗嘛！

我曾經說過，邱會作同志是個老同志，很小的時候就參加我們的紅軍，我還在江西蘇區的時候就跟他相識，到現在來說三十六七年了。長征的時候我們就在一起，特別到了陝北，那時紅軍被迫地離開了老根據地，轉戰北上，集聚在陝北。那時候，我們的領袖毛主席、林彪同志，都在前線作戰，我在後方主持工作，那個時候邱會作同志就參加了後方的後勤工作，我們差不多幾乎每天要見面的，計劃為前方籌運供應的事情，渡黃河東征的事情，轉戰到西邊，所以那一陣子我們共事最密了，我覺得他是一個很能夠工作的同志，也是年輕有為的，是一個很有希望的同志，跟著毛主席、林彪副主席走。這個看法到現在來說，已經超過了三十年了，我的看法得到證實，覺得我的看法基本上沒有錯。三十年中，他做了很多工作。先在後勤，然後又做政治工作，在抗日戰爭中，特別是解放戰爭，轉到東北，然後南下，又做政治工作，最後在林彪同志主持軍委的時候，他又來做總後的工作。接近四十年了，可以說，他是一個堅定的紅軍老戰士。這是他整個歷史的主流嘛，好的方面嘛！但是不是沒有缺點，有可能在某些方面還有嚴重的缺點。所以，毛主席的學生，林副主席的戰友，不可能在我們一生中不犯錯誤，我就是一個嘛。也犯過

多次錯誤嘛！但是我有決心，有了錯誤，敢於正視錯誤，而且決心改正錯誤。不但是中年嘛，現在到了老年，我還是這樣想嘛。……不是說緊跟毛主席嗎？按照林彪同志的話：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好學生。我相信我們後勤的戰士，要學會這個精神，希望你們學會這個精神。同時，也希望邱會作同志現在又來領導我們後勤工作，一定會做得更好。我們長期的後勤工作，遠的不說了，就是我們解放以後，和平的十七年，後勤工作可以說，有三個時期，初期是剛開國，首先就遇到抗美援朝，那個時候，我雖然做政府工作，幾乎也是大部分時間用在抗美援朝上，特別在後勤支援方面管得多。那個時候，一道共事的就是楊立三同志，恐怕是你們第一任的後勤部長，解放後不久，這位老戰友是病故了，他管後勤工作的那一段時期，在抗美援朝上是盡了很大力的，今天在座的還有跟他同事的嘛，這是我相當熟的那個三年多。後來，彭德懷從朝鮮回來了，他管國防部、軍委，那時任何人都不能過問的，主席的話他都不聽嘛，所以我們就沒接觸了。這個時期，先是黃克誠，後是洪學智，那時他們就是開口向政府要款子，要錢，要東西就是了。那是一個長時期。第四任恐怕就是邱會作同志。林彪同志主持軍委，那麼我們的關係又密切了，又協作了，可以說，凡是需要部隊支援的，祇要黨啊，政府啊一要求，他總是支援的，你們做後勤工作，都會感覺到，都會想的到嘛，支援了許多，所以這點，應該說他是一個稱職的，而且做得出色的後勤部長，是歷屆後勤部長最好的一位。這不僅是我的看法，也是黨中央、毛主席的看法。

所以，在工作上也有個比較嘛。因為鑒定一個同志的全面工作，也還得跟別的比較，跟好的比較，跟壞的比較。對立面有個黃克誠，洪學智。那麼一樣好的，有楊立三同志，但是他超過楊立三同志，因為他時間長，楊立三同志時間短，成績也超過他，因為現在管的方面大，現在管的不僅僅是我們解放軍嘛，我們解放軍現在擴大的，已經包括許多工程部隊都進來了。現在，目前在奪權的階段，我們偉大領袖給我們解放軍的偉大任務，要我們

支援革命的左派，支持農業，支持工業，交通，財貿，衛生，教育等等，實行軍管，實行軍訓，不僅對大、中學校實行軍訓，小學的高年級，乃至工廠企業事業單位，最後乃至機關都要實行。這個五大任務，非常的繁重，光榮，既光榮而又繁重，在這個上頭，後勤就要起更大的作用了。……後勤工作在邱會作同志領導下，學主席的著作，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舉得是高的嘛！去年主席的《五七指示》，給林彪同志的回信，就是因為後勤提出來的報告得到稱讚的嘛，得到推廣的嘛！現在的五大任務，確確實實是要使我們的軍隊從各方面去接觸人民，更進一步地跟人民群眾結合在一起。所以這樣的工作，對於我們解放軍來說是光榮的，對後勤工作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鼓舞。現在可以說，應該是我們後勤工作的新的一章的開始。我的話完了。

正確對待造反派

總理講話之後，總後的形勢很快就轉過來了，治理整頓成了很重要的工作。在文化大革命的過程中，總後黨委始終是堅決反對造反派，尤其是全軍文革御用的造反派，並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也取得了一個一個的勝利，由於文化革命的複雜情況，在鬥爭中也有失誤的地方。在當時極「左」的思潮影響下，有些人 and 事搞過了，對於領導責任，我全部擔當。再有，例如對造反派借刀殺人這個問題，我就發現的晚了，上了造反派的當。

我們對造反派的政策基本上是成功的，把多數人都爭取過來了。總後機關亂的程度是全軍的典型，但造反派受到處理的人數並不多。出現這種好的情況，最基本的就是執行了黨的政策，爲了縮小打擊面，擴大教育面，對執行政策提出了有力的措施。例如，在機關我釘了四個不能打倒的「界樁」。這就是：丁力（大同辦事處政委），羅文（運輸部部長），保衛部一個幹事（機關造反總部一號頭子），衛生部一個統計員（造反派骨幹，專門喊口號的），這四個人很有代表性。丁力在文化革命開始的時候，同大家一樣，有某些錯誤，但後來轉變了，並且一直工作很好。羅文在文化大革命前就站在黨委的一邊，我對他一直很欣賞，在文化大革命中，開始很好，並成爲二醫大「紅縱」要打倒的十個人之一。這四個人：

邱會作，張池明，饒正錫，楊恬、王希克，羅文，陳龐，陳念棣，王用久，王佐邦)，但在關鍵時刻，即在全軍文革組長下命令之後，說了一些錯話，幹部群眾對他有意見，我也沒有把握住，沒有再重用他，現在看來是很遺憾的事。其餘兩個人都是「五大部長」利用的人了。軍事醫學科學院造反派頭子（該院三所一個技術員），也是因我保護而沒有被打倒。用具體的政策指導鬥爭，產生了極好的效果，造反派的大多數轉變了。

湯平是總後副部長，是紅軍老幹部，我們在長征中就見過面，在延安就熟悉了，相互關係一直比較好。五九年，我當了總後部長，湯平當時是財務部長。他對我當部長很高興，對我寄予希望也很尊敬。他對我說：「你老兄當我們的部長，很合適，後勤建設大有希望！中央軍委真正用人唯賢，希望你大展宏圖，取得成功！」在十多年的工作中，湯平對我是很合作很支持的。

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湯平主動提出：「我是地主出身，解放後我回家時又犯過立場的錯誤，我的錯誤總政還未給我做結論（現在看來也不算什麼問題）。今後討論文化大革命的常委會，我就不參加了吧。」常委同意了湯平的意見。二醫大「紅縱」在總後鬧事時，全軍文革組長對我下了命令，他的秘書張彬建議他立即向造反派表態，這樣，湯平就被迫對造反派表態了。毛主席、林總、周總理保了我，總後的形勢又變了。湯平很懊悔，我也確定要保他，因為他一直是一個業務幹部，思想水平比較高，雖然在總後領導幹部中年紀是最大的，但工作始終很積極。那個時候，站隊的問題看得很重，很難擺平，我自己也沒有堅持。

六七年下半年總後機關開展大批判，財務部對湯平進行重點批判。批判進行了幾個月都很正常，湯自己也做了檢討。在批判將要結束時，湯平的秘書張彬起來「反戈一擊」，揭發了湯平的三反言行。張彬把他們平時談話的內容，如毛主席整三軍團和彭德懷、整劉少奇等都用大字報貼出來了，這在當時對湯平來說是引爆了一顆原子彈。當我知道此事時，曾立即交代文辦要注意張彬是否有什麼「奧妙」。文辦還沒有來得及做工作，湯平就先看到了張彬的大字報，一回到辦公室就跳樓自殺了。事後，我已經指出了，湯平是死在張彬之手的，他是借刀殺人的。不過，一個老幹部和自己的秘書扯亂談，應該是兇多吉少的。正好張彬要

反戈一擊找出路。對於湯平的死，我一直很難過，因為我當時是有能力有條件保他的。但這和加在我頭上的罪行完全是兩回事。

六七年冬，毛主席發出了：正確對待自己，正確對待群眾和正確對待反對過自己，又證明反對錯了的人。這「三個」正確對待，事實上就是怎樣對待造反派的方針。

造反派是文化大革命的產物，就軍隊來說，造反派又是在中央文革和全軍文革直接指揮下搞起來的。造反派骨幹分子是少數，極大多數是跟著趕時髦的，也有不少是受蒙蔽的。總後是在全軍文革直接指揮下，由二醫大「紅縱」，機關「造反總部」，後勤學院「星火燎原」搞亂的，是全軍大亂的典型。這三個造反派合起來有千餘人，對他們總的是教育問題，不是打擊的問題。人們似乎會這樣想：既然三個造反派把總後搞的成爲全軍大亂的典型，那麼，他們大多數人都會受到不同程度的處理的。其實，對他們處理，受到了紀律處分的，包括處理錯了的，爲數是不多的。後來公審時的起訴書真是造了無數的謠言，鄧小平這些人爲了政治需要，是需要謠言的。他們一方面整肅反對過他們的「三種人」，同時又撈起反對我們的「三種人」作爲工具來打擊我們。

錢信莎、陳政、王述臣、申茂興等人是總後系統十分典型的造反分子。

一、錢信莎。她是軍隊第一個造反派頭子。她的罪行不僅搞亂了總後機關，二醫大，後勤學院，軍事醫學科學院等單位，而且也是「鬥羅籌備處」的頭子，武鬥羅瑞卿、彭德懷、黃克誠、廖漢生、劉震、成鈞、劉志堅、李聚奎等人的兇手。她是軍隊造反派罪行最大的頭子之一。

對錢信莎這樣罪大惡極的造反派頭子，我們對她一直是進行教育改造，在一九六九年以前，兩三年的時間裏，都沒有對她進行處理，在學校學生分配時，並沒有讓她脫軍裝，錢信莎是正常分配的並且是分到總後直屬的青藏辦事處工作的。

錢信莎在文化大革命中搞打砸搶，搞武鬥，殘酷迫害老幹部，他對自己的罪行認識態度不好，她說是按照毛主席「造反有理」的號召幹的，是按照全軍文革的指示辦的。在全國在清查「五一六」時，才對她隔離審查。

二、陳政。他是東北遼寧南部金縣人。日本投降前，他在醫學院學醫，後來分配在總後系統工作，長期任總後政治部幹部部幹事。

東北解放後，發現日本投降的時候在遼南地區潛伏了一個很大的特務網，公安部認定陳政是該特務系統的中層骨幹分子。公安部將該案件列為重點案件，陳政即定為重點監察對象。一九五九年，我當總後部長之後不久，保衛部向我匯報工作時，他們詳細匯報了軍事醫學科學院、總醫院、幹部部三個特殊的偵察案件。後來，我考慮到在總後機關內部留下一個大的偵察案件，是很不妥當的，最容易洩露軍事機密，我提出了要調動陳政工作。保衛部又向我報告說：「陳政是一個大的重點案件中的重點監察對象，公安部要求對涉案人員，原來在哪裏工作就在那裏工作，動一個就容易牽動整個案子」。因此，對陳政不能提拔，也不能調動，祇有長期在幹部部工作，並且是總後機關內參謀、幹事、助理員中唯一的團級幹事。

一九六六年八月底，陳政就同二醫大「紅縱」秘密勾結上了，成為總後機關最早的造反分子。後來，又是「五大部長」的主要「軍師」，他對搞亂總後機關，是犯了嚴重罪行的。這樣的老特嫌分子，新造反分子，是堅決反對共產黨反對新中國的，他們趁文革之亂搞翻天的勾當，應當受到法律制裁。一九六七年四月間由總後常委提出報告，經全軍文革組長徐向前批准，並由衛戍區執行逮捕法辦了。陳政逮捕法辦是應該的。

三、張錦昌。張錦昌是總後營房部的助理員，是個「不平凡」的小人物，因為他是總後造反派的核心人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參加過營房部一次學習會，聽到他在會上發過一次言。他說：「從各地的情況來看，這次文化大革命同過去的政治運動基本不同的就是：過去是上面整下面，現在是下面整上面。為什麼呢？因為文化大革命是革修正主義的命，而修正主義又是發生在上面，不在下面。我們掌握矛頭對上的大方向就行了。」

張錦昌是言行一致的。二醫大「紅縱」一開始在總後鬧事，就發現了張是可靠的盟友，他們就密切合作了，後來並成為「五大部長」的「張軍師」。砸總後黨委辦公室，搶總後保密室，抄我的家，張錦昌都是先鋒。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我被林總、葉帥搶救出來以後，張錦昌積極

參加組織三座門靜坐，到全軍文革接待站要挾中央軍委。在三座門名爲靜坐，實爲耍賴，當時，全軍文革接待站從部隊調來了一批工作人員，觀點已經全部變了，他們根本不正式接待所謂「靜坐」的人，並且選用諷刺的語言進行了批評。張錦昌等人在三座門接待站，前後大概混了二十多天，熬不下去了就自己散伙了。

三座門靜坐失敗之後，張錦昌在造反派的骨幹會議發表了長篇講話。他說：「看來三座門靜坐是盲目的行動注定要失敗的。形勢變了，我們的鬥爭方式卻沒有變，我們過去對邱的認識太不夠了，全軍文革親自出馬都沒有打倒邱會作。現在看清楚了，邱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周總理，元帥們確保的人物。我們對邱的鬥爭不能就此結束，反而要在鬥爭中求生存。我們的政策可歸結爲四個字：『明擁暗鬥』。這就是說，明的不要再去惹邱會作了，但暗的還要鬥，否則我們就會被全部『吃掉』。」現在，我還能記得張錦昌帶著幾個殘餘的造反派幹得幾件事。

第一，衝擊會場。六七年五月初，陸海空三軍在總後大院廣場舉行大會，參加會議的群眾三萬餘人，各總部、各軍種、兵種、院校的領導幹部出席了大會。

大會臨要開始時，由於大會工作人員很忙，工作有疏忽，致使張景昌帶著總後機關的造反派一共十幾人，打著一面旗幟混進了會場才被發現的。文辦向我請示處理辦法我即命令：「收繳大旗，人員聽便。」爲了防止造反派藉機搗亂會場，大會工作人員強行收走了旗子，並宣佈參加會議可以隨便。造反派是不識時務的，他們在退出會場之前企圖鬧一場。總後文辦是預先有準備的，把他們一個一個地拉到會場外進行說服教育工作，接著就有一半的人覺悟了，公開聲明退出「造反總部」，並反戈一擊。

第二，抵制發毛主席像章。六七年冬，人民解放軍製作了一枚全軍統一的毛主席像章，並規定在發放的時候，各單位都要舉行簡單的儀式，借此在全軍進行熱愛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育。營房部發像章時，本來進行得很好，但在佩戴像章時，沒有舉行集體向毛主席致敬的儀式，張錦昌立即在現場發動了一場搗亂。他說：「在佩戴像章之前，不向毛主席致敬，就失去了儀式的意義。在我們這裏擁護毛主席的吼號喊的很

響，事實上不是那回事。今天應當停止發像章，改天重新舉行儀式。」他的意見雖然沒有得到什麼人的響應，但會場上起哄了一陣。

營房部主持會議的人是有水平的。他立即宣傳：「張批評在佩戴像章之前，沒有舉行向毛主席致敬，是禮節不周到。現在，大家都不許動，我們來補上這一課。」張景昌等人看到搞亂是不成了，就灰溜溜地走了。

張錦昌等人正在溜走的時候，主持會議的人又立即宣傳：「張錦昌等人拒絕接受像章，現在隨隨便便走了，至少是無組織無紀律。他們口頭上喊著擁護毛主席，事實上連像章都不要，這是什麼問題，大家都應當看清楚的。」造反派又吃了一次敗仗。

第三、抵制夜間巡邏。爲了保障軍隊各機關的正常工作，軍委命令各機關都要組織糾察巡邏，確保機關安全，限制造反派的活動，各機關還加強了夜間巡邏制度，楊成武還專門指出總後要特別加強力量。造反派對此十分惱火，極力進行抵制和破壞。張錦昌等人發動營房部很少幾個人，在司令部門口靜坐，抗議夜巡。我們還是做說服工作，等到只剩下張景昌一個光桿司令時，嚇得他也跑掉了。

公審時，張錦昌還去控訴我，公審的實質也就昭然若揭了。

四、王述臣。王述臣是後勤學院油料教研室的教員。他有嚴重的歷史問題，當過敵僞警長，有民憤，與血債案有牽連。王對共產黨充滿仇恨，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他是一個堅決造反分子並決心要奪取後勤學院的領導權。王從開始到結束都是後勤學院「星火燎原」的頭目之一。當時中央有個《公安六條》，王述臣這樣的人屬於「祇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的階級異己分子。但王述臣按捺不住對共產黨的仇恨，趁文革混亂之際，大幹反革命勾當，這和青年學生造反是完全不同的。例如，全軍文革組織造反派幫助搜捕內蒙古軍區來京潰散的警衛營時，王述臣藉機毒打警衛營戰士多人，並且還參與打死過人，王述臣又有了新的血債。

六七年一月下旬，「紅縱」正在總後禮堂對我進行殘酷武鬥的同時，「星火燎原」在該院東院的小山（黨委會議室）召開了「形勢分析」會議，「星火燎原」的主要骨幹分子十五人到了會，會議主要內容是通過決議，同意二醫大「紅縱」提出打倒邱會作的提議。在討論中他們發表了大量的反毛主席，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動言論，按照中央的《公安六條》，

屬現行反革命行爲。六七年冬「星火燎原」內部把會議全部內容揭露了，並交出了會議紀錄。爲了把責任全部推到王述臣身上，「星火」的「高參」小組，策劃了致死王述臣的陰謀，王述臣在隔離審查時，自知罪責難逃，他給老婆寫條子，讓他老婆在飯裏放毒藥，兩人同時自殺，他老婆照辦了，毒死了王述臣，但他老婆沒有吃。王述臣不是自殺的，是他的同夥，經過他老婆毒死的。事發後，我的秘書到了三〇一醫院現場，解剖時看見王的腸胃已經燒爛了。公審之後當時的軍委還追認王述臣爲烈士，這也是奇跡。

爲了搞清王述臣的問題，對他進行隔離審查是必要的。定爲壞分子也是正確的。但對王的處理中涉及的面過寬了，搞了一個五人的反革命集團，這就擴大化了。七〇年秋在複查後勤學院的案件時，我發覺了問題，應予糾正，但沒有來得及處理這個問題，我就倒臺了。

五、申茂興。申茂興是總後政治部文化部俱樂部主任。文化大革命一開始，他就是造反的積極分子。二醫大「紅縱」上訪隊住在總後機關內時，申就是最先與「紅縱」秘密聯繫的人之一，自始至終都是堅決主張造反的。

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之後，「五大部長」把準備武鬥邱會作及其「一夥」的任務交給了申茂興。六八年初，申被隔離審查時，政治部的造反派對申茂興連續毒打，並逼他自殺，名爲反戈一擊，實爲殺人滅口。申就是在毒打之後絕望而自殺死去的。

此外，文化大革命中，軍隊的工作都是按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辦的，總後的工作也是這樣。如三支兩軍、進「五七」幹校和清理階級隊伍、精簡機構、下放科室人員等等，這些工作必然涉及到幹部調動和處理。這些工作，不是對造反派的問題，而是涉及到所有人的問題。公審時說成是迫害，我是不能接受的。我是「有責無罪」的。這就是說，從領導責任來說，在總後死了人，不管是怎樣死的，我都負有領導責任。當然，我不僅沒有直接害死過任何人，也沒有授意過要整死任何人。比如說，我對李曼村是很痛恨的，但他是一個領導幹部，又沒有叛徒問題，也祇能一般處理了。現在想起來，死人問題有當時文革混亂的實際情況，但從領導的責任來說，這樣看是很不夠的，如果我當時清楚地發覺了造反派新的破壞手段，我是有條件，有能力保護任何人不致被整死的。

去「五七」幹校鍛煉，當時是幹部教育制度，每個幹部都必須執行。總後在寧夏賀蘭山建立了一座幹校，在校鍛煉的幹部千餘人。去幹校的。總後在寧夏賀蘭山建立了一座幹校，在校鍛煉的幹部千餘人。去幹校學習的有兩種辦法：離職學習和在職輪訓。在機關整編之後，幹部多了百分之三十以上，這些幹部，除了參加三支兩軍工作之外，祇有到幹校學習。無論哪一派的人都要去學習，祇有先後不同之分。從比例上來說，造反派去學習的人當然多一些的。我們不能把擁護總後黨委和領導幹部的人都搞到幹校去，把反對總後黨委和領導幹部的人留在機關工作吧。當時，各單位都辦了幹校，中央辦公廳都辦了幹校，總後不可能不辦幹校。毛主席的女兒都上了幹校，其他人沒有理由不上幹校。對於上幹校，誰去誰有意見，上幹校離開北京，到了基層生活條件苦多了，尤其是家屬的工作難安排，子女上學有不少困難，這都是事實，但這不是總後一家子的問題，是整個中央的決策問題，這也說成迫害不是實事求是的。上幹校比後來鄧小平清理「三種人」應該是好多了。復員轉業也是全軍一致的行動，並非專門整造反派的。犯了錯誤作復轉處理的幹部當然有，部隊歷來也是這樣。

對投降造反派的老幹部問題，我向來最痛恨三種人：黨內鬥爭的兩面派，對敵鬥爭的叛徒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投降派。在文化大革命中，領導班子和老幹部隊伍中發生分化，也是文化大革命的產物。痛恨不僅不能解決問題而且還一定要犯錯誤。基於這樣的認識，我對總後一批投降造反派的領導幹部的處理持慎重態度。對他們的處理也是寬大的。這裏我祇著重說一下對饒正錫的處理。

一九五九年我擔任總後部長，饒是總後副部長。他對我的工作，是支持的，我們的工作關係是比較好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我提議他為總後文化大革命小組組長。我們兩個都是二醫大在「紅縱」反對的對象。一九六六年冬天，全軍文革通過「紅縱」向他傳達了什麼人的「意圖」之後，他的態度變了，投到「紅縱」一邊去了。

一九六六年九月六日，在軍委常委擴大會議上，林彪談賀龍的問題時，順便點了「李聚奎，饒正錫是彭、黃漏網分子」。軍委常委會是在人大會堂四川廳舉行的，記錄是蕭華的辦公室主任鄭漢濤、軍委辦公廳秘書處長陳某（名字記不起了）。會議開始時，由林彪自己主持，並傳達了

毛主席對賀龍問題的指示，後來由葉劍英主持進行了討論。元帥們發言一致擁護毛主席的決策。

對李聚奎，饒正錫的問題，我在總後黨委會上並沒有正式傳達，祇是向常委們分別談了一下，我也同饒個別談了。並向他出了一些點子，一是要他寫一個表態的報告，通過葉帥轉給林彪；二是自己不要盲目去做檢討；三是要他辭去文革小組組長，省得惹事。我的意見他都同意了，並且照辦了。當時，饒正錫對自己的問題，表現得很緊張，我給他出的點子，他也表示感謝。

饒正錫寫給葉轉林的信，是我修改的，由當時的秘書科長劉明璞（饒原來的秘書）抄寫，他自己簽名上送的。葉帥收到信之後，曾經同我說過「饒的態度是好的。你對他的保護和幫助是同志式的。他的信，現在壓在我這，等適當的時候，我帶著他的信去向林當面說一下。現在不是解決問題的時候，你轉告饒不要過於緊張……」葉的指示，我原原本本向饒說了。

第二十六章 軍委辦事組成立前後

「五一三」事件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晚上，後勤學院「星火燎原」以「向邱部長提問」為題，向我提出了「十四問」，大喇叭連續廣播了十餘次，他們所問的中心內容是問我為什麼要打擊造反派。他們說：我們造反派是堅決批判劉、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這是革命的大方向，你為什麼不支持？這難道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嗎？！

軍事醫學科學院的造反派，在該院政治部副主任鄭洪泰的策劃下糾集了軍隊科技戰線造反聯絡站的千餘人，衝進了總後機關，以辯論為名，把總後勤部政委張池明抓走了。張池明被抓走後，我去向蕭華報告了情況並求救。蕭華回答說：「我是泥菩薩正在過河，你是金菩薩，香得很，自己去辦吧。」

總後營房部和該部設計院的造反派，在助理員張景昌的策劃下，糾集了一百餘人，在總後司令部門口靜坐，他們提出的理由是營房部發毛主席像章時，沒有唱《東方紅》歌曲，也沒有呼毛主席萬歲的口號，整個儀式都不莊重，要求營房部領導作出公開檢討。

軍委《八條命令》頒布後，軍內形勢有所好轉。對於軍隊造反派造反奪權、打砸搶，各領率機關的廣大幹部群眾是堅決反對的，為了各領率機關的正常有序地工作，也紛紛組織起來和造反派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到了一九六七年年初，空軍、海軍、總參、總後勤部及所屬的駐京機關、院校、文藝團體中的群眾組織，已經形成了旗幟鮮明的革命派，各領率機關的的領導幹部，前一階段那種「造反派」動不動就要揪鬥，並非常兇殘地強迫低頭彎腰、揪頭髮、掛牌子的日子也熬過去了。

但是，「二月逆流」以後，軍隊的造反派又鬧騰起來了，造反派最囂張的是炮兵、軍藝、後勤學院，海軍、空軍、北京軍區文工團、二炮的文工團。他們幾乎同時對各單位的領導幹部搞揪鬥，對反對和制止他們破壞機關正常工作的同志搞武鬥，打傷了很多人。

雖然，這次與一九六六年十月後到一九六七年初有所不同，各機關的黨委多數都有人管事了，但在毛主席號召造反的大勢下不是很堅強；機關的革命派對造反派也有了反擊的力量，但整個解放軍應該怎麼對待文化大革命並不明確，又要擁護毛主席，又要穩定軍隊，事情很難辦。總政的蕭華，全軍文革的徐帥都明顯支持造反派，同時全軍文革對造反派的行動也不像以前那樣指揮有力了，造反派在自己找出路，所以更具有破壞性。

當時，空政文工團在中南海有工作任務，該團的演員劉素媛，有機會同毛主席說話，她把為慶祝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五週年，在京的部隊各文工團想聯合演出的事對毛主席說了。毛對劉說：「你可以找葉群談談。」並叫秘書徐業夫給「林辦」打招呼，把此事告訴葉群。

這件事葉群報告了林總，林總經過一番深思熟慮，一下就抓住了機會。什麼機會呢？林總和軍委不是通過發指示的方式，而是通過支持誰搞文藝演出的方式表明林總和軍委的態度，支持革命派，打擊造反派，使北京的各領率機關迅速穩定下來，從而使各大軍區及全軍部隊迅速穩定下來。這是林總的高棋，也是險棋，因為在文革中直接打擊造反派還是第一次。事後，葉群跟我們說過：「林總反覆掂量，主席要軍隊還是要造反派？林總最後說：『主席要軍隊，但對打擊造反派也不會太高興。』」林總抓住了這個機會，徹底扭轉了軍隊的局勢，為黨、國家、軍隊立了大功。這也是「五一三」能夠取勝的主客觀條件。

葉群馬上答應約見劉素媛等人。劉素媛說起她們想搞慶祝《講話》發表二十五週年的文藝演出，並表示要聯合各派共同演出。葉群明確表示不要聯合軍隊內搞造反奪權打砸搶的造反派，可以聯合北京軍區、海軍、二炮等其它軍兵種文工團的革命派組織共同演出。葉群說：「林彪同志和你們的觀點是一致的，不要怕當『老保』，祇要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就應該大膽地保，要做革命的『保皇派』嘛！」葉群還說：「軍隊和

地方不同，地方衝擊的是劉鄧司令部，軍隊衝擊的是無產階級司令部，即使有壞人也不許亂衝擊。」葉群的話等於林總已經對軍隊的大局亮相了。

吳法憲、李作鵬和其他駐京機關的領導得知這次演出得到了林彪的支持，非常振奮。空軍、海軍、北京軍區和各兵種的主要負責人（當時稱「三軍黨委」）除了炮兵外均表示支持，並成立了「三軍聯合演出委員會」。總後沒有文工團，因此「五一三」沒有參加進來。但我的態度和他們是一樣的。

造反派得知這一消息也不示弱，認為這是「老保翻天」，他們聯絡清華「井岡山」等地方造反派發表聲明：如果對方膽敢單方面搞演出，就要衝擊演出會場，砸爛會場。武鬥一觸即發，這一派以後被稱之為「衝派」。

蕭華聽說以後，感到問題嚴重，分別給兩派群眾組組織做工作。避免激化矛盾。現在看來，也不能說蕭華就是錯，但林總的決心是軍隊不能存在造反派！蕭華抓了芝麻，林彪要的是西瓜。

演出的時間是五月十三日晚上，地點在北京展覽館劇場。海軍黨委事先開了會，決心一定要打勝這一仗，李作鵬、蕭勁光、張秀川還到了現場，空軍的余立金也到了現場，衛戍區的傅崇碧帶部隊也到了現場。造反派也不示弱，他們請來了清華「井岡山」、北航「紅旗」等地方造反派，決心要與「老保」血戰到底。

演出開始不久，造反派就鬧事了，造反派衝擊會場，但全場秩序井然，根本無人理睬，臺上也還是照樣演出。待造反派衝進會場有上千人時，李作鵬才下命令實行反擊。反擊一開始，造反派就被革命派分割起來了，他們也無能力反抗了。革命派預先規定的政策界限是對被包圍起來的造反派，祇准文鬥，不准武鬥，更不許打人。革命派嚴格執行了政策。

造反派乘混亂的時候，有少數人鑽空出去了，叫來了千餘人的支援武鬥隊，造反派一來就亂打亂衝，但造反派到底是烏合之眾，不堪一擊，都被革命派擊退了。革命派也付出了一定的代價，雙方受傷有幾十人，整個戰鬥經過了幾小時才結束。革命派勝利了！

當時，毛主席還是支持造反派的，還是相信造反派有力量的。展覽館「激戰」時，劉淑媛在毛主席處，她告訴主席說革命派勝利了，主席說：「你高興個屁！過一會造反派還會翻過來。」但毛主席是支持劉淑媛的，

幸好劉淑媛是個革命派，是擁護空軍黨委和吳法憲的。如果劉淑媛是個造反派，毛主席也會支持她，那軍隊的情況就會更複雜、更惡化了。所以林彪支持革命派的確是一步險棋。

總理、陳伯達、蕭華、張秀川他們都在大會堂，當時他們同意兩派聯合演出已經是很了不起了，蕭華當時也是這個態度，現在看來，這個態度也是無可厚非的，蕭華擔心的是無論哪一派演出，另一派被拒之門外，發生武鬥是難免的。總理當時不知道主席的態度，也不知道林總的態度和林總要打擊軍隊造反派的用意，他還是根據蕭華的意見以聯合演出的態度，在大會堂給兩派頭頭做工作，造反派不依不饒一直在糾纏總理。當張秀川知道了林總的態度後，轉告了總理，總理很快就明白了，尤其是劉淑媛趕到人大會堂，告訴總理毛主席是支持他們的情況後，立即嚴厲制止造反派不要衝演出會場了。但大會堂亂哄哄的，總理的講話沒有什麼效果，總理立即站在椅子上，高喊：「不許衝演出會場，再衝就衝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了！」造反派聽到這麼嚴重的話，除少數頑固分子外很快就散了。總理還立即叫陳伯達、蕭華趕往現場處理，走前總理對陳、蕭點撥地說：「這不是演出，是鬥爭。今後的工作反而好做了」。總理是太智慧了，他知道了主席和林總的態度後就立即轉向了，陳伯達和蕭華並沒有所悟，仍然批評三軍革命派不應演出，這樣就引起了三軍革命派的不滿。恰恰楊成武又抓到了蕭華這一點，蕭華的厄運很快就來到了。

五月十四日凌晨，周總理、陳伯達、謝富治、楊成武、蕭華等分別在人大會堂和北京展覽館劇場接見了兩派代表，對「衝派」進行了嚴厲批評。以海軍「紅聯總」為中心的三軍革命派，十四日拂曉之前在北京全城張貼了無數的大字報，散發了大量的傳單。通過大字報、傳單等，對造反派衝擊演出的事實進行了徹底的揭露。十四日早上，三軍革命派數千人，以新北京（公主墳地區）為中心，在軍隊各機關進行遊行示威。接著又組織了規模浩大的摩托化遊行，走遍了全城。造反派在強大的攻勢面前，一點應對的辦法沒有。其實，軍隊的造反派祇要沒有全軍文革的支持，是不堪一擊的。

五月十六日，楊成武、葉群、吳法憲等人深入海、空軍總醫院、三〇四醫院慰問被造反派打傷的傷員，贈送毛主席像章，《毛主席語錄》，等於公開表明了態度。五月二十日以後，三軍演出隊在天安門前搭起了臨

時舞臺，進行了長時間的演出，每天觀眾很多。同時，演出隊還分別在各機關進行了演出。

六月九日晚，三軍演出隊，在人大會堂小禮堂演出。林總、周總理、中央碰頭會議成員、駐京三軍負責人都看了演出並上臺與演員合影。新華社發表了新聞，《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登載了首長接見的照片。這次演出，實際上成了三軍演出隊的祝捷大會！

從「五一三」事件之後，大約一個月的時間內，除軍事博物館的造反派和後勤學院造反派「星火燎原」兩個「白色保壘」之外，各機關的造反派受到了嚴重的打擊，紛紛瓦解。造反派除了少數骨幹分子轉入地下活動以外，公開的活動基本上不存在了。各級黨委對文化大革命能夠實施領導了。

軍博、後勤學院兩個造反派是垮臺最晚的。軍博造反派百餘人，據守展覽館大樓為中心搞了堅固的設防，革命派要給予摧毀，我代表軍委辦事組沒有同意。我認為他們不會長期存在下去。一九六八年五月間，軍博造反派自己宣佈垮臺。然後，軍委辦事組在京西賓館小禮堂接見了軍博兩派全體人員，黃永勝還向他們發表了講話，對軍博造反派，包括館長在內，一個人也沒有抓，而是在對等的條件下使兩派聯合起來了。

後勤學院「星火燎原」幾十人據守學員宿舍樓，苟延殘喘的時間就更長，到一九六八年的九月才垮臺。這是因為軍博有部隊守衛，各院校、機關的造反派分子同他們的聯繫受到限制。後勤學院「星火燎原」佔據的宿舍樓則完全可以自由出入，外面同他們聯繫的人多得很。總後文辦對搞掉「星火燎原」提過各種方案，我都沒有同意。我認為他們大勢已去，滅亡是必然的。

在文革中，每一步大的行動都是在毛主席「偉大戰略部署」下進行的，「五一三」卻不是。毛主席對「五一三」的態度，並不是作為黨的指示由總理下達的，而是通過一個能與主席接近的文工團員劉淑媛傳到了總理和林彪的耳朵裏。即便主席的聲音不到，「五一三」也發生了，軍隊造反派被摧毀了，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這些地方造反派去支援也無濟於事。「五一三」事件是海、空軍機關和三總部、各軍兵種廣大幹部群眾站出來反對打砸搶，反對造反奪權的結果，當然從本質上也是擁護黨、擁護毛主席的結果，但這又是有悖當時毛主席「造反有理」路線的。

在「五一三」事件中，林彪對造反派的態度也亮相了，林彪是支持這一行動的，因為「五一三」是打擊軍隊造反派的，打擊了軍隊搞造反奪權、打砸搶的造反派，軍隊才能穩定下來。

在「五一三」事件後，軍隊廣大高級幹部對造反派的態度也明朗了。換句話說，在地方上領導幹部支持造反派，毛主席認為是支持他，可是在軍隊，廣大高級幹部認為，打擊造反派、穩定軍隊才是擁護毛主席。軍隊和軍隊造反派誰重要，毛主席心裏清楚，但「五一三」事件又和他「造反有理」的路線格格不入，「五一三」事件後也使江青不能帶著「造反有理」的「路條」插手軍隊。兩個月後，武漢的「七二〇」事件，毛主席本人也對造反派有了新的看法。

三年以後，也就是七〇年五月十三日，那天天氣很好，葉群建議到居庸關長城走一走。黃吳李邱是從西山坐了一輛麵包車去的，我們先到葉群後到。然後我們就在長城上面走，那時長城的遊人很少，可以說沒有遊人。我們邊走邊閒聊，祇走了一個烽火臺，照了些像就往下走了。我們走到下面的一間平房休息，林辦秘書郭連凱他們在桌上鋪了綠軍毯，桌上放了一點水果。這時葉群叫人拿來幾本字帖，分別簽了名送給我們。接著我們又閒談了一會，葉群笑著說：「你們記得今天是什麼日子嗎？今天是『五一三』，兩年前如果軍隊內部反黨亂軍的打砸搶分子不壓下去，軍隊也會像地方一樣亂的不可收拾。現在好了，軍隊穩住了，才能保住全國的局勢。」記得李作鵬接著葉群的話說了幾句：「三年前的今天，要不是葉主任支持我們，軍隊反黨亂軍的打砸搶分子得了逞，軍隊還不知道會亂成什麼樣子！」葉群很聰明，李的話音剛落，葉群就說：「這要感謝毛主席，是主席叫我支持你們的。我們要共同高呼毛主席萬歲！」

從到長城到離開，整個過程都不到一個小時，臨走前，葉群又說他的字寫得不好，把給我們的字帖又收了回去，她說：「我寫的字不好，你們要笑話。我重寫後再分送給你們。」我記得葉群後來卻沒有再送。

就這麼一件事，「九一三」後，專案組說這是林彪反革命政變的預演。聽到這話我倒放心了，說明他們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材料，因為這是一次最普通的一次郊遊。

「七二〇」事件

一九六七年七月武漢的「七二〇」事件，是文革進程中的重大事件之一。

「七二〇」事件之前，武漢的兩大派是：「百萬雄師」和「三鋼」、「三新」，以陳再道爲首的武漢軍區支持「百萬雄師」。當時武漢的形勢，和其他幾個比較亂的省份，如江西、湖南、四川也差不多。上海「一月風暴」以後，全國的形勢有些亂，到處在奪權，幸有軍委的《八條命令》，軍隊頂住了造反派的衝擊。武漢軍區對執行軍委的《八條命令》是堅決的，對造反派下手也是快的，解散了武漢的造反派組織工人總部，並抓了工總的頭頭。

軍隊反對造反，得罪了當時的中央文革，毛主席也是不滿意的。林總及軍委不得已，又向後退了一步，於四月間又發佈了軍委的《十條命令》，《十條命令》中，特別強調「不准隨便捕人」，「不准任意把把群眾組織宣佈爲反動組織，加以取締」。這樣，各地的造反派又來了一個大反攻。在武漢地區，對武漢軍區和陳再道來說是很被動的，街上有「打倒陳再道」的大標語。造反派對立面的群眾成立了「百萬雄師」，武漢軍區是支持「百萬雄師」的，尤其是省軍區獨立師中的不少幹部和「百萬雄師」搞在一起。

六七年七月十四日，毛主席坐火車由北京到了武漢，總理在這一天凌晨坐飛機先到了武漢，總理主要是爲了毛主席的安全，因爲主席一九六六年八屆十一中前回到北京後，一直沒有出去視察過，這次出去，全國的形勢和一年前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個變化主要是亂。同時總理也想瞭解一些情況，好向主席匯報。楊成武、李作鵬、汪東興陪同毛主席住在了一起，記得鄭維山也去了。

陳再道反對造反派，反對打砸搶，我都是擁護的。可是主席、總理到了武漢，尤其是主席在武漢這個事實，問題就發生了變化，主席、總理他們可不是一般的領導呀，他們是黨和國家的領袖呀！因此，武漢軍區當時在處理任何問題時，聽主席、總理的指示是第一位的了，主席的安全是第一位的。陳沒有把這個大前提擺好，總理那麼難，總理那麼苦口婆心做工作，陳再道聽不進去，反而跟總理頂撞說：「給軍隊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講稿上簽字，我們就

執行。」早在總理來武漢之前，軍區內部就統一口徑說「沒有犯方向路線性錯誤」，總理叫他們承認「犯了方向路線性錯誤」，幫助他們解脫，他們頂著不幹。總理批評他，總理最後命令式地提出要陳再道遵守紀律！他竟然跟總理拍桌子，並頂撞總理。陳再道不執行命令，我認爲他的錯誤就在這裏。陳再道是軍區司令，犯了不服從指揮、不執行命令、違犯紀律的嚴重錯誤。尤其是情緒激動的群眾，爲了揪王力他們，衝進了毛主席的住地東湖賓館，主席的安全毫無保障時，武漢軍區又是束手無策的。

七月二十日中午，吳法憲同我說：毛主席、楊代總長他們都在武漢。武漢形勢很緊張，除了空軍的有線電話之外，其他的有線電話都難通話。林副主席要派一個得力幹部到武漢去一趟，準備應急措施。林總考慮，黃永勝（當時在北京）、吳法憲、邱會作三人之中去一個，才能起到應有的作用。黃永勝在武漢有許多人認識他，容易暴露，不宜去。吳法憲要指揮空軍，離不開，也不能去。林副主席決定要你去一趟，各方面的條件都合適。林總還交代，要我帶一個內、外科水平都比較高的醫療小組去。

二十日下午四時，我到人民大會堂新疆廳去見林總。李文普先帶我去見葉群，葉群和我談了一陣子。葉群說，汪東興、張耀祠連連向北京告急說：「軍區獨立師警衛不力，二十號凌晨反革命分子已經衝進來了，快衝到主席住處。」上午總理來和林總商量決定，勸主席馬上離開武漢，總理已經又回武漢了。葉群還說：江青哭哭啼啼也來找林總，要死要活求林彪、葉群親自去武漢保證毛的安全。江青已寫了一封短信，勸毛速離武漢，林總決定派你帶上信立即乘飛機去武漢。

過了一會葉群帶我去見林總。林總說：「你到武漢去一趟很好。我先說一下你的任務：一、向主席報告全國的形勢；二、建議主席轉移一下，地點由主席自己選定。『主席的安全就是全黨的安全』你就說這句話是我說的；三、武漢要是發生全市動亂，陳再道又不聽指揮，圍困了主席，就設法告訴總理就在武昌固守待援。」接著林彪看了武漢地區的軍事地圖後說，「如你無法和總理靠攏就在王家墩機場建立指揮所，同北京保持密切聯繫。武漢附近的二十九師和空降軍已經做了戰鬥準備。」林彪說：「你要告訴楊成武、余立金、李作鵬，要部隊不惜一切代價絕對保證主席安

全，避免流血事件。」臨走時，葉群交給我一個牛皮紙大信封，叮囑我帶好。

當天晚六時左右，我帶著秘書吳瑞雲、警衛員蔣平安從總後出發，路過三〇一醫院時帶上了外科主任陸維善和一個有工作經驗的護士，到了西郊機場，吳法憲還為我們派了空軍門診部主任和兩名護士，我們乘伊爾十八專機夜航，於二十日晚十一時左右達到了武漢王家墩機場。我到了之後，來接我們到場部的竟是一輛帆布篷有多處彈孔的北京吉普。我立即同周總理打通了電話，總理高興地說：「好！你在機場待命，過一會有人找你。」

我坐在房間的沙發上抽煙待命。大約二十一日凌晨三點多點鐘，楊成武來了，第一句話就說：「我們勝利了！跟我走。」我聽到楊成武的話後，估計主席已經安全轉移出來了，我心裏也很高興！我坐上楊成武的伏爾加車，開往主席在機場的專列。毛主席在火車上召見了我。主席見到我時，心情還平靜，他同以前一樣，首先就說：「『興國佬』來了。你那個總後勤部的人現在聽你的話嗎？文革是個好辦法，好人壞人都會自己去表演的。」接著，我把江青的信及林總要我轉告主席的關心他老人家的話都向主席做了簡要匯報。主席一邊抽煙，一邊聽我說。待我說完之後，主席說：「我要先睡一會覺了，待一會給他們寫幾個字。」我即回到機場宿舍休息去了。

天剛濛濛亮，汪東興又來了，說主席叫我去。我上到主席的專列，他正在洗漱。主席見到我就說：「太疲勞了，又睡不著，我也沒有寫信，你回去向林彪同志說，我完全同意他對全國形勢的看法。有一點他沒有提到的就是對造反派也要加以分析，不是一切都是好的。」主席和我談完話，楊成武來到主席房間，記得他們在商量主席去哪裏，正在給主席做工作。我怕有些不便，就給主席敬了禮，回到機場住處。這時，我即向林辦打電話匯報了情況，並給吳法憲打了一個電話。

大約七點半左右，停機坪上有三架伊爾十八同時發動，接著主席坐楊成武的伏爾加來了，到了停機坪，主席下車和我們握手，也和工作人員握手，主席上了飛機，我和楊成武、余立金他們說了幾句，我才知道主席要去上海。楊成武摟著我說：「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我當時也很激動，我對他說：「你無限忠於毛主席，我要向你學習！」說完他又拉著

我上機去看主席。實話說，楊成武對我是很關心的，他讓我能多見到毛主席。我一下飛機，飛機就起飛了，警衛部隊上了另外的飛機。這裏還有一個故事，就是誰開主席專機的問題，本來執行任務的是飛行團的團長王進忠，余立金不放心，最後他選中副團長潘景寅，團長王進忠改爲副駕駛。這個潘景寅就是一九七一年「九一三」爲林彪開三叉戟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的飛行員。

我於二十一日晚八時乘原機回到了北京，臨走前我向總理聯繫，但聯繫不上，經向北京請示，決定我馬上回京匯報。我的飛機已經發動了，指揮塔又通知飛機熄火。過了一會艙門打開，一個幹部開車來向我報告：東湖首長（總理）來電話問邱部長走了沒有？想讓您和他一起走。我們報告飛機已經發動，東湖首長就說，請您先走吧。我聽了以後有些生氣，但一想下面的幹部不知道東湖首長是誰，氣也消了。總理是二十二號下午才回來的。

我二十一日回來後，即向葉群報告了。同時我也向吳法憲（張秀川也在場）說了武漢的問題。我說：「我的看法，倒是革命派反擊造反派的。陳再道不聽周總理的話是紀律問題。」吳法憲回答說：「不管什麼派，我們倒要真的按照李文忠所說的『毛主席揮手我前進』的話辦事，否則是會犯錯誤的！」

七月下旬，在京西賓館第一會議室對陳再道、鍾漢華等人進行了批鬥。那天開會的陣勢是很大的，周總理、陳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戚本禹、關鋒、王力（坐輪椅進場的）、吳法憲等到了會，各總部、各軍兵種的負責人也到會了，到會的還有在京西賓館住的各大軍區在京解決問題的負責人。會議由周總理主持，參加會議的有近百人。我和張池明、張令彬等三人到了會。那天總理的的表情非常嚴肅，開場白也非常嚴厲。我記得總理有兩句話說得非常重，一句是總理宣佈這次會議是擴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一句是對陳再道講的，總理說：你陳再道對毛主席對黨是叛逆行爲！總理的話對全場震動很大。

陳再道被押上臺之前，一些在主席臺後面的中央首長的秘書和京西賓館的工作人員給陳再道和鍾漢華「教練」了一番並做了「噴氣式」，總理和在臺上的中央首長並沒有制止。陳再道等人站在會場的西面，面朝東站著接受批判。

陳再道一聽到總理的話嚇得立即癱倒在地上，身後的兩個衛兵又把他拉起來。因為總理講了「你陳再道對毛主席對黨是叛逆行爲！」，吳法憲氣憤地給了陳再道一耳光。會議進行了一小時多的時候（他們已經站了兩個多小時了），陳再道自言自語地嘟囔：「我也是六十歲的人了，站不住了。」我坐的位置同陳再道站的位置離的不遠，他的話我聽得很清楚。我是經受過武鬥的人，對體罰的滋味完全懂得。恰好這時我看到總理起身去上廁所，我也立即起身去到廁所門口等總理。我在廁所門口對總理說：「陳再道有些站不住了，要求坐下！」總理有些不高興，可能嫌我多嘴，瞪了我一眼，沒有說什麼。總理回到座位，他自己還沒有坐下，就用命令的口氣說：「陳再道坐下！」總理這句話，同樣對會場震動很大。

毛主席離開武漢實際是不情願的，他知道他在武漢是最大的敗家，什麼「無限忠於毛主席」，什麼「誓死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都被踩在腳下。陳再道不聽他的，部隊不聽他的，兩派群眾都不聽他的，個人的利益，派別的利益才是高於一切的。當時，不僅陳再道他們知道主席在武漢，獨立師和「百萬雄師」的頭頭也知道，可是竟發生了衝進主席住處的嚴重事件，根本視主席的安危於不顧。在文革中，中央文革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領導之下的，可是謝富治、王力在武漢遭到不信任甚至非難，毛主席關於支持造反派的指示根本沒有人聽。這種對中央文革的不信任，本質上就是對毛主席路線的不信任。毛主席心中能不有所思嗎？心中能不苦澀嗎？但是從主席後來的態度來看，他除了對造反派改變了看法，對軍隊甚至林彪也有了看法（尤其是其他軍區關於支左問題給中央的檢討報告，主席並不信以為真），但是他對文革的根本路線並沒有改變，主席九月下旬從上海經杭州、武漢、鄭州回北京過國慶節，不久中央發表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七、八、九三個月，形勢發展很快。全國的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不是小好。……形勢大好的重要標誌是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了。」主席的話表面上好像爲自己挽回了一點面子，實際上，老幹部又多了一份擔心。這樣亂下去，好像看不到頭似的，總之一九六七年是文革最難過的一年。事後證明，主席在軍隊和造反派（江青一夥）的抉擇上，還是傾向了造反派。軍隊固然忠於他，但不能理解文革的真諦，造反派雖然令人怨恨，但他們和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革血肉相連。同時，主席在「七二〇」事件後反而想到了武裝左派，方這樣既動長

了邪氣（尤其是上海幫的邪氣），又製造了新的混亂，此後，全國武鬥又形成高潮，很多造反派是對著解放軍的，並開始搶軍火庫及軍工廠。

林彪必須對陳再道嚴厲，林彪是管軍隊的，武漢的部隊（主要是獨立師）出了問題，武漢軍區（主要是陳再道）出了問題，能不嚴厲嗎？但實際上，林彪除了參加天安門的大會和對曾思玉、劉豐有個「八九」講話外，他並沒有參加對陳再道的具體處理工作。

毛主席冷靜下來以後，對陳再道所犯錯誤的處理是正確的，是領袖式的，是胸懷博大的。陳再道的福氣在於他是四方面軍的幹部，主席對陳再道的處理已經超過對他本人錯誤的處理，是針對四方面軍的政策來的，如果陳再道是一方面軍的幹部，政治生命早就掉了。蕭華、楊成武，以至後來我們幾個人在文革中的命運就是很好的證明。「七二〇」事件後，社會輿論錯誤地指向徐向前、徐海東，說他們是支持陳再道的後臺，這是造謠，這是沒有的事。

這裏正好聯想到楊成武這段時間的態度。主席和林總對楊成武是非常信任，非常器重的。但這一段也是楊成武由大紅，走向大紅大紫的時期，一直到「楊、余、傅」事件垮臺。他自己沒想到，我們也沒有想到。這一段楊是從「忠於」主席、林總，到「忠於」主席、江青。楊多次在軍委辦事組的會上吹捧江青，甚至幾次叫蕭力來參加辦事組的會。不過那時辦事組直接管軍報的事情，蕭力來開會也正常，但楊對蕭力的態度就不夠正常，而是有些阿諛。楊對「七二〇」事件後政策也沒有吃透，比如說對待徐向前和徐海東的問題。造反派抄了徐帥的家，楊沒有極力制止，他對徐海東的態度也很有錯。「七二〇」事件發生後不久，楊成武從上海回到北京，曾召集各總部，各軍兵種的負責人在京西賓館開會，說「徐海東是陳再道的後臺」，「打倒徐海東」等，叫開會的人照抄下來，回去以後在各自機關貼大標語，並讓軍委辦公廳對徐家進行監視，好像能撈到什麼油水似的。楊成武還在軍委辦事組的會上研究批判徐海東的問題，由於徐的身體不好決定由辦公廳組織開小型批鬥會。尤其是一九六八年初，在總參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上，楊成武說：「徐海東就不是好東西。」還讓大家揭發，劃清界限。在這次會議期間，楊成武還特別安排鬥了蕭華。

毛主席完全清楚部隊一直是他的命根子，在文革中當然更是這樣。九月份主席回到北京，一次總理在京西賓館給團以上幹部學習班講話，主席祇和護士小吳（旭君）兩人來到後臺，隨便坐在一把籐椅上，後臺的工作人員看見了主席，立即抬了個沙發給主席坐下，我坐在主席臺邊上看見了主席，主席搖搖手示意我不要聲張，我認爲不妥，就告訴了楊成武，楊成武立即去見主席，然後回來給正在講話的總理寫了一個條子。正好總理的話也快講完了，總理說：「在我講話就要結束的時候，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偉大領袖毛主席來了！」頓時，全場群情激奮，主席走到主席臺前向大家招手，全場不斷地喊口號。然後主席又和臺上的人一一握手，主席走到我面前時說：「這個是姓邱的。」主席剛要往前走，又退回半步，一邊拉著我的手，一邊指著我說：「娃娃都有白頭髮了。」我當時也非常激動，因爲在這種場合，主席和誰多說幾句話都是莫大的榮幸。我看主席這次接見軍隊幹部，心裏似乎好受多了，軍隊還是他的，軍隊幹部也還是他的。

對於「七二〇」事件，中央決定北京要大力支持武漢的造反派，武漢造反派要派代表團來北京做報告，並指示要軍隊接待他們。我們知道這是中央文革的主意，我們實際上沒有接受，我們商量的原則是：以「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名義辦理。

當時「五一三」剛過不久，「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剛起來，這次讓北京軍隊的革命派要和武漢的造反派打交道了，「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頭頭不願意，做通他們的工作也是很困難的，爲了完成這個任務，我和張秀川召集軍隊各大單位的革命派主事的人開了一個會，「申明大義」，我強調，軍隊各單位的黨委是不可能和武漢的造反派打交道的，上面又有任務，祇能由各單位「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出面。在會上我除了講武漢事件的情況之外，對武漢造反派來北京，我們特別提出了三條：第一條，站穩立場，熱情辦事；第二條，提高警惕，不准各單位的造反派插手；第三條，藉機掃蕩軍隊造反派殘餘。因爲武漢來的造反派到軍隊各機關去，這對北京的軍隊造反派一定會有很大的影響，轉入地下的造反派骨幹分子一定會出來活動，與武漢造反派聯繫，甚至通過武漢造反派與中央文革溝通。祇要我們事先有準備，一定能取得意外的收穫。對武漢造反派要接待好，並乘機對軍隊的造反派殘餘進行掃蕩，取得了一舉兩

得的成績，這樣他們的積極性很高了。果然如此，武漢的造反派來了之後，各單位對跳出來的造反派又給了毀滅性的打擊，取得了很大的勝利！

新的軍隊日常辦公機構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軍委《緊急指示》以後，解放軍各總部、各軍兵種、各大軍區都被造反派衝亂了，領導幹部大都遭到不斷地圍攻和揪鬥，揪鬥成風。當時，蕭華、劉志堅領導的以總政為主體的文革小組垮掉了，一九六七年一月成立了以徐向前為組長，江青為顧問的全軍文革小組，但很快也不了了之地垮掉了，部隊一時幾乎無人管，十分混亂。「五一三」以後，部隊的三軍革命派打垮了造反派，軍委看守小組（四人小組）和軍委辦事組，也就應運而生，軍委辦事組是向全軍文革奪回文化革命領導權的產物。

一九六七年七月中旬的一個深夜，吳法憲打電話來說：「總理讓我通知你，經主席批准，成立一個軍委看守小組，有你一個，要做好準備。」

我問：「誰牽頭？還有誰人呀？」

吳說：「讓我牽頭，可能因為楊代總長不在吧。還有葉群和張秀川同志。」

這樣看守小組就成立了，在京西賓館八樓辦公，工作人員基本上都是軍委辦公廳的同志，沒有全軍文革的那些人。

九月二十三日，楊成武、李作鵬、余立金陪毛主席視察大江南北回京。在中央碰頭會上周總理親自宣佈把原軍隊四人小組正式改為軍委辦事組，成員為楊成武、吳法憲、葉群、邱會作、張秀川，楊成武為組長，吳法憲為副組長。楊、吳同時又是中央碰頭會議成員。不久李天煥（楊成武倒臺以後，李吃了安眠藥，後被搶救過來）、劉錦平也參加了辦事組。軍委辦事組就是在這樣的時期組建的，其目的就是建立一個統一的、有權威、有能力的領導指揮機構。軍委辦事組第二天在京西賓館會議樓第三會議室正式宣佈成立。軍委辦事組的成立使軍隊的文化革命開始了新的時期。對於辦事組的成立，我沒有聽到林彪有任何插手安排辦事組成員的意見，林彪也沒有召集辦事組開過什麼會研究工作。一切聽毛主席的，在總理領導下工作

我參加軍委辦事組，和在軍委辦公會議比較，我所負的責任也大為不同了。在軍委辦公會議期間，我祇管總後的工作，也具體辦了一些林總、賀總、羅總長交辦的事，軍委辦公會議開會，除總後的事外，我基本不發言，也輪不到我發言。在軍委辦事組五年，我分管一大塊工作，天天工作滿載超軸。軍委辦事組（包括四人小組，即看守小組）成立於一九六七年八月中旬，垮臺於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歷時五個年頭。軍委辦事組對軍隊的文化革命、戰備、三支兩軍等進行了大量的工作，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軍委辦事組成立的時候，全軍文革早已垮臺了，總政治部也「癱瘓」了。軍委辦事組把全軍文革、總政治部的工作集於一身。看守小組時期，其主要任務是在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直接領導下，負責處理軍隊系統駐京機關、部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方面的具體工作。楊成武時期和黃永勝時期的前期權力有所加強，九大以後，軍委辦事組的權力確實不一般了。縱觀軍委辦事組工作的全過程，主要幹了以下工作：1、領導軍隊的文化革命。這是當時最中心的任務。2、加強戰備；領導軍隊的日常工作。這是最主要的任務。3、組織全軍三支兩軍的工作。這是當時最繁重的任務。

「三支兩軍」是指在「文化大革命」中，解放軍奉毛澤東之命，支持左派群眾、支援農業生產、支援工業生產、實行軍事管制、訓練院校師生的簡稱。從一九六七年二月開始，解放軍先後派出近三百萬人，分赴全國各條戰線執行「三支兩軍」任務。其範圍之廣、規模之大、人員之多、時間之長、任務之巨，是我軍建軍史上前所未有的。後來別有用心的人攻擊「三支兩軍」，其實「三支兩軍」對於穩定文化大革命的局勢，穩定全黨、全軍、全國的局勢，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解放軍在文革中是有大功的。

在「三支兩軍」中，重點是「支左」。但誰是左派，就很難搞清楚，在毛主席和江青的眼裏奪權的「造反派」就是左派，在各地軍隊看來，不搞造反奪權，不搞打砸搶的、堅持生產的就是左派，這樣主席又說支錯了，要轉彎子，要檢討，工作相當難做，因為有左派就有對立的一派，兩派群眾均爭相說自己是革命派，不支則已，部隊一介入就勢必造成軍

隊支一派、壓一派。直到一九六七年武漢「七二〇」事件後，主席又開始講大聯合。

「三支兩軍」工作一直在主席手上，具體工作一直在總理手上，林彪沒有具體管過「三支兩軍」工作。軍隊支援地方的幹部，不論是參加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還是派往國務院各部委，都是辦事組從全軍挑選的，這些人的工作都得到過主席、總理的好評。

我在辦事組負責支左幹部的選派工作，工作相當難做。部隊幹部一般文化比較低，而且從參加革命開始就在部隊工作，多數人方法簡單，很難適應地方的工作，但總理一個勁的要人，祇有在部隊選來選去。我曾對總理說過實在選不到合適的，總理不太高興，有一次總理到京西賓館來開會，會前我和吳法憲在禮堂前廳打羽毛球，總理來時，我背對總理沒有看見他，他悄悄走到我身後揪著我的耳朵，開玩笑地說：「你給不給我派人來？」我忙說：「給給給，一會開會，把名單給你，你看中誰就給誰！」，燃化部就是總後副部長伊文去的，國務院直屬口的軍代表就是總後營房部的副部長丁江同志，總理很滿意。可是，「九一三」之後，總後造反派把伊文、丁江同志也整得厲害。當時總理要給新疆配一把手，這麼重要的位子真是選不到合適的人，黃永勝提出龍書金去，我不太同意。因為龍書金是一員戰將，做地方工作未必合適，又是少數民族地區，總理說黃選得好，也就派去了。龍書金同志去了以後，工作很努力，也很吃力。「九一三」之後，他受到牽連和打擊，竟被搞到鄭州工廠裏去勞動，龍書金同志身有槍傷，手臂是殘廢，老伴受株連的迫害患上精神病，兒子也受到迫害患上重病，困難程度難以想像。當時貴州很亂，工作很難做，總理叫我一定選一個好的幹部去支左，他還調侃說：「強中自有強中手！」亦即選個最好的去。藍亦農是昆明軍區副政委，是一個優秀的軍政幹部，我把他推薦給總理。總理很滿意，讓他當貴州省委第一書記，多次表揚過貴州的工作。可是，「九一三」之後，藍亦農也受到牽連和打擊，在批判他的會上當面和江青頂撞，而後被搞到邯鄲鋼鐵廠裏去勞動，一搞就是近十年。國務院和各省市支左的廣大幹部「九一三」後，尤其是文革結束後，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擊。要說廣大支左幹部有什麼「不是」的話，並不是他們的「不是」，而是由毛主席的在文革中的戰略部署和方針、政策決定的，打擊、虐待是錯誤的。在文革

混亂和困難的情況下，沒有廣大支左幹部的支撐，黨和國家的命運也是難以想像的。

加強戰備和領導軍隊的日常工作，這是最主要的任務。在文化大革命之初，毛主席就提出了準備打仗的號召，並提出了戰備的要求是：精神準備是主要的，物質準備也是重要的。當時，蘇聯修正主義對中國確實存在野心。楊成武時期的軍委辦事組和黃永勝時期的軍委辦事組對戰備工作抓的都是緊的，抓的都是好的。在黃永勝時期，一九六九年發生的東邊（東北）黑龍江上的珍寶島和西邊（新疆）克利鐵奇戰鬥，都是蘇修對我們試探性的進攻，這就完全證明了準備打仗的重要性。

楊成武時期的軍委辦事組

楊成武領導軍委辦事組時期，在對待軍隊的文化大革命方面，還是按林彪、葉劍英、聶榮臻領導軍委具體工作時期的方針進行的，由於有了「五一三」革命派和造反派的較量，以及四人看守小組的工作，在京的解放軍各總部，各軍兵種領率機關很快就穩定下來。楊成武雖然和江青個人關係很好，但軍隊不能亂這一條，楊還是做得好的。這和蕭華、劉志堅、徐向前領導軍隊文化大革命的態度是不一樣的，當然蕭、劉、徐他們當時也確有難處，完全可以理解。

楊成武時期的軍委辦事組是短命的，祇存在半年多點的時間。時間雖短，但除作了繁重的日常工作之外，還做了不少影響全國的大事。這裏祇能記述幾件主要的。

第一，組織、開辦中央毛主席著作學習班的任務。一九六七年國慶節前，毛主席指示：「辦學習班是個好辦法。很多問題可以在學習班得到解決。」中央文革碰頭會決定全國各省、市造反派的骨幹分子都分期分批到北京集訓。學習班的行政管理工作，包括住房、吃飯、組織接見等等，一切實際工作都要軍委辦事組當作任務完成。當時，北京的幾個大一點的軍隊院校如高等軍事學院、政治學院、後勤學院、空軍學院，都擔負了接待學習班的任務。每期學員都在三、五千人，有時近萬人。造反派到北京來辦學習班，還是一直搞派性鬥爭。這些問題中央文革根本不管，軍委辦事組又管不了，結果是誰也不管。學習班也祇好有三門課程：打派仗、參觀景點、毛主席接見。這三門課程完了，也就「畢業」了。

爲了擴大學習班的影響，軍委辦事組請毛主席在京西賓館禮堂接見了第一期學習班的代表。被接見的代表中還有「七二〇」事件的當事人陳再道、鍾漢華等人。毛主席在臺上同臺下坐在前排的陳再道說了話。主席首先問：「陳再道同志來了嗎？」陳再道在臺下精神抖擻地站起來回答說：「報告主席，我來了！」毛主席很高興地同陳再道說：「你學習一個時期很好！」毛主席接見完了之後，楊成武發表了長篇講話。楊的講話沒有見報。

第二，組織毛主席接見軍隊團以上幹部。毛主席八次接見紅衛兵，搞得勞民傷財。但這裏的政治油水滿大，楊成武是看到這一點的。楊向林總報告，說部隊幹部很想念毛主席，林把這個意思報告了主席，主要是說給在場的楊成武聽的，沒想到主席說，「我也很想念同志們。」這樣，軍隊團以上幹部，分期分批進京參加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實爲毛主席接見）就開始了。這個大規模的接見活動，一是對主席的神化在軍隊又大大提昇一步；二是浪費了不少經費。

第三，領導《解放軍報》的出版工作。當時，軍報直接歸軍委辦事組領導，主席和江青的女兒蕭力（李訥）當時是軍報的主要負責人，楊成武常常拉著蕭力參加軍委辦事組的一些重要活動。祇要楊成武在場，他對蕭力都是畢恭畢敬的，一定要拉她同桌共坐，祇要蕭力答應到會而未到之前，楊總是要等她來了才開會。楊成武倒臺之後，江青用很氣憤的語言指責楊在政治上「引誘」青年。她說：「在會場上一個小孩子不習慣同他坐在一起，還親自硬拉著去！」

對軍報繁重的日常工作，如審查重要社論大樣等就不說了，這裏祇說一下組織發表楊成武的《大樹特樹偉大統帥毛主席的統對權威，大樹特樹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徹底清算羅瑞卿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的滔天罪行》一事。

一九六七年冬，楊成武發表了《大樹特樹》的署名文章，一是頌揚毛主席，二是批判羅瑞卿。這篇文章原是總參大批判組的稿件，是楊硬搶過來的，當時據楊說話的口氣，說那篇文章是準備了好久的，易稿不計其數，陳伯達等還參與了指導和修改文稿。楊很得意地說（口氣很大），發表那篇文章的目的是爲了統一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思想。可是「九一三」以後，楊卻說《大樹特樹》是林彪那裏搞的文章，硬逼著楊

成武以他的名義發表，這就太不夠實事求是了。爲了文章的發表，楊成武在辦事組會議上提出要下發文件，通知全軍組織學習，大家認爲這篇文章是以楊成武個人的名義發表的，下文件不太合適，吳法憲直接提出反對意見，吳法憲說下文件大家都要簽字，搞不好難負責任，其實吳的意見是對的，也是爲楊好，但楊成武很生氣，我就出來做和事佬，我說下發文件慢，不如開電話會議下達通知快，楊、吳都同意了這個意見。文章發表時，軍委辦事組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在北京由軍報召開過新聞界的會，通告楊的重要文章要發表；辦事組對全軍召開過電話會議，在電話會議上，講了楊成武這篇文章的重要性和組織收聽、閱讀、收集反映等事宜。對發表一篇文章事先做這樣的準備工作，我見到的是第一次，是空前未有的。文章大概是十一月間發表的。文章發表後，宣傳得很厲害，標語刷了很多。

文章發表的時候《人民日報》登在第二版一小段就轉到第三版，軍報則登在第二版爲全文的主體，新華社也以重要新聞播發了。楊成武對《人民日報》登的版面位置很不滿意。爲了此事，當時在中央文革管宣傳的戚本禹還專門上楊的門道歉。

楊成武的文章發表也就一兩天，黃永勝到北京來，他約我去看望楊代總長，我和張秀川陪他一起去了。我們到了楊成武家，一見到楊成武，他就氣憤地說：「戚本禹剛剛走掉，這個戚本禹真是亂彈琴，太可氣了，這麼重要的文章（指《大樹特樹》），他在《人民日報》上登在第二版。你們知道這篇文章多重要嗎？，羅瑞卿在衛戍區看了我的文章以後，立即給毛主席寫了《認罪書》，說自己是一個假黨員。」當時，楊成武手裏正拿著羅的《認罪書》，他如獲至寶似地手持羅的《認罪書》向上一揮，說：「我說同志們呀，這就是毛澤東思想的威力！」喜形於色，溢於言表。楊成武給我們看了羅的《認罪書》。羅瑞卿向毛主席檢討說，他根本沒有入過黨，他當時和黨取得聯繫心切，要求入黨心切，沒有入過黨就謊稱自己在武漢入了黨，後來與黨失去聯繫。羅瑞卿在上海用要求恢復黨的組織生活的方法和黨取得了聯繫並得到同意。

大概又過了幾天，主席批評了楊的文章，主席說：「那篇文章，我祇看了標題，標題就是錯誤的，是形而上學！」緊接著主席又作了批示：「絕對權威的提法不妥，從來沒有單獨的絕對權威。凡權威都是相對的，

凡絕對的東西都祇存在相對的東西之中。」看到主席批示後，張秀川對我說：「邱部長你真是高人，幸虧祇有電話通知，我們下了文件就更麻煩了。」楊成武知道主席的意見後，開始有些緊張，後來就推卸責任，結果越描越黑，他在京西賓館講了一次話，在京西賓館「躲反」的各大軍區的負責人都參加了，北京的軍隊領導幹部也參加了。楊的講話有些推脫責任，結果把陳伯達、姚文元得罪了，把林彪和辦事組的同志也得罪了，把爲他修改稿子的人也得罪了。所以主席後來叫林彪在「三二四」大會上講兩面派的問題，林彪在會上還特別講楊的品質不好。

楊真是禍不單行，福州軍區有個戰士，對文章提出了批評的意見。他說：「權威和威信是樹不起來的，這是唯心主義世界觀。」那位戰士的意見，姑且不管它正確與否，他的膽量是令人欽佩的。可是楊成武發了火，要福州軍區對那位戰士進行嚴肅批判和嚴格審查。後來把那位戰士處理復員了，楊成武倒臺之後，軍委辦事組又要福州軍區把那位戰士找回來，繼續在部隊服役了。

我對楊成武是尊敬的，我向來把他當作良師益友看待。但對他某些做法我向來也是不欣賞的。特別是對他的虛榮、愛表現自己的作風更不敢恭維。

第四、組織編寫《黨史綱要》。一九六七年十一月間，楊成武以軍委辦事組的名義組織和主持了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即編寫《黨史綱要》的工作。

對編寫《黨史綱要》（即《兩條路線鬥爭史》）的事，楊成武有些神秘的表現。爲什麼要辦這樣的大的事，他沒有作過任何說明。以我的想法，編寫《黨史綱要》的工作，軍委辦事組既不能完成，也沒有資格和權威擔任這樣大的工作。我們沒有這樣大的頭，哪能戴這樣大的帽？我曾將自己的想法，善意地向楊表示過，但他避而不答。

爲了編寫《黨史綱要》，軍委辦事組調集了幾十個筆桿子在京西賓館專門從事這件事。軍事科學院、高等軍事學院、北京軍區、海軍、空軍、總政等單位的「文人」都調來了。負責給楊成武寫文章的秘書和他的大女兒楊毅參加了寫作班子，金敬邁都參加了寫作班子。對此工作，由楊親自掛帥，別人不能過問。寫作班子的具體管理事宜，由張秀川負責辦理。大約不到兩個月的時間，第一次初稿就出來了。寫黨史是必要

涉及到我黨我軍的一些領導人物，當時點陳獨秀、李立三、瞿秋白等這樣一些人的名是無須顧慮的，但是要點朱德這樣一些人的名，還是拿不準的，雖然在一九六六年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老同志都把朱德狠批了一頓，但還是慎重爲好。楊成武讓張秀川起草一個報告，張秀川來和我商榷，其實我也拿不準，我對張秀川說：「楊代總長知道上面的事比我們多，問題的關鍵不是《黨史綱要》點不點朱德的名，而是楊成武想不想點朱德的名，他想點你們就打報告，他不想點，你們既不寫，也不必打報告。」事後他們還是打了報告，其中報告提到「如寫到紅四軍七次代表大會時，點不點朱德、陳毅的名？我們的意見要點。」楊成武果然摸準了毛主席的脈搏，對於點朱德的名，主席同意了。

《黨史綱要》的初稿，當時我手頭有一本，也看過。我記得，從共產黨有史以來，到文化革命都寫上了。在綱要中，毛主席的領袖地位得到了充分肯定，林總的接班人也得到了充分肯定，江青的文化革命「旗手」也得到了肯定。江青沒有什麼歷史可寫，也被放在「第三號」的位置上了。周恩來的名字在文稿上出現過，但不佔重要地位，更不佔創始人之一位置，其餘人就「榜上無名」了。

大約在一九六八年二月間，楊成武下令把《黨史綱要》初稿一律銷毀，一份也不准留下。誰讓他這樣做的，我不清楚，我也不知道是誰監督燒的。參加編寫的人員，則在楊成武倒臺之後，由黃永勝親自開過會，都回原單位去了。

第五、《紅太陽展覽》。在編寫《黨史綱要》的同時，軍委辦事組還辦了另一件大事，就是組織了《紅太陽展覽》。這兩件事，楊成武是放在同樣重要位置上的。以我的想法，「展覽」這樣重大的問題，同樣不是軍委辦事組應當辦和可以辦的事。

《紅太陽》展覽在軍事博物館展出了，大約有圖片三百餘張。《紅太陽展覽》和《黨史綱要》的指導思想是一樣的，也是從有共產黨誕生到文化大革命，黨的歷史都反映出來了。毛主席、林總、江青三個人在《紅太陽展覽》中的地位，同《黨史綱要》也是一樣的。突出了毛主席和肯定了林總，江青佔有重要的地位。同樣，江青沒有什麼歷史性的照片，祇有把生活照片當作歷史照片了。我記的有幾張照片是毛主席、江青、李納在一起照的。李納趴在毛主席肩上，江青在一邊，這種不拚不鬥的生活

照，也作為政治照片展出來了。周恩來祇有陪襯別人的集體照片，沒有單獨照片。

《紅太陽展覽》同樣是楊成武親自組織領導，張秀川協助辦具體工作。江青去看過兩次，據說都表示滿意。張秀川陪我去看過一次。我看後向張秀川說了：「這個展覽，是有楊代總長特色的，總覺得以後會有些麻煩。」張秀川對我的話沒有表態。

《黨史綱要》、《紅太陽展覽》是名正言不順，把江青的政治地位提到黨的第三位是錯誤的。對編《黨史綱要》和辦《紅太陽展覽》，楊成武祇是個別和我說過一次。楊說：「今後我們將要為中央文革辦很多的事。我們現在辦的這些事（指搞黨史、辦展覽）都是為召開九大作的重要的準備工作。我們的眼光要放大一點，遠一點。」楊的談話，很像是因我對編寫《黨史綱要》提過某些意見的回答。另外，在一次軍委辦事組會議上楊成武還無頭無腦地說了三點意見。一是軍委辦事組除辦軍隊的事之外，還要接受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等交給的各種事情，其中有的是最為重要的大事情！二是軍委辦事組同羅瑞卿的軍委辦公會議是不同的。辦公會議是在軍委常委領導下的辦事結構，辦事組則是代表軍委常委工作的；三是我們軍委辦事組不要把自己的各種範圍搞窄了，我們應當立腳軍隊，面對全黨、全國。楊成武這些話，當然是有所指的，但他究竟指什麼，我當時不知道。後來楊成武倒臺之後，我們知道他同江青的關係特別密切，對楊以前說話也就可以理解了。比如，江青告訴楊成武，葉劍英是「二月逆流」，不要再往他那裏跑，楊成武當時也是給我們吹了風的，是好心。

第六、參加中央專案組二辦的工作。我們認為主席最信任的人才能參加中央專案組，因此我們當時對楊是很敬重的。中央專案組的工作，是黨的工作，不是私事，我認為黨給定的槓槓誰都要執行，祇要沒有超過黨的槓槓，都不為大過。其實文革以前，也有不少專案性質的工作，如胡風的，潘漢年的、揚帆的，反右的等等，傷害的人也很多，這些專案都掌握在中央要人手上。

一九六七年初，我被造反派打成重傷，在西山休養，有一天葉帥來看我，葉帥剛坐下不久，楊成武就來了，接著就是他來講新聞了。楊說：「彭德懷太反動了，衛戍區給我匯報說，他們從彭的收音機裡搜出

一封信，信是寫給主席的，彭在信中問主席，我的賬已經算清了，這次又把我押到北京，要算我什麼賬呢？彭這個傢伙太反動了，總理請示主席同意把彭交給紅衛兵鬥，北航紅旗從衛戍區把他拉出去鬥，彭回來後祇在牢房裏哎吆、哎吆叫，但不肯認罪……」。楊接著說「彭真這傢伙過盛氣凌人，現在窩囊到家了。他關在衛戍區，對誰都底三下四。彭真是假牙，過去把他搞出去，他忘了戴假牙，很難受。後來，祇要牢房門一開，他立即到窗臺上拿牙缸，牙缸裏有假牙嘛，專案人員說，今天不出去就在這裏問你幾個問題，他還是緊緊抓住牙缸不放（楊說到此處大笑）……」楊還說：「在華北彭真自己幹的事不認賬，往聶帥身上推，我和聶帥在華北就抵制他。」

這裏還要說幾句蕭華、楊成武的關係問題。他們兩個關係一直不好，歷史的原因我不清楚，從一九五九年以後在軍委辦公會議，他倆的不和是常見到的。楊對總政的空頭政治也是不感冒的，另外，在對羅瑞卿的鬥爭中，楊成武是最堅決的，蕭華一時和羅瑞卿扯不清，林總把他拉回來了。在文革中，楊成武的地位更突出了，蕭華則因管軍隊文革的事，按照左的一套來，引起大家不少怨恨，現在想起來蕭華不左也是不可能的，毛主席號召造反嘛。蕭華倒臺後，楊有兩點做得不好，一是抓住蕭華的生活問題不放，親自佈置所謂受害的女服務員寫細節並簽字劃押，把蕭華往死路上推，唯恐蕭華打不到。而且還在碰頭會上向江青匯報，蕭華的命運就可想而知了。蕭華的倒臺，楊起了推波助瀾的關鍵作用。還有就是批准鬥蕭華，蕭華被批鬥多次，有一次是總參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大會，專門叫來一個很會講話的四川口音的人在大會發言，把蕭華糟蹋一通，而且還把總政副主任徐立清、袁子欽等人搞來陪鬥，讓人看來不舒服，對蕭有幸災樂禍的感覺。

第二十七章 楊成武倒臺

楊成武倒臺的自身原因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在人民大會堂大禮堂舉行駐京軍事機關、部隊、院校團級以上黨員幹部萬人大會。「三二四」大會是楊成武下臺的代名詞。

楊成武的倒臺有他自身的原因。毛主席、林總對楊成武都是很器重的，楊成武的確是一個軍政雙全的人，也能團結同志。但是自六七年「二月逆流」以後他自己就過於往主席、江青個人身上靠，沒有分清哪些是主席作為黨的領袖在關心他，哪些是主席個人在拉他。但更重要的是，江青拉他，把他拉得意了，其實是拉糊塗了。楊自己踩在林總、江青兩隻船上，最後翻船落水。

楊在辦事組常炫耀他和江青的關係，有一次他故意問我和吳法憲：「江青同志找你們單獨談過話沒有？」我們都說沒有。這時楊來勁了，他說：「江青同志對我太關心了，最近她把我叫到家裏談了幾次話。江青同志說：『不是最親近的同志，我不在家裏談話；另外，我今天第一次向別人講我自己的苦難家史』，江青同志幼年生活很艱辛貧苦，江青同志一邊講一邊流淚，我一直在陪江青同志流淚。」

另外，楊成武這段時間也接連有事，《紅太陽》停展，《黨史綱要》收回銷毀，主席對他的文章《大樹特樹》不滿意，他的女兒也出了個人問題。林總對楊有所批評，但楊自以為有江青的青睞，有些忘乎所以，在有些問題上他直截了當地打出江青的牌子對付林總，林總傷心地說：「人一失去革命友情，就什麼也沒有了。」他的女兒出了個人問題是個導火索，但這樣就把楊成武的問題擺到桌面上來了，擺到主席和林總面前，擺到中央面前。事情發生後，最極力主張打倒楊成武的是江青認

爲從上海搞回來她過去的材料封存在京西賓館不及時銷毀，是楊成武有意而爲，是有目的的（在這個問題上，楊是冤枉的。江青交待楊辦一些無原則的事，楊不好當面頂回去，祇好拖著不辦，江青有氣。江青是個很難伺候的人。江青是很重視她在上海的「材料」的。因此抓「楊、余、陸」的時候，江青一定要抓余立金的老婆陸力行，因爲陸力行的姐姐在上海檔案館，曾管理過江青的材料）；江青還認爲，搞掉「王、關、戚」可能與楊成武有關（其實無關），是挖她的牆角。同時，毛主席不願意其他人知道他和江青「關心」楊成武這層關係，更不願讓林彪知道這層關係，終於決定打倒楊成武，「殺」了愛將。楊成武的確是作爲軍隊的接班人來培養的，楊的問題端出來，毛主席召集了四次會議，很重視楊的問題，因爲楊到處講主席和江青對他如何之好，這樣，搞不好毛、江與林之間可能產生誤會。與楊成武相比，毛主席當時肯定更信任、更需要林彪。

楊成武也是林總的愛將，林這邊也摸不準毛對楊的根本態度，一直比較慎重，主席召集解決楊成武問題的會議，林沒有參加，是葉群去參加的。楊成武雖然與江青走得過近，一時也醒不過來，但他畢竟是林的愛將，林想把楊的問題先掛起來，有機會再分配適當的工作，在楊成武離京時，林說楊還是副總長，並同意他帶老婆孩子走。可是情況馬上又變了，最終楊還是被撤銷了職務，也就是說被打倒了，事後中央發了文件。林在「三二四」大會的講話有些言不由衷，總理也很緊張，組織工作很倉促。

楊成武是軍隊的臺柱子

全國解放後，林總的老部下中，著名的有十大上將：劉亞樓、蕭華、楊成武、黃永勝、鄧華、賴傳珠、李天佑、楊得志、韓先楚、趙爾陸。在京工作的前面兩個在文革前後都發生了不同的問題，祇剩下楊成武一個人，楊成武已經成爲林總當然的接班人。楊成武在軍隊中有相當的威信，林總和元帥們都很器重他，大將也不會反對他，餘下的將軍們對他都很尊重。楊成武在華北也有很大的影響，例如華北各省市成立革命委員會之前的人事安排，幾乎事先都要同身在碰頭會的楊成武商量。

在文化革命中，楊成武是領導軍隊文化革命的主將。軍隊高級幹部在文化革命中沒有受到大的衝擊的，楊成武算一個。賀龍辦公室及總參

有少數人曾經衝擊過總參黨委，也就是爲了衝擊楊成武，但那是軍隊內部的問題，並且很快就反擊下去了。反擊賀辦衝擊的力量是很大的，總參內部各部門、各總部、各軍種、各兵種、北京軍區各部門支援楊成武的大字報比衝擊他的大字報至少多十倍以上。賀辦的衝擊，對楊成武幫了一個大忙。

一九六五年底，中央上海會議之後，羅瑞卿下臺，楊成武上臺就成了軍隊的要人。從此之後，他幾乎參加了中央的所有的政治活動，一九六七年九月底，把軍隊原來的四人小組改爲軍委辦事組之後，楊成武就從組織上接過了軍隊的全盤領導工作。軍隊一度出現的無政府狀態的歷史結束了，以楊成武爲首的「新政府」出現了。軍隊工作，開始了新的階段。

當時，我還不知道林彪、江青之間早已有矛盾。文革初期，我從表面上看到，林、江之間的關係挺好的。楊成武在做林、江之間的「政治紅娘」。對於楊成武時期的軍隊工作，尤其是三總部和駐京各機關，由蕭華、劉志堅、徐向前領導的混亂時期穩定下來，楊是出了力的，也是令人滿意的。楊成武在軍委辦事組的會議上，不止一次地說：「軍隊多災多難的歷史過去了，太平盛世又出現了。」全軍上下都爲這一好的形勢出現感到由衷的高興！

軍委辦事組成立後，在毛主席、林總、周總理的心目中是很有地位的。黨中央、國務院的很多行政事務工作，都落到軍委辦事組身上了。軍委辦事組有「臨時軍政府」的派頭。除毛主席、林總、周總理發揮了軍委辦事組的作用外，江青也企圖把軍委辦事組抓在自己的手上。事實上，當時中央祇有軍委辦事組是能辦事的機構，中央的許多事都是軍委辦事組辦的。

軍委辦事組的工作，正幹得紅火之際，突然不見楊成武到軍委辦事組視事了（一般的情況下，幾乎每天下午都可以看到他）。接著又聽說他貴體欠安，但規定不准任何人探望。三、五天之後，吳法憲也突然「失蹤」了。軍委辦事組成了群龍無首，祇有我和張秀川兩個同桌「組員」，每天下午三點，到次日清晨三點，照常上班。我們祇能處理一些小事，凡大一點的事都無權處理。對大事，祇能寫上「呈批」二字也就算處理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稍有不慎，就會給你扣上大帽子，甚至立即被打

倒。我曾對張說：「『山雨慾來』了吧？」他會意，但不多說。總之，我們總是感到有事，並且還不是小事。但什麼事，根本不知道。當時我們也有些緊張，因為楊成武一般人是搬不動的。

過了幾天，零點左右，吳法憲到軍委辦事組來了。他對我和張說：「這幾天空軍有些要處理的急事，沒有來一起辦公了。」除此之外，他「滴水未漏」。我和張秀川，同楊成武、吳法憲的關係，好像像是「在野」同「當政」人的關係一樣。我們什麼也不問，他們同我們說什麼就聽什麼，即使沒有聽明白的事也不多問。黃永勝剛來時也是這樣，我和李不是中央碰頭會議的成員，黃和吳從上面開會回來嘴也是很嚴的。直到八屆十二中全會之後，黃永勝、吳法憲對我和李作鵬實行「開放」，我們就一同議事了，葉群還專門解釋說：「以前不敢跟你們說，主要是怕我們反江青他們的情況擴散太大。」黃永勝在九大以後，就幾乎沒有一天不議論江青這些人的事了。

又過了幾天，可能是三月中旬吧，吳法憲又到軍委辦事組來了。吳說：「林副主席指示，要我把楊代總長和我之間發生的一點問題，同你們三個人（李作鵬也來了）說一下。我說的問題，現在絕不能外傳，所說的內容也由我自己負責。將來上面怎麼說，就以上面的為準。」

楊成武問題的內幕

吳法憲說，楊成武的問題，以前的你們都知道，搞《紅太陽》展覽，搞《黨史綱要》都是不妥的，但事情總算過去了，前些日子主席對他的《大樹特樹》不滿意。接著吳又說：「楊同我過說，今後我的主要精力應當協助他，總政癱瘓了，還我要多管，總參的日常工作要以我為主。這樣我對空軍的工作是時間和精力都照顧不過來了，楊考慮空軍的工作主要由余立金負責，余也是老空軍，工作能力又不錯，這樣對空軍的工作是有好處的。問我有什麼需要考慮的，如果我沒有意見，他就去向林總和江青同志去匯報。這是他要免去我空軍司令員的職務嘛！」

吳接著說：「當時我以為楊代總長上面說的話祇是一種設想，不過同我商量而已。於是我就同他說：『對楊代總長的考慮，我沒有什麼意見，把我放在哪裏都是協助你作具體工作。請楊代總長把你的意見報告毛主席』」

席、林總考慮就是了。組織上怎麼樣決定，我都服從。」其實他也根本沒有向林總匯報。這樣大的事，我當然要報告林副主席。」

吳法憲說他很快就把楊成武的話報告了林總。林聽了之後，有些吃驚，楊的這種話是無組織無紀律的，但林不知道楊這一考慮的來頭，因為楊與主席那裏是通著的，究竟是主席的打算，讓楊先對吳吹風，還是楊自己的考慮，林一時摸不清，因此林說話很謹慎。林想，如情況屬實，對這樣大的問題，楊是會同林商量的，怎麼就一聲不吭先給吳講起來了？！何況林、楊之間，有史以來也沒有過打啞迷的事。林總祇對吳說了一句：「楊的考慮不妥，一切要由主席來定。」其餘就沒有多說了。後來才知道，楊成武上面說的話是爲了女兒楊毅的事，給余立金許了願，楊耍了小聰明。

楊成武一言既出也是「駟馬難追」呀。空軍司令易人的事根本不是楊能事先定的事，再加上楊毅的事正是和余立金的秘書單世充發生的，這種許願，一旦吳不上桿子，吳肯定會向林報告的，吳也應該向林報告；另外，一旦余立金清醒過來，報告出去，問題就更嚴重了。他祇有以稱病爲名，在家不出門靜觀事態。

楊的大女兒楊毅在空軍報社工作，她看上了余立金的已婚秘書單世充，單自己也願意。但好景不長，單世充的老婆發現後向組織揭發匯報了。但楊成武如日中天，楊毅有恃無恐。後來，楊成武爲了「疼愛」自己的女兒，親自向吳法憲、余立金說單世充的好話，要保單世充。

吳法憲一開始就明確表態，對楊毅可以保護，但這件事不能這樣處理，單世充是已婚的幹部，黨紀國法不容嘛。後來，楊成武不知退，不聽勸，反而態度強硬，吳也明確表示不同意楊的要求，千千萬萬的幹部盯著呢！實際上，吳拒絕了楊的無理要求。吳在楊毅的問題上一點錯也沒有。

單世充本是個鼠狗之輩，沒想到有楊的支持，也忘乎所以起來，吳身爲空軍司令，找他談話，他都竟敢不去。單揚言：沒有楊代總長的指示，我不和任何人談話。這樣問題也就越來越複雜了。當時的情況是，楊成武耍橫，楊毅也要橫，單世充也跟著耍橫。楊所有的本錢是他自認爲他的後面有江青，楊的致命點就在這裏。楊也是禍不單行，此間，許

世友要北京派專機，說他們從敵偽檔案裏發現余立金是叛徒，要親自給主席送材料。余立金的身價一落千丈，楊成武很沮喪。

大約在三月中旬，林總對楊的問題就重視起來了。林總找吳去商量了，對解決楊的問題總的原則是：「爭取息事」。具體辦法是，楊的身體不佳，不管病情如何，都要關心他的病。但是楊一點錯也不認，把自己頂在死角了。

林總在不可能說服楊成武的情況下，才讓葉群去向毛主席報告。主席對楊的事，格外地重視，主席親自召開了四次會，反覆詳細地聽匯報，主席感到不拿掉楊成武是不成的了，甚至要影響到毛和林的關係，當時林比楊重要得多。在匯報楊成武問題的時候，江青發現了楊耍橫的本錢在於她，江青對楊的拉攏，有些毛是知道的，有些是江青的私貨。當然，江青認為她在主席面前的形象最重要，楊成武在她眼裏算個屁，在江青是個極其自私自利、反覆無常的人，她一反常態，在主席面前，在大家面前，堅決要求打倒楊。然後，毛主席、林總、周總理、陳伯達、康生等共同決定：對楊成武的問題，事情要說清楚，結論不要做，暫時停止工作。

林對楊的倒臺是挺無奈的。楊自己也太不爭氣，自己打倒了自己。如果楊留下就等於把江青在軍隊的代理人留下了。

江青要把邱會作、楊成武同罪

江青知道楊成武要下臺之後，立即上林總的家門，提出了兩點建議：（一）楊成武品質很壞，應當下臺！（二）邱會作同楊成武關係密切，同葉劍英的關係也不乾淨，應當與楊成武「同處共論」！江青的兩點意見都是向林彪討好的，林總肯定地回答說：「邱會作同楊成武現在發生的問題毫無關係！」總之，江青堅決不同意我進辦事組，說我同楊成武關係密切，總理說：「要全面考慮問題。」黃永勝說：「辦事組一定要有總後這一塊。這一塊祇能邱擔當，別人擔當不了。去年邱被造反派打傷，傷還沒有好，主席就讓他回去主持工作。這是爲什麼，就是說總後的工作還是邱來主持。」總理說：「永勝同志講得好。」

三月中旬，吳法憲特意到軍委辦事組來，同我做過一次簡短的談話。他說：「你對楊成武的問題，趕快表態，越快越好。這對你有好處。」

我是來向你傳話的，具體的以後再說。有點事，估計可以調整好，你也不用緊張。」我對吳說「對楊成武現在發生的問題，我沒有什麼態可表呀！」

「你祇是說過去的事就是了。在表態的報告上，對江青可以多說幾句好聽的話。」

吳法憲同我談了之後，我做了認真的考慮。首先考慮的是，楊成武下臺可能成爲定論。二是，江青可能要在自己身上做文章了，如果林總看重他和江青的關係，我很可能成爲犧牲品。我想祇要上面有人要打倒我，就不是表態的問題。即使今天表了態，過了關，明天又怎樣？該死還是會死的，何況，我對楊沒有什麼態可表的。對楊成武的問題，是否表態，我考慮了兩天都沒有定下來。

我正在爲難，吳法憲又急急忙忙來催我要報告了。這次來，吳法憲的表情不緊張了，還有些高興，我估計楊成武的問題已成定論，並且對吳有利。

「報告寫好了嗎？」

「還沒有下決心呢！」

吳法憲看到我不在乎的樣子，就坐下來同我認真說了一頓。他說：「前幾天的事，不是別的什麼問題，就是江青一個人的問題。江青說你同楊成武的關係密切，同葉劍英也界限不清。她要把你攆出軍委辦事組，同楊成武一起打倒。」吳還說：「主席說，楊成武這個『障礙兵』可以搬開，以便更多的人抬起頭來。」

至此，我把問題的真相基本弄清楚了，我把對楊成武問題的表態報告很快寫好了，正巧周總理給我打來電話說：「你要寫個報告來，把你和楊成武的關係講清楚。你要特別注意，在寫抬頭的時候，把江青同志的名字往前寫，寫在我前頭都可以。」總理的話引起我對寫報告的重視，心裏也有些緊張，我想祇是毛主席、林總、總理相信我還不夠，如果江青堅持打倒我，他們又遷就了江青，我被打倒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我對楊成武的表態報告，是先送林總的。林總在我的報告上批了幾句話：「邱會作同志同楊成武祇有工作關係，不需要有任何處理。」林總又把報告直接送給毛主席了。毛主席在他的名字上劃了一個圈，並劃了一個箭頭到林總對我的批語上，表示同意林對我的看法。文件送到周總理處，他也在我的報告上批了一句話：「完全同意林副主席的批示。」我的問

題通了天，一點事也沒有了，反而也讓我參加了處理楊成武問題的一些工作。

二十三日上午，吳法憲要我同他一起去西郊機場接黃永勝。在車上，吳法憲同我談了決定黃永勝來當總參謀長的過程。他說：「黃永勝來當總長，林副主席提的還是代總長，主席說，黃永勝夠資格，就當總參謀長，不要代字了，是毛主席把『代』字去掉的。」聽了以後我很高興。

黃永勝下飛機後，即由吳法憲陪同從機場直接去人民大會堂同周總理共商大事了。我即領著黃的夫人項輝方、秘書等住到京西賓館。吳法憲要我向黃的夫人宣佈三條：「（一）黃的任職未公佈前，不准同任何人透露；（二）要絕對保密；（三）在北京不准同別人議論政治問題。」

抄楊成武的家

三月二十三日晚中央碰頭會議，在人民大會堂河北廳舉行，專門討論處理楊成武的問題。我和李作鵬列席了會議。

會議決定：（一）先把楊成武從他家搞出來；（二）在中等城市安置，對外保密；家屬由總參管理，不准受歧視。這些事都佈置好了之後，周總理決定把楊成武搞到大會堂來，他先派王新亭帶中央警衛團的人去把楊成武家的警衛部隊換掉，把楊的家全部控制起來，楊成武家原來是由北京衛戍區警衛的。王新亭和楊成武的關係不錯，可以說他平時對楊畢恭畢敬，此時他有些唯唯諾諾，表示很為難的樣子。總理看了王新亭一眼，歎了一口氣對著王說：「你怎麼搞的？」我同李作鵬離總理不遠，我們靠在柱子上閒談，總理看到我立即招手把我叫過去，總理對我說：「你們兩個人去，把楊成武帶來，你過去和楊成武關係融洽，就說我讓他到大會堂來開會。讓他（指王新亭）先把警衛部隊換掉，你去帶楊成武。」我跟楊成武關係很好，我同樣也有些為難，我對總理說：「我叫他，他能來嗎？他都『歇工』一二十天了。總理給我打個條子，我把人給你領來。」總理看了我一眼說：「你去吧，就說我通知他到大會堂開會。對楊成武隻字不留。」我祇好從命了。這時李作鵬也湊過來，他報告總理說，「楊成武那裏有大量的機密資料，要搞丟了，是一個很大的損失。」總理：「對呀。」他想了一下對李作鵬說：「你也去，要負責保護楊成武不發生意外，也要保護文件，先封存，現在就去辦理。」

楊成武家住在後海，從什刹海郭老（郭沫若）家那個路口進去直上去就是了。中央警衛團的部隊先我們十五分鐘到楊家，他們越牆進了楊成武的家，整個院子都控制起來了，楊的警衛參謀（平時我叫他「×胖子」）這時才知道有事了。我叫警衛員小蔣去叫門，門沒有關，一推就開了。我和李作鵬進了院子，看見王新亭正帶人在院子裏調換警衛部隊。「×胖子」一邊給我們敬禮，一邊說：「邱部長，邱部長。」王新亭和我們一起上了二樓，趙志珍已在樓梯口上等我們，對我一個勁地說：「邱部長，邱部長。」我當時也不便說話，沒有和她搭話，這時她又說：「邱部長，我們老楊對你怎麼樣，你心裏應該知道啊。」我這時祇是說：「總理請老楊到大會堂開會。」進了楊成武的套間（外間是辦公室，裏面是臥室），我和李坐在辦公室的南端，等了不短時間楊成武才出來，楊路過衛生間時，看見他的兒子東勝在裏面，就走進衛生間，我身邊的警衛員小蔣，見此情景，要去阻攔，我一把抓住小蔣，示意他不要干涉，這種時候做的點善事也不為過，我看了一眼李作鵬，他也沒有吭聲。楊大概在衛生間磨蹭了有十多分鐘才出來的，並同我們相對坐下。我們之間的距離有幾米遠。我和李作鵬主要是把楊留在他辦公室，以便王新亭好查封他的家裏文件。楊的胡茬很長，頭髮既長又露出白頭髮茬（文革前的老同志中祇有個別人染髮），很像久病之人一樣的。楊平時很注意自己的儀表，今天同半個月以前的楊成武判若兩人了。看到此情此景，我不禁心酸起來了。

楊成武坐下之後，用很低的很沉重近於悲慘地聲音說了一句：「你們要把我搞到哪裏去？」

我回答說：「總理請你到大會堂去。一切事情總理都會同你說的。」

楊成武坐在一個長沙發上，頭向下低得幾乎要同膝蓋相連了。至少有五分鐘以上，我們互相連一句話也沒有說，房間靜得一點聲音也沒有。楊住的房子是元帥宿舍，質量非常好，祇要不開門，外面的一點聲音也聽不到。靜靜的房子裏好像空氣一點都不流通，楊成武一直沒有說話，但突然拿起電話要打，電話早被王新亭他們掐了，他把電話一摔，楊成武突然大聲說了一句：「你邱會作對我也要有良心呀！」

此時，我和李作鵬坐在那裏都沒有說話，對楊成武說的那句話，我心裏很難受！我心想，今天真是不該來。過去，楊對我的工作很支持，個人關係的確是很好的，對他的問題，我應當不沾邊就好了。方块字樓中程區制作我當即暗下

決心，今後對楊的問題，在自己可能做到的範圍內，一定做好一點，以向他表示我邱會作是對得起他的！

王新亭把楊成武的全部家屬：母親、妻子、兒女等都集中在樓下會客廳裏後，就來通知我們。臨走之前，楊要去看一下家屬，我們同警衛團的一個副團長商量之後，同意了他的要求。楊離開家的時候，他的二女兒在家屬群中站在一個凳子上，大聲地向她爸爸說：「爸爸！你要吃好飯、睡好覺，不要惦記我們。家裏的事，我們可以管好的。」楊成武的二女兒，很潑辣，很堅強，我看到之後，甚為感動！

楊坐在我的車上，我和李作鵬把他夾在中間，不知是爲了表示什麼，我偷偷握著楊的手，壓在我的屁股底下，怕李作鵬看見不高興，就時握時松。爲了安全起見，我們繞著道走，在路過定阜街的衛戍區時，楊一下激動起來，嗚咽地說：「老邱呀，你們要把我關到哪裏呀？不要關到衛戍區去嘛。」我立即說：「不是。爲了安全，我們在繞著圈子走，是總理請你到大會堂開會。」

我們到了大會堂，從北門進去，帶著楊成武坐在河北廳等總理。總理從裏間出來，帶著中央警衛局的武建華同志，楊成武見總理來了，立即起來叫總理，總理在十幾米遠就伸出胳膊，手掌對著楊成武，著急地大聲說：「你什麼都不要說，不要說。」武建華走過去帶著楊成武，跟在總理後面，又進到小房子裏面去了。

第二天晚上，楊成武離開北京之前，林總、周總理、陳伯達、江青、黃永勝、吳法憲等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接見了楊成武，我和李作鵬也參加了。林總對楊說：「你現在到外地去住一個時期，對自己的錯誤，要認真反省；還保留你副總參謀長的職務；你現在就走，可以帶家屬孩子一起走，同你住在一起。」楊成武說：「我有錯誤，我永遠跟著毛主席、林副主席革命到底。」楊起身走時，林總、周總理、陳伯達等還同楊握手道別。

楊成武先被帶到武漢，可是不到幾天，就被人發現了，總理又決定用軍用飛機把楊送到洛陽。住的地方是龍門附近原來蔣介石臨時住過的地方。

楊成武離開北京後，有關楊成武的一切具體問題，軍委辦事組指定我管，具體工作由總參辦。

首先是安排生活。我要河南省軍區給楊配備了一個管理生活的管理員、一個醫生、一個炊事員。楊的生活費用由本人自理，但亦可適當補助。個人以外的費用一律由公家報銷，決不要剋扣楊成武分文。對楊的生活一定要有保證。

其次是，遵照毛主席、林總、周總理的指示，把楊的家屬全部送去洛陽同他住在一起。路費及有關費用一律由公家報銷。妻子兒女的生活費由總參管理局照規定供應。

總參管理局對楊的妻子和他本人都按原來的制度供應，沒有改變。楊有什麼困難，總參有關部門都能及時派人到洛陽去瞭解情況和與河南省軍區共同處理。

楊成武有七個子女，並且都長大了。這些孩子長期間住在一起，問題很多，困難也不少。在徵得楊本人同意之後，所有大一些的孩子都回原單位工作，小的即在當地上學。對有關單位，總參都派人與之聯繫，辦妥孩子工作上的一些問題。如有特殊情況，涉及到孩子的處理問題，一定要事先得到總參謀部的同意。

我對楊成武生活上、家務上問題的處理，是嚴格執行黨的政策和按人道主義精神辦事的。如果沒有偏見，所有知道內情的人都會認為是辦得好的。當然，有的事他會認為是不近人情的。例如，楊的母親死在洛陽城裏的某醫院，楊要求去送終，周總理沒有批准，這雖然是小事，但不是我能決定的問題。

在文革中打倒的高級幹部，都受了不少苦難。毛主席安排了鄧，林彪安排了楊，不但免受皮肉之苦，還可以和家人在一起，有精神寄托，可他們還不認為這已是不幸中的萬幸。

「三二四」大會

當要公佈黃永勝為總參謀長的時候，毛主席指示，要召開駐京軍事單位團以上幹部大會，把問題說清楚。

毛主席說：「楊成武是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上了臺的人，現在下臺了，不能消聲匿跡，要大喊大叫。要召開駐京軍事單位團級以上幹部大會，由林彪同志去作報告，把問題講清楚。」

大會的組織工作，總理指定我代表軍委辦事組一手辦理，從發出開會的通知，到組織會務工作。下午三時半，周總理來到人大會堂，他前前後後，上上下下，都走了一遍。總理在檢查臺上坐位的時候，我向他提了一個問題，因為沒有把握，心裏有些緊張，我向總理說：「好像沒有通知幾個元帥到會。」總理聽後恍然大悟，他立即急步走出去，打電話向毛主席請示，是否要元帥們出席大會，主席同意了。總理又立即要秘書打電話通知各元帥來參加會議。大會開始的預備鈴都響了，葉劍英、徐向前、陳毅（似乎還有劉伯承）等幾個元帥來到了。此時，總理最爲難的是，老帥坐在哪裏。坐在臺上嘛，要同江青商量排位的問題，同時還要驚動已經入座的各位。此時，總理靈機一動，對著我說：「通知晚了，大會就要開始了，會作你陪著老帥到臺下前排就座。」各位元帥都隨我到臺下就座，李作鵬走在元帥們的最後面。我們都挨著坐在第一排。

今天參加大會的人，都是軍隊的幹部，有些人看到元帥坐在臺下，有些不平。在會議進行中就有人向總理寫了一個條子。上面寫著：「元帥何罪？連坐在臺上的資格都沒有了？！」散會後，我把條子交給了總理，周總理說：「群眾的意見是對的。這些問題，我承擔全部責任！」我說是我這個組織會務的人，沒有做好。總理說：「好，好。我們都來負責。」

會後，葉群同我和李作鵬說：「他們（指元帥）是臨時通知他們來的。要是安排他們在臺上就座，她（指江青）又會不高興。總理也左右爲難呀！原來準備在臺上加偏座，讓你們兩位就座，看到他們來了，連你們都到臺下就座了」。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晚上九時半至次日凌晨一時半，駐京軍事單位團以上幹部大會在人民大會堂禮堂舉行。林總、總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中央碰頭會議所有成員都出席了大會。林總在大會上講了話，周、陳、康、江，這些中央碰頭會議的人都講了話。

林總對在大會上講話，事先沒有準備。開會前一天，主席倒先發話了，主席提出要林在大會上講話，講三個問題，一是山頭主義問題，二是反對兩面派，三是講一點辯證法。

林彪說：

今天這個會是要向同志們宣佈中央最近的一個重要決定。最近我們黨的生活中間，又出現了新的問題，這個問題雖然沒有像

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彭、羅、陸、楊那樣大，但是比一般的其他的問題要大一些，所以主席說就是這樣一個不大不很小的問題。這就是最近從空軍裏面發生楊成武同余立金勾結，要篡奪空軍的領導權，要打倒吳法憲。

楊成武同傅崇碧勾結要打倒謝富治。楊成武的個人野心還想排擠許世友，排擠韓先楚，排擠黃永勝以及與他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人。中央在主席那裏最近接連開會，開了四次會，主席親自主持的。會議決定撤銷楊成武的代總長職務；要把余立金逮捕起來，法辦；撤銷北京的衛戍司令傅崇碧的職務。決定由黃永勝同志當總參謀長；決定由溫玉成副總參謀長兼北京的衛戍司令。

林總批評了楊成武的山頭主義，他說：

楊成武他祇相信他一小撮的人，同他關係密切的人，而不相信別人。……他祇用他那一夥子，而其他的就採取排擠的態度。如果照他這一套，那我們就要把吳法憲拿掉，把謝富治拿掉，把許世友拿掉，把韓先楚拿掉。與他相同地位的這些人，黃永勝、陳錫聯、楊得志都會被排擠。所以權衡兩個方面，我們祇有採取不是打倒別人，就把他打倒的做法。……這種山頭主義，實際上是一種放大的個人主義，膨脹了的個人主義。表面上是顧他那一夥，實際上是個人主義，利用那一夥。

林總特別批評了楊成武的品質，他說：

楊成武是政治品質很壞，是一個兩面三刀的人，是一個正如毛主席所說的「陽奉陰違，口是心非，當面說的好聽，背後又在搗鬼」，就是這種人。……大家知道的，以為他是反羅瑞卿的，實際上他是一個羅瑞卿分子，是緊跟羅瑞卿的，他當面好像是反對羅瑞卿的，但實際上不是反對羅瑞卿的；他參加了反對彭真的鬥爭，但實際上他是擁護彭真的。所以這種行為就是一種當面一套、背後一套，陽一套、陰一套。

最後林總講了辯證法，他真是把毛主席的《矛盾論》、《實踐論》和哲學思想學透了。

林總在講話中特別讚揚了江青，他說：

很顯然的，江青同志是我們黨內的女同志中間很傑出的同志，也是我們黨的幹部中間很傑出的一個幹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熱烈的革命的情感，同時又很有思想，對事物很敏感，她能看出問題，能發現問題，能採取措施。過去由於她多年身體不怎麼好，所以大家不瞭解她，在這個文化革命期間，就看出她的偉大作用。她一方面忠實執行毛主席的指示，在另一方面她有很大的創造性，能夠看出問題、發現問題。文化革命中間樹立了許多豐功偉績，固然是主席的領導，全體中央文革同志的努力，黨中央同志的努力，但是她是有她獨特的作用，始終在這個運動中站在鬥爭的最前線。

周總理在隨後的講話中也讚揚了江青：

在這裏，我提幾句江青同志在中央文革所起的作用。江青同志是一個堅強的共產黨員，無產階級戰士。她不是從今天，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三十年代她就是一個堅定的共產黨員，就是一個同叛徒，同假共產黨員、特務和社會的反動派作鬥爭的一位堅強勇敢的女戰士。如果說現在或者是兩面派或者是特務、壞分子，他們所謂收集江青同志那個時候的材料，有兩種，一種是江青同志自己為戰鬥所寫的東西，那不是什麼黑材料，那是紅材料，革命的材料！至於國民黨社會上，那時候是反動派統治著，那時他們寫的東西，污蔑、造謠、迫害，那都是反革命的東西，把那些東西如果拿出來，作為黑材料，那你要在哪個地方登？江青同志自己說的很清楚，那就是臺灣的話，香港的話，就是應該被打倒的那些人的話，那有什麼黑材料？三十多年以前，江青同志成了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學生。得到毛澤東思想長時期的修養、學習和鍛煉。經過了戰爭的年月。解放以後正是江青同志身體很差的時候，受到黨內一小撮走資派的代表人劉、鄧、陶，彭德懷，賀龍，彭、羅、陸、楊，譚震林等等，以至受到蕭華的迫害。儘管如此，江青同志堅強不屈，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在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準備階段，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教育的時候，進行了文藝的改革，大家都知道，一九六四年演出樣板戲八出，都是經過江青同志親自指導、修改出來的。在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剛才提到，她還有很多的著作，還有很多的演說，現在印成了小冊子，大家都讀了的。這就看出江青同志是我們黨內傑出的女戰士，傑出的共產黨戰士！值得我們向她學習！向她致敬！

總理講完話還領著喊口號：「誰反對江青同志就打倒誰！誓死保衛江青同志！」林總和總理的講話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有意地、過分地吹捧了江青，這不但是說給江青聽的，更重要的是向主席表的態，為什麼是這個樣子，我直到現在也搞不太清楚。

江青在講話中指責楊成武指使傅崇碧衝擊中央文革駐在地：「又例如，楊成武去年寫了一篇什麼叫做《大樹特樹毛主席的絕對權威》，實際上他想樹立他自己的絕對權威，他才是一個『一言堂』呢。發展到今年不得我們的允許，衝到中央文革的住在地區，不得組長、副組長的同意，當時組長請示我們的這樣一個很短的時間，他就衝進去了。身為司令，衛戍司令，破壞人民解放軍的紀律，目中沒有黨中央、沒有中央文革。昨天我才知道是楊成武三次指示他進去的，兩部車子，當時我就趕過去，我說：『你，衛戍司令，不得我們的批准，是不是來捉人呀？！』我現在才知道，他果然是去捉人去了。這樣的事情能夠允許嗎？！就從那一天我堅決抵制了他以後，傅崇碧就賴賬，楊成武就突然間『病了』，一個『病人』天天會客，天天去那兒幹兩面派的勾當，進而進行奪吳法憲司令員的權，這就是奪空軍的權。同時他支持一些受蒙蔽的革命小將來想打倒謝富治同志。」

陳伯達的講話，主要講了文化大革命的五個回合的勝利，陳說：「這幾次大勝利可以講一下的，從批判彭真的『二月提綱』起，發表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關於部隊文藝座談會紀要起，到現在恰好兩年。在這開始以後，我們就取得了第一次的偉大勝利，就是揭發了彭、羅、陸、楊鬥爭的偉大勝利。第二次的偉大勝利，就是打倒劉、鄧、陶。第三次勝利，我們就是在毛主席英明領導下，把『二月逆流』擊潰了。第四次，我們把劉、鄧、陶留下的一些爪牙，隱藏在文化革命小組裏面的幾個小爬蟲——關、王、戚或者王、關、戚揭露出來了。第五次勝利，就是把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揭露出來了。」當時，陳伯達是文革組長，講話是有份量的，我們那時與他還不熟悉，他講打倒「楊、余、傅」也是文化大

革命的一個勝利，我當時就不太同意這個說法，因為楊的問題，是軍隊的問題，主要是上層幹部的關係問題造成的，對文化大革命的進程沒有多大關係。

康生的講話是表態性的。姚文元同康生坐在一起，姚文元講起話來愛看左右的人，如果心急又容易唾沫四濺。他講話的時候，看著康生，邊看邊講，結果噴了康生一臉的唾沫，康生祇好掏出手巾擦臉。

這些人講完話後，檯子上的幕布拉上了，事隔不久，幕布又拉開了，毛主席突然出現在主席臺上，其他人又跟隨而來，主席的出現是來表態支持大會的。頓時全場高呼毛主席萬歲！

「九一三」以後，主席說，處理楊的問題是他聽信了林彪的話，這是不實事求是的，主席親自召集了四次會，是林彪聽從主席對楊成武的處理決定，按毛主席的要求在大會上講了話。

「三二四」大會之後，楊成武的問題算告一段落了。但江青對楊成武的問題，好像才開始似的，她對楊成武的處理，先後提出了三個問題。第一是，不能隱居，至少要監禁起來；第二是，要公佈楊成武的罪行；第三是，要搞到北京來組織批鬥，而且要開大會。對這些問題江青不向毛主席、林總提出，也不在中央碰頭會議上提出，而是專門向黃永勝、吳法憲提出來。這真使他們兩位做難了。辦事組商量以後，立即向總理匯報了，總理都作了妥善處理。

棄楊留吳的問題

爲什麼楊成武下臺，吳法憲留在臺上？

「棄楊留吳」的內幕究竟是什麼？對這個問題，如果簡單說來就是：楊成武自己把自己打倒了，或者說楊成武是江青害倒的。楊成武如果不公開表示投靠了江青，是無論如何不會下臺的。即使問題再嚴重一點，也不會下臺。林總說過：「楊成武下臺，是不得已的事。」事實上是，林總爲了不讓「上海幫」破壞軍隊，決心放棄楊，他雖然沒有參加主席主持召開的會，但林也沒有給楊求情。楊成武爲什麼投到江青那裏去了呢？我分析有兩個原因：一是當時主席對江青的評價是高的，是信任的，主席實際上是讓江青在中央文革主事的，楊是看在眼裏的。二是他認爲自己同林彪的關係是不需要多考慮的，穩如泰山；如果同江青也能密切起來，那就

是「雙保險」了。關鍵的問題是林和江不是一路人，這種「雙保險」在政治生活中是做不到的，「雙保險」變成腳踩兩隻船，結果翻了船。

如果祇從林、楊之間的關係來說，確實可以認為楊下臺是預料之外的！因為自從羅瑞卿下臺，楊成武就是林最心腹的人了。歷史上的事不去說了，就是處理賀龍、羅瑞卿的事件中，一批幹部下臺，沒有一個同楊成武沒有關係的，也沒有一個不是楊成武具體處理的。在楊成武原來的想像中，提出讓余立金多擔當空軍工作，不可能惹這麼大的禍上身。退一步說，如果余立金的問題，楊要事先同林商量好了，不要用江青壓林彪，我看十個余立金的問題也辦成了，根本不會有什麼困難。

林總對楊成武的處理，完全是無奈的。「棄楊留吳」也不是簡單不要楊的問題，而是楊不能再留了，這是不准江青插手軍隊完全必要的做法。

在文化革命開始以後，楊成武、吳法憲在林彪同江青的關係上，都辦了一些事。他們兩個人的作法則根本不同。吳法憲是在忠於林彪的前提下，去同江青打交道，吳法憲祇能做一個忠實的「傳話筒」。楊成武就不同了，在多數問題上，他和吳是一樣的，但在某些問題上，甚至是非常重要的問題上，楊是夾帶自己的意見和打算的，林也萬萬沒有料到，楊對他也是兩面派。林總更沒有料到的是，楊成武竟敢以江青壓林！林總是堅決不許軍隊有江青的代理人的，這樣楊成武根本不可能繼續成為軍隊統帥的實際副手了！

楊成武是個聰明人，但他在林總同江青的關係上是個糊塗人！他對林、江之間的關係是沒有看準的。江青這個人不能成大局，楊成武也是沒有看透的。這是楊成武的最大悲劇！

楊成武是個有才幹的人，但在林彪、江青之間的關係上，楊的大才幹就少了一點，在這個問題上，也可以說，沒有才幹了！

楊成武已經是林總的代理人了，是他中途把自己給拋棄了。可能有人會說，楊成武早反林彪是有遠見的。對這種看法，當然就祇能一笑置之了！「九一三」之後，在報刊上看到楊成武的不少文章，雖然他對林總和他自己都很不實事求是，但是沒有看到他寫反毛主席的文章。

可是「九一三」之後，毛主席說「楊、余、傅」搞錯了，是林彪搞的。實事求是地說，「楊、余、傅」是毛主席和江青搞的。方塊網社製

席和江青聯手搞高級幹部，是文革中毛主席和江青聯手搞陶鑄後又一次聯手搞掉自己陣營的重要高級幹部。

第二十八章 黃永勝時期的軍委辦事組

軍委辦事組改組

一九六八年三月下旬，楊成武倒臺，軍委辦事組立即進行了改組。三月二十五日，中央文革碰頭會討論了新的軍委辦事組名單。經毛主席、林總同意，黃永勝任軍委辦事組組長，吳法憲仍任副組長，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為成員。年內，又先後增補了劉賢權、謝富治、溫玉成為成員。

楊成武下臺之時，江青要把我同楊一起打倒，因為在對待二醫大造反派的問題上，江青和我結下了怨。在三月二十五日的中央文革碰頭會上，新的軍委辦事組名單是黃永勝提一個，陳伯達寫一個名字，江青點頭才算過。當黃永勝提到我的名字時，江青不同意我參加軍委辦事組，就沒有把我的名字寫上，接著寫上了李作鵬的名字。會後，周總理把江青不同意我參加軍委辦事組的情況向毛主席、林總報告了。毛主席說：「照過去一樣，不能變。」林總說：「邱會作要留在軍委辦事組。」這樣，江青就不能再說話了。我的名字被補在後面。

四月一日下午，軍委辦事組在京西賓館會議樓第三會議室召開了成立會議。辦事組成員及全體工作人員到會了。在會上，辦事組的全體人員都以「要忠於偉大領袖毛主席、林副主席」為中心內容發表了講話。當時講這樣的話並不是空話，是有所指的，我們當時誤認為毛主席和江青有本質區別，言語間表示祇忠於毛主席、林總。我還說了：「凡是拍馬屁的人，總有一天會挨蹄子的！」葉群接著講了要「通氣」的問題（即是互相通情況），她說：「通氣是革命鬥爭的需要，廣州軍區和空軍通氣是好的。」整個會議的氣氛自始至終都是非常好的。

黃永勝時期的軍委辦事組，由於時間長，又是軍隊在文化革命中起主要作用的時期，做了很多工作。辦事組的幾個同志，個個身負重擔，天天工作滿載超軸。黃永勝、李作鵬身體都不好，李作鵬因心臟病發作，搶救了幾次；黃永勝肝病一直不好，總是在堅持工作，嚴重影響了他的身體，他幾次都是發高燒還參加會議。黃永勝是軍委辦事組的領頭人，他跟江青是講原則的，他並不因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而遷就她，而是在原則問題上和江青常有爭論和鬥爭。總理當時對黃永勝很器重也常要很讚賞，因為對江青的問題，總理看得很清楚，而總理顧全大局，常要遷就江青，叫做敢怒不敢言吧。有些同志怒都不敢怒，更不敢言了。這樣，大家想說的話，都由黃說出來了。黃永勝的正氣是很可貴的。抵制江青對政治局工作的干擾，黃是有大功的。比如說，楊成武對蕭力是很好的，甚至很恭敬，軍報的事蕭力說了算。黃永勝來了後，認為軍報是很重要的部門，讓李作鵬親自抓，黃永勝認為軍報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不是什麼了不起的當權派，因此不要搞垮那麼多人，盡量多一些工作。黃還特別提到對蕭力有不同意見，不能說目的就是反對毛主席，反對江青同志，這樣別人還怎麼開展工作。誰料得到，江青馬上就知道，跑到辦事組來發黃永勝的脾氣，黃永勝不怕江青，他拿起電話就對總理說：「一會開會我要晚到了，江青同志在這裏發火。」過了不久總理竟然到了京西賓館，勸了江青很久，等江青消了一點氣，就和江青、黃永勝、吳法憲一起去開碰頭會了。不久主席也知道了這件事，不但沒有批評黃永勝，反而把蕭力從軍報調走了。

黃永勝在不許江青插手軍隊，不許中央文革的人插手軍隊，不允許江青的代理人插手軍隊方面做得是很好的，這樣軍隊一直是穩定的。在總理領導的政治局的工作中，軍委辦事組是中流砥柱。我不是說我們這些人有多大本事，而是說，黨給了你這個位子，你就為黨的根本利益在努力工作。有些人號稱和「四人幫」作了鬥爭，其實，他們和「四人幫」的所謂鬥爭，是在毛主席逝世以後，是在「四人幫」被打倒以後，是在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後，那算什麼鬥爭呢？！我們和「四人幫」（那時還不這麼叫）的鬥爭，是毛主席健在的時候，是江青他們在臺上是領導人的時候，是肯定文革的時候，那個時候，有些自詡和江青鬥爭的人，正含著熱淚向主席請罪呢。

批判軍隊「二月逆流」

黃永勝上臺之後，對他的前任楊成武的工作，沒有做太多的清理就接過去了。黃永勝是不愛整人的，但卻從楊的手中接過了在軍隊批判「二月逆流」的棘手問題，說穿了就是在軍隊批元帥，這個問題，也留下了把柄，被人利用了。其實黃永勝和我，還有吳法憲、李作鵬和葉帥的關係都是很好的。

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在天安門城樓上。



一九六八年四月初，黃永勝、吳法憲參加中央碰頭會議回來，向軍委辦事組傳達說：「康生說：主席對我說，葉劍英的問題不少，讓搞個材料來看看，由辦事組來辦。江青說：從楊成武的問題可以看出，軍隊對『二月逆流』的批判是不得力的，現在要補上這一課。葉劍英這個人，從文化革命以來，表演不少，但我們注意不夠，你們組織人把他的材料搞出來，我們要很好研究這個人的問題。」江青說的當然不對，她恨誰就無端攻擊誰。譬如對楊成武，她從拚命拉楊到一腳踢開楊，對楊下手很狠。黃永勝接著說：「我在會上看總理沒有反對他們的意見，但總理的態度我還不清楚。一散會我就問總理，總理說：『康老、江青交待的事還是要辦的。』」

批判「二月逆流」，是毛主席、中央佈置的事，是公事，全黨全軍都要動的，其實楊成武早就和葉劍英劃清界限了。一九六七年五月，我的老伴到西山去，碰到葉帥在院子裏曬太陽，在閒談時，葉帥特別說到：「我們出了點問題（指「二月逆流」），現在，我有事給楊成武打電話，他都不接，說病了，可晚上看電視他在接見外賓，這個人，變得真快。」

我聽了黃、吳傳達之後，立即提出了疑問。我說：「沒有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我們可以搞葉帥的材料嗎？不管怎麼樣，他還是一個坐了冷板凳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啊，對我們幾位也是情長誼深嘛！我看，這樣的問題是值得考慮的！」

當時，對中央文革的「權威」，黃、吳在腦子裏是有牴觸的。但要他們違抗指示還是不可能的。最重要的是，當時總理對老師的態度也不夠好，有一天他到京西賓館來吃晚餐，然後和我們幾個閒談，他把幾個元帥挨個挖苦了一頓。因此，他們當然對我提的問題就敢聽不敢進耳朵裏去了，而且他們還會認為我提這樣的問題也未免有點不懂事。對我的意見，他們祇好不理睬，並且沒有經過什麼討論就定下來了。在會上定了三條：一是，材料組，由海軍派一個得力幹部任組長，名稱就叫「一號材料組」；二是，保密，不許外傳；三是，由李作鵬具體組織領導這一工作。事有湊巧，會後祇有兩、三天，李就病了，黃、吳指定我代替他臨時管理該事。

我代管之後辦了一些具體事。首先是把材料組建起來。海軍保衛部一個處長韋建功任組長。其次是批准過材料組可以調閱鞏嬰辦公廳、

總政治部有關檔案材料。第三是，爲了保密，我要總後司令部陳龐副參謀長爲材料組借用了總後的房子。第四是，我批准打印了材料初稿。材料初稿打印之後不久，李作鵬的病就好了，我也就宣佈不管材料組的事了。李看了初稿後，指示把稿子做了很大的修改，並拉成十幾條。後來黃又去向林匯報，林發話不讓搞。這樣，辦事組還未正式討論，黃就下令把材料全部燒了，一份不准留，連零星草稿也燒了，黃祇說了一句：「這件事過去了就阿彌陀佛了。」材料組解散了，各回原單位去了。這件事根本沒有擴散。

批判「二月逆流」的問題，中央通知全國都搞了，軍隊的駐京各單位也搞了，總後機關也搞了批「二月逆流」，並出了一期簡報。簡報的標題就是：批判「二月逆流」黑幹將葉劍英。簡報的內容我作了修改，指名批判葉劍英的提法都刪去了。但簡報標題忽略了修改，仍保持原樣。一九八〇年中央審查小組還對此作爲一個問題，對我專門進行了審查，我作了如實的說明。其實，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二月逆流」的問題元帥們自己都認了，幾個元帥把自己罵得狗血淋頭，比我們講的調子還高得多，給自己戴的帽子大得很。

黃永勝從楊成武的手上接過來的另一個燙手的東西，就是「二辦」，中央專案第二辦公室。屬於部隊的專案放在「二辦」，「二辦」的工作是絕對保密的，不論是楊成武時期，還是黃永勝時期，我和李作鵬都沒有參加，祇有葉向真專案組的幾件具體事交給我辦過。關於「二辦」的事楊成武有時還



一九六八年，在文化大革命中時任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副總參謀長兼總後勤部部長

露一點風，主要是爲了表示主席、中央對他的信任，他也帶我去看過一次在押的羅瑞卿等人。「二辦」的定案工作在楊成武時期就基本完成了，黃永勝祇是接了「二辦」主任這個官位，決策工作在楊成武出事後，都收回在總理、江青、康生手上。我認爲不論是楊成武時期，還是黃永勝時期，他們管「二辦」都是在爲黨做工作，爲毛主席、爲中央做工作，發生的對與錯問題，是與非問題，恩與怨問題，都應由中央負責。不能說黃管「二辦」時的工作就是犯罪，楊成武就沒事。你們看看黃克誠的回憶錄，黃老說黃永勝時期比以前（楊成武時期）日子好過多了。

辦事組的主要工作

第一件，加強戰備工作。

加強戰備是黃永勝時期的軍委辦事組，一直放在主要議事日程上，始終沒有放鬆的工作。在這一時期，戰備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一九五九年秋，林總主持軍委工作以來，加強戰備是中心工作之一，制定了作戰方針和作戰計劃，進行了規模空前的國防建設和軍隊本身的戰備建設，整個戰備有了比較好的基礎。在文化革命中，軍委辦事組對戰備工作，主要抓了如下幾個問題：

加強了對三北（東北、華北、西北）的戰備工作。爲了落實戰備，一九六八年下半年以後，先後開過三次三北戰備會議。一九六九年冬，毛主席派汪東興去東北檢查過戰備，這對軍委辦事組是很實際的督促。接著，黃永勝也親自到華北（張家口至寧夏）和東北（哈爾濱、齊齊哈爾）實地檢查戰備。到華北是我陪黃去的，那次視察，對邊防部隊，第二線的野戰部隊的政治思想工作、軍事訓練、國防工事、通信聯絡、後勤保障等等存在的問題，都逐一進行了解決。特別是從張北到二連地區，改造地形的建設進一步落實了。這次地形的改造，對抵禦蘇修機械化部隊進攻，能夠起到很大的作用，對北京的安全也會起很大的作用。

在形勢逐漸緊張的情況下，對全國部隊進行了調整，在太行山周圍，包括西安、洛陽、鄭州在內，集中了全軍野戰部隊約五分之一，作爲統帥部總預備隊。對蘇修的作戰方針是：既實行邊境防禦，又實行誘敵深入的兩手準備。

物資準備是戰備工作的重要問題，在周總理的具體指導下，我軍的物資儲備是相當可觀的。在三北各個戰役方向都儲備了必要數量和品種的物資。三百萬人打一年的物資基本上準備起來了，對部隊物資保障能力大大提高了。爲了防敵突襲，大部分物資都上了山溝，並有相當數量的物資進了洞庫。

第二件，三支兩軍工作。

關於三支兩軍前面已經說過了。當時全國很多地區和單位都軍管和支左了，軍隊參加軍管的幹部、戰士，不僅現在，就是當時也是難以統計的。可以這樣說，當時軍隊的戰備、農副業生產、三支兩軍是交錯進行的。軍隊參加三支兩軍的情況，概括起來也可以這樣說：軍隊除值班的陸軍、飛行部隊、水上部隊沒有整隊參加三支兩軍工作外，其餘的一律參加了。軍隊的幹部約百分之九十參加過三支兩軍工作。

總理對軍隊支左和辦事組對他的支持一直是感激的。他常說這樣的話：人民解放軍是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我們的指戰員在三支兩軍中吃了苦頭，但受到了鍛煉，過去我們講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現在不但講三大紀律，而且是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打傷了，甚至打死了也不開槍，執行任務不帶槍，解放軍戰士在被圍、被困、挨打的時候還高舉《毛主席語錄》，高呼毛主席萬歲，世界上哪有這麼好的軍隊？

第三件，管理國防工業。

我國的國防工業，不僅是同國家的工業一起發展起來的，而且是向來都佔領先地位。在毛主席、林總、周總理的關懷下，我國建設起了比較完整的國防工業體系。國防工業對我軍的裝備和支援世界革命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我國的國防工業向來都是周總理具體組織實施的，趙爾陸是建設和管理國防工業的創始人，一九六〇年以後，賀龍、羅瑞卿把趙爾陸「趕下臺」了，成立了以賀龍掛帥的國防工業委員會。以後又成立了國防工業辦公室，羅瑞卿兼主任，趙爾陸副之，我也搞了個副主任。因爲我從來沒有參加過具體工作，自己把這個官帽子給搞忘了，後來中央決定我管國防工業，我對總理說我不熟悉，王秉璋他們在行，總理叫人拿來一張任命書說：「你看，這是我給你下的委任狀。」我接過來一看，是一九六二年總理簽署的讓我當國防工辦副主任的任命



一九七〇年周總理參觀我軍新研製的69式40
火箭筒打坦克表演。

文化革命開始後，中央、國務院派粟裕任國防工業軍管小組組長。一九六八年開始實行國防工業生產、科研、使用相結合的方針。九大以後，國務院和中央軍委決定成立了常規兵器工業等四個領導小組：常規兵器工業領導小組，邱會作任組長；航空工業領導小組，吳法憲任組長；造船工業、科研領導小組，李作鵬任組長；電訊工業領導小組，李作鵬任組長。經總理建議，毛主席決定將國務院系統的三機部、四

機部、五機部、六機部交部隊管，撤銷國防工業辦公室，在軍委辦事

組之下，成立了國防工業領導小組，邱會作任組長，統一管理整個國防工業的生產、基本建設和科學研究。當時，五機部是我管，我藉機把邱創成同志「撈」出來，安排在總後當副部長，總後的老同志都歡迎他。

軍隊自己管理國防工業，在國防工業有史以來還是第一次。龐大的國防工業，工作量很大，在軍委辦事組領導下，成了我的主要任務之一。在文化大革命中，國防工業無論在恢復生產還是科學研究、企業管理方面，在工業行業中都是處於領先地位。

第四件，機關整編。

一九六九年中，根據毛主席「鬥批改」，「精簡結構，下放科室人員」的指示，全軍大軍區以上的機關都進行整編。這次整編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進行的，涉及到了複雜的問題。

整編精減機關是十分必要的。全軍大軍區以上的機關業務部門進行了合併，精減和撤消三個方面的工作。精簡機關工作人員百分之三十左右。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三日，經毛主席批准，軍委辦事組公佈總參謀部、總後勤部機關精簡方案。據此，總參、總後機關進行精簡整編。

總參原編十五個部、局，精簡整編爲十三個部、局。即：辦公廳（軍委辦公廳兼）、作戰部、情報部、三部、軍訓部、軍務動員部、防化學部、政治部、機要局、測繪局、外事局、氣象局、管理局。

總後原編十三個部、局，精簡整編爲九個部、局。即：司令部、政治部、供應部、衛生部、裝備部、軍事運輸部、企業部、營房部、管理局。

年底，軍委辦事組公佈總政治部機關精簡方案。據此，總政機關由原編的十三個部、院，縮編爲六個部、室。即：辦公室、組織部、幹部部、宣傳部、保衛部、群眾工作部。

此前，總政機關於一九六七年中期就陷於癱瘓狀態。一九六八年十月，毛主席下令總政軍事管制，我們派了王宏坤、劉江亭，總政的幹部都集中到高等軍事學院去辦學習班了。一九六九年十月，黃志勇、田維新被任命爲總政副主任。十二月，總政恢復辦公，李德生任總政主任。李的任命，是林總向主席報告得到同意的，目的是爲了擋住江青要將張春橋放在總政主任這個位置的企圖。林總說過：「李現在同江青還沒有更密切的關係，在同他們的鬥爭中，他至少可以保持中立。將來如果有變化，可以立即撤下來。」「九一三」以後，李德生深受毛主席信任，在十大當選黨中央副主席，軍隊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時，李德生卻被免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職務，據說毛主席說他自己「瞎了眼」，毛主席的話是什麼意思，不得而知。

精簡下來的幹部，用三種辦法進行安置，一是進「五七」幹校；二是到國防工業戰線和參加三支兩軍；三是，轉業、復員。這三條出路，在當時的情況下，是無可非議的。總後當然也要執行中央的部署，關鍵是誰走的問題，我總不能讓反對總後黨委，反對我的人留在機關工作，把擁護總後黨委，擁護我的人去上幹校，轉業復員吧。總之精簡勢在必行，誰去支左誰不高興，誰上幹校誰有意見，誰轉業復員誰鬧情緒，公審時又被當權者利用了，把按中央部署的正常工作說成了迫害。

第五件，節約鬧革命。

文革中，不論是大串連，還是主席八次接見紅衛兵；不論是農村、工廠打派仗，工廠停產半停產，還是鐵路、航運交通中斷，對國民經濟造成極大損失，也造成了極大的浪費。但是軍隊一直堅持勤儉治軍。軍

隊三支兩軍任務很重，但堅持訓練從不間斷，克服困難、自製訓練器材，不能實彈訓練，就模擬訓練。部隊指戰員的軍裝、被服、用品也相當節約，每人幾乎祇有一套像樣的衣服，大家都在打補丁，但革命精神非常高漲。我看到總後編輯的一本書說「九一三」之後的一九七二年，總後向國家上繳節餘軍費 32 億元，這就是我們省下來的。一九七四年總後又向國家上交結餘國防費 30 億元。這都是我們節省下來的。

軍委辦事組，除擔任軍隊本身的工作之外，還擔任了中央、國務院交辦的很多任務。文化革命開始不久，除了中央文革這個十足的老爺機構之外，其餘的機構都不起作用了。當時，唯有軍委辦事組是赫赫有名的實權機構。黨政及大部份的日常工作總理都交到軍委辦事組身上了，很多具體工作都是軍委辦事組組織辦理的。毛主席、林總、周總理對軍委辦事組的辦事能力是十分欣賞的。周總理說：「中央一級應當有幾個像軍委辦事組這樣的辦事機構！」林總對軍委辦事組有過很高的評價：「機構小，力量大；人員少，幹勁大；作風好，辦事快。」軍委辦事組的歷史經過新生、興盛和末日三個時期。從四人小組到楊成武時期的軍委辦事組為新生時期；黃永勝時期的軍委辦事組，九大前後為興盛時期，九屆二中全會之後即到了末日。事物本來有生有滅，但軍委辦事組的滅亡並非「壽終」，而是「夭折」。

九屆二中全會後，軍委辦事組的處境很困難。（一）毛主席說：「要給軍委辦事組『摻砂子』」。意思是說，軍委辦事組過於「純潔」，像一塊土壤一樣板結了，要摻砂子才能通氣；（二）毛主席指示說：「要恢復中央軍委的名義。軍委是多數的，辦事組是少數。」

軍委辦事組歷時五年，它是文化革命時期軍隊的統帥部。在黨的九大之前，中央文革單獨霸佔了中央碰頭會的領導大權時期，軍隊都沒有被搞亂，這是軍委辦事組最大的功勞。在既要穩定軍隊，又要搞好軍隊文化革命的總方針指導下，軍委辦事組和政治局大多數同志一起，和擅權欺人、胡作非為的江青進行堅決的鬥爭，和中央文革的各種錯誤進行了堅決的鬥爭，是完成了歷史任務的。這是軍委辦事組的重大貢獻。「九一三」之後，加在軍委辦事組頭上的罪名就不知有多少。軍委辦事組在歷史上是功還是過，天下一切公道人，甚至可以包括許多不公道的人在內，都是不糊塗的！

從四人小組到兩屆軍委辦事組，歷時五年。爲什麼用這樣一個組織機構來領導和統帥軍隊？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林總同黃永勝的談話（吳法憲、邱會作在座）就可說明問題的真相。林總說：「去年，全軍文革垮了，江青幾次提議要恢復全軍文革，我都沒有表態。要恢復全軍文革，就會有人插手軍隊的文化革命，並在軍隊內部找他們的代理人。中央軍委常委的工作一時也難以恢復起來，現在主要的問題是誰來管事。葉帥管事，軍隊喜歡，他們（指中央文革）不喜歡；徐帥管事，他們喜歡，軍隊不喜歡。祇好用辦事組來管大事，這是最靠得住的辦法。」軍委辦事組圓滿完成了任務。

「反江青俱樂部」

黨的領導人之中夫人作風不好的有之，但象江青這樣在全黨耍霸道的，還是我黨有史以來第一個。江青的耍霸道在文革中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在林總的支持下，軍委辦事組的黃、吳、李、邱是堅決反對江青的，也就是反對中央文革的，這是保衛人民解放軍決定性的鬥爭，在文革中保衛解放軍不被江青插手就是保衛黨和國家的頭等大事。歷史事實完全可以證明：在文化革命中，軍委辦事組是反對江青的英雄！反對江青成爲我們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康生把我們的活動稱之爲「反江青俱樂部」。

過去有些事情看不清，現在就逐漸明白了。當毛主席爲反修防修搞文化大革命，林總都是支持毛主席的。毛主席搞的是「造反有理」，不怕亂；相信群眾，依靠造反派，「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林彪希望文化革命在黨的領導下，有序進行，因此林彪從在上面的中央文革、江青一夥，到下面的造反派，都不感冒。另外，林彪看得清楚，毛主席在文革這個「公事」之外，還有些「私慮」。他要按他的「理想」行事，讓人民解放軍爲其服務時，林總就消極了怠工了。因爲從文化大革命的實踐來看，在最重要的問題上背離了原來反修防修的宗旨。這樣就出現了一個現在想起來真是驚心動魄的問題，就是人民解放軍要盡力做好工作，從崇敬、愛護毛主席的感情出發，在具體工作中糾偏。鬥爭的主要形式就是抵制江青的錯誤，一心一意爲主席補臺，但客觀上、實際上就是抵制了毛主席利用解放軍辦「私慮」。但江青和毛主席在政治上的「根本」又

是一致的，這樣在客觀上又妨礙了主席的「私慮」，主席內心是不高興的。遺憾的是我們當時沒有認識到，問題十分複雜。黃永勝身為軍委辦事組的頭人，他熱愛毛主席，卻憎恨江青，挖苦、謾罵江青毫無顧忌，別人提醒他，他卻不以為然，再加上汪東興一個勁的誤導（汪總是說毛和江是兩回事），黃有一次竟說：「江青是毛主席的老婆，我們還是毛主席的兵呢！」，自以為和毛主席感情深。殊不知你就是跟毛主席南征北戰一輩子，得罪了江青也是面目全非。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屆十一中全會後，造反派也就同時出現了。從軍隊來說，對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的鬥爭基本上是「空對空」，沒有什麼實質性內容。對江青的造反路線的鬥爭就不同了，這個鬥爭是「實打實」的，是爲了軍隊不受破壞而鬥爭的。我們對江青一夥的鬥爭是堅決的、認真的、積極的，當然這種鬥爭又是十分複雜的，因爲毛主席對造反派是支持的態度。

限制江青爲代表的造反勢力影響到軍隊，是鬥爭的中心問題。對江青和造反派的影響是不可低估的，再加上毛主席和江青的特殊關係，鬥爭又是複雜的。

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江青除了一個中央文革第一副組長的頭銜之外之外，什麼還都不是，但她已經是以黨內第三號人物自居了，把總理根本不放在眼裏。對這個問題，她在公開場合所佔的位置就可以看出一些。凡是有毛主席出場的場面，江青的位置總是同林彪不相上下，在多數情況下，江青與林彪並肩出場，至少也是跟在林彪之後；凡是周總理領頭的場面，江青至少也是同總理並排出場；凡是中央文革單獨出場，江青當然就是「霸主」的位置，總是走在前頭，後面跟隨的人還要同她保持一段距離。當然，這祇是表面。關鍵是在當時的中央碰頭會上，江青總想「奪」總理的主位，總理對江青常常又很遷就，因此，在文革中整體的工作環境是很困難的，事情是很難辦的。

一九七〇年三月到四月間，毛主席在武漢派汪東興去東北檢查戰備時，來回都在北京小住。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四人在汪東興家長談過兩次，每次談的時間都在五小時以上，在三座門也長談過。所談的內容當時是天南地北的，但中心的是談毛主席與江青關係問題，據汪東興說，江青同毛主席的夫妻生活，早在一九六四年就結束了。從

汪談話中，他讓我們確信毛主席早和江青在生活上並無特殊關係，當時我們信了，所以抵制江青就無顧慮了。現在看來，上了汪東興的當，也可能是汪出於對江青的不滿，借助我們反對江青；也可能是毛主席授意汪，要我們一頓，欲擒故縱吧。

江青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從她的舉動就可以知道她的喜怒。凡進場見人先笑後說話，並同大家一一握手就是心裏很高興的表現。凡進場不說話，也不同大家握手，氣沖沖地坐在那裏，就是心裏很不高興的表現。對她必須提防，否則誰都可能遭災。凡是坐下之後嘸著嘴，摔茶杯，摔擦手的小手巾，心中就有火了，很快就要罵人了。

一九六八年夏的一天晚上，中央碰頭會議在釣魚臺 16 樓開會。因為要討論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問題，周總理通知我也去參加會議。我到會場不久，江青來了。她入場的時候，全體的人員包括周恩來、康生在內，都要起立以示迎接。周、江、康為序的座位是固定的。坐下不久，護士給她端來一杯開水和送來一包藥。江青隨手端起開水喝了一口，水可能熱了，她隨手把杯子向地下扔去並大聲說：「唉呀！不得了！護士想用開水燙死我！你汪東興，這樣大的事你也不管一下呀！你心裏還有沒有毛主席呀？」我坐得比較遠，也被扔茶杯的響聲嚇了一跳。在此情況下，汪東興祇好出到外間，叫護士給江青重端來了一杯開水。開水送來之後，總理用手在杯上摸了一下，並對江青說：「開水不熱，請吃藥吧。」江青這下才息怒，接著就滔滔不絕地說話了。

一九六八年冬，江青病了。大概有些天，除了張春橋、姚文元去看過她之外，其餘的人都沒有去看她，她的心裏很不舒服，要找機會出氣。一天，江青對著她的秘書、護士和總醫院去為她看病的醫生兇狠狠地問：「中央碰頭會議的那些人是都病了，還是都死了？！」工作人員都知道他問話的意思。事後，她的護士同我和葉群在電話上說了，葉就要黃、吳去看她。後來，護士同江青說：「黃總長、吳副總長來看江青同志，並問江青同志好！」江青還是兇狠狠地說：「他們現在不用我保護了，有權有勢了，還來看我？我才不稀罕！」

江青為了掩蓋自己的醜事，一九六七年秋天總理和楊成武派人到上海、杭州、南京抓了一批人。江、浙、滬兩省一市的公安廳局長制作抓

了不少人，連她在三十年代的保姆也抓起來了，並一律用飛機運送到北京關進了秦城監獄。

江青不僅抓了自己的仇人，也提出要為別人抓人。一次，總理、楊成武、吳法憲和我在場，江青對葉群說：「傅連璋在五十年代初，不是害過林副主席嗎？現在，為什麼不報仇！」葉群笑了笑回答說：「傅連璋還好，就是教林副主席養身之道，現在他（林）自己都會查藥典了。」江青認為葉群不識抬舉，立即說：「把傅連璋抓起來，待後再處理。」大家都不吭聲，江青就火了，這時總理說這件事我來辦。也就過了一天衛戍區來了幾個人，給我看了總理的條子：「把傅連璋交給來人，周恩來。」我看了條子之後知道總理並不是指名叫我辦的，我就給總後副參謀長陳龐打了電話，陳龐帶著他們到了香山傅的住處，翻牆進去把傅連璋帶走了，並關進了秦城。

江青的劣跡是很多的，黃永勝抵制江青是堅決的。黃的這種堅決有堅持原則的一面，也有不知毛、江深層次關係的一面；而總理常常對江青是「顧全大局」的，這種「顧全大局」有總理相忍為安的一面，也有他知道毛、江深層次關係的一面。江青鬧事常常搞得大家不得安寧，有一次江青為軍委辦事組的事對總理發了火，總理深更半夜就把黃永勝、吳法憲叫去。黃永勝的安眠藥正在起作用，為了給黃提提神，總理給他倒了一杯咖啡，黃沒拿住，撒了總理一腿，總理忙說：「沒事，沒事。」（事後黃永勝在辦事組說起這事，還為總理的處境而難過。）總理接著說了江青發脾氣的事，並說：「我明天帶上你們幾個去看江青同志，任他發火，你們一句話也不要說。」第二天，總理帶上黃、吳、李、邱去看江青，到了江青的住處，等了很久江青才傲裏傲氣地從樓上往下走，總理趕忙上去扶江青，其實江青哪裏需要扶嘛！我們都看不過眼。

反江青的兩個不同時期

軍委辦事組抵制江青是有個發展過程的。大體上可分為兩個階段：楊成武時期；黃永勝時期。這兩個時期，楊成武時期，合作是主要的。在黃永勝時期，毛主席對江青的任何動向，汪東興會立即傳到葉群那裏去，葉又轉手傳到黃永勝、吳法憲那裏去；林彪對江青的任何動向，葉群會立即傳到汪東興、黃永勝、吳法憲那裏去。汪東興、葉群、黃永勝、

吳法憲四個人，是運轉這種動向的中心人物。以前說過，楊成武是林總最親信的人物之一，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上海會議後他實際上成爲林總的接班人了。林總的任何活動，楊成武都是瞭如指掌的。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對林總、江青之間的關係也是一句不說，一字不漏的。從文化革命開始，到楊成武下臺，我和李作鵬、張秀川同楊成武的關係算是最親近的了，但對林總和江青之間的「關係」，我是一點也不知道的。

從一九六八年三月黃永勝上臺之初，他同楊成武的政策基本上是一樣的，關於林總、江青之間的關係也是滴水不漏的。黃、吳、李、邱都是同一個桌子辦公的，黃、吳兩個人挨著坐在一起，他們要是有什麼事，總是交頭接耳，或者到另外一個房間去商量。有時乾脆要李、邱離開。究竟是什麼事要這樣辦，我們二人同他們二人相互之間，大體上是「心照不宣」的，江青的事還是範圍越小越好。因此之故，我們之間也就不會發生什麼工作上的「誤會」。

八屆十二中全會正在進行的時候，有一次軍委辦事組在京西賓館會議樓第三會議室開會，黃、吳先到了，並興高采烈地在說：「……他們不止是一個宗派，是一個幫會，是上海幫。」我們聽到黃、吳正在說話，我把李作鵬拉了一下就向外走。黃即說：「你們兩個坐下，不要走。今天可以同你們談點你們聽不到的話。」黃永勝接著說：「林總提出了反江青宗派主義。這個問題今後會向你們說清楚的。」從此以後，關於林總、江青之間的關係，黃、吳對我們的態度確實有些變了。首先是對一些重大問題，黃、吳對李、邱就會透露一些了，其次，對李、邱有關的問題，他們也會分別同我們「個別談話」，提醒我們不要撞到江青的槍口上。

九大之後，黃、吳、李、邱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了，可以同桌共議了。關於林總、江青之間的問題，我們四人之間無話不說了，我們四個人的關係起了質的變化。黃說：「過去有些事沒有同你們說，有過去的情況。現在就會一切都同你們說的，毫無保留了。不僅如此，過去沒有同你們說過的事，也會同你們說的，補上這一課。因爲事情都有一個發展過程，過去的事不同你們說清楚，就不能爲你們瞭解今天。我們是一根繩子上的螞蚱，出了什麼事，我們一個也跑不了的。你們怕不怕？要是怕也可以退出。」說完他自己笑了起來。

黃、吳關於林總和江青之間的問題，確實同我和李作鵬「補了一課」，而且是內容非常豐富的一課。在九大期間，有一天，黃、吳、李、邱四人在京西賓館大樓八層東邊大房間從晚上八時談到第二天早上六時，一共談了十個小時，我們是邊談邊議的！

我們對江青一夥的問題確實談得很多的。如有重要問題，不管是三更半夜，祇要一叫，就會風雨無阻地聚集在一起的。我們自己也開玩笑說：「我們這樣經常談論別人（指江青）的長短，若是她知道了，非得把我們五馬分屍不可！」

爲了好談論問題，我們爲上海幫幾個人編了「代號」。康生叫「8樓」（住釣魚臺8號樓）或「兩撇」（八字鬚之意）；江青叫「11樓」（住釣魚臺11號樓）；張春橋「眼鏡」；姚文元叫「小的」。這樣，我們打電話和見面都使用代號，有時祇要打個手勢就行了。例如，嘴巴上摸一下就是指康生，伸出兩個手指（11）就是指江青。

黃、吳、李、邱同康、江、張、姚之間，好像很自然地成了「人以群分」。我們之間，如果不是有意同他們湊合湊合的話，那麼，無論休息、走路、吃飯、政治局開會坐位置等等都分得清清楚楚，真是「楚河漢界」了。

黃、吳、李、邱每人都有一本反上海幫的老賬。從數量上來說，我的賬最多。這是因爲江青支持二醫大整我和調「紅縱」來對我搞武鬥，我實在太傷心了！因此，我就裝著一付「老憨」的樣子，什麼都敢說。江青就向葉群說過：「邱會作這個人，爲什麼那樣不講禮貌！」

在反對江青的問題上，林彪的支持是一條，但最重要的是總理心中的支持和其他老同志心中的支持。在當時的政治局中，總理，黃、吳、李、邱，先念、李德生、紀登奎、汪東興等等都是一派，祇有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他們是一夥。其他不參加政治局辦公的人，如朱德、葉帥、董老、劉帥，在大的問題上，和大家也是一致的。在政治局大多數同志中，總理看得清，但他怕主席、不敢得罪江青，他總以過去有賬，怕主席挖傷疤；黃、吳、李、邱都是紅小鬼出身，一直在軍隊工作，沒有歷史問題，政治上一身清，又是「雙一」（一軍團、一方面軍），毛主席、林彪、總理都信任我們，所以們敢頂碰江青。

尤其是我們反江青對總理領導的蔑視，反對江青在政治局會議上對討論重要問題的破壞。總理是非常智慧的人，他事事心知肚明，總理又是十分顧全大局的人。總理雖然不敢出面冒犯江青，但在後面支持我們，有時在會上還故意「和稀泥」。祇要是總理和了稀泥，會後他會我們說明，並教育我們有些非原則的事，不要搞得太衝突。譬如，大會堂有一個提供冰激凌的地方，每次開會休息時，吳法憲和姚文元都去搶這個地方，吳法憲雖胖，速度遠比姚文元快，我們搶到了這個地方，江青、張春橋他們就不去了，然後我們幾個再過去，其他同志也過去吃冰激凌；如果姚文元搶到這個地方，也祇有江青、張春橋過去，其他人都不過去，起來伸伸懶腰就原地休息。

這個「反」不簡單呀，是擁護毛主席，反對江青，廬山會議之前汪東興和我們又是一致的，這樣就扼制了江青一夥不少對中央正常工作的擾亂。九大以後，有一段形勢不錯，就是通過抵制江青一夥，扼制了毛主席在文革中的路線，被江青一夥搬弄得往更「左」的方向發展、蔓延。

我抵制江青的事例，還記得一些，例舉如下若干條：

1、同邱國光的談話。一九六八年七月間，廣州軍區副司令員邱國光調任中央衛生部軍管小組組長。到任之前，黃永勝和我同他談過一次話。我直截了當地向邱國光說了不要上江青的當，主要談了兩點。一是，不要他插手北京醫院「三一〇」專案。我同他說，北京醫院的專案是江青親自設立的，任何人不能插手。別人要是插了手，自己就會被變為專案對象的，你要是插了手也會變轉為專案對象的。二是，中央衛生部的文化革命，不要陷入派性。北京的派性就像你們廣州的「廣交會」一樣的，你祇要不注意，別人就會同你做交易的。我說了之後，黃永勝還接著說了：「你們一家子（都姓邱）說的問題要特別注意，又要特別保密。如果傳出去了，其後果是難以設想的。」

2、不投江青的票。選舉前的一天，辦事組的在京西賓館開會，黃永勝在會上專門講了毛主席強調要自主選舉，不要受制於他人，散會時他自言自語地說：「我是不會投 11 樓的票。」黃永勝膽子好大，因為溫玉成、劉賢權等也在場，甚至記錄的秘書也在。選舉中央委員時，我沒有投江青的票，但我是自主選舉的。選舉之後，江青少了若干張票，葉群則少的不多。這個問題，對一般人來說，簡直不是問題，對江青則是大

得了不起的問題。在唱票時，江青聽到她自己少了票立即退席了，這個結果是出乎江青預料之外的。張春橋氣勢兇兇地提出要查選票，他說：「江青少了若干張票，不是「小」代表不投票，而是「大」代表搞的，這不是得票多少的問題，是政治鬥爭。」毛主席知道後，可能嫌江青他們太囂張，主席說：「你們要違背剛剛通過的黨章，你們就去查，我是不參加你們的大合唱的。」這樣這場風波才平息下去，但雙方結成大仇。

3、勸丁盛不投江青的票。九屆一中全會就要開會之時，在人民大會堂河北廳的外面，我同丁盛一邊喝水，一邊閒談。我說：「等一會選舉中央政治局委員時，如果候選人名單上有江青的名字，就不要投她的票。她是一個反軍派，也是反對林副主席的健將！」丁盛回答我說：「江青是這樣一個人啊！誰反對林副主席，反對解放軍，我們不答應！誰還投她的票？」選舉中央政治局委員時，江青一夥都少了好幾張票，這對他們來說，是十分意外，沒有想到的問題。

4、拒絕為江青選調護士。一九七〇年秋，汪東興當著江青的面，要我為她選換一個護士。汪東興說：「江青同志現在的護士，是我們倆人共同在總後系統選的。她快要生孩子，請你還是在總後系統選換一個為好。」我直截了當地回答說：「你自己直接找曹根慧（三〇一醫院副院長）辦吧，我再不造孽了（指江青對護士太厲害了）！」江青聽到我說話之後，她睜大兩隻眼瞪著我，一時沒有說出話來。正在這時，葉群插上話來了。她說：「為江青選調護士的事，由我來辦。」這樣江青的火才沒有發出來。

5、拒絕陪江青上井岡山。一九七一年七月，江青自言自語地說：「我準備上井岡山去接受歷史教育，要有一個適當的人陪我一起去。」接著，江青對著我說：「吳法憲陪我去過海南島，李作鵬陪我去過一次青島，下次上井岡山該你陪我去。」我調侃地拒絕說：「我沒有上過井岡山。毛主席在井岡山時，我脫了開襠褲子還不久呢。」江青外出，為什麼一定要解放軍的高級幹部陪同？我認為這也是她惡霸作風的一種表現。首先她認為自己是毛主席夫人，外出應當受到特殊的保護。其次，她認為自己是中央的「要人」，解放軍有保護自己的責任。第三，她認為祇有解放軍、公安、衛生部門保駕外出，才夠出風頭的。總之，毛主席、林總、周總理能夠享受的待遇，江青都要爭著享受。

6、拒絕爲江青的樣板團做演出服。江青有意把她的樣板團打扮打扮，但在當時的情況下，此事非找我就不能解決問題。江青對著我說：「你們部隊的毛料子的確良很好，適宜做演出服。樣板團的演出服需要解決。」江青有意沒有把話說完，她的意思是要我主動提出來。但我就是不說那句話，她當場就感到有點難受。當時，總理正在會場上吃飯，他知道我不會主動爲江青辦事的。總理怕江青爲此事發我脾氣，就一邊吃飯一邊說：「樣板團演出服，由我來同邱會作同志商量。」江青聽到總理的話，就面上帶有笑容地說：「我們大家都要學習總理辦事的精神。」

7、拒絕管電影、電視工業。從一九六九年，我是中央軍委國防工業領導小組組長，統管國防工業。幾年來國防工業管得不錯，總理在政治局會議上多次表揚我。當時的電影、電視工業廠子雖然不多，但問題很多，總理也正在考慮「兩電」工業劃歸國防工業系統管理，並徵求我的意見。我對總理說：「總理交代我辦的事，除了執行之外我不會有任何考慮的。我不想管『兩電』不是怕工作多，就怕吃冤枉！」總理同意了 my 意見。江青是過高地估計自己的，她直截了當地對我說：「電影電視工業由你來管，要用很大的力量來辦好這一工作，這是很重要的工作。」我毫不含糊地回答說：「國防工業就夠我管的了，我管不了電影電視工業。」江青立即向我大發脾氣說：「國防工業的工廠數以百計，你都管得了，就管不了電影電視幾個工廠，真是豈有此理！」黃永勝看到我不好下臺了，他插話說：「電影電視工業怎麼樣管，要由總理來考慮決定，因爲還有與國務院各部門的關係問題。」周總理接著說：「對！由我召集一次專門會議研究一下，再決定管理辦法。」江青聽到黃永勝和總理的話之後，沒有再發火了，但撇著一個嘴巴，一句話也不說了。我也坐在那裏不吭氣就是了。

8、要丁盛防範江青。一九七一年五月間，我陪同越南共產黨總書記黎筭去廣州參觀訪問時，我同丁盛說：「江青最近接連來過廣州兩次，從她的嘴裏可以聽到她對廣州很感興趣，對你這個司令也很感興趣。她還會來的，她可能給你什麼好處，可最終會是你的災難，你可要同她保持一定的距離，否則就要吃虧、上當的。」我接著還說了：「江青這個人是靠不住的，她要是用你的時候，把你捧到九霄還嫌低，她要是不用你，

則把你打到十八層地獄還嫌淺呢。」我最後還說了：「防範她的辦法很多，不要單獨接近她，不要向她請示匯報什麼問題。」

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之前，我不瞭解江青，沒有個別接觸過她，因為她是毛主席的夫人，我對她敬而遠之。在文革中，看她那樣飛揚跋扈，我不理解；他亂點老幹部的名，我開始厭惡她，後來我知道她整我之後，我就開始反對她。我是不怕江青的，敢於對她頂撞。我認為江青不過是一隻鍍了金的紙老虎，沒有什麼可怕的！黃、吳、李、邱反江青是眾所周知的，這方面的事例多得很，我是無法回憶全面的。

對江青一夥的問題，無論在我們幾個人（黃、吳、李、邱）之內，或是在更大的範圍之內，行動是統一的。例如前面提到的許多問題就是這樣的。當然，這個問題更多的事例是在九大之後。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之後，張春橋就說過：「過去中央政治局開會，有大會也有小會，大會常常搞不過小會。」他所說的就是我們抵制某些問題的統一行動。張春橋又說：「過去在福建廳（政治局會場）開會，每次開會吳法憲至少要打三次電話。」林彪、江青之間，從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不久就存在矛盾。這種矛盾，隨著形勢的進展，一直在鬥爭，並且逐漸尖銳化了。八屆十二中全會之後，他們之間的矛盾明朗化了，九大之後就尖銳化了，九屆二中全會在特定的條件下，鬥爭的結果是林彪失敗了，江青勝利了。這就是林彪、江青之間的真正歷史。

話又說回來，江青遭人恨是事實，但江青的問題主要還是思想意識和思想品質問題，這裏面有江青的責任，這是主要的；也有毛主席的遷就，這也是不能忽視的。但總起來說，軍委辦事組和江青一夥的鬥爭仍是黨內問題，和公審搞的是兩回事。公審是通過搞江青否定文革，搞臭毛主席罷了。

一九七二年二月間，中央專案組李震、郭玉峰、吳忠在對我審查時，就指出了我們反對江青的三個問題：（一）「林彪反黨集團」的主要問題就是反對江青，反對江青就是反對黨；（二）你們反對江青是經常的，可以說達到了無事不反的程度了；（三）九大時有組織地減少江青的選票在黨的歷史上也是空前的。對他們說的，我除了沒有同意「反對江青就是反對黨」之外，其餘的我都同意了。

李必達事件

李必達事件是發生在九屆一中全會將要舉行的時候，但事件起始在九大的準備過程中。

李必達是黃永勝從廣州軍區帶到北京來的秘書之一，李是個大學生，在文化革命前參軍到41軍，各方面表現還不錯。他所在的團領導是黃永勝的老秘書，經推薦及保衛部門審查後，調到軍區不久就當了黃永勝的秘書。李必達初到黃辦任秘書，幹的不錯，黃永勝夫婦都很滿意。項輝方對李必達也很關愛，曾幾次親自出馬爲他找對象。

文革中有一句話倒是很對的，那就是說文革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李必達的靈魂也被腐蝕爛了。李必達家境貧寒，甚至家裏因貧寒把他賣掉。在文革中，李必達名利熏心，想當出人頭地的風雲人物，幹驚天動地的大事，撈取政治資本。

黃永勝無疑是擁護毛主席的，但他理解的文化大革命是在毛主席和中央的領導下有序進行。文革一亂，那麼多老幹部受衝擊，黃永勝看不慣，六七年初在京西賓館開會，他當著江青的面就說：「江青同志要聽毛主席的話！」那時他們就結下了仇。黃到中央以後，和江青同桌辦公了，他對江青就瞭解更多了，江青那種頤指氣使、飛揚跋扈、狗仗人勢的勁頭，她對總理那種放肆的樣子，實在讓人難忍。黃畢竟是秋收起義的老資格，他敢於和江青鬥爭，總理也樂得他和江青鬥，因爲江青對黨的正常工作干擾太大了。黃除了抵制江青，和她鬥爭，背後也罵她「武則天」、「慈禧」、「惡霸」、「對老幹部草菅人命」等等。李必達偶爾聽到黃永勝罵江青的一言半語，開始感到吃驚和好奇，後來竟發展到偷聽黃永勝與總理、與葉群等人電話的地步，他認爲黃永勝這些說出去要殺頭的話，總會派上用場。果不其然，他的惡作劇終於發生了。

當時，中央安排黃永勝在北京針織總廠蹲點，黃派李必達在廠裏盯守，但他常跑出去辦私事，不能忠於職守。同時，李必達因工作中的其他錯誤受到批評，他不能正確對待，以至發展到了說是鬼迷心竅也成，說是鬼使神差也成的地步，他竟然想當大英雄，終於決定鋌而走險，把他平時聽到的黃永勝、葉群等人及軍委辦事組對江青的壞話和不恭，以及把偷聽到黃永勝在軍委首長之間的電話內容記下來，向江青告狀，想扳倒黃永勝。

李必達告黃永勝罵江青的信，寫了至少有兩三封，他甚至利用職務之便，嚴重違反軍紀，假借黃永勝辦公室的名義，蓋上「黃永勝同志處」（即黃辦）的公章，從總參謀部機要局發出一封給江青的信，隨後又通過電話查問，確知他的信已經發出才放下心來。蓋上「黃永勝同志處」發文件、信件，是要由保密員馬元剛登記才能以機要通信發出。李必達私走機要通信的行爲，不論從當時看，從現在看，都是極其嚴重的違反黨紀國法的犯罪行爲。

李必達在信中說：「……黃永勝、吳法憲、葉群等人經常惡毒地攻擊江青同志，他們是一個反對敬愛的江青同志的反革命集團！」黃永勝是誰？是我軍的總參謀長；葉群是誰？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林副主席的夫人。寫這樣的信，問題顯然是很嚴重的。

還有一封信是通過溫玉成轉的。李必達從北京針織總廠跑到溫玉成那裏向溫玉成做了匯報，並把信交給了溫。李耍賴說，溫不答應他就不走。溫雖然收下信，但並沒有如李必達的願，李必達太卑鄙太齷齪了，溫玉成經過考慮把李必達的這封信轉到了葉群手上，因為葉群是林副統帥的夫人。溫玉成這樣處理，這是李必達做夢也沒有想到的。

大概是四月二十五、六日，凌晨三時多，黃永勝有事找李必達，派人到針織總廠沒找到，說兩天沒來了；又到京西賓館找，偶而發現了他的問題。李必達的房子裏，在未燒盡的紙灰裏發現了一張燒殘的紙片，上面寫著：「敬愛的江青同志，我是黃永勝的秘書……」這樣簡單的兩行字，完全可以說明問題。黃大吃一驚，馬上派了幾路人馬找李必達，終於在住京西賓館的總後九大代表王瑞華（他的未婚妻）的房間內找到了。但李究竟寫了什麼具體東西，送到哪裏去了，則拒不交代，他把希望寄托在江青身上。

由於李的未婚妻是總後三〇一醫院的，想從她嘴裏瞭解一些情況，於是黃把我叫去了。我到了京西賓館會議樓一層東廳，黃、吳、葉坐在那裏，有些木訥，一句話也不說。還是葉群開始同我說話，她說：「黃總長的後院起火了！」接著葉群就同我說了事情的前後經過。我聽後也有些緊張，畢竟搞到了江青頭上。葉群急切地說：「你這個一精明人，提點解決的辦法吧！」我回答說：「大家一起想，刀山火海也要過呀！」此時，黃也精神起來了，我們就一起談起了解決的辦法。

毛主席對此事的態度黃、吳、葉也不知道，三人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但大家分析，信肯定不祇寫了一封，災難絕沒有過去。我說：「根據李必達的態度，不是很快可以把問題搞個水落石出的，目前應做三件事：1、找小王（瑞華）談話，看看是能否找到材料的底稿；2、要立即向總理報告，以防被動。此外還要考慮「闖江青」一下。

黃永勝說：其他的都好辦，唯有闖江青難辦？

葉群說：這關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從江青的態度就可以看出個大概來。現在就要給江青那裏發一個電話記錄稿過去，內容就寫：「十時整，黃總長要向江青同志匯報一些情況。」他們同意了，電話記錄立即發出去了。

十點多一點，江青向黃永勝直接來了一個電話。她開口就說：「你要來抄我的家嗎？」祇說了一句，電話就掛了。

根據江青在電話上的態度可以得出如下的判斷：李必達給江青寫的信，已經送到了江青的手中。但信的內容是無法知道的。這時黃、吳、葉就更憂慮了。不知道會有什麼樣的大禍將要臨頭了。

我們幾個共同商量 1、要找小王談話，看李是否在她家存有什麼東西（李同王的母親很熟悉）；2、立即把李必達看管起來；3、今天就要去向總理匯報。

四月二十八日，九屆一中全會剛結束，黃永勝對警衛參謀李學金說：「我命令你把李必達抓起來！」抓了李必達即派飛機把他送到廣州軍區關押。事後，黃辦的人到北京針織總廠收拾李必達的東西，在紙簍裏搜到李必達給江青、張春橋寫信的碎紙片。

我親自找小王談過話，所得情況非常重要。她說李必達直接同江青寫了材料，其內容都是黃總長、吳副總長、葉主任罵江青的一些具體記錄。材料有二十多頁，材料寫好後，李親自送走的。她不知道材料是否有存底。隨後，我和一名工作人員帶著王到她家去一無所得。

「五一」節後的一個晚上，約九點多鐘，我去向總理匯報了李必達的事。總理聽了其所講的情況之後，說了兩點：1、江青曾給我來了一個電話，她說「我可能要遭到暗害！」祇說了這一句， she 就把電話放下了。我當時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但我想到了是同你們（指軍委辦事組）有什麼

爭論：2、對李必達暫可以這樣處理，我知道就行了，現在還不必寫報告。

此後，黃、吳、葉、邱又在京西賓館大樓八層東邊大房間裏共商對李必達事件的處理。

大家認為，第一，對情況已經基本上搞清楚了。李必達向江青直接寫了材料，所寫內容就是有關我們反江青的問題。

第二，江青收到材料之後，估計會送給毛主席一閱的。主席會表什麼態，現在還不知道。但軍委辦事組反對江青，毛主席是早就知道一些的。

第三，周總理對這個問題的態度是很好的。

九屆一中全會之後，一次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政治局開會之前，江青怒氣沖沖、自言自語地說：「有些人天天罵我，打電話都在罵我，他們對我恨之入骨。現在『九大』開過了，我看會罵的更厲害的！」她說了一頓之後，就從自己的皮包裏拿出一封信，擺在總理面前的茶几上，並說：「信的內容，現在不能看。」總理拿著大、小信封看了一下，仍然放在桌子上，一句話也沒有說，也沒有看江青一眼，繼續看文件。

江青回到自己座位上又說：「大家都去看一看吧，以便我不得好死以後，也多一個見證人嘛。」她說完話，把小手巾往桌子上一摔，這是她在心中有氣的時候慣用的做法。黃、吳、葉、李、邱和大家一樣，都去看了一下，在小的信封上橫寫的字是：「送釣魚臺十一樓交江青同志親收。」下面寫的是黃永勝同志處。黃永勝一看就是李必達的字。江青用了一個比較大的信封並寫上：「即送主席親閱。江青」（這是豎寫的）。毛主席用鉛筆在「主席」二字上劃了一個圈，一個箭頭劃向江青的名字，並在江青二字的上面寫了一個「退」字，是退回江青之意。我們看了一下之後，一句話沒有說，也沒有什麼表情，但心中高興！在這裏得到了三點證明：一是，李必達寫的材料毛主席看過了；二是，江青承認了材料是罵人的材料；三是主席沒有寫為江青做主的話，江青收到退回來的信之後，沒有看到毛主席有任何批示。

在政治局會議結束後，黃永勝留下吳、葉、邱一起向總理談了李必達的問題。總理說：「事情的發生與處理我都知道了。你們有意見，我也是知道的，但隨便議論是不好的。今後要注意這方面的問題。」

李必達的品質太壞了，一個小小的秘書，竟想借江青之手搞倒總參謀長！而且用的手段是偷聽，這屬於嚴重違反工作紀律和秘書的職責。當秘書是受首長信任的，利用首長的信任幹陷害首長的事，這真是天理不容。李必達想出大彩，「造反精神」太強了，李必達是因為造反、投機害容。對李必達要處理是沒有什麼非議的，這種人任何時候也是被唾棄的一類。辦事組用飛機把李必達押送回廣州軍區，但他心不死，在飛機上，他在《毛主席語錄》的扉頁上寫了「誰拾到語錄本，請交中央文革轉江青同志救我」幾個字，故意把《毛主席語錄》丟在飛機上，幻想乘務人員收到後會交給江青。乘務人員的確在打掃衛生時拾到了，最後交給了吳法憲轉到辦事組。事後，我要三〇一醫院把王瑞華送到軍醫大學學習了。這樣既離開了北京，又沒有傷害王本人，我認為對王的處理是正確的。

反江青並不等於反毛主席，我看當時主席也是這麼認為的，但主席心裏肯定也不高興。後來主席就不這麼看了，他把反江青反張春橋和反對文化革命連在一起，也和反對毛主席連在一起了。

文革往事

對文革這個時期的回憶，不能不想起我的大兒子路光當年的婚事。路光的婚事得到了周總理最爲誠摯的關懷，也得到林彪、黃永勝、葉群的關心和幫助。

路光和克非是大學時期的同學，而克非的父親張霖之是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老黨員，一直在極其惡劣的環境和條件下堅持革命鬥爭，抗日戰爭時期曾任冀魯豫區黨委書記，解放戰爭時期任第二野戰軍五兵團副政委，解放後任三機部部長，煤炭工業部部長，八大時當選爲中央候補委員。

煤炭工業對我國的經濟建設是極爲重要的，那時稱「鋼煤糧棉」。張霖之對我國煤炭事業做出了很大貢獻。對於這樣一個老革命，江青等人在文革中沒有把他放過，六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她在大會上公開點名誣陷張霖之，張霖之隨即遭到兇殘的揪鬥、毒打、抄家。

張霖之在文革中遭到了滅絕人性、罄竹難書的摧殘。當張霖之反抗造反派的法西斯暴行時，這些窮兇極惡的傢伙竟用燒鍋爐的通條直刺

他的頭部，頭骨戳穿，鮮血從頭部流到脖子，再流到背上。張霖之飽嘗了人間最大的苦難，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凌晨，被江青、戚本禹一夥支持的造反派迫害致死。張霖之是文革中唯一被活活打死的共和國部長。

一九六八年，中共中央下了紅頭文件，定張霖之為走資派。

路光和克非大學畢業後，天各一方了。克非被分到江西勞改農場，一家在文革中是受了大難的，在困難無告之時，克非向我們寫了信。我和克非的父母可以說是素不相識，除了在中央的會議上見過外，沒有來往。在文革那麼混亂的情況下，政治氣氛又那麼嚴峻，一有不慎就會惹來大禍。但我認為克非是個好孩子，就算大人有問題，幫助孩子不算什麼吧？！我們把克非接到上海，調入總後華東物資局，進而又調到西安的總後裝備研究院，入伍穿上了軍裝。不過我也叮囑我老伴：「辦這些事要特別小心，走一步三回頭，沒有問題再前進。」因為讓江青、張春橋一夥抓到辮子，他們會借此興風作浪的。我們和江青一夥是死對頭。

七〇年春節後，總後在北京舉辦全軍科技成果展覽，地點設在後勤學院。克非也做為工作人員來京參加會務工作。克非是個很勤奮努力的人，當時工作條件很差，打地鋪睡在大教室，再加上工作勞累，她肺部出血，常有鮮血從口中吐出。我老伴知道後立即派人把她送往三〇一醫院。

當時，路光也快28歲了，他堅持這份婚姻，正好也有了機會。在國務院體制改革時，煤炭部、化工部等合併成燃化部，由總後副部長伊文去當革委會主任。我借此機會讓伊文深入瞭解一下張霖之的情況。經調查後，伊文向我匯報說：「張霖之沒有什麼問題，與彭真屬工作關係，沒有什麼更深的個人關係。張霖之歷史清白，在煤炭部威信較高，我國的煤炭產量在世界上的名次不斷提昇，張霖之是有一定貢獻的。究竟江青為什麼要點名說張霖之是彭真死黨，還搞不清楚。」

我聽了伊文的匯報，心裏有數了，決心摸一摸總理的態度。在一次首都體育館舉行的大會上，我向我老伴「面授機宜」，叫她在大會中間休息時，找總理匯報一下路光的婚事。她對總理說：「總理呀，我不得已打擾您一下，我要向您匯報一件事。」

在總理的同意下，我的老伴接著說：「我們的大兒子，就是路光，這孩子不懂事，她和張霖之的女兒是大學裏的同學，兩人很要好。」

總理聽到「張霖之的女兒」，楞了一下，打斷她的話說：「張霖之同志的女兒？」

胡敏說：「就是呀，張霖之的問題這麼嚴重，我們都不同意他們的事，可路光還在堅持。」

胡敏心裏沒底，她「戰戰兢兢」剛說完，沒想到總理竟說：「堅持好嘛！應當堅持。現在，xxx和xx散了，xxx和xxx也散了，臺上、臺下幾乎都散了，這一對要保住，要保住嘛！」

胡敏對總理說：「會作說，我們孩子的事情比較特殊，要經過您批准才成。」

總理說：「可以呀。」接著總理又說：「你去找葉群，葉群同意了，我就批准他們結婚。這是好事情。」

經我同意，我老伴向葉群細細講了路光和克非的事，沒想到這件事打動了她，葉群還掉了眼淚。她說：「這一家可真夠慘的，點一個名就要人家一條命。憑什麼打倒人家？這麼多老幹部都打倒了，不成。張霖之哪叫打倒呀，這叫草菅人命。我堅決支持這門子婚事，我去跟總理講。」

葉群接著又講：「很多事我都不敢給首長講，一講他就發火。前幾年，首長知道趙爾陸死了，氣得他不吃飯，在屋子裏轉來轉去，一邊走一邊罵。叫我把郭子瑞（趙爾陸的夫人）接來好幾次。他知道王秉璋經常遭武鬥，他罵造反派是法西斯，他非要見王秉璋。我說王秉璋在七機部，是國務院管，你見他不好，他說爲什麼見不好？你懂個屁，我們是戰友，是戰友！我負傷從馬上掉下來，是他和蘇靜把我搞回去的。」

我把葉群的態度告訴了周總理，同時我也把燃化部革委會主任伊文瞭解張霖之的情況，向總理做了匯報，接著我又跟總理說：「我壓力很大，得罪了江青可了不得呀，張霖之有什麼了不起的問題，我不清楚，但搭上一條命，也很不幸。現在克非家很困難，這個時候我們拆散他們，也不講良心。如果總理認爲可以，能不能給張下個內部結論，有了總理的支持，我就準備把路光和克非的事辦了。」

總理是個非常精明又精細的人，他自言自語道：「內部結論……內部結論，這個提法好。」總理對我說：「你能否叫燃化部革委會，打個報告上來。」

燃化部革委會的報告很快就上來了。

周總理在一次國務院業務組的會議前，讓紀登奎提出研究燃化部革委會的報告，並讓紀提出要給張霖之做個簡單結論爲好。在會上，紀提出這個問題後，大家都感到有些詫異，提出給張霖之做結論，也祇有由總理來主持辦理了，總理在會上就答應了。會後總理還專門交代大家，這件事是國務院業務組的具體工作，就不必在政治局會議上提起。

國務院業務組的會，稍微重要的，或者和軍隊有關的，我幾乎是每次必到的，這次開會，總理有意識不讓我參加。會後總理告訴我，國務院業務組同意給張霖之做個內部結論，並對我說：「你先提出個意見給我。」

我說，我不太瞭解張霖之的情況。總理笑著說：「嘿，你還是『高見』勒，你把你的要求提出來嘛！」我頓時才有所領悟。

我回去以後就叫秘書起個草，也讓克非提出了幾點意見，最後主要提出兩條，一是說張霖之是被毒打致死的；二是說張霖之是人民內部矛盾，家屬子女按革命幹部家屬對待。

總理接到稿子後又做了認真的修改。總理沒有同意「被毒打致死」這個提法，因爲當時的上報材料中，關於張的死因不夠明確，造反派爲了掩蓋罪行，編了不少假話，做了假證，總理怕有人告狀，捅到江青那裏，引起事端，事情「擱淺」，反而因小失大。最後，總理用了一句很高明的話「在武鬥和逼供的混亂中死去」；「按人民內部矛盾」總理沒改，同意了。這個結論現在收入了《周恩來年譜》下卷第382頁：「會議認爲，張霖之同志的歷史是清楚的。一九六七年一月，張被非法關押在北京礦業學院時在廣播中聽到戚本禹威脅和煽動的語言，張因連續受批鬥和迫害，身體已受到重傷，自不能不陷入極度緊張的狀態，因此，致張在武鬥和逼供的混亂中死去。」

「根據當時情況，礦院專案組的報告祇涉及各項經過的表面現象，還需要依據煤炭工業部所掌握的全面材料，認真地予以澄清」。「茲決定，張霖之同志的死亡，應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張霖之同志的家屬和他的子女不受任何牽連，應按革命幹部家屬對待。」

這個結論文件祇印了爲數不多的份數，而且存檔的份數較多，以防江青知道後鬧事。總理還特地給我個人一份，在文件的左邊角上用鉛筆

寫上，「會作同志存。周恩來。」同時，總理還給我打了電話說：「會作呀，事情我給你辦了。」

我也說了不少感激的話。然後我又「得寸進尺」地說：「總理，這些都是講張霖之同志的，路光和克非結婚的問題，還請總理做個批示吧。」

總理同意了，親筆做了批示「同意邱路光和張克菲（非）結婚。願你們沿著偉大領袖毛主席和親密戰友林副主席的革命路線奮勇前進。周恩來一九七〇年七月三十一日。」

路光的婚事簡簡單單地辦了。

有一天，總理到京西賓館來開會，會後他要見一見路光和克非。因為克非要上班沒有來成，祇路光一人來了。總理伸出手來與路光握手時說：「還有一位呢？」

我忙說：「克非上班去了，接到她再來，怕耽誤總理的時間。」

總理握著路光的手，搖了幾搖，深情地說：「青年人！」

我知道總理很忙，立即對路光說：「好了，你回去吧。」

路光又給總理敬禮，就離開了。

我非常感謝總理對我極大的關心和幫助，沒想到總理卻深情地笑著說：「會作呀，你滿足了我一個心願。」總理是一個體察用心的人，也絕不會在江青面前惹麻煩。毛澤東和江青都點過張霖之的名，總理一清二楚，他這麼「膽大妄為」，原因何在？總理的用意是很深的，他支持了路光的婚事，也等於在「亂世」中暗暗幫助了張霖之的家人。

記得是臨近年底時，葉群知道路光回京參加全軍馬列學習班，她告訴我說，林總要見見我們一家。幾天後的一個晚上，到了毛家灣，葉群把我們一家人帶去見林總，林總正在會客室裏等，我們依次給林敬禮。大家坐下以後，林總說：「張霖之是好同志，他為什麼被打死了？他被打死都不承認自己是反革命。」

接著葉群說：「我想請克非媽媽也來坐坐。」

林彪說：「好嘛！」

張霖之的老伴李蘊華是一九三七年參加革命的老同志，她是北京的大學生，接受革命思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沒想到最後革了個家破人亡。到了毛家灣，她激動的很，葉群拉著她的手說：「這幾年你吃苦了。」

接著葉群提出照相。她的話音一落，林彪竟高聲說：「把黃總長請來。」大家都沒想到林彪今天興致這麼高，這麼給面子。黃來了以後，林大概是受到張霖之問題的觸動，他對黃說：「軍隊的幹部能解放的盡快解放，能解脫的盡快解脫。」

黃說：「我們已經列了一個名單，有幾十人呢！在會上（指政治局會議）那些人（指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兇得很吶，一個勁往下拿。」

林彪看上去很生氣，沒有說話。

黃接著說：「我們還要努力。藉著要召開四屆人大的機會，爭取多解放、早解放一些人出來。」

我插了一句話：「軍隊各單位也有阻力，他同意這個，不同意那個，我們正在深入做工作。」

遺憾的是，由於四屆人大的推遲，由於「九一三」事件的發生，軍隊解放幹部的工作，都已走上日程，卻沒有來得及實現。當時，經過軍委辦事組的努力，已經解放的和解脫的幹部有張震、王必成、林維先、謝勝坤、江文、張宗遜……已經安排走上日程的有楊勇、梁必業、吳克華、張賢約、李雪三……還有不少人的名字記不起來了。

接下來就是照相。葉群忙著安排座位，她先讓林彪坐下，再安排其他人。大家剛坐定，林彪突然站起來，讓克非媽媽坐在中間，林彪和黃永勝在其左右，李蘊華簡直不知所措，極力推讓，葉群知道，林決定的事是不能變的，她勸李蘊華說：「快坐下吧。」

這張鮮為人知、意義深遠、令人驚歎的照片，是林彪的絕唱。一個毛主席的親密戰友，黨章上確定的接班人，竟然和毛澤東點了名，江青點了名的「走資派」、「彭真死黨」、「三反分子」、「黑幫」張霖之的夫人一起照相！稱張霖之為好同志！

第二十九章 八屆十二中全會

總理的開場白

一九六八年十月間，中央在北京召開了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會議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毛主席親自主持了會議，林總在會議結束前，做了長篇講話。我認爲這次會議對毛主席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是極其重要的，甚至比九大還重要。九大是在通過準備好的結果，而八屆十二中全會是主席力爭拿到他想要的結果。因此爲開好這個會，總理爲主席作了精心的準備和組織，當然首先是組織準備。

總理在開幕式上，對會議的組織準備做了詳細的說明。從總理的態度來看，他是堅決支持主席的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方針政策的，堅決支持主席對劉少奇的鬥爭的。沒有總理的精心組織，十二中全會是開不好的，解決劉少奇的問題，也未必能那麼順利。

總理說：「今天開的是以毛主席爲首、林副主席爲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決定召開的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人數商定的是一百三十三人。這次出席的中央委員，原有能到會的爲四十位（十一中全會時參加會議的中委是七十四人），要補選十位，因爲從十一中全會到現在已死去十人。通過無產階級司令部商定，提出下述十位同志補爲中央委員：黃永勝同志、許世友同志、陳錫聯同志、張達志同志、韓先楚同志、潘復生同志、劉建勳同志、李大章同志、吳德同志、劉子厚同志。他們原來是候補中央委員，今天在十二中全會上補爲正式中央委員。這樣，中央委員出席的就是五十位。中央委員原來定額是九十七人，現有五十人出席，過半數了。其他能出席的還有九位候補中央委員。這次出席十二中全會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一共五十九人。」

這次會議要開除劉少奇的黨籍，劉少奇是黨的副主席，從七大以來就立為毛主席的接班人，而且從八大以來，一直在第一線領導全黨的全面工作，因此，處理劉少奇這項工作要萬無一失。最起碼在組織程序上是這樣。

參加全會的大多數成員都是列席，從事後看，基本上都是九大準備安排的中央委員。對列席的與會人員，總理宣佈說：「其次，就是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中央文革是我們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產生的一個新生的力量。中央文革，在兩年前十一中全會上已經肯定了。那個時候，在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領導下，中央文革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成了直接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一個前線發動群眾的機構。經過這兩年工作，逐步地擴大為中央文革碰頭會。今天出席的五位同志：陳伯達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張春橋同志、姚文元同志，都是中央文革成員。五位以外，參加成為碰頭會成員的有：周恩來、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溫玉成這七位同志，一共十二人。」再次，在軍委處理日常工作的，在這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過程中，成立了軍委辦事組，得到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批准了的有六位同志，就是：黃永勝同志、吳法憲同志、葉群同志、李作鵬同志、邱會作同志、劉賢權同志。」這次出席會議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是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和大軍區的主要負責同志。「現在除臺灣省外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都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除了與上面重複的以外，每省出席兩位，共五十二人。各省、市革委會是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新生的力量。他們是在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直接領導下的地方的革命權力機構。」人民解放軍的大軍區各出席一個人。有的大軍區同志在前面已兼有別的任务，也就沒再來人。舉例來說，福州軍區韓先楚同志、皮定均同志就是福建革命委員會的正、副主任，那個大軍區就再沒來人了。這樣例子別區也有。所以，全國十二個大軍區祇出席九位同志。」最後一項，就是中央直屬機關，出席了四位同志：郭沫若同志、李天佑同志、曹軼歐同志、郭玉峰同志。「總人數合在一起，重複的不算，共為一百三十三位同志，這是出席會議的全體成員。」

全會的任務

八屆十二中全會，是毛主席對劉少奇司令部的決戰，並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的情況下召開的。當時文化大革命的形勢比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是有所好轉，造反派對文化大革命的猖狂破壞，受到了不小的限制，學生造反派也逐漸被主席所拋棄；軍隊的造反派在一九六七年「五一三」之後，基本上被打垮，整個文化大革命進入了比較穩定的階段。毛主席已經說過：文化大革命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已經過去了，今後是有領導的進行深入的「鬥批改」，把文化革命進行到底。因此，籌備召開黨的九次代表大會就提到日程上來了。

十二中全會的主要議程是：總結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把文化大革命推向深入發展；通過對劉少奇的結論；深入批判「二月逆流」；審議為九大起草的新黨章；決定召開九大的有關事項。大會的目的都達到了。

十二中全會，是在十一中全會後兩年多的時間召開的。但以我的感受來說，兩次全會的政治空氣是完全不一樣的。十一中全會是：緊張、恐懼；十二中全會是：輕鬆、踏實。這兩種不同的精神狀態，是與會的大多數人都有的，像我這樣的人也不例外。在十一中全會的時候，我在精神上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對全軍文革不摸底。我把全軍文革看成與一九三〇年中央蘇區的「肅反委員會」一樣，我當時已經準備隨時被全軍文革關起來！我考慮到的問題都成了現實。但到了十二中全會的時候，我的疑慮基本上都消除了。在十二中全會上，我是以受害者、被解放者的姿態出現的。

十二中全會涉及到的問題很多，這裏主要說三個問題。（一）對劉少奇的結論；（二）批判「二月逆流」；（三）林彪、江青的矛盾公開化。

（一）對劉少奇的結論。在十二中全會的時候，文化大革命在思想和路線方面的問題已經肯定，不存在什麼新的問題了。全會開幕的時候，毛主席用簡短的講話再次肯定了文革，他說：「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因此，全會的時間主要就放在批判劉少奇和「二月逆流」的問題上了。

給劉少奇定罪的材料一大本子，定他為「叛徒、內奸、工賊」。關於劉少奇在瀋陽被捕的問題，解放初期主席就叫高崗去調查，方塊字遠東社區製售結果給高

崗惹下了致命的麻煩。現在，把叛徒的帽子給劉少奇直接戴上了，在討論的時候，大家也未必都相信這三頂帽子，但表態的時候，大家基本上都是義憤填膺的樣子。開除劉少奇黨籍時，祇有五十名中央委員有表決權，那就是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朱德、李富春、陳雲、董必武、劉伯承、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李先念、蕭勁光、張雲逸、王樹聲、李雪峰、王震等。當時，會議表決是一致通過的（陳少敏的投票情況沒有什麼印象了，事後才知道她不同意開除劉少奇的黨籍）。在五十名中央委員中，後來祇有林彪、陳伯達、康生、謝富治、黃永勝六人被打入另冊，還有四十四人（佔近90%）同意開除劉少奇的黨籍，其中，近半數以上的人去世後稱爲無產階級革命家，所以，說是江青迫害了劉少奇，理由有些不足；各有各的賬，大賬是黨的全會通過了開除劉少奇黨籍的決議。

對於劉少奇的材料，我看主要問題是現在對材料存在不同的看法。有的問題可以這樣理解，也可以那樣理解。對材料可以部分推翻，或全部推翻，但不論怎樣，總不能說成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捏造的。這樣說，不能令人信服。對劉少奇的批判，材料之多，時間之長，在群眾中之深入，在我們黨內都是空前的。

八屆十二中全會，對劉少奇的鬥爭是最主要的。我認爲劉少奇是有錯誤的，應當批判，也可以下臺，但打倒是萬萬不應該的。一個政黨內部不可能沒有不同意見，不可能沒有鬥爭。鬥爭可能基本正確，或正確錯誤皆有，或基本不正確。不正確的鬥爭，在一定條件下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打倒一個人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其實，在開幕式和閉幕式上毛主席都講到鄧小平，爲鄧小平說過好話。譬如在閉幕式上，毛主席說：「鄧小平大家要開除他，我對這一點還有保留。……我這個人的思想恐怕有點保守……」爲什麼毛主席對劉少奇「激進」，對鄧小平「保守」就不得而知了。不過，從最後結果來看，對劉少奇「激進」，對鄧小平「保守」對毛主席都產生了極爲嚴重的結果。

平心而論，文革按毛主席的搞法，傷害了不少人；但回過頭來說，文革若按劉、鄧的搞法，也很不可取，也會傷害更多的人，文革中高級幹部受衝擊，毛、林、周和中央，主要是毛主席，是要負責的。下面的幹部主要是群眾的衝擊，這種衝擊也是毛主席的路線決定的。按劉鄧的

搞法，是工作組代表黨組織劃定反動學生、反動幹部。以學校為例，當時每所高校都劃了幾十名反動幹部和學生，全國就是幾十萬，和反右差不多。所以，總結黨歷史上的教訓，不要祇盯著毛主席，也要反省自己。

毛主席去世後，有人詆毀八屆十二中全會，其實會議的議程是按組織原則辦的。雖然，對劉少奇同志做了錯誤的結論，但也是按組織原則辦的。毛澤東、周恩來在這些方面是不會出差錯的。

會議有三點印象是十分深刻的。

首先，是堅持組織原則。會議的各項決議都是中央委員的法定人數通過的。因為有些中央委員靠邊站了，會議還從中央候補委員中增補了十位中央委員，會議通過組織決議時，列席代表均未參加表決。

其次，是認真發揚民主。在會上，真是暢所欲言，各種意見都可以發表。如葉劍英對朱德就發表了系統的批評意見。胡耀邦對劉少奇做了長篇的批判和在劉少奇的問題上所犯的錯誤的自我批評，王震批劉少奇也相當厲害。還有不少人，對劉少奇和「二月逆流」都提出了系統的批判，特別是對劉少奇運用職權打擊老幹部表示出極大的憤恨！

第三，是對劉少奇的結論。全會對劉少奇進行了認真的批判，印發了大量審查材料。周總理對劉少奇也說了很重的話。那些材料，極大多數有時間、地點、事實真相，並有旁證材料和實物照片。當時，對材料本身是沒有不信的理理由的，後人對那些材料的否定，從政治上講也是正常的，劉少奇受了極大的冤枉，現在平反完全應該。問題在哪裏？問題在於冤枉劉少奇的問題上責任不能亂推，不負責任地推給林彪、江青，使別人對我們黨的公信程度有質疑。

（二）批判「二月逆流」。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批判「二月逆流」是重點。這真是此一時彼一時，其實在批判「二月逆流」的時候，大家發言都很積極，被批判的人也是什麼都承認，自己罵自己，罵得狗血噴頭，尤其幾個元帥，他們批判自己甚至比批判他們的人調子還高。

總理在會上批判「二月逆流」也是重頭戲，他挨個批判了這些老同志，尤其是幾個元帥，總理批的很厲害，也很具體。在我的記憶裏，總理對聶帥特別不滿意，說他把國防科委系統搞得亂七八糟，甚至說他把趙爾陸給逼死了。對於總理的講話，我當時就有些不同的看法。因為我

認為在堅持部隊不能亂，在保護軍隊老幹部方面，葉帥、聶帥和徐帥的態度和做法是有區別的。

我在小組會上的發言

十二中全會主要的時間是開小組會。小組是以原來的大區劃分的，我分在西北小組。黃永勝、姚文元是中央碰頭會議成員，是出席西北小組的領導人。

在小組會上，我以親身經受造反派的摧殘，揭露了全軍文革鎮壓老幹部的錯誤。我的發言分為三個問題：

(1) 全軍文革怎樣對待老幹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打砸搶造反派是文化大革命的大敵，破壞文化大革命的兇手，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問題是殘酷揪鬥老幹部。

一九六七年初，江青與全軍文革相勾結宣佈軍隊文化大革命的方針是：不要怕亂，怕亂就不能搞文化大革命。依靠造反派就是大方向。在這一思想指導下，全軍文革在十多天之內，向造反派發了六支「令箭」。

第一支令箭，發給總參測繪學院「紅色造反團」。他們得令後，立即到軍事科學院內，闖進了葉劍英的院內（七機部「九一六」造反派也去了）。由於受到了警衛部隊的抵制，造反派祇在院內鬧了一通，未曾闖到住所裏去。院內的牆上和庭院馬路上寫滿了「打倒葉劍英」的大標語。聶帥住在軍科上面的西山，「九一六」要揪鬥聶帥，但未得呈。雖然兩個造反派的目的均未達到，但卻說明了一個問題就是：全軍文革通過造反派之手，是敢抓解放軍元帥的！

第二支令箭，發給國防工業辦公室造反派。他們得令後立即揪鬥趙爾陸。他們把趙連續鬥了幾天幾夜，趙因心臟病發作，身邊無人照顧，死在自己的辦公室。

第三支令箭，發給高等軍事學院的造反派。他們得令後，對該院副院長楊至成進行圍攻。楊因長期患心臟病，被揪鬥而死於非命。

第四支令箭，發給海軍機關的造反派。他們得令後，對蘇振華、李作鵬、杜義德等批鬥起來。李因患嚴重的心臟病，被鬥得暈倒在地上，因機關搶救及時而脫險。

第五支令箭，發給空軍二高專的造反派。他們得令後，把吳法憲圍鬥起來了。由於這一天打下來了一架美制高空無人駕駛偵察機，吳以指揮作戰重要為理由，要求暫停批鬥，以後「補鬥」。

第六支令箭，發給上海二醫大「紅縱」。他們得令後，把我關起來，進行了大小十餘次批鬥，把我打鬥的滿身傷殘。

這是由全軍文革直接操縱造反派搞的批鬥。至於在全軍文革「不怕亂」的方針指導下，軍內各個造反派自己搞起來的大小武鬥就無法計數了。當時，北京的軍隊機關真是成了鬼域世界。軍隊無數幹部慘遭摧殘，災難是空前未有的。這就是全軍文革打擊老幹部的「偉大戰績！」

(2) 全軍文革的命令。上級運用職權，命令下級到造反派裏去受批判，受武鬥，甚至去斷送生命，在文化大革命中，全黨、全軍、全國都沒有發生過的事。徐向前命令我到第二軍醫大學「紅縱」去「同革命」是全國獨一無二的。

一九六六年十月軍隊院校搞四大後，二醫大「紅縱」連續批判了我四十多天，被造反派鬥昏在地上，心臟病發作，經搶救後林總、葉帥命令我在西山軍委戰時指揮所養病。當時正同時住在一起的還有：劉伯承、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蕭華、劉志堅、趙爾陸、李天煥、王秉璋、杜義德、林月琴等人。六七年初上海「一月風暴」後二醫大「紅縱」奉命捲土重來，是專門來打倒我的，就是全軍文革指使幹的。當時毛主席、林總、周總理、葉帥、聶帥、劉帥對我都是保護的，大家也是很清楚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全軍文革為什麼還要借造反派之手打倒我？很顯然，這就不是對我個人的問題了，而是執行什麼路線的問題了。

(3) 全軍文革鎮壓老幹部主要手段就是不要黨的領導。軍隊的文化大革命本來在黨委領導下，進行得很好，軍隊黨委也如同過去歷次政治運動一樣，完全能夠領導文化大革命的。但是全軍文革則一腳把黨委踢開了，堅決依靠造反派搞文化大革命。全軍文革從來沒有召集過各單位常委負責人的會議，我就根本沒有進過全軍文革的門。相反，全軍文革對造反派則親熱得很，成天開會，接見，直接佈置任務。

各單位的造反派都是人數很少，能量很大的。他們當中一些人的流氓成性，打、砸、搶成性、兇殘成性的品性所決定，對文化大革命的破壞就特別厲害了。對造反派的行徑，本來是應當堅決制止和批評的，但

卻得到了全軍文革的寵愛。依靠這樣的造反派就必然會打擊廣大幹部群眾，幹部群眾就一定遭殃。

爲了搞亂機關，全軍文革特別調來了幾個造反派到北京「幫助」機關搞文化大革命。所謂「幫助」就是打倒老幹部的代名詞。造反派就是要打倒黨委，就是打倒老幹部。因爲極大多數老幹部同造反派是勢不兩立的。不打倒老幹部，造反派是不能稱王稱霸的。軍隊所以大亂，並非文化大革命的必然現象，是全軍文革指揮造反派搞亂的。全軍文革是完全背離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把軍隊的文化革命引導到了搞亂軍隊的道路上去。

在會上，徐帥發言時承認：他上臺主持全軍文革工作，部隊就亂了。

主席在閉幕會上的講話

十月三十一日，在閉幕那天的會上，毛主席作了重要講話。

主席認爲這次全會開得好，他說：「我就沒有什麼話講了。林彪同志講了那麼多，同志們也都講了很多。這一次會呀，我看是開得還可以。特別是有些同志，特別是對於所謂『二月逆流』這件事，就不大瞭解。像高級幹部都不大清楚，我們過去也沒有通風。在這個全會上，由他們犯過錯誤的同志，說明他們的問題，大家又對他們有些質問，又再說明他們的問題，又再質問，好像經過這麼幾次反覆嘛，大家就比較清楚了。」

主席前一段在全會上對「二月逆流」講了很多話，講得老師們灰溜溜的。等到把這些人批得夠噲後，主席在閉幕時又以他特有的語言方式說：「這件事嘛，要說小，就不那麼小，是件大事。要說那麼十分了不起呢，也沒有什麼十分了不起。因爲他們有意見嘛，就是要談一談嘛，幾個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員，又是副總理，有些是軍委副主席，我看黨內生活也是許可的。不是兩個大鬧嗎？一個大鬧懷仁堂，一個大鬧京西賓館嘛。他這個大鬧嘛，就證明他是公開出來的嘛。不過有些細節，大家不曉得，我也不知道。最近簡報上才看到那些情況。我看倒是細節無須乎多過問，還是大綱節目要緊。那些細節呀，比如講往來多少次呀，倒是不需要那麼看重。如果黨內生活注意那些事情去了呢，把人引導到注意那些很小的細微末節，而把大問題反倒不大注意了。但是說

是那樣天就會跌下來呀，或者地球就不轉了呀，我看也不一定。地球還是照樣轉。你那六、七個人反對，這個地球讓它不轉嗎？」

關於當時正在進行的清理階級隊伍工作。主席說：「對於這一批人呀，請你們注意，在清理階級隊伍裏頭，對於學者，這個學者，無非是比較好的、中間派，比較右的這麼三種。我現在著重講的就是這個比較右的，我們怎麼對待他們？這個世界上面，總是左、中、右嘛，你沒有右，你這個左那兒來的呀？統統是左派，我就不那麼贊成。太純了，我如果也不太好。你比如就講九大嘛，九大代表，這個『二月逆流』的同志們，他們選舉為代表。陳毅同志，我看了他的講話，說他沒有資格。我看，你就是那個右的那一方面的資格，以這個身份來參加『九大』。」

最後，主席說：「我主要就是這麼幾點，就是一個講清理階級隊伍。清理階級隊伍，注意調查研究，注意一個「準」字。對於黨內一些老同志嘛，要一批二保還有三看嘛。所謂保者，就是幫助他們嘛：看嘛，就是看他們以後的情況嘛，改不改嘛。我的意見，改了也可以，不改也可以。強迫人家改，我就不那麼贊成。你有這麼幾位有啥要緊啦，我看，我剛才不是講了嗎，地球照樣轉的。」

依我看，主席在十二中全會上作為一個重要問題批「二月逆流」，也是為九大做組織上的準備的，用批「二月逆流」方法掃了那些老的政治局委員、副總理等的威信，九大他們雖然還進中央委員會，但大都進不了政治局，進不了中央領導層了。

毛主席在會上還講到鄧小平和劉少奇有區別，說者是有意還是無意我不得而知，但我這個聽者也沒有更多的在意，認為主席是一般性的講政策。散會後回到京西賓館，張秀川也和黃永勝一同來了，黃永勝剛坐下就面對張秀川說：「總理剛才問我，主席講鄧小平和劉少奇有區別聽到沒有？我說聽到了。」黃接著對張說：「原來有些對鄧揭發材料，總理交代是放在賀龍專案組一起的，你先把他們撤出來，全部材料發到總理處，總理收了就好。如總理退回來，不許開包，放到你那封存。」我們幾個在一邊聽，沒有說話。

林總的長篇講話

十二中全會期間，林總發表了長篇講話。林總的講話印有記錄稿，祇發給了中央碰頭會成員。後來，毛主席指示，把林總的講話錄音給各省市、各大軍區都發一盤，並在群眾中播放。

林總在講話中說：

現在我要講的問題，有以下六點：第一個，就是文化革命的必要性；第二個，是文化革命的勝利、意義和它在世界歷史上的地位；第三個，就是文化革命的路線、做法的問題；第四個，是主席對馬列主義的偉大發展，特別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革命怎樣繼續前進的問題；第五個，是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第六個，是今後怎麼做法。

林總在講到：

我要說到中國無產階級文化革命在世界文化革命中間的歷史地位。要講一講，才能看出我們這次的文化革命是人類有史以來的最大最廣泛的最有深遠意義的革命。祇有通過比較我們才能看得出它是最廣泛，是最深入，是最能影響人類歷史進程和影響中國今後的命運的。

林總說：

在我看，世界上的歷史，在世界上有重大影響的文化革命，大致可以有四大次，有四次。

第一次，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化，在公元以前五世紀、四世紀，希臘的奴隸制度是處於繁盛的時代，希臘的古典文化，也處於這種那個時候出現了影響全世界上兩千多年來的思想，那是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化。那時出現了德莫克里特、赫拉克里德、亞里斯多德、伯拉圖、蘇格拉底、伊壁鳩魯，他們是影響整個歐洲的文化，也影響後來中國的思想。但是，那種文化是為奴隸主辯護的文化。這個是奴隸制度的文化，同我們的文化革命比那就是微不足道了，有一句話叫什麼，就是小巫見大巫吧。看到我們的文化革命運動才知道是大巫，知道它那個是小巫。而沒有這個比較的時候，我們腦子覺得，它那個了不得，但實際上同我們的一比，它那個沒有什麼了不得。

後來，世界第二次的文化運動是什麼呢？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出現，資產階級出現，就出現了以意大利為首的文藝復興運動。到了十六世紀上半期，文藝復興進入繁榮的時代。這個時候的基本思想，就是反對神權，提倡人性，他不敢聲明他是什麼階級的人性。他提倡自由，也不敢說是誰的自由。這個意大利的運動，以後傳到英國，傳到法國，傳到德國。這一次文化運動在當時是有進步意義的一次文化運動，文化的革命。當然在意大利之後，法國的啟蒙運動，傳到英國是英國的樣子，傳到德國是德國的樣子，而到法國，就是法國形成一個啟蒙運動。我們大家所熟悉的孟德斯鳩、盧梭這麼一些人。還有其他什麼費爾巴哈，很多的一些著名的代表人。他們是主張唯物論，但是也有主張唯心論的。後來這種思想，也成為馬克思主義產生的來源之一，社會主義思想是來自於法國的，就是聖西門、傅立葉，也來自於英國的歐文。更早一點，還有英國的烏托邦。這就是說馬克思主義也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它也是繼承了人類的先進思想。

第三次是什麼呢？……第三次就是馬克思主義產生，是人類思想上的大革命。十九世紀的三、四十年代，西歐的無產階級開始登上了歷史舞臺。法國發生了起義，英國發生了憲章運動，法國就是里昂工人起義，德國也發生了紡織工人的罷工。馬克思、恩格斯總結了工人運動的鬥爭的經驗和自然科學發展的全部成果，批判地改造了德國的古典哲學，英國的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創立了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這就是馬克思主義。這是人類歷史上思想上的大革命。是一個代表新的階級的新的思想體系，是為新的階級利益服務的，是為新的階級指明任務，指明前途的，是新的階級的革命的科學。而列寧的思想是緊接著馬克思、恩格斯時代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是人類第三次文化革命運動。可是馬恩列他們的思想沒有象毛主席的思想這樣子能傳播到七億人口當中去，他們合共起來祇有那樣多人口，而中國這次文化革命，是在七億人口中廣泛地傳播。不僅如此，在全世界勞動人民中廣泛地傳播。

這三次世界性的，一個是奴隸主的文化運動，一個是資本主義的文化運動，一個是無產階級的文化運動，如果同中國這一次毛主席領導的文化大革命比較起來，那末，規模、深刻性小得多。所以，我們要看明白中國這次這種文化革命，是世界歷史上歷次文化革命中最大的一次。不僅僅是七億人口中廣泛流傳，而且是幾十億的地球上的人口、勞動人民樂於流傳，樂於接受。

林總說：

現在，我們可以高瞻遠矚地看到全世界上的遠景，可以看到一個國家能夠空前地影響全世界歷史、人類命運的，推動世界向前進的，促進世界革命的影響世界各國人民的命運的，那就是中國。所以，中國在世界上的作用它超過西班牙，超過英國，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最革命的國家，最影響人類歷史命運的國家。所以，中國革命的任務，是很光榮的，很偉大。但是，我們必須堅持革命路線，堅持毛主席的路線，堅持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一切工作，堅持文化革命的這種精神，堅決地不斷地來批判、打擊反動的思潮，不斷地普及代表馬列主義的毛澤東思想，那麼我們的國家就不會變色，一切反動派，無論是內部的顛覆和外部的武裝進攻和這種和平的顛覆，都會遭受失敗的。我們國家有兩個前途，一個，變成對使勞動人民受二遍苦，重新復辟資本主義、半封建主義。但是，祇要我們能夠堅持這次文化革命這個方向，堅持毛澤東思想的這個方向，把無產階級專政堅持下來，把社會主義堅持下來，把對世界革命的援助堅持下來。

林彪的講話拿文革與文藝復興媲美，旨在讚揚文化革命，毛確認為貶低了他，主席是不高興的。江青同樣是不高興的，江青認為文化文藝的「版圖」是她的，林彪的講話事先沒有與她商量。

林彪、江青的矛盾

林彪講話的時候，不僅沒有稿子，提綱也是東一張、西一張。他的講話近四個小時，毛主席坐在林總旁邊一直聽到底，他聽得很入神。全場鴉雀無聲，都在用心聽講。唯有江青聽得不耐煩，她一直帶着一張臉

子，很顯然是心裏有氣。因為林彪講歐洲資產階級文藝復興問題佔了她的「地盤」。江青是在向林彪出氣的。

聽完林彪講話之後，我們軍委辦事組的幾個人（黃、吳、李、邱等）回到京西賓館吃晚飯，準備晚上還要集體辦公。我們沒有料到，江青在後面也跟著到京西賓館來了，江青進門坐下之後即說：「這樣大的事（指林彪的講話）也不事先商量一下。根本不是那樣一回事嘛。」

黃、吳大體上知道江青發的什麼火，但他們有意裝作不知道，不把事情挑明。爲了防止江青找黃、吳談林總講話的問題，吃了晚飯之後，還特意請她看電影。在當時的情況下，在沒有得到林總許可之前，黃、吳也是不敢向江青表態的。

江青對林彪早就有意見了。據事後黃說：十二中全會以前，江青對林彪主要有三個意見。一是，陳伯達當著江青、葉群的面說過兩三次，他要辭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職務，可是林總採取不理政策，根本不表態也從來不提及這個問題。二是，江青已經下了決心要搞掉楊成武，林彪毫不客氣地回答說：「這樣的問題祇有毛主席才有決定權。」把江青當面頂回去了，讓她好不惱火。三是，在十二中全會前，江青直接向林彪提過：「十二中全會要考慮補選中央委員和改組中央領導機構的問題。」林彪直截了當地回答說：「大事都要毛主席定，我們不議。」江青提這樣的問題，很顯然她是想在九大之前就當上中央委員。江青跟各地說：「八屆五中全會就補過中央委員。」江青在十二中全會之後不幾天，對著黃永勝、吳法憲、葉群三人發了一次很大的火。她說：「轎夫並不是好當的，今後不當了！」她說當轎夫的意思，就是過去吹捧過林彪，但沒有得到什麼好處，今後就不吹了。其實，江青是完全不識時務的，林彪根本不需要江青抬什麼轎子。

當林彪知道江青對他的講話（關於文藝復興問題）有意見時，林彪就講過：「我就是耍她有意見的。要不然，她總是以爲自己很了不起！」後來，江青看到對林彪的講話做不出什麼文章，她又向林彪討好說：「文藝是專門問題，不容易講好。」

林彪、江青的矛盾，從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就開始了，但當時都處於「心照不宣」的心態。當面都是客客氣氣的，背後各自都有主意。江青能夠難爲到林彪的事不多，頂多她能控制一個上海。林彪本來很喜歡

上海，過去經常在上海休息。文化大革命後就不到上海去了，寧願在蘇州，在北戴河休養也不到上海去。林彪在十二中全會的講話，全國都在放錄音，江青則下令上海播放樣板戲，不准放林彪的講話錄音。有一次我同王洪文開玩笑說：「你們上海人不喜歡聽漢戲吧？」（指湖北人、林彪講話之意），他當時沒有聽懂。以後他就聽懂了，爲了此事，王專門向我解釋說：「對放林副主席講話錄音之事，我們在幹部中放了，沒有在群眾中放。對這個問題的處理，我們是存在困難的。」

從十二中全會之後，林彪對江青的態度就逐漸變了。林彪同黃永勝、吳法憲說：「我們過去對江青的態度完全是爲了黨的利益（指江青和主席的特殊關係），現在看來完全沒有這種必要。因爲毛主席對待江青就是公事公辦的。」以後又說：「他們幾個人（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是一個宗派。在適當的時候，提出反宗派主義是很必要的。」我們幾個人（黃、吳、李、邱）插話說：「他們幾個是上海幫。」從此之後，我們在背後根本不叫他們的名字了，都叫上海幫。可悲的是，宗派的帽子，林彪沒有給江青一夥扣上，九屆二中全會以後反被主席給我們扣上了。

林彪同江青的矛盾，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之前，知道的人的圈子很小，嚴格局限在楊成武、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等幾個人之內，其餘的人是絕對不能知道的。以後，除了上述人之外，陳伯達、謝富治、李作鵬、邱會作也參加進去了。我還擔任了向周總理匯報的「聯絡員」。九大以後的中央政治局，康、江、張、姚等是上海派之外，其餘的都站在林彪一邊，朱德、董必武、劉伯承等不參加政治局辦公，但有發表意見的機會，都是說話公道的。毛主席以前高高在上，九屆二中全會以後，才開始真正知道毛是支持江青一夥，維護文革，打擊林彪。毛主席實在是公心不夠。

林彪對江青一夥的基本態度之一，就是不許他們插手軍隊。林彪說：「如果他們在軍隊有市場，是亡黨亡國的開始。」九大之後，防止上海幫插手軍隊真如同防止盜賊一樣的嚴格。軍隊向中央的請示報告，也同總理商量好了，凡是重要的事都先送周總理，由他轉送主席之後，再在政治局傳閱。看起來這是小事情，其實是大事，這樣可以減少江青一夥的干擾。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軍隊同中央文革就有一定的矛盾，黃永勝當總參謀長後，這個矛盾就突出來了。不少人知道中央內部存在的矛盾，實質上就是林彪、江青的矛盾，總理和政治局大多數同志都支持林彪。

文化大革命以來，上海的獨立王國就形成了。江青一夥死死霸住上海不放不讓別人沾手，國務院各部門對上海都畏懼三分，就連我分管的國防工業，在處理上海國防工業的事情時，也感有幾分棘手。例如，中央部門有事祇能同上海的有關部門打交道，不能同工廠直接打交道。上海三個師的警備部隊，都是上海自己掌控的，南京軍區很難插手，真正實現了張春橋的指示「上海的事，上海自己辦」的方針。

一九七〇年廬山會議林彪講話之後，張春橋嚇得差點尿褲子，他在政治局會議上，見到軍委辦事組的人就說：「我們同軍隊的關係，上海要負主要責任。」這是張春橋說的一句老實話。

由於江青和主席的特殊關係，文化大革命之初林彪、周恩來對她又有所抬舉，加上江青自己的霸道作風等，她在群眾中，特別是在造反派中的影響是不可低估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確實到了第三號人物的地位，至少是可以同周恩來平起平坐了。以我的看法，在黨內的高級幹部中，由於她和主席的特殊關係，就沒有不尊敬江青，不買江青賬的。即便是假的，也要買賬的。江青也特別需要別人看到她同毛主席的親密關係。在毛主席出場的時候，她想盡辦法要走的同毛主席近一點。發表照片時，總是選擇她與毛主席的特殊鏡頭。在文藝晚會上，江青總想要同毛主席坐在一起，不能如願，她有時就去用毛巾給毛主席擦鼻涕，整整衣服等。江青這些做法都是迷惑別人的手段。

十二中全會時，有一次會間休息，我和黃永勝在閒談，胡耀邦同志走過來，他和我們都很熟悉。他對黃永勝說，能不能搭個橋，他想向江青同志匯報一下自己的情況。黃這個人說話很直，說我幫你給總理搭橋可以，江青這個橋我搭不上。胡聽後有些尷尬，我這時倒給他出了個主意，我說：「江青同志天天大搖大擺地走，你就迎上去和她說話，她現在很『聯繫群眾』。」耀邦說：「對，迎迎她。」後來他見到了江青，說很高興很激動。所以說，面對江青，不論真假，當時是要買她賬的，因為江青的後面有毛主席。

這裏要特別說一下，溫玉成副總長投向江青的問題。溫玉成本來是黃永勝的器重的人，他能到總參任副總長，也是黃永勝建議，林彪點頭，否則是決不會有如此「官運」的。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江青還能迷惑他，確實是不簡單。

他到北京後不久，就以副總參謀長的資格在北京市「支左」。並且也就走上了通向江青之路，他手裏拿著兩張通向江青的「通行證」，一張是支持造反派，一張打小報告。前一張通行證起的作用不很大，因為北京的造反派早就是在中央文革直接控制之下的御林軍。後一張起到特別好的作用，他向江青打小報告特別多。例如，葉劍英、聶榮臻等人對中央文革和對造反派不滿的問題；他無中生有的向江青報告了葉劍英汽車上裝有特別電話，並有偵聽作用；報告聶榮臻在西山大興土木擴建自己的宿舍；報告邱會作支持清華「四一四」派反對中央文革等等（我的兒子在清華讀書，但「四一四」是什麼我都不知道）。江青看到他有特殊的作用，於是，就直接向毛主席建議：溫玉成爲中央碰頭會議成員。這樣，溫玉成的官運也到了「寶塔尖上」。溫玉成的問題出來以後，爲了割斷溫玉成和江青一夥的聯繫，連他的家人在北京住都不行，全家都送到成都去了。

林彪敢反江青也是很爲難的事情，畢竟有主席的關係在那裏，對江青的錯誤，小事情也忍了，但原則問題林彪就不讓。林、江之間矛盾的本質是什麼呢？就是保衛軍隊不亂的問題。其他問題，林總基本上是不問不問的。總起來的說，林在十二中全會的講話觸怒了江青，引起了很多的問題。林彪、江青的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這個問題，在後面還會多次說到。

第三十章 九大縱觀（一）

關於起草文件的問題

一九六八年十月，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決定召開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這次大會是在文化革命的大風浪之後召開的，江青、康生把持的中央文革想要獨霸對大會的領導。爲此以林彪、周恩來爲首，以軍委辦事組爲骨幹，以及當時在前臺工作的同志們和江青、康生、張春橋一夥鬥爭的中心問題，就轉爲在九大爲保衛黨的領導權和江青一夥奪取黨的領導權的鬥爭了。

按照常規，黨的代表大會之前必須起草好兩個文件：《政治報告》和《修改黨章的報告》。誰作政治報告沒有什麼可爭的，毛主席早就指定林彪代表中央向大會作政治報告。按照慣例，修改黨章也要向大會作正式報告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已經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章程（草案）》，但關於修改黨章的問題是否還需要在大會上作報告沒有定下來，誰作報告沒有談過，一切都要主席來定。

關於修改黨章的問題，早在六八年三月間中央碰頭會議就決定：由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三個人爲修改黨章的起草小組，九大通過的新黨章是上海幫一手包辦的。六八年九月間，我代表軍委辦事組參加了一次張春橋主持的新黨章的座談會。在會上，張春橋首先說：「今天大家看到的新黨章草稿，是上海革命造反派的集體創作。完稿後，又在群眾中廣泛地徵求意見，大家一致贊成這個稿子。大家可以提意見，可以局部推翻，也可以全部推翻。」稍後，張春橋帶有得意的神態說：「新起草的黨章祇有三千多字，恐怕是我們黨有史以來最短的黨章吧。大家還可以增加與減少。增加容易，減少就有困難了。」他講完後就起身走了，由一般工

作人員收集座談意見。結果是座談會變成了「無言會」，一個發言的也沒有，「座談會」也就結束了。

我看到的新黨章第一稿就有「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的字句。林總看到之後，甚為吃驚！六八年九月間，新黨章在提交八屆十二中全會討論之前，林總主持了一次中央會議進行討論。這次討論，到會的人比較多，除了中央碰頭會議的成員之外，還有各單位的一部分負責人到了會，我也代表軍委辦事組參加了會議。林總在會上提出：要把「接班人」的字句刪去。但是會場上關於「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的呼聲是一邊倒的，對新黨章也沒有什麼可談的了，會議開了不到兩小時就結束了。

新黨章經過中央文革建議、中央碰頭會議討論之後，將新黨章提交八屆十二中全會討論，毛主席同意了。這樣，毛主席就算正式承認林總是自己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了。但林總自己還沒有接受，在九大開幕之前，即新黨章將要提交大會審議通過之前，林總再次向毛主席提出把「接班人」的字句從新黨章上刪去。對此，毛主席沒有從正面回答問題，但在會上說：「一個人過分謙虛也不是實事求是的，比如說，大家要選我當主席，我硬是不幹，就不能說服人了。」這很顯然，主席就是要林總不要再提出在黨章上刪去「接班人」的字句了。從此以後，林總就再不提意見了。

這裏，還要說明的是，張春橋等人在起草新黨章的時候，原來的打算是林彪、江青的名字都上黨章。例如，提林彪為「毛主席的接班人」，提江青為「文化革命的旗手。」這個問題剛一提出，連黨章初稿都未上，就被康生堅決制止了。康生說：「你們不能這樣提出問題。大家若不謹慎，搞不好就會把得到的東西也丟得一乾二淨。」因為康生是他們的靈魂，他們也就不得不同意康生的意見了。江青的名字沒有上黨章，她是很不滿意的。

起草政治報告的鬥爭，同樣是複雜而又尖銳的，陳伯達向我們靠近後，講過這方面的事情。八屆十二中全會後不久，陳伯達就向毛主席請示了起草九大政治報告的問題，但一直沒有得到毛主席的具體指示，起草時間就拖到六九年春節之後了。主席叫陳伯達去談了一次起草報告的

問題。主席說：對這個問題，現在就得做準備了，凡事趕早不趕晚嘛。主席指示，由陳伯達起草九大政治報告，張春橋、姚文元輔助。

根據毛主席的指示精神，陳伯達同林總去商量。其實主席決定由林總做政治報告後，林總自己就開始拉條子，並告辦公室的同志們他已有了一個基本構思，陳伯達來了可助一臂之力，這個政治報告的主題思想很快就定下來，標題定為《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

提出這樣的思想，對經過幾年暴風驟雨的文化革命來說無疑是正確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以後，林總「克己復禮」的思想就很重了，毛主席把「劉、鄧」和「彭、羅、陸、楊」這些人打倒了，應該滿意了，文化革命這幾年確實搞得很亂，學校停課，工廠停產，全國上上下下搞奪權、搞武鬥、搞派性，經濟形勢不好，應該「復禮」了，全國應走上正常秩序，注重生產，發展經濟。陳伯達也注意到不要「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現在看來，他們的想法是對的。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上，陳伯達初稿的第一部分就出來了。

對初稿的第一部分的討論是由總理主持的，總理看到《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這樣的標題，應該是同意的，但總理深知，這樣的主題，在主席那裏是通不過的。他明明知道陳伯達是對的，但他還是以陳伯達延誤了時間，並且祇拿出第一部分為借口，否定了陳伯達。總理的確是智慧超人的。

這樣，江青一夥來勁了，他們明明知道是主席指定林彪做政治報告，也知道林、陳在起草九大政治報告，但江青裝著不知道，指著陳伯達的鼻子大發脾氣，把他大罵了一通。

江青說：「中央文革向來是集體領導，為什麼起草報告就連屁都不放一個。我認為你陳伯達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另外，江青還說：「稿上子觀點是完全錯誤的。你搞的是唯生產力論，你是以修正主義的觀點起草報告的。」江青講了之後，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也像放連珠炮一樣地指責陳伯達。

主席同意了江青的說法。現在看來，是不是主席本來就對陳伯達失去興趣，青睞張春橋、姚文元，從而對陳伯達來了個「欲擒故縱」就不得而知了。但從事情的結果來看，是這樣的。爾後，主席又與康生^{張春}張春

橋、姚文元三人重新起草，從此，起草九大政治報告的權力，上海幫就奪到手了。

其實，張春橋、姚文元早就在上海組織人起草好了政治報告。三兩天之後，稿子就拿出來，直接送毛主席了。毛主席對稿子做了很多的修改。江青看到他們起草的九大的政治報告毛主席都看過了，也就是「過關」了，她高興極了，在一次會上，江青對陳伯達用「商量」的語氣挖苦說：「對我們起草的政治報告，請你在毛主席修改的稿子上再修改吧！」

陳伯達還老實巴交地說：「我擁護毛主席的修改！」他的用詞也很有意思：不說同意稿子，祇說擁護修改！

林總知道江青把他和陳伯達共同起草的報告「槍斃」了之後，對報告的問題，就當「閉口道士」了，此後有關報告的全過程，林總一句話不說，一個字也沒有寫過，政治報告是上海幫包辦的。

開幕式

九大開幕之前，九大代表都來了不短的日子了，可是會議還沒有召開，總理解釋其原因是汪東興病了。其實，九大的準備工作，主要是總理、黃永勝、張春橋和吳法憲他們幾個，汪東興作用並不大，汪主要是聯繫主席那裏。汪東興病了是不是會議延遲的主要原因，我不太清楚，但他確實病了。葉群帶我們去看過汪，之後葉群還叮囑我們再去看汪。記得我們去看汪時，他不但很感謝，而且很激動，說著說著又哭又罵，什麼「過河拆橋了」，「卸磨殺驢了」，「不要我了」……，江青沒去看他，也沒派人去看他；主席也沒派人去看他，汪東興有這種看法並不奇怪，那個時候一切都敏感得很哪！汪東興在我們面前敢對主席不敬，我們是很吃驚的，看來主席和汪東興也有很深的私密關係，這在廬山會議上，得到了切實證明。汪東興在「楊、余、傅」事件以後就和我們走近了，九大以後就完全和我們站在一起了。實際上，汪東興也是腳踩兩隻船，其他人屢屢翻了船，汪東興確實踩穩了，真是技高一籌。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人民大會堂開幕了。

我參加過黨的三次代表大會。這就是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勝利前夕，在延安舉行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一九五六年新中國成立後，在北京舉



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在九大開幕式上。

行的第八次代表大會和在文化革命中舉行的第九次代表大會。我參加過三次代表大會，感受是不同的。參加七大感到很光榮；參加八大軍隊幹部就感到很平淡；參加九大的印象最深刻。在黨的九次代表大會上，我當選為中央委員，後又在九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我十四歲參加中國工農紅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經過四十年的革命鬥爭，我從一個普通戰士成長為黨的高級幹部，並成為黨的最高領導集體中央政治局的成員之一。

三月十五日，毛主席召集了一次中央文革碰頭會，那次會議事實上是決定九大的方針。到會的除了中央碰頭會議的全體成員之外，軍委辦事組的成員也參加了。毛主席在會議上講了話。當匯報到珍寶島地區敵人炮擊到我縱深七公里時，毛主席說：「打進七公里有什麼要緊，最好是打進七十公里、七百公里……。蘇修，要給他一點面子，讓他打進來，進來就好了，我們就有理由了。他打進來，就使我們動員起來。它也需要動員，它有一個缺點，就是紀律不好，一個是要東西，一個是要女人，他們同國民黨一樣，他們的軍隊很窮，發一套衣服還要家裏出錢。我們的衣服是國家發的，也是人民的。這次會議要動員一下，請總理講一講，請總長也講一講，動員大家。」

主席說：「日本人打敗了，就是國家小，沒有根據地。另一方面，政府投降了。我們的領導機關被打掉了，下面要照常打。大敵當前，動員、準備一下有利。蘇聯知道我們不會到他那裏去，他們那裏很冷。我們是後發制人。原子彈基地要有準備，防止他用飛機轟炸。抗議他不聽，雙方都在搶時間。他們是要面子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我們有的人說：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應當改爲我必自衛。人家犯我，我爲什麼不能犯人？無非是東西，罈罈罐罐打爛，把人消滅一半，地球還是照樣轉。」

主席又說：「一是總結經驗，落實政策；二是負責人要抓點，心中有數。」報告上（指九大政治報告）不要講二月逆流了，這次會要開成一個團結的會，他們一肚子氣。祇講劉少奇一小撮，都包括了嘛！現在與那個時候不同了，那時他們是公開發表的。「有些犯錯誤的，過一兩年還是要解放他們，就是不讓他們掌大權。」（七屆）二中全會就講了，要依靠工人，不能依靠資產階級。劉少奇到天津，就依靠資產階級。給了宋斐卿很多錢，結果跑到香港去了，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這次會要走七大的道路，把大多數人團結起來。二月逆流這些人選成九大代表，地球還不照樣轉！『天行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就是這些，主要是落實政策問題。反帝必反修，不反修反帝是不能勝利的。」

四月一日下午五時，毛主席主持了九大開幕式。

毛主席站起來宣佈：「同志們，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現在開幕！」此時，臺上臺下的掌聲經久不息！毛主席接著說：「今天要選舉大會主席團，通過大會議事日程。大會議事日程主要包括三項：林彪同志代表中央委員會作政治報告；第二項，修改中國共產黨黨章；第三項，選舉黨的中央委員會。大會主席團的名單，在預備會上已經通過了，現在請主席團各位就座。」主席扭頭向後一看，笑著說：「大家趕早不趕晚，都坐下了！」

在主席臺的前排，毛主席右邊是黨內的老同志：周恩來、董必武、劉伯承、朱德、陳雲、李富春、陳毅、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左邊是林彪及中央碰頭會的成員：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溫玉成。這樣的坐法，總理是費了一番心思的，如果不這樣坐，江青的位置就很難安排了。那

時主席基本上還公允，但要對江青安排適當，他也是記在心上的。當時的座位，劉伯承排在朱德前面，主席是有用意的，部隊的老幹部都看得分明。

然後，毛主席說：「現在，我們還要選舉大會主席團主席。大會主席團要推選一個主席，一個副主席，再選一個秘書長。哪幾個當合適呀？我看林彪同志當主席。」

林總立即說：「毛主席當主席，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當主席。」

主席還是說：「林彪同志當主席，我當個副主席，好不好？」

林總站起來說：「不好！不好！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當主席！毛主席萬歲！贊成的舉手。」緊接著，林彪自己說：「全體一致通過。」

這時主席說：「一定要我當主席也可以。我提議林彪同志當副主席，同不同意？贊成的請舉手。」

代表們一致舉手。

主席：「沒有意見，通過。誰當秘書長呀？我提議周恩來同志當主席團秘書長。好不好？」大家鼓掌通過。

在選舉了大會主席團主席、副主席和秘書長之後，毛主席發表講話。

主席說：「我希望我們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能開得好，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大會以後，在全國取得更大的勝利。」

接著，主席簡單回顧了黨的歷史代表大會，說明黨是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發展起來的。對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十二個代表，主席說：現在在座的還有兩個，一個董老（董老站起來，向大家致意），再一個就是我，其他好幾個犧牲了，山東的王盡美，鄧恩銘；武漢的陳潭秋，湖南的何叔衡，上海的李漢俊，都犧牲了。叛變的、當漢奸的有四個：陳公博、周佛海、劉仁靜。還有一個李達，武漢大學的校長，早兩年去世了。

主席特別講到七大，認為七大開得是好的。主席說：七大是在延安開的，開了一個團結的大會。清算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錯誤路線，特別是王明路線。那時有人提議，不選王明路線的人到中央。我說服大家選了他們，團結他們。結果呢，有幾個人表現不好，王明跑到國外去了，反對我們！張聞天不好！李立三不好！李維漢不好！（總理插話說，還有王稼祥），王稼祥犯了錯誤。其他幾個，劉少奇、薄一波、安子文這些人，那時不知道他們不好。對他們政治歷史我們不清楚，方塘選進來了，

從八大以來，現在搞清楚。他們的政治路線、組織路線都比較清楚了。因此，希望我們這次大會，能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在這個團結的基礎上，開成一個勝利的大會。大會以後，可以在全國取得更大的勝利！

在九大會議期間，毛主席特別強調大會要開成「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以後則把「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定為九大的政治路線。這個口號無疑是對的，但主席正是在大大破壞了黨的團結的情況下提出團結的口號的，八屆十二中全會時，中央委員不過半數，這個情況主席當然知道，但主席並沒有把大多數同志團結起來。

以我的親身經歷來說，我們黨是遭受過三次嚴重打擊的，這就是：王明的左傾宗派、文化大革命打擊一大片和毛主席去世後對毛主席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徹底否定。這三次打擊，一次比一次厲害。三次打擊的共同點是黨的肌體遭到了嚴重的破壞。

主席講完以後宣佈：「現在請林彪同志代表中央作政治報告。」

作政治報告也是一種象徵，七大是主席作政治報告，八大是劉少奇，九大是林彪。

前面說過了，關於起草九大《政治報告》的問題，從撰稿人到《政治報告》的內容毛主席和林彪都有很大分歧，林彪的意見沒有被採納。林總對張春橋他們起草的《政治報告》，無論在起草過程中，還是在大會上宣讀的時候，都沒有增加或減少一個字。林總原來打算提議，把《政治報告》印發大會，他在講話時對《政治報告》說幾句相關的話就行了，林總同我們提及此事時，黃、吳、李和我建議一定不能這樣做，林總經過考慮之後同意了我們的意見，並下決心承擔宣讀報告的任務。

在大會上，林總與其說是作報告，還不如說是讀報告，完全是照稿子念的。因為，林總事先根本沒有看過《政治報告》的內容，所以念起來不流利，精神不振，完全是應付差事。回來後，林彪說我就是要念得磕巴巴的，這是林總極為難得的調侃。

林彪講話時，毛主席一直聚精會神地聽著。我親眼看到毛主席在七大、八大、九大的神態。在這三次代表大會上，毛主席的神態是不同的。

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毛主席基本是自己動手。主席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的講稿是主席親自寫的，甚至會場的佈置都要親自過問，會議期間，毛主席不僅深入到各代表團去聽取發言，而且還深入到各小組與

代表談話。王稼祥、王明在正式選舉落選之後，毛主席做了大量的說服工作，再次補選才選上的。

毛主席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的情況，我不太瞭解，後來主席說過，他在八大基本是一個閒人。像對《政治報告》這樣的文件，我們看見毛主席是在主席臺上修改的。文件上原來寫的是：「先進的生產關係，落後的生產力」……毛主席不同意這種提法，毛主席修改之後，先給坐在右邊的周總理看了，再給坐在左邊的劉少奇看的。周總理還在那個文件上做了批注。文化大革命時，印發了周總理的那個批注。

在第九次代表大會上，毛主席的基本表現是放得下心。周總理都能注意到各方面的問題，許多具體的問題，周總理在夜以繼日地處理。毛主席在九大期間的精神是很好的。

江青一夥在九大開幕式上的表演是充分的，中心意思是：我們是毛主席的親信，未來的中央主要領導人，其目的沒有別的，就是了為拉選票，他們的做法，對不明真相的人，有很大的欺騙性。

首先是出場、退場的問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出入主席臺的時候都儼然是一副中央主要領導的神態，他們跟隨毛主席、林總、周總理一起出入場，江青有幾次是跟周總理並排入會場的。元老派則是跟在中央碰頭會議成員之後出入會場。「左」、「右」兩派劃分得很嚴格。不僅如此，在江青一夥控制的新聞報道上，還特別發表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出入會場的大幅照片。

其次是江青搞政治投機，在江青的預先策劃下，她抓住機會在主席臺上同毛主席照了一張合影。後來據江青自己說是二樓的攝影師用望遠鏡頭為他們兩人拍下了「非常好的一張照片」。在九大開幕式的新聞報道的清樣裏，附有這張照片。發表這樣的照片，周總理沒有把握，但又不敢去掉，祇好把《人民日報》的清樣送給毛主席審批，毛主席看到清樣後，用筆在照片自己的頭上打了一個大叉，主席沒有同意發表這張照片。

大會討論和發言

開幕式之後就轉入小組討論，四月十四日下午又開大會。

毛主席主持了大會，他宣佈：「今天的議事日程有三項：一是要通過林彪同志代表黨中央的政治報告；第二要通過中國共產黨黨章；三、還有幾個同志講話。」

在十四號大會上發言的有：周恩來、陳伯達、康生、黃永勝、王洪文、陳永貴、孫玉國、尉鳳英、紀登奎等人，他們分別代表軍隊、工人、農民、戰鬥英雄、革命幹部發言。每個人的發言都比較短。周恩來總理首先在大會上發言，總理的發言主要就是兩點：擁護毛主席，讚揚林彪。

總理說：

我完全擁護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在開幕式上的極其重要的講話，我完全擁護林副主席代表黨中央所作的政治報告，我熱烈慶祝在毛主席無產階級建黨路線指導下的新黨章的產生。

毛主席在講話中要我們回顧黨的四十八年歷史，我們應該經常回顧黨的歷史，特別是反對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劉少奇等反革命修正主義鬥爭的歷史，回顧黨在四十八年所積累的勝利和失敗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回顧黨在國際關係中的鬥爭經驗，回顧我們為什麼能在二十年前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接著又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勝利。二十年後的今天，又面臨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將要取得新的更大的勝利。祇有懂得了這些，才能懂得毛澤東思想勝利的歷史，才能懂得毛主席是怎樣創造性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才能懂得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才能懂得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林彪同志在這次大會上所作的政治報告，高舉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精闢地闡明了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承革命的學說，論證和證明了毛主席的這一偉大學說是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不斷革命的理論，並且從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具體實踐中證明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不是毛主席親自倡導，並發動群眾進行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為代表的

資產階級司令部就不能摧毀，我們黨和國家的前途就會像毛主席很早就指出的那樣，「那就不要很多時間了，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面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的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

林彪同志主持了軍委工作以後，在一九六一年首先在軍內出版了《毛主席語錄》，然後很快就推廣到全國，直至全世界，可以說，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準備階段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這一紅寶書把毛澤東思想所發展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大眾化了，使毛澤東思想在中國人民以至於全世界人民中都得到了廣泛傳播，從思想上武裝了億萬群眾，這是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最有力的輿論動員，並且具有深遠的影響。

……

林彪同志成為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經開始，林彪同志是南昌起義失敗後率領一部分起義部隊走井岡山接受毛主席領導的一位光榮代表。從此林彪同志一直緊跟毛主席，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為中國人民革命鬥爭和革命事業作出了卓越貢獻。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反對三次左傾機會主義的鬥爭中，在全國解放後，反對彭德懷、高崗、饒漱石的反黨聯盟的鬥爭中，林彪同志都是在毛主席的直接領導下，堅決地站在鬥爭的最前線。彭德懷的篡軍、篡黨陰謀被揭發後，林彪同志親自主持軍委的工作，林彪同志發揚毛主席古田會議的建軍思想，提出四個第一，三八作風，四好連隊，五好戰士，重整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提倡把我軍建成為紅彤彤的毛澤東思想大學校，有力地宣傳了毛澤東思想，尤其是林彪同志提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群眾性學習毛澤東思想的方法，這就是他在《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中說的：「學習毛主席著作，要帶著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這一套作法，對毛澤東思想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以至在全世界人民中的大普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這次在新的黨章中明確寫上：「林彪同志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最忠誠，最堅定地執行和捍衛了毛澤東同志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這是林彪同志四十多年的革命奮鬥中自然引伸出來的最正確的結論，是完全符合事實的。它得到全黨、全軍、全國各族革命人民的熱烈擁護，也得到全世界廣大革命人民的支持，我們不僅為著我們偉大領袖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主席而感到無限幸福，我們還為有了眾所公認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

目前國內外形勢是大有利於人民的，而不利於敵人的，我們全黨和全國人民牢牢團結起來，高舉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團結在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周圍，落實政策，奮勇前進，就一定能從勝利走向勝利！

總理發言以後，林彪有些坐不住，因為總理都是讚揚他的話，因此他即席發言。林總原來沒有準備講話，是為回答周總理的講話而發言的，林總說：「總理的講話，有兩點值得注意的地方，這就是：我們黨的勝利都是毛主席領導的勝利；任何人祇要執行毛主席的路線，擁護毛主席的領導，都能夠取得成功的。在這裏，還要指出一個問題就是不要學賀龍。如果賀龍還在的話，我的腦袋早掉了。在黨的領導下，賀龍在湘西搞起了一點武裝，就據為已有，對部隊實行『軍閥主義』的統治。如果沒有毛主席早就沒有我林彪了。我們全黨要永遠跟著偉大領袖毛主席。」

陳伯達的發言最有水平，提到「要防止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這在當時全黨都頭腦發熱的時候，說出這樣的話是不容易的。

康生的發言主要是說修改黨章的問題，其內容等於是做了修改黨章報告的摘要。張春橋他們在完成了政治報告的稿子之後，就以康生掛帥準備修改黨章的報告。他們想爭取康生擔任修改黨章的報告人。江青一夥這樣做的目的是要把九大會議中更多的東西的都攬到自己的名下來。九大沒有安排人做修改黨章的報告。在九大周恩來做修改黨章的報告是

合適的，但大會卻安排康生做這樣的發言，這樣的安排，肯定跟主席的考慮有關。

孫玉國的發言受到了大會的熱烈歡迎，大會的氣氛達到了高潮！當時蘇聯對中國的政策，中蘇邊境可能會發生衝突，但在珍寶島發生戰鬥則是突然的。我邊防部隊是被迫應戰的。

孫玉國把珍寶島的戰鬥經過，生動地在大會上講了一遍。他的發言常常被代表們的掌聲打斷，會場上出現了非常熱烈的景象。珍寶島戰鬥的勝利，為大會增添了很多光彩。

當孫玉國講到「中國革命的勝利是打出來的，世界革命也一定是打出來的」時，毛、林彪、周總理帶頭鼓掌，他講完話，毛主席當場問了孫玉國的年齡、籍貫、家庭等情況。

毛主席指著孫玉國說：「他叫孫玉國，是趙錢孫李的孫，玉字上加一點的玉，國是國家的國。這次珍寶島打仗就是他指揮的，打退敵人三次進攻。敵人打仗用了飛機、坦克、指揮車，我們什麼也沒有。我們的戰士除了一個副營長，都是沒有打過仗的。這次破除了一個迷信，沒有打過仗的，也可以打勝仗。蘇修他們開的烏龜殼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烏龜殼把人的勇敢降低了。我們打仗靠人的勇敢，靠不怕死，靠林副主席的二百米硬功夫。三月十五日來了許多輛烏龜殼，五百米我們不打，一百米還不打。五十米來了，我們一開火，他們的烏龜殼就翻了。我們過去打仗沒有烏龜殼，打勝了，還得靠人，靠步兵。烏龜殼我們有一點，但主要靠他們。裝甲兵司令來了沒有？（林彪說：『裝甲兵政委黃志勇來了，在下面。』黃站起來。）我不是說不要裝甲兵政委黃志勇了，也不是說不要吳法憲的空軍了。是說還要靠步兵，靠二百米。要準備打仗。我們不打出去，邊境上小打。可以放進來，給他些甜頭，放進來後再打。」

大會發言之後，會議通過了林彪代表中共中央委員會作的《政治報告》，《政治報告》通過後，毛主席很高興，說：「都贊成，有希望了，通過。」大會審議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也得到通過。

毛主席談兩條路線鬥爭問題

這期間，主席幾次召集老同志、各大組的召集人、各部門的負責同志開會。主席不厭其煩地多次講話，這麼上心，這麼用心良苦，是少有

的。雖然主席的開場白都是慣有的、滿不在乎的調侃，但講著講著就講到路線問題上，中心意思就是，從陳獨秀開始，歷屆黨的領導人都是不成的，都是錯誤路線。當時我們也聽得津津有味，認為主席是無比正確的，主席是偉大的。主席的談話距今已經三十年了，有些情景還歷歷在目。下面我不是按主席談話的時間，而是按內容加以回憶。

第一次談話是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一日下午，主席說：「會議已經開始了幾天了。大家對大會有什麼看法，這樣開下去行不行？」

許世友說：「大會開得很好。大家在小組會談得可熱鬧了！參加會議的人，心情都很舒暢。」

毛主席又問：「今天在坐的同志有多少參加過七大的？」

周總理插話：「參加過舉手。」

毛主席說：「啊，人很少，除了當時就在中央工作的人之外，祇有許世友、陳錫聯、黃永勝、楊得志、邱會作等人（毛主席一個一個點名的）。當時是戰爭環境，很多人都在前方，打仗第一。參加過七大的人可以對比回憶一下，看看兩個大會有什麼主要的不同？」

我說：「最主要的不同是，毛澤東思想、毛主席的威望更加深入人心！」

黃永勝、陳錫聯先後說：「我們大家都感到，我們的黨所以能夠這樣有力量，同人民群眾關係那樣密切，黨內上下那樣團結，最主要的是毛澤東思想，毛主席的威望深入人心！」

周總理說：「領袖的力量是無窮的！」

陳伯達說：「毛澤東思想是從中國革命實際鬥爭中產生的，所有力量就是從這裏來的。過去沒有好好宣傳這個問題，我們做宣傳工作的感到很慚愧！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中掀起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應當歸功於林副主席。」

許世友楞頭楞腦的說：「好的要說夠，壞的也不要隱瞞。我們黨內還有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老幹部對造反派不滿，有苦難言！所有老幹部都吃了造反派的苦頭的。對這個問題，沒有鬧起來，就是所有老幹部都聽毛主席的話的結果。老幹部並不反對文化革命，但都反對造反派！」

對許世友提的這個問題，沒有人敢附和。

接著，主席像往常一樣，都是扳著手指，把黨在歷史上的各次路線鬥爭，一口氣講下來，把每次路線鬥爭的主要問題，主要負責人和黨受到的主要損失都作了簡明扼要的說明。毛主席這樣的講話，我已經多次了，因此，我聽得很熟悉，也能理解。

主席說：「我們犯路線錯誤，最主要的問題就是不從實際出發，祇是照書本行事，或者搬用別人的經驗。例如，在中央蘇區反敵人第五次「圍剿」，提出保衛每一寸土地。好不好呢？但哪裏保得住啊！所以路線問題，是起決定作用的問題。」

主席說：「我看黨內最危險的主要有三次，一次是陳獨秀的右傾，二次是王明打倒一切的『左』傾錯誤，三次是劉少奇。其他都是局部的錯誤，如瞿秋白、李立三、張國燾、彭德懷。張國燾是局部的，在軍隊自搞一套，張國燾以勢力大小為依據，這是標準的軍閥主義，他看四方面軍的力量大，一方面軍力量小，所以另立中央。搞兩個中央就是分裂黨，其實一方面軍出發時力量也大。我們是爲了黨不分裂，團結張國燾，最後也祇是他一個人跑了。羅章龍、張國燾都另立過中央，他們都沒有搞幾天。」

主席在談話時提到黨內三次「左傾」的問題，主席說：

第一次國共合作時，孫中山還在世，他們和我們有一條口號是一樣的，就是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土豪劣紳。後來蔣介石叛變革命，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又和國民黨鬥爭。我們在土地革命時期三次「左」傾，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王明反李立三，說是三中全會搞得還不夠，王明不是反他們的「左」而是反他們的右。一次比一次厲害，李立三比瞿秋白厲害，王明比李立三厲害，把紅軍搞得差不多了。李立三沒有搞幾天，主要是王明。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發生在黨的創建時期。這時期黨員不多，我們也沒有軍隊。但造成了思想混亂，把共產黨與國民黨的界限模糊了，妨礙了黨的發展；「八七」會議，清算了陳獨秀的錯誤，以後主要是「左」傾了。中間黨派有些可以聯合的但沒有聯合，城市小作坊主，不該沒收的也沒收了，富農分壞田，地主不分田。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也有另外的作用，就是逼著一部分黨員，在大城市呆不下去了，要「上山下鄉」才能活命，才能發展。

王明的「左」傾，損失就大了。當時，我們有了大小不同的好多塊根據地，有了幾支相當大的軍隊；白區的黨也發展起來了。這些都讓王明送掉了。這叫做白區損失百分之百，蘇區損失百分之九十，紅軍被迫長征。他們都是用「左」的面目去糾正別人的右傾，所以越反越「左」。六屆四中全會後更「左」了。王明的「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的小冊子就是為反李立三的「左」傾而寫的。當時，紅軍總數十萬，王明在莫斯科一指揮就剩下三萬了，他也舒服了。

一九三八年王明由莫斯科回國後，就由「左」變為右傾機會主義了。當時黨內有一種思潮，就是國共合作就不要獨立自主了。什麼「抗戰高於一切」，「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王明從莫斯科回來就成了這種思潮的頭子。國共合作的民主潮流掩蓋了獨立自主，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的力量，搞根據地。延安整風時，批判了「王明路線」糾正了王明的錯誤路線。

我覺得這次大會，總結這幾年的經驗，總之，沒有劉少奇這夥人了，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錯誤，存在著一個全黨變修的問題。其前途就是亡黨、亡國。對修正主義的問題，我們早有察覺，在文化大革命中就看得更清楚了。還有兩句，鄧小平和劉少奇要有區別。鄧作了許多壞事，一條是棄軍逃跑；一條是到北京後與劉少奇、彭真搞到一起。也有些好事，如蘇聯的二十大，他不同意，也未查出叛徒。有人說打仗也不怎麼樣，但總打過些仗。

在主席的談話中，他對劉少奇是不滿意的。主席說：「除鄧小平沒有發現歷史問題以外，劉少奇、薄一波、安子文等都和國民黨有一些關係。大革命時，劉少奇搞總工會，讓工人糾察隊向敵人交了槍。一九三七年三月發表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劉少奇、彭真等不贊成。日本投降以後，國民黨請我們去談判，開頭是我去，沒有結果就回來了。然後就是董老、總理他們去了。劉少奇在延安黨校作了報告，說抗戰勝利是『和平民主新階段』到來了，並向各地發了電報。我們按照七大團結勝利的路線，進城以後，把劉、鄧團結起來了。」看來毛主席對劉少奇的問題，是瞭如指掌的。

八屆十二中全會已經把劉少奇開除出黨了，我本以為九大時要追認一下，畢竟劉少奇是黨的副主席呀，但九大沒有這個議程。

主席說：

朱（德）、陳（毅）是經歷過中央蘇區的鬥爭，吃過苦的，三次反圍剿幫過忙的。現在選他們當中央委員困難，許世友說朱、陳反我反了幾十年，其實有時也不反。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後，他們開了第八次代表大會，篡奪了軍權，但心裏不踏實。陳毅到上海向中央請示，受到了批評，中央批評他們是極端民主化。陳毅又請我回軍隊了。我不是又「復辟」了嘛！項英奪了軍權，不會指揮，要請外國人指揮。至於王明沒有搞過一個根據地，沒有打過仗，農民運動也沒有搞過。那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吃得開，我們這些人都是右派。項英一個時期沒有轉過來，直到一九四一年皖南事變才接受教訓。在對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上，不能不利用他們，不能不限制他們，也不能不改造他們。對待富農的問題也是一樣的。

我們要學會歷史地看問題。同資產階級，又聯合又鬥爭是個複雜的問題。祇聯合不要鬥爭是右傾；祇鬥爭，不要聯合是左傾。大革命時期在武漢，劉少奇、向忠發、項英、李維漢就祇講同國民黨聯合，國民黨的代表人物就是蔣介石、汪精衛。蔣汪叛變了就不要聯合了，打倒一切！

第二天繼續談路線問題，毛主席說：

黨的七次代表大會，是開成了團結大會，勝利的大會。大會之後，確實團結起來了，比中央蘇區，內戰時期更加團結了。七大時還有幾個人聯名寫信，不選王明他們，我說要選他們。張聞天、博古、王稼祥等犯錯誤的人，我們不在大會上批評他們，事先把他們的問題給大家講清楚。他們屬於「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但在蘇區吃過苦的，王稼祥在二、三次反圍剿幫過忙的，其實他們在蘇區與朱德、陳毅差不多。七次大會，王稼祥，王明都落選，是經過做工作第二次選舉才選上的，這種團結，是在正確路線之上的團結。七屆二中全會提出了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當時，還在打仗，沒有機會同大家講。廣大群眾

不知道社會主義革命就是要把資產階級消滅。劉少奇他們還是講利用，不講限制和改造。

主席在會上講：要把朱德、葉劍英、陳毅、徐向前、聶榮臻、陳雲、李富春、李先念等老同志選進去。這當然是很好的，當時我就認為團結的人還不夠，那個時候主席說什麼就是什麼，主席說到鄧華，鄧華就是中央候補委員，再能多團結一點人就好了。如李志民、胡耀邦等人，都參加了八屆十二中全會，選進來應該是可以的；再如張聞天、王稼祥這些人，主席也掛在嘴上好幾次，最終還是沒有把他們選進中央委員會。其實他們在黨內早已沒有太大的影響了，在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他們也都是繼續革命努力奮鬥的。選進來主席威信會更高，這的確是一種遺憾。

毛主席談關於文化大革命和清理階級隊伍的問題

毛主席說：

文化大革命同四清運動的不同點是：四清運動主要是搞基層，搞經濟基礎；文化大革命是搞上層建築，搞反修，也就是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現在基層怎麼搞，祇提出了「鬥批改」，但是還沒有落實。

搞社會主義，比打仗困難多了。搞建設實在不容易。社會這個東西，有自己的發展規律，是違背不得的，它老大得很，不管什麼「主義」管它，一概不理。要是違背了它的發展規律，是要受懲罰的。我們把制度和方法，總死死捆在一起。比如，農村實行集體所有制，這是社會主義制度，應當堅持，這是對的。但我們共產黨辦事很蠢，把老百姓的百分之八十都包起來，祇讓他們自己搞百分之二十，結果是包而辦不好。我看要把它倒過來。老百姓百分之八十的事都由他們自己來辦，我們祇包百分之二十就好辦了。

到九大的時候，「天下大亂」的時期基本過去，「天下大治」的階段應該到來。主席還是反覆講要注意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在「鬥批改」中，要注意防止擴大化的問題。主席說：

「鬥批改」是中央提出來的，下面一搞就擴大化了，這是清理階級隊伍的一個傾向，我在碰頭會上談過好幾次了，清理階級隊伍是要把叛徒、特務、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和現行反革命分子，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找出來，要搞這樣一些人。有些地方搞得不好，有些地方擴大化，這種情況是可以理解的，但要引起重視。

主席說：

我在八屆十二中全會結束的時候，就提出了清理階級隊伍要「穩、準、狠」。「準」是最主要的。有些專案組的材料不一定準，這個問題要注意，搞專案的人總想多搞幾個才好。好像過去我們行軍，沒事捉虱子，總想多捉幾個，專案組好像捉虱子，要超出一點好說話。一個大學捉了九百多人，怎麼得了？人關起來了，捉有捉的理由，放更要有個理由。至於關在牛棚裏的人更不少，恐怕各地都有。……蘇聯人講我們整知識分子，王明在莫斯科發表文章說我們不要知識分子。秦始皇殺了四百幾十個人，我們比秦始皇好一點，沒有殺，搞噴氣式，戴高帽子，遊街，掃廁所。噴氣式也不要搞，我們不主張戴高帽子。我說罪魁禍首還是地。我在十二中全會上講了：我在一九二七年的文章上說了，地主戴高帽子遊鄉，既然給地主可以戴，為什麼不可以給彭真戴？給牛鬼蛇神戴？我們幾十年沒有搞了，這次紅衛兵就翻出來了，查搞這一套。抓人還是大部不抓，抓了怎麼辦？還是事出有因，查無實據嘛！現在擴大化了，許多同志要注意。想到我們黨的歷史，總是在主要傾向掩蓋之下，另外一種傾向就忽略了。

主席講到文革時特別強調說：

文化大革命是二次革命，叫文化大革命。叫文化革命也可以，因為是從文化開始的。不管叫什麼名字，觸及上層建築，中央機關，到學校、工廠。這個工作還沒有完，恐怕還要一個時期要認真抓一下。這次文化大革命，由歷史作結論。

各個時期都有一種主要傾向，掩蓋著另一種傾向，要使同志們瞭解我們黨的歷史，以免犯錯誤。現在有一種相當普遍的傾向就是，不僅沒有預見，事情來了不考慮，總是屎急子挖廁所，

沒有不出事的。北京有個單位九千多人，抓了九百多人，十分之一。把人抓起來，不容易放，要放就得講個理由，為什麼抓我，又為什麼放我。抓人容易，放人難啊！對有的人，關在『牛棚』裏，長時間無人過問。知識分子，打掃廁所是可以的，但長期無人過問就不好了。我們現在搞的『三支兩軍』又使軍隊與群眾融合了。」

主席在談話中提到很多同志及這些同志主管的部門和地區，如李雪峰、謝富治、韋國清、楊勇、鄭維山、陳先瑞、許世友等很多同志。我感到毛主席是認認真真在搞這場文化大革命，並不是像鄧小平他們把毛主席在文革中說得一無是處，把文化大革命說得一無是處。主席說：

這場文化大革命，一方面群眾中有無政府主義思潮，一方面有人乘機破壞，打倒一切。我看這都無關大局。武鬥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幾萬人武鬥也沒有什麼了不起。有人認為軍隊穩不住了，其實沒有那回事，軍隊很鞏固，文化大革命穩坐釣魚船。軍隊本身也有派性，野戰軍，地方軍各支一派，如保定、四川、貴州、雲南都是如此。對這些同志，過去搞了武鬥，現在應聯合。這是人民內部矛盾，不必記仇。

將來有些幹部犯了錯誤群眾諒解就是了，有些抓住不放，比如楊勇。當然他也有錯誤。是哪裏下的命令？至今我還不知道。（江青：幾個老師下的命令，叫鄭維山執行的。他們倒打一耙，嫁禍中央文革，我們哪裏能下命令抓人呢。）蕭華是有問題的，他在山東的問題現在是紅衛兵搞出來的，原來中央知道的不是那回事，叛徒是肯定的。楊成武也有問題，不過他沒有歷史問題。余立金不僅是皖南事變本身的問題，主要是到了上海自首的問題。楊、余、傅，楊、余大一些，不過傅也不是老實人，不講真話。

對清隊問題，主要是總結經驗，落實政策。把政策落實，要幹一年左右，大家都要親自抓一個工廠，一個學校，一個機關。工人宣傳隊，軍隊宣傳隊都不能壓群眾。工人階級領導一切，不是壓倒一切。反對軍代表，就說別人反解放軍，反工宣隊就說別人反工人階級領導，這是不對的。對問題要實事求是，不要隨便扣帽子，對提意見的人可以做工作。現在有些謠傳很厲害，中央文獻出版社編

在街上看到貼了誰的大字報，就說某某人打倒了。去年有人要打倒張春橋、張國華，打了半天，他們還在這裏開會。

毛主席談關於準備打仗的問題

毛主席說：「幾年來，林彪同志抓戰備抓出成績來了。有人說，現在不是『有國無防』，而是有防了。蘇修亡我之心不死，對準備打仗一點也不能放鬆。」

毛主席接著說：「準備打仗，思想準備是主要的，物質準備是重要的。我們不能沒有思想準備，也不能一點東西都不存起來。準備好了，仗打不起來怎麼辦？這完全有可能出現這種情況。有準備沒有仗打，這是經常的。蘇美搞那麼多的原子彈，花的錢不計其數。他們的原子彈並非爲了展覽的，將來打不起核戰爭怎麼辦？我們還沒有爲他們找到出路。」

「過去就提出了『大辦民兵師』，這個問題還是要抓緊，這是戰備的重要問題。我們說，祇要有人就可以辦大事。我們國家有千千萬萬孫玉國，一個年青人可以指揮打仗，這是蘇修最難對付的。他們可以在邊界上打仗，也可以到任何地方打仗。總之我們不怕打仗，要有準備就是了。」

林副主席插話說：「除了物質條件不如蘇修之外，我們都比他們好。特別是毛主席的威望更是強大的戰鬥力。」

周總理插話說：「我們的生產，包括軍工生產在內，比起抗美援朝時期，還是好多了。祇要一打仗，毛主席一號召，生產可以很快上去，滿足作戰部隊的需要不是很難的。同時，我們已經有了相當數量的物質儲備，現在邱會作手裏的東西，夠三百萬人打一年。」

毛主席對著我說：「啊，你這個後勤部長不簡單，懂得準備打仗就好！我們總的戰略還是積極防禦的，這條不能變。有一條原則是：不管出現什麼情況，都不要慌張，要搞清情況才打。解放戰爭在陝北的仗就是這樣打的。胡宗南初來的時候，如入無人之地，一個兵也見不著。待敵人走來走去，欲進不能，欲退不得的時候，我們才打的。這就是說，敵人主動進攻，勢頭洶洶的時候，我們不打；等待敵人被動，我們主動的時候，我就打。無論全局，局部掌握戰爭的主動權，是作戰指揮員不可忘記的。」

毛主席談關於選舉的問題

毛主席說：「我建議有幾個同志都選進去，朱德、陳雲、鄧子恢、張鼎丞、徐向前、李先念、陳毅、聶榮臻、葉劍英。王明大家不會選他了。王稼祥犯過大錯誤，他是王明『左』傾路線的積極支持者，但也做過很多有益的工作的。這些人選進去，多他們不多；如果留在外面，少他們就會顯得少了，我是贊成選他們的。」

毛主席指著一份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的名單說：

這個名單很難排。有的同志參加了會議就榜上有名了，沒有參加會議的就名落孫山，例如，北京軍區有六個軍，來了一個軍長參加會議，名單上排上了，有的參加了省革命委員會，也排上了。沒有排上的也不一定比排上的差。排上的也不一定個個都那麼好。人們都說，辦事要公道。什麼是公道，祇有天知道！在名單上分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為什麼要這樣分，我講不出來一個道理來。

從工廠、農村來的人，選上了中央委員的，也要回原單位去，不要脫離勞動。有人提出，新走上政治舞臺的人，不要在中央，就要在基層。基層是馬列主義大學。

張聞天、王稼祥沒有排上，值得考慮。在名單上排上的人，也有人提議要拿下來，我看還是要選他們。（許世友插話：他們反毛主席幾十年還選他們？）反幾十年難說，有時反有時不反。比如彭德懷是反對我的，但反張國燾和我是一致的。陳昌浩拉彭德懷沒有拉過去，這應是他的一功。當時，如果彭被拉過去了，就剩一個一軍團了。我們北上肯定的，祇剩一個軍團，也是會北上的。這裏還提一下葉劍英這個人。葉在歷史上有二功：廣州暴動和張國燾分裂紅軍。在草地，如果沒有葉劍英把張國燾的密令搞出來，我們大家當了俘虜，還不知道是什麼事呢。

那些反過我的人，要選他是困難的，要你許世友投他們的票也是困難的。那些人，資格很老，功勞也有，錯誤不少，有的還犯過大錯。他們的檢討也有，但群眾不通過。我看以後就不要檢討了，主要看行動。我們看他們的行動，他們也看我們的行動。（許

世友插話：毛主席下命令，我們就選他們）那不行，祇能說服，不能壓服。

黨的七大時，我們要選王明，王稼祥，他們不信，我們真的選他們了。我們選了王明，後來他又跑到莫斯科去反我們，這並不是選錯了。我們要不先選他們，可能早就反了。他們繼續反，是為自己做了結論，大家都看清楚了。選一些反對過我們的人，不要緊，祇要大多數是好的就行了。黨內總會有矛盾的，中央委員會也有矛盾，沒有矛盾的事是不存在的。

上海幫批判陳毅

在文化大革命中，張春橋曾說過：「你搞別人的材料，別人也可以搞你的材料」，這句話讓張春橋自己給說中了。上海解放軍二醫大革命組織「紅旗」搞到了張春橋是叛徒的材料，好像也有張春橋的老婆歷史問題的材料；同時還有姚文元父親姚蓬子的材料。我拿到這些材料不知道怎麼處理，因為處理不好，小則給自己造成被動，大則要犯政治錯誤，甚至被打倒。因為張春橋、姚文元不僅是江青的紅人，也是毛主席器重的人。

有一次我利用開會的機會，給總理嘀咕了幾句，總理很慎重地說：「這個材料你不要轉給我。」稍等片刻總理又說：「群眾來信我是可以收到的。」總理的話提醒了我，二醫大革命組織，把張春橋叛徒的材料，直接寄給了總理。但事後一點動靜也沒有。

在九大期間，好像是進入選舉程序的時候，黃永勝悄悄告訴我：「告訴你，眼鏡（指張春橋）是個叛徒，材料轉到主席那裏去了。」主席好像並不重視這些材料，因為在選舉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時，張春橋仍然榜上有名。

早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之前，有一次黃永勝在辦事組說：「……搞不清張春橋、姚文元是怎麼回事，說多了主席肯定不高興。但抓住『眼鏡』（指張春橋）就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李作鵬好像知道什麼內情，立即提醒黃說：「我看我們少提『眼鏡』，是香是臭我們說了不算。」黃永勝本是個較嚴謹的人，但提起江青一夥又沒有顧忌，甚至挖苦完江青，別人還沒反應過來，自己就哈哈大笑。他聽了李的話就說：「不說了，不說

了。反正我們沒當過叛徒。」其實他對李的話還是漫不經心，這些話也不避秘書，爲他的秘書李必達給江青寫告狀信創造了條件。

在大會期間，上海代表團對陳老總進行了多次批判，大會選舉的頭一天晚上，還進行了通宵達旦的批判，這與毛主席批「二月逆流」和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對陳老總錯誤的批評，是有密切關係的。文革中批判「二月逆流」，主席對陳毅批判的話也確是說得過重了；在八屆十二中全會的工作會議上，毛主席挖苦陳毅是右的代表也是十分錯誤的批評，九大沒有把陳毅留在中央政治局裏也是十分不妥當的。陳老總在文化大革命中遇到的災難，主要是由毛主席對陳總的態度所決定，幾十年前的恩怨，主席嘴上說不計較，實際上心裏還是沒忘的。

八屆十二中全會行將結束討論九大的準備工作時，毛主席、林總、周總理等都出席了會議。在會上審查通過九大代表名單時，胡克實和陳老總、陳雲等人，都在席位上做了表態性的發言，胡克實說：「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是犯錯的……不應當當九大代表。」胡的話音剛落，毛主席就面帶微笑很風趣地說：「啊，你這個胡克實，爲什麼『實』都克了呢？」接著陳老總發言：「我犯過幾次反對毛主席的大錯誤，我是沒有資格當九大代表的。保證今後再不反毛主席了！」當時毛主席雖然沒有發怒，但很嚴肅地說：「你陳毅有資格當代表，你是右的代表！」毛主席講話後，全場一片靜默，鴉雀無聲。毛主席講了陳老總一通之後，陳雲可能有所思，也講了一句話：「我今生永世不反毛主席！」對陳雲的話，毛主席沒有表示任何態度。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三日晚，上海代表小組在京西賓館會議樓第一會議室開小組會，會議從晚九點開到凌晨五點。我看到陳總的隨行醫生，才知道陳總在開會，我先後進去了兩次，都向他們提出過：「陳老總是個病號，三〇一總醫院是要對病號負責的。」王洪文還同我開玩笑說：「我們也會照顧病號。」

上海代表小組的會已經開到凌晨四點多了，我祇好向總理報告了，總理接到我的電話，感到很驚奇，並說：「真有那樣的事嗎？你去給王洪文同志打個招呼，做點工作，我馬上就去。」

這樣我即進去向王洪文說：「我受周總理的委託，對陳老總的健康是負有責任的。你們的會已經開了快八個小時，一個病號能受得了嗎？會出事的。」我向王洪文談這番話時，陳老總看著我幾乎要流出淚來。

王洪文把我拉到會議室外邊說：「江青同志和春橋同志指示，陳毅這個人很頑固，對自己的錯誤基本上不承認，更使人氣憤的是他發言名爲自我批評，實爲教訓人。明天就要選舉了，他選上了中央委員，又會尾巴翹起來的，這點事就不要干擾總理了。」他回會議室繼續開會。

不久，周總理來到會議樓休息室，我向他簡單說了一下情況。總理對我說：「我們不要指責他們，祇設法把陳總送回去休息就是了。事情很複雜，一句話說得不好，都可能出事的。」

周總理同我說了幾句之後，就把王洪文、陳老總都叫來了。周總理當著王、陳的面若無其事地對我說：「邱副總長呀，我肚子餓了，想吃東西，還有他們兩個（指陳、王）也一起吃一點，搞點東西吃。」

陳老總一隻手捂著肚子，向總理說：「我不必吃什麼東西了，我這就回醫院，好嗎？」總理祇是點頭，一句話也沒有說。我把陳老總送上電梯去了。

陳老總走後，王洪文要向總理說明爲什麼這樣開會，總理都用別的話堵住了他的嘴，沒讓他說下去。王洪文不理解總理的意思，還要嘟嘟囔囔地講。我就直截了當地向王洪文說：「你不要說了，總理是到這裏想吃點東西，並休息片刻，總理的腦子早就裝滿了，你再說也沒有地方放了。」我說了之後，三人一起笑了起來。此時，夜餐送來了，王洪文也沒有說話的機會了。

江青要當接班人

大會將要進入選舉之前，江青向林彪進行了一場「藝術性」很高的戰鬥。一天，大會秘書處通知，江青要在京西賓館舉行一次座談會。參加座談會的人選，姚文元早已佈置好了：每個大組派五個人參加。姚文元是座談會的主持人。因爲軍委辦事組承擔了會務工作，我斷斷續續地進入會場聽到了一些講話和發言。

座談會開始時，姚文元首先講了話。他說：「今天江青同志召集部分革命造反派代表開座談會，是很有意義的。江青同志時刻都關心羣衆造

反派的進步和成長。現在請敬愛的江青同志講話。」這時全體起立，熱烈鼓掌，會場上高呼：「向江青同志學習！向江青同志致敬！」在掌聲中，江青開始談話了。

江青說：

我是一個不宣傳自己的人，我也不同意別人宣傳我。大家很清楚，對我的宣傳就使人把我與毛主席聯繫在一起，所以就不能隨便說。今天在座的都是我的戰友，我有責任向你們簡略地講一下我的歷史，除此之外，我今天準備向戰友們講三個問題（一）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問題；（二）八屆十二中全會的問題；（三）要有一個無產階級戰鬥司令部的問題。

關於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問題。全會把劉鄧的問題端出來了，劉、鄧是不可能再擔任當時的職務了。林副主席接班，毛主席是有個考慮過程的。一天，毛主席對我說，誰來接替劉少奇的工作，你有什麼想法嗎？我一時不敢回話。在毛主席再三問起之後，我才敢大膽回答毛主席的問題。我向毛主席說：範圍不超出現在的中央常委，但要有三個條件：一是歷史上沒有犯過路線錯誤的人；二是一貫同毛主席親密合作的人；三是要有相當的馬列主義水平的人。我說了之後，毛主席笑著說，我知道你說的是什麼人了。我有意讓主席散散心，即說：「那好，現在我們把考慮的人各自寫在條子上面。」我們都各寫了一張條子，互相看了條子之後都笑了。林彪同志作為毛主席的接班人就是我當年同毛主席一起提出來的。

關於八屆十二中全會的問題。在十二中全會上，擔任主要講話的人（沒有點林彪的名字）對文藝復興問題是講得不正確的。對這樣的問題，我是顧全大局，維護中央領導同志的崇高威信。我不想出來公開反駁那些不正確的觀點，祇是想經過一定的工作，使講話的人懂的錯在什麼地方，並自己出來糾正，我的態度是善意的。這裏，我還要指出的是，我的講話引起了軍委辦事組對我不公正的看法，對他們我同樣是不做公開申明的。對這個問題，我把所採取的態度向毛主席報告了，主席對我是很讚揚的。

關於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問題。我們的大會很快就要進行選舉了。我的願望是能選出一個無產階級的戰鬥司令部。這就是說

這個司令部是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又是在毛主席指揮下，能夠進行戰鬥的司令部，這是決定中國人民命運的大問題。

什麼人可以到這樣的司令部裏呢？我看最關鍵的就是對文化革命的貢獻問題。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開創了這條路，就找到了建設社會主義，邁向共產主義的康莊大道。我們就是要理直氣壯把對文化大革命有功的人都要選到中央委員會去，選到中央政治局和黨的核心領導，中央政治局常委裏去。我們的江山是革命造反派從修正主義的手裏奪回來的，保衛我們的江山就歷史地落到革命造反派身上了。

毛主席的接班人，應該不止一個，我們要把毛主席最信任的人都選到核心領導裏去。祇有這樣，才能把毛主席的班全面接下來。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毛主席的親密戰友，也決不止是一個人，這個問題，在文化革命中已經清清楚楚地表現出來了。

江青講話之後，姚文元接著講了話。他直接了當地提出，江青同志也應當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之一。他說，我們在黨章上，雖然祇寫了一個接班人，江青同志是文化的革命的旗手，是當然的接班人。

姚文元把江青講話的記錄整理好，就送給康生了。康生邊看邊冒大汗，他把記錄留下來，再沒有轉手。但記錄以後怎樣處理的就不知道了。後來在簡報上看到「江青同志召開部分代表座談會，對到會代表鼓舞很大」。

第三十一章 九大縱觀（二）

軍委辦事組退選舉名額

在九大期間，軍委辦事組和中央文革對選舉問題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中央文革要控制選舉，軍委辦事組則堅決反對。

毛主席對選舉問題的指示，前前後後所說的有三個問題。

第一，歷史的必然問題。

毛主席說：我看凡是正式黨員都可以當選。當然進入中央委員會的是優秀的，但沒有選進中央委員會的，也有很多優秀的同志。我們的中央委員會，肯定反映文化大革命這個時代的特點。這也是一個歷史必然的問題。

第二，老中青相結合的問題。

我們的中央委員會，一定要實行老中青三結合的原則，各級領導班子也要實行這個原則。老中青三種人，在中央委員中大體上要各佔三分之一，老的不能不要，像我們這些人就算老的了。中年的在黨員中佔主要成份，青年人是在文化革命中湧現出來的積極分子，對這些人好好培養出來就是未來的希望。對青年的培養主要是在基層。那些人要是離開了基層，也就可能成廢物了。

上次我們在各組召集座談會上，談到的那幾個人還是要考慮的。比如朱德、陳毅，他們兩人是不分上下的，南昌失敗後，從廣東到井岡山，能夠把剩下的人帶上山，祇有朱德是不夠的，陳毅出了很大的力量。在歷史上，朱、陳是分不開的。現在我們要朱德，也就不能不要陳毅了。

第三，選舉自由的問題。

沒有自由權就不叫選舉，而是奉命行事。我們不能搞那一套。拉選票，這是古來有之。資本主義社會，主要靠金錢。我們共產黨不搞這套，也搞不起呀！誰能用錢買選票？我主張在選舉之前對候選人要多討論幾次，讓代表有充分的發言機會。但我們的民主，是在集中領導下的民主。

毛主席對選舉問題，從原則到具體都說得清清楚楚的。本來是照著執行就是了，但江青一夥還是另搞了一套的。在下列問題上，都進行了激烈的鬥爭。

江青一夥的所謂選舉方針。江青在中央碰頭會上，以「學習」毛主席對選舉問題的指示為名，對毛主席的指示進行了肆意的歪曲。江青說：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就是革命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之後，革命造反派當權是根本問題。沒有革命造反派就沒有文化大革命的成功，也不可能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毛主席的指示最中心的問題就是肯定革命造反派的地位。這個問題，不僅關係到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也關係到中國的前途和希望。因此，在九大的選舉的問題上，如何對待革命造反派就是對待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問題，就是對待毛主席的態度問題，

江青他們看到候選名單上還是老同志佔優勢，大為不滿。她說：文化大革命以後的中央委員會，應當是朝氣蓬勃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已經把基礎打好了。

對這個問題還是康生比他們高明，康說，中央委員會應當有許多老同志參加，要是沒有那些人就不是中央委員會，關鍵是權力掌握在馬列主義者手裏，爭中央委員的名額是祇圖虛名。康生這一席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江青一夥最後還提出了別人說不出口的問題。江青說，在選舉中保證中央文革成員有足夠的票數，所以做好預選工作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這是整個文化大革命的威望問題。我提議中央碰頭會議應召集主席團開大會，說清楚這個問題。

周總理「啊」了一聲說：「中央碰頭會議還能召集主席團開會？」但總理馬上又緩和下來說：「我們應當開一個主席團大會，專門說下有關選舉的問題。」

在文化大革命中，代表中央辦事的就是「中央文革」，代表中央軍委辦事的就是「軍委辦事組」。這兩個「小組」的意見常常是對立的，當時，還沒有另外的任何中央一級機構可以與中央文革對立。國務院的業務組，名符其實，祇管「業務」。從一九六八年三月楊成武下臺之後，黃永勝上臺，軍委辦事組同中央文革就「貌合神離」了。對九大選舉問題，軍委辦事組對江青一夥提出的謬論，都進行了抵制與鬥爭，我們對待中央文革的辦法是很多的。其方法有的是直來直去，有的就照我們「自己的辦法」行事。在代表的總數中，軍隊代表佔三分之一以上，如加上各省市的軍管幹部，數字就更大了。軍委辦事組提出的選舉條件就是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的五條標準和老中青三結合，堅決反對把造反派作為選舉條件的觀點，對大會震動很大，對整個選舉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我們堅決主張多一些老同志參加中央委員會。老黨員不僅過去有功，也是我們今天的需要。中央委員會沒有部分老同志參加，就不能反映我們黨的光榮歷史。對老同志有些不公正的看法，必須澄清。老同志中，對造反派搞打砸搶，揪鬥老幹部是反對的，對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的胡作非為也是反對的，但這決不是反對文化大革命，也不是反對毛主席。

軍隊安排中央委員的原則是三條，一是現任職務。各總部、各大軍區、各軍種，各兵種的軍政首長，都是考慮的「當然」委員；二是資歷。各總部，各軍區，各軍兵種的副職和軍事院校的主要領導幹部都是在被考慮之列；三是才能。除上面所指的正副職幹部之外，有些比較有才能，有發展前途的幹部也是被考慮的。為了慎重起見，軍委辦事組召集各大軍區，海軍、空軍，各總部的有關首長，進行了數次會議，除了一致同意上面所提三條原則之外，對所提名單也是逐個通過的。

周總理在各大組的會議上，讓軍委辦事組首先介紹了他們在部隊系統推選候選人的做法，各省市負責人也一致同意軍委辦事組的做法。最後，周總理肯定了軍委辦事組的做法是正確的。各省市的負責人也提出各省市的候選人由自己提名的要求，這樣就打消了江青一夥企圖壟斷提出候選人的特權。

江青一夥對軍委辦事組提出的產生候選人的做法很惱火，她問周總理說：「難道對各省市革命造反派優秀人員的名單也由軍委辦事組提出

嗎？」周總理直截了當回答說：「這個仍由中央文革提出來。」江青一夥得到了滿足，他們也就不說話了。

中央碰頭會議，對中央委員的總定額，經過反覆考慮定為二百多人不到三百人，對總定額又進行了具體分配。軍隊的定額不到九十人。但不包括擔任各省市第一把手的軍隊幹部。這樣實際上就超過了三分之一以上。軍隊佔有這樣大比例的中央委員數額是空前未有的，各省市根據大小不同，分為三等（具體數字記不起了）。各省市除了幹部之外，都要有工人、農民參加中央委員會，毛主席批准了這個分配原則。

軍隊中央委員的總額在安排上進行了多次反覆研究安排，但按上面所定原則名額用不完。各軍區，各軍兵種首長也再三表示，完全滿足了要求，不能再安排了，他們說：如果再多安排一個就會產生連鎖反應，互相攀比，影響一串。經過反覆考慮，有的軍區祇是多安排了一兩名，有幾個人的名額和四名戰鬥英雄（陸軍兩名，空、海軍各一名）就是在這種精神之下打破常規安排的，但名額還有多。在軍委辦事組的會議上，有人提議，把名額退回中央碰頭會議，我向黃永勝擠了擠眼睛說：「名額先不退回去，還是我們自己掌握為好，不然冒出來需要安排的人，我們就被動了。」當時如果把名額退回去了，江青他們就會把名額搶走，中央委員會中的造反派就會增多。黃永勝完全領會了我的用意，他說：「不夠格的不能往裏塞。先把名額按住，等到這個工作結束時，我們再把名額退回去。你（邱）去同總理說一下。」我去同總理悄悄講時，總理笑了，他說：「好呀。但你不要再說下去了。」

預選是以各大代表組為單位進行的。西南大組在京西賓館會議樓一層東廳舉行。中央碰頭會議成員分別參加各大組的預選，周總理，江青參加西南大組的選舉。周總理、江青得了全票，西南大組的預選是我主持的，江青得了全票非常高興，選舉結束時，再三向我說：「今天的預選工作組織得很好，你的組織工作能力很強。」

西南大組的預選前後祇有一個半小時，江青在這段時間內，演了三出小「戲」。一是進場時同全體代表每人握手、問好；二是選舉開始前發表了簡單的講話；她說，我很忙，沒有時間來看望大家。今天利用這個預選的機會，我代表中央文革向大家問好；三是選舉結束時又去發表了簡短的講話。她說，從今天的預選結果來看，我們代表的思想覺悟是很高

的，這是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大家一致把中央文革成員選到中央委員會的深厚階級感情，我是很感動的。

溫玉成在中南大組，得到略超過半數的「保證票」。他在選舉後連家都沒有回，跑到京西賓館向黃永勝告狀。他說：「今天在中南組預選，李作鵬壓了我八十票！」黃永勝若無其事地說：「他頂多能壓你一票，爲什麼能壓你八十張？」溫又說：「我要求把我的名字，從預選名單上刪去！」黃又說：「刪去不好，你不能意氣用事，江青同志不會同意的。她對你是非常欣賞的。」

溫又說：「啊！是這樣一回事呀！她越欣賞，我的票越少。」

黃開懷大笑說：「辯證法，辯證法。」

大會選舉

主席在九大的時候，將黨內歷史上的路線鬥爭，講得很重，已經離開政治舞臺的且不說，就是參加會議的朱德、陳毅等老同志，主席也是口沒遮攔，年輕人（多數是造反派）聽了很新鮮、很激憤。我們這些人，尤其部隊的同志聽了，往往不知所措。但是，主席又強調要把老同志選進中央委員會，根據毛主席既要保證朱德、陳雲、鄧子恢、張鼎丞、徐向前、李先念、陳毅、聶榮臻、葉劍英這些人當選，又不能讓他們得到高票的指示精神，主席團秘書處作出規定：批歸批，選歸選，這樣才能使這些人認識到自己錯誤的嚴重性。總理分頭找人談話，也貫徹這個精神，告訴各大組的負責人，工作一定要過細，哪些人投同意票，哪些人投不同意的票，都要落實到「人頭」，預選時這十位老同志都過了關。但是總理還是不放心，二十四日下午正式選舉，上午總理專門召集了主席團擴大會議，特地講老同志要當選的問題。總理說：老同志有錯誤，不論是文革中的還是歷史上的，都應批判，但是偉大領袖毛主席「團結、批評、團結」的教導也要把握好，特別是這次大會要開成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我們首先要在黨內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這些老同志，可能對自己的錯誤有個認識過程，我們就一批、二保、三看、四幫吧。

散會後，總理把我們幾個留下，心事還是很重，自己輕輕拍著腦門，沉思很久才說：「下午就要正式選舉了，有把握吧（指老同志當選）？」我們說預選通過了呀。總理說：「不見得穩固！青年人不懂得黨的歷史，

不懂得大局觀念，吹一股小風就垮了。你們都是老同志，軍隊的同志原則性強，辦事組的同志威信高，你們馬上給部隊和你們熟悉的老同志再打打招呼，要投那幾個人的票，不然時間來就來不及了。」

吃午飯時，黃、吳、李和我不僅給總參、總後、海軍、空軍、廣州軍區的老同志代表打了招呼，我們也給自己的老戰友打了招呼。黃永勝專門叫了袁昇平，談完以後，袁昇平開玩笑說：「哦，原來不是給自己拉選票呀。」

四月二十四日下午，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正式選舉。

全場設有五個票箱，臺上一個，臺下四個，投票開始了，毛主席第一個在臺上的票箱投票，按照排列，第二個，第三個應當是林總，周總理。但江青在投票的時候，又藉機出一個小小風頭，江青看到毛主席起身投票時，她也站起來了，江青待林總走到自己跟前時，她邁出一步就跟在林總後面了。周總理完全知道江青的習性，還是讓她在林副主席的後面投票了。

投票結束之後，大會休息了約二十分鐘。接著在大會工作人員監督下宣佈選舉結果：一、大會主席團提出的候選名單，全部超過半數以上的票數都當選了；二、毛主席以全票當選為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三、按照以姓氏筆劃的順序，每人得票多少都公佈了。

毛澤東以全票當選。林總少兩票，林彪為了表示不能與毛澤東平起平坐，他自己和葉群投了反對票。周恩來少一票。前面提到的十位老同志全部當選了。從文革開始，到八屆十二中全會，再到九大，主席把這些人的臉皮掃盡了。主席認為把他們選進中央委員會，他們會感謝主席的，其實正相反，彼此結下很大的怨恨，主席去世以後，鄧小平等人否定毛主席的時候，這些人誰也沒有站出來為主席說話。

公佈選舉結果的時候，江青一直在比較注意聽，當宣佈到她自己的票數時，她停了一小會即退席了，以後再也沒有出場，因為中央文革的人得票情況並不佳。江青可能少了八票，張春橋，姚文元各少十餘票，而且有人在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的名字上打了「×」，江青知道後大為震怒，說誰在她的名字上打叉誰是現行反革命。軍委辦事組黃、吳、李、邱得票的情況比他們好，溫玉成可能是少了幾十票。

選舉結果宣佈完之後，林總站起來宣佈，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勝利閉幕！在文化大革命中期舉行的這一次黨代表大會，在國際歌聲中閉幕了。

九大閉幕時給我留下三點難忘的記憶。

一，上海幫的憤怒。散會的時候，張春橋、姚文元、溫玉成等人都是低著頭跟著向外走，他們不像往常那樣，昂首到處張望。在九大選舉時，江青一夥全部當選為中央委員了，但沒有一個得全票的，特別是江青沒有得到全票，他們不得不思考這個問題。

二，高級幹部的議論。九大期間，主席團成員進出大會會場，都由人大會堂東門出入。大會閉幕後，我同蕭勁光、粟裕等一起緩步向東門走去，我們幾個人，邊走邊閒談起來。我說：選舉的中心問題是當選與落選的問題，多幾票少幾票毫無意思。粟裕說：對一般人毫無意思的，對特殊人意思就大了。

三，代表的熱情。九大的代表，自始至終都保持著飽滿的熱情。會場總是表現的熱氣騰騰的景象，對毛主席，幾乎每個舉動都報以熱烈的掌聲。散會時，不少代表走到會場的主席臺前面，要仔細看看毛主席的容顏。毛主席也站起來，數次向大家致意才離開。

在大會閉幕的當天晚上，中央碰頭會議照常進行。四月二十五日凌晨黃、吳回到京西賓館。黃永勝把中央碰頭會議的詳細情況都向我們說了，他說，對選舉問題的最後解決就要看毛主席的態度，我們同他們（指江青一夥）又多結了一個疙瘩。但一反常態的是，在會上唱主角的是張春橋，幫兇是謝富治，江青反而情緒和悅，基本沒有說話。

張春橋說：「選舉中，有人搗鬼。要徹底查個水落石出！不選江青的人，決不是小代表是大代表。這不是少選票的問題，而是一種見不得人的政治鬥爭！」

溫玉成在張春橋提出問題之後，唱了很高的高調。他說：「不投江青同志的票的人，數量雖然不多，但看出了嚴重的問題。這是兩條路線的鬥爭問題，是新的修正主義向無產階級進攻。從大會的選舉可以看出，同修正主義鬥爭是長期的鬥爭！」

姚文元說：「同意徹底查清選舉中的問題，在中央碰頭會議也可以來個大鳴大放大字報大批判。」

周總理向坐在他旁邊的江青說了一句話：「你說幾句嗎？」

江青：「我是受害者，不說話！」

康生接著說了話，他說：「要查選舉中的問題，不是一個簡單問題。毛主席指示，選舉自由。另外，我們實行的是無記名投票，無法調查，這個問題，要向毛主席報告，經主席批准的才能查。這裏還要順便說一個句，什麼新修正主義？這是美國共產黨加在我們頭上的，我們不要去搭理，更不要引用。」

陳伯達：「康老說得好，我們不懂的問題不要自以為是地信口開河。」

溫玉成本來是要唱高調來效忠江青的，江青又不說話，這就夠他難受的，又遭到陳、康兩位理論家的批評，心裏就更難受了。

周總理：「我完全同意康老的意見。不要斤斤計較票數的多少。此事，由汪東興先報告毛主席。在必要時，我還會向毛主席匯報。」

江青一夥對選舉問題表現出來的憤怒情緒，使黃永勝略有不安，他對李和我說：「可能惹禍了，你們看出來了沒有？」

吳法憲補上一句說：「本來就不應當去搞那些事。」

李作鵬一下生氣了，用一種很粗魯的語言說：「在暗角裏說話，嘴巴邦邦硬，現在又屁股稀鬆鬆！」

我也說：「別人少了選票。我們擔憂幹什麼？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閒事。」我的話是有意給黃永勝壯膽。

黃永勝說：「不要埋怨人，也不要諷刺人。好漢做事好漢當！」

江青一夥提出要查選票的事，周總理還是向毛主席匯報了，並得到了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說：「要查選舉中的問題，就讓他們去查吧。我是不參加任何人違犯黨章的大合唱。」這樣，事情算是最後了結了。

四月二十五日下午，我因工作的機會同周總理見面，總理對我說：「你回去同黃、吳說一下，選舉中的問題，主席有指示，已經解決了，不要有什麼擔心。原則問題你們要堅持，在些小的問題上，常常會被別人抓住辮子，要吃大虧的。軍隊也不是百分之百的人都一致的，這次關於的選舉問題就有人同我寫了一封信，揭露了這個問題。但信是寫給我的，可以到此為止。」我將總理上面說的情況，同黃、吳說了，並建議他們兩人在順便的時候，向總理說一下在選舉中的問題，他們同意我的建議。

江青這個人也不是處處胡鬧，對選舉問題，她不僅不表態，還在知道了毛主席的態度之後，反轉來對張春橋，姚文元不指名地進行了批評。她在二十五日晚上的中央碰頭會議說：「在選舉的時候，發生了一點小小的問題，有人過於重視了，這有什麼必要。至於有的人提出，不投我的票是大代表所為，這事是毫無根據的。」

張春橋指的不投江青的票是大代表所為，就是指的軍委辦事組。江青對選舉問題似乎是「公道」的。這是為什麼？原來是康生早就同她說了：「小不忍則亂大謀。」康的意思是：一中全會的選舉才是大問題。江青對康生，基本上能做到「言聽計從」，對大會選舉問題，雖然痛恨在心，但也忍耐下去了。

三人小組

四月二十五日晚，軍委辦事組正在開會，汪東興來電話通知：主席要周恩來，康生、黃永勝立即到中南海主席那裏開會。主席召集周、康、黃開會，並不新奇，但九大剛閉幕，一中全會還沒有開，新的政治局尚未產生，這樣的會就不是一般的會了。黃去開會之前，黃、吳、李和我在一起議論了一會，我們各談了自己的想法和意見。

我們正在談得熱鬧的時候，葉群來了。她一進門就笑笑地對著黃永勝說：「你要去參加組閣了。」她又說：「今天你們要開的會，十一樓根本不知道。怕她干擾組閣工作。今天的會議主要談準備一中全會的問題。可能把政治局的名單初步定下來。」

葉群接著說：「林總說，這屆政治局的組成，比以前都困難。主要是要上的人和可以上的人太多了。」

黃永勝剛要出門，林辦來電話報告：「江青同志來電話要到京西賓館去。」葉群爲了迴避江青，她從後門走了，黃說：「我也走。」

江青來了之後，一看黃、葉都不在，就有點心不在焉了，除了問黃永勝、葉群的去向之外，就談了幾句，她說：「現在大家都是中央委員，這是革命的成果。一中全會就要開了，要產生中央政治局，也就是要產生一個以毛主席爲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關於組織中央政治局的一些原則問題，毛主席已同我商量過，具體情況，現在就不談了。」

黃永勝開會回來，詳細給我們介紹了在主席那裏開會的情況：林、康、周、黃四人幾乎是同時到達了中南海毛主席住處。毛主席首先說了話，他說：「一中全會怎麼開法？我看全會沒有別的議題，就是選舉中央政治局。選舉政治局可以有兩種方法：一是走群眾路線，由下而上的辦法，不提名單，祇提一個數目範圍，這個辦法叫民主，但這又要時間；二是先搞出一個名單出來，爲了避免個人獨裁，還是由恩來、康生、永勝三人先商量一個名單出來。我同林彪同志不參加你們提名單的工作，我們兩個是幕後。」

林總說：「對政治局人選的方針，原則請主席指示，以便有所根據。」

毛主席說：「那祇好叫獨裁，那我們還是五人獨裁吧！」

周恩來說：「一中全會，大約在什麼時候舉行？」

毛主席說：「這個月底之前吧。『五一』好上臺。」

周恩來說：「政治局委員定多少人，請主席定個數字，這對考慮人選有密切關係。」

毛主席說：「我看政治局委員，可以定爲二十五至三十人，多了更難安排，平時開會也不方便。」

周恩來，康生，黃永勝的三人小組，這樣就算是正式成立了。這個小組在毛主席、林副主席直接領導下執行一中全會的籌備工作。

黃永勝堅決不當常委

三人小組接受毛主席的委託後，立即開始工作。辦公地點在中南海內，幾乎同外界不產生任何聯繫。周總理交代：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電話可以接之外，其餘任何地方的電話都不准接。

一中全會之後，我同黃有過一次閒談：

邱：「周、康、黃三人受命組閣也即是黨政軍聯合辦公吧？」

黃：「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這是參與毛主席決定的問題。四月二十四日大會閉幕後，毛主席決定：由周、康、黃組成三人小組，先拉出一個政治局委員、常委的名單。」

邱：「你這個軍委辦事組長參加了，爲什麼中央文革沒有人參加呢？」

黃：「康生事實上是代表中央文革的。」

邱：「你參加了『組閣』工作後，我們曾經議論過，你將是中央常委之一。」

黃：「這也不是沒有根據的。在主席那裏，中央常委曾經定了七個人的名單：毛、林、周、陳、康、黃，還有江青或張春橋等七人。但是我推掉了。」

我真是有點生氣，忙問：「爲什麼呀？」

黃爽快地說：「那麼多老資格，人家會戳你後背。另外，我當了江青也會鬧著當，因此，我不當也不能讓江青當。」

黃說，政治局委員名單的產生是有個過程的，每走一步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難。第一步，號稱工作名單。這個名單不怕大，對需要考慮的人力求一個不落下。毛澤東、林彪、周恩來是當然的啦，其他人，一是上屆中央政治局沒有倒臺的老人：陳伯達、康生、朱德、陳雲、董必武、陳毅、劉伯承、葉劍英、李先念、謝富治、徐向前、聶榮臻、李雪峰等。二是中央文革成員：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三人。三是軍委辦事組成員：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溫玉成等六人。四是各大軍區和軍種，各省市和中央機關可以考慮的人：蕭勁光、許世友、陳錫聯、汪東興等。

第一次上報時就沒有溫玉成，總理和康生對他印象都不好，我沒有吭聲。康生提了王效禹，總理和我也沒有吭聲。我提了汪東興，總理和康生也沒有吭聲。這個上報的名單爲：毛澤東、林彪、周恩來、董必武、朱德、劉伯承、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許世友、陳錫聯、汪東興、葉劍英、謝富治、李先念、李雪峰、王效禹等二十三人。這是一個比較主動的名單，這個名單同毛主席提出的定額二十五至三十人相比較，還有比較大的變動餘地。

黃還說：我開始一點不摸底，我表示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功，應講功勞，但不一定要當選政治局委員，這是爲了主席，爲了大局。康生一聽我的話就火冒三丈。會後總理對我說：「你太不懂了！」不懂什麼？總理也不講。

四月二十六日下午毛主席就看到了上報名單。主席對上報名單基本滿意，祇是在江青的名字上打了一個大叉，加上了葉群。在王效禹、葉劍英的名字下面劃了一個槓槓。後來主席說，我看王效禹就不考慮了。

林總看到名單後，在葉群的名字上面劃了一個大叉，但林總沒有加上江青，這真是神來之筆，可以摸摸主席對江青究竟是個什麼態度。

在三人小組會上，周總理說：「我看到主席、林副主席在名單上刪去的名字，但我們還是要考慮的。我們堅持把這兩個人都列上，這也是從當前的大局來考慮。」總理指刪去的名字是江青、葉群。這樣又加上了江青、葉群的名字。

康生說：「總理的意見是對的，但困難比較大，我們硬著頭皮留下來。」

黃永勝說：「我同意總理和康老的意見。」

在新的名單上，毛主席還是在江青的名字上打了一個大叉，在名單的旁邊寫上李德生、紀登奎的名字。

林總同上次一樣，收到名單即在葉群的名字上打了一個大叉。

二十六日晚上三人小組繼續在一起工作。主要是談論江青、葉群兩人的問題。

周總理說：「整個名單就是江、葉二人的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了，整個名單就定下來了。從當前的情況出發，江青、葉群一定要入政治局。要從政治上向毛主席、林副主席誠懇表示我們的態度。我們三人，明天上午向主席匯報，十二時後向林副主席匯報，爭取在明天，把問題分別談妥。」

二十七日上午十時，周恩來、康生、黃永勝三人到了毛主席住處。周恩來說：「我們誠懇提出江青同志一定要列入政治局候選人名單之內。把她列入固然有一定的政治影響，不列入也會產生政治影響，甚至會產生的更大的政治問題。權衡利弊，我們提議一定要把江青列入候選名單之內！」

毛主席：「你們要那就要吧。不管怎麼說，列上了責任在我身上，就這樣吧。」

周總理等三人接著就到林總家裏去了。葉群接待了總理等三人之後，自動迴避了。

周總理說：「關於葉群同志列入政治局候選人名單的問題，從現實的政治情況來考慮，我們三人認為一定要列入，否則會產生另外的政治影響，請林副主席同意我們的意見。」

黃永勝接著說：「我們剛才到主席那裏去了，對江青列入政治局候選人名單，毛主席基本同意了我們的意見。我建議對葉群的問題，你也要同意我們的意見！」

康生說：「總理，黃總長把我們研究的意見都說了。請林總從政治上考慮，同意我們的意見。」

林總：「無論同意或不同意把葉群列入政治局候選人，我都聽從毛主席的決定。」

最後，在毛主席住處開會。九屆中央政治局候選人的名單定下來了：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葉群、葉劍英、劉伯承、江青、朱德、許世友、陳錫聯、李先念、李作鵬、吳法憲、張春橋、邱會作、姚文元、黃永勝、董必武、謝富治、紀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東興等二十五人。

主席說：「今天下午談兩個問題。一是政治局候選人名單；二是政治局常委名單。」主席接著說：「政治局候選人名單祇好就這個樣子了。有責任由我承擔！」

接著，毛主席、林總、周恩來、康生、黃永勝等五人，在政治局候選人名單上簽了字。

毛主席又說：「中央的領導機構，力求簡單權力集中的原則。政治局常委由五人組成，設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政治局常委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主席毛澤東、副主席林彪。請大家考慮是否合適？」林總、周總理帶頭，一致同意毛主席提出的原則。

大家都同意主席的安排，毛主席最後也說：「我也同意！」臨走時，主席對黃永勝沒頭沒腦說了一句：「你也能統管三軍。」

主席在全會上的講話

四月二十八日下午二時半，軍委辦事組幾個人由京西賓館一起出發去出席一中全會。臨起身之前，黃永勝笑著說了兩句話：「等一會就真相大白了，榜上有名的人，可以自己選自己。」在選舉之前，我同李作鵬也都沒有想到自己也是政治局委員候選人。

九屆一中全會是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河北廳舉行的，會議議程就是選舉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開會時，坐在主席臺上祇有主席和

林總二人，總理當時按照筆劃排列坐在下面，這時主席叫總理上臺時，大家才發現這個問題，大家對總理熱烈鼓掌，肅然起敬，總理這才走上臺去。主席說，九屆一中全會就是選舉主席、副主席、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可以選自己。

不一會，就發選票了，我這時才看到自己名字在候選人之中。選舉很快就結束了，總理宣佈選舉結果：我們主席，當黨中央主席；林副主席當黨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是：主席、林總、陳伯達、周恩來、康生。一共二十一名政治局委員，四名候補委員。所有候選人全部當選。這次選舉江青少好幾票，張春橋、姚文元各少十多張票。由於自己可以選自己，得全票的不少。江青沒有想到自己會少幾張票，心裏很不舒服，但沒有發火也沒有退席，祇是坐在那裏像一塊木頭那樣連動也不動一下。

選舉結束後，就在主席臺前召開九屆政治局第一次會議。陳伯達、康生也坐到臺上去了。新選出的政治局委員全部坐臺下前排。江青邁著慢悠悠的步子，是最後一個到達臺前的。

主席說：「下面是什麼議程呀？軍委怎麼組成？」

總理說：「下面是政治局第一次開會，我們對軍委的組成有個建議名單，四十九人。軍委主席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是副主席，根據毛主席建議原來五位副主席（劉伯承、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還任新軍委副主席，進行實際工作的，還是軍委辦事組。軍委辦事組由十人組成，辦事組增加李天佑、李德生、劉賢權。」

總理剛說完，林總就說：「贊成。」

此時，黃永勝就抓緊時間發放軍委辦事組準備的關於中央軍委委員名單、軍委主席、副主席名單，軍委辦事組成員名單，政治局會議以鼓掌形式通過了上述名單。通過中央軍事委員會的組織機構和人事任命名單，固然在全黨提高軍委辦事組的威信有重要作用，最主要的是向中央文革宣佈：軍委辦事組，是在中央領導下，在毛主席、林副主席指揮下的獨立機構，根本不受中央文革的管轄。在九大之前，中央文革是否存在，沒有正式議論過，江青一夥是力爭中央文革繼續存在。一中全會之後，中央雖未明文取消中央文革，軍委辦事組則從未向他們作過任何請示報告，都在政治局日常辦公會議上解決，軍隊本身的工作，按軍委系統呈辦。

議事日程完後，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又進來開會。主席說：「我沒有話講了。叫別人講嘛。董老，你講幾句，老資格嘛。」

董老招招手表示不講。

主席接著說：

我的話是些老話，就是大家知道的，沒有什麼新話。無非是講團結，團結起來的目的，是要爭取更大的勝利。現在蘇修攻擊我們，什麼塔斯社的廣播，王明的材料，以及《共產黨人》的長篇大論，說我們現在不是無產階級的黨，叫做「小資產階級的黨」。說我們搞一元化，就是講倒退。什麼叫一元化呢？他們說就是軍事官僚體制，按照日本人的話叫體制，按照蘇聯的話叫做「軍事官僚專政」。他們一看我們這個名單裏頭，軍人不少，這就叫「軍事」；還有什麼「官僚」，大概就是我呀，恩來呀，康生呀，陳伯達呀這批「官僚」。所以叫做「軍事官僚專政」。這些話嘛，我看讓人家去講！但他有個特點，他就是不罵我們叫資產階級的政黨，而叫「小資產階級的政黨」。而我們呢，就說他是資產階級的專政，恢復資產階級專政。

主席說：

此外，過去講過的了，就是要準備打仗。無論哪一年，我們要準備打仗。人家就問了：他不來怎麼辦呢？不管他來不來，我們應該準備。手榴彈，到處可以造，各省都可以造。什麼步槍、輕武器，每省都可以造。這是講物質上的準備。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準備。精神上的準備，就是要有準備打仗的精神。不僅是我們中央委員會，要使全體人民中間的大多數有這個精神準備。……人家打來，我們是不打出去的。我說不要受挑撥，你請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來呢，那我就要對付了。看你是小打還是大打。小打就在邊界上打。大打，我主張讓出點地方來。要使全世界看到我們打仗是有理的，有利的。他進來了，我看比較有利，不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他陷在人民包圍中間。至於什麼飛機、坦克、裝甲車之類，現在到處經驗證明，可以對付。

主席又說：

大家要謹慎小心，無論是候補中央委員、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都要謹慎小心。不要心血來潮的時候，就忘乎所以。從馬克思以來，從來不講什麼計較功勞大小。你是共產黨員，是整個人民群眾中間比較更覺悟的一部分人，是無產階級裏面比較更覺悟的一部分人。所以，我贊成這樣的口號，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不贊成那樣的口號：「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沒有苦勞也有疲勞」。這個口號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對立的。你看我們過去死了多少人，我們現在存在的這些老同志，是倖存者。那個時候，江西蘇區，井岡山蘇區，贛東北，閩西，湘鄂西，陝北，經過戰爭有很大的犧牲，老人存下的就不多了，那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多少年我們都是沒有啥薪水的，沒有定八級工資制，就是吃飯有個定量，叫三錢油、五錢鹽、一斤半就了不起了。至於菜呢？大軍所過，哪裏能夠到處搞到菜吃呀？現在進了城。這個進城，是好事，不進城，蔣介石霸住這些地方了；進城又是壞事，使得我們這個黨不那麼好了。所以，有些外國人、新聞記者說，我們這個黨在重建。現在我們自己也提出這個口號，叫整黨建黨。事實是需要重建。

主席最後說：

這次全國代表大會，看起來開得不錯。據我看，是開成了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我們採取發公報的辦法，現在外國人撈不到我們的新聞，說我們開秘密會議。我們是又公開又秘密。北京這些記者，我看也不大行，大概我們把他們混到我們裏頭的什麼叛徒、特務搞得差不多了。過去每開一次會，馬上透露出去。紅衛兵小報就登起來。自從王、關、戚、楊、余、傅下臺之後，中央的消息他們就不知道了。

一中全會散會的時候，會場上的情緒總的來說，是相當熱烈的！會場起立，久經不息地鼓掌，毛主席向左向右數次招手。

主席究竟對九大滿意不滿意？對林彪接班滿意不滿意？從九大當時的情況來看，主席好像是滿意的，但從九大以後主席的一系列做法來看，主席是不滿意的，他可能還是信了蘇修「軍事官僚專政」的說法，認為軍隊上了臺，掌了權。主席通過文革打倒了劉少奇，搞掉了劉鄧的

司令部「彭羅陸楊」，及在各地的「代理人」，劉少奇的權力奪回來了，怎麼又送給了林彪？！其實權力還是百分之百地在主席手上，全國大部分省市自治區的革委會第一把手，都由軍隊幹部出任，這是毛主席自己的決定，這是「三支兩軍」的自然結果，這是主席打倒劉少奇在各地的「代理人」必然結果。而且，雖然全國大部分省市自治區的革委會第一把手都由軍隊幹部出任，但他們並不聽命於軍隊，從不向林彪和辦事組請示工作，而是聽毛主席、總理、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的。但九大以後江青並沒有得到多大實際權力也是事實，這和毛主席的初衷不相符也難說。現在看來，九大以後，對主席是一個機會，「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立即「克己復禮」，落實黨的政策，認真甄別幹部，大搞經濟建設。但是主席並沒有這樣做，不知是主席沒鬧夠，還是江青沒鬧夠，他們又開始鬧林彪，鬧軍隊了。

九大以後，碰頭會沒有了，中央文革沒有了，政治局在總理的領導下，做了大量的工作，當時，張春橋一個時期回上海工作了，江青沒有具體分配重要工作，中央的日常工作是順利的。但好景不長，張春橋回來了，又成立了中央宣傳小組，對政治局的通盤工作影響很大。這時主席開始挖苦林彪（四個偉大討厭啦，締造不能指揮啦，三個副詞啦，等等）——然後是國家主席問題——然後是九屆二中全會問題——然後是拋石頭、搵沙子、挖牆腳——然後是華北會議——然後是中央工作會議（批陳整風匯報會）給黃、吳、李、邱下結論，戴上緊箍咒——然後是南巡，點了林的名，準備在九屆三中全會拿下林彪——然後是「九一三」。「九一三」以後，主席又輕信鄧小平的「永不翻案」，重用鄧小平，繼而批判投降派（實為批總理），等等。主席去世後，鄧小平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繼而毛澤東思想沒了，共產黨沒了，社會主義沒了。主席一生幹的兩件大事，祇剩把蔣介石趕到臺灣一件事了。

江青進入政治局的影響

江青從九大選舉到九屆一中全會選舉，心裏都很不痛快。整天吊著一張臉，好像別人挖了她的祖墳一樣。為什麼？主要有三件傷心事。一是沒有委託她參加中央的「組閣」工作；二是沒有當上政治局常委；三是沒有在一中全會明確宣佈中央文革的存在。

四月三十日晚上，江青通知中央碰頭會議照常開，新選的政治局委員也通知參加，我們是列席碰頭會的「常客」，也如往常一樣，規規矩矩都去開會了。黃永勝原來就是中央碰頭會議的成員，但黃永勝不想去，又不請假，黃永勝說：「現在還開這樣的會，算什麼？」我們勸他說，這樣不好，容易引起毫無意思的糾紛，小媳婦的地位快結束了，多當幾天沒關係。黃永勝這個人，是容易聽人勸說的，他還是開會去了。

今天的碰頭會議，比以前略有不同。江青到會最早，並且是坐在總理常坐的位置上，自己主持了會議。她說：「今天的會是我讓召開的。我要向大家說一個重要問題，現在有人在搞陰謀，一切事情都不告訴我，連電話也不打一個，這是一個嚴重問題。」

在坐的人都知道，她指的「搞陰謀」，就是周、康、黃籌備一中全會的問題。對她的話，沒有人理睬。

江青看到沒人理睬，她接著又說：「你們以為文化大革命結束了，當了什麼委員就保險了？你們的歷史賬還鎖在我的保險櫃子裏，有種的，我們就來較量一下吧！」江青放了上面兩段狂言之後，就走了。江青出去不久，汪東興就得到報告：「來人了！」這是江青進中南海的代號，汪東興立即回到主席那去了。

在場的人知道江青不回來，情緒就變了。喝水，抽煙，說話的都有。周總理完全知道碰頭會已經毫無意義了，他略為考慮了一下，就對著陳伯達、康生說：「散了吧？」他們兩個點頭同意，大家起來陸續都走了。周總理還沒有吃晚飯，就同黃永勝先後到京西賓館來了。

周總理對著黃永勝說：「永勝呀！今天晚上發生的事，還僅僅是開始，後面的文章還不知有多少！」總理在同黃說話時，吳、李和我想走，總理打個手勢：「不要走，一起談談，」我們就坐著聽了。

黃永勝說：「怕倒沒有什麼可怕的，就是纏著總理不好辦事。我的意見，要報告主席宣佈取消中央碰頭會議，改變中央的工作方法。」

五月四日中央政治局全體會議，在人大會堂福建廳舉行。周總理傳達毛主席、林總的指示說：「中央今後的工作班子，由政治局集體領導並由常委主持日常工作。」毛主席點名參加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委員是：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黃永勝、吳法憲、李先念、葉

群、李作鵬、邱會作、紀登奎、李德生。這樣，九大政治局集體領導就實際上取代了中央碰頭會和中央文革。

在九大，林總同江青進行了一場激烈的鬥爭。鬥爭的結果是林總勝利了，江青沒有達到自己的目的。但這種勝利帶來了更大的災難，正是因為這樣，九大後的鬥爭就更為激烈了，進入了白熱化的鬥爭。

黨的九次代表大會，是在文化大革命的中期召開的，政治局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時代特點是必然的。但人們對江青、葉群進入政治局是有議論的。對其餘的人也有不同的意見。但對其餘的人的意見，都容易說得清楚，唯有江青、葉群兩人進入政治局影響很大。人們也知道，葉群是江青的陪襯，論影響，也就是江青進入政治局影響大。

江青、葉群進入政治局，無論從哪一方面來說都是對黨的團結不利，也是無法解釋清楚的問題。尤其對老同志來說，主席的威望相當有損。

那麼，江青進入政治局應當作何解釋比較符合歷史情況？雖然在組成政治局的過程中，負責組織工作的三人小組，自始自終都是建議江青進入政治局的，但這不起決定作用，起決定作用的還是毛主席，不管毛主席願意不願意，沒有毛主席的點頭，江青是絕對進不了政治局的。但是有人認為，毛主席是因為個人因素把江青塞進政治局，這也不對。毛主席不會這樣做，我認為他點頭讓江青進入政治局，還是從文化大革命的角度來考慮的，當然也有主席對今後政治格局的考慮。至於葉群進入政治局，無須多說，她是江青進入政治局的「陪襯」。江青不進入政治局，葉群連邊也沾不上。江青、葉群進入政治局產生了嚴重的政治影響，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宗旨是為人民服務，不為個人謀私利。但九次大會的中央主席、副主席的老婆都同時進入政治局就是大問題了。當然，這個責任在主席，總理也很遷就主席，林彪是沒有什麼責任的。

對江青進入政治局，我沒有聽到一個人說好話，當然也沒有聽到說壞話的。對軍委辦事組的讚譽倒是不少的。九屆一中全會閉會後，我同王樹聲、栗裕、蕭勁光等好幾個人同時從人大會堂河北廳向北門走去。他們熱情洋溢地向我說：「軍委辦事組幾個有才幹又年輕的人都進入了政治局是大好事，很好。」他們的話，對軍委辦事組的工作是承認，同時對我們也寄予更大的希望。

文化大革命產生的重要問題之一就是傷害了廣大幹部，高級幹部除少數之外，幾乎沒有不受衝擊、不受傷害的。但大多數受傷害的老幹部仍顧全大局，對文化大革命出現的偏激和過火鬥爭的錯誤採取原諒的態度，對毛主席還是誠心擁護的，這是我們黨團結的象徵。但是把一些應當進入政治局的人排斥在外，如陳毅、李富春、陳雲、聶帥、徐帥等，反而把自己的老婆塞進政治局，這是不能不使人反感的大事。「老革命吐故了，老婆納新了」。這與七大相比有些相形見绌了。七大時連王明這樣給黨的事業造成極大損失的人，是與毛澤東極其對立的人，毛主席還極力做工作，甚至用補選的方法，把王明和王家祥選入中央委員會，如果九大能把陳老總等人當成「右」的代表選入政治局也是好的呀。還有富春同志，他一直是擁護毛主席的。他是八大的政治局委員，文革開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又當選為政治局常委，把富春同志「劃掉」，也是遺憾。沒有把富春同志和陳雲等人選入政治局，說明毛主席對九大以後，大力抓經濟建設是認識不夠的。當然，林彪、陳伯達起草的關於九大以後應大力抓經濟建設的政治報告被毛主席否定，也就不足為怪了。

進入政治局的人，大多數都得到全黨的擁護。這裏說幾句心裏話，我對自己進入政治局有兩比：與不如我的人或同我差不多的人相比，我心安理得；與應當進入政治局而沒有進入的人相比，我心中慚愧。一中全會之後，我有機會同周總理談到自己進入政治局的感想，我說：「像我這樣的人，當政治局委員對加強中央領導不會有什麼作用。」周總理祇說了一句話：「歷史的必然。」總理沒有作任何解釋，也不讓我說下去，我也就不好繼續說下去了。

九大過後不久，林總思想還是有些壓抑，有一次他對我們說（當著葉群的面）：「葉群當個中央委員就足矣，足矣了。她在軍委辦事組也祇是我的一個聯絡員。你（指著葉群）在外面要謹慎。」林彪講完，我們都沒說話，葉群也沒有說話。在軍委辦事組的實際工作中，雖然葉群的排名在李作鵬和我之前，但葉群很少參加辦事組的會，九大以後幾乎沒參加過。對葉群的安排，還是主席的決定，總理的用心罷了。

從九大的結果來看，毛主席革劉少奇的命成功了，權力卻給了解放軍（林彪）很大一塊，無形成爲了「軍政府」，這是毛主席是始料不及的。外電也是這樣評價和攻擊的，毛主席嘴上在調侃，其實空虛心存疑慮。

以後的事是完全證明了這一點。形成「軍政府」的結果，是毛主席倚靠解放軍搞文革，「爲了打鬼借助鍾馗」的結果，另外解放軍在全國搞三支兩軍，並三結合到地方的領導班子中去了，不少軍隊幹部九大時是以地方革命委員會領導的身份當選中央委員，這個結果是水到渠成的，並不是軍隊要如何如何，三支兩軍工作，在主席和總理手上，在碰頭會，林彪根本沒具體管過。九大以前主席幾次講過要取消中央文革，同時要保留和加強軍委辦事組並代替軍委常委的工作，況且林彪的接班人地位九大是寫進黨章的，形成這種局面，毛主席應該是高興的。主席的不高興，說明他內心並沒有想把班交給林彪。九大以後本應「消停、消停」，但人們的思想反而越搞越混亂，「設國家主席」就是典型一例。尤其毛主席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發現林彪實際上並不支持文革，大部分中央委員實際上並不支持文革，真正支持文革的祇有江青一夥和造反派。這樣林彪的麻煩就來了，黨和國家的麻煩和也來了。

附：《加強後勤工作的戰鬥化》

——邱會作同志在參加全軍戰備會議的各軍區、軍種後勤部長座談會上的講話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同志們：

今天隨便和大家談一點意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三年多了，我們一直沒有開後勤部長會，還是一九六五年開過會，直到現在。同志們對於今後怎麼辦？也提出了意見，已經發給大家看了。海軍、空軍提的一些問題，有的還沒有提出解決辦法，我們以後再研究。關於戰備方面的一些大問題，昨天黃總長已經說過了。我今天主要講講加強後勤工作戰鬥化的問題。

當前，我們全軍的中心任務就是加強戰備，準備打仗。加強戰備，準備打仗，我們後勤要做的工作很多，但一個中心的問題，就是加強後勤工作的戰鬥化。

為什麼要這樣提呢？這是根據我們後勤工作戰時擔負的任務提出來的。我們後勤工作在戰時擔負的任務，首先是保障任務，

就是要保障戰爭的勝利。同時，也有直接的戰鬥任務。現代戰爭是立體戰爭，打起來就不分前方後方，也可能先從前方打起來，也可能先從後方打起來，還可能前方後方一起打起來。我們做後勤工作的同志，首先要考慮是先從後方打起來。因為敵人採取突然襲擊的辦法，很可能首先襲擊後方的城市、交通樞紐。這樣，我們後勤戰線就要擔負直接的戰鬥任務了。但我們擔負直接的戰鬥任務還是為了實現保障任務，對於我們來說，擔負保障任務還是主要的。我們考慮問題要把這個主次關係搞清楚。這就是說，我們主要的任務是保障任務，同時也有直接的戰鬥任務；直接的戰鬥任務還是為了實現保障任務。簡單地說，我們的戰鬥任務有兩方面：一方面是保障任務，另一方面是直接的戰鬥任務。為了完成我們的戰鬥任務，就必須加強後勤工作的戰鬥化。

在現代戰爭中，後勤的保障任務是很繁重、很複雜的，工作是多方面的。概括起來有三方面：一個就是保護部隊的有生力量，保證我們的部隊能夠戰鬥，不至於非戰鬥減員太大。過去在朝鮮戰場上不是有這樣的事情嗎，華東有的部隊一上去，還沒有打仗就減員一大批，大大減弱了戰鬥力。保護有生力量，不僅是醫療衛生工作的問題，也還有其它方面的工作。第二方面的任務就是保障部隊供應。在戰時，不管是前方後方，特別是前方，要保障部隊的吃、穿、用、打。第三方面的任務就是保障部隊「開得動，打得準」。我想，我們戰時的保障任務雖然是很繁重的，是很複雜的，工作是多方面的，但概括起來無非就是這三方面的問題。

從我們後勤的直接戰鬥任務來說，最主要的就是反空降、防空襲。現代戰爭，打擊對方的後方是進行戰爭的主要手段之一。美國對越南就是這樣，它打越南的運輸線、倉庫、機場，等等。所以，一旦打起來，我們後勤戰線必然要直接擔負戰鬥任務。

根據我們的戰鬥任務，遵照林副主席用戰備的觀點觀察一切，檢查一切，落實一切的指示來看我們的工作，還是存在著很大的問題的。我們大家都做了大量的工作，瀋陽部隊更先進、做得更好，但是從戰備的要求來說，我們的工作還差得很遠。我看這裏面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們的工作要從平時狀態轉到戰時狀

態需要有一個轉變過程。全國解放二十年了，這二十年中，有個抗美援朝戰爭，有個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還有一個東南沿海的緊急戰備。抗美援朝戰爭是全國性的，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是局部的，東南沿海備戰雖然華北的部隊、瀋陽的部隊都動了，但也還是局部的。所以解放二十年來，我們的工作基本上是在和平環境下進行的。現在要把全部工作從平時狀態轉入戰時狀態，適應打仗的需要，這就有一個轉變過程。如果我們抓得緊，這個轉變的時間就會短一點，如果抓得不緊，轉變的時間就會拖長。你們的座談我沒有參加，我從材料上看到，現在有的地方感到束手無策，個別地區的同志還有點愁眉不展。這說明什麼問題呢？這說明要從平時轉入戰時確實是個很大的問題。昨天黃總長講的八個問題，基本精神就是一切工作都要轉入戰時狀態。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切不可把它看輕了。第二個原因，我們後勤戰線在全國解放以後，從蘇聯搬來不少資產階級教條，中毒比較深，後來雖然改了不少，但是餘毒未盡。本來我軍後勤工作是有自己的光榮傳統的，可是有些同志學了蘇聯的那一套以後，把我們自己的那一套好的東西丟得差不多了，而且現在習以為常了，你要把它改過來阻力很大。因為習慣了，對那些不好的東西看不清楚了，習慣成自然嘛！我們一定要看到這個問題。有許多的事情辦起來有阻力，大家的看法不那麼一致，這裏面有思想問題，也有習慣勢力問題。比如說，我們要求按照解放戰爭、抗美援朝組織供應的辦法去辦，現在就有點阻力。對於這件事，我們在一九六三年春福州島嶼戰備會議時就提出來了。再就是支援越南的組織供應的形式，我們也是想通過這樣一個實踐來總結一些經驗。因為我們的經驗總結得還不夠好，所以大家對這個問題的認識還不夠深刻。支援越南的辦法就是過去解放戰爭、抗美援朝組織供應的辦法。支援越南是兩條供應線，也是兩條運輸線，一條是從廣西進去的，一條是從雲南進去的。我們在越南的部隊最多時到過××萬到××萬人，主要擔負工程任務、防空任務。這雖然和打仗不完全一樣，但組織供應的形式打仗時是可以採用的。這兩條運輸線的後勤人員，充其量佔出國部隊的百分之十。我希冀廣辦軍

區和昆明軍區後勤部很好總結一下支援越南的經驗，要搞一個比較完整的材料。我們應當承認，支援越南同將來的戰爭情況不會一樣，因為支援越南還是在和平環境，還不是直接的在戰場上，但組織供應的辦法將來還是可以用的。我們現在考慮將來戰時供應的辦法，組織供應的形式，大體上就是採取支援越南的辦法和形式。第三個原因，我們有不少的幹部缺乏戰爭經驗，沒有經過大規模的戰爭生活，對戰爭還沒有感性認識，缺乏經驗。這就要靠總結我們的經驗來教育我們的幹部。解放戰爭幾大戰役後勤保障的經驗，抗美援朝、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東南沿海緊急戰備、支援越南這些方面後勤保障的經驗，都值得好好總結。用這些經驗來教育我們的幹部很實際，容易啟發大家把問題考慮得比較周到些。總之，我們當前戰備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主要原因是：一個是從平時狀態轉到戰時狀態需要一個過程；一個是沒有用我軍後勤的傳統做法，來組織我們的工作。再一個就是幹部缺乏戰爭經驗。是不是這三個方面的原因，供同志們參考。

應該說，經過幾年的建設，後勤戰備工作現在也有一定基礎了。一九六〇年廣州軍委擴大會議以後，我們遵照毛主席、林副主席指示，開始考慮戰備問題，特別是沿海的幾個軍區，過去抓的是比較緊的。華北方面，過去主要是對海了，面向東了；面向北的問題沒有考慮，大家都沒有考慮。東北過去是對朝鮮了，也是面對海洋的，對西面的問題，大家同樣沒有考慮到。蘭州、新疆，過去都是大後方，現在變成了前線。這當然是情況的變化了。

下面我就講一講，怎樣從平時狀態轉變到戰時狀態，也就是怎樣加強後勤工作的戰鬥化，使後勤工作適應戰爭的需要的問題。

（一）首先一個問題，也是最根本的問題，就是要用加強戰備、準備打仗的思想來考慮我們的一切問題。

加強戰備，準備打仗，是全國、全軍的中心任務，當然，也是我們後勤戰線的任務。我們要把準備打仗的思想貫徹到我們整個工作中去，首要的問題，就是要政治掛帥。我們全軍後勤戰線的同志，都要進一步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學習林副主席指示。學習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最重要的就是要活學活用。要用毛

澤東思想建設後勤，把毛澤東思想和後勤工作的實際結合起來。祇有這樣，才能使毛主席教導、林副主席指示在我們後勤戰線發揮威力。學習理論如果不同自己的實際聯繫起來，那就學不通，也學不到手，這個道理我想同志們是知道的，都很清楚的。積極分子代表的名額，後勤戰線佔的人不少，後勤戰線的好人好事很多。應該說，全軍後勤戰線，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突出無產階級政治，是做得不錯的。現在出現了一種新的情況，就是對後勤工作厭惡的情緒比較少了。過去，提到後勤，有的人總是搖頭，不大感興趣。現在這種情緒是不是大大減少了？在我看來，這幾年有很大的轉變，很大的變化。現在，後勤工作在部隊的地位提高了，就是我們的工作比過去做得好了一點，突出政治，為部隊服務，做出的成績大一點的結果。不然為什麼過去討厭你，現在不太討厭了呢？為什麼有好多部隊，對後勤的同志很歡迎呢？

我們後勤工作本來就是為部隊服務的。可是，有一個時候，特別是全國解放初期，我們搬了別人的好多條條框框。這些不合理的東西，歸結到一點，就是不為部隊服務，把部隊卡的很死，管的很死，沒有群眾觀點。現在發揚了我軍的光榮傳統，為部隊服務，關心部隊廣大指戰員的生活、工作，為他們服務。過去和現在的變化，歸結到一點就是這個問題，請同志們考慮對不對。

我到總後整十年了，頭幾年聽到的總是後勤和人家對立的比較多，就是同黨委對立，同部隊對立，黨委不歡迎，部隊不歡迎，搞的很孤立。為什麼呢？原因很複雜，但從思想上考慮，從方向上來考慮，就是為部隊服務不夠，或者服務得太少。我們按照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全心全意為部隊服務，做得好了一點，就受部隊歡迎嘛！所以，要轉變我們的工作，首先就是要用毛澤東思想掛帥，用毛澤東思想來建設我們的後勤。當前，用毛澤東思想建設後勤，最中心的問題，就是要準備打仗，為戰爭服務，為部隊服務，我們要在這個总的思想指導之下，遵循偉大領袖毛主席光輝的《五七指示》，林副主席對後勤工作「四個加強」的指示辦事。這兩個指示，是我們後勤建設的方向，方塊字什麼時候都

不能丟。貫徹執行這兩個指示，有兩條具體方針：一條就是「黨委當家，全軍辦後勤」，第二條就是「軍民結合，全民辦後勤」。抓住這兩個指示做為我們的思想武器，用這兩條具體方針貫徹這兩個指示，就能使我們的後勤工作更好地為部隊服務、為戰爭服務。同志們考慮，這樣個說法對不對？

執行「黨委當家，全軍辦後勤」這個方針，就從根本上改變了同黨委對立、同群眾對立這樣一種情況。從我們後勤工作來說，我們什麼時候都要掌握為部隊服務、為戰爭服務這個方向。從我們為部隊服務的具體思想來說，就是過去我們提過的，要勤懇辦事，勤儉辦事，勤巧辦事。

「軍民結合，全民辦後勤。」這是瀋陽的同志創造的。這個方針提的很好。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戰略思想是人民戰爭。打人民戰爭當然有前方的問題，但是從數量上來說，很大一部分是一個支援戰爭的問題。解放戰爭中有多少支前委員會啊！我們後勤工作，無論在物質上，運輸上，救護傷病員上，技術保障上，都要依靠人民。這個問題，過去我們考慮的不夠清楚，這個觀點不鮮明，瀋陽的同志提的好。

這是我提的第一點意見：就是在我們後勤工作中，首先要實行政治掛帥、毛澤東思想掛帥。

(二) 物質準備的問題

毛主席教導我們，準備戰爭，一個是精神準備，一個是物質準備。精神準備是主要的，物質準備是重要的。從我們後勤工作來說，搞好物質準備是一個重大的問題。我們的物質準備就是為了能夠保證前線部隊取得戰爭的勝利。當然，我們的物質準備要建立在國家的經濟基礎之上，也就是說，建立在國家工業、農業、科學技術發展的基礎之上。國家沒有東西，我們自己這一點東西算什麼呢？所以我們考慮問題一定要有全局觀念，不可以祇從局部利益出發。如果我們的戰備工作與整個國家經濟建設發生矛盾了，在很大的程度上我們要為國家經濟建設讓路。因為國家經濟發展是一個長遠的問題，當然我們搞戰備有問題是當前急需解決的。這個問題就要看需要與可能，需要是需要，但是國家不

可能，或者滿足了你今天的需要，明天他就沒有了，那我們是考慮今天的問題，還是考慮明天的問題？當然主要還是考慮明天的問題。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整個國家的經濟也是為戰爭服務的。比如，明年的國家計劃提出了三個第一：首先是國防生產第一，第二是三線建設第一，第三是工業生產配套第一。這就說明國家對整個國防建設是非常重視的。我們具體考慮問題的時候，就要從長遠來考慮。這就是我們要有全局觀念。昨天晚上我講國防工業問題時，就講了一個洛陽機械廠的例子，它是礦山機械廠，要他那個廠子明年生產××門三七高炮，如果這××門高炮一起加進去，那不僅這××門高炮沒有了，礦山機械也沒有了，那我們怎麼辦呢？那就應當讓這××門高炮讓路，讓礦山機械上去。沒有礦山機械，基礎工業怎麼上來呢？高炮固然要緊，那你去多××門、少××門總還是個小事吧，無非是多少的問題嘛。我們應當有全局觀念、國家觀念。不僅要顧今年，更主要的是要顧明年。有了國家的經濟基礎，我們的國防力量就加強了，就有保障了。我們考慮問題要有個前提，一句話，我們總不要因為眼前利益而妨礙了國家經濟建設，我們要顧大局，有了大局就有了我們的小局。大河裏漲水小河裏滿嘛！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點，就是在國家物質基礎許可的條件下，我們要盡可能多地儲備一點東西。這裏面最中心的問題就是要用最大的努力來建設倉庫。當然，這裏有投資的問題和材料的問題，這個問題不很大，一般的可以滿足，沒有材料可以先打洞嘛。還有一個勞力的問題，主要還是依靠群眾，依靠民兵，不要老打部隊的主意。現在有好多民兵工程團技術是很高明的，現在國防工業有很大一批是民工建設的。在湖北有一個五一三三工廠，規模相當大，建設速度很快，就是民工建的，今年「七一」開工，明年「七一」就試產，所以同志們不要老打部隊主意，主要還是民工。建設倉庫主要要考慮防空襲，當然也要防空降。

第三點，就是「藏糧於民、藏富於民。」也就是「軍民結合，全民辦後勤」的問題。這個問題要考慮兩個方面，一個方面，首先是要軍民結合，把軍用民用結合起來。目前，大多數地方不能光

搞軍用，離開民用。比如糧食，大部分都送到山溝裏去了，你要不用，又怎麼運出來呀！所以還是從軍民結合這個問題來考慮。當然「三北」地區有些地方首先儲備一些物資，無非是糧食吧，彈藥吧，鹽、蔬菜吧。有重點地區，根據作戰方案要堅守的那些地方，重點地儲備必要的東西。現在全國總不能把糧食都送到山裏去呀，都送到山溝不打仗怎麼出來？所以，要從軍民結合這樣一個思想出發，按照作戰方案，有計劃地重點地解決這個問題。這是一方面。第二個方面的問題，就是要用很大的力量去加強全民辦後勤的問題。為了實現全民辦後勤，特別是按照我們的作戰方案預定的一些戰場，那些地方是將來部隊集結的地方，那些地方是部隊要堅持的地方，對這些地方從現在起就要有計劃的加強。比如說，派醫療隊下鄉，就可以下到那些地方去，把農村的合作醫療制度搞起來，幫助地方培養一些醫生，培養一些護士。比如說，加強那些地方的加工能力，機械加工，糧食加工。比如說，加強那些地方的農業生產，支援農業。一句話，要依靠群眾，首先我們要幫助群眾。前些時候，我看了六十四軍一個材料，他們在本溪的一個地方搞「軍民公路」、「軍民大寨」，就是幫助當地群眾搞起來的。

(三) 加強後勤部隊建設的問題

這個問題值得我們重視。無論在平時，在戰時，後勤部隊都相當大的。後勤部隊都是專業性的，無非是醫院、倉庫、汽車部隊、工程部隊、修理部隊吧。對這些部隊的建設，首先要考慮的，就是要適應戰時的需要。就是要用保障戰爭勝利這樣一個觀點來建設部隊。舉個例子來說，醫院，現在全軍都講醫院少，都要建醫院。那麼我們建醫院的重點應放在什麼地方？我考慮應當放在部隊。應當適當擴大師的醫院，其次就是野戰醫院。這樣才能平戰結合，平時自己能夠解決問題，戰時能跟著部隊走。我們再也不要去搞又是野戰醫院，又是駐軍醫院，又是中心醫院，又是總醫院那一套了。現在有好多地方提出來總醫院怎麼辦？我說，到了打仗的時候上前線，這就是辦法。醫院過去分這個科，那個科，結果又都不行，分什麼科呢？過去解放戰爭期間，一個

俘虜來的醫生，帶上幾個文工團員，幾個炊事員，這就是個醫院，就是個收容所。那個時候可憐得很，一個師、一個軍也不過一兩個醫生。又比如說，修理機構，是建修理工廠，還是建修理分隊？修理工廠是要的，像海軍、空軍要一點，不然解決不了問題。但大量的，還是靠部隊的修理機構。那天我聽了海軍十一支隊的發言，那個材料很好，很能夠說服人。像海軍還是建十一支隊那樣的修理機構，還是統統都建大船塢，這是個方向問題。至於軍械修理廠，汽車修理廠，照我的觀點，關了門是最好。你還建修理廠，打仗的時候，把坦克、汽車拉到後方來修？修好了再去打仗，根本沒有這個可能。這都是和平環境下搞起來的。我們應當重點建設修理分隊，他能跟著部隊走，他自己能修理。我們現在有的修理工廠，主要的任務要成為修理分隊的後方，要供應部隊零配件。再說我們的倉庫，應當成為供應部隊的勤務分隊，它應當既能收，又能存，又能擔任部隊的供應。倉庫這支部隊，在我們後勤量很大， \times 百個倉庫， \times 萬人，應當說是 \times 萬供應部隊。我們要這樣考慮，才能適應戰時的需要。

我們建立勤務部隊是很需要的，是很大量的。抗美援朝時，入朝部隊是 \times 百萬，後勤部隊就有XX萬。這樣大的後勤部隊，就是要擔任戰鬥任務，不然，要後勤部隊幹什麼呢？它應適應戰爭的需要，這就是個轉變。過去我們倉庫，好像老和尚看廟一樣的，那就不對。其他的部隊，工程部隊，汽車部隊，都有個適應作戰需要的問題。

其次，要搞好勤務部隊的訓練，使之熟練業務。什麼都不懂，怎樣執行任務呢？昨天黃總長說了，要加強軍事訓練。他講的軍事訓練當然是廣義的，包括戰術、技術、業務，都要訓練。

再一個就是培養幹部的問題。勤務部隊的幹部要培養，總的方針，黃總長都說了，就是兩條腿走路。一是開辦各種各樣的訓練班，各種內容的學習班，你們自己辦；其次，總後還有六個學校，四個醫人的，一個醫馬的，一個工程技術，就這六個。我們考慮，大部分學校明年下半年招生。招生採取兩個辦法，一是都招部隊的，二是代訓，你們送什麼樣的人就訓什麼，將來都回

去。當然，總得留一點吧，一百個人留一、二、三個，不然學校就辦不下去了，無非是百分之一、二、三嘛！至於還有什麼學制、教材問題，主要是我們來辦，也要同志們一起來辦。這是第三點。

（四）加強裝備管理問題

武器裝備和軍需裝備兩方面都有向題。我們武器裝備的狀況怎樣呢？一個是很雜，一個是很老，一個是很少。「雜、老、少」。現在我們的裝備，除了步兵武器比較規格化以外，其它的裝備還是比較雜的。拿汽車來說，幾朝元老都有，蘇式的、美式的、我們自己的。再一個就是很少，少得可憐。這裏特別要講講汽車的問題。現在運輸車還需要××輛，我們倉庫有多少？祇有××輛車。就那麼個家當。明年國家準備生產××輛運輸車。××輛，我們得個四分之一就了不起了，要是戰鬥緊張點，就給一半，××輛，明年也祇能解決部分問題。牽引車我們還少××輛。這××輛怎麼解決呢？準備進口一部分，現在訂了合同的是××輛，但交貨時間還很長，有的是明年，有的是後年。還準備再訂一部分，準備進口××輛，這個週期也不會短，賣不賣給我們還是一個問題。明年我們生產××輛，少得可憐，主要是給我們的，還給廠礦一些。再一個就是小車，現在要補足缺額××輛，國家明年出產××輛，準備給我們一半，這個明年就有希望了。軍需生產，情況比較好一點。當然還有規格的問題，質量的問題，我們還要努力。軍需生產今年的計劃能完成百分之一百零一點五，比去年超產百分之五十二。同一九六六年比，幾乎超產一倍，生產是不錯的。看起來，很有希望，軍需生產戰線的革命職工。經過文化大革命，精神面貌是比較好的。

解決裝備問題，第一，還是要重點解決問題，不要「撒胡椒面」。要集中力量，重點解決一個部隊的問題，兩個部隊的問題。辦事情總是要分先後，分輕重緩急。這個問題，黃總長昨天晚上都講了。第二，要解決零配件。軍隊一定要擔任零配件的生產任務。現在的修理工廠，一定要轉過來。這是個全局的問題。因為國防工業工廠要大量生產零配件，就要減少生產成品。所以部隊自己要以最大的努力來解決零配件問題。第三，解決修理部隊的

裝備問題。按我們企業部提的計劃，明年可以多解決一點問題，可以裝備得更好一點，主要的東西基本上可以裝備起來。再一點，要教育我們的部隊愛護裝備，一槍、一彈、一雙鞋、一雙襪子都要愛護。

(五) 戰時的交通運輸問題

這是保障部隊供應、保障部隊開得動的關鍵性問題。從全軍的戰備來考慮，這個問題我們還沒有理出一個頭緒來。現在我提一提，我們各個軍區，自己能夠考慮的問題，一定要考慮。大的問題是國家的問題。比如說，戰時如何保證鐵路通車，這就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朝鮮戰場有多少公里鐵路，用了×個師，才勉強保證通車。將來打起仗來，國家鐵路怎麼保護，這是個大問題。現在各區要做的有那麼幾件事：第一，要掌握各種運輸條件，要搞清情況，鐵路、公路、水路等都要掌握資料。同志們要重視水運，水運是最保險的，打不爛，炸不斷，比公路、鐵路都保險。第二，要考慮整頓交通運輸的組織，使之適應指揮戰時運輸。過去軍事運輸是屬於司令部掌握的，現在屬於後勤部系統了。應當研究一不同後勤分部、辦事處怎樣結合起來。交通運輸指揮是個好大的問題，弄得不好就癱瘓了。我們後勤沒有交通運輸系統，那還有什麼戲唱呢？那什麼也沒有了。軍事運輸部門的工作搞得是不錯的。今年的運輸量是抗美援朝戰爭結束以來最大的一年，任務完成得很好，這與全軍都有份。但裏面還有點問題，主要是指揮系統要加以整頓，加以改進，使它更加適應戰時的需要。你們各軍區也有這個問題。第三，就是戰時怎麼掩護交通運輸的問題。這個問題後勤本身解決不了，但我們應當考慮。總之，就是管後勤的同志決不要忘記：交通運輸是我們保障供應、前後聯繫的中心環節。打起仗來，總有個前方後方，後面的東西要上去，前邊的傷病員要下來，通過什麼東西呢？就要靠交通運輸這個環節。朝鮮戰爭的時候，美國人說我們搞「禮拜攻勢」，祇能打一個禮拜的仗。這還不是當時沒有運輸條件，東西送不上去！

(六) 科學研究，技術革新問題。

應當說，加強科學研究和技術革新，是提高我們的保障能力，提高業務工作的質量，提高生產力，提高為戰爭服務、為部隊服務的水平，很關鍵的一個問題。第一，同志們要看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第二，要有計劃有目的地去解決我們當前存在的問題。比如從地區來說，北方主要解決防寒問題。南方無非是解決防暑問題，高原地帶要解決能夠生存的問題。從各行各業來說，既有共同性的東西，又有自己需要解決的問題。第三，要解決這些問題，一定要走群眾路線。專業技術人員一定要同部隊廣大指戰員相結合，一定要同生產相結合，不然就搞不出名堂，解決不了什麼問題。第四，對技術革新要有計劃地穩步地推廣。你們參觀了技術革新展覽，那裏面有很多好東西，但是怎樣用於部隊，怎樣推廣，還是個很大的問題。一定要很好地解決這個問題。

（七）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問題

這個問題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部隊本身的，一個是同國家有關的。軍隊本身的問題，我們應當有計劃有步驟地改，因為它不合理，束縛我們的業務、束縛生產力嘛。像軍隊的在編職工，在定額之內，就可以逐漸改為戰士。部隊的伙食標準，對國家影響不大，在不降低部隊現有生活水平的前提下，我同意象瀋陽軍區那樣自己先改。凡是軍隊本身的問題，對國家沒有影響或影響不大的問題，我們就可以改。國家有關係的，那應當是國家統一改的問題，我們不能馬虎。比如工資改革，是個很複雜的問題，不等國家統一改革，我們就不能改。職工家屬的醫療問題，也是同國家有關係的，如果我們解決職工家屬的醫療包干問題，就是鼓勵農村人口入城市，所以我們考慮問題不能那麼簡單。總之，對於不合理的規章制度，我是贊成改的，不要讓它把我們的手腳捆得死死的。但是在改的時候，一要考慮國家的情況，二要考慮我們軍隊的歷史，三要不降低部隊的生活水平。在這樣的前提下，你們盡量想辦法改，改的越徹底越好。

（八）農副業生產和軍辦工業的問題

黃總長昨天講了，明年的生產不得少於今年，有條件的還要提高，由各軍區自己辦。軍隊搞農副業生產，不單總是一個住產

問題，而是貫徹《五七指示》的一個方面，是辦好毛澤東思想大學校的課程之一。我們要從這個意義上來理解，不然，就成了消極的東西。應當承認，搞生產與戰備有一定的矛盾，但是組織得好，就不會有多大的矛盾，就可以統一起來，這個問題由各軍區自己安排。大家提的指標，我看還是積極的。但是，要抓緊，如果搞得不好，那就是《五七指示》不能落實的問題，是有責任的。當然《五七指示》不僅是生產問題。今年增加兵員，就已經考慮到部隊調防，考慮到生產問題，我們再搞不好，就有問題了。

發展農副業生產的一個中心問題，是搞好農田基本建設，提高單位面積產量。從我們現有土地來看，不應當產那麼一點糧食。全軍有 \times 百 \times 十萬畝耕地，其中水稻地 \times 百 \times 十多萬畝，好的旱地 \times 百萬畝左右，比較差的祇有 $\times\times$ 萬畝。如果畝產能提高到四百斤，那就是 $\times\times$ 億斤，可是現在祇有 $\times\times$ 億斤。如果提高到五百斤，就更多了。這是完全可能的。昨天報紙報道石家莊有一個大隊，平均畝產一千斤。昔陽縣是平均畝產八百斤。這都是土地較差的地方。要提高單位面積產量，就要加強農田基本建設，加強管理，希望同志們好好考慮。

關於軍辦工業的問題，首先是要辦，但是，它應該是為部隊的農副業生產服務，為部隊的生活服務，為保障部隊供應服務。這是主要的。同志們還提到軍隊的工廠、農場可不可以招職工的問題。我看招少數專業人員未嘗不可，但這不是方向。軍隊兼農、兼工嘛！如果都搞成職工，那不就改變性質了，變成國家工廠、民辦工廠了，何必要軍辦工廠呢？我們應當充分發揮軍隊本身的作用。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部隊生產的糧食、節餘的糧食，大部分要交給國家，進國家的糧庫，或者乾脆頂口糧。有的邊防部隊，或運輸不方便的地方，就可以自己搞點加工機械，自己種自己吃。現在我們一年生產 $\times\times$ 億斤糧食，可是交給國家的並不多。現在，又創造了「中曲」發酵飼料，用糧食當飼料的就少了。如果生產的糧食不入國家的倉庫，就必然造成很大的浪費。

(九) 節約鬧革命的問題。

節約鬧革命，這是我軍的光榮傳統，什麼時候都要注意，不能丟。特別是搞戰備，更要注意，不能大手大腳，像舊軍隊一樣，「槍炮一響，黃金萬兩」。

現在各軍區、軍種、兵種共有節餘款××億元，這個錢我們一個也不要。我們早就有這個觀點，希望你們有點錢，有點錢好辦事，你們不會浪費。你們管好，還是我們管好？還是你們管好。廣州軍區發個電報要上交二千萬，他自己的存款是九千萬到一億。我們還是不要，你們管著好。我當了十年後勤部長，大概做了三件事：第一件是搞備戰，一九六〇年開始；第二件是搞吃的，就是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第三件就是用毛澤東思想建設後勤，包括改革規章制度。過去把你們管的死死的，左一個制度，右一個預算，你們沒有就向我們伸手。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九六三年後勤工作會議，同志們都說那次會開得好。究竟好在那裏？我想來想去，就是給了二千萬預備費。過去，要出差費可真了不起，一下就是多少百萬，多少千萬。以後包干了，少了不增加，多了不上交，就是那麼多錢，都分給你們管，把責任、權力都交給你們，就管好了。到一九六五年就大有節餘。這幾年你們都不向我們要錢了。你們管，浪費不了。如果浪費，就不是錢的問題了，就是政治問題。

節約的問題，首先還是個政治掛帥的問題。從業務上說，主要是抓好四件事情：一是要抓重點。經費物資是有限的，那個該辦，那個不該辦，那個先辦，那個後辦，應該有個統籌安排，抓住重點。這樣才能充分發揮有限的錢和物資的作用，辦更多的事。二是要有計劃。後勤工作，要錢要物的工作，不能沒有計劃。沒有計劃就會造成浪費。三是要有制度。經濟工作要有制度，國家有國家的制度，軍隊有軍隊的制度。四是要勤於檢查，要不斷發現問題。

（十）工作作風問題。

工作作風很重要。工作作風是工作方法，也是思想方法，是個世界觀的問題。這個問題毛主席、林副主席有許多的精闢論述，同志們應當好好地有針對性地帶著問題學。特別是在戰備情

況下，更要注意工作方法，更要改進工作作風。這個問題我著重提三點意見：

一是工作要統籌安排，抓住重點。不要顧此失彼，也不要平均對待，一個時候要著重解決一個什麼問題，這是要首先考慮的，各行各業，各個部門都要解決這個問題。

二是要注意總結經驗，以點帶面這個問題，有些軍區是很注意的，開了許多現場會議。各個軍區，各個軍種、兵種都要注意這個問題。群眾創造了許多好的經驗，你就要注意總結，注意推廣。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就十分注意典型經驗，重視以點帶面。我們要學習好毛澤東思想，學好林副主席指示，要按毛澤東思想辦事，要用毛澤東思想武裝我們的頭腦，就是要通過總結經驗。不通過總結自己的經驗，毛澤東思想就進不了我們腦子。我們要用毛澤東思想統帥一切，真正發揮毛澤東思想的統帥作用，就要聯繫實際；聯繫實際，就要通過總結經驗。所以總結典型經驗，我們要特別引起注意。

三是要深入實際，實行面對面的領導。上面的同志要下去發現問題，幫助下面解決問題。毛主席教導我們：「以後幹部要分別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要堅持群眾路線，遇事多和群眾商量，做群眾的小學生。」你不到下面去，呼吸不到新鮮空氣，接觸不到新鮮事物，腦子就空了。經常到下面去，有了實際，看問題就比較深刻，指導工作就比較有力，講問題就比較有道理。今天我說的這些意見就比較一般化了。因為文化大革命三年多了，基本上沒有和同志們接觸過。近兩年管後勤業務也很少，許多事情不如過去那樣熟悉了，就說不太清楚。

剛才張令彬同志提到，有的軍區的同志對工廠管得還不夠好，希望你們下點本錢，下點力量，把它管好。有的同志問軍需工廠將來怎麼佈局，這個問題我們還沒有更多的考慮，整個國家的大工業，國防工業的佈局，都還在考慮。所以軍需工廠的佈局怎樣適應戰時需要，我們把它放到以後考慮，同志們也不要催。同時，軍需工廠疏散也比較容易，反正機子搬到那裏都可以生產。現在還是先揀大的事情辦。

第三十二章 廬山戰火

不設國家主席目的就是不给林彪留位子

早在一九六八年三月「楊、余、傅」事件發生以後，汪東興就和我們走近了，過去他還擺點「高高在上」的小架子，九大以後他就完全和我們站在一起了，我說的站在一起，是指對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一夥而言的。

一九七〇年三月八日晚上，在人民大會堂召開政治局會議，會議由周總理主持，其主要內容是聽取汪東興傳達毛主席的指示，汪是專程從武漢（主席當時在武漢）趕回來的。汪說：「毛主席考慮要開四屆人大了，請總理和政治局的同志們研究一下，九大召開一年了，『鬥批改』正在進行，有些政府機構可以考慮邊整改邊恢復。主席還說，戰備問題也要研究一下。……」

接著汪東興還是說主席的指示：「召開人大就有一個修改憲法的問題，可以成立一個修改憲法的小組。這裏必然涉及到國家主席的問題，國家主席要不要，我的意見是不要。如果大家認為一定要，我是不當這個國家主席的，那麼誰來當呢，祇有林彪同志來當。」主席要改變國家體制，而且是和全世界都不同的國家體制，這麼大的事先沒有和林彪、周總商量，更沒有讓政治局拿出幾個方案，供他決斷。

我清楚地記得，在汪東興說「不設國家主席」的時候，總理有點愕然，他抬頭看了一下汪；當汪說到「祇有林彪同志來當」的時候，總理看上去有些欣慰的樣子。我當時的認識是：主席對林彪這個接班人很關心，很周到。其實，我的想法和主席的打算相差十萬八千里。散會時，汪還真有些餘興未盡的樣子，對著葉群、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和我說：「走走走，時間還早，到我那裏再坐坐。」我們都欣然同意了。

在汪東興家裏，大家開始也是扯亂談。後來，吳法憲又請汪去核實剛才在會上講的「要設國家主席，毛不當，要林彪來當」的話，汪東興很認真地又重複了一遍，聽後大家都很高興。我們要起身走時，汪說：「不要著急，搞點東西來吃。」不一會，工作人員端上兩盤子紅薯，吳胖子和葉群吃了，我沒有吃。我說：「我一看見紅薯胃裏就反酸水，給我們吃碗麵條也好。」汪說：「你嘗嘗就知道了，甜得很。」

三月八號的政治局會議以後，立即成立了兩個小組，一個小組負責修改憲法，由康生、陳伯達、張春橋、吳法憲、李作鵬、紀登奎組成；一個小組負責組織會議的工作，由總理、黃永勝、張春橋、謝富治、汪東興組成，由總理抓總。因為我當時主管援越、援阿（爾巴尼亞）、援羅（馬尼亞）的具體工作，任務很重，兩個小組的工作我都沒有參加。

三月中旬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討論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的問題，主要是確定參加會議的人員，同時也討論了修改憲法工作小組請示的幾個問題。討論的都是一般性的問題，比如新的憲法要比一九五四年的憲法大大壓縮，要短。並且要求修改憲法工作小組月底要拿出草稿來。會上沒有討論設不設國家主席的問題，更沒有要討論誰當國家主席。

林彪知道了毛主席的意見後，立即表示：我認為國家主席還是要設，並由毛主席擔任國家主席，林讓秘書給毛主席那裏打了電話，但主席並沒有正面表態，祇讓秘書打電話問候林彪。四月十一日，由林彪口述，秘書記錄後向政治局提出了他的三條意見：1、關於這次「人大」國家主席的問題，林彪同志仍然建議由毛主席兼任，這樣做對黨內、黨外、國內、國外人民的心理狀態適合。否則，不適合人民的心理狀態。2、關於副主席問題，林彪同志認為可設可不設，可多設可少設，問題都不大。3、林彪同志認為，他自己不宜擔任副主席職務。

三月八日，汪東興傳達的毛主席不設國家主席的意見，政治局一致同意了，這種同意是擁護毛主席的慣性，大家並沒有深想。現在林彪的意見來了，總理在政治局會議上唸了，大家又都同意林彪設國家主席並由主席來擔任的意見，包括江青在內。我現在都認為，林彪的意見是正確的、中肯的，是維護黨和國家根本利益的，也是對毛主席「不設國家主席」的不妥想法敢於提出自己不同意見的，在「國家主席」的問題上，不是毛、林之間有什麼分歧，而是毛和大家的意見相左，林和大家的意見

是一致的。現在想看來，林彪很快就提出自己的意見，是他知道毛提出讓他當國家主席未必是真心，就像開九大時主席讓林當大會主席團主席是一個樣的，林考慮問題是深思熟慮的，他不願讓主席牽著鼻子走，更何況林的身體根本當不了國家主席。

主席很快就對林的建議（政治局同意林彪意見的報告）作了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議不妥。」是設國家主席這個體制不妥呢，還是讓他當國家主席的建議不妥，主席自己也沒講清楚。

葉群告訴我們，林提出三條意見後，大概是四月二十五號，主席在路過蘇州時，林和葉還到專列上去看了主席，讓主席住下，並給主席騰出了林住的南園賓館的房子，主席說不住了。他們交談得很好，主席還對林說起黃、吳、李、邱，並大加讚揚說：我就是信任這幾個跟我南征北戰的紅小鬼。那天正好我國的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葉群讓主席聽了人造衛星上的《東方紅》樂曲錄音，毛主席很高興。他們之間沒有再提起有關國家主席的事，既然毛不同意林的意見，當面卻不說。

可是，時隔不久，毛主席在政治局會議上表示他不當國家主席，主席還講了一個典故，大意是：三國時孫權勸曹操當皇帝，曹操說孫權是想把他放在火爐上烤，我勸你們不要把我當曹操，你們也不要做孫權。主席講完以後大家都笑了，我當時的理解，一是主席很謙虛，二是主席雖然又上了一線，但他還是不想當國家主席，不想當國家主席的原因是不願管具體事務，願意多考慮重大問題，具體工作由林彪和總理擔起來，一個當國家主席，一個當總理。現在想起來，我的意見真是幼稚可笑。其實主席講的這個典故，還是說他不當國家主席，並沒有說不設國家主席。我清楚地記得，主席雖然提出不當國家主席，不設國家主席，但後來主席也說過，叫董老當，叫陳永貴當，叫工農兵當等等。不設怎麼當呢？！總之，在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上，主席的態度也是多次反覆的。

五月中旬，軍委辦事組去向林彪匯報工作，當扯到國家主席問題時，林彪說得非常中肯，他說：「國家主席還是要設的，但祇能主席來當這個國家主席，我們這麼大的一個國家，沒有國家元首是不成的，名不正，言不順嘛。」我們提到毛主席的意思是林彪可以當國家主席時，林彪立即說：「這種話你們不能在我這裏說！我不能當這個主席，你們以後也

不要再提，還是我們的毛主席來當。我身體不好，出個門都要下好大的決心，如設副主席我也不能當。」

當時我們幾個對設國家主席的問題，根本沒當成什麼了不起的事，雖然，此期間主席也提出過不設國家主席，他也不當國家主席的意見，但我們並沒有認識到主席的心思，汪東興三月八號的話給我們印象很深，誰當國家主席也沒感到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毛主席當很正常，毛主席不當也沒少了什麼；毛主席不當，由林彪來當也很正常，也沒覺得林多了什麼，因此主席怎麼說都認為是他的謙虛。林彪則不然，主席的心思林彪很快就明白了，主席說不設國家主席，主要是不想讓林彪當，不設國家主席目的就是給林彪留位子。

總理在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上，是費了苦心的。七月上旬，總理召開政治局會議，傳達了主席的指示，主要是準備召開九屆二中全會，召開四屆人大和修改憲法的事。會後中央發出《通知》，在七月十七日到二十二日在北京召開中央修改憲法起草委員會全體會議。在會議期間，主席說過「設國家主席，那是個形式，不要因人設事。」因此總理也說：「可以考慮不設國家主席、副主席」。總理怕言之有誤，他還是反覆強調新憲法主要是突出「毛主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是全軍的最高統帥」，這等於政治局的意見又被否定了，又順從了主席個人的意見。總理的心真累。

關於國家主席的問題，林彪看得最清楚，他祇提了一次建議，以後再也沒有發表意見。關於建議設國家主席的意見，幾次都是來自下面，如三月份的中央工作會議；如在全國各地徵求意見；如七月中旬的憲法修改小組全體會議。我認為總理和康生也看清了，但他們爲了國家體制不要搞得太扭曲，因此在廬山，八月二十二日的常委會上，周恩來、陳伯達、康生還是又一次提出讓毛主席當國家主席，周恩來提出，如果設國家主席，今後接見外國使節等外交禮儀活動可以由國家主席授權。康生說，設國家主席，這是全黨全國人民的希望，我們起草憲法修改草案時也這麼希望，但又不敢違反主席關於不設國家主席的意見。陳伯達說：如果這次毛主席再擔任國家主席，將對全國人民是一個極大的振奮和鼓舞。陳伯達講後，林彪祇是附和他們，並沒有發表具體意見。可以看

出，後來扣在我們頭上的「設國家主席是反動的政治綱領」，這個「政治綱領」，周總理、康生、陳伯達、林彪四個常委都擁護。

毛主席在會上說：「設國家主席，那是個形式，我提議修改憲法就是考慮到不要國家主席。如果你們願意要國家主席，你們要好了，反正我不做這個主席。」主席最後的結論，還是不當國家主席，對不設國家主席沒有定論，不過主席不願意要國家主席，誰還敢要。林彪並沒有出來勸幾個常委來維護主席的意見，因此主席早就不高興了。即便是這樣，在當晚傳達常委會精神的時候，總理仍沒有傳達主席不同意設國家主席的意見。康生是更能揣摩主席的，但他在開幕式上，又提設國家主席，並建議毛主席當主席，他竟然還說：「如果毛主席不當，請林彪當國家主席。」

林彪同意設國家主席，全國基層同意設國家主席，幾個常委都同意設國家主席，全黨全國從上到下，從中央到地方，都是從國家體制去考慮，建議設國家主席。祇有毛主席說不設國家主席，雖然他說是為改變國家體制，實際上主席的目的就是不想讓林彪當。也許毛主席把「國家主席問題」和接班人問題連在一起去考慮了。毛主席從七大開始就考慮接班人，立了劉少奇，幾年後毛主席就對劉不滿，因高崗問題，劉少奇躲過一劫，文革重新算賬，給劉戴了「叛徒、內奸、工賊」三頂帽子，死於非命；林彪跟隨毛主席幾十年，九大剛立為接班人，祇一年工夫，主席又不放心，又不滿意。其實，六六年八屆十一中全會，主席立林為接班人，林彪不想當，打了報告，主席硬是讓他當。林不會覬覦國家主席這個虛職，去搶一張空頭支票幹什麼？！如果國家主席是有實權的職務，毛主席是絕對不會放過的。可是，毛主席在一九七一年八月南巡時卻說，「有人看我老了，快要上天了，他們急於想當國家主席。」「九一三」以後，主席又說，「設國家主席是他們的政治綱領」，這就是毛主席不實事求是了。

至於「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往哪裏擺」，這句話本來是汪東興說的，這本是一句很普通的話，但為了「說明」林彪有野心，就去搞吳法憲，結果吳胖子被迫把「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往哪裏擺」，說成是葉群說的了。吳法憲亂說一頓，造成了很大的麻煩，也給林、葉栽了贓。「九一三」之後，毛主席就是利用吳的這句假話，發出多個中央文件。廬山會議本來是幾乎全體的中央委員對江青一夥的不滿，由此引發出對文革的評議，結果

毛主席卻說成林彪有野心，想當國家主席，黃、吳、李、邱和軍隊幹部就是爲了林彪的野心，才堅持設國家主席的。其實，我們在廬山會議上的發言沒提國家主席。

在九屆二中全會上，主席《我的一點意見》根本沒有提「國家主席」，毛主席對我們的「政治綱領」都不批判，不是沒有批到點子上嗎！九屆二中全會以後，我們軍委辦事組的黃、吳、葉、李、邱幾個人人都做了檢討。在我們的檢討中，根本沒有檢討「設國家主席」問題。試想，如果「設國家主席」是我們的「政治綱領」，我們不針對自己的政治綱領來寫檢討，能行嗎？！主席那裏能過關嗎？對於我們的檢討，主席批示「很好」，有了批示，都過了關，主席還接見了我們並風趣地談了話。「九一三」之後，毛主席說我們是「反黨集團」，「稱天才」是我們的「理論綱領」，「設國家主席」是我們的「政治綱領」，都不是實事求是的。

關於國家主席問題，過去是以主席的錯誤爲正確的標桿，現在國家主席早恢復了，楊尚昆、李先念幾任國家主席都當了，但是爲了政治上的需要，他們還是誤導人們去想：毛主席說不設國家主席，林彪提議設，因此林反對毛主席，林錯了，甚至是有野心。爲什麼不反過來想，毛爲了不讓林當國家主席，竟提出不設，破壞國家原有的體制，也不讓林當。其實，林並不想要國家主席這個虛職，但林希望維護國家體制。

主席通過江青拉我們

九大以後，黃、吳、李、邱進了政治局，並參加政治局的日常工作。總理從愛護、關心、教育我們出發，和我們講了幾次什麼是「中央政治」以及屬於「中央政治」範圍裏的問題。什麼是「中央政治」？總理說：「中央政治就是處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關係。」我們聽後都笑了起來，本以爲「中央政治」是很高深的東西，怎麼「中央政治」就是這麼一句普通的話。我起先對總理的話理解不深，後來有所理解，還是不夠深，等到「九一三」被打倒以後，我才真正認識到，總理說的太高明，太深刻了，簡單明瞭恰到好處。六七年我被搶救出來回到西山時，一次葉帥對我說：「總理很顧全大局，又很能抓住問題的關鍵，他說：『葉參座，委曲求全不是貶義詞。關鍵是把軍隊院校的人勸回去，把軍隊在搞亂了，我的工作就更難了。』」

我們對江青的蔑視，總理看得很清楚，他內心是支持我們的，但他也非常清楚，這樣下去也是不行的，因此他用「中央政治」這個說法來教育我們。總理的誠心誠意和大局觀念，使我們也大有領悟。

一、對江青的態度不是對她個人如何如何，而是和主席連在一起。二、主席不是很反對江青，我們沒看清，受汪東興誤導很大。三、不能感情用事而沒有城府。



總理說：「中央政治就是處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關係。」

我們這些人從心眼裏認為林總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因為毛主席和林總在幾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是非常親密的，林總為毛主席打江山，戰功顯赫，立下汗馬功勞。所以毛主席向林總「起事」時，我們就搞不清毛主席是什麼用意，也盡量往好的方面去想，毛主席的確是一個大政治家，他說出來的話，向左向右都可以理解，而且主席每次說完也在等著看，對他有利則前進，否則就當成說了點幽默，所以毛主席九大以後說了很多對林總的話，我們並不是看得很重，直到廬山會議才如夢初醒（或半醒）。諸如毛主席說「四個偉大討厭」，去掉「三個副詞」，去掉大會堂的語錄，「締造的不能指揮呀」，等等。我們沒有往毛主席和林總之間有隙處想，反而認為是毛主席謙虛。我們沒有真正懂得中央政治，在中央的政治鬥爭中是幼稚的。當然，毛主席和江青的真實關係我們也沒有看清楚。

後來在九屆二中全會上，以及會後主席一系列的言行，使我對中央政治越來越懂得多了一些了，但是發生了「九一三」事件，懂也沒有用了。

從一九六九年底以來，江青找黃、吳、李和我談了幾次話，前幾次談話都是罵陳伯達的，而且把陳伯達罵得一無是處。我們把這

告了總理，總理說：「她這個人，叫你去如果不去麻煩更大。你們去祇帶著耳朵就是了。」

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七日，江青又叫我們去釣魚臺十一樓，這次可大不一樣了，江青主要是攻擊總理。這次去，除了黃、吳、李和我之外，還有謝富治、李德生、姚文元。江青上來就說：「總理也不是一個百分之百的好人，有兩次大的路線錯誤，一次是把蘇區的百分之九十搞沒了；第二次是喊蔣介石萬歲，一切經過蔣介石，跟蔣介石搞統一戰線。另外，解放後還有一個馬鞍形，就是經濟建設的『兩高一下』。」江青就這樣說了一串一串的事情。

當時，黃永勝越聽越激動，他突然對江青說：「總理辛辛苦苦領導我們工作，你怎麼這樣說他？！我們對過去的問題不瞭解。」黃永勝說完就提著皮包往外走，事情發生得很突然，搞得江青愕然。我和李作鵬坐得靠後一點，我們當然是支持黃永勝的，我們也附議了黃的話，也就站起來走了。吳法憲坐得靠前一點，他也站起來嘟嘟囔囔地說：「叫我們來就是搞這個？！」說完也站起來走了。

黃永勝走到門口，江青就向黃永勝大聲說：「哎，還有明天《解放軍報》的事！」黃沒有理她。有關《解放軍報》的事是這樣的，郭沫若給江青寫了一首頌揚樣板戲的詩，準備明天在《解放軍報》發表，李德生把校樣都拿來了。這時李德生也急了，他說：「黃總長，不行呀，還有明天《解放軍報》的問題。」黃永勝說：「你是總政主任，這個問題你決定，你自己處理。」

我們出來以後到了毛家灣，向林總作了匯報。林總很生氣，他說：「江青攻擊過中央常委的大多數，今天是直接攻擊總理，這個事情你們應當向毛主席報告清楚。」

這時吳法憲就給汪東興打了電話，說有緊急事情要向毛主席匯報，並簡單向汪說了一下，汪一聽是對著江青的，立即去報告主席，主席同意了，並叫馬上來。本來是黃、吳、李、邱一起去，葉群說都去不好，不要興師動眾，最後林總說黃、吳一起去。黃、吳走了以後，我和李作鵬、葉群到三座門去等。

不久，黃、吳就回到三座門來了。黃永勝傳達了毛主席對他們說的幾句話，當黃永勝向主席匯報了江青攻擊總理的事情後，主席說的第

一句話是：「一個政治局委員找部分政治局委員談一些問題是可以的。」第二句話是：「你們知道江青也是一霸。」第三句話是：「你們今天同我說這些問題，不要叫江青知道，我也不跟她說。她要是知道了，你們就只好混了。」這幾句就是毛主席的原話，黃永勝的熱臉蛋貼到主席的涼屁股上，主席對江青攻擊總理不以爲然。現在想起來，總理告誡的中央政治，我們還沒有入門。

這時我提了一個建議說：「你們兩個應當去找總理說說這個問題。如果總理先知道了，咱們還沒說，總理會傷心的。」黃永勝認爲我說得對，但他考慮了一下說：「老邱還是你去，我不是不想去，你們想想，我剛從主席那裏出來，又去找總理有些不妥。」大家都認爲黃說得對。黃有點中央政治了。

大概七點多鐘，我就到了中南海西花廳總理的家裏，我把整個過程都向總理說了。總理對江青的話、主席的話都不吃驚，但聽我的話時很激動，眼眶都是濕潤的，總理拉著我的手連說了兩句：「老同志就是老同志！」接著總理又說：「老同志是能夠理解大事的！」我望著總理慈祥的面孔和疲憊的雙眼心裏也是很激動的。

不久，李先念跑來找總理，總理還有事，我就沒有和總理一起去大會堂開會，我先走了。

過去我總是把這件事孤立地看，並總以爲是江青目中無人，口出狂言。現在看來，這件事主席事前可能是知道的，否則江青沒有這麼大的膽量。另外，這也是主席通過江青在拉我們，主席希望我們按照他的意圖來進行九屆二中全會和四屆人大的準備工作。主席不是沒有拉動我們，而是我們腦子裏根本沒有這根弦。

吳法憲與張春橋的爭論

我看到過汪東興寫的一本書，叫做《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主要是講黨的九屆二中全會直到「九一三」這段時間的事情，可以說汪嘴裏吐出來的東西，在關鍵的問題上都是假話。其實，毛、林交惡造成的悲劇，汪東興是要負重要責任的；在當時惡劣、複雜的政治環境下，總理、黃永勝、李先念和軍委辦事組的同志，也包括汪東興在內，這些當時在臺上工作的同志與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等中央文革

那些人的鬥爭，很多是在原則問題上不可調和的鬥爭，這些鬥爭在思想基礎上，和所謂的「二月逆流」是一個樣子的，那就是：擁護毛主席，不理解文革，厭惡江青、康生、張春橋等這些中央文革的傢伙。而且這些鬥爭和矛盾，很多緣由都和汪東興有直接關係，汪東興不能實事求是地講清事情的本來面目，口口聲聲是維護毛主席，實際上是用假話保護他自己。

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三日，在討論憲法的時候，吳法憲與張春橋確有爭論，而且爭論得很厲害，吳法憲在辦事組講得清清楚楚。周恩來、陳伯達、黃永勝、葉群、李作鵬和我都堅決支持吳法憲，林彪也支持他。

張春橋在會上提出，把憲法討論稿中「毛澤東思想是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天才地、全面地、創造性地」等詞句刪掉。張說，「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個諷刺，連赫魯曉夫都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吳法憲一聽就火了，張春橋那個傲慢和陰陽怪氣的勁頭實在可憎，吳堅決反對張春橋。他告訴張春橋「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虛貶低毛澤東思想」。同時，吳認為三個副詞是衝著林彪來的，張春橋和吳法憲都動了氣。

陳伯達也是修改憲法小組的，他表示支持吳法憲。陳是我國第一部憲法的起草者，修改憲法本應由他牽頭，但主席沒讓他幹，而讓康生、張春橋主辦。因為起草九大政治報告的時候，他起草的稿子提出發展生產的意見（林彪支持了陳的意見），沒有突出繼續革命的思想，毛主席沒有用陳伯達的稿子，此後毛主席就更冷落陳，而對康生、張春橋表示青睞。

會後，吳法憲報告了周恩來總理，周聽後對吳法憲的意見表示支持，周總理明確地說：他從來沒有聽毛主席說過「赫魯曉夫天才、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這是一個諷刺」的話。周總理還說他同意設國家主席。

周總理關於同意設國家主席的意見，不止和我們說過一次。有一次汪東興也在，總理說主席當國家主席是肯定的，副帥當國家副主席也是肯定的。但主席不願意參加一般的國務活動，副帥身體不好，也不能多參加活動，那可以設幾個副主席，出國訪問也好，接待人家的國家元首也好，都由副主席來出面。汪東興說：總理想得很周到，其實這個問題並

不那麼難解決，主席願意見外賓，主要的來賓主席也都見了，主席見外賓都很高興。我們也認為總理和汪東興說得很好。

關於這次會上的爭論，吳法憲也報告了葉群，葉群很快就傳回了林彪的話：吳胖子說得好，他立了功，抓住了張春橋的尾巴。當然，張春橋會後立即報告了江青，江青又詳報了毛主席。

兩天之後，八月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會議由周恩來總理主持，對憲法修改草案最後定稿。會前，軍委辦事組特別召回了在外地檢查工作的李作鵬，以加強戰鬥力量。葉群沒有參加會議，她從北戴河打電話給陳伯達、黃永勝等人，讓他們準備好，在會上跟張春橋鬥。周總理估計會上要爭鬥起來，他也做了思想準備。周恩來是支持林彪，支持軍委辦事組，支持吳法憲的。周總理的思想是，這些評價是正確的，寫就寫上嘛，張春橋又在人爲添亂。周恩來最討厭人爲添亂，使正常工作難以進行。

周總理在會上是很小心的，他拿著憲法草案，一條一條地唸，唸一條討論通過一條，唸下面一條時，總理總是提醒大家「聽好啊！」但是，出人意料之外的是，當總理唸到「毛澤東思想是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時，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在會上一言不發，根本沒有爭起來，他們表示同意，總理似乎感到有些奇怪，他很恭敬地問江青，「江青同志的意見呢？」沒想到從來是頤指氣使的江青，竟很和氣地說，「大家討論」。這樣帶有「毛澤東思想是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這些詞句的憲法修改草案被順利通過了。

周恩來如釋重負，終於鬆了一口氣。

林彪知道會議的情況後卻緊抽了一口氣，林彪太瞭解毛澤東了，會議出現這樣的結果，肯定有人點撥張春橋、江青等人。他認為到廬山（九屆二中全會）會有更大的鬥爭。

歷史證明，這次會議的結果，是毛澤東主席以虛掩實的戰術所致，他搞不清林彪在想什麼？毛說不設國家主席，林主張設；毛說他不當國家主席，林推舉毛當；連同一九七〇年七月下旬討論「八一」建軍節社論時的爭論，這是第一次毛主席和林彪把不同意見放在了大家面前。再加上大家對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中央文革一班人的怨氣，毛澤東不能沒有更深的考慮……誰對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有利呢？誰對捍衛「文

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有利呢？毛主席對張春橋表示青睞。林彪也一直想抓住機會給文革降溫。雖然，林是被毛主席拖進文革的，但林畢竟在文革初期說了擁護毛、擁護文革的話，現在文革搞成這個樣子，林是不願意的。降溫關鍵在於削弱中央文革的「極左」路線，這樣才有條件給文革降溫，黨內有了思想基礎，林就好在適當的時機建議毛澤東盡快結束文化大革命。

但是，在廬山的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雖然認識到了這場鬥爭，並沒有把握好怎麼鬥爭，他爲了黨和國家的根本利益垮臺了，這是大家和林本人都沒有想到的。毛主席卻抓住這次機會，削弱了林彪，也徹底改變了林彪的命運。

高高興興上山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六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江西省廬山舉行，故稱廬山會議。一九五九年也有一次廬山會議，在那次會議上，毛澤東主席罷了彭德懷元帥的官，把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定爲反黨集團。七〇年這次會議，在黨的歷史上也是一次出奇的會議，引起了黨內一場重大鬥爭，並導致後來重寫黨內歷史。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成爲毛澤東的死敵；「接班人」成爲「叛徒賣國賊」；爲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浴血奮戰、一身槍傷的林彪成了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反革命首領。我的冤案，也是從這次會議開始的。

這次會議所要審議的幾個報告，在會前都形成了文件，並經中央政治局審定通過了。會議無非是要舉手通過這幾個文件，因此，大家稱這次會議是「蓋橡皮圖章」的會議，還有人說是「讀書休息」的會議。會議期間能有休息的機會，我內心很高興，文革以來，工作十分繁忙，精神緊張，又十分勞累，一直得不到休息。

在會前的半個月左右，我就知道毛主席的決定，全會在廬山舉行。對此，心裏很高興，祇待會期的到來！但臨要上廬山的前三天，即八月十八日，黃永勝通知我說：「周總理決定，全會初期你帶閻仲川留守北京，紀登奎也留在北京。待全會討論一九七一年國民經濟計劃時，由李作鵬下山來換你上山。」對周總理的決定，我沒有什麼意見。這一決定，到二十日又變了。毛主席是八月十九日到廬山的，林彪和周總理是二十

號到的，毛主席聽了總理的匯報後指示說：「邱會作不留北京，黃永勝留守北京。」

我對這個變化感到很高興！

我同李作鵬及軍委辦事組的工作人員，於八月二十一日一起上廬山了。在盛暑的夏季，北京雖然不很熱，但也並不舒服。經過六小時的航程就可到達江西廬山這樣的避暑勝地，自然心中很高興！同時，我也知道，在參加會議期間，不會有繁重的工作，有時間可以遊玩遊玩廬山了。我雖然去過兩次廬山，但並不熟悉，這次大概可以瞭解廬山的「真面目」了。因此，從北京出發時，心裏什麼想法也沒有，身上什麼負擔也沒有，高高興興地離開了北京。

軍委辦事組組長、總參謀長黃永勝留京「看家」了，吳法憲八月十九日已陪江青上山，辦事組剩下的主要成員就是李作鵬和我兩個人。江青外出，總要找個軍隊的負責人陪著，搞不清她是什麼意思，總理每次都給我們做工作，讓我們把這個「任務」完成好。

早飯後，我從家裏從容地到達北京西郊機場，李作鵬也幾乎同時到達。由於九江機場停不了大飛機，我們乘坐的專機是伊爾 18 型大飛機，由北京先到達安慶機場，由安慶換乘安 24 小飛機。到九江之後，換乘汽車上山。在安慶、九江我們都受到了當地部隊的熱情接待。當時的軍委辦事組在軍隊的威信很高，我們出門，愁的是部隊同志迎接的禮遇太高了！

在九江機場看到吳法憲，他不是來迎接我們的，他是陪江青上廬山後，又回到九江機場指揮空中運輸的。參加全會的各路人馬都是乘飛機來的，他今天親自來指揮，吳這個人對工作一向是很負責任的。

在九江，我和李作鵬分乘汽車上山。軍委辦事組成員（李德生住在國務院的住區）和葉、陳、聶、徐四個元帥住在福州軍區療養院，我們住得很近，相距最多不過百米，來了以後，我和李作鵬就一一看望了四位老師，他們都很高興。在葉帥那裏坐的時間稍長一點，他說他也剛到，對我們的拜訪，葉帥很高興。他特別說到：「一九六七年我們出了點問題（指「二月逆流」），我有事給楊成武打電話，他不接，說病了，可晚上看電視他在接見外賓，這個人，變得真快。」

我們在山上住下之後，各方面都感到很舒適，江西省軍區，省革委會對招待工作組織得很好。軍委辦事組的人除了黃永勝、李德生之外，都是江西人。我們看到家鄉的工作做得很好，心裏很高興！

晚上無事，我和李作鵬來到吳法憲的住處吹牛皮，吳說：「差點見不到你們了。」我們忙問是怎麼回事？吳說：「翻了車。」吳站著邊說邊比試。他接著說：「主席是八月十九日乘專列到達九江的，我和程世清等人前去迎接，當日主席即換乘汽車上了廬山。汪東興是隨從毛主席到的，當他見到我和程二人後，祇做了簡單寒暄，就很高興地說：『在討論憲法時，要提設國家主席，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副主席當國家副主席。不設國家主席，林副主席往哪裏擺呢？』」（意即林的位置已在周總理之前了，再擔任副總理，顯然不合適了。）

我們三人吹了一會，就一起散步去看林總。我們是九點以後才去的。因為林總早休息了，就沒有去打擾，葉群接待了我們。這次是禮節性拜訪，我們在那裏閒談到次日一時左右回來的。

葉群同我們一起，在一個不大的客廳裏談起來了。她說：我們二十日從北戴河來，比你們早一天到。從準備好的文件來看，這次會議是沒有什麼重要工作要做的。我們大家都要好好休息一下，要利用這個好機會，看一下廬山怎樣？我可以當個導遊。我們當場還約好了，第二天下午四點一起遊仙人洞。

臨走時，在葉群的會客室裏，葉、吳、李、邱擠在一個長沙發上，照了一張相。

政治局常委會

八月二十二日上午休息，沒有辦什麼事，也沒有什麼人來走動。由於沒有事，昨晚本想睡早一點，但沒有這種福氣，睡不著，二十二日這天比在北京起得還早。

午休之後，吳、李和我一起出動遊玩仙人洞。我們到了仙人洞就同葉群會合在一起了，照了幾張像。我們去遊仙人洞的時間晚了一些，到達的時候就暮色來臨了。本來準備多照幾張相片，但光線不夠用了，葉、吳、李和我祇在仙人洞合照了幾張相片（這張相片，後來也成爲罪證）。

大家在仙人洞休息了一會兒，招待我們的人，還上了廬山的雲霧茶。我們坐下之後，很自然就談起中央文革這些人來了，這都是我們的習慣了。這次談的主要是吳法憲做了「女皇副官」，即他陪江青上廬山的一些笑話。

我們說：「吳胖子真有福氣，已經做了女皇副官，不知道是否加了賞金。」

葉群笑著說：「你們不要把胖子氣死了。他也是沒有辦法呀！」

我們說：對這樣的人（指江青）就是要口是心非。如表面上對她不好，是要挨罵的，划不來；裝著對她恭恭敬敬的，她會說你好話。江青不是很喜歡吳胖子嗎？

吳法憲說：「我當空軍司令倒了霉！」

大家哄笑一陣就算完了。天黑了，雖然遊興未盡，也祇好回家了。

八月二十二日，毛主席在他的住處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會議，毛、林、周、陳伯達、康生出席了會議。會議的目的，主要是毛主席和各常委碰碰頭，並確認一下九屆二中全會的議程。在政治局常委會中，還專門討論了有關設國家主席的問題，這是本次常委會最重要的內容。討論中除毛澤東外，其他四名常委均提出，根據群眾的願望和要求，實現黨的主席和國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個國家之首、國家主席。實現黨的一元化領導是毛主席自己提出來的，各省、市、自治區領導班子都是按毛澤東的這個指示，實現了黨的省委書記都兼任省革委會主任的一元化領導，黨的主席兼任國家主席也是一元化的領導吧。毛絕對沒想到在全會還沒有召開，四個常委的就一致提議設國家主席，與林副主席的提議是一致的。因此他剛一上山，就氣鼓鼓的了。尤其是他甚為倚重的康生，也主張設國家主席。毛澤東主席在會上說：「……如果你們願意要國家主席，你們要好了，反正我不做這個國家主席。」毛澤東還警告說：要把這次全會開成一個團結的勝利的會，而不要開分裂、失敗的會。毛講話的弦外之音就是，你們不聽我的意見就是破壞黨的團結。後來毛澤東還說過：「關於國家主席，這個不要再提了。如果在繼續這樣搞下去，我就下山，讓你們鬧；再不然，我就辭去黨中央主席職務。」可是，為什麼不設「國家主席」，毛一直沒有講，一直沒有給大家最高指示和「諄諄教導」。

晚上開政治局會議。會議主要是總理、陳伯達、康生傳達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精神。我記得總理祇是說了會議怎樣開的問題，並沒有說什麼大的問題。會議的議程早已定了，會上當然不用再說這個問題，總理在晚上的政治局會議上也沒有傳達常委會上，主席和四常委對設國家主席的問題的態度。但是可以看出，後來扣在我們頭上的「設國家主席是反動的政治綱領」，而這個「政治綱領」，周總理、康生、陳伯達、林彪四個常委都擁護，絕大多數中央委員也擁護。

總理說：「今天下午，在主席那裏開了常委會。確定全會明天下午三時開幕。主席同林副主席說，他以前說過的那些問題（沒有點明什麼問題。後來汪東興補充發言時給點出來了），這次好好說一下，這次中央全會除議程之外，應當談點實質的問題。明天下午三點是開幕式，會議從二十四日開始，主要是小組會。我們大家都要參加小組會議，身體不好的，還是以休息為主，其他人也不要放棄這次休息的好機會。」

吳、李和我同時提出：「我們最希望總理能休息一下。」

總理講完後，對汪東興說：「你來做補充。」

汪東興接著發了言，他說：「我首先聲明，我是中央辦公廳的工作人員，列席了中央常委會。主席在會上談的問題，我做點補充傳達。主席說：『九大以後，有的人在後面搞了一些活動，這些都是見不得人的事。那些事也搞到總理和伯達同志頭上去了（指五月十七日，江青找部分政治局委員談話的事）。這些事，在中央全會上應當講清楚，這對黨的團結是有利的。』主席還說：『最好再講講形勢，套話人家不愛聽。』並且對林副主席、周總理說：『你們誰來講一講？』總理立即謙讓的推舉：『請林副主席來講吧。』主席又說：『可以把問題講得寬一點。』」

汪東興平時還是一個挺嚴謹的人，今天的確比較隨意，也許他有意找機會抨擊江青，出江青的洋相。他在補充中說的內容，總理都沒有講到，汪東興竟然敢「補充」出來。當時康生就很生氣，鬍子翹得老高。散會後，康生走過汪東興身邊時說：「革命這麼多年，還是個警衛員的水平。」我看當時汪東興樣子，有些不以爲然。後來，陳伯達下臺之後，康生在政治局會議上以亂傳達毛主席的講話指責了汪東興。

汪東興這個人過去黃、吳、李都不瞭解他。我跟他打交道較多，不過都是些具體事務，對他也不很瞭解，我認爲這個人的主要特點有兩個：

一是裝腔作勢；二是肚子裏事不少。至於他的辦事能力，康生說他祇是個「警衛員的水平」，當然有點挖苦人，汪還是有能力的。

晚上政治局會議散得很早，這在北京是沒有過的。我回宿舍後，沒有什麼事可幹，也沒有什麼地方可走。吳法憲房子人來人往，我不願去。李作鵬因身體不好在輸液，不便講話。我信步走到聶老總房子裏去了。他住的地方離我約二十米遠，我把剛才政治局會議的情況都同聶帥說了，他很高興。九大以後，我仍然上葉、聶兩帥的門，他們兩人對我的做法都很滿意。他們說：「我們現在都是閒人，你主動來同我們嘮叨嘮叨很好。」葉帥有時還主動叫我去「閒談」。實話說，因為「二月逆流」的原因，我並不大情願，但一般地我仍然照辦了。

廬山會議就人數來說，是個小型會議。到會的人數，連工作人員在內也不過三、四百人。會議的主要分工是：會務工作，由中央辦公廳負責；招待工作，由江西省軍區、省革命委員會負責；安全警衛工作、空中運輸等，由軍委辦事組負責；廬山周圍的外部警衛工作，由江西省軍區一個獨立師擔任；廬山內部的警衛工作，由中央警衛團擔任。另外，由空軍在廬山開設一個防空指揮所，並準備兩架直昇飛機，以備必要時專用。除此以外，廬山及其周圍沒有任何部隊。

開幕式上林彪的講話

據陳伯達講，八月二十二日晚，他到了林彪住處，他非常希望林能在會上講話。陳認為九大以後，「無休止的運動」，不但沒有減弱，反而在繼續發展，我們國家長期處在這樣的無政府狀態下是極為不利的，會承受不起。陳認為，造成這種局面，在主席那裏起作用的主要是江青、康生和張春橋，江青不能碰，碰碰張春橋是可以的。林彪沒有對陳伯達表態。林祇說，如果要講，明天開會前向主席報告一下。實際上，我認為陳伯達還是把林彪說動了。事前，吳法憲向林報告了他與張春橋在修改憲法問題上的爭論，也是促使林要講話的原因。

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三時，全會在小禮堂開幕。但常委們一直沒有出來，大約等了四十分鐘，毛主席、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五人才走出來在臺上就座。政治局委員和元帥們坐在臺下前排。



九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開幕式上講話。

全會由毛主席主持。主席宣佈：「我們的二中全會，現在開幕！」然後，毛主席左看右看地看了一下林彪、周恩來，之後即說：「請林彪同志講話。」

林總對毛主席笑笑地說：「好，我說幾句。」

毛主席又接著說了一句：「現在，請林彪同志講話。」

林彪的講話，不到兩個小時。平心而論，林彪的話講得很一般，問題也不是講得很清楚，但事後產生這麼大的反響，真是意料之外。他講話的內容主要講了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講憲法修改稿的特點；第二個問題是憲法修改草案體現了毛主席的國家學說；第三個問題是憲法修改草案體現了毛主席倡導的群眾路線。林總對憲法修改稿的評價是比較高的，他說：

全會這次的三個題目，是全國人民政治生活中間的三件大事。我研究了這個憲法，表現出這樣的特點，一個是把毛主席的偉大領袖、國家元首、最高統帥的這種地位，毛澤東思想作為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這一點非常重要。用法律的形式鞏固下來非

常好！這可以說是憲法的靈魂。是三十條中間最重要的一條。這條反映出我國革命經驗中間最根本的經驗。……

毛主席的這種領導的地位是在幾十年的鬥爭中間形成的，是在黨內兩條路線的較量中間來比較出來的。所以，這個領導地位，就成為國內國外除極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認的。中國革命，半個世紀的歷史都證明，祇有毛主席代表了最正確的方向，代表歷史發展的要求，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這是大量的鐵一般地證明了的事情。可以說我們的工作的前進或後退，是勝利或者是失敗，都取決於毛主席對中央的領導地位是鞏固、是不鞏固。……凡是碰到毛主席的思想不能貫徹的時候，就使革命受到挫折、失敗；得到貫徹的時候，就蓬勃地發展。我們同志們必須記住，必須把這種迷迷糊糊的思想，變成自覺的思想。必須，特別是年老的這些同志，要把這些思想向下傳播，傳下去。……

勝利以後這二十年，特別是在文化革命以來，繼續和更加證明毛主席思想的作用。我的看法是這樣子，不管什麼地方，不管什麼部門，毛主席的威信比較高一點的地方，對於毛主席著作比較肯學一點，人的精神面貌就改變，跟之而來的就是物質的強大變化。原來認為做不到的事情，能做到了。這就是毛主席的這種革命的精神，具體的政策、具體的指示，一旦深入群眾的時候，一旦群眾領會的時候，那就是排山倒海的力量。主觀世界的變化引起客觀世界的變化。……

你們大家是不是覺得老三篇不起大作用呀？我覺得這個東西還是起作用。另外還有其它的政策思想，以及哲學思想，這些都起作用。幾十年嘛！我們說毛主席是天才的，我還是堅持這個觀點。我們這些人都是參加革命嘛，毛主席幾十年寫的東西。我們現在水平高，是有創造的。……毛主席個人的這種天分、學問、經驗來創造出新的東西來。而毛主席這些著作中間所發揮的地方，所增加的新的東西，你們翻開馬列著作中間他不可能有的。這也很自然的，他沒有那個客觀嘛。因此，不能對於新的問題作出預先的答覆和解決。所以不能說是沒有發展，這還是形而上學的觀

點。這種觀念不符合馬列主義的起碼的原則的，是反馬列主義的。這點值得我們同志們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因為他那個中央不同，在我們這個國家，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共產黨當權的國家，最高的一聲號令，一股風吹下去，就把整個的事情改變面貌，改變面貌，改變面貌。因此，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值得把腦筋靜下來想一想，是不是這回事情。

林彪說：

第二點，就是突出了無產階級專政和繼續革命。也是體現了毛主席的國家學說這種發展。沒有一個憲法，沒有一個國家，沒有一個政權不是階級性的。如果真正到了沒有階級的時候，就沒有國家了，也沒有政權了，也沒有黨了，也沒有憲法。那麼有憲法，有政權，有黨，有國家，這些都是階級鬥爭的表現，是階級不可調和的表現，不是階級相互妥協的表現。不是什麼聯合政府，總是一個階級壓迫一個階級，總是階級對階級專政。……我們這個憲法有一個鮮明的特點，體現了階級性，是階級專政。

林彪講第三點時說：

這次憲法，還有一點，就是突出了群眾的路線，集中了群眾的智慧。主席是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歷來如此。大家是知道的，到處街上都有的，「人民，祇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這是一句言簡意深，概括了馬列主義的歷史唯物論的基本觀點之一。所以，主席一再地強調把這個憲法交給人民討論呀，修改呀，這都是相信工農兵和教育工農兵的一種表現。反覆徵求群眾的意見，集中了群眾的智慧。憲法是他們提了意見的，成為他們自己的東西，這個是有很大的好處。主席要求憲法簡單扼要、通俗易懂，使群眾容易掌握，這也是考慮群眾的需要。從一〇六條壓縮到三十條，一萬多字壓縮到四千多字，這都是適合群眾需要的。這次我們的草案經過我們這裏全會討論了以後，還要經過群眾再去討論和人大討論。所以這次憲法可能成為全國人民奪取一個新的勝利的一個戰鬥的綱領。

林彪的講話沒有稿子，一口氣能講這樣長的話，是不容易的。我聽過很多林總講話，他基本上不用稿子。

林彪結束的話聲剛落，全場爆發熱烈的掌聲。坐在主席臺下第一排的許世友、陳錫聯竟跑上前去和林彪握手，表示支持和敬意。這時葉帥和陳老總也起身和林彪握手，林爲了表示尊重，蹲在臺子上和兩個老師說了幾句話。

毛主席對林彪的講話聽得很認真。

林彪講話之後，康生講了修改憲法的問題，尤其講了對設國家主席的態度。康生在發言中表示對林的講話「完全同意」，「完全擁護」。康生指出，在要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彪當國家副主席的問題上，「所有意見都是一致的」，「如果主席不當國家主席，那麼請林副主席當國家主席。如果主席、林副主席都不當的時候，那麼主席這一章就不設了。」汪東興在他的書裏說周總理和康生聽著林彪的講話「表現出著急的神態」，你說汪東興是不是說謊，康生比誰的調子都高，他著急個屁。

接著，周總理講了開會的問題。因爲時間晚了，總理講話比較短，他說，關於《國民經濟年度計劃》已印發了材料，就不具體講了。總理也對林彪的講話表示擁護。

會議結束後，毛主席一邊站起來，一邊說了兩個字：「散會」

其實，我認爲林彪的講話比較一般，話講得也含含糊糊，但林彪講完話以後受歡迎的情況並不一般，好像有一種「勢」，毛主席看到此景，肯定心裏別有滋味。

山上的熱鬧

今天開會的座位，張春橋坐在我的左邊，我們緊挨著。林總評論憲法時，他總是張開口，無聲笑著，一個字也沒有記錄。當林總講到「我們同志們必須記住，必須把這種迷迷糊糊的思想，變成自覺的思想」時，張春橋有些敏感，立即緊張起來。他越聽越不是滋味，沉默起來，拚命做記錄。林總講完話之後，他掏出香煙，自己沒有抽，第一支先給了我，他的手都有點發抖，拿著煙對我說：「老邱抽煙」。這是我們認識以來，他第一次遞給我香煙，我有點好笑。這雖是小小的舉動，但也可以看出張春橋當時的心理狀態是「做賊心虛」。我和張春橋是「老死不相往來」的，

六七年一月，他支持上海二醫大「紅縱」，造我的反，我對張春橋是憎恨的。

會場的臺上有個後門，由臺上回我們的住處比出大門近多了。散會時，大家陸續退場，吳法憲、葉群、李作鵬、汪東興和我不約而同地走在最後面，並往主席臺的後門方向走，陳伯達在臺上等著沒走。此時，我們後面的幾個人，有的已經上臺去了，我還在階梯上，汪東興就講開了，他簡單地介紹了一下會前林彪報告毛主席要求講話的情況，及林彪報告後主席說不要點名的情況，這時，葉群忙提醒大家「會上發言不要點名啊，林總講話裏指的是陸定一式的人物，是不點名。」葉群還講：「林總說主席是偉大的天才，毛主席的革命實踐太豐富了，主席比馬克思、列寧還懂的多。我就是堅持天才的觀點。」

其實，「不點名的點名」我們聽得懂，林總講話是指張春橋的。當然，葉群、汪東興一開始就是唱主角的，他們通報這些消息並非多餘，他們一講，起到了聯絡感情的作用。臨走前，葉群又提醒大家：「會上發言不要點名啊」。林總的講話，是批評張春橋這些中央文革的人，我們是完全擁護的，但這次林總講話，我們事先一點都不知道，我和李作鵬擔心的是陳伯達、吳法憲、葉群三人把林總「推」上臺的。如果真如此，是沒有不壞事的。我又想，林總是一個非常縝密的人，他的講話一定得到了主席的同意和支持才講的。我和李作鵬一同走在回去的路上，李問：「老邱怎麼樣呀？（指林總的講話）」我說：「不知道爲什麼？」李：「是呀！事先連個招呼也不打！」

晚飯後八時許，我同北京黃永勝打了一個電話。我拿起話筒就問：「山上的熱鬧，你知道了嗎？」

黃說：「剛才，吳胖子來過電話了，知道山上的大好事，不需要再說了，真高興啊！晚上還多吃了一碗飯。」

我們在電話上談笑了一陣，就掛電話了。

晚上九時許，召開政治局會議。今天會場的空氣與往常不一樣了。張春橋、姚文元坐在後面了，不是同往常一樣總是坐在前面，並要同周總理並排坐下；江青和康生雖然坐在前面，但江青也總是吊著一張臉不說話；康生翹著小鬍子，不斷地抽煙。陳伯達、吳法憲並沒有什麼具體事，他們卻在會場上來回走動。兩種不同心情的人，表現出兩種情緒，顯得

格外分明。我與李作鵬同往常一樣，其餘的人情緒略有不同，但不是很明顯。

今天的會議，主要是研究明天開小組會的問題，沒有別的議程。吳法憲提出：「對林副主席的講話，各小組應當好好學習討論。」李德生、許世友、陳錫聯等人隨聲附議。總理說：「這個意見很好，請汪東興同志報告主席。」我想，討論林副主席的講話也在情理之中。

汪東興接著提出：「各組反映，對林副主席的講話，不少地方沒有聽清楚，他的口音重，要求重放錄音。」總理同樣簡單地對汪東興說：「此事，也請報告主席。」

總理對著張春橋說：「憲法草稿，有關國家主席的章節，要準備一下，備用。」

張春橋急忙回答說：「現成的，現成的。已經準備好了，請總理放心。」

今天的政治局會議沒有更多的內容，自然散得很早。

散會後，我和李作鵬示意吳法憲到葉群那裏瞭解一下情況。吳回來後，對我們說：葉群講，林總本來在開幕式上不準備講長話，開會前，主席和林總交談了很久，林總向主席反映一些問題，主要是我（吳）和張春橋吵架的事，主席說：「張春橋的後臺是江青。」主席對林總說可以在會上講一講，但不要點名。

然後，吳法憲又說請「老夫子」（陳伯達）到他的住處來閒談。不久，陳到了吳的住處。我們聽陳、吳談話，主要是陳談的，一直談到二十四日凌晨三時才散伙。

從陳伯達談話的內容、口氣來說，陳伯達對張春橋不僅是貶低，簡直是到了鄙視的地步。可見他對張春橋的仇恨是很深的。

陳伯達說，張春橋是個無名小卒，沒有什麼本事，寫文章也不行。自己不行，還好表現自己。如果他寫了一篇什麼東西，總怕別人不知道，到處瞎吹一通。張春橋寫的東西都是在上海請人搞的，在上海那個地方搞文字吃飯的人有的是。陳伯達說，一九六七年，上海「一月風暴」都是北京直接指揮的，安亭事件發生後，是他派張春橋去處理的，連張春橋在上海的講話都是他在北京寫好，用電話傳過去的。群眾起來了，張春橋當時並不敢去，是他寫了幾條要張去宣佈的，並由上海警備區派

部隊保護張春橋才去了。然後上海召開一個群眾大會，張春橋也是不敢出去見群眾的，又沒有什麼主張，還是他同張春橋直接打電話告訴他的辦法（似乎也說告訴了幾條），結果大會開成了，奪權成功了。張春橋還吹什麼他創造了「上海革命」，這是貪天之功爲己有。陳還說：「上海的文化大革命，並不是張春橋吹的那樣好。是在毛主席同意的情況下，把張春橋的對立面鎮壓下去的。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是花了很大代價的。中央支持，又允許鎮壓，哪有搞不好之理！」另外，陳伯達還談了張春橋參加「九大」修改黨章就到處吹噓自己，我寫的文章很多，我從來都不說。

此外，陳伯達還講了張春橋的許多壞話，有的我就記不起來了。

我們大家在一起聽陳伯達講到二十四日早上三時，吃了夜餐。

我回到宿舍之後，劉秘書同我說：「張池明政委、張令彬副部長，今天下午來看部長了。」我即想到要給他們回個電話，否則，他們會有意見的。但說什麼呢？我稍微想了一下，就向他們回電話說：「對林副主席的講話，可能還要組織聽錄音，這樣便於小組會上發言。」這是個極其一般的電話，我當時根本沒有想到是搞什麼「陰謀」，祇是想到給他們一點可以談的「內情」，但後來追個不停，大家都知道，兩張在政治鬥爭中，是起不到多大作用的。

整個廬山都狂熱起來

二十四日上午九時許，在廬山小禮堂聽林總講話的錄音，毛主席昨天晚上就同意聽林彪講話錄音。除毛主席、林總之外，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員全部到場了，元帥們也來了。江青這個向來「自由自在」活動的人也來了，坐在第一排中央。從她的行動就可看出林總講話對江青的震動有多麼大！如果不是這樣的話，即使出轎子抬也是抬不來她的。錄音放了一遍以後，總理說再放一遍。中央委員們聽了林彪三次講話（上午聽了兩遍錄音），已經消化得差不多了。大家僅從聽錄音這件事，就知道要發言表態和怎麼表態了。於是大家紛紛在小組會上發言，表示擁護林彪的講話，這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汪東興和陳伯達在華北組都發了言，尤其是汪東興的發言牽動了整個全會，汪東興在發言中提出揪人是發言的要害之處。隨著汪東興和陳伯達的發言及隨後出的華北組的六號簡報，從

八月二十四日到二十五日下午五時，整個廬山都狂熱起來了。這是毛、林、周都沒有想到的。

聽完錄音之後，葉群在昨天同樣的地點，向同樣的人說：「昨天晚上，總理交代張春橋，在憲法草稿中準備好國家主席的章節，這對我們有很大的啓發，我們要向總理學習！」

散會時，我看見陳伯達塞給汪東興幾頁紙，說是搞了幾條馬列「語錄」，打出來請常委審查，可是，下午我去開會前，劉秘書已經交給我這份「語錄」，我就帶在身上去開小組會了。

我下午去參加西北組的小組會。開會前，吳法憲打來電話說：「姓汪的來電話說，他已經發言了，叫我們快發言，也叫空軍、海軍、總後及其他軍隊同志發言。過了這村就沒這店了。今天發言表示你自己旗幟鮮明、立場堅定，明天發言就算隨大流了，今天發言很重要。要盡快發言。」我說：「姓汪的都指揮到我們頭上了。」吳說：「人家也是好心嘛！『語錄』你拿到了吧，這是汪主任親自給我的，讓軍委辦事組『近水樓臺先得月』，先睹爲快了。」我說：「對對對，知道了。」

西北組的簡況（二十四日下午）。二十四日下午，在西北小組會上，我是第四個發言。我記得在西北組，冼恆漢、張達志、康生、鄧穎超、董必武、粟裕、張秀川、李瑞山都發了言。

我的發言主要是三個內容：一是，熱烈擁護林副主席在全會上的講話。二是，嚴厲譴責反毛主席的人。我指出，在九大之後的中央委員會內部還有人反毛主席，這是絕對不能容忍的。我們要提高警惕。三是，宣讀了陳伯達搞的馬列論「天才」的「語錄」。

我發言的具體內容並不很多，時間也不長。我的發言主要是講對毛澤東思想態度問題。我說「林副主席說過『毛主席是天才，思想是全面繼承，捍衛，……』這次說仍然堅持這樣的觀點。爲什麼在文化革命取得勝利，二中全會上還講這個問題，一定有人反對這種說法，有人說天才，創造性發展……是一種諷刺，就是把矛頭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爲什麼在這次會上林副主席又提出這個問題，我認爲是有人不同意，不然爲什麼又提這個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是不能動搖的，不能有形形色色的謬論，不能利用主席的謙虛來反對這個問題。這個問題關係到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問題。」

小組會上對我的發言，反響不很大。大家對我的發言有三點評論。第一，認為我是知情人，對我的發言十分重視，即使一句半句也是有用的。第二，認為我也是文革初期被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毒打的重要受害者。他們說：反對毛主席，反對林副主席，反對解放軍是三位一體的。他們這樣反，當然也就把矛頭指向軍隊了。邱會作同志也是被反的一個。第三，認為我的發言，內容雖然不多，但講得實在，沒有「譁眾取寵」之意。大家對我宣讀的論「天才」「語錄」不特別感興趣，但一致提議要將「語錄」印出來。

我發言之後，康生、董必武、粟裕、鄧穎超等都做了發言。

康生說：「我同意邱副總長（他叫我的職務）的發言，他用的是一種研究問題的態度。這是很好的態度，對問題應當有研究的精神！我看他馬列主義學得比較好。」他還說：學習毛主席著作有三種人，一種是學習好、用得好，林副主席是榜樣；一種是學習還可以，但用不好，我就屬於這種人；一種是不好好學習的，這種人不是個別人，但也不是多數人。康生在西北組的發言中，表示擁護林彪的講話，同意設國家主席。

董必武說：「我很熟悉邱會作同志，他從年青時期就愛學習，他的文化不是老師專門教的，主要是自己努力學來的，他今天的發言還是學習的精神，很好！」董老也表示擁護林彪的講話，同意設國家主席。

鄧穎超說：「我同邱會作同志長征就在一起，他是一個很使人喜愛的幹部。很多同志就很喜愛他。他剛才的發言，是很能啓發人的。」鄧穎超在發言中也表示擁護林彪的講話，同意設國家主席，她還義憤填膺地說：「誰反對林副主席，我們就打倒誰！」鄧穎超還爭功似的說：「我們現在都說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你們知道嗎？『親密戰友』這樣的稱呼是我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第一個提出來的。」

大家差不多都發了言後，由鄧穎超、粟裕牽頭集體通過了擁護林副主席講話，同意設國家主席，希望毛主席擔任國家主席、林彪擔任國家副主席的意見。鄧穎超說：「我們都發言了。現在我們再用全組通過的辦法，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建議，這樣我們小組的態度就更加鮮明瞭。」鄧提議後，立即一致通過，我因知道一點關於「設國家主席」的情況，調子不是很高。全組通過之後，粟裕還對我說：「邱副總長！對設國家主席的問

題，你好像是棄權了。怎麼樣？不會有兩本賬吧！」我忙說：「我完全同意大家的意見，我是不會脫離群眾的。」

蘭州軍區政委冼恆漢同志是西北組的召集人，會上沒有機會發言。「風雲突變」之後，大家在檢討時，冼恆漢同志還坦誠地展示了他靈魂深處的思想，他說：「我是在小組會上沒有機會發言，如果我發言，和大家的意見是一致的。」

晚飯後，政治局開了一個簡短的會議。我在會場的電話室門口與總理相遇，總理笑著對我說：「你下午很有力量！」「你怎麼知道？」我問。

「跟你一組的人（指鄧穎超）同我說的。她還問我說，邱的發言，很顯然是話中還有話的，話並沒有說完，是怎麼一回事？我叫她獨立思考。」我說：「我的發言，還祇是一個開頭，我準備清算造反派對我的摧殘！」

總理說：「不要心血來潮，要考慮成熟再說。」

我說：「這次林總的講話，我事先確實不知道。因此沒有向總理匯報，我要有什麼打算，肯定會事先向總理報告，並得到總理的指示！」

總理說：「這次發生的問題，我知道你是不知道的。這點，我不會有什麼懷疑的！現在事情才開始。」

我說：「我一定聽總理的話！」

晚上，我繼續去參加小組會。會議還沒有開始之前，張秀川同我咬耳朵說：陸定一式人物就是指張春橋吧？我回答說：「獨立思考！」張碰了我的釘子，事後我感到對不起他，小組會正式開始時，我用紙煙盒子給張寫了一個條子。大意是：「你指對人了，但不能點名，可以表示憤怒！」張看到我的條子後表示滿意。

小組會的中間，我在廁所裏碰到曹里懷。我問他發言沒有？並鼓勵他對林總的講話要趕快表態。曹回答說：「這是大是大非問題，我一定會表示自己的態度！」

從上述情況來看，我在小組會上是比较活躍的。造反派把我整得太慘了，我對他們的後臺中央文革是不滿的，這也是我能夠活躍起來的思想基礎。我是堅決反對造反派的，這點是眾所周知的。但對林彪的講話，我確實是不知原委的。在會前，連林彪要在全會上講話，我也是不

知道的。至於林總同江青的鬥爭，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之前，我知道的不多。

汪東興、陳伯達在華北組（八月二十四日）。在華北組，陳伯達到會參加討論，陳伯達說：「我完全擁護林副主席昨天發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語重心長的講話。林副主席說，這次憲法中肯定毛主席的偉大領袖、國家元首、最高統帥的地位，肯定毛澤東思想作為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這一點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寫上這一條是經過很多鬥爭的，可以說是鬥爭的結果。……現在竟然有人胡說『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這些話是一種諷刺。……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謙虛，妄圖貶低毛澤東思想。……有的人說世界上根本沒有天才，但是他認為他是天才。我們知道，恩格斯多次稱馬克思是偉大的天才，他的著作是天才的著作。列寧多次稱讚馬克思是天才。斯大林也稱馬克思、列寧是天才。我們也稱過斯大林是天才。否認天才，是不是要把馬克思、列寧全盤否認呢？更不用說要把當代最偉大的天才一筆勾銷。我看這種否認天才的人無非是歷史的蠢才。」

汪東興在陳伯達發言之後也發言了。汪東興在發言中，表示擁護林彪的講話，還說「根據中央辦公廳和八三四一部隊討論修改憲法時的意見，熱烈希望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副主席當國家副主席。」「建議在憲法中恢復『國家主席』一章。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副主席當國家副主席。這是中央辦公廳機關的願望，是八三四一部隊的願望，也是我個人的願望。」

在會上，汪東興很嚴肅地說：「我們再也不要糊裏糊塗的。這裏面問題嚴重呢。我們林副主席真是了不起。是他對問題發覺得早，又一次出來捍衛主席，不然問題可就嚴重了。」

當有人問汪東興：「你說有人反對主席當主席，這樣講，主席知道嗎？」

汪東興說：「當然知道，就是不讓點名。我一說你們就明白了：現在是筆桿子壓槍桿子，可厲害著呢！」

汪東興發言後，從華北組出來就碰到了國防科委第一副主任王秉璋，汪說：「王主任，要抓緊發言喲，我已經發過言了。我們就是要旗幟鮮明、立場堅定地表明我們的態度。」

晚上，蕭勁光同志來了個電話，他說：「你那裏怎麼樣？」

我對蕭勁光的電話有點奇怪，心想怎麼問到我這來了。蕭勁光是我的老上級，關係一直很好，我隨便回答說：「馬馬虎虎。」

他不滿意地說：「什麼叫馬馬虎虎？今天汪東興來到我這個組，大講了一通設國家主席的問題。我記得以前不是傳達過不設國家主席嗎？現在他又主張設，這是怎麼回事？汪東興口氣很大，他說這是大是大非問題，不能糊塗。我可真糊塗了。」

我不太願意回答他的問題，我就說：「你問李瞎子（李作鵬）就行了。」

蕭說：「問他問得出來我還找你！？」

我看他有些動氣，就立即說：「兩種說法都有，就看自己的階級感情了。常委都說設，主席沒有同意。主席是太謙虛了。」

過去，汪東興給我們通氣，一般是給吳法憲打電話，由吳轉告我們。可二十四日晚上，汪東興逐個給吳、李和我打電話，詢問我們發言的情況，汪很亢奮。汪東興的發言是全會發言的重中之重！他提出「建議設國家主席」，並提出「有人反對毛主席」，「筆桿子壓槍桿子」，總之他提出揪人。這刺痛了毛主席的心，後面毛主席的做法完全證明了這一點。

大會秘書處印發了各個小組的簡報，華北組的簡報（八月二十四日小組討論的情況），編為大會的第六號簡報提前印發了。簡報寫到：「大家熱烈擁護林副主席昨天發表的非常重要的、非常好、語重心長的講話。認為林副主席的講話，對這次九屆二中全會具有極大的指導意義」，「大家聽了伯達同志、東興同志在小組會上的發言，感到對林副主席講話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別是知道了我們黨內，竟有人妄圖否認偉大領袖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強烈的憤慨，認為經過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黨內有這種反動思想的人，這種情況是很嚴重的。這種人就是野心家、陰謀家，是極端的反動分子，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壞蛋，是反革命分子，應該揪出來示眾，應該開除黨籍，應該批倒批臭，應該千刀萬剮，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在東北組，陳錫聯、曾紹山、周恩來、尉風英、李素文、汪家道發言。在東北組的發言中，周恩來總理表示擁護林彪的講話，同意「天才」的觀點。周恩來說：「毛主席天才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儘管毛主席叫我們不要總強調三個里程碑，但客觀上就是這樣。」周恩來還就黨的歷史發展經驗說：「要勿忘過去，警惕現在，教育後代，要夾著尾巴做人，知錯就改，做毛主席的好學生。」此前（七月十八日），關於修改憲法，周恩來在中共中央修改憲法起草委員會全體會議上發言，提出修改後的憲法要「突出毛主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黨是全國的核心力量」，「毛主席是全國武裝部隊的統帥，林副主席是副統帥。」在開幕式前二十二日的常委會上周總理同其他三個常委再次提出要設國家主席。

在華東組，許世友、杜平、韓先楚、楊得志、王震、陳雲、方毅、程世清、周赤萍、陳勵耘、韋祖珍、彭沖、王洪文、王秀珍發言。在華東組的發言中，許世友義憤填膺地抨擊了張春橋：「造反、造反，你們造誰的反？黨和國家都被你們搞亂了！……」。陳勵耘在發言中指責中央文革迫害老幹部，反對解放軍。陳還沒講完，許世友又插話說：「老陳，你講的對！我同意你的意見」。連江青、張春橋的親信王洪文、王秀珍等人也在會上發言擁護林彪的講話，堅持「天才」的觀點。王洪文說：「林副主席講話非常重要，給我們敲了警鐘，不承認天才，就是不承認毛主席的正確領導……」華東組發言非常熱烈，幾乎人人搶著發言。搶不上話筒的人就站起來喊口號：「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到誰！」「誰反對毛主席決沒有好下場！」要求「揪出來示眾」，「鬥倒批臭」，「千刀萬剮！」……張春橋坐在那裏一根接一根地低頭抽煙，一聲不吭，都不敢抬頭看一下是誰在發言，誰在喊口號。

在中南組，劉興元、丁盛、葉群、葉劍英、李作鵬、孔石泉、任思忠、曾思玉、劉豐、華國鋒、李震、于桑發言。葉群說：「林彪同志在很多會議上都講了毛主席是最偉大的天才。說毛主席比馬克思、列寧知道得多，懂得得多。難道這些都要收回嗎？堅決不收回，刀擱在脖子上也不收回！」李作鵬說：「本來林副主席一貫宣傳毛澤東思想是有偉大功績的，黨章也肯定了，可是有人在憲法上反對提林副主席。所以黨內有股風，是什麼風？是反馬列主義的風，是反毛主席的風，是反林副主席

的風。這股風不能往下吹。有人想往下吹。」公安部長李震和副部長于桑爲了爭先發言，爭先對林彪的發言表忠心，竟然搶起話筒來。

在西南組，張國華、梁興初、周興、藍亦農、張銓秀、陳康發言。吳法憲參加了西南組的討論，吳說：「這次討論修改憲法中有人對毛主席是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列主義的說法，說『是個諷刺』。我聽了氣得發抖。如果這樣，就是推翻八屆十一中全會，是推翻了林副主席的《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中肯定下來的，怎麼能不寫呢？……關於天才的說法，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都有過這樣的論述。毛主席對馬克思和列寧也都有過這樣的論述。林副主席關於毛主席是天才的論述，並不是一次，而是多次。……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虛來貶低偉大的毛澤東思想。」

陳老總在華北組發了言，他的言辭是激烈的，因爲他對江青、張春橋一夥反黨亂軍、禍國殃民是痛恨的，他說：「誰反對毛主席就同他鬥！我雖然身體患重病，也要手扶肚子站起來同他們鬥爭。九大之後，我是被打在陰溝裏的，現在我必須爬出來，跟著林副主席一起戰鬥。」

除了陳老總外，老資格的中委，如聶榮臻、陳雲、李先念都發了言，雖然他們不是很激動，但也都表了態，表示對江青、張春橋一夥的行徑不滿。

在二十四日那天的下午開始，廬山的戰火確實是燒得很旺盛的，實際上是對中央文革實行了討伐！在二中全會上，並不祇是陳伯達、汪東興、吳、葉、李和我等反對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這些中央文革的要員，而是極大多數中央委員共同的想法和行動。大多數人對中央文革是痛恨的！今天有林總帶頭反對中央文革，極大多數人都感到由衷的高興！中央文革在文化大革命中整人太多，他們是眾矢之的，真有「老鼠過街，人人喊打」之勢！尤其是汪東興和陳伯達的表現，使毛主席不能接受。汪東興是毛主席身邊的人，是在毛主席身前身後辦事的人；陳伯達是黨內理論家，是「最能準確表達毛澤東思想」的人，他們都是毛的人。他們卻站在林彪一邊，帶頭發江青、張春橋的難，發中央文革的難，毛主席是不會答應的。

第三十三章 風雲突變

晴天霹靂

會議正在進行時，八月二十五日下午五時突然發生了變化。會議由「蓋橡皮圖章」變為「蓋冤案圖章」了。後來，竟捏造事實說，什麼廬山會議期間出現了一個「反黨集團」，林彪搞了什麼未遂的「陰謀政變」。我亦被列入該集團成員之一。但我參加了什麼政變？過去十幾年不知道，現在仍然不知道。因為這是捏造出來的，除了捏造者本人知道之外，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

二十五日下午，我繼續去參加小組會。臨走時，秘書對我說：「皮包裏，放有華北組的簡報，到會場上可以先看一下。」

到了會場之後，我就把包裏的華北組簡報拿出來了。我邊看，內心邊發笑。華北組的簡報寫得實在好！他們的小組會，真是「炮火連天」。原來反對中央文革的竟大有人在，這是我過去所不十分知道的。

這時，各小組的發言已經遠遠超出討論林彪的講話，整個會議已經形成一種勢，即反對江青這些人，甚至不滿文化大革命的「勢」，情緒相當大，這種「勢」觸痛了毛主席。雖然在大家的心目中有一個共識：毛主席搞文革是繼續革命，祇因為江青一夥的破壞，對老幹部無情打擊，才使眾多老幹部遭殃，文革才亂成這個樣子。事實證明這種看法也大錯而特錯了，因為「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是主席的方針，江青是執行主席方針的。

我準備提議，在小組會宣讀華北組的簡報。但我抬頭一看，康生沒有來，小組召集人冼恆漢也沒有來。我立即想到，毛主席那裏是不是開什麼會？因此，我多了一個心，到了嘴邊的話又收了回來了。「禍從口出」的諺語，這次對我真起了作用。

各小組的討論情況，毛主席肯定是知道的。當時，許世友、楊得志、韓先楚三個大軍區司令員也給毛主席和林彪寫了信，堅決擁護毛主席當國家主席。許世友還直接了當地點了張春橋的名，並提議要把他們下放農村，勞動改造三年。尤其是華北組的六號簡報，火藥味十足，並以汪東興的講話為主。汪東興在華北組的發言，時間早於許世友等人，他在發言中，不僅堅決提出要設國家主席，而且提出要揪人。汪東興還說：「現在是筆桿子壓槍桿子，可厲害著呢！……我們林副主席真是了不起。要不是他對問題發覺得早，又一次出來捍衛主席，問題可就嚴重了。」大家都明白了，「不點名」點的是誰了。汪東興的話實在是太露骨太有份量了。

八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時，毛主席在山上的住處召開了中央常委會（各組有一個召集人列席會議）。會上毛主席決定，收回六號簡報（即華北組的簡報），各小組停止開會。毛主席召開的這次會議，是廬山會議的轉折點，矛頭指向江青張春橋一夥的熊熊戰火開始被毛主席熄滅。

八月二十五日下午五時，西北小組的召集人冼恆漢，參加了中央常委會回來說：「毛主席決定小組會暫停，以後怎麼開會，待通知。」

下午五時，各組都宣佈暫停開小組會。但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當時大家都不清楚。這對全會的極大多數人是一瓢涼水，澆得大家昏頭轉向；可中央文革這些人興奮極了！參加會議的人在林總講話之後的情緒和停止開小組會時的情緒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前一種情緒，多數人興高采烈，中央文革的幾個人惶恐不安，憂慮重重；後一種情緒，多數人垂頭喪氣，中央文革少數幾個人興高采烈。

下午五時，我從西北小組會場回來後，對廬山會議二十多個小時（二十四日下午四時起）以來，發生兩次突然變化完全想不通。我同李作鵬商量，必須再次嚴肅問一下吳胖子，問他究竟知不知道林總要在開幕式上講話。如果他知道林總在開幕式上講話，又不同我們打個招呼就可能有什麼新的內幕，那樣，葉群、汪東興、吳法憲他們就是一夥了，我們就不是林總最信任的人了，汪東興在會上講話那麼露骨，究竟原因何在？如果吳真的不知道，就是過去鬥爭的繼續。

晚上，我們一起到吳法憲住處去了。對上述問題，我們直截了當地問了吳法憲，他有點莫名其妙。吳法憲說：「我真不知道林總在開幕式上

提出張春橋的問題。如果我知道，以前不跟你們說，現在再不講實話就不行了吧。要是我知道林總要反張春橋不跟你們說，這是無論如何說不過去的。你們應該相信我說的話是真的。我可以給你們立個字據，連我的人格、老婆孩子都列入擔保之內。」他說得很誠懇。

我們認為吳法憲的話是誠實的，我們相信了他的話，也就放心了。然後，我們三個人就一起回憶準備開二中全會以來的一些主要問題。

我們經過仔細回憶，想起的主要問題就是：關於設國家主席問題，關於在憲法上寫毛主席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問題，關於搞「天才」論的語錄等三個問題。這三個問題，即使有錯誤也是思想認識問題，完全不是什麼政治問題。經過回憶之後，我們自己認為根本沒有什麼可擔心的事，也沒有擔心的必要！

我們一致認為，當前還看不出毛主席對林總的講話採取什麼態度，可能不會有什麼問題。但我們擔心的是，今後江青、康生、張春橋這些人，在中央政治局會更神氣，甚至可能從九大以後的政治局集體辦公退步到中央文革時期那樣的程度；這些人不懂又愛管，把該辦的事搞得一塌糊塗，總理又那麼「顧全大局」。如果廬山這樣轉向的話，林總講話權威性會不如過去，甚至有針對江青的話也會不便說出來，我們對這個問題要充分的認識，也是我們要特別注意的問題。江青不把總理放在眼裏，今後也不會把林總放在眼裏，對我們就更不在話下了。

以後事態的發展，證明我們當時的分析是完全正確的。

這時，汪東興、葉群前後來了電話。

汪東興這個人，九大以後經常給辦事組打電話，有機會就往辦事組跑，跟葉群就更緊密了。上了廬山以後，他天天給吳法憲打電話，甚至一天不止一次，一般情況下由吳再轉告我們。汪東興說：「看到全會上各組的氣氛，他們真害怕了。江青帶著張春橋、姚文元，乘江青的汽車闖進了毛主席的住處。江青並不知道下午三時中央開常委會，她是帶著張、姚去向毛主席告狀的。江青進毛主席的門時，衛兵擋了她的車。江青說：我自己的家裏也不許進去嗎？衛兵、江青正在爭議時，張耀祠出來了，這時江青才進去的。江青向毛主席說：我帶春橋、文元來見你一面。他們快死了，真正擁護文化大革命的人你要保呀，他們表面上是對著春橋和我，實際上是對著你來的，現在各個小組都有劉少奇的陰魂。」汪東

興接著幸災樂禍地說：「張春橋、姚文元這兩個傢伙，見到主席立即跪在面前，一人抱著主席一條大腿痛哭，這兩個傢伙把主席的褲子都哭濕了。毛主席對他們說：『對開會的事，中央就要開常委會討論了。』」汪東興還胸有成竹地說：「我看開會也是主席讓大家給他們一條生路。」汪東興還專門說：「主席已採取措施，今後我們暫停電話聯繫，你們之間也少打電話，有話當面說。」汪東興還說：「許世友來開會時，主席說：『我不能當國家主席，你爲什麼一定要我擔任國家主席。我的手都是冰冷的（伸出手去給許摸），我每天能睡著覺的時間很少。我不能擔任國家主席那個職務。國家主席由老年人、年輕人擔任都可以。你許世友也可以，你許世友擔任國家主席就足足有餘。』許世友說：『我聽毛主席的話，我再不提議毛主席擔任國家主席了。』主席笑著說：有希望！祇要對你許世友的工作做通了，其餘的人就沒有不通的。」

但是，毛澤東聽進了江青告狀和求援的話，聽信了江青的話！主席是反對「天才論」的，還寫了《我的一點意見》，批評陳伯達。毛主席還說過不當國家主席。「九一三」以後，專案組從吳法憲嘴裏壓出了「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往哪裏擺」的假話，毛主席又把「設國家主席」杜撰爲我們反黨的政治綱領，「天才論」是我們的理論綱領，事情越搞越假，越搞越亂。實際上不是這麼回事。主席真正的心病在哪裏呢？一個是林彪因不滿中央文革在會上不指名地點了張春橋，那麼多人都擁護林彪的講話，林在會上的威信，使毛主席難以接受；另一個就是除造反派的中央委員外都反對文化大革命，會上提出揪人揪張春橋。主席很自然會把反對張春橋和反對文化大革命聯繫在一起；把文化大革命的命運和毛澤東自己的命運聯繫在一起，主席後來不是講過，他一生幹過兩件大事，文化大革命就是其中一件。因此，反對文化大革命，對主席來說是一件要命的大事。這樣，林彪在大會上不點名地點了張春橋一事，就顯得嚴重了。

接著，葉群也來了電話，她說：下午三時，林總去開常委會。她想到林總去開常委會，必須追上林總去叮囑幾句。葉群在毛主席住所門口不遠的地方追上了林彪的車。葉群向林總說：「今天，如果有什麼很麻煩的事，一定要保汪東興！」葉群驅車趕林總時幾乎翻了車，但她趕上了林總，對發生過的驚險也就不在意了。不過，葉群下車下得急，下車腿

一軟就坐了一個「屁股蹲」，受了傷，以後幾天開會，她都墊個小游泳圈在屁股下面。

二十五日晚上，政治局開會，擴大到各小組的召集人，會議由總理主持，這時江青、康生、張春橋他們那種不可一世的勁頭又來了，因為主席的決心還不知道，尤其是主席對林彪的態度還不知道，總理看到他們那個樣子也不高興。我當時就隱隱感覺到，主席的屁股可能坐到江青那邊了，可我萬萬沒有想到主席在山上和下山後的一切都是對著林彪來的。總理在會上說：「會議的日程做一些調整，根據主席的指示，休會兩天，大家休息休息，很多人還沒有來過廬山，可以去遊一遊，換換空氣。」

散會以後，吳法憲要到林總那去，我們勸他不要去，他還是堅持要去，爲了等消息方便，我們就坐在吳胖子住處等，不久他就回來了，吳說：「我去時林總剛從主席那裏回來，主席召集開常委會，各大組的負責人也到了，林總說主席對會議不高興，說陳伯達在華北組起哄，並說以後不要再提天才了，國家主席他不當。林總說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事情，不做虧心事不怕鬼叫門。」

我回到住處，總理給我來了電話，他同我說：「主席說廬山問題還是一般的思想認識問題，但發生在不同的人的身上，就有一定的嚴重性。這就是說，在陳伯達身上發生的一般的問題，也必須嚴肅對待。你沒有什麼大事，但要化被動爲主動，因爲你究竟有沒有大事，不是你自己定得了的。」總理的話，都說到這種程度，我仍然沒感到自己會有什麼事，祇是我感到陳伯達可能要倒霉了，可是爲什麼要搞到陳伯達頭上，我真是搞不清楚。

毛主席宣佈停止小組會後，從八月二十六日開始，大家可以自由活動，有的人在家裏看會議相關的文件，有的去遊廬山，晚上還安排看電影。實際上，主席自己忙乎得很，天天找人談話；江青他們也忙乎得很，而且打著主席的旗號，拉攏人心。我們幾個則沒有給任何幹部談過話。

八月二十六日下午，吳法憲通知我到總理的住處開會，這個會除吳、李和我之外，還有康生、汪東興參加。總理說：「按主席指示，召集你們來談一談，把有些情況搞搞清楚。」

總理的話音一落，康生就氣勢洶洶得對汪東興說：「你汪東興所在的華北組六號簡報被毛主席扣上反革命簡報的帽子，可是反革命的帽子沒有給年你汪東興戴上，你敢做不敢當，不但推卸責任，還陷害別人。在華北組起哄！」汪東興沒有看康生，沒有吭聲，也沒有低頭折服的樣子。這下康生更火了，扯著嗓門說：「你汪東興在華北組點火，陳伯達跟著你起哄！吳法憲撒謊。還有陳毅這個反革命分子也跳出來了！你們想幹什麼？」康生講話時，總理一直看著他，沒有傾向性的表情，也沒有說一句話。因此，我們心裏也有些底，李作鵬是個有膽識的人，他首先頂了康生一句：「康老呀，總理說，按主席指示找我們來，是把情況搞清楚，你怎麼上來就下結論呢？」康生一下就啞火了，吳法憲見到此情景，立即跟著說：「康生同志，你是代表中央下結論嗎？這個結論有點早吧。」康生老到得很，他自知話說過了頭，一句話也不回答。總理趁勢說：「今天就到這裏，明天上午接著談。」總理又強調：「主要是把情況搞清楚。」在會上我也沒說話。

第二天（八月二十七號）上午繼續在總理那裏開會。吳法憲拿著一本《黨章》對我和李作鵬說：「這是林總給我的黨章，黨章上明明寫著『黨內允許有不同意見的爭論』。我才不怕康生呢！毛主席說我錯了我才承認。」在會上康生把我們當被告一樣，又是追又是訓，大放厥詞。康生竟說：「你們也是『軍事俱樂部』！你們要交待這個俱樂部都有誰？怎麼成立的？爲什麼陳毅這個反革命分子也跟你們在一起？陳伯達起哄很得意呀，他把林副主席也綁在自己的戰車上了！」

我聽康生簡直在胡說八道，況且我昨天也沒有發言，我應有個態度，便反擊康生說：「我在西北組發言時，你康老也在場嘛，你同意我的發言，你還表揚我馬列主義學得比較好，我還受寵若驚呢，你自己說的話都忘了嗎？黨的會議，大家都可以發言嘛。設國家主席，祇是傳達過不同意見，究竟是哪種意見，也沒有定嘛，就是讓大家在會上提嘛。你自己也同意設國家主席嘛！」聽了我的發言，康生氣得滿臉通紅，但我說的話比較平和，康生想發作也發不起來，他傲慢地揚著頭，鬍子翹老高。吳法憲緊接著說：「你今天又說陳毅是反革命，而且和我們搞在一起了，這是中央定的嗎？你是常委，說話要負責呀！我們沒有『軍事俱樂部』，沒有！我們祇有軍委辦事組，這是毛主席定的！」吳法憲說著說著

激動地站起來了。總理一直沒有發言，這時總理立即說：「康老的話說過了。」總理就說了這麼幾個字，又讓大家說。李作鵬對付康生是有辦法的，以前的政治局會議上，一有機會李作鵬就挖苦康生。李作鵬說：「康老呀，我記得在九大時，主席說陳毅是右的代表，現在怎麼成了反革命了？這是創造性的，還是諷刺呀？」我們三個人把康生收拾了一頓，康生那個囂張勁頭才下來，不過我們也祇是嘴上痛快，因為康生不是代表他自己來的，他是代表毛主席來的，我們這些人不諳世故。總理說話一直沒有傾向性，總是說：「平心靜氣，平心靜氣，主要是把情況搞清楚。」

下午四點左右，陳伯達叫吳、李和我到他住處去談了一次話，時間約一小時。對此我們有點猶豫，吳法憲說，陳伯達告訴他是主席叫他找我們的。

我們到他住處時，我們看到陳伯達精神十分緊張，很沮喪。大家坐下之後，喝了一點熱茶，他精神的緊張程度稍微紓緩一點。他說：「我叫你們來是經過主席批准的。主席叫我去談了一下，對我有批評，對你們也有批評，主席要我找你們幾位談一下。」

陳伯達顛三倒四地說了不少話。我記得，主要內容是談的毛主席批評天才論，說陳伯達給我們語錄，把我們騙了。在談話的時候，吳法憲拚命記錄，我也幫他記了一些要點。整個談話的內容都是重要的，但如下幾句話，我認為特別重要。

陳伯達說：「毛主席指責我參加了『軍事俱樂部』！說我背叛了中央文革，要我到江青、康生那裏去承認錯誤，爭取他們的原諒，搞好團結。」陳伯達說：「毛澤東一出此言，我腦子就懵了。『軍事俱樂部』是一九五九年毛澤東講彭德懷的話，怎麼在十年以後又拿同樣的話講起親密戰友林副主席來了？我是罪孽呀，怎麼把林副主席推到第一線了。」

陳伯達說：「康生指責我把林副主席綁上了戰車，甘願當叛徒，投靠了軍委辦事組，我準備你陳伯達殺我的頭！」

臨走時，陳伯達向吳法憲宣佈：「我犯了錯誤，從此中斷電話聯繫！」這幾句話，把當時發生的問題的性質都點明了。例如：「軍事俱樂部」一詞，是上次廬山會議反彭德懷的用語，康生的話是再明顯不過了，我們問題的性質和彭德懷是一樣的。

我們三人都認爲，問題一下就嚴重了。就決定到林彪那裏去一下，準備走時，吳說給葉群打個電話，陳伯達聽見後像嚇丟了魂似的，懇求吳胖子千萬不要在他那裏打電話，我們就離開陳的住處。吳說我們就直去林彪的住處，如林不肯見就回來，李說如果不見，那問題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到了林彪的住處，葉群依舊很熱情，說：「快來，快來。」林彪也親自出來了，我們把陳伯達的話講了一遍，林彪還是很鎮靜，好像對這些是是非非的話有反感，林總祇說了一句：「那是講陳伯達。」

對於毛主席同陳伯達的談話，我又專門打電話向總理匯報。他聽到後也非常吃驚，他認爲主席把問題搞嚴重了。

周總理真是不辭辛苦，立即找吳、李和我談話，總理說：「話的份量是相當嚴重的，要超過『二月逆流』，但主席是對陳伯達說的，與對你們說，是有區別的。要是有什麼需要你們注意的，我會向你們打招呼的。但你們講話要慎重，別人豎著耳朵聽你們講話，搞不好要影響林副主席。」

我們對總理都存有感激之心。因爲在最高層搞這些名堂，我們的確一竅不通。

不管怎麼樣，從陳伯達這次談話起，我們才真正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對我震動很大！從此，我就比較認真考慮問題了。我考慮來考慮去，腦子裏「翻箱倒櫃」，各方面的問題都認真想過了，在廬山除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之外，大家對林彪講話的態度都是一樣的，開始也包括康生在內。因此，不是誰有錯誤的問題，而是主席說誰有錯誤的問題。我認爲不管廬山的問題有多大，對我們都是「提起千斤重，放下無四兩」。現在的關鍵問題，是毛主席「提起」還是「放下」的問題。後來的事實證明，是毛主席把我們和汪東興分開，把我們和全體中央委員分開，把我們孤立起來，其實也就是把林彪孤立起來，再扣上幾頂帽子，進行打擊。

林彪的態度

總理宣佈暫時休會以後，林在等主席表態，也沒有主動要求去見主席，因爲不知道談什麼，也不知道錯在哪裏？主席反而天天找人談話，主席還想了一個方法，叫林彪給陳伯達、葉群、吳法憲、李作鵬、邱會

作、汪東興開會，說我們犯了錯誤，都是屬於思想認識問題，把問題談通了，問題也就解決了。

林彪是不願意出面開這個會的，他認為主席不夠誠懇，但主席發了話，林也祇能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辦，從八月二十八日開始，林彪就召集陳伯達等六人，在他的住處開過三次會。每次會九時開始，十一時結束，每次會約兩小時。第一次會議開始時，林總說：「毛主席要我同各位談談，做點思想工作，我們的會要開兩三次，每次會的情況，請汪東興向主席口頭報告，我就不另寫書面報告了。」林總當面批評了陳伯達：「你的書生氣太重了，考慮得太多。主席批評我能不能再看張春橋兩年，主席說得對。我們部隊的幹部要和地方幹部搞好團結。就是這些嘛。」對於讓林主持這樣的會，後來林彪說主席在「耍」他，他也祇有應付差事。

到會的人都說了話，說的內容都是有關團結的問題。當時，毛主席《我的一點意見》還沒有印發出來，所以大家都沒有批判天才論的問題。大家的話都說得很簡單，都是屬於表態的話，實質性的話一句也沒有。這種會是純粹做樣子的。

第二天開會的時候，林彪有些調侃地說（我從沒有見到過林彪開玩笑，林說話向來認認真真）：「你們說說，是不是有組織，有預謀的？你們為什麼在同一時間，講了同樣的話？」三天的會，林彪沒有多講一句話。

葉群對我們說林總的態度是：「不改變自己的觀點，不干擾毛主席對問題的處理。」從此他基本上都是這個態度。葉群還說：「林總說，吳法憲提出檢討，這是他的權利。如果他要問我（林），我就說檢討是因為有錯誤，你吳法憲沒有錯，你檢討什麼？！」從我們比較知道內情的人來說，林彪在廬山的確沒有單獨進行過任何活動。他的心情總是坦然的。他說過：「一個人搞鬼還是沒有搞鬼，自己說的不算數，要別人說的才算數。我不出門，不說話，不找人談話，就沒有什麼顧慮，也不給別人製造緊張局勢的話柄。」在廬山，吳、李和我等人，除了在公開的場合同林彪見面說過話之外，基本上都沒有單獨同林總講過話。事後我想了一下，林總在二中全會上的講話，好像是軍事上的「火力襲擊」。林總的「火力襲擊」的目的，不是對準整個中央文革，而是對準他們的幹將——張春橋。這一仗如果成功了，對中央文革以後的文章就好做了。但林總的火力襲擊還沒有完，戰鬥就宣告失敗了。

林總在廬山反對中央文革是未遂政變嗎？這完全是鬼話。那麼林總爲什麼失敗了？毛主席支持江青，支持中央文革是林總失敗的根本原因。林總的命運就抓在毛主席手裏。

毛主席支持張春橋，是爲了江青嗎？這也不全對。其實，毛主席支持張春橋，這是關係到整個文化大革命的路線問題，也關係到文化大革命中搞造反的一批幹部。上海是文化大革命搞得比較好具有代表性的地區，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又是從文化大革命產生出來的代表人物，這就是說，如果張春橋被打倒了，就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而是文化大革命產生出來的一批人的問題。林總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積極領導者和既得利益者，除了在毛主席決定後，他對打倒賀龍在九大說過幾句話之外，在文化大革命中沒有欠下什麼需要還的賬。

吳法憲檢討

八月二十八日上午，總理給我來電話說：「我已通知吳法憲寫個檢討，這樣爭取主動，主席對於肯做檢討的人，一般是原諒的。我看吳法憲的精神有些緊張，恐怕他寫不好，你和李作鵬都去幫他起草一個稿子，拿給我看看。」我說：「我馬上照辦。不過這裏面有個問題，吳法憲寫檢討一事，是否要報告林副主席？吳一檢討，勢必影響到葉群，也就等於影響到林副主席。」總理說：「你考慮得周到。但檢討還是要寫的，不然主席那裏不好交待，兩邊都要兼顧到。關鍵是檢討怎麼個寫法，所以我才叫你和李作鵬去嘛。」

我給吳法憲打了一個電話，講明情況，吳表示感謝，說自己先搞。吳的思想壓力大，自己搞不深透，秘書搞，吳又不滿意，主要是怎麼說林，拿不定主意。晚上我和李作鵬到了吳的住處，共同商量檢討稿怎麼寫，大家商量了一個框架，吳當時精力消耗太大，有些力不從心，我就執筆給他寫了一個稿子，吳認可了，又拿給李去看（李身體不好，先回去休息了）。吳法憲向總理交了卷後，總理又把我們三個人叫去親自談，親自動筆修改後才定稿的。總理還說：「你們幾個人政治上一直都很順利嘛，要經得起挫折。」吳的檢討稿很簡單，一是說對林的講話，自己理解上有偏差，因此在發言中有錯誤，自己發言中的錯誤自己承擔。總理說：「這個提法好，要自己承擔，保護副帥（指林彪。這是總理的專用語）」。

一是說討論林彪的講話是吳提出來的，吳說他的提議干擾了大會的議程。這個提法就等於替總理開脫了，因為此事江青抓住不放，討論林彪的講話和聽錄音畢竟是總理同意的。總理對這一條特別滿意。

總理這個人，對人還是很誠懇的，而且精力特別充沛，對大局的事，對有利於團結的事，他都會盡力去做，他對黨內的團結有美好的願望，從不好勝。比如說，葉群二十五日下車時坐了個「屁股蹲」，開會時很不方便，他想請假，總理說：「這個時候千萬不能請假，不然別人會有很多想法。」葉群聽了總理的話，開會時搞個小救生圈墊在屁股下面。當然，祇要主席的態度已明確，對總理來說，上面那些就不算數了，他是無條件聽毛主席的，總理知道主席是太好勝了。

當時，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江青、康生、張春橋他們，把前一段在北京討論憲法時，做記錄的人（也是這次會議會務組的）找來寫了一個材料，說「在憲法修改小組的討論會上，吳法憲和張春橋確有爭論，但這個爭論，不是原則上的爭論，而是文字上的爭論」，這個材料是他們為張春橋找退路的。二十五日以後，形勢變了，江青、康生、張春橋他們又把這個材料，捅到主席那裏去了，並大肆宣揚說吳法憲造謠說假話。吳法憲當時已經「潰不成軍」了，他沒有和我們商量竟承認自己說了假話。這件事引起了林總、周總理的極大注意，我和李作鵬對吳則極為不滿。林總在吳困難的時候，真是幫他，林認為吳法憲不會說假話，並為他專門說了一段話。林總還叫把他的話傳出去。

林總說：「吳法憲沒有說假話的問題。吳跟我幾十年，我就沒有聽過他說過假話，也沒有聽別人說過吳法憲是一個說假話的人。吳法憲對毛主席、對黨都是忠誠老實的，是不會說假話的人。」

林總還說：「在憲法小組，對運用毛澤東思想編寫憲法，確實有過爭論，有不同意見是正常現象。我們決不能說，提出不同的意見就是說假話。這樣就不是以理服人。」

同時，總理在東北小組也做了文章。雖然，總理沒有象林總那樣直截了當地說：「吳法憲是不會說假話的人。」但說的話是很有份量的。總理說：「吳法憲是一個很誠實的人，對爭論的不同意見不能簡單地認為就是說假話。」懂得內幕的人，對總理的話是完全理解的。吳法憲說假話風波到此就平息下去了。

黃永勝上山

二十九日上午，李作鵬和我在吳宿舍閒談，葉群也來了，葉群說她拾到了三個「險球」。這三個「險球」是指周總理轉給葉群的三封信，並附有條子說：「此件存你處不必再呈、轉了。」

信是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志、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寫給毛主席、林總、周總理的（轉去的還有其他省、市中央委員的信）。信的內容是打擊張春橋的。許世友提出，要把張春橋下放農村改造三年。楊得志、浙江的南萍、熊應堂提出要公開批判張春橋，韓先楚原來沒有寫信，聽許世友一講，他立即響應，他說：「我也給這個鱈魚眼（指張春橋）補一槍。」葉群對我們說：「與此事不搭槓的老同志，我一定要保他們。」

這樣的信不轉到毛主席那裏去，不去火上加油，祇有周總理能夠做到，同時也祇有總理能夠把事情向著好的方向解決處理。

晚上，李和我建議吳求見毛主席。吳立即向毛主席秘書打了電話。不久，秘書回了電話說：「主席說，現在不要談話，以後主席會找你談話的。主席交代了三條；一，不要緊張；二，要犯得起錯誤；三，我們要以孔夫子打牌『和爲貴』的辦法處理問題。」

八月三十日，黃永勝到廬山，李德生回到北京值班。黃永勝一上山就被叫到毛主席住處，我們一直在吳法憲的住處等他。黃從主席那裏出來，又去看林彪，半夜了黃才回來，而且是和葉群一起來的。黃祇簡單地講了一下毛主席和他談話的情況，有些情況尤其是主席拉他和批評吳法憲的話沒有多講。

黃永勝說毛主席估計山上的情況他已經知道一些，因此談話一開始主席就問：「到廬山來緊張嗎？」

黃永勝：「我剛到，就來主席這裏。」

毛主席：「搞突然襲擊，還那樣厲害！張春橋手無寸鐵，你們搞他幹什麼？」

黃永勝一聽說的是張春橋，也直言回答道：「張春橋不得人心，我們確實有些意見。他特別倚重江青同志，我認爲有些事是給主席臉上抹黑。政治局實際上是不團結的，張春橋起的作用不好。總理一直在努力工作，擔子很重，很吃力。過去，沒有向主席報告清楚，我應當負責！」

毛主席：「你當然要負責，你是一個頭。張春橋拍江青的馬屁有什麼用？」

黃永勝說：「江青自以為有偉大領袖毛主席這張牌嘛！她總認為自己主牌多，又有大王，她總認為自己會贏。」

毛澤東：「大王出過了，小王就當家了。你是和我一起搞秋收起義、上井岡山的嘛！人不多嘍。爲什麼連你都不向我報告江青的情況？」

黃永勝是個政治上挺成熟的人，究竟毛主席怎麼看江青，他還沒摸透，因此他沒有順著毛的思路往下說，黃說：「我們不想干擾主席。」

毛澤東：「你們能不能讓我看張春橋三年？」

黃永勝：「我是在主席領導下參加秋收起義的。幾十年來的槍林彈雨，艱苦歲月，我都是跟毛主席的，我都是擁護主席的。但中央文革的一些爲人爲事，我不能同意。造反派到處衝擊，到處奪權，到處打、砸、搶，我不同意。造反派上面有人，問題最難辦。」

毛澤東：「你也不贊成文化大革命？」

黃永勝：「我堅決擁護毛主席、林副主席！我不同意的是打、砸、搶。」

毛主席說：「現在問題都解決了，不把問題帶下山去。今後主要是學習、提高認識問題。大家都要執行九大路線，團結起來，把文化大革命搞徹底！」

黃永勝：「我聽主席的話，在主席領導下，努力學習，努力工作，搞好團結！」

不過，黃永勝的態度，也決定了事後毛對林彪，黃、吳、李、邱的取捨。毛當時已經很清楚了：要林彪、黃、吳、李、邱，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保不住，他們骨子裏都是反對文化大革命的；要保住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必須拿掉林彪！有沒有以後的「九一三」事件都是一樣。

黃永勝到廬山之初，因爲毛主席同他談了話，開始他有點「局外人」的態度，他不主動向別人打聽情況，別人同他說話，他也不太感興趣。同時他負擔也並不重，因爲毛主席已經說了，「問題已經解決了」。我觀察到這一情況之後，除了有事之外就很少到他那裏去了。祇是三十日晚上，黃、吳、葉、李和我在一起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葉群把廬山問題，向黃做了比較系統的介紹，並從林副主席對廬山問題的態度說起。

黃永勝與總理的聯繫比較多，受總理的教育和點撥比較多。黃對廬山的問題瞭解多一些了，也漸漸找我們談話，並且在對待中央文革一幫人的態度上，黃比我們還堅決，對維護大局，他和總理作了不少工作。黃強調：一個是保護副帥；一個是叫吳法憲在檢討時祇說自己，不要扯別人；一個是要保護陳伯達和汪東興，問到自己頭上就實事求是地說。黃強調說，老夫子（陳伯達）也是手無寸鐵；一個是強調山上山下沒有聯繫，在廬山我們和大家的意見都是一致的，不承認我們是一夥；一個是和張春橋有鬥爭而且是原則性的鬥爭，批評張春橋沒有錯，不是祇有我們幾個人對張春橋有意見，政治局很多人對張春橋都有意見。我現在想起這些往事，仍然認為黃永勝的思想水平是高的，人品是很可貴的，如果他被毛主席拉過去，問題就複雜了，毛主席就可能提前把林彪端出來。

《我的一點意見》

毛主席《我的一點意見》這個文件是八月三十一日下發的，政治局進行了學習討論。

《我的一點意見》是毛主席看到華北小組的簡報而寫的。在原稿上，除了關於搞語錄的問題，還有陳伯達、吳法憲的名字。後來，周總理說：「語錄是陳伯達搞的。」毛主席又把吳法憲的名字刪去。

《我的一點意見》，我記得文字並不長，主要內容有：對廬山發生的問題，提高到「炸平廬山」的說法。在天才論的問題上，諷刺了陳伯達，保護了林彪。文中關於天才論的問題，有一句「我同林彪同志交換過意見，我們一致認為……」整篇文章，初讀起來好像學術味還是相當濃的。但細細一看，就是對陳伯達的宣判書了。

在政治局討論《我的一點意見》時，江、康、張、姚高興得不得了，姚文元說：「毛澤東思想是無價之寶，可以戰勝一切牛鬼蛇神，也可以戰勝權威人士（暗指林彪），我們要很好學習毛主席這一重要指示。」

張春橋說：「毛主席發表的《我的一點意見》，是偉大的馬列主義的又一光輝文獻。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打倒了劉、鄧反革命修正主義司令部，同樣，毛主席發表的《我的一點意見》也一定是戰無不勝的。我們要以批判『天才論』為中心，學習毛主席《我的一點意見》，建議文元連夜寫出個大綱來。」

吳、李和我除了表態擁護之外，一句話也沒有說。姚文元帶著諷刺口吻說了一句：「不表態也是一種態度！」我也說了一句：「表態也並不一定是最好的態度！」周總理怕吵起來，就用其他的話把問題引開了。

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對《我的一點意見》如獲至寶！江、康、張、姚召集華東地區的造反派中央委員，如王洪文、王秀珍、徐景賢等十餘人，在張春橋的住處舉行了慶祝會，光茅臺酒就喝了幾瓶。

小組會恢復後，姚文元在他所在的東北組發言，講了幾小時，主要是批判天才論。消息傳了出去後，其他小組造反派出身的中央委員也不守紀律，竟然脫離自己的小組，都跑到東北組去聽姚文元發言了，中央文革在造反派中的威望是不可低估的。

毛主席派張春橋到華北組，有人請他批判天才論。他祇說了兩句話：「唯心主義大師是馮友蘭（北大教授），黨內的蹩腳理論家是陳伯達。祇有他們兩個人，才有資格講天才論的問題。」除此之外，他還擅自參加了各個小組的會議。他的舉動沒有別的，就是要大家看看，「副統帥親自上陣也沒有把我張春橋打倒。還有什麼人可以把我打倒嗎？」周恩來知道會場被他們搞亂了，非常生氣。他告訴張春橋：「回到華東組去。」張對總理不屑一顧。毛澤東知道這一情況後，哈哈大笑。

江青的表演就更使人噁心了！她每天上午都到一個小組（不固定）的會場上去。她到西北組的時候，一進門就笑起來，表示非常高興的樣子。坐下之後，她說：「我來晚了，是有原因的。我要協助毛主席處理會務的許多問題之後，才能出門。我是來看看大家的。毛主席睡覺很好！」

我在小組會上也做了簡短的發言。我發言的主要內容是說了自己學習差、理論水平低，識別不了真假馬克思主義，今後要好好學習馬克思主義和毛主席著作，愛護黨的團結。我的話音一落，康生就對著我面帶冷笑地講話了：「善於觀察時勢的人，應當多說一點嘛。上一次在小組會上，不是說得很好嗎？」

「把時間留給理論家康老用。聽說，康老已經準備了長篇發言稿。」我是以平常的態度回敬康生的。

大家對我們倆個人的幾句對話，報以哄堂大笑。

康生在西北組除了把我諷刺了一頓之外，還以「反對唯心主義的先驗論」為題講了大約兩小時。

會議的最後幾天

九月一日，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各省市、大軍區負責人出席了會議），會議主要內容是：吳法憲、陳伯達做檢討，會議由林彪主持。林彪能主持會議也是我沒有想到的，我以為他會稱病，但他卻來主持了會議。

陳伯達發言時，張春橋做「翻譯」，這雖是一件小事，但對他們來說，卻是一件大喜事。他們在展示：「你陳伯達打不倒我們，你今天怎樣了？」

九月二日，繼續昨天的政治局擴大會議。陳伯達、吳法憲檢討後，還有幾個人發了言。

張春橋發言，除了盡情謾罵陳伯達之外，還說了：「以吳法憲為戒，努力學習努力工作。」

林彪在會議結束時，對陳伯達說了兩句話。他說：「陳伯達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對這樣的人應當與之徹底劃清界限……」

會議至此，「廬山戰火」就暫時平息了。會議轉為全會原來的議題了。

九月三日，總理回北京了，會議似乎沒有人管，各小組名為審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和《一九七〇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實際上都在亂扯談，大部分人拿著審議文件當閉口道士。

九月四日，總理回來了。主席在他的住處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會上主席說不要搞得太緊，會議再延長兩天，然後對到會的陳伯達說：「閉幕式你就不要參加了，你如果參加，別人會把你從主席臺上攆下來。」主席說完話，陳伯達當時非常窘迫，他低著頭坐在那裏不動，這時總理走過去，給陳伯達咬了咬耳朵，陳伯達站起來快快不樂地退出會場了。陳走了以後，主席又接著說：「陳伯達的歷史我和康老最清楚。我在這裏向中央揭發陳伯達，陳伯達是個托派、叛徒……他出生在一個封建官僚家庭，陳伯達有變節行為，一九三一年被捕叛變，成了國民黨特務，一貫追隨王明反共。……」主席還說：「對陳伯達還要看一看，可以給他當個中央委員。」

毛澤東的講話，大家聽了很不是滋味。過去，陳伯達號稱馬列主義理論家，在毛主席身邊工作三十多年，周恩來也說過：「伯達同志最能準確地表達毛澤東思想。」前幾天，陳伯達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現在怎麼又是「托派」，又是「變節」，又是「叛徒」，又是「反共」方塊有錯誤區制作可以檢

討嘛，怎麼一得罪，就搞成這個樣子？張春橋也是叛徒，爲什麼一字不提！？林彪揪張春橋就是分裂黨，毛主席揪陳伯達就是團結勝利的大會？大會討論林彪的講話就是改變大會的議事日程，大會學習毛主席《我的一點意見》不也是改變大會議事日程嘛。聽了毛講完話後，人人面面相覷。不過主席講到：「對陳伯達還要看一看，可以給他當個中央委員」時，葉帥突然發言。他說：「我看陳伯達的事不能這樣就完了！」毛主席聽進了葉帥的話，遂決定對陳伯達審查，並由葉帥具體負責。

主席在九屆二中全會上，那種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神氣，表現得淋漓至盡。毛主席已經站在黨和國家之上了。這是毛澤東主席晚年所犯錯誤根本原因之所在。

最後總理又徵求大家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和《一九七〇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的意見，這個時候大家哪有心思討論這些，都說沒有意見就散會了。

九月五日，討論通過了《關於加強戰備的報告》。

九月六日九屆二中全會閉幕。會議由林副主席主持。

這是毛主席特意要林總主持會議的。毛主席說：「你要不主持會議，大家會有很多想法的。」

會上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一九七〇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和《關於加強戰備的工作報告》。會上也通過了全會的公報。

毛澤東在會上講了話，他在講話中，暗指陳伯達是黑秀才，大家上了黑秀才的當。暗指張春橋是紅秀才，在會上公開給張春橋撐腰打氣。接著主席說：「他們認爲，代表人民的標誌就是要當國家主席。我在十幾年前就不當了嘛，豈不是十幾年以來都不代表人民了嗎？我說，誰想代表人民，你去當嘛，我是不幹，你把廬山炸平了，我也不幹。你有啥辦法呀？」

事實上，誰也沒說過「代表人民的標誌就是要當國家主席」，大家提議設國家主席的目的，是爲了健全社會主義的國家體制。

但在閉幕式結束前，周恩來講話時說他代表毛澤東主席宣佈對陳伯達進行審查。

全會閉幕了，服務員在打掃會場的衛生時，竟然從地上拾到「打倒張春橋——幾個中央委員」的條子。周恩來看到條子後，非常感慨。我想主席看到條子後，一定也非常吃驚。

九月六日晚，中央中央政治局舉行了簡短會議，周總理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廬山的問題不下山，傳達會議精神要控制範圍。回到北京後，政治局舉行一次學習生活會，各自做自我批評。『孔夫子打拳，和爲貴』。康生則提出：「廬山的問題並沒完，要追查到底，落實到人頭，這樣才能徹底解決問題。」周恩來祇說了一句「應照主席指示辦。」就散會了。

與會者陸續下山了。

九月七日，林彪下山了。周恩來去看望林彪，兩人緊握雙手，面面相對，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和我下到九江機場向林彪送別，在飛機上大家合影留念。林說：「不做虧心事，不怕鬼叫門。照常吃飯，照常睡覺，照常工作，最多是個彭德懷第二。你們有事情多向周總理請示報告。」從此以後林彪就很少和我們聯繫了。

周總理九月九日上午下山。

毛澤東九月九日下午下山，毛澤東走在所有中央委員之後。

九月六日晚，葉群給吳法憲打電話，叫黃、吳、李和我也去看望一下江青。吳說，他們可能不願意去。葉群說去做做樣子嘛。

黃、吳、李和我幾個到了江青住處，足足等了半個小時，江青才從樓上下來，而且穿著睡衣，我們幾個真窩火。江青象女皇一樣，邊走邊說：「我向來是反對陳伯達的，你們又不是不知道。現在舒服了吧，過去你們不聽我的話，犯了錯誤，今後聽主席的話就是了。主席和我對你們的態度還是和過去一樣的。你們主要是上了陳伯達的當。」從江青家出來，大家異口同聲地說：「戲子，戲子！真他媽窩囊。」

毛澤東的苦澀

我認爲主席內心是苦澀的，主席對高級幹部的情況，心裏都清清楚楚，文革中應不應該打倒這麼多老幹部，他心裏最清楚。「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團結不同意見的人，甚至反對過自己的人一道工作」這是毛主席經常教導的，可是，在文革中這些他都不要了。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是否要用「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方法解決黨

內問題？黨內搞這麼大一場革命，是不是應該由江青掌重權來做領導文革的工作？主席心裏都清清楚楚。現在，他又以否定林彪的正確意見為代價，以否定四個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正確意見為代價，以否定政治局大多數同志的正確意見為代價，以否定二百多個中央委員的正確意見為代價，換取了江青、張春橋的「安全」，這種代價也未免太大了。為了一個造反派張春橋（林彪稱之為小記者），竟然打擊了跟隨他一生，南征北戰，出生入死，一身戰功、一身槍傷的林彪，究竟是為了什麼？

林彪講「天才」是不是就是說毛澤東是生而知之，主席心裏很清楚。林彪講天才是對毛主席的歌頌和稱道，是崇敬！在大家都在說劉少奇好話的時候，毛主席多麼希望有人讚揚他，希望「要一點個人崇拜」。林彪高舉毛澤東的旗幟，並且舉起來以後，他又說「討嫌」，令人無所適從，祇有認為主席是謙虛，而且是偉大的謙虛。毛主席在廬山把「天才」和唯心論的先驗論搞在一起，純粹就是為政治服務了，有意把水攪渾了。

究竟國家主席有多重的份量，毛澤東清楚，林彪也清楚。如果國家主席是一個要職，在毛主席退居二線的時候，是決不會把這個職務讓給劉少奇的。林彪對自己的身體狀況很清楚，他這個人一天保持健康地生活，正常地飲食起居都很困難，哪有精神去考慮非分的事。他非常清楚，雖然給他戴上了「接班人」的帽子，就他的身體狀況來說，也是接不上班的，林彪對國家主席這樣的虛職，根本就不感興趣。

廬山會議的實質問題是什麼呢？簡而言之，就是林總為了扼制江青、康生、張春橋等這些中央文革的人在九大以後，仍然堅持搞極「左」的一套，就以張春橋為突破口，向中央文革實行了火力襲擊，林彪是反中央文革的英雄。從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五時，在二十多小時之內，廬山燒起了熊熊烈火！出席二中全會極大多數的人，都興高采烈，沉浸在歡樂之中。但好景不長，毛主席於二十五日下午五時就把戰火撲滅了。出席會議的極大多數人，從興高采烈變為臉無喜色了。主席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用「殺雞給猴看」的辦法，犧牲了陳伯達，暫時撲滅了戰火。

九大以後，形勢好多了，如果能夠開一個比較成功的四屆人大，情況就會更好一些。沒想到毛主席又提出在四屆人大上不設國家主席的主張，毛主席不顧國家體制，一個人說了算，大家又為因人廢事而忙乎。林提出設國家主席，並要毛當國家主席，正是「克己復禮」的建議。方物建議區制毛主

第一章 总 纲

第 一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 二 条 毛泽东主席是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是全国全军的最高统帅。林彪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是全国全军的副统帅。

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第 三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以工农兵代表为主体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民主协商选举产生。原选举单位和选民，有权监督和依照法律的规定随时撤换自己选出的代表。

第 四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实行

「鬧來鬧去，把帽子給我們扣上了，可憲法草案上還是寫上毛澤東主席
『是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元首！』

席不但沒有採納，反而給林彪扣上「他們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的大帽子。

其實，毛澤東主席在文革的問題上，在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問題上「有病態」，他才造出了不設國家主席的「理論」。召開四屆人大，必定要涉及到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必定要涉及到前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必定要涉及到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必定要涉及到劉羣鶴制民法

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等等。可劉少奇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已經死了，朱德委員長不能在人代會上當家，副委員長、副總理多數已打倒，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找都找不到了……我看毛主席想開一個馬馬虎虎的人大，不要開一個認認真真的人大，不然上面這些問題不好交待。這就是毛主席的苦衷，設不設國家主席根本不是問題的實質。

毛主席還有一個苦衷，就是文革的問題。林彪在開幕式上的講話，講張春橋的話是含含糊糊的，並沒有什麼更重的味道，而且也沒有點名。所以聽林彪講話的錄音，討論林彪的講話，毛主席都同意了，總理也非常積極，而且總理、康生還整理了林彪的講話。主席沒有想到的是在討論林彪講話的時候，對張春橋形成的討伐，實際上就是對江青掌控的中央文革的討伐。而且，幾乎全體中央委員都擁護林彪的講話，幾乎是一呼百應。這種號召力毛主席是絕對不能接受的。江青說得對，表面上是對著張春橋來的，實際上是對著江青來的，也就等於是對著文化大革命來的。正如毛主席後來所講，搞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中所幹的兩件大事之一，否定了文革基本上等於否定了他。

在廬山會議上，毛主席打擊的是林彪和我們。從道理上講這是不對的，從政治打擊來說毛主席是早有考慮的。在小組會上，我們祇是念了馬列稱天才的「語錄」，擁護了林彪在開幕式上稱毛主席是天才的講話，擁護天才的觀點，這既無什麼大錯，也不比別人調子高。為什麼我們同意稱天才，一個是林彪在開幕式上講他「堅持天才的觀點」，一個是「天才地、全面地、創造性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林彪講的，張春橋反對，我們是反對張春橋的。在小組會上關於設國家主席問題，我們祇是一般的提及。

從廬山會議上各小組的發言來看，汪東興、許世友、陳伯達等人是最積極的，汪東興、許世友提出了「揪人」。毛主席為什麼要翻臉，就是因為「揪人」！揪誰呢？揪張春橋。毛主席認為對著張春橋不是一個人的問題，而是對著文化革命來的。在廬山汪東興、許世友、陳伯達等人跳得最高，毛主席為什麼卻搞黃、吳、李、邱呢？因為毛主席不是按誰跳得高打分的，而是按人劃圈子。毛主席借「天才問題」和「設國家主席問題」為由頭，把林彪和黃、吳、李、邱劃在一個圈子裏，先扣上帽子然後進行削弱和打擊。這種削弱和打擊不是在廬山偶然形成的，而是大以

後毛主席對林彪就不感冒了，他是要找機會削弱和打擊林彪的，在廬山正是機會。

汪東興與華北組六號簡報

我跟汪東興的關係一直都是工作關係，平時接觸也不多。一九六八年「楊、余、傅」事件以後，汪東興和軍委辦事組的來往越來越密切，九年以後汪東興就主動向軍委辦事組靠攏，經常和我們一起吹牛皮，有關主席和江青的關係，都是從他嘴裏說出來的。吳法憲經常問他的一個問題就是：主席和江青是一回事，還是兩回事？汪東興和江青關係不好，他每次都說：「完全是兩回事！」其實，主席和江青關係很深，毛澤東從來就沒有真正批評過江青，更沒有想過要打倒江青。留心歷史的人就會發現，毛澤東每次講批判江青的「壞話」，都未必是動真格的，「二月逆流」如此，林彪如此，後來對鄧小平也如此。

汪的目的是想讓我們衝在前面和江青鬥。

汪還多次以透露毛、江之間隱私的第一手材料來巴結黃、吳、李和我。有一次，汪東興從東北出差回來，還沒有休息，就把黃、吳、李和我請到汪東興家裏來「吹牛」、「侃大山」，一侃就侃到第二天天亮。汪東興說：江青做了婦科手術後就很少和主席在一起，後來就根本不在一起了。江青經常氣主席，主席幾次外出都是掉著眼淚離開北京的。不過主席也有不方便之處，其實就是有短處，所以江青有些要求、有些提議，主席有些是反對的，有些也祇好默認了。比如，江青要反田漢、周揚、夏衍、陽翰笙四條漢子，這本是江青的私心，但主席還是同意了。江青又在主席面前提出要批俄國的車爾尼雪夫斯基，主席未置可否。汪東興說：如果江青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批車爾尼雪夫斯基，你們不要表態。汪東興說：張春橋最不是東西，他以為巴結上江青就能接近毛主席。上海「一月風暴」是主席、總理、伯達他們指揮的，張春橋既滑頭膽子又小。張想在上海搞什麼衛星中心，主席沒有同意。汪東興還說，穩定全國的局勢就靠軍隊了，你們幾位老總是重任在肩啊！九大以後，不怎麼提中央文革了，這個江青、張春橋，就是念念不忘中央文革……如果張春橋靠邊站了，江青也很難有什麼搞頭。

汪東興在廬山的表現是怎樣的呢？

1、開幕式後他就告訴吳、葉、李和我以及陳伯達，主席說對張春橋「可以講，但不要點名」。這樣，使大家增強了對張春橋、江青一夥鬥爭的決心。

2、為陳伯達印馬列稱天才的語錄，陳叫他印五份給常委做參考，汪自行印了二十份，首先發給了吳、葉、李和我，並沾沾自喜地說：「近水樓臺先得月」。

3、汪東興在華北組的發言，是全會調門最高的。一，堅決要求設國家主席，「建議在憲法中恢復『國家主席』一章。這是中央辦公廳機關的願望，是八三四一部隊的願望也是我個人的願望。」二，在華北組的會上，汪東興很嚴肅地說：「我們林副主席真是了不起，他對問題發覺得早，挺身而出捍衛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不然問題可就嚴重了，我們再也不能糊裏糊塗的了。」汪東興的話等於告訴大家，有人在反對毛主席，林彪在開幕式上的講話不是泛泛地在講有人反對毛主席，而是有所指的，挑動大家起來鬥爭。三，當有人問汪東興，有人反對毛主席當主席，這個情況毛主席知道嗎？汪東興說：「當然知道，不過主席不讓點名。我一說你們就明白了：現在是筆桿子壓槍桿子，壓得很厲害呀！」汪東興說是不點名，實際上已經等於點了名，大家都知道「筆桿子」指什麼，指誰！中央全會就那麼二百多人，汪的講話很快大家都知道了，難怪毛主席說華北組的簡報是反革命的簡報，把大家都煽動起來了。

4、汪東興開會前，就給吳法憲打電話，叫吳、李和我發言，還叫吳、李和我鼓動各自所在單位的中委發言，汪還強調說：「過了這村，就沒這店了；今天發言是旗幟鮮明，明天就是隨大流了。」二十四日晚上，汪東興還親自給我和李作鵬打了電話，汪幾乎逢熟人便如此鼓動。

5、搶先出華北組簡報。

6、「風雲突變」以後，汪東興欺上瞞下，推卸責任，陷害別人，對陳伯達尤甚。

汪東興的表現真正是「汪東興一聲炮響，給全會送來了假毛澤東思想」。真正起到了轟動效應！！也把大家害得很苦。憑良心說，廬山會議，汪東興、葉群關係最密切，在會上態度最積極，調子最高。吳、李和我及部隊的同志，如許世友、韓先楚、楊得志等調子也高，但與葉群、汪東興相比有差距。是主席自己沒搞清問題，上了汪東興的當。

亂了。主席在處理廬山問題時，把吳、李和我裝進去，把汪東興拉出來，名義上把矛頭指向陳伯達，實際上指向林彪。結果把最大的起哄者汪東興給「漏」掉了，汪東興和葉群的關係也沒有搞清楚，葉群和林彪的關係也沒搞正確。

這裏也要指出，六號簡報被毛主席扣上反革命簡報的帽子，可是反革命的帽子沒有給汪東興戴上，汪東興敢做不敢當，不但推卸責任，還陷害別人。關於六號簡報，毛主席也在幫汪東興賊喊捉賊。

我放出來以後，一九八九年到北京，我的一個知己來看我，他說聽吳旭君同志說：王良恩被逼死後，汪東興去給毛主席報告，汪離開時，主席指著汪的背影說：「這傢伙又要了人家一條人命！」

汪東興在廬山會議上，爲什麼那樣積極，把我們引入「泥潭」。究竟是毛主席授意的，還是汪自己所爲，我就百思不解了。也就是說，沒有「設國家主席」，沒有林彪堅持「天才」的觀點，沒有陳伯達搞的稱「天才」的「語錄」，毛主席就不拿掉林彪了嗎！？

會議一結束，林彪就下山了。他對前來送行的黃吳李邱說：
「你們照常吃飯，照常睡覺。頂多做個彭德懷第二。」



第三十四章 「甩石頭摻沙子挖牆腳」

關於中央政治局生活會的方針問題

一九七〇年九月六日，在廬山最後一次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首先說：這次廬山發生的問題，偉大領袖毛主席處理得很好。主席再三說對廬山會議犯有這樣那樣錯誤的人，要搞好讀書學習，應放下包袱，輕裝前進。總理接著說：我現在傳達主席的兩點指示：一、主席決定回北京之後，中央政治局舉行學習生活會議，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政治局本身首先要好好讀書學習，開好生活會，進行整風。二、要領導好全黨、全軍、全國的批修整風。

另外，周總理在會上還說，爲了工作的便利，主席已經決定張春橋主要在上海主持工作，有事即來北京；江青到上海休養一段。這句話好像是專門說給黃、吳、李、邱聽的，因爲主席在廬山幫了江青一夥，反了多數中央委員的「潮流」，扭轉了形勢，但人心未必服氣，江青又是個鋒芒畢露的人，主席這麼說主要是要她避避風頭。其實我們心裏明白，這項決定是辦不到的，江青是決不會到上海去閒居的。

對政治局生活會議，存在兩種不同的態度。江青一夥一直抵制召開中央政治局學習生活會，因爲他們並不滿足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去解決問題，他們不願意把套在林彪脖子上的「套索」拿下來，這根「套索」對江青一夥是無價之寶！。由於康生「抱病」不出門，政治局生活會議一直開不成。這也是他們抵制會議的最好方法。如果江青一夥認爲會議對他們有利的話，即使康生有病，他也會「抱病」與會的！

這期間，黃、吳、李、邱對主席的指示都是豎著耳朵聽的。主席再三指出，廬山的問題不下山，叫我們「想通了再檢討」。其實主席在觀察我們，我們卻以爲主席是給我們吃「定心丸」，這是因我們政治上幼稚而

產生的幻想。老實說，對廬山的問題，我從沒有害怕過，也沒有什麼可怕的，但又不能不怕。一是怕江青一夥象豬一樣不停地拱來拱去，不知什麼時候總會拱出事來；二是怕葉群這位「高明夫人」耍小聰明惹事，因為無論出什麼樣的事，黃、吳、葉、李、邱都是綁在一起的，哪一個都很難逃脫。

軍委辦事組希望在政治局生活會上能夠徹底解決問題，讓江青一夥牽著鼻子走，實在難受！鑒於廬山會議的教訓，對準備開政治局生活會議，黃、吳、李、邱幾個人的思想，也是經多次研究才基本統一起來。對會議採取什麼方針？我們四個人存在三種思想：黃永勝對主席感情很深，雖然他十分痛恨江青，但他對主席會偏袒江青認識不足，因而思想重視不夠，也比較急躁。他的基本思想是五個字：不理與反擊。黃永勝說：「對即將召開的政治局生活會議，不需要有什麼準備。先不理睬，必要時就反擊。好來好之，壞來壞之，沒有什麼可怕，我們和主席也是槍林彈雨、出生入死呀。」吳法憲的思想是悲觀的，他說：「人家勝利了，並且得到了『上帝』保佑！我們還有什麼可說的。」我同李作鵬的思想是三個字：「自衛戰」。祇要過得去，我們就當「閉口道士」；要是他們欺人太甚就堅決反擊。

李作鵬對黃、吳的想法不滿，並使用了激烈的言詞，他說：「你們兩位組長，一個是左傾，一個是右傾，你們要把軍委辦事組引到哪裏去？」

一九七〇年，陪同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接見朝鮮軍事代表團。前排右三黃永勝、右一邱會作。



李還一針見血地說：「她（指江青）和主席不是個人關係，主席搞文革，她是旗手，怎麼是個人關係？！我們的思想能統一就統一，不能統一就各打各的！」我也特別注意研究了鬥爭方針的問題，並向黃永勝提出了建議。

黃永勝聽了我和李作鵬的意見之後，思想震動很大。他感到對會議確實需要準備，毫無保留地同意了我們的意見。他說：我急躁是不對，吳法憲沒有出路的思想也不對。我們就以李、邱二人的意見為準，對即將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做準備。這樣，我們的思想基本上統一起來了。

但是政治局生活會一直沒有開成。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陪同周總理、李先念副總理會見羅馬尼亞政府代表團。前排右三邱會作。

吳法憲、葉群向毛主席寫檢討報告

在林總同江青的鬥爭中，汪東興一開始就是堅決站在林彪一邊的。如果說，林彪有什麼「集團」的話，汪東興就是那個集團的主要成員。汪東興的主要任務就是向葉群、黃永勝、吳法憲傳遞情況。正因此故，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五日主席變臉之後，汪東興就立即告葉群、吳法憲「暫時停止聯繫」。汪東興過去總以為毛和江是兩回事，這次廬山會議，在關鍵時刻，汪才看清毛和江其實是一回事。因此，他不再反江青了，更順從主席，聽從主席擺佈。當時他的主要做法，就是要從「林彪集團」裏逃出去。

廬山會議之後，大概在九月中旬，汪東興又向毛主席寫了一個檢討報告。他的報告很短，內容也很簡單，祇說了上了陳伯達的當，受了騙。主席對汪的檢討報告除批了「政治局傳閱」外，還授意總理和康生拿著汪的檢討到毛家灣給林彪看，並提議黃、吳、李、邱「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寫檢討」。總理已經把話說開了：雖然主席說等你們想通了再寫檢討，實際上主席希望看到你們的檢討，這也是我們親自登門的目的。林總也祇能同意周、康的意見，並順手推給總理和康生跟我們幾個談。

周總理和康生按照毛主席的交待給我們幾個談話，總理說（大意）：汪東興做了兩次檢討，這很好。你們幾個應向主席、林副主席寫個檢討，副帥認為這樣很好，希望你們盡快拿出行動來。總理的談話是誠懇的，但黃永勝堅決不檢討，他認為他在廬山沒有發言，因而沒有犯錯誤。更重要的是黃認為江青、張春橋一夥會因我們檢討而幸災樂禍，為此更不能檢討。我和李心裏也不服氣，認為我們在廬山不是以軍委辦事組的名義在發言，而是以中央委員的身份在發言，我們的調子並不算高，至少比汪東興、許世友等低多了，我們也沒有表示要寫檢討報告。李還說：「這不是檢討，是給別人送把柄。」總理和康生把我們的情況向主席匯報了，主席說：「這幾個人沒有想通，也不急於寫檢討，他們與陳伯達的問題性質不同。」聽到主席的話我們很高興（事後主席是言行不一的），我們一無所悟，思想很麻痺大意。

但吳法憲在汪東興得到「解放」的啓示下，九月底也向毛主席寫了個檢討報告，這是他的權利，如果我們阻止他寫檢討報告的話傳到主席那裏，問題就了不得了。吳法憲寫檢討之前並未同大家商量過，寫好之後也沒有給大家看過就送上去了。吳法憲的報告，送上去有十多天都不見批回來。他很著急，又去鼓動葉群給主席寫檢討報告，以起到提醒毛主席注意吳法憲報告的作用。葉群回京參加國慶節，在天安門她找主席談話，因為與主席談話談得「很好」，以為寫了檢討就能過關，所以她也向毛主席寫了一個檢討報告。

葉群給毛主席的檢討報告，確實起到了「提醒毛主席批示」的作用。十月十四、十五日，毛主席對吳法憲、葉群的報告同時批下來了，毛主席對他們兩個人的檢討報告批得很嚴厲，劈頭蓋腦地打下來。例如，毛主席在吳法憲報告上的批語是：「由幾個人發難，企圖欺騙中央

委員」，在葉群的報告上，毛主席批語是：「『九大』勝利了，當上了中央委員，尾巴翹到天上去了！」主席對兩個檢討報告的批示，同在廬山他說的「問題不下山」的精神完全不一樣了，嚴厲多了。

吳、葉的檢討報告，毛主席都批給政治局閱。江青他們看到了毛主席對吳、葉報告的批示，如同在廬山看到了毛主席《我的一點意見》是一樣的高興，對他們起到了極大的鼓勵作用！張春橋在會上就叫服務員給他拿茅臺酒喝，十分囂張；姚文元也舉杯向江青說：「我們向江青同志祝賀，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定會最後勝利！」

從毛主席對吳、葉的檢討報告批示來看，實際上已經向江青、張春橋一邊倒了，開政治局生活會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加強團結，已經毫無意義了，因為毛主席支持他們的調子已經明朗化了。

毛主席對吳法憲、葉群檢討報告的批示，尤其對葉群檢討報告的批示不給面子，實際上就是不給林彪面子，這對黃永勝震動很大，對黃、吳、李、邱是一個嚴重的打擊。批示的內容，同在廬山下山時講的並不一樣，在解決問題的方向上並沒有減輕「份量」，而是加重「份量」。當時我們在政治上還是很幼稚，自欺欺人地告慰自己：毛主席整個批示，還是一個思想認識問題，還沒有提到敵我問題。想起來當時我們也太天真了，毛主席連林彪都不想要了，我們還有什麼舉足輕重之處呢！

全軍批陳整風

廬山會議後，中央政治局對廬山會議怎樣傳達，並沒有明確的規定。因為當時不知道主席是什麼打算，主席是按照自己的主意一步一步走，中央政治局也祇有跟著主席一步一步走，主席指示什麼，中央就貫徹什麼。軍委辦事組對軍隊怎樣傳達，同樣沒有發過文字的東西和做過佈置。當時我們想的與主席的打算是不合拍的。我們認為，如果說林彪在廬山的講話不適合，甚至講錯了，希望毛、林之間談一談，消除誤會就成了，當然還是「親密戰友」。至於我們，當然是維護林彪了，有事自己擔，不往上推。

主席則不然，主席內心已經不想要林彪了，因為林彪並不擁護文化大革命。從廬山下來以後，主席就精心搞他的「拋石頭，摻沙子，挖牆腳」，全力削弱林彪，然後看全黨的反應，再視情況處理林彪。

了一年多，就從「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到處理林彪，這是黨和國家的大事。我想，林彪心裏是明白的，總理也很快明白了。那時候，我們哪裏能想這麼深，祇覺得無所適從。

軍委辦事組在傳達廬山會議精神的問題上，也是不順利的。當時，黃永勝情緒很大，對傳達廬山會議精神時批判陳伯達也結合自己進行自我批評有抵觸，因為他認為自己沒有錯。他說：「怎樣自我批評？自我批評是雙方的（指江青一夥），祇叫我們做自我批評很困難！」

對傳達廬山會議的問題，蘭州軍區黨委，向軍委辦事組提出了傳達廬山會議的請示報告。報告說：我們軍區對廬山會議，還沒有正式傳達。軍委辦事組是否發傳達提綱或發傳達指示？以便我們遵照執行。對這個問題，因為主席和政治局沒有定大的原則，總理從來沒有明確說過這個問題，軍委辦事組很無奈，軍委辦事組的回電是：「廬山會議的問題，由各軍區自己傳達。」

在政治局會議上，姚文元把蘭州軍區的來電和軍委辦事組的復電都提出來了，姚說：「廬山會議幾個月了，軍委辦事組還沒有發出傳達指示，真是難於想像！」張春橋以諷刺的口氣對著吳法憲補了一句：「怕引火燒身吧？是不是，老吳！」吳法憲說：「不是。」

我立即脫口而出：「中央組織宣傳組不怕引火燒身，你們對傳達的問題講過一個字嗎？」對我的話，他們無法反駁，祇好兩眼一瞪一句話也不說了。

江青突然說：「在廬山，我們沒有參加陳伯達搞的突然襲擊。」

張春橋說：「陳伯達是政治騙子，也是小醜。這種人一見太陽就原形畢露了。」

此時，全場一點聲音也沒有，氣氛略有緊張，周總理不斷地喝茶沒有講話。軍委辦事組祇有黃、吳、邱三個人在會場。黃永勝情緒不好，不願意向江青一夥多費口舌，最難得的是吳法憲沒有說話。

我略為思考了一下，說了兩句話：「今天的會是廬山會議的繼續，還是政治局開會？要是廬山會議的繼續，我們就不發表意見了，因為這是違背毛主席指示的，如果今天再提廬山的問題就是同毛主席唱反調了。」

江青聽到我的話後，火冒三丈，她說：「就是你們擁護毛主席，我們不擁護？你們參加長征，打過仗，擁護毛主席有特權？我們也不吃乾

飯的。文化革命是誰革的？沒有文化革命的勝利，我今天還能在這裏開會？早就被劉、鄧關起來了。」

周總理看到氣氛越來越緊張，就以比較溫和的口氣說：「互相之間一些不同的看法，今天就不說了，待以後政治局進行生活會議再說。」總理說完之後，大家也就沒有繼續爭下去。事隔幾日，全黨批陳整風就正式開始了。

軍委辦事組提出了全軍以批判「天才」論為中心，進行批陳整風的學習運動，並向全軍發出了指示。

在指導全軍的學習運動中，我們提出了三點要求：政治氣氛一定要濃；結合實際一定要緊；在廣泛學習的基礎上，一定要出典型。軍委辦事組在全軍的威望是相當高的，號召力是相當大的。軍隊的學習運動很快就搞起來了，各軍區、各軍兵種、各大單位的報告相當多。儘管報告都是抄書抄報的居多，但從報告中可以看出，軍隊學習運動的聲勢是很大的。雖然毛主席對吳、葉檢討的嚴厲批示，給我們又是一次打擊，但我們還經得起。毛主席說我們不批陳，就批吧；毛主席說我們不懂馬列，那就學習馬列吧。

關於軍隊的學習運動，軍委辦事組向毛主席寫過兩次報告，並附了典型材料。毛主席讚揚了軍隊的學習運動，並表揚軍委辦事組開始抓住了大問題。軍委辦事組決定舉辦全軍宣傳處長參加的馬列學習班，學習馬列的六本書。辦事組對學習抓得很緊，黃永勝的兩個兒子都參加了學習，我的大兒子也參加了學習。我也很注重這次學習，叫秘書把講課的內容錄了音，每天後半夜散會回來都要聽一段，有時間就看看書。

我在總後黨委和國防工辦聯合的黨委擴大會上傳達，採取了說「真話」和說「假話」相結合的辦法。主要是把陳伯達的政治騙子和自己上當受騙結合在一起說的。陳伯達騙人則放開說，自己怎樣上當受騙說得很輕，且祇說自己的事不涉及別人，這樣也就有了一定內容的自我批評。

周總理問：「你的傳達寫成了稿子嗎？」

我回答說：「記錄稿，我已經送給您一份呀。」

周總理從皮包裏取出了我的「記錄稿」，很快就看完。總理看文件的習慣是愛用紅筆邊看邊劃上槓槓，對我講話的「記錄稿」也是這樣的。

周總理問：「你的稿子上報中央了嗎？」

我回答說：「請總理過日後，再正式上報。」
周總理說：「大家對陳伯達都不瞭解，批判是比較困難的，但祇要多研究，還是可說出一些道理來的。你的稿子不錯，比周興（雲南省委書記）的無論在內容或思想性方面都好多了。你看過周興的稿子嗎？」

我回答說：「看過。」

周總理說：「中央要轉發周興的稿子的時候，你爲什麼不提醒我一下，看一下你的稿子？」

我回答說：「我不願給總理添麻煩。」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間，毛主席找黃永勝去談過一次軍隊的學習問題。黃永勝向毛主席報告說：「軍隊批陳整風的學習運動確實搞起來了，現在我們正在總結經驗，把學習運動提高一步。」

毛主席說：「從現在來說，軍隊的學習成績是好的。但成績總是相對的。」主席說成績是相對的，主要指我們沒有檢討在廬山的錯誤，主席處理問題是要先把你握在手上再處理解決，我們沒寫檢討主席是抓住不放的。

毛澤東「甩石頭」（三十八軍的報告）

軍委辦事組對中央的部署是緊跟的，但主席心裏還是不滿意，因爲我們沒有給他寫檢討。我們沒寫檢討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怕在檢討中，要涉及到汪東興主席不願聽，因爲主席已經放過了汪；要揭發陳伯達和涉及到葉群，又勢必牽連到林彪，這是我們不會幹的。主席耐不住了，用三十八軍揭批陳伯達的報告作爲石頭甩過來，想震醒我們。

三十八軍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主力部隊之一。該支部隊及其前身在大革命時期、抗戰時期、解放戰爭時期、抗美援朝時期都有很多戰功。在抗美援朝時期，彭德懷曾稱該軍爲萬歲軍。三十八軍是楊成武時期的軍委辦事組從東北調到華北來的，是經林總提議，毛主席批准的，把三十八軍調駐保定，也符合當時要在中原地區集中相當數量的戰略預備隊的安排，並負有直接保衛首都的任務。

在文化革命初，三十八軍在支左問題上與瀋陽軍區有矛盾。林總很重視這個問題，瀋陽軍區司令陳錫聯同志是四方面軍的幹部，三十八軍是林總的老部隊，關係處理不好有林支持之嫌。但三十八軍進駐保定

之後，他們又一頭栽進了派性之中，原來河北省軍區和當地駐軍六十九軍對群眾組織的觀點是一致的，三十八軍來了以後，和河北省軍區有矛盾，楊成武時期就給三十八軍做工作，但幾乎沒有效果，這給河北，甚至華北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增加了極大的麻煩。該軍同北京軍區、河北省軍區處於對立狀態；對北京軍區、河北省領導機關和軍委辦事組的指示執行不力，他們存在的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

爲了糾正三十八軍的派性，六七年下半年陳伯達巡視河北時，對該軍有誇獎有批評，但無效果；軍委辦事組曾派任過該軍軍長的劉賢權去專門解決支左的問題，也毫無效果。軍委辦事組召集該軍的黨委到北京開過數次會議，請他們的老軍長李天佑做工作都沒有解決問題。總之，三十八軍的派性是根深蒂固的，在軍委辦事組倒臺之前沒能根本解決問題。

廬山會議之後，主席看到三十八軍對批判陳伯達和搞掉北京軍區都有很大作用，於是，秘密把三十八軍的領導叫到北京，由江青親自組織三十八軍寫報告，江青說這是主席的指示，所以三十八軍的人特別賣力氣。報告寫好以後，毛主席又以三十八軍主動寫報告的形式，對報告做了批示，作爲石頭向軍委辦事組打了過來。毛主席和江青的這些做法，我們看在眼裏，對主席的做法感到震驚，疑惑。但那時根本不敢想主席的不是，而是對江青、張春橋之流更加痛恨。

三十八軍向中央寫了長篇報告，對陳伯達、李雪峰、鄭維山的所謂「派性」進行了大量揭發。報告寫得有聲有色，陳伯達在北京軍區吃過幾次飯都有統計。爲了批判陳伯達的需要，毛主席批發了報告，並定爲全黨、全軍的學習材料。他們的報告對華北會議和陳伯達、李雪峰、鄭維山下臺起了重要作用。

周總理向軍委辦事組傳達了毛主席要「全軍學習三十八軍」的指示。總理說：「毛主席要我向各位說一下，軍委辦事組和全軍都要好好學習三十八軍的報告，辦事組要首先學好，在全軍做模範。毛主席說，軍委辦事組的幾位不砸爛枷鎖就不能解放自己。軍委辦事組的人，同陳伯達是不一樣的，他們是認識問題。」主席說的「枷鎖」是什麼？就是林彪。但是在廬山會議之前和廬山會議之中，林彪從來就沒有讓我們「堅持設國

家主席」，也沒有讓我們「堅持天才的觀點」。我們是很難的。主席也是在

其後的南巡中才點了林彪的名，而且還不讓我們知道。

三十八軍的報告就其立場觀點來，是代表造反派的，是不能支持的。對這一點，我們心裏很明確。學習三十八軍的報告又不能支持他們的派性情緒，但陳伯達也要狠批，這是一個矛盾。總理也注意到這個問題，在二月初的政治局會議上總理說：「下邊一些地區和部隊領導人的驕傲自滿和對一派群眾的歧視可能還有所滋長，這要不斷提醒他們；而其他地方，特別是內蒙、山西、河北、天津的反覆會大些，已要北京軍區注意這一情況。」

軍委辦事組在學習三十八軍報告的問題上，提出了兩個學習重點：消除派性和批判政治騙子，對這個問題大家同李德生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李德生說：「批判陳伯達的派性應當是學習重點，陳伯達是支一派，壓一派的典型。」意即陳伯達壓制了造反派。

我說：「我是堅決反對李的觀點的。按照主席的指示，陳伯達主要是政治騙子問題。你不要把造反派的觀點帶到軍委辦事組來。」

李德生說：「難道你就是革命派的後臺了？」

我說：「對不起！不僅我是革命派的後臺，軍隊的高級幹部中，除了極個別的人之外，都是革命派，這點難道你還不清楚嗎？」

黃永勝看到我們的爭論很激烈，就說：「軍隊是決不允許造反派存在的，這一點不能含糊。批判的內容還是對準陳伯達和『上當受騙』的問題。如果超出這個界線就要把葉群也拉到裏面來的，要漏底。這樣就引起問題的複雜化。」

李作鵬說：「底是要漏的。不漏底別人總以為我們有見不得人的事，就是在坐的兩位（指李德生、劉賢權）也不會相信我們是清白無辜吧？」

我說：「我同意老李的意見。我還主張應當『翻箱倒櫃』讓大家看個清楚。比如說，我是反對造反派的，反對某些人（指江青、張春橋）支持造反派整我的。這就是我的主要的底。至於在廬山葉群說的那些話，也要漏底，否則別人真會懷疑我們搞了『炸平廬山』的什麼事。現在，大家都還活著，這個底必須漏，而且要漏的連一點渣子也不留。」

黃永勝說：「請李德生、劉賢權也向我們提些意見，揭發更好。」他們兩個人都搖頭說：「沒有什麼意見。」李德生還補了一句：「你們的職務、水平都比我高，我是相信你們的。」

李作鵬說：「你們不要搞臺上握手，臺下踢腳。」

黃永勝最後說了兩句話：「要有自我批評，要說自己的問題。」

毛主席「挖牆腳」（華北會議）

華北會議是廬山會議之後的第一次重要會議，毛主席稱之為「挖牆腳」。會議表面上是解決廬山問題的主要當事人陳伯達的問題，實際上是對著林彪的。其實，北京軍區並不是林總的「地盤」，他也從沒有「安插」過幹部。主席開華北會議，改組北京軍區，主要是爲了北京的「安全」，也就是爲了他自己的「安全」這個「安全」是高過一切的，爲此李雪峰、鄭維山和不少幹部受到了冤枉。

爲了搞陳伯達，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中旬，中央下發《關於傳達陳伯達反黨問題的指示》和毛主席批陳伯達的《我的一點意見》。周總理在政治局會議上，傳達了毛主席對批判陳伯達的指示。其內容大致是：對廬山發生的問題，現在看的更清楚了，是陳伯達興風作浪搗的鬼。他不僅是一個政治騙子，在歷史上也還有不清楚的問題。陳伯達的問題講清楚，這樣，犯了錯誤的同志也就有出路了。

周總理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後，政治局會議的會場上，立即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情緒。軍委辦事組幾個人一句話不說；張春橋祇說了一句話：遵照主席的指示辦。這時江青來勁了，她說：「以牙還牙，過去他們怎樣整我的，我就怎麼還擊，我是不管他姓什麼。一，陳伯達的老底我是清楚的；二，陳伯達在廬山那樣的表現是仗勢欺人，他自己沒有什麼了不起，我們要批判陳伯達的幕後人和轎夫。」江青的話很顯然是指批判林總和軍委辦事組的黃、吳、李、邱等人。

周總理的態度是很鮮明的，他立即帶有情緒的口吻說：「我們一定要按照主席指示辦事。」黃永勝毫不含糊地立即表態說：「我們擁護毛主席批判陳伯達的指示，我們的一切行動都以毛主席的指示爲準則。」他說話的音量相當大，也略有點神氣。

周總理看到會議難以繼續開下去，於是就採取老辦法：「今天的會到此為止。」一邊說一邊起身就走了。

過了兩天，周總理又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說：「主席指示，要召開華北地區黨、政、軍領導幹部的會議。」這就是華北會議的由來。

華北會議表面上是解決陳伯達對華北的影響，實際上是爲了奪北京軍區的權。人們都稱陳伯達、李雪峰、鄭維山是華北三巨頭，主席對他們不信任不放心了，換上主席信任的謝富治、李德生、紀登奎去掌管北京軍區。李雪峰、鄭維山他們，經過華北會議之後都下臺了。

廬山會議以後，北京軍區決定召開黨委擴大會，因不少軍隊幹部支左後在地方任職，因此會議定爲華北會議，參加的範圍是華北地區三省兩市（河北、山西、內蒙、北京、天津）地方地（市）委書記，軍隊師級以上黨委負責人，約四百多人，會議在京西賓館舉行。主席對召開華北會議的批示是「建議李德生、紀登奎二同志參加會議。」這是開始公開重用李德生、紀登奎的決定。可能主席又覺不妥，批示「永勝、作鵬應同德生、登奎一道參加華北會議。」會議從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開始，到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結束。

會議對陳伯達、李雪峰、鄭維山都進行了充分的揭發。所揭發的問題也無非是文化革命中出現的那些問題。整個揭發的材料，與三十八軍的報告中的內容差不多，並無多少新的問題。要揭發的問題也不能實事求是，如廬山會議華北組六號簡報的問題，明明是汪東興的責任，一幫人卻賊喊捉賊地追李雪峰和他的秘書。

對李雪峰、鄭維山的下臺，黃永勝、李作鵬同李德生、紀登奎持不同態度。前二者認爲會議沒有揭發出李雪峰、鄭維山和陳伯達有什麼非組織活動，錯誤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工作上的一般錯誤，因此他們主張祇批判不作人事變動；後二者則主張堅決搬掉，否則華北問題難於解決。李德生、紀登奎這麼大的決心其實也並非他們自己的意見。

劉子厚是揭發李雪峰最得力的人物，華北會議之後，李雪峰被撤銷職務，劉子厚即代替他任河北省委第一書記。鄭維山也被撤銷職務，李德生擔任北京軍區司令員，謝富治爲第一政委，紀登奎爲第二政委。

華北會議結束的時候，周恩來總理代表毛主席、黨中央做了總結，並宣佈了改組北京軍區的決定。毛主席稱讚華北會議開得好，解決了主

要問題。按照主席的要求，政治局委員都參加了華北會議，江青在會議上表現得非常不像話，動輒訓人，甚至罵人。揭發的問題也無非是一些是是非非的問題，甚至雞毛蒜皮的小事，這樣的問題也要撤銷職務，是不妥的。現在看來，華北會議不能說開得好。當然，毛主席是要把北京軍區和北京地區握在自己手中，冤枉李雪峰、鄭維山就不重要了。

毛主席一直掌握著華北會議。在華北會議期間，毛主席找黃永勝、李作鵬、李德生、紀登奎匯報過數次，毛主席每次都有指示。對毛主席的指示，黃永勝都在辦事組傳達了，我現在還能回憶起來的大意有如下幾點：

關於領導方法問題。毛主席說，領導幹部的工作方法很多，但最主要的是調查研究。把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就祇有進行調查研究了。學會調查研究，有兩個關鍵問題：一是走出去；二是腦子能起「加工廠」的作用。比如，你們幾個人參加了華北會議，這本身就是調查研究。你們的皮包裹可能裝滿了材料，有無用處呢就看你們的腦子這個加工廠的作用了。

你們搞軍隊工作的幹部，除林彪同志等少數人抓大問題之外，其餘的人都不善於抓大問題。我看你黃永勝這個總參謀長就不善於抓大問題。

在過去戰爭年代，差不多都由我自己當總參謀長。整個解放戰爭，我就是總參謀長，總理就是總後勤部長。中央軍委除了情報、通信、機要等專業工作人員之外，機關工作人員很少。幾年的解放戰爭就是這樣打下來的。在戰爭時期，我瞭解軍隊，現在當然就不如過去瞭解了。

關於團結多數人的問題。毛主席說，我們的原則是團結的人數越多越好，多一個人總比少一個人好。

毛主席講到這裏一時沒有說話，然後不知爲什麼突然說：「你們的政治，又多又兇，在廬山海陸空軍都出來了，搞突然襲擊。你黃永勝雖然沒參加前期會議，但你的責任是跑不了的。你是軍隊的頭子。」

毛主席這番話，把黃永勝打得昏頭轉向，一時不知所措。接著毛主席又補了一句：「當然，廬山發生的問題，還是思想認識問題。」這樣，才又把談話的氣氛轉過來了。主席又說，宗派這個問題，難於完全搞掉。比如說，我同你黃永勝熟悉，從井岡山到現在幾十年了。總不能否認我從井岡山就認識你，總不能說我們從井岡山認識就是宗派嘛？但我們要是

搞宗派主義就錯了。鄭維山祇喜歡華北的幹部，對外來部隊另眼看待，這就不對了，不注意就會成為宗派主義，這就危險了。

關於批陳整風問題。毛主席說：批陳整風是我們當前的主要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九大路線就實現不了。

毛主席最後對著李德生說：軍委辦事組幾個人（黃、是、李、邱），他們有思想問題。你是總政治部主任，要多給他們做思想工作，提高他們的思想、路線覺悟。這樣軍隊的工作是會有希望的。

李德生說：他們現在的思想覺悟都提高了。我們互相學習。此外，毛主席還說了批判「天才」論的問題，軍委辦事組要「摻沙子」的問題。四月初，紀登奎、張才千參加了軍委辦事組。主席後來還說李先念要參加軍委辦事組。

軍委座談會

毛主席對三十八軍批示沒幾天，華北會議就召開了。這樣，軍委座談會也會促上陣了。

廬山會議之後，軍隊要召開一次適當的會議來解決廬山發生的問題，是勢在必行的。但在一個什麼時機開會就大有「學問」了。我認為廬山的問題主席有了基本調子後再開為好，現在開等於白開。因為廬山會議以後毛主席對軍委辦事組出現了信任危機。

對廬山會議的問題，在一九七一年四月中批陳整風匯報會議之前，我始終是兩筆賬的。就我個人來說，我有什麼問題，自己是最清楚不過的：「提起千斤重，放下無四兩」，但就整個的問題來說，我始終是心情沉重的。因為廬山的問題，是不能簡單了事的。這是為什麼？是由下列三個問題決定的。

廬山會議鬥爭的實質，是軍隊反江青一夥的鬥爭，由於林總不點名的批了張春橋，問題就不一般了。對廬山問題的處理，關鍵是毛主席對林總的態度。在當時的條件下，也就是毛主席怎樣說一句話的問題，林總的政治生命就在毛主席手裏提著的，這是不能不考慮到的。

毛主席在陳伯達身上開刀，是沒有辦法的最好辦法。這樣可以一舉兩得：保護林彪；滿足江青一夥的需要。還有另一個重要問題是「殺雞給

猴看」。如果江青一夥再搞點風浪，我們幾個人就可能同陳伯達同罪論處了，至少吳法憲可能是這樣的，對這一點，我的估計總是比較壞的。

對主席解決廬山問題的打算，黃、吳、李、邱是非常關心的，因為這是關係到我們的政治命運的問題。但我們經常在一起談論的是，如問題昇級到涉及林總，就是黨內的大局問題，也涉及到九大路線問題。五九年廬山會議反彭德懷的結局，可不可能出現？

我對廬山問題的前途是兩點論，既要看到當前好的一面，又要看到可能向壞的方向變化。(一)廬山的問題，可能隨批陳整風結束而結束，我想這是主要的可能性；(二)在江青一夥興風作浪之下，對我們這些人，即使不是全部，也可能對某些人，做出不利的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結論。李雪峰不是廬山問題主要當事人，現在不是也下臺了，但他與林彪沒有什麼關係。

我是堅決反對倉促開會的，我曾對黃永勝直言不諱地說：「軍委座談會要開失敗了，就會出現嚴重的後果，我們會錯上加錯，他們(江青一夥)會喜上加喜，這一錯一喜加在一塊，就有埋葬我們的可能。」我認為如果隨便召開一次影響全軍的高幹會，就有一招不慎，全盤皆輸的危險。對廬山會議的問題，主席那裏沒有相對明朗的態度之前，召開全軍高幹會是不適當的。現在繼續抓緊全軍的批陳整風比什麼都好。要是軍委辦事組能夠在全軍批陳整風學習的基礎上，加上軍委辦事組向毛主席寫出一個有份量的檢討，大家都有做「汪東興」(解脫)的可能。

我們幾個人(黃、吳、李、邱)都是廬山問題的當事人，毛主席現在究竟信任我們，還是不信任？這是我們自己不能回答的問題。不被信任的人，去主持全軍高幹會能行嗎？說話能有人聽嗎？

黃、吳基本上不同意我的觀點。他們說：「你對有利的因素看得太少了，對可能發生變化的問題估計得太多了。這樣也未必能正確處理問題。」由於軍委辦事組多數人都同意召開軍委座談會，開會的問題就定下來了。

一九七一年一月九日至二月十四日，軍委座談會召開。參加這次會議的人員為：各總部、各軍種、各兵種、各大軍區的首長和業務部門負責人，近一百五十人參加。軍委辦事組討論決定會議的任務是「批陳整風，

佈置七一年度工作」。但會議一開始主席就決定參加軍委座談會的人全部參加華北會議。

軍委座談會開幕的前一天，軍委辦事組召集各組負責人討論黃永勝在開幕會上講什麼話的問題，又是一場爭論。

我說：「黃總長明天說什麼好辦，關鍵是會議怎麼開，我看這是大問題。我主張，在廬山會議犯了錯誤的人，要首先做檢討，我的理由如下：

- 一、軍委座談會，提出了批陳整風的方針。我們批評陳伯達就是包含進行自我批評，我們沒有自我批評就不算批判陳伯達。其實，我們和陳伯達什麼『關係』也沒有，我們和陳伯達祇是非議過江青、張春橋這些人，犯過自由主義，爲此江青不滿，毛主席也不滿。現在是毛主席把我們算成陳伯達『一夥』了，在這種情況下，祇有自我批評才能同陳伯達劃清界線，真正做到自己『解放』自己。

- 二、會議對我們的批評能否搞起來，在很大程度上就看我們的自我批評了。祇要我們有自我批評，到會的人自然就會對我們進行批評了。祇要出現了這種局面，批判陳伯達就是成功的。

- 三、以我的看法，這次軍委座談會開的成功或失敗，唯一的標準就是我們要以陳伯達爲對象，有自我批評，從而引起到會的人對我們幾個人的批評。對我們進行批評甚至過火的批評，會議就成功了。反之，如果到會的人對我們沒有批評，會議就失敗了。」

我的意見講了後，大家對我的意見提不出反對的意見，但也沒有什麼熱勁。有人說：「廬山的問題，大家看得見的，是沒有什麼好說的。」對我的這種提法，有的人根本不同意，他們說：「什麼看得見看不見？對軍委辦事組採取懷疑態度，是毫無根據的。」這些說法，對會議進行和開展批評都起了很大障礙。在會上不少人給軍委辦事組評功擺好，就是有點批判，在批評的話之後，又補充一些好話。比如冼恆漢在會上說：「軍委辦事組威信高，軍委辦事組犯了錯誤，但我們對軍委辦事組還是完全信任的。」事實上，廬山會議之後，對軍委辦事組同中央文革的鬥爭，有不少人對主席的態度內心持有不同看法。總之，大家就是這麼一種情緒，在這種情緒下，怎麼能按照毛主席的心願開好軍委座談會呢？

黃永勝對我的意見，則用另一種說法以表示他不同意。他說：「我們幾個人做檢討是大局，需要請示報告。」我對黃的話是明白的，他說的

「大局」就是指林總反對江青的問題。這個問題，我是同意黃的觀點的，不應該把林總同江青的矛盾擺到毛主席面前去，這樣反而把問題複雜化了。黃還說：「自我批評祇能說自己，不能涉及別人。」他的意思我也明白。

過了幾天，黃永勝召開了小組長聯席會議，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黃說：「關於我們做檢討問題，我請汪東興向毛主席請示了。主席指示說：『在這樣的會議上，不要做檢討。』」黃說了後面這五個字之後，還稍停了一下，並且略有點「神氣」。我對黃的性格是熟悉的，對他也是很相信的，他是絕不會假傳「聖旨」的。但我又很難信服，我當時如同在頭上澆了一盆涼水，對「不要做檢討」的問題，我感覺這不是毛主席的真心話。我雖不敢再說話了，但想法依然如故。

在會議進行到中期的時候，黃永勝又召集小組長聯席會議，傳達毛主席指示。黃說：「毛主席指示說：『整風還可以，但批陳不夠。』」接著黃提出，會議從明天起，專門用兩天批陳，軍委辦公廳要把簡報辦好。針對黃的傳達和提出的措施，我發表了一點意見。我說：「完全同意增加批陳的時間，但在批陳的同時，軍委辦事組不做檢討，能夠叫做批陳嗎？」我說出這句話後，大家都瞪著我。發言後，我自己很後悔，但又覺得自己的話是應該說的。

以後的兩三天會議中，對批陳確實「搞起來了」。儘管簡報內容都是大同小異的，可是簡報的數量確實如同雪片一樣的滿天飛。有的人一天發三次言，就上三次簡報。我在一個小組會上發表了簡單的自我批評。我向小組長冼恆漢首先提出：「你們應當像三十八軍批判陳伯達那樣，批判軍委辦事組犯了錯誤的同志，這才是真正批判陳伯達。陳伯達是政治騙子，但我們在不少問題不是受騙，而是同流。陳伯達是大騙子，我們起碼當了小騙子。例如，陳伯達搞的「天才」論的「語錄」，我在西北小組就全部宣讀了。爲了保護陳伯達大騙子，我還聲明「語錄」是自己查書搞出來的，這不就是小騙子嘛。再如，廬山會議開始頭兩天，有人說林總的講話是對陸定一式人物不點名的點名，對這些話，我又去對別人講，讓他們也這樣說。」我的發言雖然很簡單，但受到了小組熱烈的歡迎。

我的發言也登在簡報上了。周總理看到之後很高興，並且把那份簡報留在自己的皮包裏。後來，總理同軍委辦事組談話時，還談到我的發言的問題。黃永勝看到我的發言，祇獎給了我一個「先進分子」的稱號。

加強了對陳伯達的批判之後，黃、吳認為太平無事了。軍委座談會二月十五日就結束了。會後，黃永勝還是不肯檢討，他的主要理由是他主席那裏沒有發言，因此沒有錯誤。公道地說黃永勝說得對，但主席那裏不這麼認為。總理叫我給他做工作，我也沒有做通。我向總理匯報時總理就把問題的實質給點穿了，總理對我說：「什麼會上沒有發言，發言不發言，在主席那裏都是一樣的，主席要打你們的宗派主義！」我一字一句地把總理的話傳達給黃永勝，黃永勝說：「原來是這麼回事！我們檢討吧。我不檢討你和李瞎子也不便檢討，把你們憋得夠嗆吧？」接著黃又說：「我們不是宗派主義，他們才是宗派主義呢！」看來黃永勝還是沒有想通。不過，這時黃永勝肯寫檢討了，我和李作鵬也前後寫了檢討。

江青一夥的威風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九日，毛主席在周總理有關計劃會議的報告上批示：「開展批陳整風運動時，重點在批陳，其次才是整風。不要學軍委座談會，開了一個月，還根本不批陳。」這個批示象晴天霹靂一樣，把軍委辦事組多數人的腦袋都打昏了。寫下這樣的批示，究竟爲了什麼？當時我是不清楚也不理解的。毛主席說的和做的不一樣，而且經常變。

黃永勝在會上唸了唐朝詩人詩：「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然後一個勁地埋怨軍委辦公廳沒有把簡報辦好，其實他心裏是著急的。我用較溫和的語氣說了一句：「不是這樣的問題。簡報也許沒有辦好，但問題不在那裏。」黃永勝急得嘴唇也抖動了，他說：「你說問題在哪裏？」

我說：「散會再說。」

散會後，我到了黃的房子裏，黃很沮喪地坐在沙發裏。我說：「我來犯點自由主義。我們的會開了這麼久，都是按照中央提供的陳伯達的材料批判陳伯達，我們自己沒有新的東西，也就是說我們沒有揭發陳伯達，也沒有檢討自己。主席是天天看簡報的。我想在主席看來，軍委辦事組是否批判了陳伯達，唯一的標準是我們這些人是否有自我批評。我們犯了錯誤的人不進行自我批評就是不批判陳伯達，我們的座談會，是開了一個太失敗的會。」黃說：「軍委座談會，主席有幾次指示都還不錯嘛。」我說：「那是你老兄的理解。」

主席的批示對大家震動很大，我們給主席寫檢討，不但勢在必行，而且要加快步伐了，二月二十日，我們以軍委辦事組的名義向主席寫了檢討報告。毛主席當天就做了批示：「你們幾個同志，在批陳問題上爲什麼老是被動，不推一下，就動不起來。這個問題應該好好想一想，採取步驟，變被動爲主動。」

毛主席在批示中，強調讓我們作檢討，又表示讓我們過關，毛主席還批道：

「要召集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各大軍區、軍兵種負責人、中央、國務院各部、委負責人參加，由黃、吳、葉、李、邱作檢討，讓他們下臺過關。並將此情況告訴林彪同志。」

我們當時的思想是：有抵觸情緒又認真作檢討；想不通又對毛主席感激萬分。

毛主席對軍委辦事組「不批陳」的批評，是廬山會議以後最嚴厲的批評。這一批評對軍委辦事組極爲不利，對江青一夥是非常有利的。毛主席的批示使江青一夥對廬山會議問題的態度有了新的發言權，也有了一定的操縱權。江青一夥的鬥爭方針是力爭把廬山會議的問題重新提出來，鬥爭是非常激烈的。在政治局會議上，對全國計劃會議的問題沒有提幾個字，主要是對黃、吳、李、邱的批鬥。從後來主席南巡的談話完全可以看出，原定的「開政治局生活會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解決問題」的方針原來就是一個泡影，而廬山會議以後再把「廬山會議的問題重新提出來」，則是勢在必行的，可我們一點認識也沒有。

當時軍委座談會已經結束，大多數的人還沒有走，參加了「拍板定案」的小型全國計劃會議。經我們商量後，軍委辦公廳又通知各地軍隊領導幹部來開會，因爲我們對主席的批示要做檢討，沒有人聽也不行呀。軍委辦事組成員，按排名順序做了「檢討」。我們幾個說的大意是：陳伯達是個政治騙子。我們上當受騙了。現在我們也還沒有認識到他對我們的危害性，因而在軍委座談會上沒有做自我批評。主席對軍委辦事組的批評完全正確，完全擁護。會後黃又報告總理，請總理安排我們幾個人一定的範圍作檢討。總理考慮後說：「就在全國計劃會議上檢討吧。」

中央政治局主持召開的「拍板定案」的小型全國計劃會議，於一九七一年二月間在人大會堂舉行。會議由周總理主持，總之，要給軍

委辦事組一個下馬威。總理在會上說：「在廬山會議時，林副主席指示，每年的全國經濟計劃會議在結束前，要各省市自治區第一把手到會共同對國民經濟計劃『拍板定案』。今天的會議，就是照林副主席的指示辦的。這是今晚第一個內容。今晚的會議，同時還要傳達毛主席對批判陳伯達問題的指示，這是今晚會議的第二個內容。毛主席對軍委辦事組有批評的批示。我看現在請黃永勝同志先發言。」

黃永勝事先有準備，他代表軍委辦事組首先發言。他的發言是經過軍委辦事組討論的。由於黃、吳、李、邱，尤其是黃對毛主席的批評，是口服心不服的。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上，要寫好一個高質量的稿子是有困難的。因此之故，黃永勝的發言不管好壞都會成爲上海幫批判的靶子。

在黃永勝發言之後，以江青一夥爲主對黃、吳、李、邱進行了猛烈攻擊。總之，要給軍委辦事組一個下馬威。要是意志軟弱一點的人，在這種情況下是會被嚇倒的。

張春橋發言說：「我今天上午去看了康老。當他知道了毛主席對軍委辦事組的批評後，表示非常關心。他要我爲他帶三句話到今晚會議上來。這三句話是：軍委辦事組不批判陳伯達，可以理解不可以原諒；陳伯達同軍隊究竟是什麼關係一定要搞清楚；對軍隊往何處去不能等閒視之。」張春橋接著說：「我認爲軍委辦事組不批判陳伯達，不是一個認識問題，而是一個立場問題。爲什麼對陳伯達連批判一下都不行呢？毛主席對你的批評，我看就是向你們提出了希望。你們同陳伯達不一樣，我是同意的。但希望你們自己不要硬往陳伯達那裏鑽你們究竟是要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還是要陳伯達那個政治騙子？這是你們必須抉擇的問題。」

廬山會議之後，江青一夥選了幾個當選了中央委員的「文藝戰士」經常參加黨的高級會議。今天他們帶進會場的打手是於會詠、劉慶棠、浩亮三人，由浩亮代表他們三人聯合發言：「一、軍隊少數人把陳伯達當成國寶，不批評，我們表示憤怒；二、軍隊少數人，同陳伯達究竟是什麼關係？你們在廬山搞的什麼名堂？應當無保留地交代清楚；三、軍隊是保衛毛主席的，還是保衛陳伯達的？對這個問題，軍隊幾個掌握大權的人一定要表明態度，否則我們是睡不著覺的。」

接著，列席會議的毛遠新發言，他說：「軍隊幾個人爲什麼不批判陳伯達，可能是不傷同類吧！現在來看廬山的問題就更清楚不過了。廬山沒

有被炸平，是陳伯達動手太早了，你們內部也協調不好。廬山問題的實質是未遂的政變。……我們的文化大革命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我們把劉、鄧司令部打垮了。那麼，出現另外一個司令部怎麼辦？我們的回答是：像對待劉、鄧司令部一樣的老辦法！我勸你們不要令利智昏，毛主席的威望是高於一切的。」

毛遠新的發言，影響是很大的。他似乎等於是毛主席的代言人，我認爲毛遠新的重頭話是不敢亂說的。

再下來是列席會議的馬天水的發言。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黃永勝即席做了很簡短的發言。從總理的眼神看有些吃驚和擔心，我真是手心裏捏出汗來，黃說：「今天的會議活像造反派的鬥爭會，連說話的語言都是造反派慣用的，就差戴高帽子，掛牌子了。現在，我要問的倒是：毛主席說的話算數還是你們說的算數？我是堅定不移的擁護毛主席的，有錯誤我們會誠懇向毛主席檢討。所以任何人企圖打著毛主席的牌子來嚇唬人，對我都是無效的。」關鍵時刻黃永勝還真扛得住。

最後，周總理說了幾句話，他說：「毛主席原定對廬山會議問題處理的方針、政策都沒有變，也不能有任何改變。我們的一切提法都要以毛主席的話，即最高指示爲準。」

軍委辦事組整風

在「拍板定案」的小型計劃會議上，黃、吳、李、邱受到了廬山會議以後最爲嚴重的打擊。在會後清晨四時回到京西賓館，我們幾個人議論了兩個問題：一是，將情況向林總匯報（葉群未參加會）；二是，我們無論如何，要從被動爭取主動。這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我發表意見說，應當向林總匯報，但決不能請示解決辦法。因爲，當前即使請林總出來講話，對問題的解決不僅無利，反而可能引起不必要的麻煩，我提議請周總理同我們談次話，主要是接受總理對我們的批評。這個提議，大家同意了。對第二個問題，我們商定，軍委辦事組一面進行整風學習，同時要盡快向毛主席寫檢討。另外，還是要樹立鬥爭的信心，不鬥是永遠受欺負的。我們的信心和爭取主動是一回事，祇要爭取到了主動，信心就來了。我們爭取主動的唯一辦法就是「自我批評」。祇要有比較好的自我批評，並獲得了毛主席的基本同意，我們就主

動了，在一定意義上來說，上海幫越橫行，對我們越有利。經過討論之後，大家的精神狀態比較好了。

軍委辦事組整風會議，開得是比較成功的。在會上以自我批評為主，也有批評。大家對吳法憲提了不少意見。對黃永勝主要批評他「對廬山問題，以局外人處之，領導和處理問題，很不得力。」對我和李作鵬也有若干批評。

李德生的發言還是比較好的，一是說對廬山的問題沒有信心不對；二是說對原中央文革的領導人，有不尊重的態度是不應該的。

黃永勝根據大家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主要講了如下三個問題。

第一、我們同陳伯達的關係問題。陳伯達是什麼問題，有待中央對他的結論，可以肯定我們同陳伯達沒有反黨、反毛主席的關係，但我們同陳伯達又有一些關係，即對一些人犯自由主義的關係。至於說我們同陳伯達的政治瓜葛，最主要的是擁護「天才」論，陳伯達是黨內的理論家，我們對他有一定的迷信。

第二、我們同陳伯達不是怕不怕受牽連的問題，而是早就牽連進去了。雖然我們的交往並不多，但我們相互之間也有互相支持的地方。例如在廬山會議開始的當天晚上，陳、吳、李、邱一起就在吳的房子裏，長時期談論過張春橋的問題、中央文革的問題和上海的文化革命問題。開幕式散會後，葉群談的「陸定一式人物」的問題，陳伯達也是在一起的。這些都是事實，我們是不能否認的。

第三，我們怎樣同陳伯達劃清界線的問題。我們同陳伯達劃清界線的唯一方法，就是揭發陳伯達的問題和進行自我檢討。這兩者是統一的。祇有徹底的揭發，深刻的自我批評，界線才能劃得清楚。

這是廬山會議之後，黃永勝在軍委辦事組比較有思想水平的一次講話。記錄稿很快整理出來，並立即送給周總理了。總理看到記錄之後，很高興。

在我們整風的基礎之上，周總理同軍委辦事組（包括李、劉）談了一次話。

總理首先說：「我看到永勝同志發言的記錄稿，這是一篇很好的講話。在這個記錄稿的基礎上，可以寫一篇較好的檢討報告。你們應立即

向毛主席寫個報告。」接著總理談了兩個問題。一是，毛主席對我們幾個人的態度問題；二是，自我批評問題。

總理說：「毛主席對你們仍然是很關心的。我剛才就是從主席那裏來。主席交代我說，軍委辦事組幾個人的精神狀態比較好了，這就很好。你告訴他們，要犯得起錯誤，要做得起檢討。有了這兩條，你們還有什麼顧慮？」

總理說：「你們的問題，當然不僅同陳伯達有關，同政治局其他人（指汪東興）也有關。這就是問題的複雜性和處理的難度。」

總理接著說：「大家對自己的問題要心中有數，有信心。自我批評是解決問題的關鍵。毛主席最恨結伙整人。對你們整人是如此，別人整你們也是如此。不過現在關鍵的問題就是你們要有自我批評，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要沒有這條，主席的心是放不下的。你們應當看到，主席對你們抓得很緊，你們應當從正確的方面來理解主席的精神。」但事實證明，不抬出林彪，主席是不會罷手的。

根據周總理的談話精神，我們向毛主席寫了一個報告。報告是由我同李作鵬起草，辦事組集體審查、修改，再經總理審查修改之後上報的。緊接著，我們幾個就向主席寫了檢討報告。

我們的檢討報告

對於要我們幾個人寫檢討報告的問題，在政治局會議上周總理提出了三點要求：「一要旗幟鮮明。一定要站在毛主席一邊同陳伯達作鬥爭；二要觀點和材料統一；三要有自我批評。你們一定要掌握住寫檢討報告的精神，沒有自我批評是寫不出檢討報告的。」

江青在會場上，表現得特別「和藹」。她首先說：「毛主席的話，我早就向你們傳達過，你們同陳伯達的關係，沒有什麼包袱可背的，放下包袱才能寫好。毛主席瞭解你們。」她還說：「寫檢討主要是注意思想性，那些囉囉嗦嗦的事，多一件少一件關係都不大。」

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之後，黃永勝召集吳、李、邱開了數次會議，從談思想開始，到要自我批評和互相幫助都說到了。黃永勝說了不少話，但中心是說：「統一思想、統一認識和統一口徑」三個統一。對三個統一的前兩個，大家沒有多少意見，對統一口徑意見就不一致了。費制吳、

李、邱幾個人之間，展開了激烈的爭論。這是廬山會議以來辦事組第一次這樣激烈的爭論。

李作鵬說：「統一口徑的具體內容是什麼？」

黃永勝說：「祇說自己，不涉及別人。」

李作鵬說：「不涉及別人，我同老邱就不需要寫報告。我們的事是從你們正、副組長那裏來的。」

吳法憲說：「過去，我同你說的事，也沒有聽你說過什麼不同意的話。」

李作鵬說：「要是你都同我們說，也許不會有今天的事。憲法小組爭論的問題，我在場你也沒有同我說過一句話，就向各方報告了。難道你做得對嗎？」

黃永勝說：「我說的不涉及別人的意思，你們會理解的。除了林總這個大局之外，其餘的人無論怎麼說都可以。」

我說：「我同意黃總長的意見，我們一定要顧全林總這個大局。除此之外，自己負責。因為這是個人的檢討，個人可以盡情寫自己要寫的事。」

我說了話之後，黃永勝怕吵起來，就說：「今天不談了。」

過了幾天，大家又在一塊談。這次主要是談吳法憲新寫的檢討稿。他自己向大家讀了一遍，然後黃讓我們發言。

我說：「稿子寫得很『文氣』。」

李作鵬很生氣地說：「什麼『文氣』，應當是『憋氣』，這是什麼檢討稿？」

黃永勝趕緊說好話，他說：「我們好好商量，互相幫助。老吳的稿子是一定會寫好的。」

吳法憲聽了李作鵬的話，手拿著他的稿子，抱著一個皮包，起來就走了。他邊走邊說：「我的稿子好壞，我自己負責。你們不要為我操心了。」吳法憲走了，我們也就沒有談下去了。

黃永勝最後說：「看來在一起要談得好，是不可能的。在一起不僅談不好，還容易傷和氣。」從此以後我們四人就沒有再在一起談檢討報告的事了。

黃永勝、李作鵬和我三月中下旬都分別向毛主席寫了檢討報告。

關於我自己的檢討報告問題，在軍委座談會的時候，我就寫好了一個發言稿，準備在會上發言用的。周總理傳達了毛主席要我們寫檢討報告的指示之後，我立即把發言稿加以修改就成檢討報告了。我的報告主要寫了兩個問題。一是和陳伯達的關係問題。我同陳伯達根本沒有歷史和工作關係，六七年夏天才同他面對面第一次談話。我為什麼能同他搞在一起呢？最主要是迷信他是「大理論家」，還有就是對張春橋不滿有共同犯自由主義的關係，陳伯達是大騙子，他騙了我這樣的人，我又把他搞的「語錄」在小組上宣讀，我既是上當者，又是受害者，還是害人者；二是和張春橋的關係問題。我同張春橋雖然沒有爭吵過，但不來往，不接近。陳伯達就把我當作他反對張春橋的同盟軍了。

我的報告寫好後，於七一年三月中旬就送給周總理。總理看到報告之後，認為寫得不錯，他很高興。他轉給了毛主席。

毛主席第一次接見

毛主席收到黃永勝、李作鵬和我的檢討報告，很快就批了下來，主席的批示是：「黃永勝、邱會作、李作鵬三同志的檢討都看了，我認為寫得很好。以後是實踐這些申明的問題。」其實，我們的檢討寫得一般，但滿足了毛主席的心願。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四日下午三時，毛主席在中南海住處和周總理、康生接見了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紀登奎、李德生、汪東興。

毛主席是在他的臥室接見我們六個人的，主席坐在沙發上，向我們進去的人微笑招手。我們進去的人都先向主席敬禮、握手，然後在兩旁坐下。我們坐好之後，毛主席說：「早就要請你們幾位來談談，今天才實現。中國人有句話叫做：禮多人不怪，有禮不怕遲。」毛主席總是帶著笑容說話的。正在談話時，毛主席忽然想到：「為什麼不叫汪東興來呀？」一回兒，汪東興來到了。

毛主席說：「中央準備召開一次會議。主要內容是講批陳整風問題，你們之中的一些同志也發言做點自我批評，名義上討論陳伯達的問題，實際上給你們做點自我批評創造條件。這樣做好不好？」

黃永勝立即說：「我們完全擁護主席的決定。我們犯了錯誤，應該進行自我批評。」

毛主席說：「進行自我批評，我不反對。我反對的是對犯有錯誤的人採取不公平的辦法，結伙整人，硬要把別人一棍子打死，我是堅決反對的。」

周總理說：「我們要發揚延安整風精神，用自我批評和批評的武器來解決問題。」

毛主席說：「延安整風精神很好，但現在是否還有效，就值得考慮了。」

周總理說：「這是毛主席創造的馬列主義的精華，是永遠有效的。」

毛主席說：「我們黨快五十年的歷史了，但對待犯錯誤的問題，還沒有很好解決。在我們的隊伍內，作為犯錯誤的來源，無非是兩個問題。一個是貪生怕死，貪污公款等，為個人利益犯錯誤；另一個是思想問題，為革命犯錯誤。除了為個人打算的錯誤以外，所有犯錯誤的人都是為革命而犯錯誤的。每個人犯的錯誤都有當時的具體環境，有對立面，祇一面是不會犯錯誤的。」

「我是贊成不怕犯錯誤的。一個人要工作就要不怕犯錯誤，怕這怕那還做什麼工作？當年，我們上井岡山，黃永勝也是跟著上去的一個，就沒有事先考慮錯誤與正確的問題，是逼上山的。如果事先去考慮會犯錯誤，還能上井岡山？」

「我是贊成犯得起錯誤的。每個人的經驗都有正反兩方面的。祇有一面，不能成為經驗。反面的經驗，常常比正面的經驗用處還大。當然，我也不是說，犯錯誤越多越好。但犯一點錯，又能認識錯誤，也沒有什麼不好。其實改正錯誤，就是對客觀事物的正確認識。」

「剛才你們說，延安整風經驗很好。但是，對犯錯誤的人沒有正確看法，不是熱心去團結他們，整風經驗就沒有什麼用處。大家知道，我們講的整風經驗，從本質上來說，就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正確總結經驗和與人為善。如果離開了這樣一個目的而不是總結經驗和幫助犯錯誤的人認識、改正錯誤，還有什麼整風精神？」

「延安整風並非一帆風順，是經過嚴肅鬥爭的。首先是領導人不能整人，其次是動員全黨不能整人。我們沒有整王明，是做了艱苦工作的。」

比如，在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這場生動的黨內鬥爭，今天在坐的多數人都在場吧。（周恩來插話：除了兩三個人外，其餘都參加了七大）對廬山幾個犯錯誤的人，也是一樣的。我們不要他們很簡單，要他們退出中央委員會，退出政治局也不難，但這就不是黨的政策了。黨的政策的核心問題，是人民的利益問題。不要他們幾個人，是違背人民利益的。

「我們將要開的會，要開成像延安整風會議一樣。祇准做批評和自我批評，不准搞別的什麼名堂。總之，是要實事求是，不准搞歪門邪道的東西。共產黨應當是光明磊落的。」

周總理說：「主席今天的指示，也就是我們政治局領導開會的基本思想。誰要是離開主席的指示，去另搞別的什麼東西，他就是我們的對立面了。」

康生說：「任何人想背離毛主席的指示，都是沒有出路的。」康生坐在那裏沒有多說話。

接著，毛主席手持報告，對著我說：「這個報告（指我的檢討報告）是你自己寫的嗎？」

「是我自己寫的。」我立即回答。

對我的回答，毛主席既不認可，也不否定，好像還要說別的什麼似的。

周總理接著說：「是他自己寫的，他是可以寫一些東西的。這次他的檢討報告就概括為三個問題，概括得很好。把陳伯達視為大騙子，自己是小騙子；自己是受騙者，又是害人者。文字不長但把問題比較生動地說清楚了。」

毛主席說：「是呀，此人的文化是背識字牌背出來的。他還很年青的時候，在長征的路上我們就熟悉了。」

周總理說：「我是在瑞金就同他熟悉的。在長征的路上，他是我們的青年小科長。」

毛主席說：「啊，不簡單，報告寫得不錯，你的字也寫得不錯嘛。我死後你可以來這裏當中央委員會主席！」

主席的突如其來之語，全場都震驚了，我反應還算快，立即站起來大喊一聲：「祝毛主席萬壽無疆！」

周總理對我非常滿意，大家也發出了笑聲，全場的氣氛很活躍。毛主席說：「我提議，恩來同志帶你們幾個人（黃、吳、李、邱、紀、李、汪）到北戴河去一趟，去同林彪同志商量一下開會的問題。林彪同志這個人，想問題常常比我們想得都深刻，對開會的問題，先徵求他的意見再做決定，是很必要的。」

毛主席的話音一落，汪東興就說：「我就不去了吧？」

毛主席說：「你不是也沾了邊嗎？好，不去也可以。但自我批評還是有好處的。」

北戴河之行

爲了籌備召開一次最後解決廬山會議問題的中央會議，進行了一個半月的準備工作。北戴河之行是準備工作的重要行動。

在上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張春橋就提出了要召集一次專門會議，最後解決廬山會議的問題。江青、姚文元、紀登奎、李德生立即贊成張的意見。其餘的人不表態。黃永勝說了一句：「開什麼樣的會議，由總理考慮決定。」

由於周總理對開會的問題還沒有考慮成熟，故對張春橋的提議未加理睬。後來，總理認真考慮了開會的問題，並同黃、吳、李、邱通氣之後，才正式提到政治局討論召開會議的問題。

周總理提出：「同意上次大家的意見，召集一次中央會議最後解決廬山會議的問題。可以提出兩種會議形式：政治局擴大會議或小型中央工作會議。究竟開什麼會議好，請示主席後最後決定。」黃、吳、李、邱及先念同志立即擁護周總理的意見。

總理向主席請示後，向我們傳達說：「毛主席說開會的問題，暫還不要定下來，要做必要的工作以後再定。第一是，由周帶黃、吳、李、邱等到北戴河去同林彪同志商量，並要得到他的同意，開會的問題，等總理去北戴河回來後再定；第二是，黃、吳、李、邱等各人要寫好一個檢討報告，中央對他們的報告要有批示；第三是，政治局開會要約法三章，主要內容是祇能搞大動作，不能搞小動作。」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周總理領黃、吳、李、邱、紀、李等六人，由北京乘專列火車到北戴河去了。

在火車上，周總理同大家說：「我們去北戴河，是去向林副主席集體匯報、請示，特別是向林副主席請示中央開會的問題。同時，也是去看望林副主席的，這就是我們的任務。」

我們到北戴河，得到最爲熱情的接待。葉群親自到北戴河車站去迎接周總理，生活也安排得很好。周總理、黃永勝各單獨住一棟樓，吳、李、邱、李、紀等五人，住在空軍療養院。晚上，黃、吳同葉群談話去了，其餘的人都同總理一起，在他的住處看電影。

四月一日下午三時，林總主持了在他的住處舉行的匯報會議。那天的天氣還是相當的冷，但我們到達時，林總皆葉群在門口等待周總理。總理到了之後，林、周進房子，還互讓了一會。林要周總理走前，總理讓林走前。正在相讓時，還是葉群說：「我走前面給總理引路。」在葉群引導之下，林、周才並排走進去，互相之間十分親切。

林總主持了匯報會，他簡單乾脆地說：「歡迎總理講話。」會議開始時，葉群還在走來走去，林副主席用嚴肅的口吻說：「葉群，你坐下來聽總理講話。」

周總理說：「毛主席要我領他們幾位，到這裏來向林副主席匯報和請示中央要召集一次會議的問題。主席說，廬山會議的問題到現在都有半年多了。本來問題已經處理了，但發生了一些新的情況，還需要做一次處理。」另外，總理還談了國際形勢和外交工作的一些重要問題。周總理說完之後，他要黃永勝簡要說一下戰備工作方面的問題。

黃永勝說完之後，李德生和紀登奎也作了匯報。周總理又要我簡要說一下國防工業的問題。

最後，林總發表了簡短的講話，他說：「廬山會議後半年多來，批陳整風運動取得了很大成績，我完全贊同。國內的工作很有成績，國際活動打開了新的局面，都是很好的，戰備工作有成績，國防工業生產情況良好，都是好事。全黨、全國、全軍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我們在毛主席領導下，可以克服各種困難，勝利前進。」林總還說：「同意毛主席對黃、李、邱的批示。對三人檢討很高興。並要求吳法憲、葉群重寫一次局面檢討。他們是無心插柳柳成蔭。還說絕沒有想到陳伯達的問題那樣嚴重，這次把陳揪出來，是很大的勝利。」

在林總住處開完會之後，我們即上原來的專列火車回北京。葉群到車站歡送周總理。

毛主席派中央常委、政府總理率六名中央政治局委員去外地向自己的副主席匯報和商量問題，這即便不是「史無前例」的，也是非常罕有的。

毛主席第二次接見

一九七一年四月一日，毛主席在中南海住處裏，又一次接見了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紀登奎、汪東興。這是周總理領黃永勝等到北戴河去同林彪商談後的接見，陪同接見的有周總理、康生。

我們被接見的人走進毛主席住處時，主席正坐在沙發上看黃、吳、葉、李、邱寫的報告。我們坐好之後，靜候毛主席說話。

毛主席首先說：「在北戴河挨罵了吧？」（指在北戴河受到了林總批評之意）

黃永勝很聰明，腦子反應很快，按主席的思路，為取悅主席，黃立即回答說：「受了批評舒服。」總理如釋重負地向他點頭。

毛主席說：「批評也是武器，同槍炮是一樣的。前者用來打錯誤的東西，是思想武器；後者用來打敵人，是戰鬥武器。槍炮可以打敵人，也可以打傷自己的人；批評也是一樣的，可以用來打錯誤的東西，也可以傷自己人。」

周總理說：「在歷史上的王明路線，就是打著批評的武器，傷害很多的好同志。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也是受害者。」

康生說：「誰不接受歷史上的教訓，誰就不能接受毛主席的思想，執行毛主席的路線。」

接著毛主席的談話進入了正題。主席一口氣說了三個問題。

第一點說的是路線問題。主席說：「我們黨從第一次路線鬥爭，到粉碎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已經有九次路線鬥爭（毛主席扳著手指，從第一次講到第九次路線鬥爭）。歷史證明祇要路線正確就能取得勝利，革命是失敗不了的，祇要路線正確就不怕失敗。路線正確，沒有根據地會有根據地，沒有槍桿子也會有的。王明上臺，根據地損失了百分之

九十，最後我們解放了全中國。張國燾搞分裂，最後還是團結起來了。劉少奇搞修正主義，馬克思主義還是勝利了。」

第二點說的是批陳整風問題。主席說：「文化大革命已經五年了，我們最主要的是批判修正主義。不破不立，祇有破了修正主義，馬克思主義才能立起來。批陳整風一定要搞好，我說的搞好就是既要搞清楚問題，又要團結同志，不講團結的人就一定搞分裂。在廬山有的同志犯了錯誤，現在問題都清楚了，就是團結。如果現在抓住別人某些錯誤不放，矛盾的主要方面就要換位置了。」

第三點說的是陳伯達問題。主席說：「陳伯達是一個反共反人民的老反共分子，托派分子。我對他的問題寫了幾句話，寫在黃永勝的報告上的。」

「此外，你們幾個人的報告（黃、吳、葉、李、邱）我都看了。報告寫得都好。我在黃永勝的報告上批了幾句話，也是對你們大家的報告批的。我批的是（手拿黃的報告，照念的）：報告寫得都好，我都同意。今後就是實踐自己的申明了。」

毛主席念完批示之後，又說：「他們幾個人（指黃、吳、李、邱）的問題，在我這裏就全部處理完了。剩下開會的具體問題，請總理去辦。」

周總理說：「完全擁護主席對黃永勝等五位同志的報告的批示，這是毛主席的重大決策。毛主席的批示，對全黨團結起來，具有重要的意義。」

康生說：「完全擁護主席的批示，我們決心努力學習毛主席的教導，改正錯誤，改造世界觀。毛主席的批示就是我們行動的準則。」

周總理說：「大致方針定下來了，現在，向主席請示有關開會的幾個問題。」

接著，周總理說：「第一個問題，會議的名稱問題。這個問題在北戴河沒有多說，我考慮可以稱為批陳整風匯報會議，簡稱為中央工作會議。因為批陳整風的問題，在計劃會議上已經佈置了，現在稱為『匯報』會議是比較合適的。」

毛主席說：「可以同意用這個名稱。」

「第二個問題，會議規模問題。這個問題，我同軍委辦事組和政治局一些同志人商量過，會議規模以小為宜，大約不超過百人的會議制到會

的有各省市自治區約黨委正副書記（每省兩人），各大軍區司令員、政治委員，北京中央黨政機關部分中央委員，包括一些老同志，做好老同志的工作，對全黨團結有重要作用。」

毛主席說：「同意這樣一個規模的會議。總理提到做好老同志的工作。對老同志的工作，不要要求過高，但中央對他們的政治待遇，生活待遇則要盡量滿足需要。當然，這樣做還會有少數人不滿意的，這就是他們自己的問題了。」

「第三個問題，對會議的領導。周總理說：我們考慮，中央工作會議，由中央政治局工作班子集體領導，不另設什麼會議班子。在會議進行中，如果有重要問題，及時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匯報請示。」

毛主席說：「這樣好！」

「第四個問題，會議編組。會議同廬山中央全會編組的方法一樣，以原來的大區為單位，編為六個小組。黨政軍參加會議的人員編到各個小組。中央政治局委員也編入各個小組，但可以自由參加各小組的會議。」

毛主席說：「同意這樣辦。」

「第五個問題，會務工作。會務工作全部由憲法小組承擔。張春橋同志提出，這次會議與憲法小組有密切關係，我考慮可以同意這樣辦。」

毛主席：「好嘛。」

此外，還有一些具體問題，如會議開多久時間，周總理都提出來了。毛主席也都點頭同意了。為什麼對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周總理這樣細緻地向毛主席請示匯報？就因為這是廬山會議的繼續，這其中的奧妙關係很多。周總理是有意這樣做的。

我們正要起身起時，毛主席又開口說話了：「在會議開始的時候，總理還說幾句話。你向大家宣佈：中央對他們報告的批示，可以同意也可以推翻，受批評的人，可以接受批評也可以不接受；對黨的團結可以維護，也可以破壞。」

周總理：「在毛主席關心之下，我們一定能夠開成團結的會議。」

我們臨走時，毛主席坐在沙發上，向大家招手致意。

毛主席第二次接見，黃、吳、李、邱的心情是難以描述的。可以說是真正放下了思想包袱。從廬山會議，到「批陳整風匯報會議」已經八個

月了，在此期間，可以概括爲八個字：「坐臥不安，矮人一等」。今天毛主席同我們談了之後，問題就解決了，哪有不高興之理。

晚上九時，中央政治局照常進行會議，周總理向大家傳達了下午毛主席的指示。周總理傳達得很詳細。當周總理說完，並要黃永勝、紀登奎等人補充時，江青發火了。

江青大發雷霆地說：「你們把毛主席牽制起來作爲鎮壓我的工具，你們少數人都把問題決定了，還要開會幹什麼？」

周總理對江青的怒氣，根本沒有理睬。還好，那天晚上的會算是平安無事地開下去了。對「批陳整風匯報會議」一系列的問題都定下來了。批陳整風匯報會議定在四月十五日正式開始。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五日至二十九日，中央工作會議（批陳整風匯報會議）在北京舉行，中央各部門負責人、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軍隊各總部、各大軍區的負責人，共九十九人參加了會議。周總理代表中央對軍委辦事組幾個犯「錯誤」的人做了政治和組織結論。

會場上的交鋒

毛主席第二次接見我們之後，可以說是「一錘定音」了。在當時的情況下，毛主席的話真是「一句頂一萬句」。我們軍委辦事組幾個人的思想，基本上是樂觀的，但也有盲目樂觀的成分。

黃永勝是我的老戰友，是兄長一樣的老戰友。我認爲他身上擔子太重，我心裏是很願意支持他的。對開會的事，我經過認真考慮，向他提出三點建議，也就是「戰前」的三件大事，黃永勝同意了我的意見。（一）我們幾個人要恪守毛主席批示的口徑，不要超過原有報告而承認新的問題。對別人的提問，即使追問也不能回答。（二）軍委辦事組應先做思想工作。對這個問題，大家很同意，但又怕惹起麻煩。主要是怕江青一夥指責軍委辦事組搞小動作。經過研究之後，找到了一個最好的辦法就是軍委辦事組以召開檢討會爲名做思想工作。批陳整風匯報會議開始的前兩天，軍委辦事組召集了出席會議的軍隊全體人員開會。這次會議，黃永勝以檢討爲名，詳細傳達了毛主席兩次接見軍委辦事組所做的指示，使大家心中有底，這對我們是有利的。（三）向周總理建議，應當在會前傳達毛主席的指示。

總理完全同意了黃永勝的建議，於四月十四日在會議的預備會上，用他自己的話，比較詳細和有力量地傳達了毛主席兩次接見軍委辦事組的指示。

周總理對毛主席的指示傳達得很詳細，發揮得也很好，極大多數人都完全擁護總理的傳達，對會議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們認識到毛主席的批示是鬥爭的「武器」並不是過關的「通行證」。祇有拿起武器堅決鬥爭，才能過得去這一關。

黃永勝在軍委辦事組召集與會人員的會上說：「今年二月間軍委座談會，我們應當向大家做檢討，但沒有這樣做。這是我們的錯誤，我代表軍委辦事組在廬山犯了錯誤的同志，向大家承認錯誤！今天，我向大家做檢討，並傳達毛主席的指示。在三月底四月初毛主席連續接見了軍委辦事組兩次。參加接見的有：黃、吳、李、邱、紀、李等六人。我的傳達，如有遺漏的，他們可以補充。」黃永勝對毛主席的指示，傳達得很詳細。據到會的人後來說，這次傳達，對統一思想真正起到了重要作用。

批陳整風匯報會的思想準備是很充分的，江青一夥的抵制力量也是很頑強的。這也就是說鬥爭是非常激烈的。軍委辦事組「恪守批示」，江青一夥「先露鋒芒」。

這次中央的會議，名義上是批陳整風，實際上是和江青一夥的較量。到會人數不足百人，就其政治情況來說，擁護軍委辦事組的人約三分之二；擁護江青一夥的三分之一不到。由於會議是「結束廬山會議」的會議，因此整個會議過程都鬥爭得很激烈。鬥爭的主要問題是對會議的方向、對小組會的控制和對吳法憲的追擊三個問題。

會議開始討論的是什麼問題，這就是是會議的方向。四月十四日晚上，政治局會議檢查中央工作會的準備情況時，發現已經印發的文件，祇有黃、吳、葉、李、邱的檢討報告，批陳整風的文件一份也沒有印發。這樣，會議很自然就會從批「黃」（黃、吳、葉、李、邱）開始，而不會從批「陳」（陳伯達）開始了。會議批判的目標變了，從而也就會影響會議的方向。

周總理發現了這個問題，他著急了，總理問張春橋說：「爲什麼不先印發批陳的文件，而祇印發他們的檢討報告？現在立即趕印批陳文件，

並通知各小組照原定計劃辦。各小組祇能批陳，不能隨便批判別的什麼人。」

批陳整風匯報會議的主要形式是小組會，汪東興、黃永勝、吳法憲都在小組會上作了檢討，因此控制小組會的導向成了主要鬥爭場所。由於軍委辦事組和周總理對毛主席指示的傳達，大多數人對江青一夥的一舉一動都是眼明心亮的。

第二天的小組會上，出現了一個異常情況。江青一夥的姚文元、毛遠新、徐景賢等人，竄到各小組發言，他們說：「這次會議不是『批准』檢討，而是『聽取』檢討。要是前者就不用開會了，印發他們的檢討就行了。」他們一個勁煽動，要大家逼著黃、吳、葉、李、邱在大會上做檢討。他們認為陳伯達已經打倒了，繼續批判毫無意思。

姚文元到我所在的西北組來遊說了半天。他在西北小組主要說了三個問題。一是他說九大以後的路線鬥爭，不僅沒有結束，而且鬥爭更加尖銳了，特別是文藝方面，簡直是寸步難行。例如，去年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的通知，這樣簡單的問題都受到壓制。二是廬山會議的問題。今天在坐的人都參加了廬山會議，事情的發生發展大家都還記憶猶新。問題是誰挑起來的，是什麼性質的問題應當搞清楚。第三個是，這次會議是把路線問題搞清楚，還是把路線問題鎖到保險櫃裏去，這是原則問題。我們一定要經過鬥爭，去達到新的團結，這才是真正的團結。

姚文元講話之後，胡煒等熱烈響應他的講話。

然後，粟裕、鄧穎超先後發言：「主席的批示（對黃等人的檢討報告批示）就是我們會議的指導思想，另外提出任何問題都是不合適的。」

姚文元說：「從實際出發，是理解執行主席批示最根本的問題。」

胡煒說：「在小組會發言，任何人都可以說自己的話。每個人都說一樣的話是不可能的。」

粟裕說：「我們的小組會，可以與毛主席的指示對立起來嗎？這是不可想像的。我是堅決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的。」

鄧穎超說：「我們不應當接受與毛主席批示相違背的任何東西！」

氣氛緊張了，小組會開不下去了。小組召集人洗恆漢祇好宣佈：停會看文件。

我把小組會情況，特別把姚、粟、鄧、胡等人的發言的情況，立即向周總理報告了。

四月十七日晚，在政治局會議上，總理明確了如下兩點：（一）會議祇能提批陳。當然，在小組會有對其他人批評的自由；（二）從廬山會議以來，毛主席和中央沒有說過的話，不要說。誰要想提誰報告毛主席批准。

各小組會的形勢，第四天開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所在的西北小組，在傳達了周總理的指示後，情況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極大多數人都同意總理的指示，也有少數人不同意總理的指示。

在小組會上姚文元向我挑戰說：「邱副總長，你是不是也像在廬山會議開始時那樣，同我們說點內情嘛。」我一句話也不說，祇是抽煙、喝茶。我在小組會上「泰然自若」。姚文元又逼著我發言，我就是不開口，會議已形成了僵局。這時鄧穎超走出會場去叫總理，總理來後，簡明扼要地說：「我們要批陳，這是首要的！會上可以進行同志式的批評，不是批判。」總理說完就走了。姚文元看總理動真格的了，他也不說話了。

針對小組會情況，我們幾個研究的方針是堅決鬥爭，具體措施：一是，堅守檢討報告界限，多一個字不說；二是，建議葉群立即回北京參加會議；三是，對一些錯誤的言論，除在各小組鬥爭之外，要立即上報總理。我們的鬥爭方針，每人都做到了。

追擊吳法憲的問題。江青一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對吳法憲猛打、猛追，爭取「戰場繳械」。他們取得了很大的收穫。

會議的第三天上午，毛遠新、徐景賢等人就到西南小組圍攻吳法憲。徐景賢對吳法憲的下馬威是：「你要把你肚裏的髒東西都亮出來見見太陽。你不要裝糊塗，我們是決心同你鬥爭下去的。」

吳法憲由於對此沒有思想準備，在徐景賢等人逼迫追擊之下，由於過於緊張，心臟病發作了，當時就倒在小組會場上，並實行緊急搶救。下午三時，周總理趕到會場坐鎮，小組會上才基本停止了對吳法憲的追擊。

江青一夥除在小組會上追擊吳法憲之外，還派人追到吳法憲家裏去了，看看他是不是裝病。可見，江青一夥對軍委辦事組是絕不手軟的。林總得知吳法憲被迫害的消息，於當天晚上八時就由北戴河回到北京

了。葉群由西郊機場直接到了人大會堂，並且遊走了兩三個小組。她在各小組都說：「毛主席要林彪同志回來加強對會議的領導。我們都回來了。」林總回京後，對我們起到了很大的支持作用。

周總理知道林總回到北京，很高興。他很希望主席、林彪能在會議期間見大家一次，如能給大家講幾句話更好，使會議開成一個真正的團結——批評——團結的會，說穿了就是調節好主席和林彪的關係。爲此，二十四日，總理將會議情況報告送呈主席、林彪。但毛澤東批示：我這幾天不出門。林總也表示不參加會議。這樣，總理工作的難度是很大的，他也祇有按毛主席的心願了結這次會議。

會議給我們下結論

本來，批陳整風匯報會對黃吳李邱不需要有什麼結論，祇是給黃、吳、李、邱一個檢討的機會。毛主席向周總理交代說：會議結束時，說點批陳整風的問題就行了，不要專門對軍隊幾個人搞什麼結論。毛主席還提出了：「要結論和不要結論都可以。請恩來同志代表中央講幾句話，也就是結論嘛。」

總理是深知主席的，他很慎重，在政治局會議上還是決定由周恩來、江青、張春橋、黃永勝、姚文元、紀登奎六人成立了起草批陳整風匯報會議結束時的講話大綱的小組。說是「講話大綱」，其實，關鍵內容就是給黃、吳、李、邱下個結論。「講話大綱」實際上就是江青、張春橋起草的，是按照毛主席的意願起草的。但這個結論畢竟是很難下的，說輕了，毛主席那裏交待不過去，江青一夥也要鬧；說重了，雖然是打在黃、吳、李、邱身上，實際上是刺在林彪心上，大多數人都參加了廬山會議，心裏也不服。所以，總理事事都是向主席報告的，主席同意才算數。對我們的結論是毛主席同意後，總理才講的。我看總理是違心的。總理就是在這種無奈的情況下，主持了這次批陳整風匯報會。

四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時，在大會堂河北廳，召開了批陳整風匯報會議全體會議。周總理代表中央宣讀了對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五人的政治和組織結論。結論的內容，還能記起的有：「軍委辦事組五位同志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在組織上犯了宗派主義的錯誤；但錯誤的性質還是人民內部問題，同反共分子陳伯達問題的性質

根本不同。他們之所以犯這樣嚴重的錯誤，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不聽毛主席的話，站錯了立場，走錯了路線」。會議時間前後不到一小時，除了周總理講話之外，其餘的人都沒有講話。批陳整風匯報會議到此正式結束了。

會後總理來到京西賓館，深情地對我們說：「還是要振作精神。我還指望你們一起工作呢！沒有你們我是寸步難行呀！」因為我們同總理熟悉，我就更熟悉一點，我說：「他們在會上的做法，比廬山厲害得多，我們反他們的宗派沒反成，反而把宗派的帽子扣倒我們頭上，我們今後怎麼工作！？」我說了「我們今後怎麼工作」時，黃永勝坐在沙發裏傷心得落了淚（他這天還正好發燒，帶病去挨「板子」）。總理看著我沒有說話，他也不便把話頭展開。他看見黃永勝那麼難過，就過去拉黃永勝說：「開飯的時間到了，我們一起去吃晚飯吧。」其實，總理是眼見肚明的。中央正式公佈了對黃、吳、葉、李、邱的結論。時過境遷，到現在就是我們反江青一夥的歷史證據，我們上了反江青一夥，後稱「四人幫」的光榮榜。

毛主席去世之後，鄧小平、彭真有他們特別的政治目的，硬是人為地樹起了一個「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這是根本違背歷史事實的。從文化大革命以來，我們反對江青一夥的禍國殃民是完全正確的。沒有軍隊抵制江青一夥，就沒有軍隊的穩定，沒有軍隊介入文化大革命，江青一夥就要奪取更大的權力，這不是危言聳聽。黨的十大，上海幫奪取了中央很大部分權力，不就是事實嗎？但奇怪的是，毛主席去世後，對我們過去反江青一夥的歷史事實不僅不承認，反而要把江青一夥同我們捆在一起，實行公審，這連江青都不承認。他們硬要把林彪與江青綁在一起進行審判，實際上就是要審判毛主席的九大政治局，從而把我們做了這些反毛主席「英雄們」的墊腳石，這就我們黨有史以來最大的冤案。

批陳整風匯報會之後

批陳整風匯報會，對黃、吳、李、邱作了結論，我們祇有組織服從，但在思想上想不通。對主席的言行不一，想都不敢想。會後怎樣傳達會議精神是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政治局經過研究，對傳達定下了三條：

一是，祇限於傳達到各省市自治區，各大軍區、軍種、各總部黨委常委，各兵種祇傳達到司令、政委。傳達時祇照文宣讀文件，不得隨意發揮。

二是，今後在報刊上一律不得透露對黃、吳、葉、李、邱的檢討和批評的問題。

三是，在傳達文件之後一律清退，由印發機關清點銷毀，不准存檔。軍隊駐京各總部的傳達，由軍委辦事組統一組織實施，在三座門統一聽傳達。李德生宣讀了周恩來總理代表中央的結論，然後以各總部、海空軍為小組分開討論。各兵種司令、政委參加總政小組的討論。

在傳達的前一天晚上，總後小組（即黨委常委會）就聽了我的檢討，向常委做了簡要的自我批評。各常委都發了言。大家的發言，不外是兩點意思：擁護毛主席對黃、吳、葉、李、邱檢討的批示；擁護周總理代表中央做的結論；同意邱會作同志的檢討。常委會不到兩小時就結束了。聽後大家有些懵頭懵腦的，似乎很不理解中央為什麼要這麼做。

一九七一年「五一」節，邱會作（中）、紀登奎（右）在天安門城樓上。



在傳達之前，軍委辦事組特別強調保密的問題。當時，對保密要求如此嚴格，主要不是爲了黃、吳、李、邱幾個人的問題，而是爲了人民解放軍，爲了林彪的問題。因爲祇要知道了我們幾個人的問題，就同林總的問題聯繫在一起了。如果出現這種情況，對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都是不利的。

在傳達之後，各省市自治區、各大軍區、軍種、各總部黨委都向毛主席、林總寫了兩個擁護的報告，一致擁護毛主席對軍委辦事組幾個領導同志的報告的批示，擁護周總理代表中央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做的結論；同意黃、吳、葉、李、邱的檢討。不少單位在報告中都提出了：我們一定要如過去一樣，尊重軍委辦事組幾位領導同志的領導。奇怪的是上海市委的報告，還特別強調了軍委辦事組做了好的「自我批評」，真是虛偽至極。所有報告都表現出團結的氣氛，不利團結的字眼，在報告中是看不到的。據王洪文後來在秦城對我說，這點也得到了主席的教導。主席說：「下了結論以後，就要講團結。」

五月初，我和耿飆（當時爲中央聯絡部長）陪同越南的總書記黎筍去南方參觀。我們住在韶山時，一天早晨我同耿飆、卜占亞（湖南省委第二書記）從宿舍信步去食堂吃早餐，我對卜占亞說：「我已經看到你們省委常委對傳達批陳整風匯報會的報告。你們對軍委辦事組幾個犯了錯誤的人，採取了原諒的態度，說了很多好話。」

卜占亞說：「事實就是那樣嘛，我們祇能實事求是。你們畢竟是上當受騙，才犯了錯誤呀！」

我問：「華國鋒書記本人有什麼意見沒有？」

「沒有。常委會都是他主持的，他的意見包括在報告之中。」

「你們看到或聽到什麼意見，都能及時告訴我就好了。同志的幫助，對一個人防微杜漸會有很大作用的。」

「我對敬仰的老首長不會有什麼保留的。」

耿飆說：「老邱呀，千萬不要背包袱啊！我們都團結起來努力把工作做好，少讓他們挑刺。我們不挑起擔子，總理就更難辦了。」

在廣州，我一直忙於陪同外賓參觀，除聽取省國防工業辦公室匯報，時間不多。我離開廣州回北京時，劉興元、丁盛送我去機場，我們在車上簡單說了幾句有關批陳整風匯報會的問題。

我說：「在廬山我們犯了錯誤，影響很不好。對你們這些老戰友，也不能說一點牽連都沒有。看起來，我們幾個人在政治鬥爭中，還是很不成熟的。」

劉興元說：「現在好了，問題解決了。不論是按什麼水準解決，也算解決了。這次中央的會議，鬥爭是尖銳的，但在廣州軍區不會留下任何影響的。在人們的眼光中，現在的林副主席，現在的軍委辦事組的形象更高大了。但在少數人心中就和過去不一樣了，不過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大家對誰是泥鰍，是很清楚的。」

這些老戰友的話，我心裏都明白，但當時是絕對不能交流，大家也不會交流的，多說一句就犯自由主義了。

在歷史上起重要作用的廬山會議，經過批陳整風匯報會就結束了。鬥爭的結果，我們失敗了。爲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關鍵的問題都是毛主席決定的。具體來說，有如下三個問題。（一）在廬山主席已經把黃、吳、葉、李、邱同陳伯達捆綁在一起了，林總的威望也受到了極大的影響。（二）江青一夥操縱了會務工作。他們是做了「合法」的壞事，造成既成事實。（三）主席內心支持江青一夥。其實我們並無宗派，我們和很多老幹部對文革的看法，對江青一夥的看法都是一樣的，反而被打成宗派；江青一夥是文革中最大的宗派，卻得到不斷的放縱。批陳整風匯報會之後，我的思想確實起了很大的變化。會議之後，確實有個包袱了。我的包袱主要是「想不通」。興師動眾地處罰了我們，這是「大局」服從了「小局」。這也就是說，以犧牲林總爲首的軍隊的威望，去服從江青一夥的利益，這就本末倒置了。不過，我的這個包袱是裝在我的「公文」包裹的，我認爲爲江青一夥背上一個包袱是完全不值得的。我一直還是在努力工作。

我自己也認真想了一些問題。第一個問題，毛主席和林總的關係問題。這個問題是一切問題核心的核心。祇要這裏不存在什麼問題，其餘一切問題都不必考慮。毛主席同林總的過去，我是知道的。從過去看現在就沒有什麼問題需要考慮了。但現在要想的是今後的問題，這是當時還不可能想清楚的問題。

我想過，一九六六年八屆十一中全會，林總上臺，是因爲他主持軍委日常工作而把他「黃牛當馬騎」，還是真正的「親密戰友」？我考慮的

結果是後者，是歷史必然。林總確實是黨內的排頭兵，無論打仗、執政都能勝任的。在上述的思想基礎上，對毛、林之間今後的問題，就沒有更多的考慮了。我也確實沒有想到還有什麼需要疑慮的問題。這不是我觀察的問題深度不夠，而是從歷史事實得出來的結論。

第二個問題，自己的學習和工作問題。我向來都有這樣的思想「做官靠運氣，吃飯靠本領」。當然，這裏說的做官，是做自己連想都不敢想的大官。因為有史以來，任何大官都離不開「運氣」這個基本條件。要是沒有運氣，即使有天大的本事也是枉然。吃飯靠本領，這是我一貫的思想。在全國解放前的革命時期，吃飯靠「兩條腿」，祇要跟著黨幹革命就有飯吃。解放後的建設時期，吃飯就靠「一雙手」了。在建設時期，我從沒在「有我不多，無我不少」的那群人之中混過。我是靠努力學習和工作掙飯吃的，過去，我的這個思想起過積極作用。

第三個問題，「改邪歸正」的問題。過去，我參加議論江青一夥，反對江青一夥的事不少，自己愛說別人（江青一夥）的閒話總是不好的。

這段歷史已經過去了，我們對毛主席還是情深得很，因為我從十五歲參加革命，一直都奮鬥在他老人家領導的革命事業之中，我們永遠都是主席的兵。

總之，歷史總歸是歷史了。

第三十五章 毛主席南巡

不在乎，又在乎

林對主席是深知的，不但對主席的思想、意志瞭解，對主席的個性也瞭解。我們則一無所知，總把主席當成神聖的領袖。廬山的事，林對主席遠了，其實對我們也遠了。林總深知祇要把問題攤開了，在毛和林之間，不論誰是誰非，我們肯定會選擇毛。所以林對我們也不說話，不向我們提任何建議。

在廬山會議之後，我們感到林總同毛主席的關係，不比以前了，因為林總觸動了文化大革命這根神經。對這個問題，我們提出過建議，林總採納了。

一是，注意上毛主席的門。一九七〇年九月十八日，林總從北戴河回到北京從機場就到毛主席住處去了。這是在廬山會議之後，他們第一次見面。

二是，林總很注意向毛主席選送材料。這種辦法是林總向來同毛主席保持密切關係的一種好辦法。林總選送了貴州軍區政治部關於「三支兩軍」的一個報告，毛主席對那個報告做了批示。

三是，有關戰備問題，林總向毛主席的報告就更多了。關於戰略預備隊的組成，三北（東北、華北、西北）的戰略方針，三北各省市要建立自己的後方基地等問題，都分別向毛主席寫過專題報告。毛主席對那些報告都有批示。

軍委辦事組對毛主席、林總之間的來往關係，都向總理及時報告。爲了穩定人心，七一年一月間，毛主席找葉群和周總理分別談過一次話。

黃、吳、李、邱對廬山會議發生的問題總的態度是：不在乎，又在乎；或者是口裏在乎，心裏不在乎。這就是說，除反了江青一夥之外，其

餘問心無愧，毛主席若以我們反了江青一夥「定罪」，則願意吃冤案，這就是我們的共同心願。正是由於存在這種思想，所以對問題的複雜性想得不多，更想得不深。我們在精神上，還是希望到林總「平安」就好。大樹不倒，矮的總是壓不死的，毛主席對林總的態度是我們注意的中心問題。在這方面祇要有一點什麼情況，對我們的影響都是很大的，因為廬山問題的實質問題就是毛主席對林總的態度問題。江青一夥的「勝利」不是他們自己取得的，同樣的，軍隊的「失敗」也不是自己無能的結果，這些都是毛主席決定的。

我們的心情實在不好，我們的思想情況，我都及時向總理匯報了。周總理對我們是非常關心的，除了經常向我們做工作之外，一九七一年二月（春節的第二天）在京西賓館大樓八層，周總理同黃、吳、李、邱做了一次長時間的談話，從晚上九時起，一直說到天亮。

總理說：廬山會議到現在幾個月了，政治局生活會議也還沒有開，你們的情況，會作都同我斷續談過。今天就同你們再談一次。總理談話的要點如下：

1、你們提出了「自衛戰」的方針是正確的。廬山的教訓是可貴的。對張春橋的問題，沒有想到更嚴重的後果就是失誤。你們緊跟毛主席是不成問題的，但怎樣跟法，過去你們不清楚，現在清楚了就很好了。毛主席對你們幾個不僅無惡感，而且是關心的。

2、關於江青的問題。對待她這樣的特殊的人，是要費點腦子的。我的經驗就是「忍耐」兩個字，其餘的辦法是沒有用的。這樣做是必要的，這個問題很特殊，就不談了。

3、關於批判「天才」論的問題。你們認識了這點很好。這個問題全部核心是涉及到副帥，不是「天才」論本身的問題。因此，不管你們對「天才」論的問題懂得不懂得都要批判，不批這個問題是交代不了的。而毛主席對陳伯達的問題不僅僅是「天才」論。

4、關於批判陳伯達的問題。這個問題你們應當抓緊。吳法憲更要準備做比較深刻的批判與自我批評。你們是可以寫出比較好的東西來的。如果有必要，我還願意幫點忙。

毛主席說打撲克最主要的是要有不怕摳底的精神。你要是怕對方摳底，顧慮就多了，那還能贏別人嗎？這如同一個人心裏有事是一樣的。

你總怕別人知道你的心裏的事，想講又不想講或者講一點留一點，這還有能講清問題之理？

毛主席這段話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要我把問題徹底講清楚，也祇有講徹底才能講清楚。我就是照著毛主席不怕「挖底」的精神才把問題講清楚的。我想你們掌握這個精神也一定能把問題講得清清楚楚的。

5、關於軍委辦事組要「摻沙子」的問題。毛主席對軍委辦事組要「摻沙子」的意思是從軍隊的歷史來考慮的。考慮過別的方面軍的人參加軍委辦事組。主席的考慮也是爲了軍隊的團結問題。

周總理接著說：你們在想什麼？對這些問題有沒有系統交換過意見？今天，我們可以互相談一下。

黃永勝接著說：我們幾個人主要有三點共同想法。第一，有怨氣。我們認爲在廬山並沒有做壞事，祇是說了幾句話，雖有不妥也沒有大錯。第二，他們幾個人（江青一夥）太霸道。現在更趾高氣揚了。第三，我們都認爲很難用自己的口說清楚自己的問題，這就是我們思想上存在的問題。

黃永勝又說：軍委辦事組是軍隊的統帥部，這是一條大船，駕駛得好壞，是一件大事，我們感到毛主席對軍委辦事組有信任的問題，不是能力問題，因此我們壓力很大。

周總理說：你的想法是不對的。毛主席、中央對軍委辦事組根本不存在不信任的問題。如果有這樣的問題，毛主席早就會採取斷然措施的。

周總理最後說：「我同軍委辦事組是心心相印的，我也感激各位對我的信任！」

葉群、吳法憲聽到總理說的最後一句話，竟突然哭起來。他們表示非常痛心，不僅一把鼻涕，一把淚，還哇哇叫的哭出聲來了。當時的情景非常淒慘！總理走了以後，黃永勝也很傷心，他說：「葉群在這裏我也要說，我們不怕掘底，但要告訴我們掘誰的底，又要講團結，又要掘底，怎麼個搞法？！我寧願再過一次草地，也不願意這樣走不到頭。」葉群祇說了一句：「不要倒苦水了。」說完她就走了。

林總的態度

廬山的九屆二中全會，正在熱火朝天地討論林總在全會開幕式上講話的時候，八月二十五日下午五時，毛主席在各小組長參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突然決定：停止討論林總的講話，這是急轉直下的變化。

林總對廬山會議總的態度是：聽毛主席決定。

泰然自若。林總對各小組停止討論他的講話，以我所觀察到他的表現是泰然自若。除了擁護毛主席的決定之外，其餘什麼話也沒有說。從此他的態度就是：「不說話，不干擾，不自責。」在以後一年多的時間都是這種態度，一直沒有變化。林總採取這種態度，是真正執行九大「團結起來，爭取更大勝利」的路線。

林總確定自己的態度，是有堅實思想基礎的。(一)林總八月二十三日下午在全會開幕會上的講話，在主要論點和組織觀念上都沒有錯誤。據葉群說：八月二十三日全會開幕前，在小禮堂休息室主席和林總議論過講話的問題。毛主席對林總說：「不要講稿，放開說。照稿子念都是講不好的。」這些情況，在八月二十三日晚的政治局會議上得到了證實。周總理傳達了小禮堂常委會的情況後，汪東興接著作了補充，他說：「我是中央辦公廳工作人員，列席了二十二日的中央常委會。林總今天的講話講得好，是主席要林總講的。主席還交代要放開講，才能把話講好。主席還讓在會上講講形勢。」汪講了這段話之後，康生表示好不高興。八月二十五日晚，在政治局的會議上，康生就不客氣批評汪東興說：「做了這麼多年的工作，還是像個警衛員一樣的水平，對中央常委會的問題也隨便說。」由此看來，林總講話的論點是先得到毛主席點頭的。二十三日開幕式前，林在後臺對主席說，要講一講，是對主席二十二日要他講話的再確認，林對主席是尊重的，是守規矩的；(二)林總對我們黨要有自己的領袖的思想很早就有了，他堅決擁護毛主席為黨的領袖。一九五九年，林總主持中央軍委工作之後，把「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毛澤東思想一定要學到手」提到了建軍路線的高度。從軍隊開始，學習毛主席著作成為全國人民重要的政治生活內容。當時，從中央領導人周恩來、彭真、康生、陸定一、陶鑄等等都是經常稱讚：全國掀起了學習毛主席思想，林總是立了大功勞。我從來也沒有聽到過毛主席反對過林總提

出學習毛主席著作問題。林總確實認為，毛主席是馬列主義的「天才」，他這種思想從來也沒有改變過。林總用很大的精力宣傳毛主席是「天才」，是歷史的發展，黨的利益的需要。對這些問題的提法，即使有些不妥之處，也祇是適當糾正提法的問題，決不是反黨問題，更不是政變綱領。(三)林總說：「我在全會上的講話，毛主席在場都聽了。」二十四日上午重放錄音，也是毛主席批准的。各小組經過兩天多的討論，沒有聽到毛主席說一句什麼話。爲什麼二十五日下午江青帶著張春橋、姚文元，闖進了毛主席的住處之後，就發生了新的問題？這裏的新問題，其實也是老問題，就是「天才論和設國家主席」兩個問題，但設國家主席的問題林總沒有提及，我們在發言中也沒有提及。

不說話。八月二十五日，中央常委會後，林總就沒有參加中央常委的領導工作，等於「一邊站」了。毛主席後來對林總下的「狠心」也是源於這裏。

以我的記憶，從八月二十五日到九月二日與全會有關的話，林總祇說過四次話，每次也祇有幾句。

八月二十六日，毛主席要林總召集：陳伯達、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汪東興等開個會，作思想工作，提高認識。林總照辦了，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日三天連續開過三次會，每次會議九時開始到十一時結束，林總在會議開始時，祇說：「毛主席要我召集各位開個會，提高認識。」每次會議結束時，林總也祇說：「開會的情況，由汪東興向毛主席口頭報告，我就不寫書面報告了。」會議中間，林總一句話也沒有說。

八月三十一日，林總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由陳伯達、吳法憲作檢討，會議開始時，林總祇說了一句話：「政治局會議開始。」會議結束時，林總也祇說：「陳伯達這個人，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應當同他劃清界線。」其餘什麼話也沒有說。

另外，毛主席指責陳伯達的話，康生攻擊陳伯達的話，都直接指向了林總。大約是八月二十八日，毛主席叫陳伯達去談過一次話，他指責陳伯達：「你參加了軍事俱樂部。」可能是同一天，陳伯達去看望康生等人，遭到了一頓大罵。康生憤怒地指著陳伯達的鼻子說：「你把林副主席綁上你的戰車，我準備你陳伯達殺我的頭。你給我滾出去。」還有，毛遠

新、徐景賢指責：「廬山出現的問題，是未遂政變。」上面這些話的份量夠重了吧，但是林總聽到仍若無其事，不理睬、不吭氣。

林總對毛主席的性格和爲人是很清楚的。祇要毛主席認定的問題，而自己又沒有改變自己的看法，別人提任何意見是聽不進去的。況且，隨便提意見還可能出現料想不到問題。林總從來不隨便多提意見，更不會輕易進行爭論。

八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之後，常委會是否照常開會我不知道，但周總理、康生則每天晚飯後都要到毛主席的住處去。以我所知，林總一次也沒有去過。事實上林總就被排除在中央常委領導之外了。

不干擾。一九七〇年九月六日晚，在廬山舉行最後一次政治局會議。在會上，周總理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一、廬山的問題已經在山上處理完了，沒有什麼問題需要帶到山下去處理；二、回到北京後，政治局開一次學習生活會議，大家就都照常工作。這裏指的學習生活會議，意思是黃、吳、葉、李、邱作檢討，通過批判，達到團結。但這次會議未曾開成。

回到北京後，康生裝病，會議開不成。據王洪文後來說，康生對上海幫說：「政治局的生活會議不能開，在山上對他們都沒有搞到什麼東西，回北京就能搞到？會一開，他們脖子上的套索就拿下來了。」康生在文革中的行爲比陳伯達更甚，陳伯達出了事，他裝病避「風頭」。「九一三」之後不幾天病就好了，就神氣十足地露面了。

從一九七〇年九月到七一年四月十五日「批陳整風會議」之前，林總一直住在北戴河，祇回過北京兩次，一次七〇年的國慶節，一次七一年的五一節。林總國慶節回京時，從西郊機場直接到中南海毛主席住處去了。他對毛主席說：「這次在廬山，如同擦了一根火柴，差點把房子都燒著了。」毛主席祇簡單說了一句話：「沒有那麼嚴重，擦火柴的目的不是燒房子。」我認爲林總向毛主席說的那句話，是試著做自我批評的，可是沒有得到毛主席的反響，於是就沒有說下去了。

批陳整風會議中期，毛遠新、徐景賢等「追剿」吳法憲很厲害，吳犯心臟病倒在會場上。江青一夥派人從會場上追到吳法憲家裏去。此時，林總帶著葉群從北戴河突然回到北京。他們回來的當天晚上，葉群接連在三個小組露面，並宣佈：「林副主席和我回來參加會議」。

習。」林總回來後，江青一夥原定「抓住吳法憲，戰場上繳械」的企圖就沒實現。

七一年五月一日之夜，毛主席、林總在黃永勝陪同之下，同時登上了天安門。放了一輪煙火之後，林總指著自己的頭向毛主席說：「我頭痛，早點退場。」毛主席同答說：「好。今天沒有什麼題目了。」此時，毛主席也進休息室去了。

葉群很機靈，她抓住這個機會，跟著毛主席進休息室去了。毛主席同葉群談了將近兩個小時。葉群出來之後，非常高興地同我們說：「主席同我談得很好，談笑風生地和我說了很多問題，還是和對我報告上的批示差不多，沒有加新的東西。」

廬山會議結束，到七一年四月的批陳整風會議，北京發生了好多多的事。其中毛主席的口頭指示或批示，有的都直接指向林總，政治份量相當嚴重，但林總都沒有說話。例如：

(一) 毛主席對吳法憲、葉群兩人報告的批示，批的內容都很嚴厲。

(二) 對三十八軍報告的批示。三十八軍的報告是主席、江青授意的，在形式上指向陳伯達，事實上是指向軍委辦事組和林總的。對該軍的報告，軍委辦事組是兩本賬，對外向他們學習，對內根本不予理睬。

(三) 對軍委座談會批示。批評軍委座談會「不批陳」的批示，起了強力爆炸的作用。對軍委辦事組打了一記悶棍，給了「上方寶劍」。這是廬山會議以來軍委辦事組受到的最大打擊。

(四) 政治局一九七一年全國計劃會議拍板會上對軍委辦事組批判、攻擊。出席會議的一小部份人，對軍委辦事組當做敵人般進行了嚴厲打擊。正是因為有他們對軍委辦事組的打擊，毛主席就決定召集另一次中央會議來解決問題，「批陳整風匯報會」就是從此而來的。當然，現在看來，也可能是主席安排的。

(五) 北戴河會議。中央政治局決定召開批陳整風會議之後，毛主席決定要周總理帶部份政治局委員黃、吳、李、邱、李德生、紀登奎等人去北戴河向林總匯報，並對批陳整風會議進行研究和決定有關事宜。林總對周總理的匯報，基本上祇說了四個字的話：「同意，擁護。」其餘就沒有說什麼話。

批陳整風會議結束時，中央常委討論對黃、吳、葉、李、邱五人的結論。林總祇說了一句話：「凡是不需要留檔案的問題，以不留為好。」很清楚，林是不贊成做結論的。對這個問題，毛主席沒有考慮林總的意見，周總理代表中央對黃、吳、事、邱、葉還是做了結論：「政治上犯了路線錯誤，組織上犯了宗派主義錯誤」。對上面這些問題，林總基本上沒有說話，更沒有提出過什麼建議性的意見。

不自責。從廬山回到北京後，政治局會議久久未能召開，但對黃、吳、李、邱的責難，則不斷發生。針對當時的情況，我同黃永勝交換過一次意見。

邱：你好受嗎？

黃：不好受，又有什麼辦法。

邱：我看現在的溫度（指毛主席的指責）比山上還高了，「山上的問題不下山」，可能是空話。

黃：完全是空話，現在還看不出來。但對我們抓住不放，同在山上是差不多的。

邱：以你的看法，毛主席在抓什麼？

黃：要我們做自我批評。

邱：我們的自我批評是需要的，在一定條件下，也可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主要是要有副帥的態度。我看，林總要表示自己的態度，可能會起到很好的作用。

黃：你說的有一定的道理，但誰能開這個口呢？

邱：我看你就可開口。為慎重起見，可以先向葉說，如果說得下去，再向林本人說。

黃當時情緒還好，他同意了我的意見。

過了大約三天，黃主動對我說：「北戴河回話了。」

葉群傳達了林總對黃永勝建議的回答。林說：「（一）自我批評本來是我們黨的正常生活，祇要有缺點，有錯誤就應當進行批評。但對廬山的問題我是沒有什麼可自責的。全會開幕上我的講話，毛主席是同意的，我講話的要點毛主席是知道的。所以毛主席才會說：『不要奉命講話，要講自己的話，才能講好。』我就是本著這個精神講話的。（二）他們妄想要從我們的自我批評中得到什麼東西，這是不可能的。在廬山興師動眾鬧

了幾天，還不就是得到了『天才論』和設『國家主席』兩個問題。這兩個問題，前者是老得掉牙的問題，我是提過堅持天才的觀點，難道我連提個人觀點的權利都沒有了？（三）廬山的問題不是做自我批評可以了結的問題。」

最後，林總還說了幾句：「告訴他們，要是晚上睡不著，可以加點安眠藥。」

黃永勝要我去把林總的話，向周總理匯報。我把黃永勝的建議和林總回答，都向總理匯報了。周總理祇說了一句話：「林總善於把複雜的問題條理化。」其餘什麼也沒有說。

從後來的事態的發展看，林總堅持不做檢討是有理由的。事情本來是一般性的問題，即使話是從林總口裏出來的，問題的本身也還是一般性的問題。以我的看法，毛主席對廬山問題的處理是不計後果的，毛主席一定要佔上風，林彪就是不說話；林越不說話，主席就越要幹到底，這樣事情就越搞越重、越搞越亂。可以說對廬山問題的處理，等於又進行了一次文化大革命。打倒劉、鄧後，又對著林彪。

毛主席為什麼南巡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五日，毛主席在汪東興陪同下，由北京出發，在武昌、長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地進行了巡視，史稱毛主席南巡。

毛主席外出巡視，在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之前是常事。那個時候，毛主席爲了不讓江青跟著走，多數都在毛主席離開北京之後，總理才在政治局會議上公開。同時主席的外出，中央常委，總參謀部、空軍、海軍主要負責首長都是知道的，因爲軍隊對毛主席負有相應的保證安全的責任。這次則很特別，毛主席外出後，周總理祇說過一句話：「毛主席外出了，現在在武昌，要華國鋒到武昌去。」毛主席離開北京時，林彪在北戴河也不知道。過去，毛主席在外地的談話，周總理在政治局會議上都是及時傳達的，這次則沒有做一個字的傳達，毛主席南巡是突然的、保密的。毛主席常說，要搞陽謀，不要搞陰謀，毛主席這次南巡大家都可以得出自己的看法。

毛主席南巡，是決定黨的命運的問題，也就是決定黨是團結還是分裂的問題，同時也是決定許多老幹部的政治生命問題。我和社聯人受到

了空前未有的打擊，是同毛主席的南巡密切相聯的。因此，搞清楚毛主席南巡，對研究這段歷史很重要。

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日，周總理帶黃、吳、李、邱、李（德生）、紀（登奎）等人去北戴河向林總匯報回來之後，在四月一日，毛主席接見了去北戴河的人，並做了重要講話，對廬山問題拍板定案了，當時認為是解決了問題。從四月底到八月下旬將近五個月的時間裏，中央太平無事，大家都在做自己分工負責的工作，軍委辦事組主要是抓戰備。四月下旬「批陳整風」會議之後，我向黃永勝提過一次意見：「我們應當放下包袱，認真工作，不然別人（指江青一夥）在工作上抓住我們什麼辮子就只好辦了。」黃同意了我的意見。至於周總理，他對軍隊的關係還是同過去一樣的密切。

這時，關於九屆三中全會和四屆人大的準備工作也在正常進行。在四屆人大的方案中，黃、吳、李、邱都有所安排，黃為第一副總理，李、邱為副總理，吳為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而且，在總理給主席的報告中，還專門講了「請林副主席在國慶節和四屆人大上講話」，「因為兩個會日期比較近，講一次長話，講一次短話，避免內容重複。長話、短話怎樣安排，請主席指示。」看來一切都很正常。

八月下旬，當我知道毛主席南巡以後，覺得沒有什麼可驚奇的，但九月六日李作鵬陪同朝鮮軍事代表團訪問了韶山之後，從武漢回到北京，講了武漢軍區政委劉豐同他講的有關主席在武漢與他和汪東興等人的談話內容之後，思想上有很大的震動。但我同李是一樣的想法：「心中有數」，在思想上並無太大的負擔。

毛主席為什麼南巡，目的是什麼？南巡的導火線是什麼，我當時和現在都不清楚。但從他在各地的講話來看也就很清楚了。南巡就是發動「群眾」，要大家站在他一邊，在三中全會上開始重新處理林彪的問題，三中全會臨近，主席也走得匆忙。一九七〇年毛主席在廬山九屆二中全會結束時講話時說：「山上的問題不下山，回北京後政治局開一次學習生活會就行了。」七一年四月一日又講：「他們幾個人（指黃，吳、李、邱）的問題，在我這裏就處理完了，剩下開會的事（即批陳整風會議）請總理去辦。」毛主席說的那些話，都不算數了，自己全部推翻了。

林彪是同毛主席一起在戰壕裏成長的，不論是艱苦歲月還是槍林彈雨，不論是挫折還是勝利。林彪一生中功績很大，沒有什麼「污點」。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把林彪拉上了自己的「神臺」，毛主席對這樣一個人，是不能不慎之又慎的，想把林總拉下來，在黨內是要有基礎的，尤其是軍隊。因此出去遊說是必要的。

以我的看法，毛主席在廬山會議上發現了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林彪問題」。在毛主席看來，「林彪問題」究竟是什麼問題？最主要是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林彪的威望很高，而江青一夥不得人心。廬山鬧了這樣久，對林彪沒有大的影響，林本人也沒有什麼思想負擔。另一方面就是鞏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問題，林彪在全會開幕式上的講話，把矛頭對準張春橋，毛在江青的提醒下，也認為對著張春橋就是指向文化大革命，而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的命根子。在毛主席的思想裏，武裝鬥爭奪取政權和搞文化大革命是一生最大的事業，也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誰要在這兩個方面有所指責，必定是輕則路線錯誤，重則反革命。

根據上述的歷史與現實情況，毛主席對「林彪問題」，是經過廬山（山上），北京（山下）和南巡三次不同辦法處理的。

廬山會議的問題，在山上基本上已處理了。毛主席是犧牲陳伯達，支持和保護了江青一夥，批評和壓制了軍委辦事組，在當時的情況下，江青一夥得到了滿足。

主席南巡時，批陳整風會議已結束將近三個月，即對「林彪問題」進行了第二次處理。這次處理是在對軍委辦事組進行了廣泛徹底批判之下，又召開了「批陳整風」會議，給軍委辦事組戴上了帽子，即做了犯有「宗派主義錯誤」的組織結論。這次處理，江青一夥得到了預料之外的大滿足，軍委辦事組則抬不起頭。而且，當時政治局對三中全會、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已經就緒祇待開會了，主席視這些黨和國家的大事於不顧，執意要走。

毛主席南巡，在武昌、長沙、南昌、杭州、上海等處的談話，直接指出了林彪的問題，這就是說，毛主席借南巡對廬山問題要進行更高級的處理了。毛主席南巡，無須多說就是對「林彪問題」的處理不滿足也不滿意，因為林彪經過廬山會議的折磨，並沒無什麼損失，地位和威望並無損失反而提高了。大家本來就對江青、張春橋十分怨憤，廬山上的

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大家心裏也明白，主席心裏也明白，以陳伯達換張春橋本來就有些不值，保護張春橋傷害林彪就更不值。事情往往物極必反，廬山會議以後，主席不停地張羅，收效甚微，大家口服心不服，反而同情林彪。搞張春橋和擁護文化大革命本來是可以分開的，搞「王、關、戚」就是這樣。這次因為有江青的問題，主席非說反張春橋就是反文化大革命，就是對著他自己。毛沒有繞出這個怪圈，非要叫林彪從他的胯下爬過去，林就是不從。主席會想：這樣的林彪能夠鞏固和發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嗎？這是毛主席南巡要重新處理林彪的主要原因。

在武昌的談話

毛主席在各地的談話，在「九一三」之前或以後都沒有聽到過傳達，應不算光明正大。我所知道的主席南巡講話，除了李作鵬講的在武昌的談話內容外，其餘的都不知道。真正瞭解毛主席南巡講話是近二十年以後，我已經被扒了幾層皮，下了地獄，成爲階下囚之後才知道的，是保外就醫後聽劉豐、卜占亞告訴我的。

一九九〇年，我和老伴到武漢去看女兒，見到劉豐。劉豐的境況非常糟糕，他的老伴又得了不治之症，生活上很困難。劉豐提起往事說：「我們對主席真是無限熱愛和忠誠，最後還鬧了一個家破人亡的下場。」

我望著劫難二十年以後又重逢的劉豐同志，心裏很難過，他那麼困難、那麼落魄、那麼無助。劉豐是我的老戰友，我在延安當軍委供給部長時，他是處長。劉豐同志對黨忠誠，對革命忠誠，工作任勞任怨，吃苦耐勞。我是他的入黨介紹人，他是一個優秀的共產黨人。

劉豐說，八月十六日、十七日毛主席兩次找他們談話。參加談話的人有劉豐和汪東興，還有劉建勳、王新。武漢軍區司令員曾思玉當時不在武漢。

毛主席講了一大段黨的歷史，很快就將話題轉到九屆二中全會上，毛主席說：「廬山的問題是路線問題，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這個問題還沒有完，陳伯達後面還有大人物。在三中全會對這個問題要講清楚，你們不講，我來講，總是要把問題講清楚的。我希望你們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義；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

毛主席又說：「軍隊的幾個人，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人在廬山跟著起哄，他們搞突然襲擊，地下活動，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他們看到我老了，急於想當國家主席，實際上是想奪權，分裂黨。廬山會議以後，我採取了甩石頭，摻沙子，挖牆腳三個辦法。批發三十八軍的報告是甩石頭，叫紀登奎參加軍委辦事組是摻沙子，改組北京軍區是挖牆腳。軍委座談會開了那麼長時間，根本不批陳。犯了路線性、方向性錯誤，爲首的改也難。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他們做了檢討，但吞吞吐吐並沒有把問題講清楚。因爲廬山會議以來，有的人一句話都沒有說，大人物不開口，其他的人即使講，也是講無關重要的問題。」

毛主席還說：「我就不相信軍隊會跟他們造反，軍下面還有師團，還有司政後機關，你調軍隊來，他們會聽嗎？……廬山的問題，林彪同志要負一些責任的，我同林彪同志談過，他有些話說得不妥，什麼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天才，不符合事實嘛！我不是天才。……從去年下山到今天，一年多了，我一直都睡不好，很難休息好。但你們要保護林彪同志。」

毛主席還說到：「反對自己的老婆當自己的辦公室主任。……」

毛主席最後說：「今天我們的談話，你們要進行座談，有什麼意見都可以提出來，你們討論之後，寫個簡要的報告給我，我們還要談一次。」

劉豐說，主席還叫汪東興把華國鋒從北京叫到武漢來。主席也和華國鋒進行了長談。

劉豐說，二十七日，他去看望主席，劉豐對主席說：「我們完全擁護毛主席的指示，無論在什麼情況下，我們都聽毛主席的話，跟毛主席革命到底。我認爲，如果因林副主席的講話影響了主席的健康，我建議林副主席在適當的小範圍內，向主席做個檢討。」

聽了劉豐的講話，毛主席立即興奮起來，拍著自己的大腿說：「你說得好！這個意見在北京是沒有人提的，黃永勝是不會提的！你的態度很好，在九屆三中全會上，就由你把這個問題提出來。希望你實踐自己的申明，表裏一致應當是一切共產黨員的態度，但這不容易做到，更不容易一貫做到。」

毛主席還讓劉豐他們唱《國際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劉豐說到這裏非常激動，他說：「我是在劫難逃啊。如果沒有『九一三』，我也自身難保。想想看，主席讓我在九屆三中全會上，把林的問題提出來，這不是找死嗎！？我提吧，林不會放過我；我不提吧，主席更不會放過我。」

在長沙的談話

毛主席是八月二十七日到長沙的。在長沙和當地的軍政主要領導人談了話，參加談話的有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政委劉興元，廣西自治區書記韋國清、還有任思忠、華國鋒、卜占亞等人。從主席的談話來看，矛頭已明顯指向林，指向黃永勝，指向軍委辦事組。主席離開長沙後，在南昌、杭州，上海、豐臺都和當地的軍政主要領導人談了話。這些情況我當時是一點也不知道的。我到西安以後，卜占亞同志給我講過毛主席在長沙談話的情況。主席談話總的精神就是「處理林彪問題的動員令」。不管以後有沒有「九一三」，主席南巡的講話，都使黨分裂了。毛主席反劉少奇時，分裂了黨；這次反林彪，又一次分裂了黨。

其實，主席在各地談的和在武漢談的也差不多，基本上還是那些問題。

第一，廬山這件事還沒有完。大家都認為問題解決了，其實還沒完，還沒有解決。

第二，不贊成自己的老婆當自己的辦公室主任。

第三，點名說了黃永勝。毛主席說：「黃永勝調動軍隊造反，各軍區都聽你的？我就不相信」。主席還對著丁盛說：「黃永勝要是打倒了，你們怎樣辦？你們和黃永勝的關係那麼好，黃永勝倒了你們怎麼得了啊？」

第四，唱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

第五，毛主席希望把鍾赤兵調到廣州軍區當副司令。劉興元說我們馬上報告軍委辦事組。汪東興聽到後立即說，你們不要報告了，我去和軍委辦事組說（汪東興是怕劉興元漏了風聲）。

第六，我的談話你們不許給北京講，也不要傳達，但可以在常委之間吹吹風。

卜占亞說：「主席談完話，大家回到賓館，我問丁盛：『主席問你黃永勝打倒了怎麼辦，你就說跟著主席幹革命嘛，怎麼一句話也說不出』」

來？」丁盛說：『太緊張了，太緊張了。主席對我們是進行路線教育，怎麼突然說打倒黃永勝？』我對丁盛說：『黃永勝祇是個代名詞，你自己去琢磨吧。』

卜占亞還說：「接下來我們幾個就開會，研究主席的談話。主席說：『我的談話你們不許給北京講，也不要傳達，但可以在常委之間吹吹風。』主席究竟是希望我們傳達，還是不希望傳達呢？大家一致認為主席是希望傳達的，我們應該傳達。於是廣州軍區就在湖南韶山的滴水洞開了黨委擴大會，傳達了主席跟我們談話的內容。」

對於九屆二中全會的問題，在廬山我就有這種想法：廬山的問題看起來有一定的複雜性，但核心問題祇有一個，這就是：毛主席對林彪的態度問題。如果毛主席對林彪態度未變，什麼事也沒有；如果毛主席對林彪態度變了，就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連根本不敢想的問題都會出來的，在廬山，毛主席終於發現林彪原來對文化大革命，對中央文革的江青、張春橋等人是否定的態度（姚文元稱廬山會議是「八月逆流」），主席對林彪的態度就徹底變了。總之，提起來千斤重，放下來僅四兩。

林彪是冤鬼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到十五日晚以前，我沒有聽到周總理傳達毛主席對林彪問題的任何說法，政治局會議照常進行，照常處理各種問題，照常是凌晨三點以後才能散會。從十五日晚起就變了，當得到我駐外蒙使館關於林彪等人全部在溫都爾汗摔死的報告，毛主席要汪東興在政治局會議上傳達了一句話：「林彪幫了我一個很大的忙」，這句話實際上就是一錘定音，也就是對林彪可以按需要任意處理了。從十七日開始什麼武裝政變，謀害毛主席，轟炸機、高射炮、火箭筒等都逐漸出來了。林彪是頑兇，是「現行反革命」的頭目了，不知有多少人要做殉葬品了。

對林彪是先定為武裝政變的現行反革命頭目才處理的，不先給林彪定下罪名就無法處理，也沒有什麼可處理的，所以，當時搞清林彪的問題毫無意義；如同八屆十二中全會處理劉少奇一樣，不先在他頭上扣上「叛徒、工賊、內奸」三頂反革命性質的帽子，也是無法處理，道理是一樣的。先「殺」後示眾，是對劉少奇、林彪處理的主要手段。

林彪確實幫了主席一個很大的忙！接著「二月逆流」，「賀龍問題」，「楊、余、傅」問題，等等等等，都由林彪擔當了。中國革命進程中的大功臣，中、外有名的軍事家慘死了，這就是林彪的下場。

毛主席在各地直指林彪的談話，葉群是能及時知道的，但葉對林彪有封鎖所有消息的可能，一切都由她作決定了，這就使問題越搞越亂。葉群進入了緊張的階段，林立果瞎張羅，林彪則照常生活。在林立果看到林彪走投無路時，就下了毒手把林彪挾持外逃了，這是我對林彪外逃大致的看法，我始終認為林彪是決不可能外逃的。

林彪真正搞武裝政變謀害毛主席？我認為是毫無根據的。

第一，武裝政變是特殊戰鬥，古今中外都一樣，這種戰鬥來不得半點差錯。我們所看到林彪搞武裝政變的「證據」，就是什麼「五七一工程紀要」，「小艦隊」，這根本不能說明林彪有什麼問題，這些材料不僅不能說明問題，更不能證明任何問題。

我們不要忘記林彪是大軍事家，也是最有實戰經驗的，林彪要真的搞了什麼武裝政變，就沒有不成功的。

還有一個重要問題，七一年九月十二日的情況。當時，毛主席還在返京路上，林彪在北戴河，北京祇有周恩來。在這種情況下，林彪要搞武裝政變，還不是可以隨心所欲，水到渠成嗎？因此，假的東西要說成真的不可能的。

第二，武裝政變要有最有力的指揮。林彪搞武裝政變怎麼好像是小孩做遊戲一樣的？

林彪要搞武裝政變，他沒有動用統帥部的任何指揮機構，沒有動用各軍種各大軍區，也沒有動用任何作戰部隊。這樣象搞武裝政變嗎？林彪搞政變都不依靠我們，「林彪死黨」的帽子白給我們戴上了！

同樣不要忘記，當時林彪不僅可以通過指揮系統指揮全軍部隊，而且也可以指揮任何作戰部隊。林彪沒有動用任何部隊，這也是搞武裝政變嗎？

第三，全國平靜。事實證明，「九一三」之後，黨內、軍內秩序良好，社會平靜穩定。沒有發現一個排、連、營、團接到過林彪或黃吳李邱緊急戰備或緊急待命的指令，更不要說一個師、一個軍了；同樣沒有發

現一輛坦克、一架戰鬥機、轟炸機接到過林彪或黃吳李邱緊急戰備或緊急待命的指令。林彪，黃吳李邱是軍人，他們政變不利用軍隊，不利用槍炮，不利用飛機、坦克，這算搞什麼名堂！？難道林彪祇和自己的兒子及幾個空軍的小幹部搞政變嗎？！這根本不是林彪。政變是爲了活，而不是爲了死，可是按照官方的說法，好像林彪政變就是自己在搞一場爲了死的兒戲。那麼，爲什麼都說林彪是搞武裝政變失敗而外逃的？這是借用「九一三」事件來處理「林彪問題」的手段，祇有把林彪先定爲反革命集團搞政變的頭目，才有處理的根據。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四日晚八時，當確悉林彪出走的飛機在外蒙溫都爾汗機場機毀人亡，機上九人全部喪生。接著，汪東興自己回中南海，同毛主席和工作人員舉行了慶祝會，毛主席的心情很好，並要汪東興向政治局傳達一句話：「林彪幫了我一個大忙。」這句話的意思很清楚，林彪成了死反革命，對「林彪問題」可以隨心所欲放手處理了。說「九一三」是林彪搞政變，對毛主席是飲鴆止渴，並爲鄧小平否定毛主席準備了炮彈。

然而歷史是不能改寫的，林彪對中國人民革命偉大勝利的貢獻終究還會永遠記錄在史冊上。

第四篇

我的晚年

第三十六章 「九一三」事件——林彪死了

十三日凌晨的政治局緊急會議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是星期六，我住在總後的家中。十三日凌晨三時許，公務員張軍到臥室來叫醒我說：「劉秘書來電話說，總理通知，在人大會堂四川廳開政治局會議，要你立即去。劉秘書一會兒就會送公文包來，小朱（警衛員）也起來了。」

文革當中，各種事情繁多，無論什麼時候開政治局會議都是常事，我也沒多想什麼，馬上就起來了。當時，我被總後造反派打傷的胳膊和左腿都還沒有完全恢復，爲此，張軍即協助我穿衣服。我因剛吃了安眠藥，腦袋暈暈忽忽的。

到了人大會堂四川廳，江青、姚文元等人已經先到了。先到的人同平常一樣，有的抽煙，有的像一尊菩薩一樣，靜坐在那裏。我看到人還沒有到齊，估計一下子還開不成會，即就到四川廳外面去活動了一下，回來後又坐在原位置上。

四川廳是人大會堂一個比較大的廳，在大廳東南角擺了一圈沙發，成橢圓型。我到了不久，張春橋也到了。同時，李作鵬才在警衛員的摻扶下進入會場，他也服了安眠藥，他站不穩，在警衛員的摻扶之下還晃晃悠悠的。紀登奎，李德生也是後到的。在這個時候，政治局究竟開會幹什麼？誰也不知道。李作鵬清醒一些之後，他還問了鄰座的江青：「江青同志，今天開會是什麼事呀？」

江青的回答是：「等一會就知道了。」她的回答是很妙的。這種說法，既不能說她知道開什麼會，也不能說她不知道。但江青肯定是不知道的。她要是知道了，早就會同先到場的人說了，以表示自己知道的事多。

我們大概等了近三小時，於十三日早六時，可以看到窗外的光線，天都快大亮了的時候，政治局的會議才開始的。周總理隨即進入大廳，葉劍英，黃永勝，李先念，吳法憲等人也跟在總理後面進來了。總理坐在南面的正中間。他坐的位置是可以眼觀「全場」的。周，葉、黃、張、李等原來就在人大會堂河北廳修改《政府工作報告》。發生了「九一三」事件之後，他們就在那裏集體辦公。

周總理剛進來時，我觀察到他的神色很特別，他看起來不光是疲勞的問題。但我萬萬沒想到，竟是發生了「九一三」事件！

周總理坐下之後，習慣性地掃視了一下全場，就特意對著江青說：「江青同志，今天凌晨發生的事你不會感到突然吧？」江青當時不可能理解總理的話，因此她沒有回答總理的問話。總理看他的話毫無反應，又補充了一句：「林彪坐飛機走掉了，飛機出境到外蒙古了。」

當時全場立即變得鴉雀無聲，真的肅靜到都能聽到自己的心臟在跳動的地步。大家的面部表情都凝固了，有的張著嘴巴，有的豎起耳朵，但每個人的雙眼都盯著總理。我自己也和眾人一樣，思想上震動極大。我的腦子都麻木了。

江青對總理特意向她問的話，不僅不搭理，連看也沒有看總理一眼，她半天連身子沒有動一下。江青為什麼會對周總理持這樣的態度呢？她可能想到的是：發生了林彪出走這樣的大事，你周總理為什麼不早告訴呢？我為什麼和大家吃一樣的「飯」呢？

周總理宣佈了林彪的事後，眼皮就幾乎打不開了，他合眼有兩分鐘，然後就拿起茶杯喝茶。此時，江青大聲說：「有什麼事就講吧，不要讓大家跟著受洋罪。」周總理仍採取不惹她的辦法，對江青的話，總理連理也不理。

更使人氣憤的是，政治局會議進行到後半段的時候，周總理正在斷斷續續講林彪走的經過，江青聽得不耐煩，就和張春橋、姚文元三人竟三缺一地打起撲克牌來了。周總理看到此情此景心裏很難受，但也沒有予以制止。這說明江青不把總理放在眼裏，這也說明，因林彪的出走情況，還沒有落定，因而還沒有定性。

這次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是一次重要的會議，但大家的心情又是不一樣的。江青一夥內心很高興，江青、張春橋兩人不斷地交頭接耳說些什麼

事，他們連說帶打手勢，並且臉上常出現笑容，有時姚文元也湊到江青那裏小聲說上幾句。其餘的人都很規矩，沒有一個隨便說閒話的。這次四川廳的政治局會議，是江青一夥走上了「宏發」道路的會議；是軍委辦事組走上了下「地獄」道路的會議，是黨內重寫歷史的會議。這在事後看是很清楚的。

緊急善後處理

四川廳政治局會議，分前後兩段，前段是宣佈「九一三」的問題，後半段是緊急處理一些應急的事情。「九一三」之後，需要處理的問題很多，這裏講的僅是一些需要緊急處理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林彪座機出走的經過。

周總理說：「林彪出走是突然的。在事件發生之前，不僅沒有人想到，也是根本沒有人敢想。」

周總理接著說：「十二日晚上十一點半的樣子，葉群來電話說，一〇一動一下，去大連住幾天再回北京開三中全會，特向總理報告。」

總理問：「什麼時候起身？」

葉群答：「今晚走，準備空中走。」

總理說：「晚上飛行不安全，不要坐飛機走。三叉戟才進口，駕駛員還不熟悉。明天白天走，可以坐飛機。」

葉群說：「你知道，那個急性子（指林彪）很難說服得了。」

總理說：「爲了安全，必須這樣做。你應當耐著性子做說服工作。」

總理接著說：「十一點半多一點，接到北戴河中央警衛團（林彪隨身帶的警衛部隊）的報告說：葉群宣佈，周總理同意首長今晚起身去大連，葉群一宣佈就上汽車走了；接著，林豆豆從北戴河中央警衛團打來電話說：「他們（指葉群、林立果等人）坐汽車把我爸爸搞走了。」」

周總理說：「接到豆豆第三次電話，也是十一點半多了。」

總理說：「這個人的脾氣是很怪的，很難說服他不走。但爲了安全，我還是命令警衛部隊要把他們追回來。晚上無論如何不准放行，出了問題怎麼負得了責！」

周總理繼續說：「葉群他們到山海關機場之後，是採取緊急上飛機的辦法走的。在當時的情況下，基層單位是很難攔得住的。」

林彪上了飛機之後，機組的人並沒有到齊，飛機就發動了，林彪乘坐的飛機，是在沒有機場放行命令的情況下，強行起飛的，起飛的時候可能是十三日零時三十分左右。

周總理說：林彪的飛機強行起飛之後，是在京山航線飛行的，空軍的雷達看得很清楚。但到了接近承德時飛機徐徐下降，到了承德上空雷達搜索到一次，飛機調頭向北去了。

總理最後說：「十三日零時左右，還得到住北戴河中央警衛團的報告說：林彪的老警衛員，現在的保衛處長李文普，從北戴河到山海關的途中被打傷了，又據林豆豆的報告，昨晚林彪已服了安眠藥，在北戴河上汽車都是兩個人扶著上去的。這些情況都還有待查清楚。」

總理說：「他們上車後，不久李文普跳下車來，受了傷。」

總理最後說：「能想到的辦法都想到了。……飛機是強行起飛的。」

總理在政治上是非常成熟的，他可能想得較遠，因此，他既沒有說他和吳法憲、李作鵬想辦法阻止飛機起飛的情況，也沒有說主席講的「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的話。總理有政治態度的話，都是在九月十四日確認林彪摔死之後。

周總理剛講完話，江青以他慣用的手法，把小毛巾向茶几上一擡就起身上廁所去了。她邊起身邊說「林彪歷來都是鎮壓我的。」對她的話，當時沒有一個人呼應。

第二個問題：關於發表聲明與戰備問題。

周總理講完話之後，工作人員就進來送中午飯了。

在吃午飯之後，葉劍英向周總理提出了一個問題，他說：「林彪不會去蒙古，有可能到蘇聯去了。我們要發表一個聲明，在軍事上後發制人，但在政治上要先發制人，我們的公開聲明，主要是給蘇聯人看的。」對葉的提議，周總理表示同意。

周總理說：「可以發表一個聲明，祇有幾句話就行了。」葉劍英、黃永勝等都同意總理提的原則。葉劍英當時很積極，他一邊說政治局作記錄的秘書一邊記，聲明很快就寫好了，稿子很短，祇有百把十個字，周總理認真看後，派人去打電話，問毛主席睡了沒有？很快得到報告說，主席沒有睡覺。

聲明稿送到主席那裏不久，周總理就去接主席的電話去了，他回來後傳達說：「主席指示，聲明現在不要發，看看情況再說，林彪究竟到什麼地方去了，現在還不確切知道。主席說，即便到蘇聯去了，他就能當他們的國防部長？就有指揮軍隊的權力？……」大家聽了之後，沒有一個說話的。

接著會上就談到防止蘇聯乘機從空中和地面突然進攻的問題。這個問題別人沒有發表什麼意見，主要是黃永勝講的。他講了三點：

一、三北（東北、華北、西北）進入戰備狀態。三北的國境線上的部隊進入一級戰備。

二、各戰略方向的二梯隊，進入一級戰備狀態。統帥部的總預備隊，進入一級戰備狀態。三北的空軍部隊的戰備請總理親自部署。

三、北京要對空進行戰備。

黃永勝說完，總理要黃永勝趕緊搞一個全軍的應急作戰部署。緊急戰備文件就是我們搞的，這真是可笑，我們搞「政變」，我們又對我們自己搞戰備。

第三個問題：中央領導人的防空問題。

總理要求中央所有領導人都要住在有防空設施的地方，以防蘇修用原子彈突然襲擊，周總理規定如下：

一、周恩來、葉劍英、江青、黃永勝、張春橋、姚文元、吳法憲等人住人民大會堂，這裏亦為中央和中央軍委辦事組的指揮所，閻仲川為戰備值班室的總負責人。

二、李先念、李作鵬、邱會作、華國鋒、余秋里住京西賓館。

三、紀登奎住北京軍區機關。

四、李德生住空軍機關。

五、康生仍住玉泉山，暫時不要回釣魚臺。

最後，周總理還說，毛主席的防空問題，由他向主席請示後再定。

防空問題，包含著總理的智慧和複雜的政治問題，一是把對軍隊有指揮權的黃永勝、吳法憲（包括閻仲川）都控制起來了。二是向江青一夥示好。因為江、張、姚同周總理一起，住在人大會堂是毫無必要的。三是把華國鋒、余秋里提到了同中央政治局委員一樣的待遇。總之，中央的政治情況開始改變了。

第四個問題：對山海關未能走成的人的審查問題。

凡是到了山海關沒有走的人，集中管理，這批人一律由海軍李作鵬負責組織專門人進行審查，然後再處理。

第五個問題：撤消三中全會的工作班子問題。

這個問題由我負責處理。一，通知王良恩全會推遲進行，把工作班子一律撤消。二，把京西賓館通往空軍辦公大樓地下室的防護門打開。一旦需要時，住京西賓館的人可以進入地下室，經過空軍地下室向外疏散。三，通知鐵道兵在空軍地下室通往地下鐵的出口處停一列火車。

周總理對大小問題都做了具體的佈置。

周總理把所有緊急的問題都處理完了，最後鄭重宣佈：「偉大領袖毛主席安全回到北京來了，並已進住中南海。」但總理並未宣佈毛主席什麼時候進住中南海的。

江青無頭無腦地說：「昨天下午，我已經到中南海把主席臥室的窗戶打開了，換了空氣。室內也做了衛生消毒處理。」其實，根本沒有這樣的事，她也根本不會知道毛主席的行蹤，她是有意吹牛皮，抬高自己的身價。

周總理用帶有調整的語調說：「啊！我是主席回到豐臺以後，才知道這一情況的。」

江青聽了總理的話之後，不僅不臉紅，而且一點也不感到難為情。

從十三日凌晨三時，到下午五時半，歷時十五個小時的政治局緊急會議到此結束。

九月十三日至九月二十三日略記

九月十三日 下午六時，我去京西賓館處理周總理交代的幾件具體工作。一，撤消三中全會的工作班子，是交代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王良恩辦的。二，安排李先念、李作鵬、華國鋒、余秋里等人的住宿，是交代總參管理局副政委辦的。三，打開京西賓館地下室通往空軍地下室的大門。我親自走了一遍，我是京西賓館的防空總指揮，必須親自預先察看路線。

晚上九時，我又由總後大院去了京西賓館一趟，檢查了李先念等人的住宿，他們都睡下了，我祇在每人房門口同他們說了一句話。我敲李

作鵬門時，他還沒有睡，我就約他到會議廳的休息室聊天，一直聊到次日凌晨三時。他的精神狀態同我一樣：有思無慮。我們天南地北、過去現在等，雜七雜八談了很多。現在還能回憶起來的，有如下一些。

關於事實真相問題。

我說：「林彪真的叛國投敵了嗎？這真是不可想像的事呀！」

李說：「從現來看，走掉了已經是事實了！今後在這件事上的性質，

也是要看怎麼說了，是方是圓都由人說了。」

我說：「同意你的看法。如果他自己決心要走，臨走的時候，下幾道命令，在短時間之內也會大亂的呀！林彪走的原因，現在我們還不清楚。以我的估計，還是高明夫人腦子想歪了，把林彪搞走的，真是糊塗透頂了。」

李說：「這個問題，我也這樣想過，但現在還無法自圓其說。」

我說：「是夫人的事，問題可能就在這裏，現場還有好多人，特別是豆豆瞭解的事會比別人更多，更確切。我想事情很快就可以搞清楚，現在怕的就是以權說話。」

我說：「關於林彪的問題，我們是否要向主席、中央寫個報告？」

李說：「報告是要寫的，但寫什麼就是難題了，我們什麼事也沒有。要說有事，也就是得罪了江青。這樣寫，別人會相信嗎？看看再寫吧。」

我說：「江青他們幾個的鼻子要長到腦門上了，他們真神氣！看來很難有什麼黨的政策可講了。」

李說：「事實上，他們不光對我們神氣，對總理和其他人照樣神氣。」

我說：「他們神氣，我們受氣。」

時間過得很快，已經凌晨三點了。我們之間的閒談就此結束。

我立即將此事報告了周總理，總理說：「很好。我已知道了。」

九月十四日 今天上午八時就起來了，一個人坐在家中辦公室苦思。腦子裏好像裝滿了雜貨的箱子一樣，好像什麼都有，但又好像是一個空箱子，裏面什麼也沒有，真的不是滋味。下午，我把林彪出逃事，同胡敏和路光說了一下。他們聽了之後，除了震驚之外，要說的話很少。

我同往常一樣在家裏的辦公室一一翻閱文件，我在《三部要報》中看到：「蒙古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通報，昨凌晨一時許，中國一架大型運輸機入侵，在肯特省溫都爾汗墜毀……」

我立即將此事報告了周總理，總理說：「很好。我已知道了。」

今天下午中央政治局沒有開會。晚上開會時，周總理宣佈：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飛機，在外蒙古溫都爾汗墮毀了，機毀人亡，飛機上九個人都死了。

張春橋聽到周總理宣佈林彪死了之後，親自到外間服務臺拿出一瓶茅臺酒和數個杯子。他手拿著酒和杯子，笑嘻嘻地說：「今天，我自己花錢請大家乾一杯！」他給每人斟了一杯酒，並說：「我們今後在毛主席領導下做好工作。」當他走到吳法憲面前時，還特別說：「我們誠心共事合作！」他走到總理跟前時，也說了一句什麼話，但我沒有聽清楚，總理沒有站起來同張春橋碰杯。張走到我跟前要碰杯，我說了一句雙關語：「我要再喝酒就更迷糊了。」我沒有同張碰杯，張也沒有再去和黃、李及其他人碰杯。總理宣佈完林彪的死訊後，就叫汪東興立即到中南海去。不久，汪又回來了，他向大家說：「主席知道林彪死了，很高興！還與我們碰了杯。並且說了『感謝林彪幫了一個大忙。』」此時，張春橋自己哈哈大笑了好一陣子。

散會後，我又到京西賓館去同李作鵬閒談。剛說話不久，李的秘書送來海軍政治部保衛部發回來他們對扣押在山海關機場人員的審問記錄。李一頁一頁地看，並一頁一頁的遞給我看，記錄稿很長。在一張記錄稿上有兩點：一是被審查的人要求不要把他們交回空軍，以免被殺人滅口；二是，被審的人交待：他們聽林立果說，在空軍學院開過一次會，會上決定李作鵬，邱會作的任務是解決釣魚臺，要抓住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才算完成任務。我看完那頁記錄之後，李作鵬問：「你害怕不？」

我說：「說得越邪乎就越好，沒有什麼好害怕的。現在不是害怕的問題，是主席怎樣對待我們的問題了。」

我說：「我們現在是在下地獄的口子上，可以下去，也可以不下去。以我的估計是非下去不可的！我們軍委辦事組已經垮了。中央軍委已經由葉帥接管了，空軍由李德生接管了，北京軍區由紀登奎控制了，黃、吳、李、邱都成了閒人了。」

九月十五日 在今天的政治局會議上，周總理先是傳達了毛主席對當前情況要做分析的指示，毛主席說：「過去也不知道，現在的材料像雪片

一樣的飛來了。你說信吧，天下哪會有那麼多的怪事？你說不信吧，這些材料又自己飛來了。張國燾逃跑後，就是沒有注意分析情況，結果打擊面過寬，傷害幹部太多了。這是歷史的教訓，現在對我們很有用處。」

接著，總理叫公安部長李震，衛戍區司令員吳忠等十餘人來到福建廳，繼續開會。會場中間放著一張長方形的桌子。桌子中間擺著一個大搪瓷盤子，裏面放著一個大黑本子，本子上有兩頁白紙，貼著很多碎紙片拼起來的有數行紅字的一張條子。這就是號稱林彪寫給黃永勝的那封信，信上寫道：「永勝同志 很惦念你，望任何時候都要樂觀 保護身體 有事時可與王飛同志面洽 敬禮 林彪」。上文是我按材料抄在這裏的，我現在能記得起來的不完全。信是用紅鉛筆寫的，信的形式像林彪寫的，但疑點一看就能看出來。當時就有人（不是黃、吳、李、邱）提出：「這是手跡嗎？」我也走近桌子去看了一下，我看後，搖了搖頭，表示懷疑。看完我一抬頭，看見周總理就在我旁邊，他用眼瞪了我一下，但沒有說話。老實說，這封信是不是林的手跡，我當時是持懷疑態度的。黃永勝氣得坐在那裏不說話。

會上吳忠介紹了這封信是動用了大量民兵，經過一天才收集起來的。

然後，由周總理主持，吳法憲介紹了一直昇飛機企圖出逃和迫降的經過。直昇飛機由沙河起飛，到了張家口「迷航」了，又折回北京。到了密雲上空，才被迫降落的。

李震比較詳細地介紹了直昇飛機上的情況，直昇飛機迫降後周宇馳、于新野自殺了，唯一還活著的是李偉信。究竟這件事與我們有沒有關係，李偉信這個人是一個很好的活證據。

九月十六日 在今天的政治局會議上，主要是討論張春橋代中央起草的關於林彪事件的通知。通知裏稱：「林彪叛黨叛國」，「是林彪這個資產階級個人野心家、陰謀家」，「倉惶出逃，狼狽投敵，叛黨叛國，自取滅亡」，「林彪出逃的罪惡目的，是投降蘇修社會帝國主義」，「陳伯達路線，實際上是林彪、陳伯達路線」，並把林彪問題上昇為黨內的「第十次路線鬥爭」。把林彪說到這種程度，令人難以置信，也難以接受。但我們都沒有發言，總理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主要是講和林彪劃清界限的政策。文件通過以後，報毛主席批准，是十八號發出的。

九月十七日從昨天開始，我在總後的家中向毛主席、中央寫報告。寫了一個開頭就寫不下去了，寫報告最大的問題是不知道寫些什麼。除了工作上的事以外，我與林彪、葉群的私交並不多。在目前這種嚴峻的情況下，自己間接知道的更不能亂說，其實也無法說清楚。關於「廬山會議」一事的檢討，主席那裏已經通過，這之後我祇在周總理帶領下到北戴河向林彪匯報過工作，沒有單獨談話；「五一」在天安門上向林彪敬了個禮，也沒有和林彪單獨談話。除此我與林彪沒有見過面，也沒有通過電話，我和林彪之間沒有新的問題。因此，報告沒能很快寫成，怎樣寫報告成了我當時一個大難題。

下午四時，周總理給我打電話。總理說：「剛才，我同黃總長打電話，他理發去了。現在，我把要同他說的話，先同你說一下，等會兒你到山上去同他說一下，我現在就去睡覺了。」

周總理說：「現在有好多跡象表明，三北邊防是有些情況的，值得重視，你告訴黃總長今晚召開一次各總部、軍兵種首長會議，把三北情況很好研究一下，並要盡快落實。一切工作都要具體化，戰備工作還是由黃總長負責。告訴黃總長可不許撻挑子呀！」

我回答說：「總理的指示精神我懂了。我很快就上山去向黃總長報告。」

周總理又問：「你現在幹什麼？」

「我在想問題，準備寫報告。」

總理說：「想問題就很好。對歷史上的事，不想是回憶不起來的。會作呀，你的水平怎麼這麼低呀。你怎麼和林彪搞到一起去了？」

我說：「總理呀，我不祇是水平低，我的覺悟也很低。對現在發生的事，我想不通，也說不清楚，更是寫不請楚。」說完，我的眼淚就隨之流下來了。因為，總理都說出「你怎麼和林彪搞到一起去了？」這樣的話，可見總理的態度在變化，他是在林的問題上自己在找退路，總理太不容易，能退出去最好。那我們這些人祇能坐以待斃。林彪是黨的副主席，是主持軍委工作的副主席，我不和他搞在一起，還能和誰搞在一起？！

「啊！」總理叫了一聲，有些吃驚地說：「你還說不清楚？！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思想，這是不對的，你的事沒有多少，黃，吳麻煩一點，黃總長是橫豎看不起江青。你過去同我說過的那些問題，現在證明你說的是對

的，對那些問題，我是不會忘記的（總理說到這裏我的心裏很感謝他）。最近兩、三天內，我會抽時間來找你談，你的情況我還會同毛主席談。據我現在瞭解的情況，你們是沒有什麼問題的，我是保你的。一會你見到黃，也要給他做工作，盡快向主席表示態度。」

我說：「這個時候做黃的工作有難度。總理呀，你可要把握住江青。江青要耍霸道，有意挑釁，黃肯定不幹了，也幹不下去了，黃是個很硬的人，他不怕江青。」

總理說：「你去做工作嘛！批陳整風會上，黃不肯檢討，說他在廬山沒有發言，還跟我們講黨性原則。後來，你做了工作，他才肯檢討，我相信你能做通工作。」

「好，照總理的指示辦。」

接完總理的電話，我一時感到輕鬆多了，我對在場的胡敏和路光說：「這下好了，總理保我了。快搞飯吃，我們上山。」

我在總後的家中吃完晚飯，就和胡敏、路光上西山了。我的剛出生的小孫女在山上，也想去看一看。到了山上，我叫路光先到黃家看看他理髮回來沒有，黃住在西山最高處的9號，9號下面是龐大的地下工事，是軍委前指的所在地。過了一會，路光回來說：「黃伯伯回來了，請你去呢。」

我問路光：「你黃伯伯在幹什麼？」

路光說：「他在批文件，並對我說，他要站好最後一班崗。然後他放下筆，從桌子上拿起一個相框給我看。他說，路光呀，這是我在我在井岡山當排長時照的，像不像我？」

提起井岡山，我對黃永勝的敬意油然而生，路光還沒有講完，我就起身去黃處了。

約六點半鐘的樣子，我到9號同黃永勝見面談了話。這次談話是「九一三」之後，我們第一次談話，也是此生我們最後一次談話。

兩人坐下來之後，反而沒有立即說話，這時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最後還是黃開了口。

黃說：「老邱啊，我們以後談話的機會不會多了。」

當我講了周總理的態度後，黃說：「話是這麼說，文章不一定這麼做喲，總理做不了這個主，江青不會罷休的。我們過去上了汪（指汪東

興)的當，他利用我們看不慣江青的霸道啊，看不慣江青對老幹部沒有感情，她到處出口傷人啊，看不慣江青在政治局頤指氣使，爲難總理啊，汪東興老鼓動我們去反江青，說主席討厭江青。那次(指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七日)，我和胖子去反映江青攻擊總理的事，才知道主席對江青根本不是汪說的那麼回事，其實主席很在意江青。」

黃接著說：「我看最多把我和胖子抓起來，總不能都抓起來，難道都不要了嗎？黨有政策嘛。你放心，把我抓起來，我什麼都不會說。江青會算老賬，要算老賬也還是那些，沒有什麼可怕的。」

我說：「就是沒有什麼可怕，才難辦呢！問題就難在這裏。」

黃說：「我們也有嘴嘛！我們反江青、張春橋，有道理嘛！不頂住文革小組那一套，不行嘛！況且，張春橋還是個板上釘釘子的叛徒。不讓她插手軍隊，是怕軍隊亂了，這也不對嗎！？支持總理工作有什麼不對！？過去主席是不會出面管這些的，現在不同了，他們會騎在我們頭上做林彪是『反革命』的文章。」

當時黃永勝對林彪是十分有氣的，他說到這裏站起來，在房間裏來回踱步，然後走到有一幅巨大的三北地圖的牆前，大聲疾呼：「你跑什麼跑，害死人呀！」

黃喊完坐下來後又說：「廬山會議以後，我們還沒有吃夠苦頭？我看，林彪的下場就是反江青的結果，現在該輪到我們頭上了。」

黃永勝說著說著有些不耐煩了，突然說：「說這些王八蛋幹什麼，算了，不說這些了。」

過了一會，黃又換了一個話題，黃說：「老邱呀，我們是什麼時候認識的？」

我說：「我在江西蘇區就知道你，我剛參軍時，你就當團長了。」

黃說：「打張輝瓚時，我就當師長嘍。」

黃問我：「你們家窮不窮呀？」

我說：「窮的就差光屁股了。我們家窮是窮，不過，從辛亥革命時就是老根子了，革命黨人常逃到我家歇腳，江西蘇維埃時期，我爺爺，我父親、母親都一齊上陣搞革命。紅軍撤離蘇區後，敵人把我們家的房子都燒了，全家躲在山洞裏。四九年方強他們南下時，一個團部指揮所就設在我們家。」

我們倆你一言我一語，從江西蘇區、五次反圍剿、長征路上、延安、熱河、東北、遼瀋戰役、平津戰役、廣西剿匪、十五兵團、華南軍區、中南軍區……，說著說著，我們都開始流淚，邊說邊流，黃則大哭起來，當談到我們在敵人的炮火下生死與共的情景時，兩人淚眼相望，激動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但心裏痛快極了。

後來，參加戰備會議的人陸續來了，我們的談話也就結束了。

黃是湖北咸寧人，我是江西興國人，我們都是不同地方的窮苦人，我們真是爲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的。在幾十年的烽火硝煙、槍林彈雨中，結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誼。黃是威風凜凜，有大將風範；有長者胸懷，一副熱心腸，對人特別好。黃會打仗，判斷準確，能下決心，總是打勝仗。我給他當政委，心情特別舒暢。

晚上散會後，我住在西山3號。

九月十八日 下午三時，總理又給我打電話，問昨天晚上戰備會議的問題。在電話上，我向總理簡要報告了一下，他表示滿意，沒有多問什麼。總理就轉爲問黃永勝的精神狀態了。總理問：「黃總長的情緒怎樣？」

我說：「怎麼好得起來，總的來說是悲觀的，還做了最壞的打算。」

「主要是什麼問題？」總理問。

我說：「最主要的是，他說祇知道難受，不知道『病』在哪裏。林彪給他的那封信，也是他負擔很重的問題。」

「你同黃總長再談一下：一，光難受不行，還是要好好想想；二，要相信毛主席、中央；三，林彪給他的信，是林寫給他的，並且又未收到。這些問題，我早就注意到了。你還要告訴他，過去你和他同我談過的問題（指江青攻擊總理），我是不會忘記的！」

晚上，在人大會堂福建廳開政治局會議。在會上，發生了姚文元欺負葉劍英的事。在會上張春橋提出：「有的省、市對林彪事件的傳達，認爲範圍太小了，各地的中委和候補中央委員應當聽傳達。」對此，張春橋也沒有提出自己究竟是什麼主張。

葉劍英提出：「爲了保密，目前還祇能傳達到省、市自治區的常委，不能擴大。」葉帥談話的口氣，當然有點像主持會議者的態度，江青一夥自然不會買賬的，他們現在神氣得不得了。

姚文元立即反擊說：「一個黨中央的副主席跑了，爲什麼不向全體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傳達？我們作爲政治局委員，有責任提出這樣的問題。」

姚文元的「高論」發表之後，江青、張春橋、紀登奎、李德生、汪東興等人，都同意他的意見。葉帥坐在那裏半張著嘴，一句話也不說了。黃、吳、李、邱坐在那裏，一個字也沒有說，心裏想我們鬥了幾年，你葉帥接著幹吧。今天，葉帥吃了姚文元一記悶棍，不知有何感想？葉帥是江青一夥打擊的對象，但當面受姚文元的悶棍還是第一次。

最後，周總理也祇有同意姚文元的意見。

九月十九日，總後黨委常委會於晚上七時開始。會議由我主持。參加會議的人，除常委之外，還增加了裝備部長苑化冰和國防工辦副主任李如洪列席會議。

總後黨委常委會是邊開會邊寫簡報，會議完了簡報也就出來了。我們的第一次簡報，印在中央辦公廳印發的簡報上了。

我原來打算通過總後黨委常委會議，把自己的問題說清楚，常委多數人不同意。他們說：「你在總後沒有什麼林彪的問題，在中央是否有問題，我們不知道。你的問題不要在總後講，中央需要你講就到中央去講。」於是，我在總後就沒有機會講清楚自己的問題。

總後副部長、第五機械工業部部長邱創成參加了國務院業務組的政治學習。

九月二十日，晚上，人大會堂福建廳政治局會議。

今晚的會議我看沒有什麼主題。周總理說了一下對「批林整風」要抓緊的問題。凌晨二時左右周總理宣佈：「大家要是沒有什麼事就散了。」接著又說：「李德生、紀登奎留一下。」

我記得，這是最後一次參加政治局會議。

九月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日這幾天，我就開始成爲閒人了。昔日我是因忙的不可開交而難受；今日閒的無聊，實在使人更難受。我告訴胡敏和路光把桌子上玻璃板下面的有關林彪、葉群的照片都取出來，燒掉。我也叫秘書們把辦公室的資料、材料，有關林彪的也整理出來燒掉，文件登記本上有登記的，對我有影響、無影響都不要動。我還對胡敏說，你沒有什麼事，給豆豆介紹對象的事今後肯定要問到你頭上，你要有思想準備。我還對路光說，我練字寫的那些東西，在中央圖書館整一下都燒掉。

過了一會路光拿來兩件東西，問燒不燒？一件是陳伯達送我的字「天地馳驅客，英雄清淨身。留心千古事，不厭一寐塵。」還有一件是葉群的詩「繁霜冷雨仍從容，晚節尤能愛此功。寧願枝頭抱蕊老，不能搖落墜西風。」我是個不懂詩的人，過去對這些東西也不太在意，今天看到後反而對我刺激很大，懂也罷不懂也罷已經過去。我告訴路光統統燒掉。

從「九一三」到九月二十三日十天的時間，對林的問題怎樣處理，毛主席、周總理、葉劍英等人是費了腦筋的，因為在黨的歷史上，林的把柄是很少的。我考慮當時處理的辦法祇有兩條：一是「暫緩」處理；二是以「反革命」處理。結果是採取了後一種辦法，這種辦法就是抓住林彪「外逃」二字做文章。這在當時是最簡單、最順手的辦法，但又是極端錯誤的辦法，我說的錯誤並不是完全針對我們幾個人，而是說主席爲了他的文革，爲了江青一夥，政治上完全失去平衡，從而爲他自己變成孤家寡人創造了條件。雖然，抓我們的時候，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沒有來，可是中央文件發佈的「林彪反革命罪證材料」之一、之二、之三等等，有大量的謠言都是出自這幾個傢伙之手。

林彪決不可能是反革命，但又「外逃」了，怎樣解釋？這不僅是後來，就是現在很難說清楚的。林彪爲什麼會「外逃」？我認爲是葉群、林立果不惜犧牲林彪的一切，爲了自己的私利造成的。一是，對林彪封鎖一切消息，林彪本人什麼也不知道；二是，葉群把林彪控制起來了，他的女兒和工作人員都不能接近林彪；三是，葉群採取惡劣手段把林彪作政治「禮品」送給蘇聯。與其說林彪是外逃的，還不如說林彪是葉群的玩偶，被她架走的。我的看法以後會得到證明。

第三十七章 淚別周總理

北門解迷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到九月二十四日，整整十天的時間了。在這十幾天時間，我的腦子整天都是嗡嗡響的，像做夢一樣。但不管怎麼想，把我關起來是萬萬沒有想到的。待到二十四日約八時半進了人民大會堂的北門，我的迷夢才醒過來。

二十三日晚上，我還在給主席寫檢討報告，劉秘書就來向我報告了第二天的外事和內事活動。第一件是：早六時去東郊機場送李先念出訪越南；第二件是：下午有外事活動，主要是談軍事援助問題；第三件是：早八點福建廳政治局會議。對早八時福建廳的會議，我倒稍微愣了一下，按慣例政治局會議都是晚上開，為什麼改在早上開？但我又想，這是非常時期，可能有緊急事要處理，也就沒有多去想了。

對周總理安排的活動，我向來是一不請假，二不誤時，二十四日我早早就起來了。我如同過去一樣，帶上警衛員小朱坐車按時向東郊機場去了。雖然沒有睡好覺還有困意，但在北京秋高氣爽、涼風宜人的季節，很快也就精神了。

我到東郊機場貴賓廳之後，來的人還不多。因為今天有外賓，我還是選擇了一個適當的位置坐下。為什麼要坐在適當的地方呢？這是吃過苦頭的。大約是六八年的什麼時候，也是在東郊機場貴賓廳的外事活動。那天我去得稍晚了一點，除了挨著主賓席還有兩個空座位之外，其餘都坐滿了。我看著主賓席就不敢去坐，另外找了一張凳子坐在別人的後面。周總理來了，他看到還有一個空位子，兩眼一掃看見了我。他走到我跟前，二話不說，把我拉去同他坐在一起，並且還說：「我又不是老

虎！」我祇好推托說：「我是抽煙的。」總理說：「你儘管抽就是了。」此時，全廳的人都笑起來了，我真難爲情。

我坐下之後，服務員照樣送茶來，煙就在茶几上可以隨便抽。我一邊喝茶，一邊抽煙，所看到的一切，都同過去是一樣的。不久，李德生來了，他挨著我坐下了。李德生是一個開始紅得發紫的人，我當然不會主動問他任何問題。但他還是主動問起我來了。

「你們總後的常委會開得很好嘛，中央的第一號簡報就登的你們的會議情況。」李德生首先這樣說。

「第一號，第幾號還不一樣，號數不起任何作用！」我的回答，其中略有意思。

李又說：「這也可以看出你對毛主席、中央的態度嘛！」

我祇「嗯」了一聲。沒有同他細說下去。接著，我補了一句：「我準備發動總後的常委對我搞揭發。」李德生對我說的「揭發」一詞沒有做正面回答。他祇說：「能搞起來嗎？」又說：「即使搞起來了，也祇能說些柴米油鹽的事，這有什麼用？」談話稍停片刻，李又問：「你們總後常委是怎樣分工的？你哪有多少時間管總後的事，日常工作是誰管？」

「家裏的工作由張池明政委抓總。」

此時，周總理來到了。我們的談話也就沒有系統談下去。從事後來看，李德生同我談話是有目的的，他在做調查工作，我是一點也沒有在意。

總理來了之後，不久起飛時間就到了。臨去機坪時，李先念憂慮地跟總理說：「我很擔心主席和總理的安全。」因爲我坐在旁邊，總理聽到這個話，有些尷尬，他順手把他的手放在我的手上，一邊拍著我的手，一邊對李說：「你放心去，一會政治局要開會，研究今後的工作。」

在停機坪上，我和總理並排站在一起，記者拍了不少的鏡頭。送走李先念後，總理主動對我說：「八點鐘福建廳有會，知道嗎？傳達主席的指示。」我回答說：「知道。」

總理又說：「我就直接去大會堂了，你還回家不回家？」

我回答說：「那我也不回家了。」

總理說：「你不回家，還不給胡敏打個電話。」我當時根本沒有想到，要把我們抓起來，隨即笑著對總理說：「給她打電話幹什麼」不用。

總理說：「那好吧，到大會堂，我們先談一談。」

上了汽車之後，我又抽起了煙。小朱勸我不要再抽了。車開出機場不遠的地方，司機告訴我說：「後面有隨車。」我說：「讓開，讓他先走。」過了一會，司機又說：「停了，不走。」我們邊走邊停了三次，隨車都跟著走。中央辦公廳規定，政治局委員都要有隨車，我也沒有起懷疑，其實，大禍已經臨頭，我一點思想準備都沒有。相反，我還想過總理說的「向你們傳達主席指示」，很可能是福音，給我們卸包袱的！

人大會堂北門有內外兩重門，門與門之間有個短過道（其他門也一樣）。我一進外面的一道門，在過道上就有警衛幹部一把把我拉到旁邊的小房子裏去了。我以為是有緊急電話呢，一進小房子就搜摸我全身，我來不及說話，搜摸我身上的人就說，今天要檢查一下。我進到裏面的二道門時，看到警衛員小朱的後影，有兩個人把他連拉帶拽地向西走去。至此，我一切都明白了，解謎了！然後兩個人把我押進了福建廳。（我九二年從西安到北京，跟隨我多年的老司機張自貴來看我。在回憶往事時，他說：「當時也把我扣押在人大會堂地下室，我又氣又納悶地對小朱說：『還敢扣押我們，準是反革命政變了！』」我看著忠厚、老實的張自貴，笑得肚皮都痛了。）

一踏進福建廳，一眼就可以看出一切都變了。

福建廳是昔日的中央政治局辦公地，今天可成了法場了。廳內過去的佈置是東西一圈橢圓形佈置的沙發，對著門是做口，離門不遠的地方還有一扇屏風。今天的佈置是：東邊祇有兩張單人的沙發，南邊四張沙發，北邊還有兩排若干張沙發。廳內沙發後面有若幹警衛人員像西安臨潼兵馬俑的泥人一樣，面無表情地站立在那裏，每個人手扶著腰上的手槍。葉劍英、李德生、紀登奎、張才千、劉賢權在北面的沙發外站著。他們對我視而不見，我也沒有同他們打招呼。還有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王良恩走來走去。這種場面我有生以來還是第一次看到，我是一個沒有被敵人俘虜過的人，今天倒被自己的人「俘虜」了，這種場面就是讓我們「見識見識」。

我被押進福建廳被指定坐在南面的四張沙發靠東面的最後一個位置上。剛坐下，總理的警衛員小高進來對我說：「總理叫邱副總長到河北廳去談話。」我剛起身，楊德中立即對小高說：「現在不談了，等會一起談。」

我給總理解釋。」過了一會，小高又來喊我。楊德中有些不高興地說：「告訴你談了，怎麼又來喊？一會我跟總理解釋！」小高邊走邊嘟囔說：「是總理叫我來的。」

我是第一個到福建廳的，不久，吳、黃、李先後到了，他們進來時，同我的神情幾乎一樣。

周總理的談話

大約九時，總理在楊德中的陪同下，步入福建廳。看上去，總理心情沉重，很疲勞，步伐也不十分穩健。楊德中有意坐在總理和我們之間，這種坐法就是爲了「安全」，把總理和我們分開。他是中央警衛團的副政委，專門負責總理安全保衛工作的。楊德中這種做法，在我們來看是多餘的，在他來看是必要的。

總理坐下之後，首先喝了一口茶，並掃了我們（黃、吳、李、邱）一眼，即開口說：「主席對你們的問題有決定。這幾天各省市和各大軍區的電報，你們都看了。上海、陝西、天津的意見很尖銳，政治局內部的意見也很尖銳（指江青一夥），這樣就祇好先對你們採取一些措施了。黨內發生過許多重大問題，偉大領袖毛主席都處理得很好。這次對你們的問題會處理得更好。」總理的講話很平靜、很客氣。

總理說到這裏又喝了一口茶，並略微思考了一下，說話時前後並不很連貫。總理主要指責我們不該跟著林彪反對江青和中央文革，「九一三」之後，又久久不表態。總理說：「出事都十天了，你們幾個人一言不發，一字不寫，不知是什麼原因？這樣，偉大領袖毛主席決定你們暫時離開工作的崗位，認真考慮自己的問題，時間不會太長。林彪叛國，造成很大的被動，上了黨章嘛，幾乎要毀掉我們的黨。」此時，吳法憲支吾地說：「我昨天晚上向主席、總理寫了一個報告，凌晨五時送出去的。」總理對吳法憲的話沒有做任何表示。

總理接著說：「不知你們在想什麼？九大時該照顧的都照顧到了（指都是政治局委員了），還有什麼想法嘛！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新力量（指江青一夥），是好事，這有什麼不好嘛！？」接著，總理又補充了一句：「政治局的產生，你黃永勝是參與其事的。」

總理歇了一會又說：「過去有人（指江青）在病中說了幾句話，（你們）就懷恨在心，那些問題都可以說清楚嘛！」總理的話是指八屆十二中全會之後，九大之前，江青有一次對林彪發脾氣說：「蔣介石搞了一個黨國，我們現在搞了一個軍黨，軍國。」這是江青反林彪的核心問題。江青的意思就是文化大革命勝利之後，林彪不能獨吞果實，中央文革是出了力的。總理在廬山會議之前和以後都不同意江青這樣提問題。因為主席沒有批評過江青這個問題，江青在這個問題上一直很傲慢。但不知爲什麼，在廬山會議之後，在我們走背字的時候，江青反而自己在政治局會議上主動說：「我在患病的時候，說過一些話，可能欠妥，但那是病人說的話呀。」總理當時就批評她：「話不能這樣說，不能把說了不適當的話都推到病的問題上去。」現在總理對這個問題的說法又變了，有些袒護江青，這完全可以想得通。

總理說：「主席說過，出事之前，什麼都聽不到，現在情況象雪片一樣飛來了。有的雪片可以打死人。你不信吧，人家又說得出來；完全聽吧，又實在觸目驚心。偉大領袖毛主席決定，讓你們幾個離開工作崗位一段時間，專門反省自己的問題，時間不會太長，你們要相信主席，相信中央。」總理接著又重複說：「主席說等了你們十天，不能再等了。十天的時間，你們怎麼一個字都沒有給主席寫？」

我們都默默無語。寫什麼呢？難啊。關於廬山會議的檢討，在主席那裏已經過關了，主席還跟我們開玩笑。在主席那裏檢討過關以後，我們沒有犯新的錯誤，「九一三」的事，的確一無所知。寫什麼呢？總不能說我們也搞「政變」吧！？實際上，我們被關起來以後，主要挖我們的就是「政變」問題。

至此，總理停了好久沒有說話。他至少三次拿起茶缸子喝水，一邊喝水，一邊在想什麼。他對著葉帥和其他在座的軍委辦事組的人說：「大家都說說嘛，祇我一個人說？」葉劍英張了一下嘴，但一句話也沒有說。紀登奎即說：「今天總理多說一點，我們以後同他們談話的機會還有呢！」

然後，總理先問了黃永勝幾件事，主要問的還是前幾天辯認的那封林彪給黃的信，黃完全否認，態度很強硬。總理又問起李必達的事，黃此時有些激動，黃氣憤地大聲說：「總理啊，我們對江青同志是有自由主義，但是你清楚，在座的也清楚，這是因工作中和江青同志有矛盾給逼

出來的。如果是主席批評我，我接受批評。總理您想想，一個秘書有意偷聽首長的電話，這樣的人能要嗎？你們在座的能容忍身邊有這樣的人嗎？」

總理不好再往下說，從座位上起來，一邊說：「你先走吧。」一邊走上來和黃握手，並叫吳忠跟黃走。黃快走到門口時，總理又說：「你們聽好，你們的夫人和孩子都是革命的。你們回來的時候，他們有什麼閃失，找我姓周的是問！」說完用手在自己的胸脯拍了一下。其實，沒過幾天我們幾個人的老婆、孩子、親屬和秘書、司機、警衛員都抓起來了。總理已經不能控制局面了。

接下來，總理問吳法憲：「林立果大學沒有畢業，就當了什麼副部長，林彪的子女都在你們空軍工作。空軍搞得很亂，你吳法憲是有責任的。你把空軍搞得一場糊塗！」

總理剛問完，吳就站起來說：「我向毛主席請罪，我對不起毛主席！我們軍委辦事組反對江青同志，我向毛主席請罪，我對不起毛主席！」

因為吳提到了軍委辦事組反江青的事，李作鵬突然大聲說：「吳法憲胡說八道！是他自己討好林彪、葉群。」李心裏認為，反江青算什麼錯！事情發展到今天，可以說與反江青有很長的歷史淵源，今天，不但有一肚子苦水和冤屈倒不出來，反而馬上就要被抓了，李激動得不能自己。

總理沒有顧及李，馬上對吳說：「你也走吧。」並與吳握手。由楊俊生跟吳走了。

總理又坐下來對李說：「不要急，有充分的時間讓你們考慮問題。」

總理接著說：「張學思是怎麼死的呀？」

李是一個頭腦很清醒的人，他有板有眼地講了張學思的情況，說是中央專案組直接搞的，辦案子和海軍沒有關係，也沒有插手。一聽中央專案組，總理就沒有往下問了。總理又問李：「聽說海軍層層站隊搞得很厲害？」

李說：「總理的批評是正確的。海軍不團結，基本上就是一個派性問題，是有些擴大化，沒有控制住。我有責任，我檢討。」

我同李作鵬的關係，可以說是非常好的，相當真誠。但我聽到他自我批評還是第一次，可見我們是多背吧。

總理先後問他們三個人的話，問到的都是一些工作上的問題和「雞毛蒜皮」的事，我聽著聽著突然腦子裏「噏」的一響，好像開了殼似的。我這時才想到主席早就決定抓我們了，所謂等了十天，不是胸懷大度，而是在收集我們的「罪狀」，以此來降服我們。

李作鵬走時，總理也上去與李握手。

總理有些生氣地問我：「你怎麼也搞進去了？」我沒有吭聲，也沒有正視總理。接著，我有些醒悟似的，把胡敏給豆豆、林立果找對象的事講了一下。

總理又問：「盛玉華怎麼搞到總後去了？什麼忙都亂幫一氣。」

我向總理做了檢討。

總理接著說：「你們抓了李必達，連李必達的未婚妻都搞得不知下落了。王瑞華同志搞到哪裏去了嘛？」

王瑞華是三〇一醫院高幹病房的護士長，工作表現很好，她是李必達的未婚妻。李必達事件發生後，我沒有叫三〇一醫院處理她，因為她是九大代表，要慎重一點，就把她送到四醫大學習去了。總理幾次都問李必達的事，我知道我們要倒大霉了，因為李必達的事是和反江青直接有關的。

我走前總理和我握手，我含著淚對總理說：「我相信毛主席，相信中央，也相信我自己。」

總理那雙很有神的眼睛看了我很久說：「好。」我就要離開福建廳了，我的心情十分激動，我雙手握住總理的手，從肺腑裏吐出一句話：「希望再見到總理！」總理又盯住我看了一眼，用很低沉的口氣說：「到那裏去，好好住下！」

我從十六歲就認識總理，黨把我從一個紅小鬼培養成一個高級幹部，轉眼四十年過去了。在文革中，我被造反派多次打得死去活來、遍體鱗傷；傷還沒有好又投入到夜以繼日的工作中去了，忙得有時身體都難以支撐，但還是咬著牙幹。真沒有想到最後反而成了反革命。不過，我向來都有這樣的思想：不管在什麼情況下，相信黨是不變的，今天同樣不變！一個老共產黨員，如果連黨都不相信，也就不是具有革命意義的人了。而相信黨不祇在一般情況下要這樣，特別是自己處在嚴重困難的情

況下，嚴重受冤屈的情況下，在黨不相信你的時候，更是要相信黨。祇有這樣，自己活著才有信念。

三相信

十時多一點，也是由中央警衛局的人把我押走，由福建廳到地下室。在地下室有預備好的汽車，車門對著電梯口，下了電梯就上車了。與我同車的有中央警衛團的大隊長，我不認識，他坐在前面駕駛室裏。我坐在後面，兩旁各一個警衛人員把我的手壓在座墊上。車出正陽門往東走，拐向北，再向東，走在去東郊機場的路上。因為警衛戰士對我的手越壓越緊，我向大隊長提出：「應該壓得松一點。」大隊長即下命令：「放鬆一些。」我們一共三部汽車，徐徐開進了部隊的營房，把我關起來了，我的政治生命，從此宣告完結。

這裏是北京的順義縣衛戍區警衛三師師部，我被安置在二連營房中間的一間房子裏。房子裏有單人木板床一張，小木凳子一張，小桌子一張，舊搪瓷臉盆一個，一個飯盒子和一雙筷子，一隻搪瓷飯碗，這就是房間的全部設備了。

進了房間之後，因為太疲勞了，便躺在床上。我眼睛一閉，過去的事活生生地一幕一幕地出現在我的腦子裏。我使勁不想那些，但怎麼樣也攆不出去。

不久，看管的人給我打來了飯。一個三層的飯盒子，一層是大米飯，一層是白菜，再一層就是湯了。一菜一湯。可是大米飯裏，稗子和砂子很多。我的牙不好，我最忌諱飯裏有砂子，祇要吃上一粒砂子，整個牙都酸了，根本不能嚼東西。於是，我就把開水倒進飯裏，用筷子一攪，砂子沉底，吃上面的就是了。這是在衛戍區的第一頓飯。

可能是下午五時多一點，又打來了晚飯。除了米飯換成饅頭之外，菜同上頓是一樣的，打飯的人對我說：「這是招待所打的飯。伙食不很好，你忍著吧。」我祇看了一下盒子裏的飯，一點也沒有吃，就放到桌子上去了。一天沒有進幾粒米，看管的幾個人有些著急了。站在我旁邊的人說：「你不要過於焦急，有什麼問題，組織上會解決的，還是要吃飯，要注意身體。」我抬頭一看，同我說這番話的人，不是別人，正是送我來的中央警衛團的大隊長。接著，他這乘機又悄悄說：「我們快要回去了。」

總理都把話給你說清楚了，你不要忘記總理說的話，時間不會長。你還是要吃飯，不然總理是不會放心的。你還有什麼話要我帶回去？」我向那位大隊長表示感謝之後，請他回去後向總理轉報三點。第一點，請總理放心，我不會胡想，也不會胡爲。我決不會做那種對不起黨，對不起毛主席，對不起周總理的事（指自殺）。第二點，我對自己的問題心中有數。第三點，我很惦念我的妻子、兒女。我永遠不會忘記總理在福建廳對我們的家屬問題所說的肺腑之言。在我剛參加革命的時候就認識了總理，以後又多次長期在總理直接領導下工作，能夠經常得到總理的教導，真是三生有幸。我在大會堂對總理說過：「我相信毛主席，相信中央，也相信我自己。」我堅信到底，也請總理記住我的話。

永遠懷念周總理

押送我到順義的那位中央警衛團的大隊長走了之後，我就上床躺下了。大約到了七時多一點，我就向看管的人要了安眠藥。過去，服「速可眠」很管用，吃了之後至少可以睡六小時，可是今天服了安眠藥一點作用也沒有，翻來覆去總是不能入睡。

由於睡不著，我就要來紙和筆，向總理寫了一封長達十幾頁的信。其中主要內容就是回憶我同總理的關係。我同總理的關係確實是不尋常的。信寫好之後，我看表已經早上六時了，我第二次要來了安眠藥，這次睡了五小時以上才醒來。我腦子比較清醒之後，把寫好的信又看了一遍，我立即醒悟到，目前寫這樣的信完全沒有必要，有可能給周總理造成困難，便立即把信撕了。

我第一次見到周總理是一九三〇年冬，在福建的泰寧。我們紅五軍團部隊開大會，周總理當時是中央蘇區紅軍的總政委，他來給部隊講話。我祇有十六歲，個子還矮，又在隊列之內，離講話的地方可能有幾十米遠。除了看到周副主席的大鬍子之外，其餘什麼也沒有看到，講的什麼內容也聽不太清，即使聽到一些也不太懂。例如，周總理說的兩條戰線鬥爭我就不懂。

一九三二年，我被選送去瑞金紅軍學校特科團學習。由於我的成份好，是黨員，學習成績又好，畢業時，被選送去總部供給部做機要統計員，管理全軍的實力統計。這是絕對秘密的工作，因為要掌握整軍的人

數、馬匹、槍支等數字。總供給部有我這樣一個人，周副主席早知道，但沒有見過。一九三四年三月間，一天早飯後，總供給部部長葉季壯突然告訴我說：「等一會，我們一起到總司令部去。」在路上，葉部長才告訴我我是到周副主席那裏去開會。我心裏很高興，但也有些緊張。我們到了周副主席的辦公室，不一會，一個大鬍子從內間出來了，葉部長向周副主席介紹說：「這是我們的機要統計員邱會作。」

總理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啊，是個小年輕。」接著周副主席把國家政治保衛局一個人也叫來了，然後就開始向我們交代任務。

周副主席說：「你們兩個人帶一個保衛班，由邱會作總負責，去完成一項特殊任務。把兵工廠、衛生材料廠、紡織廠和七個倉庫一律炸毀。有些東西沉到河底。這個工作要做得徹底，要採取夜間行動，要絕對守秘密。」我們接受任務後，做了必要的準備就出發了。我當時祇有十九歲，真是初生牛犢不怕虎，我們圓滿地完成了任務。

大約是一九三四年八月間，我隨同葉季壯部長去向周副主席匯報工作。周副主席見到我就說：「我已經看到了你們的書面報告。小人辦大事，任務完成得很好。」

三四年十月，長征出發前的一天黃昏，政治保衛執行局長張炎和到總供給部來，要把我抓去處死。因為我辦了與長征有關的重要的事情。可是葉季壯不在，我感到徹底絕望了。但真是湊巧，在押我執行的路上，正好周恩來、鄧發、葉季壯三個人騎馬迎頭而來，葉季壯看見我大吃一驚，立即問周副主席是怎麼回事，周恩來也有些驚愕，但沒有說話，祇是面向鄧發，鄧發向周恩來擠擠眼睛（示意是按老規矩辦），我則死死地盯著周恩來。周恩來略加思考對鄧發說：「他還是個孩子！交給葉季壯帶回去吧。」這樣又給我鬆了綁。周副主席把我的命保下來了，並指定要帶我長征。這些事，我當時不可能知道，長征到了陝北之後，周副主席、葉部長才對我說的。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初，長征到了江西、廣東交界，通過了第一道封鎖線的水口地區。中央縱隊五千多人的運輸部隊，大部分垮了，軍委縱隊由我管的一千多人的運輸部隊大部分未垮。周副主席就在這緊張的情況下，把這兩支運輸部隊合併成立運輸指揮部，並任命我負責（沒有正式

職務)，統一指揮三千多人的運輸部隊。這支部隊到貴州還有一千五百餘人，並不比戰鬥部隊減員更多，周副主席非常滿意。

三四年十二月，在貴州南部，周副主席親自授權我組織向五軍團運輸銀元、煙土的護送隊，並任命我為隊長。爲了防止萬一發生情況，還以紅軍總司令部的名義給了我一張遊擊司令委任證書。我們勝利地完成了任務。

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遵義，周副主席親自選調我到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籌備委員會物資分配處工作。我去工作的時候，周副主席對我說：「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依我看，你這個小青年會管得好的！」

三五年五月間，在四川的天全縣，周副主席親自任命我爲軍委第四局三科科長，主管行政、軍務和供應等業務。從此，我同周副主席就在一個單位生活了，朝夕可見。在一個時期，周副主席有時就叫我「小青年科長」。

一九三六年，紅軍東征期間，周副主席任陝北後方辦事處主任，我是總供給部駐辦事處的代辦處長。在不短的時間內，我同周副主席除了工作關係之外，都是同住一個院，共同生活，有時一起娛樂，在生活上非常密切。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周副主席在南京電告毛主席，對葉季壯、楊立三、邱會作三個人的工作提出了具體建議：葉季壯主要搞統戰，任十八集團軍軍需處長，楊立三以第十八兵站分監的名義到前方總部任供給部長；邱會作任中央軍委供給部部長。

一九五四年，由黃永勝建議，周總理批准，調我任總後方勤務部副部長兼副政委（黃克誠是部長兼政委）。

一九五六年，周總理親自要我到國家經委任第一副主任。後來，我要求先學習後到職，總理批准了。我和武競天等人到蘇聯溜了一大圈，回國後彭、林、黃都不放我走，未曾到職。

一九五九年，周總理先後同林彪、羅榮桓商量，建議我任總後勤部長，總理在中央政治局的會議上，對我做了讚揚性的介紹。我任總後勤部長後，雖然在國務院沒有職務，但我是固定參加國務院會議的。在國務院會議上，我能得到毛主席、周總理和中央的許多指示。

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初期，造反派在全軍文革縱恣下對我進行了嚴重摧殘，總理對我是大力保護的。從六六年十二月到六七年一月底，周總理在各種不同的場合發表過多次對我保護性的講話。由於造反派根本不聽總理的話，對我的保護未曾免去我的災難。

周總理曾經派人讓上海的造反派向二醫大「紅縱」做工作，要他們無論如何不能對我進行武鬥，並對我作了肯定性的講話。但全軍文革沒有執行總理的指示，同樣沒有解除我的災難。在毛主席、林副主席、總理、葉帥的關心下，才把我從造反派的手中搶救出來。

從六六年十一月開始，到六七年三月，我被造反派多次打傷。我傷癒之後，總後黨委舉行兩千多人的幹部大會，歡迎我回總後主持工作。毛主席派周總理送我回去，總理並在大會上對我做了很高的評價。他說：「邱會作同志是個老同志，經過長征的，很小的時候就參加我們的紅軍，我還在江西的時候就跟和他相識，差不多到現在來說三十六七年了。長征的時候我們就在一起，特別是到了陝北……。那時候，我們的領袖毛主席在前線作戰，我在後方主持工作，那時候邱會作同志也就參加後方工作，後勤工作，我們差不多幾乎每天要見面的，計劃為前方籌運供應的事情，渡黃河東征的事情，所以那陣子共事最密了，我覺得他是一個很能夠工作的同志，也是年輕有為的，是一個很有希望的同志，跟著毛主席走。這個看法到現在來說已經超過了三十年了，我的看法得到了證實，覺得我的看法是沒有看錯的……應該說他是一個稱職的，而且做得出色的後勤部長。」總理的講話，對我本人，對總後的工作，對全軍後勤工作都是很大的鼓勵！

一九六八年八屆十二中全會之後，以林彪為首的軍委辦事組和以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開始了激烈的鬥爭。我從軍委辦事組的角度，經常向總理個別匯報林彪、江青之間的鬥爭情況，直到我下臺為止。總理是完全站在林彪一邊的。

一九六九年周總理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建議，要我主持國防工業的工作。我開始任常規兵器小組組長，後任中央軍委國防工業領導小組組長，主管全國的國防工業。

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七日江青在釣魚臺召集黃、吳、李、邱、李德生、姚文元談話反總理。兩小時後我就把情況向總理報告了（江青以前的

三次談話，我都及時向總理匯報了)。總理拉著我的手說：「感謝老同志！老同志就是老同志！」

九大以後到一九七〇年廬山會議期間，周總理在政治局會議上，表面上對江青一夥和我們是「公正」的，但實際上又是支持我們的。有一次總理找我個別談話，他說：「今天晚上，你有什麼話要同我說的嗎？」我懂得總理說話的意思，把我知道的事（總理不知道的）全部對總理說了。總理很高興，說：「你幫助我做了心中有數的事。」從此以後，總理對我們的支持直到「九一三」基本上都沒有變。

從廬山會議以後，到一九七一年四月批陳整風會議之前的半年時間裏，總理曾經同我個別談話兩次。一次是詢問我在總後黨委擴大會議上傳達廬山會議的情況；一次是詢問我在軍委座談會上對主張對有關廬山的問題要做自我批評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總理嫌我沒有及時向他報告，失掉了向毛主席提出建議的機會。總理還對我說：「你要同過去一樣，有什麼事及時對我說，爲我爭取工作上的主動。」

七一年「九一三」事件的當天下午，總理有意分配我做與我的工作關係不大的工作。例如，收拾三中全會的會務工作攤子，組織京西賓館的防空等等。

九月十七日，周總理在十分疲勞的情況下，還藉故給我打電話，主要是對我做鼓勵工作，表示是保我的。

九月二十四日，我就要隔離審查之前兩三小時，周總理還想到要同我個別先談談，但受到了楊德中的阻攔，未曾談成。

從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起我在衛戍區隔離受審查期間，總理對我依然是很關心的。例如，要衛戍區給我送蚊帳、涼席、電風扇等用品。據衛戍區看管的人同我說：「總理除了沒有批准你喝酒之外，一切事都辦到了。」

七二年五月間，當時的江青一夥控制的專案組，對我的審查告一段落時，總理還要專案組向我傳達了三條：一，你交代的那些問題，不要有什麼負擔，中央主要負責人對你是瞭解的；二，利用機會多讀幾本書；三，注意身體。從此之後，江青一夥控制的專案組，對我的審查就基本結束了，我也就安心在衛戍區警衛三師等待處理。

我一九三〇年第一次見到周總理，到一九七一年同周總理最後分別，將近半個世紀。我從一個普通戰士成長為一位在中央工作的領導幹部，同總理同桌辦公，這是不可想像的事，但又是歷史事實。周總理是我的領導人，是我的長輩，是我的良師益友，是我的救命恩人！

一九三四年周總理救了我一命，時至今日，使我多活了五十二年。一九七一年我被隔離審查之後，周總理陪外賓去廣州，曾召見當時還在廣州軍區工作的我的二兒子承光。他除了鼓勵我的孩子之外，還當著我的孩子的面，向軍區首長交代：「對孩子要一視同仁！」一九七三年我的女兒直接向總理寫了報告，總理有批示，當時解決了一些生活上的問題。總理對我的家屬是關心的，我根本不相信總理對我們會下狠心。我同總理的關係是誠摯深切的，總理對我是關心和器重的。我永遠懷念周恩來總理！

在衛戍區經過不幾天，我的情緒就穩定下來了。我想到的是：在這裏不是「住幾天」的問題，而是長期受審查的問題了。

第三十八章 在順義的日子裏

改天換地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從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把我押送到順義縣北京衛戍區警衛三師師部關起來了，在警衛三師，我度過了五年又三個月，於七六年十二月三十日離開，押送到了秦城監獄。

七〇年廬山會議之後，主席是很信任江青，很信任江青一夥的。林彪不吃香了，我們也不會太吃香了，這是預料之中的事。但要我們下臺，還沒有想到。因為我們不僅是林的人，更重要的是我們也是毛的人，是黨的人。我想到的也頂多是政治上慢慢淘汰，「文明」下臺，根本沒有想過會把我抓起來。對我的審查，七二年五月底就基本結束了，以後再也沒有找我系統地交代過什麼問題。毛主席在世時，出現了林彪那麼大的問題，可毛主席也沒有把我們送進秦城監獄，江青一夥也沒有在把我們關進秦城的問題上興風作浪。現在倒好，「四人幫」打倒了，我們正在高興時，卻把我們關進了秦城監獄，這就錯上加錯了，想來想去不得其解。

八九年在北京見到李作鵬和吳法憲，得知他們的情況也和我差不多。可見，毛主席、周總理健在時，主要是清查我們與林彪有沒有「兩謀」（謀害毛主席，南逃另立中央）之類的反革命關係，因為我們和林彪根本沒有兩謀的關係，審查多久也不會審查出來的（退一步說，林彪不知道、有沒有參與林立果搞的「兩謀」問題，直到現在也是沒有證據說清楚的）。毛主席是下決心不要我們了，但還沒有要徹底打倒我們，對我們還是審查。當時，可能解脫我們的「火候」還不到，也有江青一夥的阻力，也祇能「掛」著了，到七六年底進秦城前，幾年內我們一直關著。

剛進衛戍區那幾天，我心裏還有點「吊著」，因為說我們要跟林彪搞政變，但過了國慶節，全國是穩定的，沒有什麼「大新聞」，我的心就放下了。我從那時起，從來沒有相信林彪要搞什麼政變，這完全是爲了搞倒林彪，搞臭林彪，給他戴的一頂大帽子。

在衛戍區，我一天能接觸到的客觀事物就是吃飯，看報紙，在房子裏走步，這是見天如此的「三三」制。吃三頓飯要不了多少時間；讀每張報紙，即使從頭到尾一字不拉地讀，也要不了多少時間；一棟空房子，走上一小時就走膩了。每天都是度日如年，精神上的痛苦是無法形容的。不管怎麼樣去想，都沒有想通，這是最痛苦的。在順義五年零三個月的時間裏，祇有在書本子上找出路，我讀了厚薄不同的書上百本，馬列的書，中國歷史書，文藝書，三種書都讀。例如，毛主席提出的三十本馬列主義書，外加馬恩選集、列寧選集等；還有能找到的中國歷史書；文學著作，有《紅樓夢》、《水滸》、《三國演義》、《西遊記》、外加《東周列國志》，現代文藝作品中，浩然的《金光大道》我都讀了。讀書時，越是難讀的，則更喜歡讀。一天到晚，祇要讀通了一頁書，或搞通了一個什麼問題，時間就過去了，心裏也感到很高興！讀書成爲我「度日」最好的方法了。我用讀書的辦法，解決了時間之「多」。

家屬情況怎樣？這是我不能不關心的問題。當時，我一家四代九口人，老的是八十多歲的老母親，文革初期，我受到造反派的殘酷武鬥，說我頑固執行劉、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老母親在家聽說後，又氣又急，瘋掉了。「九一三」時，小孫女祇有十幾天，小女兒也剛剛十三歲，他們怎樣活下去？這是我不可能不想的問題，現在雖然還不知道他們的處境，但家屬不受株連也是不可能的，「家破人散」是肯定的。

我明明知道自己事實上成了一個階下囚，那裏還顧得上家！祇有讓他們聽天由命了！可我越控制不想，他們可越「來」的勤快。祇要一閉眼睛，家裏的親人就會浮現在我的腦際。

我住的房子外面的樹上，有一窩老鴉，它們好像在故意逗弄我，每到黃昏的時候，都吱吱喳喳在叫喚，直到把它們「家裏人」都叫回來了。鳥都知道「全家福」，這對我鉤起了好多念家的心思。

爲了試探胡敏是否在家，我用讓看管人員從家裏拿東西的辦法去試探。七一年十月六日，從我家裏第一次拿來了日用品，都是普通的物品，裏面還有口罩、手帕等，說明胡敏還在家，其他任何人都不會這麼細緻。後來我指定要拿《王雲五字典》，這種字典非胡敏或路光在家裏是找不出來的。他們連續去過幾次人，都沒有把我要的東西拿來，我就斷定胡敏不在家了，連老婆也抓起來了，我是沒有想到的。

一九七二年三月間，專案組對我的「閻王氣」就比較少了，我們之間雖然不可能有共同語言，但見面之後閒話就比過去說的多些了。因爲我與林彪沒有「兩謀」關係，查來查去也無用。有一次，我硬著頭皮問專案組：「胡敏，現在什麼地方？」專案組說：「可以告訴你，胡敏另外給她安排了住處。你母親還住在三〇一醫院。你的小女兒還在上學，小女兒很有禮貌。」對專案組說的話，我確實是信以爲真的，因爲他們說的好像真有那回事一樣的。這段時間我對總理講的「三相信」，對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特殊首長」

在順義看管我的幾個人稱「四組」，我估計是按黃、吳、李、邱排下來的。七二年元旦過後不久，在閒聊中我才知道他們稱呼我「特殊首長」。我說：「你們十多人，辛辛苦苦爲了我一個人！」他們有人脫口而出地說：「這有什麼辛苦，你是特殊首長！」我又說：「你們年青人，很會說開心話。」接著，他們的負責人就比較慎重地同我說：「我們自己說話時，稱你特殊首長，這並非惡意，是我們師長同我們開會做指示時這樣說的，後來我們就照著說開了。」

在衛戍區的五年多，我一直同看管人員的關係很好，特別是後四年「住閒」之中，同他們的關係更好，他們幾次同我講了一些周總理對我們的指示。

他們說，總理對看管工作經常有指示，七二年過春節的頭一天，總理召集看管黃、吳、李、邱的全部人員和有關的師團首長開過一次會，總理在會上做了重要指示，把看管工作提高到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高度，還講得很具體。

總理說：「對黃、吳、李、邱的看管工作，可以概括爲三條方針：第一條，保證安全；第二條，保證身體；第三條，保證生活。」

總理說：「我是看管工作的第一組長，李震是第二組長，你們的吳忠司令是第三組長，你們各個工作小組就是第四組長了。我們一致努力就可把這件事辦好。這件事是不能辦壞的，如果讓我們看管的人都病了或者死了，我是無法向毛主席交代的。這裏，我要同你們交個底，毛主席對他們幾個人都是很瞭解的，他們是路線問題嘛。你們瞭解了這個底，就會更好辦事了。」

我初來這裏的時候，師長每天的多數時間都同看管組一起度過。我的一切情況，從吃飯、睡覺、拉尿、散步、抽煙、喝茶等等師長都要親自過問。凡遇到困難，如燒煤，建廁所、搞火牆等都能立即解決，都是師長現場指揮的。

我的看管組變更過二次。第一次一律是師部的科長以上的幹部，政治部主任是現場的帶班人。這個組的時間不長；第二次一律是連以上幹部，這個組持續有一年多的時間；第三次是幹部和老戰士各一半，這個組直到把我送進秦城都是這樣的。

看管組對我的態度，從開始到最後都是很好的。尤其是七三年秋天之後，我基本上是閒住了，生活的「花樣」多了一些。例如，他們同我一起打羽毛球，他們打乒乓球，我給他們當「裁判」。他們打撲克，我給他們當記分員。

警衛三師師長是華東野戰軍的幹部，同我一樣都操客家話，客家人是很講義氣的，我們互相交談都很高興。因此，我關在警衛三師之後，他從他的工作出發，對我是很關心的。他多次到我的房間來看我，在話語中有安慰之意。例如，他第一次到我房間來就同我說：「現在就要管自己了！我規定，你每天上、下午要走廊裏散步兩次，多活動對身體好。」他說完之後，拉著我就往房外走，並同我一起散步。師長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

生活問題之一。我對生活需求很簡單，祇是要求能吃得飽，睡得著，拉得出。這三件事在進衛戍區之初都遇到了極大的困難。

從剛到衛戍區直到十一月底前伙食是非常不好的。每天在戰士食堂打飯，除了洋蔥、老白菜之外，最好的菜就是煮土豆。飯食壞無所謂，

祇是米飯裏的砂子多，我都不敢下嘴，咯一次牙要難受好幾天。我每天早上，祇好祇喝一碗稀飯，留一個饅頭中午吃。在兩個多月的時間裏，我的體重由掉了二十多斤。當時的政治氣氛非常嚴肅，他們明知我吃不好也沒有辦法，上面沒有指示他們也無可奈何。如對我稍有照顧，很可能被扣上階級立場不穩的帽子。

有一天，吃豬肉燒土豆，這是很好吃的菜。如果換上牛肉土豆，就是赫魯曉夫的「共產主義」了。晚上，把飯打來之後，香味使我高興極了！我把幾塊瘦肉吃了之後，還不解饑。於是，我就把幾塊肥肉也吃了，香得我幾乎把碗都吞到肚子裏去了，我的饑勁，連自己都不相信。可是我的腸胃享不了「大福」，把肚子吃壞了，拉肚子拉了一個星期才好。

這樣，在幾十天之後，我瘦的不像樣子了。就在此時，周總理派專人來到我的住處秘密察看我的身體情況，來的人是認識我的，一看嚇了一大跳，恰在這個時候，黃永勝向毛主席寫了信，要求改善伙食，毛主席批准了。看管的人同我說了，毛主席講：「他們幾個人應當吃好，有資格吃好。」從此以後，伙食就大為改善了。

從七一年十二月一日起，我的伙食就是新的標準了。當時，中央規定的是每天伙食費一元。師首長讓我在師小灶打飯吃，每天晚飯還為我加一個菜。從此以後，我就不是吃不飽了，而是吃不了了。每天打飯的時候，我總是交代少打一點。爲了我的吃飯問題，師長經常在我吃飯的時候就來到我住處親自察看。要是不滿意，就立即採取措施。中央專案組的人也經常問到我的生活情況；有時也要親自看我的飲食情況。總理對他們說過：「今後他們要再掉磅，專案組要負責！」此外，總理還規定，搞專案的要管三條：管審查，管思想教育，還要關心生活。在總理的關心下，我的伙食一直很好，直到離開衛戍區都是很好的。

住房問題對我來說，實際上就是冬天取暖問題。房子沒有暖氣，燒爐子容易中煤氣，師長決定用做火牆的「土」辦法了，並限期三天內要辦好，人要能住進去。由工兵營設計施工，限期辦好了，經過實驗，效果很好，取暖問題解決了。

師長還派車到山西省陽泉拉運一種好煤，每年冬天都是燒的好煤並派了個鍋爐工專燒爐子，取暖問題，解決得非常好。按照氣候變化的需要，有的年份，十月初就燒火牆；有的年份春天一直燒到四五月才停止。

在衛戍區我穿的還是按軍隊的供應標準發衣服的。在五年多的時間裏，七一年冬天給我發過一套新棉衣。七二年春天，還爲我做過兩件麻的確良襯衣。對穿衣沒有發生過困難，日常用品也沒有發生過困難。看管組的人，看到我需要了什麼東西，總是主動同我買來了，他們對我的生活考慮得很周到。

七三年的國慶期間，師長來到我的住處問我：「你爲什麼臉色也不夠好。是否營養不夠？」其實我對生活是滿意的。

可是，第二天中午不到，看管組的人提回來了一籠子活雞。晚飯就打來了一碗雞湯和適量的雞肉。打飯的人關心地說：「好好吃吧，多吃一點，長胖一點。」以後就接連幾天晚上都有一碗雞湯。

一天，我問對我特別同情的防化連 H 副連長說：「現在伙食已經改善了，爲什麼每天都有雞肉吃？」他很驚奇的回答說：「啊，你還不知道呀！這是我們師長特別爲你改善伙食的，要把你的身體搞好……。」我說：「現在我不是好好的嗎？總理還會有什麼批評嗎？」H 副連長說：「我們師長最近到中央去開過一次會，主要是討論你們出路的問題。到什麼地方去，什麼時候出去都還沒有定下來。周總理有指示，要注意你們的生活，不要搞得很難看。這就是給你加強營養的原因。你祇要能吃下去就放開吃。我們師裏農場東西也多得很……。」

生活問題之二。醫療問題，師長也是很關心的問題。

爲我看病的醫生是師屬醫院門診部主任。開始的時候，他的工作崗位是專門招呼我的並同我住在一起，對我非常好。我這個曾經的總後勤部長對全軍基層的醫務力量不足是瞭解的，我個人的病情畢竟是不多的。於是，我對師長說把他的工作方法改變了一下，白天仍到門診所去上班，晚上同我住在一起，白天對我則隨叫隨到，師長同意了。

爲了治病，我用藥是非常方便的，幾乎要什麼藥都有，後來我才知道，中央保健小組同那位主任有直接的工作關係。貴重的藥品隨時可以要來，高明的醫生隨時可以請來。七二年初，在澡塘洗澡我不慎在室內跌了一下，當時很疼，兩小時內北京醫院的外科專家就來到我的住處，爲我看病。醫生對我的健康也非常注意，每月至多三個月要給檢查一次身體，還注射過胎盤球蛋白。衛戍區對我的醫療，我同樣是十分滿意。

的。由於衛戍區對我的生活照顧得很好，在幾年之內，除了患過輕微的感冒病之外，其餘沒有患過什麼病。

師長指示，要看管組特別注意我的室外活動，要運動，要曬太陽。對這個問題，看管的人抓得很緊。師裏還將師直托兒所的小院於全部騰出來了，我搬進去後，晴天都可以在院子裏活動。

洗澡是每個星期一次，我都是在師首長的塘盆裏洗澡。我同師長一起就洗過若干次澡。我的住處到澡塘，距離祇有二百米。要是天下雨、下雪，非讓我坐汽車去。

理發是指定的專門理發員給我理。半月一理，到時候還非理不可。

這裏還要特別說一個小問題，在我的房子裏擺了一張質量很好的小沙發。這個問題，可謂小吧，但從這裏可以看出師長對我的關心了。

我的穿著也是按照「規定」辦的，每個星期一定要換一次內衣，半個月一定要換一次外衣。內衣我在洗澡時自己就洗了，無論如何不要看管組的人同我洗。外衣他們是非洗不可。有一次，我自己在洗外衣，他們看見後立即端走了，並且說：「你又要我們挨嗑了吧！」

我用的被褥一個月換一次，是師部招待所管理的。我墊的和蓋的都足足有餘。我的房間，他們每天給我打掃一次，每月至少要消毒一次。桌子等處要擦一次，並且都做的很仔細。

我在衛戍區期間，正趕上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爲了我的安全，在將近四個月的時間裏，從師長到四組的全體人員對我的安全都是十分關注的。

七六年七月中旬早晨，我已經穿好了衣服正在下床，突然感到房子有些動，就在這時，值班的人猛推開我的房門，連拉帶拖地把我搞到院子裏。此時，值班的人才喘了一口大氣說：「地震！」我剛要問什麼地方發生地震時，師長就站在我跟前，並用緊張的聲調說：「安全就好！」他還向值班的人交代了暫不要進房子等注意事項。

值班的人員說：今天早晨的地震是突然而來的。在此之前由於沒有比較具體的消息，又怕妨礙你的睡覺，所以師長指示不要同你說有關防震的問題。他們說：師長還沒有起床，地震就發生了。他從床上滾下來，衣服都沒有穿好就到我們這裏來了。他一進門就看到你站在院子裏，心裏很高興！師長先親自瞭解了你的情況之後，才到作戰室去指揮全師的

防震。在發生地震的當天中，師參謀長就來到四組開會，討論研究我的防震措施。會後，他們同我說：「今天早飯後，參謀長專程去中央專案組請示對你的防震問題。總理去世了，現在沒有人管事了，根本沒有人解決問題，我們師長指示，按照中央的原定精神辦事，一定要保證我的安全。」經過討論，研究決定採取如下辦法：

第一是，在我住的院子內安裝警報器。

第二是，在院子裏住宿。從地震的當天晚上，我同四組的人，一起都住在院子裏。

第三是，防震車。師長批准撥給四組大卡車一輛，在大卡車內架有行軍床，晚上在車上睡覺。

第四是，住防震棚。從十月底開始，在外面露天睡覺就吃不消了，但防震又未結束。師長派了一個工兵排，一天之內就為我和四組的人搭好一個防震棚。我們在防震棚一直住到十一月中旬才搬回房子裏。

我們在防震棚過得很好，四組的人成天都是撲克和象棋，我除了當觀眾之外，就是當義務記分員了。在住防震棚期間，師長，副師長、師參謀等都不止一次地來看過我，我對他們的好意，總是表示感激之情！

第五是，準備轉移到無震區。四組的人向我透露過，師黨委已經寫了報告將黃、吳、李、邱四個人都轉移到無震區去。上面對這個問題總是不表態，所以一直沒有走成。

四組同我的關係

前面說過了，四組大變過三次，人員調整的小變就更多了。他們雖然變動很大，但對我的態度，除了個別人有時態度稍微生硬之外，絕大多數人，對我的態度都是很好的。衛戍區對我是認真執行政策的。

爲了說明四組對我的態度，這裏祇說三個典型事例就可見一般了。一個是防化連 H 副連長，一個是老戰士小 G，一個警衛連 J 副連長。

第一「好友」是防化連 H 副連長。他同我一起的時間四年還多一點，對我的幫助特別大。一九八四年他到西安出差還到我的住處來看過我。

H 副連長是在防化學校畢業的優秀生，分配到警三師擔任副連長的。他很聰明，對政治有自己的見解。他來了之後不久就同我談過一次，他對我說：「我看你內心負擔還相當重，這完全沒有必要。你的問題毛主席

席、周總理清楚，你自己清楚。我來的時候，師長向我介紹了你的情況，我們師長對你的看法是沒有偏見的……。」

H副連長對我的真誠，對我的心靈是莫大的安慰，也使我瞭解一些我不可能知道的情況。

第一件，周總理對李德生的批評。我關起來之後，李德生在總後大院我的家裏辦了一個「展覽」，他們的目的沒有別的，就是爲了對我的醜化。展覽之後，總理派王洪文、華國鋒去看過之後，立即下令停止展覽，並對李德生進行了批評。

總理說，在邱會作家辦展覽，這種搞法，過去是沒有過的。這樣大的事我事先並不知道，也沒有報告毛主席批准。尤其是把公家的東西搬進去展覽，說成修正主義更是不對的。對黃、吳、李、邱的問題，我是要對毛主席負責的。

第二件，對我的安置問題。「十大」以後，雖然把我們都開除了，具體的內幕我不知道，但H副連長說：「中央決定對黨的歷屆犯了錯誤的中央政治局委員，都作了安置，都是每月二百元養起來。中央定的二百元，純粹是生活費用，其餘一切費用，如水電費等等都由公家包下來。現在你住在這裏，就是每月二百元的費用。你每月祇花五十元左右，多餘的存起來了。……」

「這次安置的共有六人：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陳伯達、李雪峰。一九七四年二月間，春節前四天，看房子的回來了。本來農曆二月二十八日，你就要離開這裏到新的地方去，我們二十九日就回家，每人放假一個月。但江青這些人反對周總理的意見，你們的事，也就沒人管了。在此之前，我們曾經得到過兩次通知，準備要你走都沒有走成。」

第三件，李震之死。李震死了對你們的審查也就停下來了。對你們幾個人怎麼辦？有人提出，黃、吳、李、邱就是那些問題，可以處理了。對這個提案毛主席、周總理都同意了，但中央專案組的汪東興提出李震之死可能與「四大金剛」有關，要待李震的問題搞清之後再處理他們四個人，這樣就拖下來了。可見汪東興之壞，他爲了和我們劃清界限，落井下石，無所不用其極。

粉碎「四人幫」之後，有人提出：黃、吳、李、邱是反「四人幫」的，問題應予以解決。軍隊的當權派堅決反對解放黃、吳、李、邱。汪東興則提出，現在主要是集中精力搞「四人幫」，把他們先搞到秦城「放」起來。

J副連長說：「從我知道的情況來看，幾年以來你都是處於多災多難之中的。毛主席逝世之前，本來對你們做了安置，但「四人幫」堅決反對，沒有實現；粉碎「四人幫」之後，本來可以得到更好的安置，又未得到實現。我們都是同情你的。」

第二個好友，師直工兵營戰士小G。他是河北省井陘縣人。他同我相住的時間約三年，他是使我知道女兒一些情況唯一的一個人。

小G很老實，很勤快，很愛學習，對我的幫助就等於是我的「警衛員」一樣的。祇要他在值班的時候，對我的一切事情都包攬了，連我的褲叉、襪子都是他同我洗的。他的時間是不虛度的，每次值班都要向我學習一點什麼東西。從文化知識，到哲學知識等都是他學習之列的，有時他問到我毛主席的詩詞，我也同他說上幾句。祇有我們兩人一起時，他也總是稱呼我「老師」。

七四年，我幫小G辦了一件好事。小G探家臨走之前就同我談了我的女兒在井陘3502廠所知道的情況。小G說：「你的女兒七四年春節前就被總後從北京搞到3502廠。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孩，孤身一人在那裏生活，困難加上歧視，慘狀可想而知，我過去不同你說，是怕你會傷心的。」

二十天之後，小G從家回來了，他對我女兒在工廠的情況講得非常清楚。但他對我女兒受罪的情況還是一帶而過，不肯吐露真情。我聽了之後真是悲喜交集。

第三個好友，師直警衛連J副連長。他給師長當過警衛員，J副連長也同我相處約三年的時間，從他口裏我知道了許多師長對我關心的一些具體問題。由於師長對我的態度好，他對我特別好。

我在衛戍區的五年又三個月裏，在衛戍區，從師長、政委、副師長、參謀長和全體看管人員，以及同我有關的工作人員對我都是很好的，我對他們對我關心的話是說不完的，也沒有恰當的言語來表示我的

感情，我祇從肺腑裏發出一句話：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衛戍區警衛三師是一支好部隊！

從關在衛戍區的幾年來看，毛主席不管多麼對不起我們，還把我們當人看，我們的問題雖然還沒有解決，但還是有餘地的。毛主席說過：「死黨可以不死。」汪東興最對不起我們，九屆二中全會後及會後，葉群及軍委辦事組都極力保汪，他和我們的密切關係，我們一個字都沒說過。毛主席、周總理去世了，江青一夥打倒了，解決我們的問題有了條件，可汪東興卻極力對我們下毒手，把我們「昇級」關進了秦城，真正是下了人間地獄。

第三十九章 中央專案組的審查

沙河機場的兩次審問

從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把我關起來之後，對我進行過各種不同的審查，這就是：「江青一夥」控制的中央專案組的審查；「四人幫」倒臺後，中央審查小組的審查；彭真控制的最高人民檢察院預審組的審查。這三種審查的時間、目的、手段都各不相同。我從中央專案組的審查開始，來分別說明三種不同的審查。

一九七二年年初到四月間，在三個多月時間內，公安部部長李震、中央組織部部長郭玉峰、北京衛戍司令員吳忠對我進行過四次審問。四次審問的前三次地點在北京沙河機場裏的所謂「林立果公館」，第四次是在通縣到順義的張家灣進行。前三次審問是衛戍區警衛三師師長陪同我一起去，後一次是師的參謀長陪我一起去。每次出去都是三輛小汽車，前面一輛是師長的車，中間一輛是我坐的車，後面一輛是警衛車。

李震部長的四次審問，可以分爲兩個不同的目的。前三次主要審問一九七一年八月八日在葉群家「搞陰謀政變」的問題，第四次審問的是在廬山許世友等向中央寫的三封信問題。

沙河機場的第一次審問。這次開始的時間比較晚，寒暄的時間比較長。對我吃飯、睡覺、治病、散步、洗澡等問題都問到了，還問得比較詳細。然後才問到案情的問題。

李震說：「你寫的材料，我們都看過了，其實那些材料是多餘的。那些問題你不寫我們也知道。雖然問題是很複雜的，但不管再複雜也會有主要問題核心問題，你祇要把主要的說清楚了，一切問題也就了結了。……」

郭玉峰說：「中央對你是寄予希望的，這是對你的審查的有利條件。」

李、郭、吳三人對我審問的時間並不久，就開始吃飯了。我一個人單獨吃飯，吃了飯之後，李、郭、吳三人和我說了一陣子閒話，然後我們才回順義的。當時，警三師師長、看管我的組長、醫生也在場。

第二天上午，中央專案組兩三個工作人員，又到順義來了。他們說：「昨天談話的精神，你是一聽就懂了，你需要向中央交代清楚的是主要問題。」

「什麼是主要問題？我還想不到。你們要認爲可以的話，希望你們直截了當地提出來。」他們笑著說：「嗯，你會想得到的。老實說，吳法憲聰明不如你，但他早就說清楚了。」

我有意對他們的提問表示冷淡，我不知道他們究竟要什麼。至於他們後來說的主要問題就是所謂「八八」問題，我是根本沒有想到的。他們怕同我搞僵了，沒有多問，啞謎也沒有打開，我們的談話就結束了。

沙河機場的第二次審問。這次同上次談話的時間，大概隔了一個星期的樣子。這次見面時雖然還有寒暄，但又有一些「火藥味」了。李震說：「黃永勝、李作鵬是死硬反革命……中央領導對你是很瞭解、很關心的。你的許多事情，中央領導同志說得清清楚楚。你祇要把主要問題說清楚了，我們就好辦了，我們會妥當處理的。不是你的問題我們決不會放在你的名下。同黃、吳比較起來，你的問題是很少的。任何問題都不會孤立的，你的問題，即使你不說，我們也知道。」

「一九七一年八月八日你同吳法憲在葉群家談的話是一個重大問題，你祇要把這個問題說清楚了，其餘就沒有什麼重大問題了。這樣的重大問題，我們是要專門向中央報告的。因爲你在場，報告裏要沒有你的態度（實爲口供）是不行的，這些道理你是完全懂得的。」

「吳法憲爭取了主動，把問題早就說清楚了。他曾再三說，那天晚上到毛家灣去是他叫你去的，你沒有多說什麼話。中央考慮對吳法憲從輕處理，把他的生活安排好。你把問題講清楚會得到更好的處理的。」

郭玉峰說：「『八八』問題，吳法憲是說清楚了，也說得很好，幾句話就把核心問題說清楚了。」

李震說：「吳法憲不會害你的，他寫的材料把與你有關的問題都說清楚了。老實說，中央領導同志對你是心中有數的。」

吳忠說：「『八八』那天晚上，你們四個人在葉群家談話，現在活著的還有三個，至於你們周圍有關的工作人員那就還有不少。現在，我們要你把自已的問題說清楚，與其說爲了向我們說清楚問題，還不如說是爲了你自己和你全家。你說得越清楚，對你越有利。你這個大明白人應該完全懂得。」

他們說完之後，我即說：「你們說的『八八』問題，我當然不能理解，因爲那天的談話都是很平常的談話，但根據你們說的意思，我可以猜到幾分。我猜想你們說的意思是兩點：一是『八八』問題是屬於搞陰謀，搞政變，搞謀殺之類的問題。吳法憲已經承認並且交代了，中央準備對他寬大處理，將得到很好的安置；二是我要是同吳法憲一樣，也承認自己的『罪行』，你們會給我說好話，中央會對我更寬大更好的處理，對我的安置也會更好。可是從葉群回京治病到她離開北京，我參加的事，我可以給你們寫一份詳細的材料。我相信，我是可以回憶得起來，也會寫清楚的。」

李震說：「你猜的有……（有什麼沒有說出來，立即轉口）你再好好想想吧。你祇要願意寫，什麼問題都可以寫清楚的。我們幾個人認識你都多年了，對你的才能是很清楚的，今天就談到這裏爲止。」

第二天，專案工作人員又到順義來了，關於「八八」問題，我用了不長的時間，已經把材料寫出來了。他們看到我的材料之後，祇自言自語地說了一句：「沒有實質問題。」我也動了氣：「實質問題是什麼？我不清楚，你們可否乾脆給我點出來？！」

「我們點出來好？還是你自己交代好？你看怎樣好？」

「你們說吧？」

「我們認爲還是你自己交代好，這樣可以看出你的態度來。」

「我寫的材料就表示了我的態度，我寫的材料對毛主席負責，對黨中央負責，對你們專案組負責，也對我自己負責。」

「老實說，你寫的材料嘛，雖然把過程交代清楚了，但沒有用！吳法憲是直截了當的交代了，八月八日在毛家灣葉群和你、吳法憲策劃陰謀政變！」

我當時雖然腦子裏有潛意識的思想準備，但聽到「陰謀政變」幾個字，頭還是「轟」的響了一下。吳法憲爲了得到「很好的安置」，把本家

都送上「陰謀政變」的臺階上，再加上「九一三」的突發事件，林彪又摔死在外蒙溫都爾汗，你說毛主席和中央是信還是不信呢？信是有理由的，但吳說的是假話；不信是沒有道理的，畢竟是吳的親自交代。問題既然見了底，我心裏就不怕什麼了。

我說：「吳法憲怎麼交代的，我不管，但我決不向你們說假話！違背事實，違背黨的政策，違背自己良心的事，我是決不會幹的！」

「中央領導同志（指李、郭、吳）對你抓得那樣緊，還能讓你違背原則嗎？對吳法憲的交代，中央領導同志向他問過數次都沒有推翻，我們對吳法憲沒有逼供信，你看這是吳的補充交代，沒人逼他呀，是他主動補充的（他們按住正文，祇讓我看了吳主動交代的標題），對吳法憲這樣一個人物的話，我們能不相信嗎？對你們這個案子很快就要了結了，現在主要是等你對這個問題的交代了。」

聽了專案人員的話，我心想：吳的假交待害了黃、李、邱，甚至害了林彪，其實也害了他自己。因為吳的假話，毛主席和中央很容易把林立果的「謀殺」和吳法憲說的「政變」聯繫到一起了，把林立果和林彪扯到一起，又把林彪和黃、吳、李、邱扯到一起，江青一夥再煽動去鬧，問題就複雜了。如果沒有吳的假交待，這個根本沒有的問題就不能成爲問題，祇要講清我們和林彪的政治關係，我們的案子就基本會了結了，總理也好幫我們說話。在毛主席活著的時候就會給我們一個結論。

此時，我又氣又無奈地說：「你們要我交代的實質問題，我已經明白了。」

專案人員說：「這個問題，其實也並不複雜，你寫三點就可以了。第一點是，葉群策劃你們必要時準備到廣州去另立中央；第二點，葉群動員你們準備在三中全會上繼續反黨；第三點，你對吳法憲的交代可以寫『同意』，或者寫沒有聽清楚他們說什麼，都可以。」

我按照他們提出的三點，祇用了半小時就把交代材料寫出來了。第一點，在吳法憲轉達了廣州軍區首長很想念林彪時，葉群回答說：「我們也很想念他們，今年冬天準備到廣州去過冬」；第二點，葉群說了：「在三中全會上，他們（指江青一夥）要是把廬山會議的問題再端出來，我們以端對端，決不要怕他們。」我們同意葉群的意見；第三點，吃了晚餐之

後，我再三提議要散，因為我對他們繼續談下去有點不耐煩，幾次到走廊裏轉了轉，吳法憲、葉群說的話，有的我沒有聽到。」

專案組看到我的材料，沒說什麼，就收場了。

沙河機場的第三次審問

這次審問的時間，同第一次相隔一個多月了。一見面，他們就說：「我們去接張國華（成都軍區第一政委，四川省委第一書記）的骨灰去了，來得晚了。」

一九七一年八月八日在葉家談話的問題，是決定我的政治生命的重大問題，也是決定黃、吳、李、邱，軍委辦事組，甚至關係到解放軍廣大指戰員的政治生命的重大問題，但問題又是那樣簡單，因為「八八」去毛家灣見葉群，沒有談任何問題。

李震等對我的審問集中的是「八八」問題，其餘的問題，有時也順便提到，但沒有專門問過。後來，李震部長的專案組把問題理成三個問題：一是「八八」問題；二是「九六」問題；三是「九一二」問題。這三個問題也就是審查我的反革命問題。在一九七二年的三月上旬，到四月中旬，中央專案組的工作人員幾乎每天都對我進行審問。

在一個多月中，專案小組對我的審查就是直接了當的使用「壓供、誘供」。我當時祇要說一句話：「同意吳法憲的交代」，就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但我自始至終在原則問題上都沒有說假話，沒有做自己害自己的蠢事。這段時間，每天對我審查的內容，甚至說的話都差不多。現在，我就綜合寫在這裏。

李震和專案組說：「吳法憲已經把主要問題交代清楚了，中央領導同志很讚賞。吳法憲有出路，正在給他找房子，安排他一家人住在一起。你本來是排第四位的，為什麼要向前擠？這对你毫無好處嘛。對你的問題，中央領導人（指李震等人）已經向你交了底，在你的名下不會放什麼東西的。我們考慮到『八八』問題，吳法憲已經說清楚了，你祇是證明一下就是了，這有什麼難於辦到的呢？」

李震說：「周總理對你是很瞭解的。他曾經說過這樣的話：在他們幾個人之中，邱會作雖是跟著走的，但他並不是盲目的，不會主動辦什麼壞事。吳法憲交代『八八』問題之後，周總理大吃一驚，老實說他对你

也有了新的看法，我又一次找你親自談話，就是總理要我來的。我們認為對搞清你的問題是很有利的。」

李震和專案組說：「你不是說過八月八日晚上，吃了夜餐之後，常出到外廳去，有時還在電影室門口看一看嘛，你說的情況我們是得到了證據的。在這種情況下，也不排除吳、葉說了什麼，你沒有聽到。你也可以把當時的情況再說一下。」

專案組說的上面三點意思，我是完全理解的。他們把周總理也抬出來了，作為對我誘供的手段。我當然決不能上當。

接著我就提出了我交代的辦法：「專案組提問，我回答；或是專案組提具體要求，我自己寫。」他們聽了我的意見後，立即說：「稍休息一下。」

不久，又繼續談。他們說：「你提的辦法，可以商量。我們的具體要求就是，你把當時的問題如實說清楚就行了。」

「我以前寫的就很清楚了。」

「以前寫的不能解決問題。」

談話到此就僵持了好一會，互相一句話也沒有說。他們忍耐不住了，即向我提出了具體問題。他們說：「在毛家灣，你們吃夜宵之前，不是提出了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嗎？」「話是吳法憲提出來的。」

「我在以前的材料上，寫了當時的情況。吳法憲說了什麼根本辦法，我確實沒有聽見。」

對我的話，他們久不表態。我知道他們在「誘供」，我即故意主動開口說了一句他們愛聽的話：「對吳法憲的話，我沒有聽到，不等於他沒有說。」他們對我的話很感興趣，又提議「休息一會兒再談吧。」

不一會兒，又繼續談話。他們說：「你可以把當時的情況寫個材料。」

我立即回自己的房間寫材料。我把吃夜宵前的情況寫了一下：「當時，祇有吳法憲、葉群（胡敏在沙發上睡著了）和我在場。我不願意聽他們談一些無關重要的問題，我經常出到外廳去有時也去電影室看一會電影。我祇聽到葉群說：『不要怕他們，也沒有什麼可怕的。開三中全會時，他們怎麼來，我們就怎麼去！』」

他們看到我的材料之後，沒有反感之意，但也沒有什麼高興的表示。當天談話結束了。

第二天上午，專案組又來了。他們見到我的第一句話就是：「你坐下。」他們接著把我以前寫的材料和昨天寫的材料都拿出來了，並要我把兩個材料合在一起，湊成一個材料。我拿著材料回我自己的房間去了，大約半小時我就交稿了。他們看了我的材料之後，說了「可以了」，就讓我回房間去了。

中央專案組對「八八」問題，以後再也沒有提了。

我以爲「八八」問題就算過去了，沒想到他們又對我搞了一次大圍攻。大概是七二年四月下旬，中央專案組在我的住處，專案組來了十二人，除原來同我接觸過的四人之外，新來八個人，主持審問的也是一個新來的瘦高個子，我沒有見過。那次審問真是殺氣騰騰，我一進門主持審問的人就大聲說：「坐下！」我從容不迫地坐下了。他們的恐嚇，反而引起了我的注意。

「邱會作，你要老實交代！八月八日你們在葉群家談的和九月六日李作鵬同你說的都是反革命活動！」「我們掌握了材料，你賴不掉！」主持審問的人，氣勢洶洶地這樣說。

「那肯定有人胡說八道！」

「你要無賴！」

「你們也不要太威風！」

他們沒有奏效，接著有三個人對我進行批判，像紅衛兵一樣的氣勢，有的還用拳擊桌子，表示他們的憤怒！我則照樣喝水、抽煙，根本不予理睬！

另一個人用比較緩和的口吻說話了，以似乎「關心」我的態度，向我交代政策，他說：「你還是寫了材料吧？這樣不能解決問題。還是要把沒有交代的問題寫出來！」

針對他們提出的問題，我斬釘截鐵地說：「沒有新的問題可寫了。」我說了之後，先後兩個主持審問的人交換了一下眼色，宣佈：「今天到此結束。」

不過使我難於理解的是，自那次以後，中央專案組再也沒有對我進行審問了。

在審問中出了什麼「名堂」，我早已猜到了幾分，特別是「八八」問題，他們追得如此之緊，話又說得如此之明顯，例如，李震^{方塊}鄧玉峰說：

「吳法憲是不會害你的！」對此，我就從相反的角度去思考問題，我基本判斷他們得到了假材料，這個假材料很合他們的口味，也幫助毛主席把林彪打成反革命提供了重要的證據，他們捨不得撒手，當然也不會輕易撒手。其實，吳的假交待，不僅害了我，害了黃、吳、李、邱，害了解放軍，從而也害了搞專案這些人他們自己。不出所料，一九八一年七月吳、邱、王、江在秦城合監之後，吳法憲首先哭著向我說了真話。他說「八八」問題，一九七一年就說了假話，直到一九八〇年「公審」之前才作了糾正。

當然這不僅是害苦了我們的問題，同時也干擾了毛主席、周總理、中央對「黃、吳、李、邱」的判斷，給江青一夥鑽了空子，在當時的情況下，雖然沒有政變的證據，但按「政變」對待我們乃是必然的。

第四次審問時間大約是一九七二年四月下旬，地點北京以東通縣到順義縣之間的張家灣，警衛三師的一個團部。

這次審問陪同我去的負責人是警衛三師的參謀長。大約晚上七時我被押送到張家灣，同我去的看管人員陪著我一直等到次日凌晨五時多，李震才派來的兩個工作人員才同我談話。談話開始前，祇聽到李震頻繁打電話的聲音。他們說：「李震部長要你把在廬山看到許世友、楊得志、韓先楚、南萍、熊應堂等人，向毛主席、林彪、周總理寫信的情況和內容寫個交代材料，現在就在這裏寫。」

我祇有按專案組的吩咐辦，約半小時就寫好了。許世友、楊得志、韓先楚三個人在九屆二中全會上寫的信，是周總理交給葉群，葉群讓吳法憲、李作鵬和我看了。葉群有一次同吳、李、邱三個說：「這三封信是周總理轉過來的，並交代信就放在我這裏，不要再轉手了。」葉群又說：「這是三個險球，如果落在『最高』手裏，特別是落在江青手裏，還不知道要起什麼風波呢？」我瞭解了這一情況後，自己內心想：「周總理是在做黨內團結的大好事，總理真是一個好總理！」

我記得他們信的總的精神是：熱烈擁護林總在二中全會開幕式上的講話，並提出了要堅決鬥爭下去。許世友還提出要把張春橋下放勞動（實際上要求罷張春橋的官）。楊得志、韓先楚基本是照許的口氣寫的。

中央專案工作人員看到我寫的材料之後說：「同過去寫的差不多。」

我回答說：「歷史事實祇有一個，祇要不說假話，寫十次也祇能是一樣。」交了材料之後，已經天亮了，我們也就原路回順義警三師師部去了。

一九七二年四月底或五月初，專案組原來的那四個人一起來了。他們用平和的態度對我說：「今天沒有什麼問題要問的，祇是向你傳達三條：一、中央認為你是交代了問題的，你所交代的問題說得比較清楚，對自己交代的問題不要有什麼思想負擔；二、要注意身體；三要利用這個機會多讀幾本書。誰能說這樣的話你是會想得到的。」

然後，他們就把帶來的尼龍蚊帳，涼席，電扇給我了，並且還說：「這些東西，誰讓我們給你送來的，你也應該想得到。」從此之後，中央專案組對我的審問就停止了。

從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到七二年五月初，審查我的問題，共花了七個多月的時間。即使林彪有「兩謀」問題，我們也沒有；林彪沒有「兩謀」問題，我們就更沒有了。即使吳說了假話，他其實也沒有「兩謀」問題，吳不說假話，他就更沒有「兩謀」問題。中央專案組第一線的總負責人是紀登奎，經過嚴格的反覆審查，紀登奎代表中央專案組向政治局報告說：「經審查，黃吳李邱沒有『兩謀』（發動政變，謀害毛主席，南逃另立中央）問題」。主席、總理都是超人，這裏面的真實情況我想他們會做出判斷，爲什麼不解脫我們就不得而知了。從七二年五月到七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關進秦城，共四年半的時間，無人過問。再到七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央審查小組來，又是三年時間，共七年半時間無人過問，我都快不會說話了。

關於組建基本建設工程兵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總理對軍委辦事組是支持和大膽使用的，對黃永勝時期的軍委辦事組更是大力支持，非常信任，非常倚重的。七一年四月中央批陳整風匯報會議之後，周總理向黃永勝說過：「『中央政治』徹底解決了，軍委辦事組要發揮更大的作用，今後，邱會作的主要工作時間，應放到國務院方面來。」從此，到「九一三」將近四個月的時間，國務院的工作佔了我的不少時間，例如，組建基本建設工程兵，國防工業系統的整頓和領導機關的改組，陝西省委在京舉行常委會等事。這些工作在「九一三」之後都成了我的「罪證」。

建國初期，我軍在學習蘇聯軍隊時，就有了軍隊「在編職工」。例如，機關炊事員、汽車司機、維修工人等等都是。部隊存在「在編職工」，一是不好管理；二是工作效率太低。針對這種情況，改革就是出路。

把軍隊職工改爲穿軍裝的小分隊，這樣的「工改兵」先在後勤系統試行，經過試點之後，效果良好。六二年全軍的編制裝備會議肯定了這種辦法，軍隊的「工改兵」解決了一個「老大難」問題，得到了全軍上下一致贊同。羅瑞卿也當著我的面對大家說：「老邱！你這個人鬼點子真多，就是會辦事。你算爲軍隊解決了一個長久以來未解決的問題。」

周總理知道我搞「工改兵」，很感興趣，先後找我談過兩次，詳細詢問了各方面的情況和問題，有一次還要我帶上專業幹部去匯報工改兵的問題。

周總理說：「現在全國的基本建設隊伍上百萬，存在三個主要問題。一是工效低，二是家屬多，三是調動不自由。用軍隊搞工改兵的辦法，如果把上百萬基本建設隊伍，改建爲基本建設工程兵，可以說會有如下的優點：一、可以提高工效，並且可以解決勞動力更新的問題；二、家屬按規定隨軍可以控制隊伍中隨隊家屬數量；三、可以調動自如；四、便於組織施工，並可以爲戰時做好準備。」周總理最後說：「工改兵是一個大問題，等於增加了幾十萬部隊，應當向毛主席報告，得到原則批准之後，再研究實施。」過了不久，大約是在一九六四年秋冬的時候，周總理領李先念、我等人向毛主席專門匯報了「工改兵」的問題。

毛主席肯定了「工改兵」的問題，周總理指定我搞試點組織領導工作。具體事情，由建委機關做。我們初建三個支隊，共計三十多個團及一些附屬分隊，約二十萬人，經過不到一年時間試點工作結束。這支隊伍在文化大革命中，轉戰東南西北，發揮了很好的作用。在試點工作的基礎上，周總理即決定：全國基本建設隊伍要逐步改建爲基建工程兵。進行的步驟則先中央，後各省市。周總理說：「我向毛主席提出，要找一個得力的人來管『工改兵』的工作。主席說，『誰發明這個辦法就讓誰來管，邱會作抓總不是很得力的嗎！』」

六九年冬周總理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了「工改兵」的方案，並指定我負責組織實施。爲此，我指定國家建委軍管會主任李良漢等連我自己七人組成規劃小組，進行規劃工作。經討反覆研究，規劃做出來了。

周總理看到規劃之後，很高興並大加稱讚。由於發生了廬山會議的問題，「工改兵」的問題也就壓下來了。

七一年「九一三」之後，中央專案組爲網織罪名，對組建基本建設工程兵的問題，對我進行打擊並對我進行了反覆審問。

「組建基本建設工程兵，是林彪以全國皆兵爲幌子，搞陰謀的組成部分，以便實現你們的軍國論。」

「全民皆兵的口號不是林彪提的，是毛主席提的。至於組織基本建設工程兵是毛主席、周總理批准、支持的，林彪當然知道，但林彪根本沒有過問過這個問題。『軍黨、軍國』是六八年八屆十二中全會之後江青提出的，林彪是堅決反對江青這一提法的，這與組建基建工程兵毫無關係。」這是我的回答。

「你邱會作篡奪了組建基本建設工程兵的規劃領導權。這是搞武裝暴動的力量之一。你就是企圖憑藉這支力量來控制全國的大後方。」

「我是受周總理的委託，搞組建基建工程兵規劃的，我每次受托總理都是在正式會議上交代任務的。有很多的問題，我也是同李先念、余秋里一起處理的。在規劃初稿上，起草小組提出了基建工程兵的隸屬關係歸總後或軍委工程兵。我修改時，明確提出了歸國家建委。」

「你表面上擁護總理，事實上是反對總理的。你會逼過總理，批准你搞的組建基建工程兵的規劃，企圖把總理拉到林彪的圈子裏去。你指示過李良漢要解放原中央基建政治部主任謝友法，這也是反周總理的。」

「你們提的這些問題，真是無稽之談。你們要想從我口裏搞周總理的什麼東西，即使你們解剖了我的屍體也找不到。」

現在看來，「工改兵」不能認爲是絕對正確的，但也不能說是錯誤的，在當時的條件下，有當時的作用，而絕不是什麼「政治陰謀」。

關於國防工業問題

全國解放以後，毛主席、周總理、林彪、賀龍、聶榮臻等就注意建設國防工業，並提到了重要議事日程。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國防工業系統是造反派衝擊的主要戰線之一，整個國防工業亂得難以收拾。當時，戰備工作緊張，而國防工業的工廠幾乎都在打派仗，很多工廠停產了。爲了扭轉局面，周總理建議派粟裕爲國防工業軍管小組組長^{讀書}，並由軍隊

派了數萬名幹部擔任軍管工作。六八年下半年開始，周總理提出了新的國防工業的領導方針，即將使用、生產、科研以使用為主，分別管理國防工業的方針。周總理的建議得到毛主席的贊同。爲了實施新的方針，中央決定分兩步走。第一步，由總部和海、空軍分管；第二步由中央軍委統管。

第一步先成立四個國防工業領導小組。以邱會作爲主成立常規兵器工業領導小組（具體辦事機構仍爲五機部）；以吳法憲爲主成立航空工業領導小組（具體辦事機構仍爲三機部）；以李作鵬爲主成立造船工業科研領導小組（具體辦事機構仍爲六機部）；以李作鵬兼管（周世忠主管）成立電訊工業領導小組（具體辦事機構仍爲四機部）。四個工業領導小組名義仍屬國防工辦，但事實上各自爲政了。這種辦法是過渡辦法，不能根本解決問題。

第二步，國防工業歸中央軍委統一領導。爲了加強對國防工業的具體領導，經毛主席、林彪批准，決定在軍委辦事組之下，成立中央軍委國防工業領導小組，並決定由我任國防工業領導小組組長，從此，國防工辦軍管會宣告結束，原來的國防工辦一分爲二。一部分由陳華堂帶到國家計委（陳任計委副主任）成立專管國防工業的機構；一部分由李如洪帶到軍隊（李任國防工業領導小組副組長）並任中央軍委工業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從六八年下半年開始，到七一年秋我倒臺爲止，我搞了三年多國防工業的領導工作，都是在周總理直接領導和支持下工作的。

第一恢復生產。從六九年開始，國防工業戰線的生產就大部分恢復了，絕大部分工廠都能正式生產了。以七〇年上半年爲例，國防工業完成全年生產計劃百分之四十八點五，在整個國家工業處於遙遙領先的地位。當時，國防工業生產恢復得那樣快，得到了毛主席的讚揚。

第二健全領導機構。從中央到各大軍區、各省市都建立了以軍隊爲主的國防工業領導機構統一領導國防工業（包括小三線）。爲了加強各大軍區對國防工業的領導，各大軍區成立了國防工業領導小組。

第三制定了發展規劃。軍委國防工業領導小組辦公室，根據生產的可能性和戰備的需要，提出了「四五」期間國防工業的發展規劃。當時的

計劃今天看來是高了，但當時在主席經常告戒「要準備打仗」的決策下，這樣的計劃恐怕還是低了呢。

第四整頓了國防工業的科研機構。航空、艦艇、通訊的研究院進行了整頓，調整了科研項目。常規兵器的研究機構，把分散的研究所集中組建了兵器研究院，並制定了科研計劃，這對兵器工業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七一年九月「九一三」之後，江青一夥控制的專案組對我進行了惡毒的攻擊。他們主要審問了我「奪取國防工業的領導權」等三個問題。

關於奪取國防工業領導權的問題。專案組說：「你要交代是怎樣取得了國防工業的領導權的？」

「我是服從中央的決定，擔負起領導國防工業的重大責任的！你們要是認為還有什麼問題，你們去問周總理。」

「你為什麼要用國防工業來搞垮國家的整個工業？你必須交代你的陰謀詭計！」

「對這個問題很好回答。國防工業生產、基建、科研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一條起決定作用的就是周總理親自抓國防工業的結果。難道周總理祇要國防工業不要地方工業嗎？」國防工業由軍委辦事組管，軍委辦事組是完全支持周總理工作的，抓好國防工業就是支持周總理，為周總理分憂。國防工業也是國家工業的一部分。國防工業有成績，黃永勝也是有份的，因為他是軍委辦事組組長，他大力支持我們抓好國防工業。但軍委辦事組抓國防工業，首先要清除國防工業系統的打、砸、搶分子，清除堅持鬧派性的造反派頭子，這是抓國防工業關鍵的關鍵。不是吹噓什麼工作成績，但成績又是存在的，軍隊的裝備改善了，戰備庫存增多了，工廠能夠正常生產總是事實吧。國防工業的一切成就都與周總理親自過問分不開的。其他工業系統為什麼落後，就是造反派在作怪。總理又受到有些人（指江青一夥）的牽制，所以生產恢復是有些慢。

陝西省委常委在京舉行擴大會議問題

陝西省委常委擴大會議，是在「九一三」發生前夕召開的，由於會議是由我代表中央政治局主持的，因此「九一三」之後，就當做重大問題之一，對我進行審查。

七一年八月間，中央軍委國防工業領導小組召開了全國國防工業工作會議，討論和制定國防工業「四五」期間的發展規劃問題。西安地區是全國國防工業的重要基地之一，因此，陝西國防工業存在的問題必須爭取盡快解決，否則就會影響全國國防工業的生產和整個發展規劃的實施。

陝西國防工業存在的問題我向周總理做了簡要匯報，引起了總理的重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周總理提出了陝西的問題，並要我先說了一下國防工業的問題。之後，紀登奎補充說了兩個另外的問題：一是延安地區沒有飯吃，已經有餓死人的現象；二是供應西安燃料的銅川煤礦停產，西安整個城市將成爲「寒窯」。討論中大家一致指出：陝西的問題非常嚴重，是九大之後全國最落後的省份了。

聽了紀登奎的話，周總理掉著眼淚說：「在戰爭時期，陝西人民寧可自己不吃小米、酸菜，讓給軍隊吃了。現在他們連飯都沒有吃，我這個總理真是對不起他們呀！我怎麼向毛主席交代！陝西問題一定要立即有效地解決。」周總理的話，感動不少人，使黃永勝這個很重感情的人也流了淚！大家一致擁護周總理的講話，會上立即決定三條：

一、採取最有效的辦法解決延安地區的糧食問題，絕對保證不能再餓死人。糧食調動由國務院業務組負責，具體的由紀登奎辦。運輸問題，由軍委辦事組負責，具體的由邱會作辦。

二、陝西省委全體常委到北京來舉行常委會，集體匯報和討論陝西的工作。

三、由邱會作、紀登奎兩人領導陝西省委在京的常委會。這就是陝西省委在北京召開常委會的來由。

七一年八月中旬，陝西省委在北京舉行了常委會，中央指定蘭州軍區政委冼恆漢參加。常委會開了幾天之後，揭露的問題很多，他們自己認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於是他們就提出了要擴大到會的人員，改爲常委擴大會，中央同意了他們的建議。

陝西的會議經過了三個階段。

會議的第一階段是省委常委會，他們感到壓力很大。我同紀登奎經常參加他們的會議，經過反覆的思想和認真交換意見之後，一致認識到主要問題就是三個。

一是農村吃飯的問題。延安附近的幾個村子都有餓死人的問題。全省其他山區，也出現了餓死人的問題。二是，全省相當多工廠停工、停產。其主要的原因又是原料、動力、交通三個問題。更嚴重的是，造反派還在公開破壞生產，甚至舉行武鬥攔截生產車輛。三是全省城鄉人民生活都很困難。

對以上三個問題，除了胡煒說「不要看成漆黑一團」之外，其餘的人都沒有異議。陝西省的工作爲什麼會落後，大家的思想基本上統一起來，綜合起來有三點：一是派性干擾破壞；二是工作重點沒有轉到抓生產上去，特別是農業生產沒有很好抓；三是省委軟弱無力，等於沒有政府。

對上面的問題，大家認爲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派性問題，造反派專了共產黨的政。這個問題不解決，要想轉變全省的工作面貌是不可能的。再一種意見是胡煒的意見，他說陝西的問題不是派性問題。

紀登奎、洗恆漢同意陝西的主要問題是派性問題，但祇同意一半，即同意派性的干擾，但對造反派專政的問題則從來不表態。我向紀、洗再三表示：「我對陝西的主要問題就是造反派的問題的看法不變，但在措詞，即表態的語氣上可以斟酌。」我們之間的看法顯然不一致。

會議的第二階段是省委常委擴大會。當時，國防工業工作會議還沒有結束，我忙不過來，周總理派李先念參加陝西省省委常委擴大會議。此後，對陝西省委擴大會議，李先念負主要責任。

常委擴大會議開始時，李瑞山首先傳達了常委會的精神。他說：我們工作落後最主要的原因是派性的干擾，由於派性干擾，全省基本上還是處於混亂之中。由於派性干擾，全省的工業生產、交通運輸情況都很不好。生產不好就影響了人民生活。由於派性干擾，迫使我們工作沒有重點，每天都忙忙碌碌窮於應付，根本不能集中精力和時間抓主要問題。

李瑞山說：對派性的問題我們省委常委存在認識不一致，我們常委多數人對造反派基本上是害怕的，不敢管，更不敢碰。從我個人的思想來說，害怕碰了造反派，會影響咱省委常委內部的團結，影響軍政關係。正是因爲這樣，我們省委就表現軟弱無力。

李先念聽了李端山的講話後，有一種不安的感覺。他對我說：「老邱呀，對造反派的問題能這樣提嗎？怕有問題吧？」紀登奎也說：「我同老邱說過，對造反派的問題，我保留意見。」我對他們兩個人說：「我認爲造反派的破壞是文化大革命的關鍵問題，我們軍委辦事組兩年以前就是這樣說的。事實就是這樣的，爲什麼不講，有什麼可怕的？陝西的派性問題得不到解決，這次會議就不能達到預期目的。」他們對我的意見沒有表態。

會議的第三階段是討論今後的工作方針問題。

在會議開始之前，李先念、邱會作、紀登奎三人向周總理和黃永勝做了匯報。我們提出了，以胡煒爲首的造反派對李端山提出消除派性的問題，心裏接受不了，這樣省委的思想還是統一不起來。

李先念說：「對造反派的問題怎樣提法請總理考慮。」

黃永勝說：「陝西的要害問題就是造反派搗亂，這個問題解決了其他問題就迎刃而解了。這個問題，可能會有來自其他人（指江青一夥）的阻力。」

周總理說：「邱會作在國防工業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和李瑞山在省委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的紀錄稿我都看過。對造反派的問題，李的講話是根據邱的講話的精神而來的。邱對陝西工作的要害確實是抓住了，但又要防止阻力太大反而妨礙了陝西問題的解決。可以考慮這樣辦：（1）邱的講話稿暫不印發；（2）對派性和造反派的問題，由李瑞山自己提出來；（3）對省的黨政軍主要領導幹部的思想工作要做好，力求他們在思想上、行動上一致。」對總理的意見，大家都同意。周總理又提出：爲了很好解決陝西的問題，我們幾個人分頭同他們的黨政軍領導幹部談一次話，做細緻的思想工作。

常委擴大會議對今後的工作方針和怎樣貫徹的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根據會議的討論，李瑞山做了總結發言，他對今後的工作提出了四條方針。

七一年九月五日中央政治局接見了陝西省委常委擴大會議的全體人員。李瑞山代表省委做了全面的匯報。李講完之後，胡煒接著發言。他發言的基本精神都偏向爲造反派叫苦了。這時張春橋插話：「造反派是革命

派。幹革命不能沒有錯誤！胡煒聽到張春橋的插話之後，他聽出了中央政治局對造反派有不同的看法，於是就停止了發言。

張春橋發現了他的兩句插話的影響，他即興火上加油地發表了很激烈的講話。他講話的重點是與李瑞山的匯報針鋒相對的，他不同意提造反派的破壞作用。他說：「革命造反派在鬥爭中發生某些錯誤，同省委書記在工作發生某些錯誤，是一樣的道理，爲什麼造反派就不能犯錯誤？今天對造反派的錯誤不是指責的問題，而是教育的問題。」

此後會場反倒無人發言了，周總理對著我說：「你講幾句話。」

七一年四月底，批陳整風匯報會時給我們下了結論，說我們在廬山「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在組織上犯了宗派主義的錯誤」，這樣江青、張春橋他們神氣了。我當時思想肯定也有顧慮，但爲了工作我也沒服軟，我說：「陝西存在問題的要害是『派性干擾，造反派的破壞』，這兩句話是我講的。我的講話並不是憑空說的，我們派了以裝甲兵副司令員林彬同志爲組長的調查組，在西安做了一個多月的調查，材料是確實的。」沒想到這時總理態度突然變了，他插話說：「所謂的材料！林彬來了沒有？」林彬坐在比較遠的地方大聲說：「邱副總長講話的材料是我提供的，由我負責。我的材料是確實的。」黃永勝坐在我的旁邊，他看出我了還要講話的樣子，於是，他咬我的耳朵說：「不要再說話了。」我也只好忍下去了。陝西的會議這下給張春橋攪黃了。

中央政治局會議結束之後，我拉著黃永勝一起同周總理說話。我對總理說：「陝西的問題，我認爲我的看法是正確的，並無惹禍之心。總理對我的間接批評我是不會在意的。我擔心的是，這次會議之後，陝西可能會出現更大的反覆，我建議總理注意陝西事態的發展。」周總理說：「我沒有否定你對陝西問題的看法，你的看法是對的，祇是不要把造反派這個問題提到桌面上來，那樣越搞越被動。林彬同志也是對的，你給他講清楚，我心中是有數的。對陝西的問題，我們都要注意。該省的問題同戰備關係比較大，軍委辦事組還要同過去一樣，多注意一點。」

黃永勝說：「我們也很困難啊，搞了半天讓別人兩句話就吹了！」

周總理說：「這是暫時現象，三中全會以後你們就會更好工作了。」

七二年五月間，中央專案組把陝西省委在北京舉行常委會的問題，對我進行了難以想像的誣陷。

「企圖奪取陝西省的領導權，是你搞的陝西省委在北京舉行常委會的主要目的。」

「陝西省委在京舉行常委會，是周總理在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大家一致同意的。有的人還讚揚說，這種辦法也是解決地方問題的一種方法。」

「你爲什麼要堅持陝西問題的要害就是派性問題，就是造反派的破壞。」

「事實就是這樣。我當然要堅持我的看法。」

「黃、吳、李、邱你們幾個人都有分工，你是負責鞏固後方的。你的計劃是首先佔據陝西，進而佔領整個西北和向西南進軍。」

「我今天是第一次聽到還有這個說法。你們這麼搞，我就沒有什麼可回答的。」

「還有，你打擊胡煒就是打擊西安的造反派，你的罪責是逃不脫的。」

「你說過，西安地區的造反派是胡煒一手搞起來的。陝西工作落後了，胡煒要負主要責任。」

「我說過這樣的話。實際上，我們辦事組對胡煒是重用的。九大安排了他爲九屆中央候補委員，後來又當了蘭州軍區副司令員。按照軍隊的幹部情況，對胡煒的使用，不僅不低還略爲高一些。他畢竟是個抗戰時期的幹部。」

「胡煒在廬山會議是反對你們的。你們對他懷恨在心。」

「我是參加西北小組的。我祇知道胡煒旗幟鮮明地擁護林彪的講話，他在小組會上第一個提出要點名批判反對毛主席的人。」

關於「九六」問題

七一年四月底批陳整風匯報會之後，中央的政治情況是比較「太平」的。周總理除了不斷傳達毛主席對國際問題（主要是對美國）的指示之外，沒有發生什麼新的問題。

毛主席在七一年五月以後到八月中旬以前，都在中南海沒有外出，也沒有發表過重要指示。主席還是很關心戰備的，七月底曾叫黃永勝去談過戰備問題。

林總在北戴河也不外出，不說話。幾個月來，林總連軍隊的具體工作也沒有發表過任何指示。我同北戴河除了半月二十天打個電話問候一下之外，其餘就沒有過什麼聯繫。

最能看出問題的是江青一夥的活動了，江青兩次去海南島休養，然後去青島，還計劃要去井岡山，張春橋也回上海住了不短的日子。

周總理是一個老練的領導人，他是中央政治的「寒暑表」，中央內部祇要有事，我們是能夠從各種不同的側面觀察出來的。即使不能搞個清楚，也會知道一個大概。

周總理對林總同江青的鬥爭，在「九一三」之前是一貫站在林總一邊的。批陳整風匯報會之後，周總理對軍委辦事組態度同過去完全一樣，軍委辦事組對總理的工作依然如故地支持，在生活上也是很關心的。

周總理沒有休息時間，這是眾人皆知的。在文化大革命緊張的時候，我們也曾考慮過要設法拉著總理略為休息一下，這種打算曾經實現過，但多數時候都實現不了。我們每個月總有三兩次，拉著總理一起休息，在一起吃飯、看電影。每次總理都可以休息兩三小時。對我們關心周總理的生活，鄧穎超很清楚也很感激。她有一次對我說：「你能拉著總理休息，你們能辦到的事，我們都辦不到。」

周總理能夠「順從」同我們一起休息，是可以說明問題的。如總理早就知道毛主席的打算，即使他不說，也會同我們疏遠一些的，能夠同我們在一起休息，可以說明總理同我們之間是沒有隔閡的。另外，從工作上的問題也可以觀察到政治情況，我們同周總理的工作關係依然很密切。

第一件是國防工業會議。在會議開始之前，即八月上旬周總理到軍委辦事組來聽取匯報，在匯報開始的時候，我說：「總理今天來聽取國防工業工作的匯報，對我們的工作是很大的鼓舞，我們國防工業領導小組向總理致謝！」總理笑著說：「你不要謝我，我倒是要謝你的。你為我挑起了三個擔子；一是，總後的工作不用我管了，特別是供應上不找我的麻煩了。二是軍事外援的日常工作全部擔起來了，我很放心！第三是國防工業問題，毛主席、林副主席都是十分關心國防工業問題，這個問題過去佔我的時間很多，現在邱會作同志管起來了，並且管得很好。」周總理最後說：「軍隊對政府工作是大力支持的，我向軍委辦事組表示謝意。」

黃永勝說：「總理對軍委辦事組，對軍隊的工作鼓勵很大，我向總理表示感謝！今後我們在毛主席、林副主席、周總理領導下，努力學習，改正缺點錯誤，爭取把工作做得更好！」

周總理情緒很好，心情愉快，對國防工業工作會議的問題，做了詳細的詢問。然後對一些主要問題，如工業佈局的問題，鐵路支線建設等問題都當場拍板定案了。

第二件是聽取了閻仲川對「三北」戰備的匯報。這次匯報由黃永勝主持，對修築工事等三個問題，總理當場拍板定案了。這對戰備工作是一個有力的支持。

第三件是對四屆人大政府的人事安排問題。周總理提出來的四屆人大政府人事安排，黃、吳、李，邱都在國務院和人大常委會領導人的名單之中，對這樣的問題，如果毛主席對軍委辦事組有什麼戒心的話，周總理是不會向毛主席提出這樣的人事名單的。事後，有人說這是毛主席的煙霧彈，這我就搞不懂了。

毛主席八月下旬南巡期間，李作鵬陪同朝鮮軍事代表團去武漢、湖南參觀，是九月五日下午回到北京的。九月六日下午軍委辦事組，各總部、軍兵種的有關負責人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接見朝鮮軍事代表團，然後即隨周總理一起去朝鮮使館參加代表團舉行的答謝宴會，我下午不到三時就到了北京廳。

我走進北京廳就看到黃永勝、李作鵬兩人在西南角上談話，我本也想去湊熱鬧，但怕影響他們談話，就沒有去。我想他們肯定是談毛主席南巡有關的問題，因為李作鵬才由南面回來，可能聽到了什麼風聲。外賓將要來之前，黃、李各自歸位了，李作鵬同我挨著坐在一起。我問李他們剛才在談什麼？李說：「你要知道了，準會把你嚇死！」

「你知道了都沒有嚇死，為什麼我知道了就要嚇死？！」

「我可以同你說，但有兩個條件：一是，不准同北戴河（指葉群）打電話；二是，不准同胖子（吳法憲）說，要不遵守這兩條，我一句也不講。」

「可以！」我說。

在去朝鮮使館的路上，我上了李作鵬的車，在車上他同我談了在武漢劉豐同他談的毛主席談話的內容。毛主席在武漢找到劉豐、華國鋒、汪東興談話，主要是說「廬山的問題還沒有完，……陳赓楚懷巒還有

人，……反對自己的老婆當辦公室主任，……」，並讓劉豐在三中全會上把這個問題提出來，等等。

我完全遵守李作鵬提出的「條件」。他同我說的話，我不僅沒有同北戴河打電話，也沒有同吳法憲說，更沒有同別的任何人說。但是，我心裏的感覺是沉重的，我的心裏沉重倒並不是自己怕什麼，祇是感覺主席這種做法欠妥，有什麼問題，如果在會上談，當面談，什麼問題都好解決，這樣在背後搞，越搞越亂。當然，這也是我模模糊糊的想法，是不敢深想的。一句話：聽毛主席的就是了。

第四十章 在秦城的日子裏

押進秦城監獄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八時，由衛戍區警衛三師把我送進了秦城監獄；八一年九月十一日上午八時，我被「保外就醫」離開了監獄。我在秦城監獄關了四年九個月又十天，加上從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起到七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在衛戍區關押的五年三個月的時間，到我出獄時，已經同社會隔離了整整十年了。

我出獄時是六十六歲。這六十六年我是這樣度過的：在家鄉，窮苦農民的孩子十四年；在革命隊伍裏，為推翻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打敗蔣家王朝，創立新中國，槍林彈雨、南征北戰，為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積極工作、努力奮鬥，四十二年；在「自己」班房裏，忍辱為黨、含辛茹苦，十年。這是多麼慘痛的歷史。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晚飯後，我正在院子裏散步，突然從有線廣播裏，發出了緊急通知：四組的全體人員，除留一名值班的之外，其餘人一律到司令部辦公室開會。

過了好一會，H副連長回來了。他支開值班戰士後，他就同我一起在院子轉圈子。

稍過片刻，他對我說：「你八點鐘要離開這裏！」

「到哪裏去？」我問。

「沒有想到，是到秦城去！」他看了我一眼，又說：「要有遠不如這裏的思想準備，但也不要太悲觀。」

我聽後的確很震驚。但我故意若無其事地說：「我到哪去都可以，我們相處四年，我是什麼樣的人，你還不知道？他媽的，有什麼了不起！」

「正因為如此，我才敢跟你說。今天我鄭重叫你老首長，我相信黨，也相信老首長！對你們幾個人（黃、吳、李、邱）的問題，我們衛戍區的人不管接觸過你們沒有，都對你們表示同情。粉碎『四人幫』之後，你們是應該解放的！」

他接著說：「周總理去世後，你們就由葉帥管了。周總理管得很具體，總理去世後，實際上就等於無人管了。我們曾接到過通知，一九七四年『五一』節就決定要把你解脫，安置到外地去，後來沒信了。七五年春節前，又決定把你們送到外地去安置，後來也沒信了。總之，對你們幾個人，毛主席、周總理生前還是當作大事來抓的。我說這些是讓你有信心。」

H副連長擔著風險和我說這些話，實在難能可貴！

聽到這突如其來的消息之後，我的心情是難於形容的。我用最大的毅力克制自己，仍然鎮定自如。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午八時，我進了人大會堂北門，才知道災難臨頭了。但毛主席、周總理在審查我們時，不論給我們戴上什麼「帽子」，把我們還是當成黨內問題審查和對待，生活上一點不虐待。而且，七三年以後因為沒有查出什麼名堂，審查也就停止了，一直閒呆著。就是這樣，主席也沒有說把我們關進秦城呀。

大約晚上七時半，師政委和四組的幾個人來了。除此之外，還來了兩個不認識的人，他們戴著口罩向我宣佈說：「你今天晚上離開這裏，到另外的地方去。日常生活用品帶上，學習的東西一律不帶。」他的話音一落，由外間進來兩、三個人，清查我的東西，那兩個新來的人一直盯著。我的東西分兩部分，一是書籍，二是寫的材料底稿。把我的東西收拾好以後，新來的人指著爐子下面殘存的紙灰說：「有用的東西都沒有了！警惕性不高呀！」新來的人對四組表示不滿是很顯然的。臨走前四組的人給我送來了最後一頓晚飯。其飯堪稱豐美，有燒雞、蒸臘肉等幾個菜。新來的人一看，又不高興。我知道到秦城是要吃苦的，管你媽的高興不高興，先吃了再說。

大約晚上八時整，師政委發出命令說：「上車，出發！」在院子門口的路上排了一串汽車和摩托車。我坐在一輛吉普車裏，車前面坐著常給我看病的師醫院的老所長，我和兩個看管幹部坐在後面，他們一邊各一個。大約走了一個小時之後，能看見監獄的大門的時候，我就感到有些

熟悉了，我們在離監獄大門幾十米遠的地方，司機加大了油門，汽車加速前進，連續進了三道大門，等進到監房區之後，汽車慢了下來，車停在二十一號監樓，因怕人看見，秦城的監管人員，把我連拉帶推地推進了監樓院子內，從監獄的樓門，一直推到樓內三層的監房裏。

七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晚上約十時，進入秦城監獄五道鐵門之後，才知道自己成了囚徒。這是自己無知吧？不是！最主要的是自己對黨忠誠。我對毛主席，對共產黨，對自己，無論過去和現在，在什麼時候都是相信的。因此，我從來也沒有想過自己會變為共產黨的「敵人」，我相信我的信念是正確的。我過去、現在和將來，永遠都不會是共產黨的敵人！也不會成為國家和人民的敵人！

老幹部的歸宿

由衛戍區把我押進了秦城監獄。從此，我進入了最黑暗的地方！

這究竟是為什麼？我的腦子裏一直在想這個問題。但無論從什麼角度來考慮也想不通。如果打倒「四人幫」之前，把我關進監獄，我是決不會想不通的；在打倒「四人幫」之後，我真是比誰都高興，認為起死回生的機會來了！怎麼還把我關進秦城監獄？真是毫無理由。因為我同華國鋒、葉劍英既無公仇，更無私憤。我甚至夢見葉帥通知我重新工作，鼓勵我放下包袱好好幹。現在我對他們完全失望了！

不久，監獄一個穿便衣的人，開始查點物品。對我帶去的物品，凡是帶有帶子的物品都把帶子絞斷。在交接完物品後，他們要摘掉我軍衣上的領章和帽子上的帽徽，這些本來對我毫無意義的東西，但我也不知道從哪裏來的勁，向獄方進行了頑強的反抗！我從小參加紅軍穿上軍裝，從來沒有離開過軍隊，從來沒有脫過軍裝，現在要扒我的領章、帽徽，真跟要我的命一樣！監獄的人兇狠狠地指著我身上的領章和帽徽說：「這些東西你自己扒下來！」

「辦不到。我的領章、帽徽國民黨沒有扒下來過，因為我沒有當過俘虜！」

「這是什麼地方？！所有命令你都得執行、服從！」

我已是六十多歲的人了，他們年輕力壯訓練有素，我雖然扭不過他們，但他們也沒有扒下我的領章帽徽。正在爭執得激烈的時候，外面進

來了一個人說：「不要搞那些事了，以後不穿就是了。」一場針鋒相對的鬥爭就停止了。

衛戍區押送的人，臨走時都站在我的牢房門口看了我一眼。他們的眼裏都充滿困惑，我望著他們每個都很熟悉面孔，都充滿感激之情。H副連長站在人群的後面，一直在向我遞送友好的眼神。師政委站在大家的前面真誠而又無奈地看著我，他對我說：「我們走了。希望你像過去一樣，一定要相信黨，有信心！」我聽到師政委的話，眼淚一下就流出來了，因為他們待我還像同志，有親切的感覺。衛戍區和監獄的人都走了，但還有一位軍官在我的牢房踱小方步，他自言自語地說：「看來你精神很不好，這是可以理解的。你過去常要別人正視現實，你的話是對的，現在就輪到對自己了。希望如同過去一樣，正確對待自己的問題。你到這裏來，可能會發生一些你想不到的困難。」

由於房子太冷，怎麼也不想躺下，我就到走廊上去小跑步。快天亮了，實在支持不住才睡下。我躺下之後，翻來覆去怎麼也睡不著，那位軍官進到牢房站在我床跟前，自言自語地說：「房子確實太冷，暖氣管子不好使，溫度上不來。」他出去一會就抱來了一床被子，並提來一個電爐子。牢房裏沒有插銷，電線是從外面拉進來的，電爐子接通後，那位軍官對我說：「電爐子由值班的管著，這點你要遵守！」我什麼話也沒有說。牢房祇有幾平方米寬，電爐子插上後，房子立即暖和了。

現在想起來，當時的當權者是匆匆忙忙決定把我們關進秦城的，秦城方面幾乎毫無準備，暖氣都是壞的。沒有準備好就把我們關到秦城，可見這幫當權的傢伙多狠心。把我們關進秦城是一個重大的歷史錯誤，完全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他們既然已經把我們放到斜坡上往下推，那就收拾不住了，後來鄧小平、彭真等人又借勢踹上一腳，一踹到底了。

現代黑店

「秦城」這個地方，位於北京以北的沙河鎮，離城裏約四十五公里，大概是六〇年蘇聯援建而成。在毛主席生前，主要是關國民黨高級戰犯；從文革開始，國民黨高級戰犯，一個個釋放、優待；共產黨高級幹部一個個關押、嚴懲，共產黨的老幹部去秦城「接防」了。八一年我離開秦城

時，監獄長和我談話時開玩笑說：「想開一點，就當這裏是高幹療養院。」我當時心裏一怔，我們的黨怎麼搞成這個樣子，你在臺上，他去秦城「療養」；他在臺上，你又去秦城「療養」。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上海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之後，以葉劍英元帥為首成立了「首都工作小組」，由楊成武牽頭，對首都的要地進行實地勘察，我參加了這一工作。城裏的許多高層建築物，如郵電大樓、電視大樓、中南海周圍的建築物、城外的玉泉山、西山、秦城等地都查看過。參加勘察的有：楊成武、王尙榮、李靜（作戰部副部長）、萬里（北京副市長）和我等人。我們去秦城是一天下午四時左右，因為時間晚了，對整個監獄就沒有全面觀察過，祇在辦公室聽監獄的負責人匯報情況。我還同王尙榮兩人到監區的門口去望了一眼，我同王尙榮開玩笑說：「你看這麼仔細幹什麼？是不是來為自己看房子的！」王尙榮說：「我這輩子是不會來住的，這點是肯定有把握的！」他說得對，名副其實的老革命，身上又無半個反革命「細胞」，哪裏會去想要進「自己」的監獄呢？沒想到跟著共產黨打了一輩子反革命，最後自己竟成了共產黨的「反革命」，關進了「自己」的監獄，真是千古奇聞！

監獄區一律是按一個圖紙建造的三層樓房。樓房的結構都是「U」型的。北、東、西三面是樓房，南面是敞口。監房都是一面走廊，一面是牢房。每一層監樓之內，有十一個監房，每個監房約有九平方米，其中，不到四分之一的地方安裝了一個抽水馬桶和一個小水池；不到四分之三的地方放了一張地鋪一樣的單人矮床，其餘的就什麼也沒有了，即使有也沒有空間了。房子要比一般房子高很多，窗戶是毛玻璃，窗臺很高。裏面看不到外面。我在監獄期間轉過幾十個監房，大體都是一樣的。

我關進監獄之初是「三九」天。室內的暖氣幾乎沒有，凍得全身疼痛，祇有鑽在被子裏過日子。關進監獄的第三天下午，那位軍官來問我說：「你怕不怕冷？」我回答說：「又怕又不怕。落到這個地步，就什麼也不怕！」他沒有再說話，就領我走到樓底下的院子去散步。這是我進監獄後第一次見天地。在整個院子裏，除了看到很高的圍牆和電網之外，就看到了一排一排沒有屋頂的房子。對那種「房子」，我無論如何也想不到是幹什麼用的，一年半之後，我光顧那「房子」時，才知道是囚徒的放風場。所謂放風，就是讓你從牢房裏出來透透氣，時間半小時，每個

放風圈約有十米見方，囚徒在裏面活動。監獄對放風的規矩很多，颯大風、下雨不放，天太冷不放，監管人員有事不放，星期日照例不放，監管人員不高興不放。總之一個月平均能放十次風就很好了。有一次，我有二十多天沒有放過風，走出監樓的時候，立即感到眼睛被陽光照得很難受。放風是囚徒的享受之一，囚徒在放風場裏放風，彼此可以聽到咳嗽的聲音，但見不到人。放風場圍牆上面有警衛走動，祇要看到你不「規矩」，就會馬上被制止。

在秦城度過了將近五年的時間，過的是真正的飢寒交迫的囚徒生活。所謂囚徒生活，就是同豬狗無異。吃什麼、吃多少在獄方看來都是監獄「施捨」的。在衛戍區是愁吃不了，在秦城是愁吃不飽，而且吃得太差。在戰爭年代，我得了嚴重腸胃病；在文化革命期間，我被造反派打成重傷，因此，我是很怕吃冷食的，受涼就渾身痛。我並不講究吃什麼，穿什麼，中心問題是保護肚子，不至於天天拉肚子，但恰恰相反，我在監獄裏住的是寒室，吃的是冷食、粗食，這對我的身體是嚴重的傷害。

每次飯來了，我用手一摸，祇要冷的我就不吃了，吃了就拉肚子。這樣持續了有三、四個月。大約是七七年四月間，監管員突然問我：「打來的飯，你爲什麼不吃？」「太涼了，我不能吃冷的，我進監獄之初，衛戍區的醫生不是向你們介紹過，我吃什麼都可以，就是不能吃冷的。因爲我在戰爭年代得的腸胃病，一直沒治好。」「這裏就是這樣的伙食，要別的沒有！」聽到監管員的話，我就冒火了！我大聲地說：「給我吃什麼，是你們的權力。我決不吃冷的豬狗食！這是我的權利。」囚徒的死活，監獄是根本不在乎的。

爲了解決不吃冷食的問題，每天早晨送飯時，我有時就要兩個饅頭，吃一個，留到中午吃一個，泡點開水就可以吃下去。有一次，我放風去了，回來一看，我被子裏的饅頭給沒收了。這下我可憤怒了！當天，晚飯我也沒有吃。這樣，他們心裏倒有些著急，晚上，一個沒有見過面的人，提來了一飯盒熱氣騰騰的麵條。他一進門就說：「飯很熱，快吃點吧！」我也很「知趣」，一句話沒說就吃開了，因爲我的肚子已經餓得相當難受了！對我們這些人，政治上壓迫我們，生活上總不該受虐待吧！？但上面態度惡劣，不把我們當人看，下面就胡作非爲。

從關進監獄起，到七七年的九月，飯食是直接送到我的牢房裏的小桌上，後來突然把房門關了。監房門的下端有一個約二十公分見方的小洞，和我的家鄉狗進出的洞一樣。監管員送飯來的時候，一定要我自己把碗從洞裏送出去，這是新的送飯方式。第一次是一個女監管員，她在外面叫喚：「拿碗來打飯。」我根本置之不理。她提著飯盒就走了。不久，換來一個男的又把飯送來，在外面照樣叫喚，我還是不理。後來，他打開門把飯送到我的桌子上，並且說：「監獄就是這個規矩……」我當時很氣，即說：「我永遠不從狗洞裏要飯吃！」此後，他們送飯照樣送到我的桌子上。自從進了監獄，伙食總是一個樣。主食就是饅頭、窩頭、米飯，米飯裏沙子還特別多，副食就是水煮白菜、水煮土豆，有時裏面有幾片肥肉。

十月一日的晚飯，監管員送來了兩飯盒餃子，提進牢房來時還冒熱氣，心裏當然有幾分歡喜。不過，我高興得太早了，餃子是羊肉餡。我向來不吃羊肉，可是饞得很，就決心勉強吃下去，但事不由人，吃了兩三個之後，就反胃了，全都吐了。不久，監管員來了，他一看沒有吃就不高興地說：「爲什麼不吃？」「我不吃羊肉。」他提著飯盒就走，過了一回兒，監管員送來兩個冷冷的窩窩頭，我把冷窩窩頭用開水泡了一個，由於吃了冷窩窩頭，引起腸胃病，上吐下瀉。但國慶放假，沒有醫生，這就是我的國慶節。回想起四九年開國大典時，在毛主席「將革命進行到底」的號召下，我們正在進行衡寶戰役，並取得了殲滅白崇禧鋼七軍的決定性勝利，我在《紅旗飄飄》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向新中國獻禮》。江山都打下來了，萬萬沒有想到，二十多年後的國慶節是在秦城監獄這樣過的。

公審以後，從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午起，我的伙食標準更因徒化了。監獄對我有三條明顯的變化：一是伙食變得更糟了。主食，每頓早飯是稀飯和饅頭，中午是窩窩頭，晚上是粗米飯。副食，就是大白菜幫子加白水，別的什麼也沒有。這種伙食，實在是苦呀；二是無論如何不給安眠藥了；三是房子更冷了。凍得實在睡不著，我就起來在房子裏踱步，走累了又睡。

關進秦城近五年時間，起初我的衣服和用品還是夠用的，到七八年底，我的用品就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除了還有一套破棉衣、破單衣

之外，就什麼也沒有了，連背心、褲頭等都沒有了。從七七年秋天起，我就想到了冬天的穿著問題，我曾經無數次提出要衣物。監管員從來也不說給或不給，就是不予解決。

「爲什麼我自己存在監獄的衣服都不給我穿？」我直截了當問他。

「自己的？還有什麼東西是你自己的？你是糊塗了？」他也是直截了當地回答。

「又沒有宣佈沒收我的用品，爲什麼不是我自己的？你們也太殘忍了吧？」

「殘忍！對你們幾個比對別人還好十倍呢！」

天快冷了，爲了解決肚子受凍的問題，我把所有破爛共有大、小十餘塊從床頭櫃裏拿了出來，試圖做條「圍巾」，能夠圍在肚子上護著肚子就行了。我向監管員借來針、線，連續好幾天才拼縫在一起。我有生以來從沒用過針線，在縫製的過程中，多次刺破指頭，鮮血直流，並且還常把破爛和褥子縫在一起，縫了又拆，拆了又縫，自己既心酸，又苦笑。但經過艱苦勞動，終於把「圍巾」縫成了，我感到很滿意，護肚子的问题解決了。圍巾縫好後獄方知道了，他們認爲有長度的物品是危險品，就向我嚴厲指出：「把你的長布條交出來！」我堅決拒絕。就在爭執、互相扯起來的時候，布條被扯斷了。那天晚上，我把床單子撕下來了一半，睡覺時圍在肚子上。第二天上午，來了兩個監管員氣勢洶洶地向我耍起威風來了。

「你把床單撕下來幹什麼？」

「我有胃病，你們連個背心都不給我穿，肚子著涼就得病。圍在肚子上就好多了。」

「你這是破壞公物。」

「什麼破壞公物！？你們是迫害！」

七八年的十一月底，監獄讓我出去放風，我赤著腳就走了。因爲我從衛戍區穿去的一雙棉鞋穿透底了，襪子根本沒有。我走到監樓門，監管員看到我赤著腳就一把我拉回去。那位監管員看了一下我的棉鞋破得實在不像樣子，就給我拿來了一雙舊鞋墊，我就靠著那雙鞋墊子過了一個冬天。七九年冬天，監獄待我似乎稍微爲好了一點，給我發了一雙舊棉鞋和一雙線襪子，解決了凍腳的問題。

在監獄得病是最苦的，我的腸胃病和腰痛病根本得不到治療，我是長期服用安眠藥的，但獄方根本拒絕提供安眠藥。睡不著覺的苦楚，不失眠的人是根本不理解的。有個男醫生，對我要安眠藥，總用侮辱的語言給予拒絕。例如他說：「安眠藥不治病，是高貴人圖舒服的！我們監獄供不起安眠藥。」

我的腰和肩胛骨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打成重傷，一直未好，一著涼或不小心，就發作，疼痛難忍。我要求治療，獄方理都不理。我的腸胃病也經常發作，黃連素對我的病效果比較好。關進監獄之初，還給過幾次黃連素，以後不給了。如果我要的次數多了，醫生就會說：「這種藥不便宜……」其實黃連素是最便宜、最普通的藥。

監獄每半月洗一次澡，但有幾次都是下午洗操，水是冷的，我祇好不洗穿起衣服又回來了。一次值班的問我：「爲什麼那麼快就洗完了？」我回答說：「水冷了，沒有洗。」他對我說：「是監管員先洗之後，才叫你洗的。水當然冷了。」我聽到他的話，真是火冒三丈，我心想，囚徒的「福利」本來就很有限，現在連僅有的一點福利都被剝奪了。

監獄裏的鬥爭

在近五年的時間裏，從我接觸到的監獄工作人員來說，大換有三批。首先接觸的是軍人，一個穿便衣的也沒有。其次是監獄的老工作人員，他們年齡比較大，同囚徒打交道很有經驗。第三批是衛戍部隊的復員戰士。從我的實際接觸來看，最後這一批人最好，我在監獄裏的鬥爭，主要是第二批人，即「老監獄」居多。

一是關監房門。監房有兩重門，裏面還有一層鐵柵門。鐵門很重，開關都很費勁。一次放風回來，我在前面進了監房，監管員在後面說：「進去自己把門關上。」進了門之後，我即坐在床上，不予理睬，監管員站在外面一個勁叫喚：「全監獄祇有你不聽管理！」我對監管員說：「你讓我自己關自己，這辦不到！」

二是擦地板。監房每週要擦一次地板，並且要同監管員一起進行。這點勞動，爲了自己衛生一點，是可以辦的。但有一次，一個監管員腦子裏不知發了什麼「熱」，他不給拖把，祇給一塊破布，硬要我彎著腰跪著擦地板。我不幹，連破布也不接。於是，我們就對著幹開了。

「你爲什麼不擦地板？」他神氣十足地問。

「把拖把拿來，我就擦。」

「今天要用布擦。」

「那我堅決不擦。」

事有湊巧，我們正爭執得熱鬧時，有三個人一起來查監了。那個監管員，不知爲了什麼，轉身就走，不同我吵了，我的災難也就免除了。

三是理髮。囚徒是監管員給理髮的。理髮時，要是遇到了比較好的人就少受罪，否則就遭大罪。「心狠手毒」的人借理髮整人。他把腦袋理得狗咬一般，還有意從脖子向衣服裏弄進去好多短頭髮，理髮之後，不僅沒有熱水洗澡，即使弄點熱水擦一擦身也難。理一次髮就是受一次大罪。爲了理髮少受罪，我堅決要求剃光頭。

四是放風。如果遇到惡毒的監管員，他可以晚放風，早收回；冬天可以把你放到背陽的放風場去，夏天則相反。

五是扒在地上寫字。七九年十二月，中紀委審查小組對我重新審查以後，寫資料的時間很多。我的房子祇有一張矮桌子，寫字時幾乎要彎成九十度。我的腰痛得難忍，我祇好扒在地上寫資料。事情真巧，有一天中紀委審查小組的劉寶慶、祖連坤（可能是正副組長）到監房來看我，恰好我正扒在地上寫字。姓劉的進門看到此情此景「啊」了一聲，扭身就走了。但壞事變成了好事，一小時後，監獄就給我送來了一張高桌子和一把椅子。從此，我就可以坐在凳子上寫字了，直到審查完畢都是這樣的。

六是同小法西斯的鬥爭。七八年夏秋之交時，一個年齡不大的監管員領我出去放風。他讓我進到一個長久無人去過、雜草叢生的放風圈裏，並惡狠狠地向我說：「你把圈裏的草給老子拔了，要不我就不客氣了！」說話時還把拳頭伸了出來。

我進到放風場後，就坐在小凳子上連動也沒有動一下。不久我把馬扎的木條拆下來，準備自衛！站在放風圈牆樑上的值班警察看見了，他是一個很好的青年，很懂政策，可能報告了。就在一觸即發之際，兩三個人趕來了。他們到了之後二話不說，就把那個監管員拉走了。然後，另一個監管員把我拆掉的馬扎凳子及兩根橫檔收走了。

第二天上午，我又到昨天那個風圈裏放風，風圈裏的草已經拔乾淨，衛生也打掃好了。在風圈上面值班的還是昨天的那位警察。他樂呵呵地向我說：「今天不需要準備戰鬥了。如果再有昨天那樣的事，大指揮官就要親臨戰場了！」他說的「大指揮官」就是監獄的領導。

到關我們的時候，秦城關的人可以說都是共產黨自己的「囚徒」了，受到屈辱大家一般都忍耐著，如果發生了衝突，那的確確是忍無可忍了。

有一次在我的監樓內，發生過持續時間不短的爭吵聲，爭吵是因吃不飽引起的。

「多打一點。」

「糧食有定量！」

「爲什麼不讓吃飽？你們所謂的定量，就是餓不死吃不飽吧！」說完有人就把碗砸在地上，並高喊「你們是吃人的法西斯！」很清楚，爭吵是由於囚徒吃不飽引起的。這個問題，以我自己的親身經歷也可得到解釋。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宣判後，每天早飯是一碗稀飯，一個饅頭，中午是一個玉米窩窩頭。

囚徒吃不飽飯，是古今中外的老問題，並不是什麼新鮮事，但在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裏的囚徒也吃不飽飯，尤其是對我們這樣出生入死打江山的人，也不給吃飽飯，就不是平常的問題了，應當是嚴重的政治問題。

七九年，我搬回二十一樓北樓，在西樓和東樓都各有一個女囚徒，她們幾乎每天都要唱歌。那兩位女囚徒似乎有「預約」，差不多每天都是同時唱歌。她們唱的歌大都是延安時期的歌曲和抗戰時期的歌曲，雖然我不太會唱歌，但這些歌曲畢竟伴隨過我的青春，那個戎馬生涯的時代，因此我聽了是又氣憤又酸楚。

除了女囚的聲音之外，還聽到男的歌聲，他唱的好像是京劇《紅燈記》。

另外，還有一個能顯示囚徒精神的是春節之夜，特別是女囚徒的精神，更使人敬佩。我在秦城監獄渡過了五個春節，但七九年的春節令我印象最深刻。

七九年春節，除夕之夜的晚飯後，監獄的有線廣播播放了音樂節目，女囚徒跟著音樂都唱起來了。不久，監獄給我發了兩個蘋果，三、五塊糖和一小把花生。發食物後，女囚徒還是在唱，但是不久女囚徒的歌聲就變成哭聲了。她們都以念及自己的父母、丈夫、孩子作為哭的內容，例如，她們自言自語地說，「爸爸沒有被關押吧，姥姥還抱著你吧？」等等，並反覆念說，其淒慘的程度，連我都被深深感動了！我也同樣的想念我的母親、妻子、兒女。監管員對女囚徒痛哭的態度，開始是不理，然後就是咒罵了。監管員不理她們的時候，那兩女囚徒哭得還不那麼厲害。監管員鄙視她們的時候，她們就哭得更厲害了。監管員兇相十足叫嚷著說：「哭什麼，哭也不頂用！哭得再兇也出不去！」秦城監獄這種情況比國民黨、比帝國主義的監獄，是好一點？還是壞一點？我都不得而知，但監獄對我們之狠，我是有親身體會的。

這裏要說的是，囚徒為什麼會有這樣好的精神？因為他們不是反革命。比如我自己就是這樣的。十四歲參加革命，幾十年來一心一意為革命，身上連一個反革命的「細胞」也沒有，哪裏會是反革命！路線問題、政治問題都是黨內問題，黨內問題應該在黨內解決，而不能用專政的辦法。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搞「一陣子」是可以理解的，如關衛戍區。但關到秦城這個情況就變了，雙方的性質都變了。後來又用玩弄所謂的「法律」的辦法，搞公審來解決路線問題和政治問題，事情就越搞越糟。我們幾個人吃了苦，固然很悲哀，但對黨的事業就更悲哀。路線問題，政治問題，這些黨內問題和犯罪都混為一談了，而且，可以用權力來隨意改變它。

黑暗中的星光

在監獄近五年時間，我接觸過的監管人員，總有幾十人之多，就他們對囚徒的態度來說，對囚徒極壞的是個別的，對囚徒好的也是少數。即使這樣，我也確實看到不少好的工作人員。他們對囚徒抱什麼態度，在日常生活中是能夠表現出來的。從監獄生活來說，微不足道的小事就是大事，個別監管人員整囚徒，少數工作人員幫助囚徒，都祇能通過小事才能表現出來。

第一是，吃飯問題。這個問題他們可以做很多有聲有色的文章。例如，打飯的時候，主食、副食的量是否打夠了；偶爾吃肉的時候，是給瘦的，還是給肥的；給饅頭是大的，還是小的；送來的飯食是熱的還是冷的等等，都是問題。例如，吃肉的時候，有的監管員給我打一碗較瘦的肉，然後向我微微一笑，我也祇有還以一笑向他致謝！

爲了解決我冬天不吃冷的食物的問題，監獄設有電爐子給我加熱食物。但這樣差別還是很大的。有的送來的飯雖然加過熱，但並未熱就送來了；有的不僅加得很熱，並且還是跑步送來的，飯放在我的桌子上，還是熱氣騰騰的。這種差別是顯示出監管人員的不同態度。

第二是看病問題。前面提到過，對囚徒要安眠藥，監獄向來是不重視的，很難辦得到。在監獄我見過的護士有兩、三個，其中有一個對我的態度特別好。年齡不算大，人很精明，作風也潑辣。一天，她給我送藥來，值班的監管員同她說：「他晚上總睡不著，你給他要點安眠藥吧！」那位護士笑著回答說：「晚上包給！」晚飯後，她果然把安眠藥送來了，這真是雪中送炭，解決了我的大問題。我有生之日都不會忘記那位護士對我的幫助！

七八年冬初，我的肩胛骨痛得難忍，腰椎骨也很痛。在我要求之下，醫生給開了一個療程的理療單，但祇限於肩胛骨一個部位。第一次給我做理療是一個年輕的女護士，她問：「肩胛骨是怎麼傷的？別處沒有受傷嗎？」「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派打的。受傷的還有腰椎骨！」她給我做過肩胛骨治療之後，立即主動把理療儀器移到我的腰的部位，說「把腰也做一下。」我高興地向她表示謝意。當我做完一個療程後，護士說：「休息三天繼續做。」我說：「醫生沒有開理療單。」「我去叫你就是理療單！」我連續做了三個療程，很解決問題。在做理療的過程中，我們相互熟悉了，她就同我談了自己的情況。她說：「我是由三〇四醫院調到這裏來的。我聽過你兩次報告，我們大家對你的印象是很好的。你是我的老部長，現在能爲你盡點力，心裏特別高興！」

第三是理髮、洗澡等問題。這是一些小得不能上口，但又有必要簡單說一下。理髮重要的不是理得好壞的問題，而是對我們的態度和什麼時候理髮的問題。監管員以他的時間爲主來安排囚徒的理髮。每人理髮的時間頂多十分鐘，剪短了就行了。對我態度好的監管員除理得仔細

之外，還特別選擇在洗澡前給我理髮，理髮後立即洗澡，這真是囚徒的幸福！要衛生紙也值得一提。有時要衛生紙幾乎要不來，都沒有辦法揩屁股。遇到好的監管員，一要就要來了，並且還拿得特多。

八一年九月十一日，我由秦城到西安時，送我的有三個人，其中有一位男醫生。他說：「在沒有公審之前，我對你的確是仇恨的，以為你真同林彪搞反革命活動。公審之後，我們就清楚了。我會真正認為你是個好人。」

送我的三個人都這樣表示：「我們是在專政的第一線，但我們專了什麼人的政，是在公審以後才清楚的。」對他們的談話，我感到很受教益！

子女探監

七九年九月間，獄方就向我提出：「讓你的子女來看看你，如何？」聽到這樣的話，我真是激動了一陣子。家破人散已經八年多了，老伴和孩子們都毫無音信，哪有不想之理！可當時是又想又怕，想是主要的；怕是不願意增加孩子們的痛苦和受到牽連。我的孩子都是共產黨員，在當時嚴峻的政治情況下，如果他們來看我，政治上勢必對他們有很大影響，違心地劃清界限，那個年代人人都會。

「不需要。」我斷然拒絕了。

「爲什麼？」

「他們來對我毫無作用，反而會增加孩子們的痛苦！你看我這個樣子，這麼冷的天連雙襪子都沒有，他們有嘴巴會說，說出去會給黨抹黑的。」

「也許見一見有互相鼓勵作用。對你的問題會有新的認識。」

「什麼新認識？！我的子女什麼時候也不會認為我是反革命！反革命是強加在我頭上的。孩子們見到我，是會痛苦不止的！」

他們知道我不讓子女來探監的態度後，有很長一段時間也不提這個問題了。快到年底了，不管我願不願意，我的子女真的來探監了。

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兩點多，兩個監管員突然走進我的監房來。他略有喜色地對我說：「走，出去一下，有事。」開始我跟著監管員走，後來監管員索性拉著我的一隻手，急速地走出三道監門。待到監樓外的大路上，他才同我說：「你的子女來看你了！」我聽到他說這句話時，立即興

奮到頭暈眼花的程度，兩條腿突然軟了下來，兩個監管員就架著我走，當時這個大的，那個小的都出現在我的腦海中！但我突然想到自己穿得太破爛了，腳上連襪子也沒有，每隻布鞋上都有兩個大洞，腳趾頭都露在外面。我立即對監管員說：「我穿得太破爛了，孩子們看到會很傷心，對黨的形象也不利。」監管員說：「顧不上這麼多了，八年了，見一次親人多不容易呀。」邊說又邊架著我走。不一會兒，監管員把我帶到了探監室。事後才知道，監獄接受了黃永勝不願見的教訓，監管員怕我不見，才採用這種辦法。當我踏進探監室的門，首先看到一屋大大小小的人。轉眼之間，京京、光光、毛毛、新平、路光就出現在我的眼前，除了承光因路遠沒趕上之外都來了。大兒子路光我還認識，其餘的真是都不認識了。

京京喊出一聲爸爸，就撲到我懷裏來了，我聽到後面叫爸爸的聲音，一個接一個而來。當時，我的心情是難於形容的，簡單一句話就是：「苦中之喜！」但我忍著淚水，同每個孩子都抱著親吻了一下。我和路光擁抱時，我在他的耳邊問：「你媽還活著嗎？」路光本來很堅強，他要求弟弟、妹妹不許哭，聽到我這樣的問話，他立即感到很辛酸和悲愴，他騙我說：「媽媽很好。」其實，自「九一三」之後，路光至今還沒有見到他媽媽，我的老伴在經過了中央專案組的關押審查後，當時正在陝西大荔農場監督勞動。幾年後，路光回想起這件事對我說：「你在秦城時問我，『媽媽還活著嗎？』我感到非常傷心，這個國家是你們打下來的，你們是國家的主人，你們最應該幸福愉快地生活，你卻問『你媽還活著嗎？』這樣的話，真叫人不可思議！」

是京京扶著我坐下的，我從一進門就拉著京京的手沒有放開過，八年了沒和任何人握過手。「九一三」時，京京是一個祇有十三歲的瘦小的女孩，現在長到一米七多的青年人了，我祇有一個女兒，她無疑就是京京了。我坐下之後，路光向我介紹：京京的愛人新平，毛毛、光光的愛人和躺在籃子裏祇有三個月的小孫女——小愛。這時我重新看了一下所有的兒女們，八年了，把我搞得家破人散！

我指著光光、毛毛問路光：「這兩個是誰呀？」

「我是光光」，「我是毛毛」。

女兒的心真細，她一邊流著淚，一邊解開我棉衣上的扣子，用手一直往裏摸，發現我沒有毛衣，也沒有棉毛衫，身上有臭味，還問了我是

否有虱子？女兒邊問邊淚流不止，她說：「爸爸你怎麼祇穿一件棉衣殼呀？」我是一個十足的「囚徒」，胡茬很長，身體又瘦弱。身上穿的衣服是補了又補，各種顏色都有。黑顏色是我的爛褲叉上扯下來的，黃的是原來軍衣上的口袋撕下來的。我渾身襤褸，孩子們是想不到的，這時大家忍不住內心的痛苦，竟放聲哭開了！我也跟著哭了，真想哭個痛快。

這時路光解開衣服脫下自己的毛衣和襯衣一定要給我穿上。路光是個敢說話的人，面對著監管員說：「他怎麼穿得這麼破呀？！光著身子穿棉衣，大冬天襪子也沒有，穿一雙單布鞋，還有兩個洞，大街上撿垃圾的比我爸爸都穿得好！我也被關過監獄，也沒到這種程度呀！能不能送衣服來？」兩個監管員都不說話。

孩子們帶來很多的食品，他們都希望我多吃點。由於我患有腸胃病，又沒有吃零食的習慣，祇好每樣都吃一點，以了孩子們的心願。我們一邊吃東西，一邊零星星地談起分別八年的事來了。孩子們來探監，對家人受株連的情況，他們是「滴水」不漏的。對家屬受株連的情況，我是一九八一年九月「保外就醫」到了西安後才知道的。孩子們爲了使我寬心，還特別同我介紹了他們結婚的情況。

好景不長，監管員提醒我們注意：「大約還有半小時，還有什麼話要說的，現在就說吧。」頓時，整個房子沒有聲音。我打起精神向大家說：「你們都不要悲傷，我不是還活著嗎？現在，我應當向你們說幾句話。首先，對你們媽媽說，要她注意三點：一是，好好活下去，活得長一點，也許還有見面的機會，要是活得短，在八年前就算最後分別了；二是，要把天下的大事都想開了，我們所遇到的事也就想通了；三是，不要掛念我，我會活下去的。對你們也說三點：一是，要老老實實地生活，不要同別人比；二是，要扎扎實實地學本事，本事就是飯碗；三是，要遵紀守法。對我自己也說三點：一是，我的問題是時代的問題，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問題；二是，我永遠相信黨，相信我自己；三是，我沒有做過對不起黨，對不起毛主席，對不起兒女的事。」

我說了之後，也情不自禁地忍不住淚水。孩子們反轉來安慰我。他們說：「爸爸不要難過了。我們看到爸爸還活著，就非常滿足了！爸爸遇到的那些事，我們早就懂了。兩個月之後，我們又會來看爸爸的。」

監管員已經催了兩三次。我祇好忍著痛苦，同每個孩子再親吻了一下，就離開他們了。我提不起腳步，祇好一步一步地向前挪，慢慢走進監管區。我不願回頭，不敢向監獄區的大門外面看一眼。出來時，孩子們成爲我最大的吸引力，把我吸引得一切都顧不上了。返回時，孩子們成了我最大的拉力，把我拉得連腳步都拖不動了。我回到監房後，沒有吃晚飯，祇喝了一口水，什麼也不想吃。第二天早晨和中午什麼都沒有吃，心想這場災難怎麼是這個樣子！？直到第二天晚上，才用開水泡了一點饅頭吃。此時，由於中紀委審查小組已經開始審查，監獄對我的態度，同以前相比是好多了。獄方注意到我的痛苦，他們除了勸說之外，晚上還主動發給我安眠藥，第三天的中午，還特地給我做了一碗雞蛋湯。

第二天晚上，一個監管員值班時到我房間來，同我說了一席話，我懂得其意，對我啓發很大。他說：「不要因孩子來看你而過份傷感。要看東方，久雨也許有晴的可能；當然這祇是可能，現實還是看不到的。你不要因我的職業同我格格不入，任何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對問題都會有看法。以後有什麼事，可以同我說，可能對你精神上會有一定的幫助……」

探監對有的孩子卻造成了災難。我的女婿是部隊幹部，他就受到了很大的壓力，總政治部對他進行了通報批評。指出：「這種行動是敵我不分、喪失立場的錯誤。」

過了兩個月，孩子們又來了，承光夫婦也來了。「九一三」之前，承光和雪巾祇是一般的朋友，一共才見過幾次面，承光在廣東部隊裏工作，部隊在惠陽羅浮山深處，雪巾在重慶四醫大上學，可以說他們天各一方，雪巾連我是幹什麼的都不太清楚。這對有情人終成眷屬，有他們自己的信念，也有專案組「幫了大忙」！「九一三」之後雪巾竟然也被關起來，一關就是六、七年，而且比承光關得還久。專案組故意給雪巾戴上「邱會作兒媳婦」的大帽子，她不嫁給承光嫁給誰？我不感謝專案組又感謝誰？！

這次探監後預審工作就開始了，第二次探監時，我拿大便紙給路光寫了一個條：「可能要進行審判，這是做夢也想不到的。」我的態度是：不懼怕也不抱幻想。他們是什麼貨色，我非常清楚，可難就難在他們是打著黨的牌子，怎麼對他們是小事，但怎麼對黨就是大事了。

第四十一章 中紀委的審查

審查的重點

七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下午三時許，監管員走進監牢來對我說：「中紀委來人找你談話。」他還把「談話」二字的聲音說得特別大。很顯然，他們是有意不用「審查」二字的。

聽了監管員的話，我當時心裏一楞！我心想：「從七二年夏天到現在，由衛戍區警三師到了秦城監獄，七年多的時間對我無人過問。現在還有什麼人找活著的死人談話？」當我來到審問室，審查組的人就正式向我說：「我們是中央派出的審查小組，在中央直接領導下，對你進行審查，處理你的問題。我們對中央負責，也對你邱會作本人負責。」

審查組問我：「你最近想些什麼？」

「不想什麼，我進了監獄後，即進了『三無世界』，一無人問，二無人審，三無人管。」

他們聽了之後說：「何必這樣悲觀嘛！」

「事實就是這樣嘛。我遭受到的摧殘，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有過嗎？這些你們比我還清楚！」

「所以我們要對你重新進行審查。例如，錯誤與罪行。錯誤與罪行是有界線的，但又常常分不開。」

「我對自己的問題，用四個字就可以說清楚，那就是，『有錯無罪』，錯也是有當時條件的。在當時的情況下，也就是在文化革命中，我們是擁護毛主席的，但我們思想上與毛主席的一些政策有不一致之處，比如我們反對造反派，反對打砸搶，反對踢開黨委鬧革命。毛主席也批評江青，可實質上又是支持、維護江青的，現在看來我們反江青一夥並沒有錯。但毛主席健在時，以他的文革路線為是非標準，我們就叫有錯。現

在，毛主席去世了，中央也認為毛主席在文革中的路線、政策有錯誤，那扣在我們頭上的『反對毛主席』的錯又在哪裏呢？請你們審查，應該給個結論。林彪是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軍委副主席，我們在林彪領導下工作，但我們與『九一三』的任何事情毫無關係，這就叫做無罪。關於『九一三』問題，我希望中央再審查，我不怕再審查，怕的就是審查清楚了，也不給結論，這才真正叫做沒有政策了。」

接著他們提出了三個問題。

「你對江青有什麼看法？」

「過去我看不太清楚她和主席的關係，又有人（我沒有說出汪東興的名字）在中間煽動，犯了反江青一夥的錯誤，也就是犯了反『四人幫』的錯誤，這多麼可笑。現在，主席去世了，江青也垮臺了，談談也無妨。從思想作風上來說，江青是個惡霸，有些狗仗人勢。現在想起來她的『本事』，就是靠兩條，一是她與主席特殊的關係，因此，在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受到了不少人的吹捧，甚至林彪、總理對她也有過抬舉，其實這種抬舉是說給主席聽的；二是她自己也有品質不好的思想基礎，作風很霸道。她把這兩條運用得很好。」

「說得不錯嘛。你再說說林彪提出設國家主席的問題。」

「林彪提出要設國家主席，本來是建議，應不為過。當時的中央常委周總理、陳伯達、康生都同意設國家主席，五個常委四個同意。林本人並不想當國家主席，我們心裏很有底，徒有虛名的東西他並不想要。當時大家都同意設國家主席，我們這些人也擁護設國家主席，但那是讓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根本沒有想到讓林當，在這個問題上汪東興是最大的積極分子。後來編造的謊話很多。」

「你再說說，你反徐向前的問題。」

「徐向前的事你們竟然也作為問題提出來？因為徐是元帥吧？而不是因為是非曲直。我沒有在徐帥領導下工作過，我過去對他印象很好，也很尊重。在六七年文化革命最混亂的時候，徐帥他自己頂不住造反派的糾纏，就利用職權下命令把我送到二醫大『紅縱』老虎口上去，他不是以全軍文革組長的名義指示我回總後參加運動，他特別強調他是軍委副主席的名義命令我回到準備把我往死裏斗的造反派手裏，葉帥、聶帥是堅決不同意他的。結果助長了造反派的氣焰把總後搞得大亂，把我也幾

乎打死，徐帥是有很大責任的。既然事實如此，我爲什麼不可以批評他的錯誤？徐向前整我在先，我的反擊在後，事情是由徐向前引起的，他應當承擔後果！我過去對徐帥有意見是公開的，沒搞什麼陰謀。徐帥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作了檢討，把自己罵得一塌糊塗，並向我道歉。他特別說：「他當全軍文革組長時，軍隊亂了。」

第一次審查到此結束。

中紀委審查小組對我的審查，一反李震時期中央專案組的方法，是從文化大革命問題開始的，而不是祇追「九一三」的問題。這說明了他們不是孤立的抓什麼「罪行」，而是通過調查研究，力求得出比較正確的結論。對我的審查，他們分爲三個單元，即：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廬山的問題，林彪集團的問題。在整個審查過程中沒有提過「兩謀」問題，可能他們認爲，這頂反革命的大帽子是扣不到我們頭上的。

審查組從一九八〇年一月開始，到七月間談完了文化大革命問題之後，即轉爲揭發「四人幫」的問題。

審查組說：「廬山及以後的問題，你寫了很多的材料，也寫得比較清楚，我們對廬山問題，瞭解得也比較多，就不問你了。現在，你即對『四人幫』的問題進行揭發。有多少說多少，相信你也不會保留的。從材料上來看，你們很早就同『四人幫』對立，現在就不要怕犯反『四人幫』的錯誤了。」

我已經向他們談了三、四次反「四人幫」的問題，他們聽得也很感興趣，但又突然停止了，轉爲談廬山問題。

關於廬山會議的問題

審查組說：「對廬山的問題，我們畢竟是局外人，現在，還需要把廬山問題，從頭到尾談一下。」

對廬山的問題，我寫了三份比較厚的材料，他們基本滿意。但有兩點，他們不太相信，這就是：一、對林彪在全會開幕式上的講話。他們感到，林彪在全會開幕式上的講話，事先不僅沒有同黃、吳、李、邱商量過，而且林彪講話事前我們都不知道。二、九月七日，在九江機場送林彪走，祇擠在機艙裏和林彪照了一張合影，林彪沒有給我們交代什麼任務。對這兩點他們不相信，又提不出任何證據。

對我寫的材料，審查組重視過的似乎有：七〇年五月十七日，江青在釣魚臺十一樓向黃、吳、李、邱、姚文元、李德生等攻擊周總理的問題；七〇年四月間和六月間，汪東興在他中南海的家裏向黃、吳、李、邱先後談過設國家主席和江青的問題；七〇年八月二十五日在廬山林彪去毛主席住處開中央常委會，葉群驅車追上林彪要他保護汪東興的問題；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午，周總理在人大會堂福建廳宣佈對黃、吳、李、邱隔離審查時的講話等等。對其中的兩個問題，即「江青攻擊周總理的問題和「九二四」周總理的講話，他們還要我分別口頭再講一次，並搞了錄音。他們聽了之後說：「對這兩個問題，你還要講兩次，我們要請我們的上級也來聽聽。其目的不是別的，正是爲你創造一些條件，爭取寬大處理減少阻力。你可以放開講，時間不限。」

第一次講的時候，聽的人不少。除了審查組的人之外，其餘的都沒見過。聽的人很感興趣，有人邊聽還不時點頭。聽完之後，有一個我不認識的人說：「你的揭發材料寫得很好，今天講得更好。注意身體。這對我們爭取對你的寬大處理極爲有利。」但我對此除沒有抱幻想之外，總感到他們「好的態度」是一個不解之迷。

第二次講的時候，除審查組的人之外，還有穿軍裝的人在聽。聽的人的興趣比上次的人小多了。當我講到：「江青攻擊周總理時，她的話音一落，黃永勝就表了態說：歷史上的問題我們不清楚，總理領著我們辛辛苦苦工作，我對總理沒有意見。吳、李和我也跟著表示同意黃的講話。」我的話音一落，那位穿軍裝的人站起來說：「你們有這種覺悟嗎？」他說完就走了。我心裏想：「你這個小兔崽子！除了當劊子手之外，不會有什麼用。」我對他十分鄙視！

審查的第一遍，也就是「過濾」性的審查，到此告一段落。以後就轉爲重點問題審查了。

關於攻擊朱德的問題

五九年十月間，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我第一次聽到林彪批判朱德。他說：「朱德能力不大，可是還想當領袖。人大委員長不願當，要當國家主席。什麼總司令，是假的，我軍的總司令向來都是毛主席。……」林彪對朱老總的批判，我當時並不以爲然，但感到其中必有問題。在

一九六六年五月的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周恩來、陳毅等人都批判朱德，他們的調子都比林彪高。

六八年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葉劍英對朱老總作了長篇批判發言，批判的主要內容與九年前林彪講的基本相同，而且還大有過之。從簡報上看，批判朱老總的人就多了，發言的調子也高，不少老同志都批判了朱德。現在看來，批判朱德應當是來自毛主席，所以大家講的是否是實話也難說，我看主要是講給主席聽的。

我還清楚的記得，在楊成武的軍委辦事組時期，搞《黨史綱要》時，其中提到朱德的錯誤，但點不點名楊成武拿不準，就給毛主席打了報告，毛主席在批示中同意點名，而後以中央文件下發。

六八年十二月，我在總後常委擴大會議上，講了朱老總的「問題」。我講的內容主要是根據葉劍英在會上的發言為依據的。我對朱老總的批判是完全不必要的，是帶有趕「潮流」、趕「時髦」的性質的，但在當時的情況下，唯獨總後不傳達，恐怕也是不成的。總之，對朱德的批判是工作性質，不是我一人批他。好在我當時還遠遠沒有面對面批判朱德的資格，朱老總也聽不到我的講話。

關於搞葉帥材料問題

六八年四月初，黃永勝上任軍委辦事組組長不幾天，康生在中央碰頭會上就要黃搞葉劍英的材料，康生說：「主席對我說，葉劍英的問題不少，對他的問題，搞個材料來看看。」

對搞葉的材料，黃永勝在軍委辦事組傳達後，我發表了在當時的情況下可以表示的態度。我說：「葉是政治局委員，雖然是坐冷板凳的，但搞他的材料應由主席或總理交代才好。」對我的意見大家都不表態，黃永勝說：「從感情上講我和葉帥不錯，從工作上講整材料費力費時費人，但康老何許人也？他在會上講是主席讓搞的，當時總理也在場，康老給我們搞陽謀。」

黃永勝還說，他會後問過總理，總理說：「會上佈置了的工作是要辦的。」

這樣，對搞葉的材料，黃永勝決定：先搭架子搞起來再說，但不要太牽扯我們的精力，要絕對保密，由軍委辦事組直接管。誰負責抓這件

事，吳法憲提議由我來抓，我不接受這個任務。我說：「我以前跟葉帥關係很好，甚至有人說我是葉劍英死黨，我怕涉嫌，對工作不利。」黃永勝即決定：「老邱可以不管，由老李來管，由李在海軍調選主要辦事的人。」我記得，李作鵬指定海軍政治部一個處長管這件事。

搞葉帥的材料組成立後李作鵬恰好病了，黃、吳要我臨時管一下。我不能推托，就辦了如下幾件事：第一，除組長之外，由空軍、總參、總後選調的工作人員是我審定的，並由我召集全體人員開了第一次會議。第二，我批准材料組的辦公地點設在總後機關大院之內。第三，我批准材料組調閱過軍委辦公廳、總政治部的有關檔案材料。第四，我批准印發了材料組第一稿材料，我一個字也未改，即批：「印發軍委辦事組審議」。在我辦了上面四件事之後，李作鵬病好了，從此對搞葉帥材料之事，我也就「移交」了，再沒有過問。後來對葉帥搞成了一個素材稿，基本上都是空話。黃永勝和葉帥關係也很好，他多了一個心眼，把這件事向林總匯報了，林總堅決不讓搞，黃永勝立即下令把材料全都燒了，一份不准留，搞葉帥材料的事也就結束了。

關於反擊徐向前的問題

六七年初，我在西山養病，因為我被總後系統的造反派批鬥得很厲害，心臟病發作，昏厥在批鬥現場，經搶救後，葉帥叫我到西山休養，這個情況徐向前是完全清楚的。

一月十九日下午五時許，徐向前突然給我打電話，他在電話裏說：「我以軍委副主席的名義，命令你回到總後去參加運動。」這個時候，徐帥要我回已被造反派搞得大亂的總後機關接受群眾批判，實際上是讓我去送死。對徐向前的命令，我感到很震驚、很突然，這個時候到群眾中去，意味著什麼，我心裏很清楚，但他畢竟是軍委副主席，我還是很認真地回答：「堅決執行命令」幾個字，其他什麼也沒說就下了山。上海二醫大「紅縱」是唯一支持上海「一月風暴」向上海市委奪權的軍內單位，是江青、張春橋勾結起來，把造反派勢力引向軍內的禍水，他們來京是專門衝擊總後黨委，專門整我的。這些徐向前是很清楚的。徐帥身為軍委副主席、軍委文革組長，頂不住造反派的壓力和糾纏，又向江青示好，他竟利用自己的權力，把我送到「虎口」上去，蹩蹩杻杻的問

題?!在毛主席、林總、周總理、中央軍委的支持下，在總後黨委的領導下，打垮了總後系統打、砸、搶的造反派以後，清查禍根，勢必涉及到徐向前。我要總後文辦搞了徐向前的材料也是事實，材料搞好了，但沒有散發。爲什麼沒有發？是黃永勝勸阻了。

八〇年，中央審查組對我的審查將要結束之前，審查組全體同我做過一次政策交底。他們說：「對你的問題的複雜性，你應該想得到，對徐副主席的問題，你說的情況是事實，但這樣問題得不到解決，我們也不能這樣向上報告。我們提議，你對這個問題做個簡單的檢討，這對整個審查是有利的。」

審查組談話的精神我完全理解。我即表態說：「對徐向前的觀點，我是不能改變的，但爲了支持審查組的工作和顧全大局，我可以向軍委，向徐副主席進行自我批評！」審查組對我說：「可以！」對這個問題的審查也就結束了。

平心而論，徐向前是害了總後不少幹部的，這和「四人幫」「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類似的。中央決定批鄧，不批是不成的；鄧東山再起，不處理批鄧積極分子也是不成的。當時，總後絕大多數幹部群眾是擁護總後黨委，擁護我的，在混亂的情況下，絕大多數幹部都是堅守崗位，認真工作的。徐帥的命令一下，把我推進造反派的虎口裏，不少幹部誤認爲中央對我的態度變了，甚至認爲毛主席、林總、周總理對我的態度變了，這樣，幹部隊伍發生了動搖，一些人倒向造反派。其實，毛主席、中央是保我的、肯定我的，並派周總理親自送我回總後主持工作，這樣，把一些幹部裝進反總後黨委、領導的圈子裏，審查和清理造反的幹部也就勢在必行了。

關於總政的一些問題

從五九年秋我當總後勤部長以來，總政某些人就一直反對我。由於軍委對我的器重與支持，他們沒有能達到目的。在文化大革命前夕，總政把我列入羅瑞卿的圈子內一起打倒，也未能得逞。在文化大革命中，總政某些人就策劃利用造反派之手把我打倒。

審查組：「根據我們掌握的材料，你要同我們談清如下問題：一是搞總政的材料問題；二是看總政的檔案問題。」

根據上面的問題，我分別簡要做了如下交代。

關於搞總政治部的材料問題。我指示搞了總政一份長篇材料，並分發到了各大軍區、軍兵種、院校後勤機關。搞這個材料的目的是，主要的是揭露總政的空頭政治，使後勤機關的工作能夠更好地實行政治統帥業務的方針。

六七年三月底，總理在總後開大會送我回總後主持工作，四月間，在總後機關，把由全軍文革支持的，對總後黨委造反奪權、打砸搶的造反派被打垮了。爲了總後機關能夠盡快投入正常工作，認識造反奪權、搞打砸搶的危害性，對幹部群眾進行路線教育，我親自佈置要搞材料：一是總政、全軍文革迫害總後的問題；二是二醫大「紅縱」的罪行；三是總後的文化大革命大事記。現在看來，在文革的歷史條件下，當時的材料難免有不夠切合實際的地方，甚至錯誤的地方。

接下來我還說，你們提出看總政檔案的問題，我認爲是來自總後造反派的，好像抓到了我的辮子。我實事求是地說，如果真抓到了辮子也不要緊，有錯我就承認。但請你們注意，我當時是軍委辦事組成員，又管幹部工作，我不僅是同意了總後文辦派少數人去總政看檔案，我還有權調閱總政有關檔案的，比如調軍隊支左幹部的檔案進行審核，我完全不必要偷看。有件具體事是這樣的：六七年秋，總政文辦的同志爲了支援總後的文化大革命就把總政有關迫害總後的現有存檔材料同總後文辦說了，並同意總後派人去看檔案。總後文辦向我匯報了上述情況之後，我就同意了文辦派少數人去總政看檔案。總後文辦把全軍文革有關總後文化大革命的幾個記錄本拿來給我看了，我還交代：文辦拿回來的所有檔案看後立即退回，要做到一份不能少。

文化大革命中，我並沒有害怕全軍文革（班底還是總政）支持造反派整人，是同他們公開干的。六九年十月間，軍隊整編機關的時候，軍委決定：總參裝備計劃部、軍事交通部撥歸總後建制。在總後歡迎兩部到總後的會議上，我講到機關作風時，確實講過「機關要有好的作風，但決不能學總政的壞作風」，「總政同國民黨特務機關差不多」的話。這句話，雖然是我一時的氣話，但這是不該說的，對此，我應承擔責任。但把我說的某些錯話，作爲我的「反革命」罪證，我是永遠不會接受的。至於「砸爛總政閻王店」的事，與我毫無關係。

在我說完之後，審查組的人說：「對總政的問題，我們搞清楚了。你祇把看總政檔案一事寫個材料。」對這個問題的審查就結束了。

關於醫療保健問題

對這個問題，主持審查的人要求我交代的有：徐海東、羅瑞卿、陳毅、賀龍、傅連暉等五人的問題。我當時情緒也比較大，這是上面爲了打倒我們故意讓總後造反派醜化我。但他們抓我的辮子沒抓到，反而披露出文革時搞專案的一些情況。

其實，老師的治病問題，都是由總理專管，我沒管，我也沒資格、沒權力管。在賀龍、羅瑞卿等人治病的問題上都是中央專案組報總理直接管，總後是不能管的，甚至是不能打聽的。三〇一的領導也不向我匯報，這是黨的工作紀律。在這個問題上，三〇一醫院僅是總後的直屬單位而已。這如同你租用了我的房子，但房子裏死了人，並不能算到我頭上。另外，這個問題我也是很難啓齒的，因爲這些事是由中央專案組辦的，一說就扯出主席、總理，我當時真不知怎麼說好。我繞了一個彎子說：「爲了便於說明這些問題，要先將當時醫療管理的情況簡要加以說明。」

對軍隊高級幹部的醫療保健，在文化大革命前，中央衛生部規定：軍隊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和上將以上的醫療保健由中央衛生部保健局統一管理，並由北京醫院承擔醫療任務。後來，軍隊幹部提出在北京醫院看病諸多不便，於是不少高級幹部的醫療保健工作則轉爲以軍隊爲主，總醫院承擔醫療任務。

在文化大革命前，軍隊的醫療保健工作，有些不成文的規定。對元帥配有保健護士，外出時派保健醫生，並定期供應保健藥品；大將按需要也能享受元帥級的待遇；上將以上在三〇一醫院住院時，可以住南樓三層的套間大病房，看病可以在南樓高幹病房就診；對中將以下的則沒有什麼規定，由各單位的醫療機構負責。多年來大家都能自覺遵守那些不成文的規定。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北京醫院的醫療保健機構被造反派砸爛了。此後，不僅軍隊高級幹部的醫療保健工作完全由三〇一醫院負責，社區中央黨

政機關的高級幹部，也經過不同的渠道轉到三〇一醫院來了。但原來整個醫療保健的管理制度，則尚未改變。

一九六七年五月間，周總理召集我、汪東興、以及搞保健工作的醫務幹部吳階平、蒲榮欽（三〇一醫院副院長）李晉（三〇一醫院南樓醫務主任）等在京西賓館會議樓第三會議室開過一次會議，專門討論了醫療保健工作。在會上，周總理同大家一起商定了五條。

一、成立中央醫療小組。小組的主要任務是負責中央常委、中央文革的醫療保健工作。爲了保證中央領導人保健工作的需要，在中央警衛局三〇五醫院內設立特別小型藥房。周總理還宣佈：「中央醫療小組的工作，由周恩來、邱會作、汪東興、吳階平統一負責。」

二、軍隊所有高級幹部的醫療保健工作，由周恩來、邱會作、汪東興負責，以三〇一醫院爲主，北京醫院、協和醫院量力而行，擔負醫療任務。取消純粹保健藥品的供應，需要者可以代辦，自己照價付款。中央舉行會議時的醫務工作，列入保健工作範圍之內，統一領導管理。

三、對中央原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副總理以上的領導幹部，正在受審查的人員，涉外事項的醫療保健工作，一律歸周總理批准，由三〇一醫院，北京醫院、首都醫院、公安醫院，按照總理批示執行任務。對上述人員的醫療保健，沒有總理的批示各醫院不得自行辦理。

四、對外的醫療工作，由外交部承辦，經總理批准，委託有關人員辦。例如，一九六八年派去阿爾巴尼亞爲霍查治病的醫療小組，就是周總理委託我一手承辦的。

五、從國外進口醫療器材和藥品，一律經周總理批准，交由外貿部承辦。

六九年，三〇一醫院在深入「鬥、批、改」之後，對軍隊領導下部的醫療保健提出了改進的意見和措施。在報告中，對個別人的特殊化提出了批評。總醫院提出的改進措施，包括徹底取消純粹的保健藥品，私人不得佔用總醫院過多的醫療人員，總後黨委批准了總醫院的報告，並報告軍委辦事組審批。軍委辦事組鄭重其事地討論了總醫院的報告，並原則上予以批准。其中還特別指出：對老師的醫療保健工作一定要做好，但對不夠合理的要求，要做耐心的工作。還指出對新調任中央領導工作的幹部醫療保健工作，要認真做好。

以上對醫療保健歷史情況的簡要敘述，目的是便於說明對老一輩無

產階級革命家的醫療保健工作是怎樣進行的。

這裏還要指出的是，賀老總的治病問題，及羅瑞卿，陳老總，陶鑄的治病問題，三〇一醫院都盡了全力，他們的不幸是文化大革命的複雜政治情況造成的，不是三〇一的醫療造成的。這裏要說有責任應該在毛主席、周總理和林彪，與總後無關，與三〇一醫院的專家教授及醫護人員更無關。靳來川、曹根慧及三〇一醫院的其他領導同志，都是我軍優秀的醫務工作者，靳來川是寧都暴動的紅軍幹部，長征過來的。遠的不說，在文革中，他們給老師治病，給總理批准送來的中央領導治病，給軍隊的高級幹部治病是有功的。他們忠誠黨的事業，品德好，工作任勞任怨，每天常常工作十幾個小時以上。三〇一醫院的專家、教授、知識分子，在文革中都得到了很好的愛護，有人甚至說文革中知識分子在三〇一真是在天堂一樣，因為他們的老同學、老同行，在文革中大部分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受到「牛棚」之苦。

在文革中，中央衛生部被冠名為「老爺衛生部」，衛生部直屬的大醫院如北京醫院，協和醫院，造反很厲害，老幹部住院很困難，住進去也不得安寧。記得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份，總理把中央的醫療保健任務交到了三〇一醫院，這是為什麼，就是三〇一醫院信得過嘛！因此三〇一醫院收治老幹部的任務很重，爲了更好的給老幹部治病，在醫院南樓（高幹病房），又設了專門及時搶救老幹部的「小門診」，要求隨時做到實施搶救任務，醫院南樓還專門設立了藥檢室，藥品經檢驗室檢驗後才能給病人服用，尤其爲主席進口的藥都要經過嚴格化驗才給主席服用，有一次爲主席在香港進口治支氣管炎的藥，曹根慧坐飛機晝夜兼程，不辭辛苦順利完成了任務。爲了老幹部治病，他們還專門搞了一個全國、全軍專家聯絡名單，當時，地方的專家、教授、知識分子，打成反動學術權威的很多，蹲「牛棚」的也很多，爲了解決醫院領導的顧慮和困難，我說：「管他是不是牛鬼蛇神，能認真治病就成。」這句話也成了我的罪狀。黃永勝總參謀長對老幹部很關心，對三〇一醫院的工作很支持，他對給他出診的醫院領導說：「你們不要管外面收進來的人是怎麼回事，總理叫收進來就是病人，你們祇管認真治病，不能出任何問題，一出問題就要『通

天」。病好了也不要催人家出院，要聽安排。」三〇一醫院對所有住進來的病人都進行了認真的醫治。

但是，「九一三」之後，他們受到了極大的冤屈和災難。

關於羅瑞卿的治療問題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八日，羅瑞卿在家中跳樓「自殺」，人未死摔傷了腳。羅瑞卿屬於總理親自管的中央專案，具體事情由楊成武管事，他的去向我根本不知道。後來我才知道，羅瑞卿先是送到北京醫院搶救治療的，並在那裏做了第一次腿部的手術。

六七年四月初，羅瑞卿才到三〇一醫院住院，住在十四病室，專案組給他起名叫「郝少平」，中央警衛團派來的警衛人員，日夜不斷地看守。十四病室是南樓高幹病房蓋好前的高幹病房。

大約六七年六月間，我去總醫院看望住院幹部和醫護人員時，第一次知道羅瑞卿在外科病樓十四病室住院。靳來川院長對我說：「周總理叫我們去，親自交代說：『這是特殊病人，到了醫院之後，除了向管他的人報告和向我這裏報告之外，其他的地方不必報告。對他的治療，要經我批准，才能執行。』遵照總理指示，我們沒有向邱部長報告。」

我說：「總理有交代，我就不管不問了，你們做的對。對這些人的醫療，應當遵照總理的指示辦理。對這種特殊病人，應當特別經心。」根據周總理對總醫院的指示，我對羅在總醫院治療就根本不能過問了。羅什麼時候開刀，什麼時候開的第二次刀，什麼時候出院，出院後到什麼地方去了等等，我都不知道，也沒有聽人說過。

從上面的情況來看，羅瑞卿在三〇一醫院的治療，是好是壞都同我毫無關係。不能因為我是總後勤部長，是三〇一醫院的領導，就在我的頭上加上一切莫須有的罪名。應當肯定，羅瑞卿在三〇一醫院是得到了好的治療的，因為醫院是堅持執行總理指示的。羅瑞卿自己都說過：「要不是三〇一醫院給我做了手術，恐怕我連命都保不住了。」

當時，軍隊造反派成立了一個「鬥羅籌備處」對羅瑞卿進行了多次殘酷的批鬥，在住院期間也把羅瑞卿搞出去批鬥，為此，羅瑞卿的治療常常中斷，傷口不能癒合，形成股骨頭壞死和骨髓炎等病症。羅瑞卿自己向中央寫報告要求做截肢手術。同時三〇一醫院非常負責地組織專家

會診後，給中央寫了報告，周總理看了三〇一醫院的報告，看了x光片和特別畫的手術示意圖，周總理批准了這個手術報告。

六九年初，給羅瑞卿做了手術，手術前三〇一醫院又給周總理打了報告，總理批示要保證治療的效果和安全。主管醫療保健的曹根慧副院長主持手術，由骨科副主任黨廣博和主治醫生王一德主刀，主治醫生宋運琴負責麻醉，著名專家外科主任陸惟善在手術室指導，雖然羅瑞卿患有心臟病，由於組織周密，認真負責，手術很成功。若干年後他到世界上最先進的西德去做手術，卻死在那裏。

可是，連命都差點保不住的卻是爲他認認真真做手術的這些醫務人員。羅瑞卿重新上臺後，把這些做手術的醫務人員幾乎全部抓進監獄，並召開萬人大會批鬥，當場扒掉他們的領章帽徽。靳來川院長關進秦城，曹根慧副院長關在白廟監獄，他患有嚴重的胃病，在監押期間做了胃切除手術，還要吃監獄的窩窩頭和白菜幫，我現在想起來都很寒心。其他的醫務人員有的判了刑，有的被開除黨籍，著名外科專家陸維善也被整治，攆出軍隊。

後來還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聶帥拯救他們，才最後落實了政策。

關於陳老總的治療問題

陳老總是我尊敬的老首長。他是一個在革命戰爭年代英勇戰鬥，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嘔心瀝血，爲黨的事業奮鬥終生的人。在工作中，他批評了你，你都心裏舒服。

陳老總得病是積勞成疾的結果。七〇年陳老總在石家莊，因身體不適總理批准他回京治病，是中辦副主任王良恩直接給三〇一醫院管首長保健的曹根慧副院長打的電話，曹根慧立即答應並做了準備。陳老總是十月二十六號去住院的，住在南樓三層的套間，這是三〇一醫院當時最好的病房了。陳老總住院後，我到醫院去看望過他，因爲陳老總沒有帶警衛員和秘書，南樓的醫護人員對他照顧得很好，這下把陳老總感動了，他對我說：「我說一句倚老賣老的話，這些醫護人員，比我孩子對我都關心周到。」當時陳老總還說了一句貌似玩笑的話，他說：「總理這個人呀，別人把他當驢使，他還尾巴翹得高高的往前跑。」這句話我從來沒有對別人說過，現在看來陳老總的話是對的。

葉帥和吳法憲也去看過陳老總，黃永勝知道陳老總住院後，叫我替他去看一下陳老總，我也照辦了。因為黃永勝也病了，剛剛出院，經檢查排除了胃癌，是肝硬化。黃永勝就是帶著這樣一個身體，「九一三」前在夜以繼日的為黨工作，全力協助總理，並在第一線和江青的錯誤對著幹，「九一三」後也是拖著這副身子蹲了共產黨自己的十年監獄。

經過專家會診和腸胃鉬餐透視等檢查，並請北京的放射科專家對陳老總的光片進行了會診、討論鑒定，認為「不顯示腸癌跡象」。這不是三〇一醫院一家鑒定的，是和北京的專家共同鑒定的。

一個多月後，即十二月二十二日，因沒查出病因，陳老總要求出院，曹根慧副院長希望他多住一段時間，再繼續觀察和檢查，陳老總不從，他說：「毛主席快過生日了，我要去為毛主席祝壽。」曹根慧從病房一直把陳老總送到車上。

陳老總出院後情況不太好，他感到腹部很痛，二十天後，也就是七一年一月十六日他來南樓要求做理療，幸虧理療科的醫生讓他先檢查一下，如果做了就壞了，這樣會加速癌細胞的擴散。經南樓值班的陶醫生檢查，立即決定陳老總住院，醫生都很熱愛陳老總，先收留住院再說，並立即報告了曹根慧，曹根慧立即讓著名的腹外科專家陸惟善給陳老總會診，同時請了北京醫院的周光裕主任。專家們摸到陳老總腹部有塊狀物，但X光片沒有發現問題，拍片才不到一個月，即便有腫瘤也不會長得如此之快，大家分析，根據疼痛的情況急性闌尾炎的可能比較大，應立即進行手術。為了搶時間，簡便請示手續，三〇一醫院直接給總理打了報告，並直接送往中南海，總理立即批准了手術，並派他的保健醫生卞志強一同去醫院為陳老總手術做準備，卞志強也是專家，他是中南海的保健辦主任。陳老總和張茜都同意做手術，靳來川院長，曹根慧院長，卞志強醫生都親自督陣。打開陳老總的腹部一看，不是闌尾炎，塊狀物是因腸梗阻積聚的糞便，病灶沒有找到，找到病灶是必須的。但原來是為闌尾炎手術開的是一條豎的小口，現在要在腹部擴大探察必須再開一條橫的刀口，這樣就形成了一個「T」字形刀口，陸惟善和周光裕都同意這個方案，為了加強力量，靳來川院長又調來心腎科主任黃宛，外科副主任周明禮，病理科主治醫生游聯璧參加手術，同時讓卞志強立即給總理報告，周總理同意了專家們的方案。

在進一步手術中，在陳老總結腸部位發現腫塊，並與肝臟粘連，經快速病理檢查確定為結腸癌。這時總理又打電話來指示：「組織全力搶救，需要哪個醫院的醫生馬上去請！」陳老總的手術做得非常細心，做了五個小時後順利完成。

手術後，總理對陳老總很關心，親自安排到日壇醫院做放療，每次都是吳桓興院長親自給陳老總做，每次三〇一醫院都有專人陪同。經過幾個月的治療陳老總身體有好轉，體重增加，「五一」節上天安門還見到了毛主席。夏天陳老總從北戴河休養回來，特地把北戴河院子裏的蘋果帶回來給南樓的醫護人員，以表示感謝，是張茜親自送去的，並且送給王錦聯護士長一張陳老總和張茜的合影。陳老總在北戴河時，總理去看過他。在專家醫療組給陳老總檢查時，發現癌細胞開始擴散，回到北京陳老總又做了第二次手術，但陳老總得的畢竟是癌症，於七二年一月六日去世。不過，那時我已因「九一三」事件被關起來了。

事後看來對陳老總的病有「不到」之處，但根本不存在「迫害陳老總」這個主觀故意，這跟當時的技術水平和醫療設備的條件有關。發現不是闌尾炎後，採取措施得當，有人指責開了「T」字形刀口，試想，如把開闌尾的口子縫上再橫開腹部，這樣會耽誤更多的時間。事後第二天，三〇一醫院就以曹根慧副院長的名義向中央寫了一個報告，先送到我這裏，我想了很久做了批示：「暫不要寫報告，以後需要寫時，再研究。」我做這樣的批示有兩層意思，對上保護總理，對下保護醫院領導和醫護人員。因為一寫報告就要在政治局傳閱，江青他們就會攻擊總理，別看他們對陳老總那麼惡劣，但有辮子可抓時，他們也不會放過。陳老總住院時江青去看過陳老總，但總理到醫院看王進喜時，本打算去看陳老總，由於時間緊得實在來不及就走了。這樣江青會借此說她是多關心陳老總等等，而且江青他們特別會做戲，一定會追查醫院的責任，在文革的環境中，醫院領導和專家、教授有的是做不完的檢討，很耽誤工作，靳來川、曹根慧這些人經常忙的飯都吃不上。事後我向總理說明了情況，並以我的名義向總理檢討了，總理表示滿意。

這裏還要附帶說一個問題，就是陳老總搬病房的問題。這確有其事，但被傳的沸沸揚揚的所謂對陳老總「不恭」，則完全是造謠，總後造反派利用此事為「由頭」，搞派性打擊別人是實質，對醫院的具體工作人

員都進行了處理是不當的，也肯定是陳老總不願意的。事情是這樣的，陳總在總醫院南樓三層北病室住院，他住在進門的頭一個病室，因為陳老總住院沒有帶服務人員，安排這個病房離護士站近，便於照顧。後來李作鵬也住院了，同陳總住在同一病室，並且住在最裏面的一個病房。李作鵬住在醫院還要工作，一天到晚去送文件的人很多，都要經過陳總病室門口。總醫院從陳老總能安靜養病考慮，同我報告了這個情況。我當即回答：「把陳老總搬到南病室去。」陳老總理解了搬病室的意思，很高興地同意搬了。

關於賀龍的搶救問題

六五年十二月，解決羅瑞卿的會議以後，賀龍就不主持工作了，改爲葉帥主持，但軍委的事，賀老總還在管，那時主席對賀龍還是很好的。但八屆十一中全會後，變化很大。記得是六六年九月初（肯定是十一前），林總在大會堂召集軍委常委會，除賀龍外的元帥都來了，我也列席了會議。林總說這個會是毛主席讓給軍隊的高級幹部打招呼。在會上，元帥都發了言，擁護毛主席的決定，擁護林總的講話。這個會是蕭華在具體張羅，會後蕭華對我說：「賀老總（蕭還是這樣稱呼賀龍）經常表揚你，但你也不要背包袱。」我沒有搞清蕭華這樣無頭無腦的話，我沒有吭聲。賀老總對我的工作的確是很支持的，文革初期造反派也抓了我這一條，他們把我和賀老總的照片拿去示眾，我心裏還是有些緊張。爲此我去楊成武那裏探探底，沒想到楊成武大笑起來，楊說：「他（蕭華）在嚇唬你。不做虧心事，不怕鬼叫門。賀龍的事跟你毫無關係。」

大概在六六年秋天，在京的各總部，各軍兵種的負責人，被通知到京西賓館集合，各自坐各自的車到京西賓館後由蕭華，楊成武帶隊換乘兩輛大轎車到葉帥家看有關賀龍的材料，上車後還拉上窗簾，蕭、楊在車上說，臨走前總理特別打電話交代，到葉帥家看材料重點是看通敵問題。我想總理的話也是在賀龍的問題上給大家一個態度，畢竟總理和賀龍一起領導了南昌起義，並把賀龍引上革命道路。關於所謂賀龍的「通敵問題」，總理是認真的，這個認真想必是來自毛主席的認真。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央爲賀龍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中指出「中央當時認爲把賀龍同志的問題搞清楚也是必要的，於一九六七年九月予以同意」，當時

毛主席、周總理還健在，這個「中央當時認為」肯定就是毛主席和周總理了。如果不是這樣，而如毛主席說的，是林彪搞的，那就直接點林彪名字了。

到了葉帥的會客室，葉帥說：「主席對賀龍很不放心，不少人揭發了他的問題。整理了一些材料，大家來看一看。總理剛才打電話來，特別強調要注意看投敵問題。」蕭華、楊成武提到投敵問題，葉帥又強調，大家都爭著去看這份材料。蕭華忙說：「不要亂，不要多拿，每人祇拿一份，然後交換看。」會客室的桌子上放著十幾份材料，這些材料都是賀老總比較親密的部下說了一些事事非非、捕風捉影的事。祇有一件是總理提供的一封信，這封信是賀老總寫給國民政府裏任職的舊交的，信裏也沒有太實質性的問題，這可能就是總理所謂的「通敵」問題吧。

賀老總的專案問題我是一點不知道的，中央專案組是極其嚴格和保密的。在楊成武的軍委辦事組時期，我祇聽到楊成武說過一句話，「總理叫把鬍子放到象鼻子溝去了」。象鼻子溝和西山是一個山坡之隔，是國務院系統的戰時指揮部所在地。在黃永勝的軍委辦事組時期，我也祇聽到黃永勝說過一句「彭德懷和賀龍的案子楊成武的時候就基本定下來了」。

賀老總的夫人薛明說了我一些不好的話，是她不瞭解情況，看在賀老總在天的冤靈，我也就不多說什麼了。我保外就醫後在北京見到了當時三〇一醫院的負責同志，他專門給我講了賀老總的治療、搶救和死亡問題。

六九年六月九日凌晨，三〇一醫院副院長曹根慧接到中央二辦打來的電話說：「賀龍得了重病，以前他看病都在衛戍區的醫院，這次黃總長因你們條件好，技術力量強，指示你們立即派醫生出診治療」。曹副院長立即進行了安排，他找到了曾給賀老總看過病的主治醫生黃秀琴和南樓（高幹病房）護士姜輝永帶著搶救器械和藥品趕到了賀龍的住處。黃秀琴診病時，薛明和專案人員都在場。黃醫生經過診斷立即向曹副院長匯報，因為曹副院長根本不知道賀老總的住處，他說：「如路途近，道路平坦就速回醫院搶救；如路途遠，道路顛簸就增派醫護人員去現場搶救。」黃醫生認為賀老總的住處不具備搶救條件，這裏去三〇一的路途不遠路況又好，請示送三〇一搶救，曹副院長立即決定「把病人接回來，路上不

間斷地搶救治療，注意安全，防止意外。」曹副院長又立即向靳來川院長匯報，靳說：「關鍵是確診，然後進行搶救！」

賀老總到三〇一時，樓裏樓外已經是戒備森嚴，顯然是中央佈置的。南樓（高幹病房）主任李晉率醫生進行搶救，確診賀老總是糖尿病酸中毒。曹副院長立即組織專家會診，大內科曾誠富主任，放射科高育璈主任，心腎科黃大顯主任等趕到病房，當時比較先進的移動式X光機也由蕭志達醫生推來給賀老總拍片，發現賀老總肺部感染。再經過驗血後，決定輸液。輸液的藥劑是5%的葡萄糖和胰島素，胰島素適用糖尿病酸中毒和伴有併發症的病人；對昏迷的糖尿病患者要打一定劑量葡萄糖，直到醒過來為止。這個用藥方案是可以經得起檢驗的。三〇一從領導到醫護人員盡了最大的努力，但賀老總沒有搶救過來，於六月九日下午三點去世。

賀老總去世後，黃永勝指示一定要薛明去見一見，並指示一定要找到在京的子女也去見一見。黃永勝是冒了一點風險的，因為讓子女去見面，他沒有向政治局報告，是不是向總理報告了，我就知道了。薛明和他的兒子、女兒都見到了賀老總的遺體。賀老總去世的當天，三〇一醫院就向中央寫了報告，賀老總的後事都是按中央的指示辦的。

「九一三」以後的七三年底，主席在一次談話中講到賀龍問題時說：「我聽了林彪的一面之詞，整錯了賀龍」。整錯了賀龍是事實，但是林彪聽了主席的一面之詞，還是主席聽了林彪的一面之詞？在六六年九月，林總關於賀龍問題的打招呼會議之前，我從來沒有聽到林總講過賀龍的話，祇是在九大時，我才第一次聽到林總講賀龍的不是，雖然祇是幾句話，林總說話還有些嗚咽，看來是主席給林總打過什麼招呼，說過什麼「小話」，把林總給說傷心了。

但是，毛主席說賀龍就多了，例如，六八年楊、余、傅到臺前後，毛主席接見軍隊團以上幹部學習班時說（大意）：我原先是保賀龍的，後來我知道他和成鈞他們一起搞陰謀、搞顛覆，我就不保他了。尤其是在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式上，毛主席又專門講了賀龍，主席說：「過去我對賀龍是一批二保，因為他是二方面軍的代表。現在不能保了，從成鈞、許光達、廖漢生等人的揭發看，他是有反黨篡軍企圖的，但沒來得及。……」

現在，在賀龍等老同志的治病問題上，說林彪（也包括我）是誣陷，是犯罪，而毛主席是犯了錯誤，周總理是做了違心的事、說了違心的話，這是對歷史的編造。

關於徐海東的醫療問題

徐海東是多年以來的老病人，他離不了醫療條件，也離不開氧氣；對他的病情，我早就知道。五九年，我當總後部長後，徐海東的老部下、總後營房部部長蘇煥清陪我去過他家，我對他的病情就更清楚了。我向來主張對徐海東應有很好的護理、醫療和生活條件。

我曾經當著徐海東和夫人周東屏的面向蘇煥清交代過：「今後除總參管理局門診部常規管理外，需要有什麼特殊辦理的事，可以直接同總醫院辦，也可以告訴蘇煥清辦。」徐對我的交代很感激。

徐海東的醫療保健，五九年以前由北京醫院直接管理，具體的醫療工作由總參管理局一門診管理，同總醫院沒有發生過醫療關係。徐海東需的藥品和氧氣，總參一門診部可以向北京醫院直接辦理；需住院可以直接住北京醫院。這種關係已經行使多年了。六四年我批准給徐海東的家重新修理房子，翻修好之後，我又看他時，曾問過他對醫療和生活還有什麼問題。他的回答是很好，表示很滿意。在閒談中，徐海東還對彭德懷表示了極大的氣憤，對林彪進行熱情歌頌。

徐海東在文革中的不幸首先是在於他的秘書陳玉炳，文革初期陳玉炳就寫信誣告徐海東，對徐海東的精神和身體造成極大傷害。另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楊成武對徐海東是不感冒的，一九六七年「七二〇」事件後，楊成武召集會議，佈置軍隊各單位刷徐海東的大標語，其內容能回憶起來的有「打倒徐海東」，「徐海東是陳再道的黑後臺」，等等。楊成武還在軍委辦事組的會議上佈置開徐海東的批判會，楊在會上說：「徐海東不是好東西，你們誰和徐海東有關係，趕快劃清界限。」楊成武還佈置軍委辦公廳金濤、路陽對徐海東家進行監視。

在這樣的情況下，徐海東的醫療工作勢必受到影響。六七年在周總理親自主持下，對醫療保健工作進行整頓，徐海東的醫療保健工作一直在北京醫院，這時就轉到三〇一醫院管理了。總醫院南樓的醫務主任李晉幾次走訪徐海東的家，對他的醫療工作有檢查，本人也感到滿意，並

未提出過什麼要求。可是徐海東的秘書陳玉炳又寫信誣告三〇一醫院，說三〇一醫院對徐海東太熱情，這裏面可能有陰謀。在當時的情況下，我對總醫院報告的批示是：「徐海東的醫療由他們本單位（總參）自己管，今後三〇一不管了。」事後，我專門對靳來川院長說：「我那個批示是給楊代總長看的，徐在楊的手上，不要因這件事得罪楊。對徐的醫療保健由總醫院管理，由總參門診部執行。你去和徐本人和周東屏講一講。」

後來徐海東的家屬不准總參門診部的醫生護士進門，一定要總醫院的人才能給徐做醫護工作，徐海東的家屬同總參門診部嚴重對立，徐的護理確實受到過影響，但這後面的政治問題，徐海東的家屬並不清楚。楊成武倒臺後，周東屏給葉群寫信說（大意）：「總參門診部不管徐海東的醫護工作了，連氧氣都不供應。」徐海東的子女也給江青寫信反映情況，黃永勝還見了徐大將的兒子徐文伯，黃表示會很好照顧好徐的生活。黃永勝還叫總參政治部、管理局派人檢查，但當時雙方情緒比較對立，檢查的結果報告是：「家屬報告的情況不實」。對此，總參門診部的群眾對徐海東的老婆寫了大字報。經過檢查之後，黃總長的指示是：「徐海東的醫療保健工作仍由總參門診部負責，並要把工作做好；在醫療中有什麼困難，立即請總醫院解決。」我的指示是：「對徐海東的醫療保健工作，按照總參首長的指示辦理。並要同總參門診部一起把工作做好。」

這就是對徐海東醫療保健工作的簡要情況。

關於傅連暉的問題

傅連暉是總後衛生部原掛名副部長（一九六四年已免職），他住在香山。文化革命開始後，衛生部主要批判傅的「養尊處優」，「修正主義」。後來在他家抄出一個箱子，傅把他死後的碑文都擬好了，並親筆以他十幾歲兒子的名義寫了一篇悼念自己的文章，引起了衛生部幹部群眾的不滿，在文革那種「革命」的年代這是可以理解的，總後黨委和我都批評了傅，這也是正常的。我和傅連暉關係很好，長征路上天天走在一起，我更知道他是一個閒人，而且主席前不久在傅連暉給他的信上做了「此人非當權派，又無大罪，似應以保護」的批示。黨委和我沒有一個人要動他。但傅這個人和不少人有過節，如在延安時，衛生部買了十個熱水袋，因

爲工作疏忽忘了給主席分一個，因爲傅連璋告訴了主席，主席發了姜齊賢的火，並調動了姜的工作。

六八年初，總理突然給我打了一個電話，說衛戍區去人馬上要帶走傅連璋，衛戍區的來人，竟帶著總理寫的條子「把傅連璋交給來人。周恩來。」有了總理的指示，事情是必須辦的，我讓秘書告訴衛戍區的人去找陳龐，陳龐在總後是管專案的。陳帶著衛戍區的人到了香山，由幹休所長帶路，翻牆進了傅的院子把他帶走。過了幾天（那時我不在碰頭會，不是天天見總理）我見到總理，問爲什麼抓傅連璋？總理祇說了一句話：「和你們沒關係。」不久傅連璋就死在秦城。

傅連璋被中央專案組關進秦城後，總理向葉群透了氣，葉群爲了順應中央對傅連璋的嚴厲態度，特地從外地調來當年的林辦原秘書趙川寫過一份傅對林彪治病情況的材料。因爲林辦沒有打字機，葉群便叫胡敏和我的秘書吳瑞雲去把材料拿回總後打印幾份。胡因爲初到總後不久，不懂得辦事規則，便把材料交給吳瑞雲去辦。這僅僅是一件具體差事，胡敏根本不知道葉群要他們辦這件事的底細。關於傅連璋的問題曾對我多次審問，我都如實說清楚了，但我沒有提起總理。

聽完我的話，審查小組當即就說：傅連璋之死與你無關，你對傅連璋在文革中說過的一些批評的話，不能和專案混爲一談。

所謂迫害幹部和群眾的問題

中央審查組，對所謂我在總後機關迫害幹部和群眾的問題的進行了反覆審查。本來這並不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但經過總後造反派的搗亂，破壞，顛倒黑白，把事情的本來面目搞亂了。

總後機關是全軍文革支持造反派的發源地，全軍文革學著中央文革所謂「相信群眾，支持群眾，尊重群眾首創精神」的調子，縱恿解放軍第二軍醫大學的造反派「紅縱」，在六六年八月底就到北京進住了總後機關大院。全軍文革依靠這支隊伍，把總後機關搞亂了，成了全軍大亂的典型。

一九六七年一月底，中央軍委發佈的《八條命令》，是軍隊文化大革命的轉折點，打擊了造反派的反動氣焰。六七年五月十三日，駐京各機關的革命派站出來了，把反黨亂軍、造反奪權、打砸搶的造反派打垮

了。總後黨委根據中央軍委的命令，對造反派進行了堅決的打擊。中央發出清理階級隊伍的指示後，造反派的首惡和骨幹分子受到審查和處理。

第一，總後黨委決定，對二醫大「紅縱」，後勤學院「星火燎原」，機關造反派三個造反派，實行徹底搞垮的方針。當時對造反派的打擊，同文革結束以後清理三種人是一樣的。

第二，動員廣大群眾，對上述三個造反派的罪行，實行徹底揭發批判，對造反派頭子進行了整肅。

第三，對造反派後臺進行了堅決批判。總後政治部充當造反派後臺的領導幹部停職反省，歷史反革命分子陳政由全軍文革組長徐向前元帥批准，由衛戍區逮捕法辦。充當各大單位造反派後臺的領導幹部也受到了應有批判。我們對造反派的鬥爭是堅決的，否則，造反派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一直到六九年機關整編才基本告一段落。總後機關打擊造反派，對總後機關正常工作和機關建設起到了極大的作用。但在這樣一個大規模的運動中，整過頭，甚至整錯了的情況肯定會有的，這在運動後期會甄別和糾錯的。但我們在運動中就被打倒了，很多工作並沒有來得及做。

總後死人的問題是重點審查的主要內容。審查組問：「總後死人不少，以我們掌握的材料來看，有的人與你有直接關係。」

我回答說：「總後死了多少人，我的確不知道。雖然文化大革命是特殊的政治運動，但我是總後勤部長，黨委第一書記，我有領導責任。人命關天，死了人總是大事，要深刻汲取教訓。」

「不完全是這樣。有的人之死你有直接的責任！」

我說：「總後死的人，除後勤學院的王述臣是他老婆利用送飯的機會，用藥毒死的，屬他殺，周長庚是病故之外，其餘的人都是自殺的。這總是事實吧！如果說有直接責任的話，全軍文革比我的責任大得多，全軍文革不把總後搞亂，那些自殺的人不造總後黨委的反，不搞打、砸、搶，事後也不會被審查，自然也不會自殺了。」中央審查小組的人把話題一轉說：「這樣談不解決問題。我們談具體的人吧？」

審查小組提出，有八個人之死與我有直接關係。這八個人就是：湯平（總後副部長），周長庚（後政副主任），楊樹聲（後政保衛科長），申茂功（後政文化部俱樂部主任），王述臣（後勤學院教員）塊字讀顧子制（營房

部設計院工程師)，畢迪平（軍械部助理員），張凌鬥（工程學院秘書）。他們提出八個人的名單，我感到有些突然，因為這八個人，我認識的人祇有湯平、周長庚、申茂功。王述臣祇知道其名，沒有見過面，其餘的我根本不認識。

關於周長庚之死。周長庚是六九年冬戰備疏散到四川廣元總後倉庫的，因心臟病突然發作，送到成都軍區總醫院，搶救無效而病故的。

周長庚是紅二方面軍老醫務幹部之一。原為軍事醫學科學院政委，後調總後政治部任副主任。五九年我當總後部長之後，才認識他，他對我當總後部長真誠擁護，在工作中合作很好，周長庚在總後的工作中，始終都是站在黨委一邊的。六三年，軍事醫學科學院院長賀誠，反對總後副部長饒正錫，我和李聚奎找賀誠、周長庚談過一次話，周堅決站在總後常委一邊，對賀誠進行了尖銳的批評。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周長庚即主持政治部的工作。徐向前給我下命令把我送到二醫大「紅縱」的虎口上的第四天，即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晚，周長庚找了少數幾個人研究過「總後文化大革命的前途問題」。他們認為我肯定要被打倒，他準備對造反派表態支持；但他們的大字報還沒有公佈出去，毛主席、林總、周總理就派葉群把我搶救出去了，周長庚等人的態度又變過來了。後來，政治部的幹部群眾就抓住周長庚的這個問題不放，一直過不了關。

六九年冬，中央決定實行戰備疏散，「閒人」一律送到北京以外地區。在軍委辦事組的戰備疏散計劃之下，總後也搞了一個戰備疏散名單，我在該名單上劃了一個圈，周長庚就是這樣被送到外地去了。

周長庚死後開了追悼會，《解放軍報》發了消息。在文革的情況下，我和總後黨委算是盡到力了。我在疏散的文件上劃了一個圈就要抵償一個人的命，我認為是不適當的。後來的總後王平政委，依從了造反派不符合事實的意見，不僅把周長庚的病死算我的罪行，還對政治部關廣發、周子健等同志進行了嚴懲。

關於申茂興之死。總後政治部文化部俱樂部主任申茂興是在六九年自殺死的。申茂興我是認識的。六十年代初，正在困難時期，我對俱樂部經常搞舞會曾經提出過批評。當時，總後政治部的領導，在批評申時也話裏有話地說：「邱部長不會跳舞，你們搞這麼多舞會幹什麼？」俱樂部

部對我的批評不滿，他們認為，我是不會跳舞不參加舞會，才批評他們的。

六七年八月間，上海二醫大「紅縱」進駐總後機關之後，申茂興就是造反分子之一，他秘密同二醫大「紅縱」聯繫，曾經被保衛部門抓過。當時，總後政治部要把申茂興下放基層去鍛煉，我沒有同意。

六七年一月十九日徐向前給我下命令之後，總後政治部立即成立了機關造反總部，申茂興是造反派的武鬥隊長。爲了對我進行批鬥，申茂興領著武鬥隊進行了三次演練，並多次用活人做道具演練「噴氣式」，一月二十三日下午，二醫大「紅縱」在總後禮堂鬥我，申茂興擔任武鬥總指揮，並親自上陣對我搞「噴氣式」，幾次指使人揪我的頭髮，他叫囂「要揪掉才是對三反分子的階級感情」，並叫人穿上大頭鞋踢我的肝部和腰部。造反派垮臺之後，他自知罪過太大，認爲檢討也過不了關，精神高度緊張。當時，毛主席正好有「專政是群眾的專政」的批示，我認爲申茂興的問題不是清理階級隊伍中的叛徒、特務那樣的歷史問題，因此，我在總後政治部一份簡報上批示：「對申茂興實行群眾專政。」

總後俱樂部是造反派武鬥隊的主力，他們見申茂興被專政了，怕申茂興把他們都供出去，爲掩蓋他們自己的劣跡而過關，紛紛起來揭發申茂興，把罪過都推到他一個人頭上。這些「群眾」賊喊捉賊地毒打申茂興，申茂興深知這些「群眾」的意圖，他感到無望，又忍受不了毒打，就自殺了。

關於王述臣之死。王述臣是後勤學院的教員，在文革中是後勤學院造反派組織「星火燎原」的主要頭子之一，是第一勤務員。六九年冬或七〇年春，組織上查出王述臣解放前當過僞警長，根據當時的中央《公安六條》，他屬於不准參加群眾組織，祇許老老實實，不許論說亂動的階級異己分子，再加上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罪行，對他實行隔離審查。

王述臣是個不折不扣的階級異己分子。他趁文革之機，堅決反對總後黨委，堅決反對後勤學院黨委。他帶領「星火燎原」幹盡了當時所有的壞事，如衝擊國防部，參加圍困中南海揪劉少奇，與外交部造反派一起造陳毅的反，自稱反了九個元帥（除林彪），更嚴重的是他帶人砸了總後保密室。

六七年三月三十日，周總理代表毛主席、林總在總後召開幹部大會，總理對我發表長篇鼓勵的話。「星火燎原」感到末日來臨了，爲了把罪行推到王述臣的身上，他們就決定對王述臣下毒手，實行殺人滅口。王述臣自己也認爲在劫難逃，在隔離審查期間，他叫他老婆利用給他送飯的機會在飯裏放了毒藥，共同自殺，王述臣自己吃了，中毒而死。

星火燎原的「高參組」、「勤務組」在後勤學院小山會議室開過一次會，那次會是瘋狂攻擊毛主席的。這樣的惡毒攻擊，我看到的還沒幾個。對這樣的問題，我不僅當時站在黨的立場上，現在要是遇到這樣的問題，也還會站在同樣的立場上的。對這樣大是大非的問題，我相信，除了反革命分子之外，都會站在黨的立場上的！

過了幾天，審查組說：「對死人的具體情況就不再說了，今天著重談認識問題。對死人的問題，希望你在認識上能提高一步。」

根據審查組提出的問題，我講了自己的看法，我堅持如下三點：

第一，總後死了人，是由於造反派把總後搞亂了，被揪鬥的各級領導幹部太多了的後果。造反派不把總後搞亂，就不會發生治亂的問題，廣大幹部群眾對造反派仇恨太深，歷史事實就是這樣。另外，如果全軍文革不下命令，不要說一個造反派組織，十個造反派組織也搞不亂總後的。所以把死人的責任加到全軍文革頭上，是合適的，因爲是全軍文革下命令把總後搞亂的。

第二，總後死了人，不管出自什麼原因，我都承擔責任，因爲我是總後主要負責人。清理階級隊伍，雖然當時有分工，但我決不把領導責任推給別人。清理階級隊伍是中央的指示，當時，說是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全國都按中央的指示搞，總後不可能不搞。

第三，總後死人，除王述臣是他殺，周長庚是病故的之外，其他的都是自殺的。其中有的是造反派借刀殺人，把人整死。死了人是當時執行黨的政策中出現的問題，總後死了人我負責，全國死了人主席負責，這是對的，但這不涉及到法律問題。如果有人企圖用法律手段處理文化大革命中死人的問題，這是否定毛主席的惡毒手段。

萬毅的談話

八〇年四月下旬，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常委萬毅到秦城監獄來同我談過一次話。地點在二十一監樓預審室，時間三小時以上。

一天早飯後，一位監管員走進監房來，笑著同我說：「走，中央來人找你談話。」對此，我並不驚訝，中央審查小組早就告訴了我中紀委會來人同我談話。我走進預審室倒驚訝了，因為擺設的格局都變了。原來長條形的預審桌，變為方形的談話式的桌子，桌上還擺了一瓶花，原來我是坐矮椅子，今天同他們一樣都是坐軟椅子，原來我喝水的杯子不一樣，今天也一樣了。在約二十平方米的預審室裏，發生了這樣的變化就算了不起的大事。

今天同我談話的是三個人，萬毅和隨員二人。其中一個隨員還是後來的法官。我在萬毅對面坐下。有一位隨員首先說：「今天萬毅同志代表中央來同你談話。」

「啊，還認識嗎？」萬毅首先說話。

「嗯，不敢認了。」我回答說。

「不用客氣，今天我們在一起談話。我們都在四野嘛，你在八縱我在一縱。」

「啊，想起來了。你是萬毅司令員。過去我們在一起打仗。打天津時我們還在一起吃過飯。」

「對呀！過去我們在一個戰場上打仗。今天又在一個特殊的情況下，看到你了。」

「事情常會有變化的。」

「你穿得那樣破爛，這是為什麼？」

「沒有穿的呀。冬天更難過，現在天氣暖和了，好過一些了。」

「唉，事情使人難以想像。可否讓你的孩子搞點衣服來穿，這是比較方便的辦法。其餘的辦法都要費很多周折的。」

「孩子恐怕自身難保，他們都還在受株連，不會有什麼辦法的。」

「聽說，你想要讀點書都很困難，我們設法給你搞點書來。在生活上，還有什麼困難嗎？」

「謝謝你。此一時，彼一時，想不到有什麼困難。」

「好。我們就開始談正題吧。中央審查小組給你搞逼、供、信了嗎？」

「沒有。」

「我們先談林彪問題。林彪的問題，牽扯到很多人，但牽連其中的人和人是有很大差別的。正是因為有這些差別，中央處理問題時就要分別對待了。我說的意思；你有什麼想法嗎？」

「沒有。我準備了：活著當囚徒，死了當野鬼。」

「開了十一大之後，還是這種想法嗎？」

「我對十一大不瞭解。」

「中央的政策，現在也在變化。對黨總該有信心嘛？」

「我永遠相信黨。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午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周總理宣佈對我審查時，我當即向總理表了態。我說：擁護中央對我的審查措施。我相信毛主席，相信黨中央，同時也相信我自己。」

「啊，三個相信很好嘛！現在也還要有這個信心才好！」

接著，萬毅談了我交代的問題。

「你已經關了八年多了。現在是你的關鍵時刻了。現在對你的審查，與其說是對你的改造，還不如說是對你的挽救。你的問題很快會得到處理的。這點你還是要有信心！」

「你寫的材料，我看了不少。總後死了人，從領導責任上來說，個個都可以追到你的頭上，從法律上來說，你沒有殺一個人。何況，你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深刻的認識，立場轉過來了，決定不追究刑事責任（還念了我的交代材料的一大段）。你相信中央的政策嗎？應當相信。」

「你跟著林彪，不能說沒有幹一點壞事。但全案攤開之後，問題就看得比較清楚，你的問題同別人比較起來，有很大的差別。實事求是的處理問題，這就是現在中央的方針。」

「任何人都會相信真理！」

「你的問題，很快會得到處理，總不再需要兩三年了，這點你有預感嗎？」

「毛主席、周總理在世的時候，我相信我的問題總會得到解決的。打倒『四人幫』後，我想立即會解決我們的問題。現在，我就不要再想這些問

題了，因為想也無用。我可以直率地說：把我們關進秦城本身就不符合黨的政策。」

「中央對你的問題，會處理得很好的。對你的寬大，連你自己都不會想到。通過你的問題的處理，要使大家看到，實事求是是中央的基本方針。最後，希望你對自己的前途不要失掉信心。你不是抱怨看不到什麼報紙嗎？過不了多久，你什麼報紙都可以看了。……」

「好。今天就談到這裏。以後還會有見面的機會的。」

自從中央審查小組對我開始審查後，獄方對我的態度就大大變化了。對我好的更好了，不大好的人都改變了態度，要安眠藥，不僅不困難，而且每天都送上門來；對我態度最冷淡的監管員，打好飯之後都要問一句：「夠了嗎？」夏天放風的時候都要爲我選個最陰涼的地方；監獄當官的進到監房來同我談話等等。

八〇年大約是四月底，或五月初，監獄一個負責人來到我的監房，談笑風生約兩小時。據說，他是監獄第一把手（我稱他爲光頭主任），以後還同我接觸過三、四次。

這位監獄負責人來監房時，一行三人，進來之後，我用唯一的一張小馬扎請他坐下，我同他的隨員都坐在床上。他坐下後即說：「今天來看看你。這裏並不是個好地方，也很不平靜。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公安部的壞人經常在這裏挑起武鬥。這裏也有造反派，被他們搞得亂七八糟。你認識的傅連璋，這裏的造反派不給他飯吃，活活餓死了。公安部的楊奇清副部長關在這裏，鬥了他半個多月，打得非常厲害，後來連站都站不起來了，總後那裏的造反派打你，我們都聽說了。」

「你沒衣服穿，我們知道，也向上面報告了不知道多少次，但都沒有人管。我們也看到了你穿的破爛得不成樣子，但就解決不了。我們這裏，是別人來不了的地方，但也是有問題也解決不了的地方。」

「你們吃的伙食，祇要抓得不緊，問題也就出來了。可能你已經感覺到，伙食是時好時壞。」

對那位「光頭主任」的話，我祇是聽，別的話一句也沒有說過。

八〇年五月底，或六月初，監獄的另一位負責人，又同我談過一次話，他同我談話的時間有一小時多，從他對我談話的態度來看，似乎是有「送行」之意，可是從後來的事實來看，又不是那回事。

中紀委審查小組最後的話

審查一開始是對我嚴格執行政策的，他們對我審查的基本方針是：搞清問題，爭取對我寬大處理，這和李震時期的中央專案組的審查成了鮮明的對照。李震時期的中央專案組主要是抓「兩謀」的「反革命」的材料，中央審查小組是落實真憑實據的材料。

他們說：中央對你的審查是很重視的，我們用了將近一年時間做了比較充分的準備工作，對你的案情做了反覆研究。

他們說：「我們這樣做，是從『事』求是、而不是倒過來從『是』求事。」

他們說：對我這樣的人物，要以搞清問題就要先搞清楚事實，並用黨的政策界限去分析事實，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如果以搞到什麼材料為滿足，就必然走上逼供信。因為對被審查的人，要抓住一點半點材料是非常容易的，但要把問題搞清楚就不很容易了。

中央審查小組基本上堅持了回到當時文化大革命特殊的歷史情況中去考慮，放到與當時的政治形勢聯繫起來考慮，把我放進包括毛主席、周總理在內的領導集體之中去考慮，我認為他們的觀點是正確的，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

他們注意到了沒有文化大革命就不會有我的問題，對我的問題有則有之，無則無之，忘記就是忘記了。對問題寧可交代不完全，也不可以想當然湊「完滿」。

八〇年七月上旬，中央審查小組的審查就宣佈結束了。

中紀委審查小組對我的審查結束的時候，全組人同我做了一次比較長的談話。主要說了如下兩點。

他們說：我們接觸已經八個多月了。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對你的問題已經搞清了，其問題的性質同我們預料的基本上是一致的。我們搞清楚了你的問題，也認識了你這個人。前不久，萬毅同志代表中央又同你談過話，我們相信你是心中有數的。對你的問題，目前是處在一個關鍵時刻，我們認為，你的問題已經清楚了，無論用什麼形式審查也是變不了的，對這個問題，我們完全負責，你儘管放心。我們很欣賞你過去常說的一句話，就是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堅決相信黨，特別當黨不信任自己的時候，更要相信黨。對這個問題，你的思想無疑是正確的，這

點是根本的。過去，我們同你說過多次，能夠爲你爭取到寬大處理，我們感到高興，對黨也是一個貢獻。對你的審查，我們可以拍著胸脯說：對得起黨，對得起人民，也對得起你邱會作本人！我們的工作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但對你的處理終究是要服從組織決定，要遵守紀律的。這個道理你也是很清楚的。

他們還說：我們接觸之初，你同我們說過的兩句話：「心中無愧，不怕見閻王。」這是你的態度。這句話我們理解，但是我們還是要送你一句話，那就是：「不要爲自己幫倒忙！」我們的話對你會有用的。另外，記錄問題你是很不注意的，你存在「記錄無用」的思想。你要知道，是有用的，用處很大，可以作爲處理問題的根據，並不是一張廢紙。

當然，這段歷史的內幕我是不知道的，如果說這只是爲了捉弄我一番也大可不必，但他們實事求是解決問題的願望畢竟沒有實現，有些人還參加了公審。回想起這些，我的心情很沉重。實事求是是共產黨人的根本所在，是黨的光榮傳統。可是這個根本，這個傳統，往往被自己破壞。廣大幹部群眾是能堅持實事求是的，但無濟於事。職務越高的人，甚至是很高的領導人，往往不能實事求是，他們習慣用個人意見代替政策，用權力代替實事求是。

對於公審，我自己認爲我沒有什麼罪行，中央審查小組也認爲我沒有什麼罪行，雙方都應是按照這個思路走的。可是公審自己吃了大虧，發生在文革中這樣一個特殊的、複雜的環境下發生的事，而且這些事和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部署相關，爲了顧全大局，自己當錯誤來認，結果法庭當罪來辦。實事求是到底在哪裡！？「大局」、「態度」一直困擾自己，自己本質還是幼稚，我堅信黨而不是某些人，而某些人卻能左右黨，這就是悲哀。

第四十二章 移交高檢與預審

補辦逮捕手續

中紀委審查組的審查剛結束，我對中紀委審查小組「美好的話」還沒有來得及深想，僅隔十幾天，就宣佈對我補辦逮捕手續，這也是我沒想到的。可見上面鬥爭是激烈的，實事求是地解決黨內問題、路線問題是很艱難的。

八〇年七月二十三日上午，在秦城監獄以總政治部保衛部的名義，爲我補辦了逮捕手續。我在衛戍區關了五年又三個月，在秦城監獄關了近四年，關押快十年了，才辦逮捕手續，真是古今中外的大奇聞。毛主席和周總理祇把我送進了衛戍區，隔離反省。毛主席、周總理不在了，我又被關進了監獄，現在又進一步要把我公審了。這說明鄧小平這些人是不願意實事求是地解決我們的問題，他們從法律上抓辮子，利用軍隊原來的造反派爲骨幹，來打擊我們，他們並沒有從黨內鬥爭的錯誤方法中走出來，而是「現在輪到老子了」。

宣佈補辦逮捕手續的人好像天生祇會板著面孔，特別兇。在補辦的逮捕證上，我簽了一個名，並寫上「服從中央決定」幾個字。他們不願意我寫這幾個字，我堅持要寫。另外，非要給我照一張相。對我逮捕的「法律」手續就算完成了。我對逮捕不逮捕是無所謂的，關著就是實質，其他都是花活。

過了兩三天，在預審組長陪同下，來了六七個從來沒有見過的人。來人的面部表情，嚴肅到了使人害怕的程度。組長對我說：「今天專門談『八八』問題。」

我從口袋裏，把過去寫交代的底稿拿出來了。他們打開錄音機，我就一字不漏地念開了。我大約念了二十分鐘就念完了。此時，他們說：「你的稿子還是過去的，一點新內容都沒有！」

我回答說：「過去我就把情況全部交代完了，當然不會有新內容的！」
「不盡然吧！何必同我們對立，把問題搞清了對你有好處。」

「要是有好處的話，早就該有了。這個問題在八年以前，即七二年三月間，我就向當時的中央專案組交代清楚了。」

「不要過早封口。吳法憲交代了過硬的材料。你是在場的人之一，能與你無關嗎？」

「我希望你們有過硬的材料，完全可以定罪的材料，這樣，我就可以不受罪了。因為這個材料我已經寫了幾十次了。我同吳法憲是兩個人，這總該是事實吧！」

「我不知道他交代的內容。」

「根據你們提供的情況，我認為不排除兩點，一是，吳法憲、葉群可能利用我不在的時候說了什麼。二是，也不排除吳法憲說假話的可能。」

他們聽了我上述意見之後，一句話沒有說，就宣佈：「談話到此為止。」

又過了兩三天，預審組又同我談了一次話，他們首先說：「你前幾天對『八八』問題對我們有啓發。」以後他們就沒有再問了。

由於總政保衛部的預審就要結束了，他們又鄭重其事地同我談了一次話。他們要我談談補辦逮捕手續之後的感想。我說了兩點：

第一，屈從中央的決定。前幾天，獄方就向我宣佈了七三年十大的決議：邱會作是林彪反黨集團的成員，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籍。不是說要光明正大嗎？怎麼對我們的決定七年後才通知我。

第二，對即將到來的審判，我毫不害怕。我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一定堅持：永遠不反對毛主席，永遠不反對黨，永遠不說假話，我對自己心中有數。

又過了十多天，即到了九月初，預審組負責人劉寶慶，監獄一個工作人員，在秦城監獄二十一樓預審室向我宣佈：「現已查明，邱會作是林彪反革命集團主要成員，移交檢察機關。」這次宣佈，前後祇有五分鐘，並且祇是口頭的，並未立記錄，我也沒有在任何地方簽名

「反革命主犯」問題

八〇年九月上旬，最高人民檢察院預審組，在秦城監獄開始對我進行了連續十多天的預審。

預審組由三個組員、一個記錄，共四個人組成。我一見到組長王瀑聲，即大吃一驚。

王瀑聲原是後勤學院政治部主任。王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一個幾易其主的人，文革開始的時候曾經多次表示：學習毛主席著作，要遠學林副主席，近學邱部長，堅決跟著邱部長一起鬧革命。但後勤學院造反派「星火燎原」成立之後，他又投降了造反派，當毛主席、林總、周總理派葉群把我從武鬥場上搶救出去之後，王瀑聲又痛哭流涕地要求回到革命派中來。「九一三」之後，王瀑聲又轉回造反派一邊去了，這就是最高人民檢察院預審組組長王瀑聲的本來面目。組員孟恩慶，從他對我的兇惡態度來看，很可能是軍隊政法部門的。

看到這樣的陣容，我真是一肚子氣，但對鄧小平、彭真的路數也就清楚了。最高人民檢察院預審的目的是兩個：（一）為確定我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二）為確定我的反革命找「證據」。

其實，搞來搞去，內容還是那些東西，不過，不同名義和目的的審查，各取所需，各有各的利用角度就是了。

高檢預審組主要的是企圖抓到我在文化革命中同林彪有「反革命」關係和參與「南逃另立中央，謀害毛主席」的「兩謀」問題。

高檢預審組對我審查一開始就說：「現在我們對你的審查，是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問題的審查。你是這個集團的主犯，也應當受到國法制裁。你必須如實回答我們向你提出的問題。」

我說：「江青是什麼樣的反革命集團，我不清楚。有沒有林彪反革命集團，我很清楚。」

「你不認為林彪搞了一個反革命集團，你說說你的理由吧。」

我說：「現在，我就借你們對我審查的機會，說說我對林彪『反革命集團』的看法並希望你们們記在記錄上。」

「第一，我認為林彪反革命集團是不存在的。因為任何一個政治集團，總會有綱領，有活動和有罪行。對這個問題你們能指出事實嗎？第二，林彪反革命集團成立於何時？第三，我成為林彪反革命集團成員的

根據是什麼？我的罪行又是什麼？我在林彪直接領導下工作時間很長，哪些是工作關係，哪些是反革命關係？對這個問題，請你們指出來。」

「你是林彪的親信，當然是林彪反革命集團的主要成員。這還有什麼疑問嗎？」

「親信就是反革命集團關係了？我是不能同意的。什麼叫親信，希望你們有個明確的概念。」

「親信就是結幫、重用、安插位置。林彪不正是這樣對你的嗎！」

「我知道你們所謂親信的概念了。九大之後，周總理同我談過一次。我說我參加政治局是黃牛當馬騎，總理回答說：這是歷史的必然。我現在也祇能用總理的話來回答你們。」

「你是政治局委員就決定了你的問題的性質！這點你總不能否定吧！」

「現在我又多明白了一點你們的邏輯了。政治局委員就等於反革命，這就是你們決定問題的根據。」

根據他們提出的「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一致」的問題，我說「根據歷史事實，林彪、江青的關係，在文化大革命中，爲了維護毛主席，有過工作的關係，但主要是鬥爭。這裏，我不講林彪同江青鬥爭的全部問題，祇簡要說四點。」

「第一點，不准造反派奪權。林彪對六七年一月上海『一月革命』是沒有表過態的。正是因爲如此，在所謂的『二月逆流』中，還有人指責林彪是後臺，這點你們可能不清楚。」

「第二點，不准中央文革插手軍隊。林彪防止中央文革插手軍隊是像防賊一樣的。不准他們進來；也不准軍隊有中央文革的代理人。李德生當總政治部主任，就是爲了擋住中央文革的張春橋進軍隊的。」

「第三點，不准軍隊搞四大。六六年五月間，中央發表《五一六通知》之後，中央軍委立即決定，軍隊不搞『四大』，祇搞正面教育。一九六七年一月底，中央軍委發佈了八條命令，三月間，中央軍委又召開了全軍軍級幹部以上的高級幹部會議，對穩定軍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六六年十月，林彪確實同意了軍隊院校搞四大的《緊急指示》，這當然是錯誤的，給軍隊帶來了嚴重的後果，這個文件是誰起草的？是全軍文革起草的，用來將老師軍的，林彪、葉帥、聶帥是不得己而爲之。」

「第四點，不准江青一夥橫行。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一夥沒有奪去軍隊更多的權力和軍隊沒有亂，林彪是有功的，軍委辦事組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九一三』之後，江青一夥大發橫財的主要『資本』就是他們抓住了『林彪反黨集團』反江青一夥的事實。」

「你說的那些，不在我們審問的範圍之內。根據你同林彪的關係，我們認為你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主犯。」

確定我為「反革命」的證據

高檢預審組在先給我戴上「主犯」帽子的前提下，進一步就要找到我的「反革命」證據。他們指出如下五個問題，其實都是撈稻草。

第一，關於燒燬材料的問題。

「爲了掩蓋你同林彪的反革命關係，『九一三』之後，你燒了很多的材料。你應當老實交代！」

「『九一三』之後，我的老伴和大兒子確實燒過一些和林彪、葉群合影照片，葉群、陳伯達寫的詩詞等無關重要的東西，有些東西也是我交代秘書辦的，燒了什麼，在秘書的工作日記上有記錄。要是反革命材料，我還能讓秘書經手去辦嗎？我的工作文件、資料，有關工作方面的檔案，不會少一件的！」

「既然你燒的是不重要的東西，爲什麼又要燒？」

「『九一三』事件發生以後，燒了一些東西，主要目的是不想讓別人知道我和林彪、葉群關係密切。現在想起來，毫無必要。李作鵬就沒有燒，難道他就不是你們所說的主犯了嗎？」

第二，關於反對徐向前的問題。

「你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就惡毒攻擊徐帥。你反對徐帥就是犯罪！」

「徐向前利用職權，把我推到二醫大『紅縱』的虎口上送死，我就不能反對他的錯誤？況且，徐帥不止一次向我道歉，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徐帥也向我道了歉，當時很多人都在聽。如果是犯了罪，我根本上推脫。可是，我的犯罪是從徐向前那裏來的。他利用軍委副主席的職權，把我推到二醫大『紅縱』虎口上去，當時正是造反派搞武鬥最厲害的時候，『紅縱』是要把人往死裏整的，這是什麼問題？難道我就不是老

幹部，就可以讓人任意宰割，而且，當時陪鬥的還有很多總後的其他領導呢！當時葉帥、聶帥對徐向前極不負責的做法是很氣憤的。這個問題，如果我同徐向前的關係打個顛倒，我要是有權力把徐帥推到二醫大『紅縱』的虎口裏去挨鬥挨打，今天扣到我頭上的帽子就是不折不扣的謀殺徐帥了！隨著文化革命的結束，我和徐帥的疙瘩早就沒有了，徐帥在歷史上是有大功的。我看你們未必是爲徐帥『伸冤』，徐帥也未必同意你們這樣做。你們祇不過是藉著徐帥的牌子打擊我就是了。」

第三，關於「砸爛總政閻王店」問題。

高檢預審組指控我：「你是參與砸爛閻王店的積極參與者」。

「這是毫無根據的。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在天安門城樓上，林彪說了『砸爛總政閻王店』的話，這句話當時是氣話，當然也是錯話。後來總政軍管了，這是毛主席親自決定的。我倒沒有看到林彪有什麼批示。」

第四，關於「看總政檔案」問題。

「你派人偷看總政的檔案，要老實交代！」

「不是我派人，是我同意了總後文辦的建議。況且，也不是偷看，檔案還能偷看得到？檔案保留下來就是給人看的。關鍵的問題是我當時的職務有沒有批准看總政檔案的權力，如果有就是正常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看檔案的不計其數，比如說，不看檔案，群眾怎麼知道不少老幹部有這樣那樣的歷史問題呢？我看那些砸軍隊機關檔案室，搶走機密檔案的造反派才是違法犯罪呢！他們搶檔案幹什麼？就是爲了看嘛！」

「看總政的檔案就是爲了砸爛總政。」

「這說不上，我沒有看總政檔案之前，總政早已被『砸爛』了。總政若是不爛了，也看不到總政的檔案。」

高檢預審組最後嚴厲地說：「按照中央的有關規定，被審問的人拒不承認，也可以定罪。」

第五，關於總後「死人」的向題。

「死了人總是錯誤的，但這個責任怎麼負？由誰來負？作爲總結教訓，我這個後勤部長、黨委第一書記是要負責的，但把死人問題別有用心地作爲『犯罪的證據』，我是不能接受的。在文革這樣複雜的情況下，全國不知道死了多少人，連國家主席劉少奇，政治局常委陶鑄，彭德懷、賀龍兩個元帥都死了，死人的教訓是很大的。」

因為除了總後死了人之外，不僅找不到我的「反革命」證據，也找不到我的觸犯刑律的證據，所以在總後死人問題上，他們特別賣勁。高檢預審組對湯平、周長庚、張樹聲、申茂興、華迪平、顧子莊、張凌門、王述臣等八人的情況都問了。但對上面的情況，我早就向中央審查小組交代清楚了，他們根本提不出什麼新的問題。

高檢預審組，關於總後造反派的問題也對我進行了審問。

他們說：「革命造反派要打擊的主要對象就是林彪反革命集團在總後的代理人邱會作，總是事實吧。」

「造反派要堅決打倒我是事實。但他們打倒我的理由是先在我頭上扣上執行劉少奇、鄧小平資反路線的帽子，然後又定我為中國赫魯夫式的反革命修正義分子。在文革中，造反派從來沒有指責我是林彪的什麼分子，也沒有消滅一個什麼林彪反革命集團。但造反派在文化革命中搞亂了總後機關，對領導幹部進行了兇殘的批鬥，是全軍大亂的典型，這些是最基本的歷史事實。」

「反對你就是和林彪反革命集團做鬥爭！」

『九一三』之後，這麼說可以。『九一三』之前這麼說是不對的。」

可以說，他們的審查都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但他們是不會罷休，即使是搞清楚了的問題，他們在起訴書中也會照樣作為所謂「罪行」起訴的。

在公審之前，不知是證據不足，還是需要找到更多的證據，在秦城監獄對我進行了兩天的突擊審訊。對我的審訊是以最高人民法院的名義進行的，他們來了三個人，其中一個原來見過。唱主角的是新來的，他們說：「今天是談話，不是預審，不做記錄。」他們首先說：「文化大革命對黨、對國家和人民造成的損失是難於估量的！對文化大革命的路線、政策及個人的罪行都到了需要徹底清算的時候了。對這些問題，應當用法律肯定下來。你對這個問題，有什麼想法和看法，都可以說。」他們對問題的提法，可以說是十分尖銳的。

我說：「我首先提一個問題，文化大革命是反革命嗎？」

「文化大革命是什麼性質的問題，中央將會正式做出決定的。但文化大革命中出現了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是肯定的。」

「對我的審查，除了江青一夥在位時期的專案組和高檢預審組逼問我，搞我的反革命證據之外，中央紀委審查小組並未向我提出什麼反革命問題。因此，我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是怎麼一回事，並不清楚。」

「林彪搞武裝政變，謀害毛主席，叛國投敵；江青搞陰謀奪權，不是反革命嗎？」

「現在是公審，不是給林彪下政治結論，每一句話都要有證據。林彪即使有這個陰謀，那個謀害，我是沒有的，我對自己心中有數。那麼，爲什麼還要扣在我頭上一頂反革命帽子，對我的反革命能夠舉出事實來嗎？」

說到這裏，那兩個生面人一個突然站起來說：「這是我們審問你！」

那個主持審問的也嚴肅地說：「我們問到哪裏，你就回答到哪裏。現在你說自己有什麼問題。」

「我的問題，說來很複雜，但又很簡單。在文化革命中，主要問題有三個：一是，我按照中央和軍委的調子攻擊過朱老總；二是，反對過全軍文革極左的一套和組長徐向前；三是，在總後清理階級隊伍中，造反派死了人，對有些人我負有執行政策上的領導責任。」

「這些就是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的罪行。」

「六七年初，在全軍文革指揮下，把全軍省軍區以上的機關和軍隊院校、文體單位都搞亂了。有很多幹部被造反派打傷、打殘，也打死不少人，這就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

「那是群眾運動！」

「現在，我已經知道你們的觀點了。凡是你們決定劃入林彪反革命集團的人，不管大、小錯誤都是反革命罪行；反之，造反派不管犯了多大罪行，都是群眾運動而了之。」

下午開始審問時，他們說：「今天下午，我們把談話的方式改一下。先由我們向你提出問題，你祇能按照我們提的問題回答。」

他們接著問了我如下問題。

第一，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問題。

他們說：「林彪、江青兩反革命集團，必須用法律制裁，否則就不能割除禍根，全黨就不能團結，社會就不能穩定。」

我說：「在文化大革命中，有教訓，有錯誤，但根本不存在一個『林彪反黨集團』。」

「江青的中央文革和全軍文革能夠把全國和全軍許多單位搞得亂七八糟，就是依靠你們所說的群眾組織，依靠這些造反派搞亂的。造反派這樣的群眾組織是中央文革和全軍文革，利用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有理』的提法搞出來的。這些造反派組織被中央文革和全軍文革所利用，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打倒老幹部，搞垮黨委，奪取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革命派也就在同造反派的鬥爭中產生了，因為大多數幹部群眾反對打倒老幹部，反對搞垮黨委嘛！機關幹部要正常上班嘛！革命派是擁護毛主席的，是擁護黨委領導，擁護抓革命促生產。沒有革命派與造反派對立，造反派就更無法無天了。」

第二，全國全軍大亂的問題。

他們說：「搞亂全國全軍就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罪行。對這個問題，你要有足夠的認識，否則就不能深刻認識自己的罪行。」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派就出現了。造反派自稱自己是什麼『左』派，其實就是打砸搶派，這是歷史事實。造反派是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人搞起來的。王力、關鋒、戚本禹是中央造反派的著名頭目，他們都是中央文革的成員，又是中央碰頭會議的成員。他們是站在黨和國家的領導崗位上，指揮搞亂全國、全軍的。而林彪和我們軍委辦事組是擁護毛主席的，但對文革不理解，對江青一夥的中央文革做了鬥爭。軍隊是反對亂的，反對打砸搶的，是堅持在黨委領導下搞文化革命的。」

第二天上午，他們集中審問了我關於「迫害」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審問，同高檢預審組審問的內容和方法都是一樣的。同我「有關」的八個死人都扼要問了一遍。

下午繼續審問來的是兩個新面孔的人，我走進預審室後，足足等了幾分鐘，那兩個人才吞吞吐吐地說：「總政寫了一個報告，提出開除黃、吳、李、邱的軍籍，中央軍委已經批准了。時間過去很久了，報告可能沒有帶來（還假裝摸了摸皮包），可不可以給你看一下。」說完我鄙視地看著他們，什麼話也沒有說。他們也就起身就走了。

整個審查也就這麼結束了。在將近十年時間裏，我經過了江青一夥在位時的中央專案組的審查，中紀委審查小組的審查，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審查。這三種審查，出現了兩種鮮明的對照。中紀委審查小組（包括偵察預審）的審查基本上是執行黨的政策，真正把我的問題搞清楚。江青一夥在位時期的中央專案組和高檢預審組的審查，是一樣的，其目的都是要把我審成反革命。高檢預審組的審查手段，搞的是訛詐，並且是掛著中央牌子和穿著法律外衣的訛詐。預審組的孟慶恩幾次把煙灰缸子用勁在桌子上一敲（如同驚堂木）並說：「我們現在是在審問你！你必須老實！」

搞到這般地步，我心裏就越來越明白了。說我的罪行就是三條：

一、說我們和林彪搞政變。這種話，在毛主席活著的時候，在「四人幫」擅權的時候，扣個政治帽子也可以，但毛主席活著的時候他老人家並沒有下定論（他心裏明白，哪裏有什麼政變），這個問題更沒有和我們見面，從七三年起，我們就被掛起來了。但政變問題，現在作為法律問題提出來，就不簡單了，要有證據嘛！結果什麼證據也沒有，唯一的證據就是吳法憲的假話，在公審前，官方自己也否定了。不過大帽子並沒有拿下來。

二、說我們是反革命。因為我們攻擊了老師，用醫療手段整老師。其實呢？我們攻擊老師都是在黨委會上、幹部大會上，傳達主席、林彪、總理、葉帥的講話精神而已，而且是按中央的部署辦的。在老師治病的問題上都是毛主席、總理親自領導的中央專案組辦的，根本不經過總後，也不經過我。

三、說我們迫害幹部群眾。這個問題的確教訓是很深的，毛主席發動和領導的文化革命，一直是在左的思想下進行的。全黨、全國都亂了，幸虧軍隊相對保持了穩定，為了部隊的穩定，必須清理整治反對黨委，搞造反奪權，搞打砸搶的造反派，和後來清理三種人是一樣的。當然，在這麼一場史無前例的運動中，整過的、整錯的肯定會有的，如果我們仍在工作，我們也會在運動後期進行甄別。在這裏我也坦率地說，我是部長、黨委第一書記，這個賬記在我頭上，我承擔責任，我向整錯的人道歉。對鄧小平來說，反對他們的人是「三種人」，的確也是「三種人」。可鄧小平卻藉著公審的牌子，利用反對我們的「三種人」為自己服

務。他們爲了打擊我們，說我們跟著林彪反對毛主席，反對文化大革命；他們爲了打擊毛主席，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又說我們跟著毛主席干文化大革命。如果說毛主席晚年有什麼錯誤的話，他最大的錯誤就是看錯了鄧小平。鄧小平不是「永不翻案」，而是在他得勢後掘了毛主席和共產黨的「祖墳」。

遞交起訴書

爲了公審所謂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經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批准，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遞交起訴書是公審的第一步，特別檢察廳向特別法庭遞交了起訴書。

八〇年十一月十日上午，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在秦城監獄辦公區，向我遞交了特別檢察廳起訴書的副本。

早飯後，監獄的工作人員手持鏡子和刮鬍刀，到監房來向我說：「今天上午，特別檢察廳向你遞交起訴書，你把鬍子刮一下，把衣服換一下，做點準備。」

「刮了鬍子，換了衣服就不像囚徒了？」我故意說了兩句。

「什麼囚徒囚徒的？上面有交代，你們到底同一般反革命有所不同，還要發新聞照片。我們要使中、外人士都看到，對你們的生活總還是照顧的！」

「最虛偽！」

「不管虛也好，實也好，我們是要按上面的指示做的。爲了管理好對你們的公審，上面派來了工作組。」

上午九時半，一個監管員，兩個穿著制服的武裝警察，來到我的監房。警察向我宣佈：「今天向你遞交起訴書，現在就走！」

我們出了監樓的院子大門就上小汽車。從監樓到遞交起訴書的地方，距離不到五百米，這樣近也要坐汽車，不知道是什麼「規矩」。

遞交起訴書的地方，就在監獄區大門外的左邊。我們到了那裏之後，先在一個房子稍微停一會兒，就由前後各一個警察把我押出場。進場的時候，一個警察向一個官長模樣的人報告說：「被告邱會作帶來了！」這時就有不少攝影機對著我，閃光燈一個接著一個，卡嚓卡嚓響個不停。

法院的工作人員說話了：「你是邱會作嗎？我們是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的記錄員，今天向你遞交起訴書。」

在宣讀什麼文件的時候，我心裏湧起一股特別反感的心緒。我不知道起訴書是什麼一回事，它的作用是什麼？可以說，我是個法盲。我的心緒是怎樣來的呢？是我對我們黨真實的感情而來的。我心想：「我們好端端的共產黨，現在爲什麼搞成這個樣子了？共產黨的法庭審判自己人，難道這就是我們國家的『民主法治』嗎？這就是對文化大革命的『總結』嗎？這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嗎？什麼都不是。這是當權者開創的用法律手段解決黨內問題、鎮壓共產黨老幹部的先例。審判我一個人是小事，但在我後面不知有多少人要遭到殘酷鎮壓了。」

宣讀完文件之後，他們問：「你聽清楚了嗎？要沒有聽清楚，可以發問。」

我祇搖了一下頭，什麼也沒有說。

此時，監獄的工作人員把起訴書副本給了我。要我在一張印好的什麼證件上簽上名字。

「你要辯護律師嗎？你的律師，可以由你自己聘請，也可以由法院給你指定。」

律師是怎樣一回事？我祇從字面上瞭解一點，具體的根本不瞭解。在當時的高壓政治下，律師怎麼可能爲我說話？！

我搖了一下頭。

此時，法院的工作人員好像很爲難。他們不知道怎樣繼續說下去好。他們稍微想了一下，又說：「法院的新制度，被告可以有律師的。」

「我要說的話，連我自己說都不夠，何必還要律師代勞？」

「律師說的同你自己說的，其作用是不同的。」

至此，我就根本不說話了。法院兩個記錄員相對看了一下，他們就宣佈：「對邱會作遞交起訴書到此結束。把被告帶下去。」此時，攝影記者的拍攝又開始了，跟我進場時一樣。

我回到監房後，本來想把起訴書看一下，但怎麼也看不下去。監房門上的窺鏡總是不斷發亮，外面不斷有人在觀察我的情緒。我心裏難受極了，但什麼辦法也沒有，祇好在房子裏反覆踱起步來。這樣一則可以解悶，同時也使他們看不清楚我的面部的表情。

遞交起訴書後的當天下午三時，有兩個人到監房來同我談話。「今天怎樣，感覺如何？」監管員先說話。

「大姑娘上轎，頭一次。我心中無愧，不怕見閻王，何況今天見的還是小鬼。」

「你可以談談你的真實的思想。」

「我對起訴書總的印象是，寫起訴書的人不是實事求是的。」

「中央是會有正確決策的！」

「現在世道不同了，一切都變了！毛主席、周總理要是健在，根本不可能發生公審的事。當然，現在自己要面對公審了，我還是要向毛主席請教的。我想起了毛主席長期教育我的兩句話，即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今天對我特別有用處。我就以這兩句話去對待公審！」

「我祇粗略翻了一下。我對起訴書本身的感覺就是亂說一頓，起訴書開頭就寫的什麼『以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為目的』，這樣的帽子扣在任何人頭上都必死無疑！說也奇怪，在文化大革命中，因為我在臺上工作就是推翻無產階級專政？我真的很痛心。出毛主席的氣，方法多得很，怎麼非要這麼搞呢？」

遞交起訴書後的第五天，最高法院來的三個人，主持談話的人，曾經陪同萬毅來同我談過話，後來是公審的法官。另一個是許宗琪，原總後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長，公審時的法官。另一個人別人稱他吳老。談話時間，從上午八時開始到晚上十時才結束。

他們首先確認了我不要律師後，主持人接著說：「現在談談一個與公審有關的問題。」

「七一年九月六日，李作鵬從武漢回來，同你談了毛主席南巡的問題。所談內容，你以前已經交代了，若沒有新的內容就不必說了。現在主要說一下，他同你談的背景是什麼？」

我說：「你們說的背景指的是什麼？我不理解其意。」

「我們問的是李作鵬同你說的目的是什麼？」

「毛主席的指示誰都想瞭解，更想瞭解毛主席對廬山問題有無新的指示。」

「你們聽到毛主席南巡的指示緊張嗎？」

「這祇能說我自己。我是一點也不緊張，因為我有什麼問題，自己心中有數。」

他們看到對這個問題沒有什麼可問的了，就說：「在公審時李作鵬同你談話的問題，你準備出庭作證。」

下午繼續談。他們說：「今天下午主要聽你對起訴書的意見。你大膽說，我們會如實匯報的。」「首先感謝你們準備聽我的聲音。過去是林彪『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我們不可避免會遭殃；現在是毛主席『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同樣，我們不可避免會遭殃。我知道我講的你們是不會認同的，即使你們心裏認為我說得道理，你們也不會認同的，我就過過嘴癮吧。下面就是我的意見：

「第一點，對我的關鍵性問題，就是在我的頭上扣了一頂反革命的帽子，但在我名下的具體內容，則一條反革命事實也沒有。

「起訴書上首先指的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罪行。他們有也好，沒有也好，都與我毫無關係。因為關了十年，事出有因是『九一三』事件，但審來審去我沒有『兩謀』問題，我沒有『兩謀』問題剩下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在臺上工作的問題了。可是，你們拿一頂『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公用的大帽子，也扣到我的頭上來了，這也就是問題的關鍵。這頂帽子，如果能扣到我的頭上，那也可以扣到當時領導文化大革命的許多人頭上，這樣就不是什麼十個主犯了！

「這裏有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起訴書在表面上好像是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起訴，實質上是對文化大革命的起訴（我沒有提是對毛主席的起訴），是用法律手段判處文化大革命『死刑』，這就是起訴書的核心問題。但是你們對發動和領導文化大革命的直接責任人則避而不談，那你們還大講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就是對法律的不恭了。在文革中打倒了『劉鄧陶』，『彭羅陸楊』，還有賀龍、彭德懷等等，祇算犯錯誤，我們跟著中央的調子對朱德等不恭的話，就是攻擊，就是犯罪，我想不通。法律就是準繩，你們對同一件事用兩個準繩。用人為的辦法確立了兩個『反革命集團』。說句不該說的話，其實這兩個『反革命集團』就是毛主席的代名詞。

「第二點，主犯的問題。起訴書上定我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之一，這是奇怪得不可思議的問題。一個人成為反革命，一定會有

反革命綱領，反革命活動和反革命事實。這些爲什麼在起訴書上不寫出來。既然我是『主犯』，我在反革命集團中是什麼位置？給我的任務是什麼？對這些任務我幹了哪些？公審畢竟不是扣政治帽子，而是要有根據，你們也該給我做個定論。你們定我『主犯』的唯一根據，就因爲我是黨的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但你們又不敢寫出來。這就是起訴書的虛僞。你們能說不是嗎？！

「再次，我是反對江青和以江青爲核心的中央文革，後來叫『四人幫』的，也是反對造反派的。我是受過造反派的嚴重摧殘的，這些你們未必不知道！從起訴書上來看，你們恰好把當時革命派和造反派的位置對調了一下，用權力能改變歷史事實嗎？就總後的具體情況來說，你許宗琪（同我對面坐著）也不會忘記六七年一、二月間的具體情況的。造反派爲什麼要把我往死裏整？就是因爲我是共產黨的總後勤部長，黨委第一書記。」

「受審的不是你們幾個人，是一批人。中央文革、中央碰頭會議成員都是支持文化大革命的。」

「周總理也是中央碰頭會議成員！」

「周總理是違心的！」

「我怎麼就不是違心的呢？」

「你後來也是中央政治局委員。」

「現在我懂得了。你們把我定爲反革命的根據就是因爲我是政治局委員。」

「第三點，全軍文革組長徐向前運用職權命令我到二醫大『紅縱』虎口上去送死，把我打成重傷，幾乎打死，這是什麼問題？這就不是犯罪？我是總後勤部長、黨委第一書記，我就不是老幹部？我就不是受迫害？上級對下級怎麼做都是應該的嗎？何況，我祇在黨的會議上批評過徐，通過黨組織搞過他的材料，這就是罪大惡極？這裏還需要說一點是，徐向前的材料，並未公開。當時，軍委辦事組組長黃永勝不同意公開徐向前的材料。同時，我考慮到徐向前爲黨做過很多有益的工作，當時還是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是元帥。我對徐帥當時是顧全大局的。我承認有個別問題的提法，有失之過重的地方。但徐向前對我打擊的手段，也不是我們黨的政策吧？」

「第四點，對迫害幹部和群眾的問題，過去對這個問題，我說的很多，今天祇簡單說些問題。起訴書上指控我迫害了 462 人。對這個問題，不知你們是怎麼計算的。如果我反對造反派就算『迫害』那就大大超過上面的數字。對造反派，我祇有兩條路可走，一和是同他們同流合污，一條是嚴肅治亂。我是堅決同造反派鬥爭的，在治亂中，我也『傷』了一些人，這是損失，我承擔責任。但你們說當時該不該治亂？你們說爲了機關能正常工作，應該怎麼辦？」

許宗琪說：「你迫害群眾的數字祇算你點過名，有批示和劃過圈的。」

「好，這裏我說三點：一是，上級對下面報告的批示，即使有批錯的，是工作上的錯誤，還是觸犯刑律？二是，如果批錯了就是犯罪，那麼你們就加到比我職務高得多的人頭上了。例如，陳政逮捕法辦就是徐向前批准，由衛戍區執行的。三是，那些經我批示的人，我能認識幾個？你們能說清楚點吧。」

「總起來說，我不是反革命，更不是什麼主犯。」

這次談話，他們主要是要我的態度，拚命記錄。

從此以後，我對公審一點信心也沒有了，他們完全是在做戲，我不能陪著他們演戲。我想到了彭老總當年的一句話：「要什麼給什麼。」我祇想趕快走完每一個過場，生死都不在乎了。

第四十三章 「公審」鬧劇

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公審，就是公審文化大革命，更確切一點說就是公審毛主席。正是因為如此，審判的法庭才掛上一個「特別法庭」的大牌子。

宣讀起訴書

十一月十七日晚，我在監房內接受了受審的傳票。什麼叫傳票？過去連這個名字也沒有聽說過。看來，越虛偽的行爲，其表面做法還越周到。

晚上八時許，一位特別法庭的工作人員到我監房來了。由於腰痛，我躺在床上，那位官員一進門，我就掙扎著起來，但起來得稍微慢了一點。就在此時，那個傢伙怒火萬丈地向我命令說：「你給我站起來！」他離我很近，說話的唾沫都噴到我臉上來了。

我也是怒不可遏，索性不起來了，立即回答了一句：「老子就躺在這裏怎麼樣？」我想，你要想用兇惡的辦法來對付我，連門也沒有。

爲了便於公審，八月十九日晚八時，就把我送到公安部院內去了。這是我七六年十二月三十日關到秦城以來，第一次出監獄的大門。

下午三時多，監管員一手拿著鏡子，一手拿著刮鬍子刀來到監房裏，對我說：「今晚上，可能要到出庭的地方去，提早把鬍子刮一下，做點準備。」

我的衣服裏外都爛得不像樣子了，監管員看到我穿得那樣破爛說道：「這樣還能出庭嗎？」

「爲什麼不能？又不是走親戚！」

公審兩天以前發給了我一套藍色的罩衣。

我對監管員說：「我真想穿著一身破爛去，這麼多年都在吃苦，快公審了才給件衣服，不是替他們貼金嗎？況且，衣服也沒有扣子，怎麼穿？」這下，來了兩三個監管員，忙了一陣子。有的給我縫扣子，有的趕緊去給我找鞋子。我的棉衣爛得不成了，一個多月以前，我自己把它稍微縫補了一下，結果是兩邊長短不一。穿上罩衣露出一塊很長的破布，接著監管員又立即把我的棉衣修補了一下。我心裏想，公審「很好」，幾年未解決的穿衣困難問題在兩小時之內就解決了。

晚上八時半，把我押出去了。上汽車之後，由秦城到沙河有一處大轉彎的地方，可以看到車隊的燈光照的像一條長龍，我在車上看，前後都看不到頭。一路上，除建國門立交橋沒有見過外，其餘的都似曾相識，對依稀聽到的和看到的都覺得很新鮮。在「井底」下生活將近十年了，現在第一次到「井面」上來了，哪有不新鮮之理！

當汽車駛過長安街後，不到幾分鐘，就從公安部大院的東門進去了。五五年鎮反運動時，我來公安部開過若干次會議。那時我是鎮壓反革命的領導幹部，今天我自己倒成了「反革命」了，這是當權者製造的大冤案！現在的中國，什麼事都可以發生，想不到的怪事，還在後面呢！

我在公安部住的地方是一個筒子樓，衛生間是公用的。好像住得很擠，我在房子裏聽到過陳伯達、吳法憲的說話聲，但我沒有見到過他們。

十一月二十日下午三時整，在公安部禮堂正式開始審判十名「主犯」了。這十名主犯，除了江騰蛟之外，其餘八名是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王洪文是十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這是震驚中外的大事，是我們國家空前的「創舉」。

在開庭的幾小時前，法院有兩個工作人員，到房子裏來同我說過話。他說了很多個「不准」，例如，不准說話，不准東張西望，一切行動都要聽法警指揮等。他還說：「在法庭上，法警對被告有權按法律行事！」對他們的話，我不僅沒有回答，連聽也不願聽。我這個人最討厭煞有介事，裝洋蒜。

我住的地方離公安部禮堂祇有一門之隔。我由三個法警押著，到了禮堂門口稍為站了一會兒，從擴音器裏傳出江華的聲音：「傳被告邱會作到庭。」兩個法警左右押著，我泰然自若地走進了法庭。進門，我看到

禮堂坐無虛席，黑壓壓的一大片都是觀審的。法庭裏，對著我的攝影記者，多得不計其數。

在法庭裏，被告一字形坐在臺下。陳伯達是用手推車推進法庭的。陳伯達是大革命時代的老黨員，在毛主席身邊工作幾十年，對宣傳毛澤東思想立過大功。他一生最大的業績就是花了很大心血整理好了毛澤東選集一到五卷，起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對陳伯達，人們都稱之爲老夫子（有學問之意），現在也上了法庭。

被告全都到齊後不久，臺下的法警向臺上報告說：「報告庭長，被告李作鵬心臟病發了！」江華一句話都沒說，祇稍微揮了下手，意思是推出去就是了。

當聽到李作鵬心臟病發時，我不顧法庭有多少個「不准」，扭過頭去看他，一直看到他被三輪板車推走爲止。李作鵬心臟病發作的慘狀實在令人慘不忍睹！他痛得坐不住了，身體縮成一團，連眼鏡也掉了下來。他用手抓住胸前的衣服，頭靠在地上抬不起來了，簡直到了奄奄一息的程度！我親眼看到兩個法警，一個在前，一個在後，重手重腳地把他抬上三輪板車。

公審開庭，江華院長主持，黃火青、史進前一前一後，宣讀了起訴書，史是照本宣讀，看起來精神很緊張。黃比史更緊張，黃宣讀時滿頭大汗，用濕毛巾在腦門上擦了多次。黃是一個比較正直的人，他很可能由於職務的關係，不得不執行命令。史就不同了，從他宣讀的表情來看，對被告仇恨極大。江華、黃火青、伍修權都是我們的老戰友，我們之間無怨無恨，他們在文革中受了苦，不是我們造成的。鄧小平讓他們出來出文化大革命的氣，出毛主席的氣，沒有膽量，就拿我們出氣。臺上來坐著還有不少軍隊的反黨亂軍、打砸搶的代表人物，文革中爲了穩定軍隊，爲了清理他們這些「三種人」，他們受到了黨紀軍紀的制裁，現在反過來說成受了我們的迫害，這是最讓人氣憤的！也使我對當局失去信心。

今天開庭就是宣讀起訴書。宣讀完起訴書之後，江華即發出命令：「被告退下。」江青退下時，有人要扶著她走。她神氣十足地說：「我自己能走！」我向後一看，她昂首挺胸地走出去了。接著，我聽到黃永勝的咳嗽聲音，扭頭一看，真把我嚇一跳，黃穿了一件長短、大小都很不合身的軍裝，腰彎得像個月牙，比過去好像矮了一截。他有氣無力地拖著雙

腳，一步一步地向外走去。從他走路的神態來看，邁出每一步都十分困難。我當時心裏很難受。

黃永勝是參加秋收起義的著名的戰將，今日竟成了「自己」法庭的囚徒。這真是天翻地覆呀！早在江西蘇區時期，由於他作戰有功，在瑞金中華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上，曾獲得「紅星」獎章。當時，獲得獎章的人不多。大家都在傳告，誰得了「紅星」獎章，誰就永遠拿到了免死牌，可見「紅星」獎章含金量之高。解放後，他又獲得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這三枚勳章說明在中國革命的漫長征程中，黃永勝是頂級的英雄！但這一切並沒有爲他消除奇冤大辱。

七一年「九一三」以後，除查我們的「兩謀」問題外，還說我們反對毛主席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反對江青一夥。十年後的公審，又說我們和「四人幫」是一夥的，是擁護文化大革命的。可見他們的思想是多麼混亂！

十一月二十一日晚，由公安部返回秦城。爲什麼沒有受審就回秦城，當時是不得而知的。

第二審判庭

第二審判庭設在空軍學院，對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江騰蛟進行審判。

大約是十一月下旬我們就住到了空軍學院，我沒有手錶，也沒有報紙，是無法知道日子和時間的。每天的白天、黑夜之分，也祇能是以窗戶透進的光線爲準。這種黑暗生活的滋味，沒有身臨其境的人，是無論如何也體會不到的。

對空軍學院我是比較熟悉的，從建院開始我就參與其事。特別是該院要建個禮堂，是空軍司令劉亞樓同我具體商辦的。另外，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是周總理處理西北問題的助手。我還陪同周總理，在學院禮堂接見過新疆、陝西、寧夏等省區的來京代表。我同空軍學院禮堂是有歷史緣份的，但萬萬沒有想到今天竟成爲審判我的法庭所在地。

在空軍學院，我住的好像是圖書館，我睡在一個大房間裏，用木板給我隔了一個「房中之房」的小間，我就睡在裏面。

在空軍學院的物質生活，比秦城好多了，除了被褥是軍用品之外，其餘的一切都是新的。特別使我感到久違的是，有吃飯的筷子、磁碗、勺子等，這些在秦城都是禁用的。伙食雖然一般，但與秦城也有天壤之別。特別是使人難於忘記的是，在學院期間，還吃過兩次囚徒不能吃到的水果，看到水果我都感到稀奇！

我是晚上到空軍學院的，第二天早飯後，有兩個監管員到我的房間來，其中一個就是原來中紀委審查小組的負責人劉寶慶（不知是否真名，也不知他的職務）。姓劉的說：「我現在負責對你的監管工作。中央對你的政策是不會變的，包括萬毅同志代表中央向你說的政策性（寬大處理）的話，都不會變的。對你的處理，還是要經過一定的法律形式就是了。」從此之後，劉寶慶幾乎每天至少都要到我的房間來一次。都到了這個份上了，他們還在忽悠我，但也不排除他真心希望我有個好結果。因為自從七月二十三日對我補辦了逮捕手續之後，我的一切想法都變了。他們所說的所謂寬大，也祇是多判幾天，或少判幾天徒刑之別罷了，這對我來說，是毫無意義的事，與我過去對此事的認識完全是兩回事了。

當時，我祇有一條褲衩子，一條破爛不堪的長襯褲和一雙襪子，有時洗了褲衩子，光著屁股睡覺。一天在澡塘洗澡，我先洗長襯褲，放在暖氣片上烤乾，再洗澡。警衛戰士看我的破爛襯褲後，十分驚奇地說：「你的褲子不能穿了！」在場的兩三個警衛戰士和工作人員，看到這種情況，對我表示了同情。他們說：「真是不可想像呀！」過了一兩天，他們給我拿來了兩條軍用褲衩，一件化纖襯衣，一雙襪子，這下算解決了大問題。我對他們表示了謝意！

為我看病的醫生、護士都是解放軍總醫院派來的。他們是認識我的。一位年青的醫生，在看病的時候，同我主動說話：「我是二醫大畢業的，我當然認識你！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你遭受的災難，我看到了很多，真殘酷呀！我親眼看到你的身上都是地上的塵土，還有血淋淋的斑痕。現在我也做不了什麼，趁這個機會，我們能做到的，保證做到。」

在空軍學院的警衛部隊，是衛戍區警一師派出的。他們的領導幹部多數都認識我，對我的態度、作風、禮貌，同秦城的警察實在是不可相比。警衛戰士在值班的時候，他們不僅不會為難我，還盡量給我方便。

即使遇到一時不便辦之事，也會給我說明。像秦城那樣管囚徒的惡劣做法，在他們身上是難於找到的。

我的洗臉水和洗腳水都要從外面打來，每次都是值班戰士給我打的。我洗澡換下來的衣服，戰士們就在澡塘給我洗好，放在暖氣上烤乾，並且還疊得整整齊齊。我每次都誠懇地向他們點頭表示感謝！他們幾乎都立正站著回答說：「我們的心情，你不一定完全理解。我們能為你做點小事，感到很高興！」然後他又悄悄對我說：「是指導員交待我們盡力做好工作。大家都同情老首長。」

在空軍學院，祇要不颳風下雨，我每天上下午都到室外散步，在院子裏曬太陽，除值班戰士之外，沒有監管人員陪同。

五次出庭

在我的記憶裏，到空軍學院之後，差不多有二十天都沒有出庭。我每天也就是吃飯、睡覺、散步三件大事。事不湊巧，我在要出庭的頭天，在室外散步時跌倒，磕壞了牙和臉部，略有輕傷。

第一次出庭時，警衛師的幹部同法警辦了移交手續，並在一個本子上簽了字。以後出庭也是這樣。

我走路有兩手後操的習慣，進了法庭沒走兩步，左邊的法警在我兩手後操交叉處，猛的擊了一拳，並說：「把手放下！」我回頭怒視警察，我已經準備好了，如果他們再敢動手，我就要拼老命與他們對打一頓，可是他們推了一下之後再也沒有動手了，我仍然兩手操後走路。

第二審判庭的佈置，同公安部禮堂的佈置是一樣的。左邊是檢察官，右邊是法官，左右兩排中間的頭一名，左邊是史進前，右邊是伍修權。舞臺的下面臨時拆去了若干排椅子，顯示出了一塊很大的「空地」。對被告還特別做了一個框架式的籠子，裏面放了一張凳子，被告人就坐在裏面，框架外面還左右站了一個法警。

我進入被告人的籠子坐定之後，副庭長黃玉昆就宣佈：「對被告人邱會作的法庭調查，現在開始。」黃玉昆是我的老鄉，不僅我們之間熟悉，連我的母親、弟弟都認識他，因為他每次回家探親都要到我家裏去。我們之間毫無恩怨，他肯定是奉命行事的。

在整個法庭審訊中，我共出庭五次，每次多則兩小時。在法庭上就是捉弄你，如同貓捉到老鼠，在吃之前，一定要戲弄夠了才吃掉是一樣的。我們根本沒有講理的條件，所謂法庭調查就是陪著臺上的人走過場，我已經是案板上的肉，任人宰割，這就是所謂的法庭「調查」的實質。回想起我的態度，認罪不是認罪，自棄也不是自棄，我之所以基本上都認了，因為你認不認都是那麼回事，我不願意和他們共同演這個蹩腳的戲，讓他們耍弄我。他們別有用心一問，我心裏就有火，真是懶得回答，不回答又不成，那就認吧，快點結束吧。因為誰判幾年早就定好了，還調查什麼？就是調查清楚了，他們就敢採納？他們就不判你的刑？可能嗎？！多少年後我才知道，在公審時就是很小的事都要請示中央批准。

第一次出庭主要審問我在「九一三」之後，燒材料的問題。

這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問題，但對我的用心是十分惡毒的。「九一三」之後，我確實燒過一些相片之類的東西，根本沒燒什麼材料。燒東西也祇是避林彪這個嫌罷了。對這個問題，在過去的一系列審查中，我都做了交代，都是十分清楚的。

那麼，法庭上為什麼又這樣虛張聲勢地做呢？因為「燒材料」可以迷惑一點人，好像我們燒了什麼「罪證」，從而可以同「反革命」掛上鉤，



有口難辯。在一九八一年「公審」中。

因此，起訴書上寫的是：「邱會作爲了掩蓋林彪及其反革命罪行，「九一三」之後燒了大量的材料。」這完全是以假亂真，虛張聲勢！

在這次出庭中還提到我送給葉群的一個硯臺，葉群很喜歡這個硯臺，她讓我書寫了一首她自己寫的詩，刻在了這個硯臺上。詩文是：「繁霜冷雨獨從容，晚節尤能愛此功。寧可枝頭抱蕊老，不能搖落墜西風。」我以前並沒有注意這首詩，現在看起來，這首詩寫得不錯。

第二次出庭主要是審問我「誹謗」朱德的講話和搞徐向前材料的問題。

法庭向我提問：「在六八年十二月總後黨委擴大會上，你誹謗過朱德委員長，是事實嗎？」

我一聽心裏就火得很，這真叫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我講朱德的問題是在黨委擴大會議上講的，即使有錯誤，能算犯罪嗎？而且我講朱德的問題，是在八屆十二中全會後，按中央的佈置講的，而且都是鸚鵡學舌的。法庭不是實事求是，而是把事情孤立起來，然後套法律條文。

但一想對著幹也沒用，我說：「我誹謗了朱德是犯罪。我的確在總後黨委擴大會上傳達八屆十二中全會時講過，朱德從井岡山就反對毛主席，他那個總司令實際上一天也沒有『總』過，朱德野心很大，想當領袖……」

接著，法庭向我提問：「是不是指使總後文辦主任王希克整過徐向前的材料？」

關於搞徐向前的材料問題，從開始審查我就說清楚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搞材料是普遍問題。實話說，這個問題的確是徐帥錯了，總後大亂是全軍文革組長徐向前下命令要我去二醫大『紅縱』那裏送死，才大亂的。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徐帥向我道了歉。對這個問題我想未必是徐帥的意思，而是總後造反派向法庭提供的炮彈而已。

對這個問題我講了不少，當我還要講下去時，法官立即粗暴地用很大的聲音說：「你不要講了！」並同時用手一揮，示意關掉擴音器，頓時法庭似乎什麼聲音也沒有了。

晚上，我很激動，也很氣憤。我早就說清的問題，法庭還當成罪名來審我。

第三次出庭，法庭主要是審問所謂迫害總後領導幹部

第四次出庭，法庭主要是審問所謂「鎮壓」群眾的問題。

法官首先說了一些煽動人心的講話。他說：「邱會作和總後副部長陳廳在文化大革命中私設監獄，搞刑訊逼供，迫害了總後四百五十七名幹部和群眾……」。

聽了法官的話，我氣就來了。文革中整人，有整對的也有整錯的，整對整錯都是按照中央的部署來的，都是在文革中複雜混亂的環境中造成的，都是在黨委常委會上研究的，都是當時的工作，法庭拿出來的證據都是各種會議上我的講話。在文革中就是按照中央清理階級隊伍的部署辦事，現在否定了文革，就是承認錯誤、總結教訓。當然整錯了人，整過頭了，整死了人，我這個後勤部長、黨委第一書記是要負責任的，負責是爲了接受教訓，但法庭是作爲炮彈向我們打來。毛主席說：「專政是群眾的專政」，究竟怎麼個專法？「九一三」以後把我關起來是不是私設監獄？把我關到秦城近十年才宣佈逮捕，又算什麼？但心裏想的這些話又不能說出來，一說出來就上了當，引到反毛主席上面去了。所以快認快結束算了，這就是我當時的思想。

然後，法官就把總後常委會的記錄，我的講話，給林辦的電話記錄，我在總後佈置工作的講話等等，讓我辨認。這些當然都是真的，我祇能認下來，關鍵是這些東西怎麼對待，怎麼用。是孤立的用法律條文卡住，還是根據文革中的具體情況實事求是的分析。

提到「迫害」，不提緣由，不提「受害者」當時的所作所爲，那我還有什麼可說的呢？比如庭控訴我迫害總後政治部幹事陳政，他解放初期就是公安部的內控對象，文革中又反總後黨委，搞造反，究竟應不應該對他審查？！況且逮捕陳政是全軍文革組長徐向前批准的。還有到庭控訴我的總後營房部助理員張錦昌，他在文革中是造反派頭子，反黨委，揪鬥老幹部，打砸搶。這就是貨真價實的應該清理的「三種人」，祇不過當時爲了軍隊的穩定我早就把他們清理了而已。

法庭上指出的總後死了八個人，我有一半不認識，當然不認識並不等於我沒有責任，關鍵是怎麼對待這些問題。從中央來說，劉少奇、陶鑄、賀龍、彭德懷等等黨和國家的領導人都死於文革中，應該說責任在毛主席，但不能說毛主席犯了罪。文革的問題對我們不能搞兩個標準，

尤其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發明者彭真，在領導公審時更不應搞兩個標準。

法庭提到湯平的死，我是感到非常痛心和追悔莫及的。湯平的老婆劉伯音上庭控訴，話不算很長，有些話也不夠真實，但過頭話也不多，主要說的是湯平死的經過情況，對湯平怎樣死的卻避而不談。湯平是我的老戰友，對我的工作一直很支持，因此，劉伯英的話音一落，我立即說：「湯平部長之死，在執行政策上我負有責任和沒有保護他過關。我是有能力保護他的，但我沒有及時做到。我現在向同我在一起工作的老戰友湯平的妻子請罪。」

對於法庭指控的事，你不認法庭也不會罷手的，所有問到的事，記得起來記不起來的我都認了，認了也不能說就是事實，法庭不是我說話的地方。晚上，劉寶慶等來我房子「閒談」。我說：「運用職權，又穿上法律外衣整人，是政治上最卑鄙的！像鄭洪泰、陳政、張錦昌這樣的反軍渣滓，都拿到法庭上來做爲真槍實彈使用，真是無聊到了極點！他們的本領太低劣了。」

第五次出庭的審問是結束式的。提到的問題很多，沒有什麼主題，時間祇有一小時多一點。今天法庭的特點是：法警川流不息的傳什麼「證據」給我看。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日下午，法庭開庭進行了所謂的公開「辯論」。辯論時間共四十五分鐘，檢察官王瀑聲，用什麼「公訴人」的身份對我「公訴」的時間佔去約三分之二。我的發言和伍修權的問話一共才十五分鐘。

王瀑聲對我的「公訴」共分四部分：（一）積極投靠林彪，參與林彪的反革命陰謀活動；（二）積極參與誣陷黨和國家領導人；（三）積極追隨林彪「砸爛總政」的活動；（四）迫害幹部獨霸總後領導大權。

在王瀑聲「公訴」之後，法官即要求我做最後的陳述。我知道法庭的什麼所謂「辯論」是虛偽的，故不參與辯論。我祇簡單的說了幾句話：

我是從小在革命隊伍中長大的。我的一生看到了我的上兩代和下兩代，連我自己五代人受到了共產黨的恩。今天，我還是相信共產黨，並且永遠相信共產黨。現在，在我們「自己」的法庭上，我從肺腑裏發出我的聲音，高呼：我們偉大的共產黨萬歲！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

審判後，我這樣想：公審是中央決定的，雖然是鄧小平錯誤的決定，但也畢竟掛著中央的牌子。自從「九一三」之後，無論把我送進衛戍區、關進秦城監獄、公審，我都是服從中央決定的。我根本不會與中央對抗。因為，文化革命的整個路線及文革中的具體方針部署，毛主席要負很大責任的，這是很明顯的。在法庭上，你一辯論，很容易就被他們利用去做一個反對毛主席、反對共產黨的小醜，這點我是絕不會做的。

判決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上午八時，在北京公安部禮堂，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十名「主犯」宣佈判決。震驚中外的「公審」到此結束了！

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庭長江華宣佈黃永勝判處有期徒刑十八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吳法憲判處有期徒刑十八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李作鵬判處有期徒刑十七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邱會作判處有期徒刑十六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所有人判決前的關押期間，均抵押刑期。

一月二十四日晚，由秦城監獄去公安部禮堂接受判決的情況，同兩個多月以前去受審的情景是一樣的。不僅大的方面一樣，小的方面也幾乎是一樣的。例如，事前監管員照樣給我拿來刮鬍子刀和鏡子，要我把鬍子刮一下，去受判決也要「打扮」一番。到了公安部，一切都同上次受審時也一樣。睡覺、拉尿都在原地方。不過，宣判那天早上那頓早飯還是不同的，吃的好大米乾飯，有一個很大的紅燒丸子和一塊醬豆腐。從空軍學院受審回秦城之後，伙食就太差了，後來才知道公審時吃得好一點，是爲了讓我們公審期間身體別出事，是爲了他們，不是爲了我們。

在宣判的四小時內，我看見李作鵬兩次服用過硝酸甘油，他身體不好，真可憐。

宣判大會由江華主持，一開始就是宣讀判決書，判決書從頭至尾一字不漏都讀完了。江華宣讀判決書的前部分，伍修權宣讀中間部分，最後判決部分又是江華宣讀的，宣讀判決部分，他頭上一直是冒大汗，整個臉部都是通紅的，他不斷用毛巾擦汗，江華把昔日的戰友，變成今日的專政對象，可能有些想法。

宣判的第一名就是江青。江華宣佈：「判處江青死刑，緩期兩年執行。」話音一落，江青立即站起來，用最大的音量並拉長嗓音說：「革命無罪！打倒以鄧小平爲首的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此時，江華有點措手不及。坐在他旁邊的副庭長伍修權，同樣漲紅著臉，他也大聲說：「江青胡說！住口，把她拉下去！」江青是壞人，但江青是硬骨頭。

江青是鎮壓過我的，我也是堅決反對她的。但我認爲判處江青死刑是給她樹碑立傳。她在文化大革命中除了自己的錯誤之外，主要是執行毛主席的路線，在個人作風上雖然也令人討厭，但這些仍然是黨內路線問題和個人品德問題。我認爲，要堅決制止把路線問題當作反革命問題來處理，這在黨內是重要的大問題，一個黨的主要領導者，要具備的條件很多，但有一個絕對不可少的條件就是：祇能有公敵，不能有私敵。一個人無權的時候，受到別人鎮壓，這是別人的問題；但當自己又有權的時候，就用職權進行報復，這是十分惡劣的行爲，萬萬使不得，而且這樣做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同時，這樣做也是黨內和社會長期不能安定的主要因素。

對我的判決是大錯特錯的，是空前的大冤案。因爲用「公審」這樣的辦法來解決黨內路線問題，來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批評毛主席晚年所犯的錯誤，從根本上就錯了。在我的判決書上除了前面的大帽子外，對我的「罪行」滿打滿算不到三百字，而且一條反革命的事實也沒有，一條觸犯刑律的事實也沒有。

宣判結束後，我立即被押回秦城。我記得，我由空軍學院回秦城監獄是十二月十九日還是二十二日。

這次就不是坐小轎車，和我同車的有王洪文、姚文元、江騰蛟等。在車上，有三、四個警察，有一個手持一根黑警棍，那是一個什麼東西，幹什麼用的，我當時並不知道。

回到秦城監獄，我還是住在原來的監房，我進了監房就看到桌子上有一小碗白菜幫，兩個窩窩頭；當時，我還以爲是誰在這裏臨時住過，吃過飯剩下的食物。我坐在床上，大約有半小時，一個監管員進來同我說：「你吃飯啊，這就是你的飯！」此時，我才知道，伙食變了，變得更差了。我沒有吃就睡了。一九八一年，我已經六十六歲

革命，到判決的時候，已經有五十二年的革命歷史，這樣一個老革命、老黨員、老幹部，就無辜地死在自己人手下。

難友合監生活

公審後，監獄似乎有許多的變化。其中可以使人感覺得到、看得見的有如下幾點：

一是，工作人員的態度有很大的變化。幾個「兇惡」監管員沒有再露面。過去對我的態度好的，現在也同樣很好，所有工作人員的態度都好了起來。

二是，從六月三日中午起，伙食變了。中午開飯的時候，送飯不是一個人，而是三個人，同時推來了三輛車子。吃的兩菜一湯，並還有小菜(醬菜、豆腐乳、辣子)。菜的數量可以隨便要，主食是大米、白面，沒有粗糧了。每隔一天的晚飯，不是包子，便是餃子。

三是，注意囚徒的衛生防疫。我住的房子，每個星期都要用藥水噴灑一次。醫生每天都到牢房來一次，需要什麼藥，可以立即開處方。此外，還督促幫助洗衣服和曬被子。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在這幾年裏，是從來沒有過的新鮮事。

從這些情況可以看出，監獄不是沒有條件對我們「好」，而是願不願意對我們「好」。當然願不願意的權力在上面，這些人，被別人打成反革命時，天天喊冤；可是，他們把別人打反革命時，一點不客氣，心狠手毒。這還算共產黨嗎？！

公審之後，八一年七月十五日中午起，王洪文、吳法憲、江騰蛟和我四人，合監住在二十二樓。那天上午約十時許，監管員突然叫我：「你到這裏來一下。」我跟著他，走進一個房間就看到他們三個人坐在那裏動也不動，對吳法憲，我一眼就看出來了；對其他人怎麼也想不起來。

監管員說：「從今天起，你們四個人就住在這棟樓。你們相互間可以來往，可以談話，可以在一起活動……」我們四個人共同生活就開始了。二十二樓的監管員很快送來了象棋、撲克，還搬來了一張小桌子放在走廊裏。獄方不斷來人督促我們在一起玩。但我們四個人，剛開始對監管員說的幾個「可以」，一個人也沒有可以一下。大家都呆在自己的監房裏，不出門，不來往，不說話。

合監後第二天下午，我們稱他爲光頭主任的監獄的負責人，在兩三個工作人員陪同下，到我們監樓來了。他在走廊裏大聲說：「你們怎麼都在自己的房間裏，爲什麼不出來走一走，大家在一起玩玩？」聽到他的說話，我們都先後到走廊裏來了，光頭主任很自然的同我們大家坐在一起閒談起來。

光頭主任好像很有感慨地說：「把你們幾個搬在一起，就是要改變一下你們的環境。幾年了，說話的機會都很少，這些我們哪能想不到呢？不能這樣了，大家若不在一起說說，將來到外面去都不會說話了。」對他那句「將來……」的話，我倒真的楞了一下，認爲是一句有用的話。

光頭主任走後，我們還是各自回自己的房子裏去，根本無心走在一起。人人心有餘悸，「共產黨」的臉說變就變，大家怕上當。

祇要天氣好，每天上、下午都放風。監管員幾乎每天晚飯後都來叫喚：「出來走走呀！」有一兩個監管員乾脆到各人房子裏去把人拉出來，並且還陪著我們一起玩撲克，下象棋，說閒話。除了颶風下雨外，天天都是如此。我們這種生活待遇好像上昇到同沈醉寫的《我這三十年》的監獄生活差不多了。從沈醉的書上來看，他在監獄比起我們來，還自由多了，待遇高多了。例如，他可以抽煙，還有什麼文藝生活等等。可見共產黨的監獄，對國民黨、共產黨有區別的。對國民黨戰犯、特務寬得很，對共產黨的老幹部嚴得很！

我記得，在八月什麼時候就開始允許看電視了。開始是黑白的，後來就是北京出產的十四寸彩電了。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自己國家產的彩電。開始，每個星期看一次，後來每隔一天，或兩天看一次。我們曾要求多看點電視，監獄的人直接了當地回答說：「輪不過來。你們又不都能在一起看。」這句話說明，關在二十二樓的不止我們四個人，還有別的人。

我們住在一起之後，江騰蛟好像成了「組長」，監獄裏有些什麼小事都找他辦。監獄讓學習，我感到很好，因爲在此之前很久沒有看報紙了，什麼也不知道。一天，監獄讓宣讀《解放軍報》一篇文章，其內容說鄧小平是學習毛主席的榜樣。宣讀之後，進行了討論，但沒有人發言。

八一年八月一日，我同王、吳、江和好幾個監管員及護士等人在馬路上拔草，這是在監獄唯一的一次勞動。這次可以說是勞動，也可以

說是遊戲。拔草的時候，大家有說有笑。那天還適逢空軍表演，吳法憲看得津津有味，一個空軍司令看飛行表演，不是在主席臺上，而是在監獄的放風場上。

合監以後，在生活上確實有些變化。從自己的小牢房能夠自由自在地踱到走廊裏，對囚徒確實是一個很大的「解放」，從形影相吊改爲多人相見。當然，這種改變祇是生活環境的變化，對個人思想來說是毫無作用的。對我公審就是最大的冤案，在我有生之日是改變不了我的觀點的！

王洪文、吳法憲、江騰蛟和我四人合監的時間不到兩個月。我們除了在一起「玩玩」之外，最主要的還是互相瞭解各人不同的境況，有些這些問題，我是有生以來聞所未聞的。我們幾個人在一起，主要談了吳法憲的「假交代」，王洪文的「痛苦難忍」和江騰蛟的「有苦難言」三個方面的問題。我則說了生活上暗無天日的問題。通過這些問題，使我進一步瞭解到，中央專案部門對老幹部打擊之殘忍是前所未聞的！

這裏首先說吳法憲的「假交代」。吳法憲是一個容易被引誘上鉤的人，在交代自己的問題上也是這樣的。他對我們三人（吳法憲、葉群、邱會作）一九七一年八月八日在毛家灣葉群家裏一起談話之事就做了假交代。

七一年八月八日，周總理要吳法憲到葉群家去拿毛主席寫給林彪的「龜雖壽」手跡，想送給「病」中的康生看一看，吳法憲叫我同他一起去了。對這個問題，我沒想到吳法憲竟會說假話，而且他把假話說成是我們商量策劃陰謀政變的反革命問題。

關於這個問題，江青一夥在位時期的中央專案組和公審前最高人民檢察院預審組，對我都是作爲重大問題，決定我「反革命」的關鍵問題進行審問的，追得特別緊。他們爲什麼對這樣一個普通問題追得那麼緊？我懷疑過其中必有什麼原因，但沒想到是吳法憲說假話引起來的。

一天，我們在一起閒談，我說起了「八月八日」在葉群家談話的問題。吳立憲立即緊張起來，並一下擁到我的肩上流著眼淚說：「老邱！對不起你，我說了假話，可能對你有連累。我交代過，八月八日，在毛家灣，葉群和我們說的主要是『要準備政變的問題』。」

「爲什麼要說這樣天大的假話？你不祇是連累我，你還連起累了黃李，連累了解放軍！你給江青（沒敢說主席）幫了大忙。他們找不到定我

們參與『政變』的臺階，你把大家送上了這個臺階。你的假話，對我不能沒有影響。不過事情已經過去了，對得起對不起都沒用了。我心裏很明白，對我們的公審決不是僅根據你的假交代決定的，沒有你的交待他們照樣幹。我不怪你，你放心好了！」

我這麼說後，吳哭的更傷心，他說：「是他們逼我說的。他們說這是給我提出了找出路的方法。我就是照著他們的需要說的和寫的。結果什麼也沒搞到，還是關到現在。」

王洪文說：「我想起了，一次李震、郭玉峰、吳忠三人向中央政治局匯報時，曾經說到你們在葉群家談話的問題。總理最後是這樣說的，八月八日吳法憲、葉群、邱會作在葉群家議論的問題，是目前已經發現的最重大的問題，起決定作用的問題。但這個問題，吳、邱的口供不一致，對他們處理問題，今天就不討論了，待把『八八』問題搞清楚後再討論處理。我記得對你們的問題也就拖下來了。」

吳法憲說假話當然不對，但說明他們很需要吳的假話，想把我們往「兩謀」、「政變」上連。如果他們有了林彪「兩謀」、「政變」的確鑿證據，也不會無數次地追問這個『八八』問題了。

王洪文被捕後，所經受的痛苦是駭人聽聞的！我們合監之時，王洪文因腦子受創傷還不能做系統的談話。他說的常常是東拉西扯，詞不達意。

我們的談話是從談粉碎「四人幫」開始的。江騰蛟同王洪文比較熟悉，江對著王說：「現在你房子裏鋪著地毯，還有專門值班的警察，把飯送到你房子去。你還是副主席待遇嘛！」

王洪文苦笑著說：「你怎麼挖苦都可以！其實，我能夠自己走路，時間還不長，我每天都會跌倒在房子裏，這些日子是怎樣活下來的，我祇能模模糊糊地記起來。」

王洪文接著說：「毛主席去世後，我們考慮會被排擠出去，沒有想過會被抓起來。七一年『九一三』之後，特別是黨的十大之後，我們特別相信毛主席的威望，我們把自己的命運同毛澤東思想深入人心聯繫在一起。其實，康生去世後張春橋比較沉悶，江青過份相信自己的夫人『尊嚴』，在毛主席去世前，我們已經是比較鬆散的了。」

「我現在的身體為什麼那樣壞？要詳細說，話就長了。他們給我上的刑具是現代化的，那種手銬一動就會自動緊固。你不掙扎還罷了，要是

用力掙扎就會隨之加緊，手緊箍得腫脹，疼痛難忍。我開始是關在人民大會堂的地下室，在我睡覺的房子內裝有一個可以定時自響的儀器，聲音不算很大，但有鑽心的感覺，對人的精神刺激特別厲害。聽了這種聲音之後，無法入睡。這樣無論晝夜都不能睡覺，我瞌睡的程度，別人是難於想像的。有一次我在喝開水，水還沒有進口就睡著了。接著就『啪』的一聲響，我睜開眼睛，開水還是溫的。到了監獄之後，是每兩小時『查房』一次。他們查房每次都要同我說話，即使睡著了也要叫醒，從不例外。

王洪文說：「爲了要什麼材料，對我搞車輪戰術是常事。有時說著話就睡了，他們曾經幾次給我注射過針藥。祇要注射了那種藥，無論怎麼樣也睡不著，心裏煩躁得特別痛苦。我堅決拒絕打針，他們就強給我注射。後來的交換條件是：祇要好好交代就不打針了。」這時吳法憲突然說：「媽的，也給我打過針啲！」很快吳好像發現自己「失言」，起身就走了，邊走邊說：「我不參加你們扯亂談。」

對我們幾個的問題，他前前後後，同我講了不少。

王洪文說：「七一年『九一三』後，很長時間我還在上海，把你們關起來的情況，我是不瞭解的。我能想到的，多數是後來李德生同我說的。」

「據說，毛主席對林彪的問題是既重視又慎重。毛主席說：『林彪的問題，比歷史上任何一問題，其影響都大』。毛主席還說不能用處理楊成武的辦法對你們。對你們的問題，要急於處理，除張春橋、江青以外，最積極的是汪東興。」

王洪文說：「對你們四個人的組織處理，總理提過兩個方案。處理吳法憲一個人；處理黃、吳二人。在很長的時間內，主席也總是在考慮區別對待。主席開始基本同意祇處理吳法憲，保護黃、李、邱。主席還風趣地說：『以少換多，值得！』康生及江青他們始終同總理持不同意見。葉劍英、汪東興、李德生等也不同意總理的意見。在對你們的處理問題上我也講了不少不實之詞，也起到了不小作用，我對不起你們，其實，黃、吳、李、邱的事，大家心裏都明白。」

過了三四天，我們坐在院子裏「放風」，王洪文最後一個出來，他剛走了沒幾步，人就像門板一樣，直直地摔在地上，口吐白沫子，我們剛

要去扶他，監管員立即說：「千萬別動，動就很危險，祇有讓他自己慢慢緩過來才成。」過了兩三分鐘，王洪文才慢慢側過身來，鼻子磕出血，半個臉都是灰土。王洪文見我們幾個坐在那裏，祇是一絲苦笑。

走出秦城

八一年九月十一日，我終於離開了關押了四年又九個月的秦城監獄。當我走出二十一監樓西樓時，吳法憲、江騰蛟兩人站在走廊的出口處，他們祇是微笑，點頭示意，不敢同我握手。我倒沒什麼怕的，很大方地伸出手去同他們分別握手，並說：「不要難過，你們也很快就會離開這裏的！」走出監樓，監管員、警察、護士都在門口送我，我向他們點頭致意。

從監房起，到離開監樓要走過四道鐵門，離開監獄區共有三道鐵門。從監房到離開秦城監獄，共計七道鐵門。當我們的車子駛到監獄區的大門口時，我自言自語地說：「願這裏今後關押的是真正的反革命！」

秦城的高個子副主任，一直送我到火車上，並在我的車廂裏坐了不短的時間，臨開車才走的。獄方派兩個監管員，一個醫生，把我直接「護送」到西安。應當說，監獄的「禮節」是周到的。

八一年九月十二日上午八時，我乘北京經太原的火車，到達陝西西安。恰好，這天是中秋節。我和大兒子路光在一起過的中秋節，這是值得紀念的一個日子！

第四十四章 空前的大冤案

公審是大倒退

八一年九月十二日上午八時，我由北京抵達西安。到了西安，我從十八層地獄底層昇到首層，但還是地獄。

與社會隔絕十年有餘了，當時我就好像初懂事的孩子一樣，一切都似懂非懂。但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對過去的事情都逐漸回憶起來了。

我從一九二九年參加革命到一九八一年的五十二年中，我經過了黨內五次大的「自己打自己」的運動。一次是一九三〇年江西蘇區捉AB團；一次是一九四二年延安的搶救運動；一次是六六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一次是一九七一年肅清林彪反黨集團；一次是一九八〇年的公審。這五次運動，無論叫做肅反也好，整人也好，總之是自己殲滅自己的大戰。這是我們黨內最悲慘的苦難歷史，對黨造成過不可估量的損失。

我又看了一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的《起訴書》，這是一份絕好的審判文化大革命，用法律手段反對共產黨，反對毛主席，指責周總理的文件。《起訴書》人爲地把老幹部分成「黑榜」、「紅榜」，這種用法律的形式製造派別，是我們黨有史以來最大的「創造」。凡當局需要的人，不管是當權的、在野的、活著的、死了的領導幹部，也不管是什麼時候下臺，爲什麼事下臺的領導幹部，都一律放在「紅榜」之內，一律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這樣就把一個反毛主席的同盟建立起來了。通過《起訴書》，完成了把共產黨分爲擁護毛主席和反對毛主席的兩大派。「黑榜」刊出名單，也就是所謂的敵我矛盾，是由當權者圈定的。這次審判在形式上是法律，主宰者卻是當權的領導人。黑白、曲直、是非依循的根本不是法律，而是當權領導人的指示，這在我們黨內開創了借法律手段解決黨內問題公開審判黨內高層領導人的先河。事後才知道，公審的一切事

情，包括很細小甚至很瑣碎的事情都要通過當權的領導人的批示才能實施。

很可悲的是，公審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否定文革，但公審的主導思想方法又和文革中的思想方法是一樣的。與其說是公審，不如說是「現在輪上我們上臺了」罷了。先定罪後收集證據，用誣陷的方法審判別人誣陷。所以公審的思想體系和文革是一樣的，從這個角度來說公審是文革的一部分。喊一句徹底否定文革的口號有什麼用，我認為到目前為止我們的黨還沒有真正地、實事求是地總結文化革命的教訓。公審祇能叫「鬧劇」。

公審的思想脈絡相當混亂。爲了打擊我們，他們延續並利用了毛主席對我們的錯誤，把莫須有的所謂「政變」仍扣在我們頭上，好像我們爲了反對文化大革命不惜謀殺毛主席；但他們爲了反對毛主席的需要，又說我們擁護文化大革命，說我們在文革中是執行毛主席路線的。

公審並不是審判什麼「反革命」，而是審判共產黨在文革這個時期的工作，審判毛主席和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其實，列入主犯名單的，除江騰蛟外（把江騰蛟列爲主犯的目的，是爲了穿鑿林彪和小艦隊及「兩謀」的關係），都是黨的中央委員會選出的政治局委員，把這些人作爲毛主席的替身。從審判的陣勢來看，軍隊系統參加「兩案」的人員多是造反派登場，當權者利用他們的怨氣或仇恨，把軍隊的是非界限搞顛倒了。因此，對待公審我有原則性的兩點考慮：一是決不反毛主席，事情不往主席身上推；二是決不反黨，事情不往中央身上推。上面兩條如果有一條做不好，都會被利用，把我做爲反毛主席的工具。今天當局能夠把我拿去公審，與毛主席生前對我的錯誤處理是有一定的聯繫的，他們利用了過去在「四人幫」極大干擾下的錯誤結論。即使這樣，我也決不反對毛主席。不反毛主席和糾正毛主席生前所犯的錯誤是兩回事。

另外，在正常的黨內鬥爭中，打擊「四人幫」我雙手贊成，「四人幫」的確錯誤很多、很嚴重，但他們畢竟還是黨內問題、路線問題。因此是不是要公審他們，我持否定態度。

我認爲，公審決不是爲了所謂的「加強民主與法治」，而恰恰是大倒退，本來打倒「四人幫」以後，撥亂反正，重整山河，司法工作有一定的恢復和前進，一搞公審，這些都毀於一旦。法律有相對的獨立性，有相

對的規則，但公審事事聽黨的領導人的指示，甚至判多少年都由有黨的領導人來確定，這難道不是倒退嗎？這難道是進步嗎？

對公審來說，還有一個不可告人的目的是：把死人（毛主席）作為活人的墊腳石。像我這樣的人算什麼主犯，我們祇不過是政治上的小石子，但不管再小的東西，放在他們腳下，也會有墊高作用的。

所謂「林彪反革命集團」

在中國的土地上，在共產黨內，根本不存在一個包括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在內的「林彪反革命集團」。但確實存在一支以林彪為首的、在文化革命的混亂形勢中奮力支撐黨和國家的人民軍隊，確實存在一個保衛人民解放軍不受破壞、堅決抵制中央文革江青一夥的軍委辦事組。

應該說，我這一生都是堅決擁護黨、擁護毛主席的，但對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我確實是不理解的，主要是對踢開黨委鬧革命不理解，對依靠造反派不理解，對受毛主席重用的江青、張春橋一夥飛揚跋扈、頤指氣使看不慣，我想部隊大多數幹部也都是這個看法。對於林總和軍委決定部隊的文化大革命不搞「四大」，不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全軍都是擁護的。但主席讓介入，讓搞「四大」，怎麼辦？林總和葉帥、聶帥及軍委，把對待毛主席的態度放在首位，還是順從了毛主席的意旨，現在看來也有遷就老人家的因素。六六年國慶節後，軍委發佈了《緊急指示》，軍隊的軍以上單位搞「四大」，這樣部隊從上到下一個時期也亂了。我一直認為《緊急指示》的發佈是錯誤的，但不發佈也是不可能的。因為在毛主席那裏是過不去的。但這麼快就搞出「緊急指示」，內容也很左，這和全軍文革李曼村、謝鏜忠這些全軍文革的人，一心一意搞極左是密切相關的。《緊急指示》發佈後，軍隊造反派在全軍文革的縱恿、操縱和支持下，砸遍全軍！解放軍三總部，國防科委，海軍，空軍，各軍兵種，各大軍區的領導幹部都被揪鬥，全軍正常工作難以進行。在這樣危機的時刻，林總一方面把各大軍區領導搞到北京來「躲反」，又在六七年一月底發佈了軍委《八條命令》，有力抑制了軍隊的混亂。但是軍內造反派是不會輕易退出歷史舞臺的，由於主席支持造反還是當時大的形勢，江青把持的中央文革也是支持軍隊造反派的，李曼村、謝鏜忠這些全軍文革

的人就在暗地裏煽動和支持他們的亂軍行徑；同時，軍隊在執行軍委《八條命令》時，也有過火的地方，對造反派打擊面過大，「辦子」被江青一夥抓住，在毛主席造反有理的文革大勢下，軍委不得已又讓了一步，軍委《十條命令》出臺了，軍隊造反派又鬧起來了。當時，中央機關亂了，國務院各部委亂了，各省市亂了，軍隊這時也亂了，總之，全國都亂了。在這樣的關鍵時刻，林彪通過「五一三」事件堅決支持了軍隊擁護黨委、維護領導幹部軍隊的革命派，反對打砸搶的造反派，「五一三」事件後，軍隊反黨亂軍、打砸搶的造反派被徹底打下去了，軍隊的工作很快就恢復正常，軍委辦事組，也應運而生。不論是楊成武時期的軍委辦事組，還是黃永勝時期的軍委辦事組都是保持軍隊穩定的，黃永勝則做得最堅決！保持軍隊的穩定，不許江青一夥插手軍隊搞破壞，也不許江青一夥的代理人在軍隊搞破壞，黃永勝和黃永勝領導的軍委辦事組同江青一夥做了堅決的鬥爭。軍委辦事組在文化大革命中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一）穩定了軍隊；（二）反對和抗衡了江青一夥（中央文革）；（三）承擔了三支兩軍的艱巨繁重的任務；（四）在總理領導下及政治局大多數老同志努力支撐著黨和國家。這些使命的完成，和林彪的支持、總理的具體領導是分不開的。可以肯定地說，沒有軍隊的穩定，全國不僅會更亂，而且以江青一夥為中心的造反派，會奪取更多的權力，會給黨和人民造成更大更多的災難。人民解放軍是黨領導下真正的人民軍隊，當時掌握軍隊大權的軍委辦事組，是堅定維護黨的根本利益的革命派，在文革中是有大功的！根本不是什麼反革命，更不是什麼「林彪反革命集團」！鄧小平審判我們，真是天理不容。

很多人說自己和「四人幫」進行了鬥爭，試問你們是怎麼鬥的？！黃永勝和黃永勝領導的軍委辦事組和江青一夥的鬥爭，是在毛主席健在時，是在高度肯定文化大革命時，是在江青一夥是黨和國家領導人時；你們和江青的鬥爭是在毛主席去世後，是在否定文化大革命後，是在江青一夥成爲階下囚後。

我們的「反革命」的帽子是怎樣帶上的呢？

「九一三」事件的確是件驚天動地的大事，發生這樣的事，毛主席把我們抓起來隔離審查，我們雖然有想法，但還可理解。命運也就一步步演變下來了。

第一，停職反省。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時，在人大會堂福建廳，周總理代表毛主席宣佈：黃、吳、李、邱四人停職反省，並關進了衛戍區。這是毛主席決定的，並沒有宣佈什麼反革命。

第二，反黨集團。七三年八月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對黃、吳、李、邱定為反黨集團，撤消黨內外的一切職務，做出永遠開除黨籍的政治和組織結論，雖然這個結論和處理是錯誤的，但並未定為反革命，仍然在黨內問題的範圍內。因為審查了幾年，並沒有查出黃、吳、李、邱與「兩謀」有任何關係。

第三，投進秦城監獄。七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黃、吳、李、邱四人從衛戍區關進了秦城監獄。我到秦城之後，監獄當局的宣佈是：「奉華主席的命令，你到秦城來是集中學習，繼續審查」，仍然沒有直截了當地宣佈為反革命。但關進秦城是一步致命的錯誤，也許他們的本意是把我們「圈」起來以後再說，先集中力量去對付「四人幫」。結果把我們搞了個有去無回，並給鄧小平事後鑽了大空子。這一步對我們的命運是關鍵的，華、葉及汪東興要負歷史的責任。

第四，補辦逮捕手續。關在秦城期間，中紀委審查小組對我們的問題進行了「不帶框框」的重新審查，並有實事求是的結論，因為對我們的問題來說，祇要我們沒有「兩謀」，就是文化革命特殊而複雜情況下的路綫問題。鄧小平不能接受這個結論，八〇年七月二十二日上午九時，在秦城監獄以總政治部保衛部的名義，對我補辦了逮捕手續。從此就把「反革命」的帽子給戴上了。這也就是說，從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到八〇年七月二十三日，從衛戍區到秦城，關了將近十年，才把我們變成「反革命」的。

祇有把我們變成「反革命」，才能審判，而且硬要煞費苦心地把江騰蛟這個小艦隊的人和我們扯到一起，從而要把我們和「兩謀」扯到一起，他們的用心太險惡了。

第五，起訴與判決。八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的「起訴書」和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的判決，除了把我判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和給我戴上「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罪行的「大帽子」之外，其餘各個地方，特別是在我個人的

「罪行」名下，連半點「反革命」的事實和一個「反革命」的字眼也沒有找到。

起訴和判決又是文不對題的！起訴書中起訴我們是「反革命」，是「以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爲目的」，結果審來審去，什麼也沒有審出來，就連吳法憲說的假話他們自己也給否認了。判決的問題都是文革中一些具體事情，用誣陷的手段來起訴，用兩個標準來對待文革中發生的死人問題。比如說，總後死了八個人，起訴我負有責任，但負的是什麼責任？在什麼樣的前提下負責？如果大家在嚴肅認真地總結文革的教訓，我一定會承擔這個責任，死人總是不好的，應當總結教訓，我做爲總後勤部長是要負責任。但是他們不是這樣，他們是爲了打倒我，而利用所謂的法律讓我負刑事責任，這就是完全錯誤的了。在文革中我處理這些問題的具體手段就是對審查人做過批示，這種手段和毛主席，和周總理處理問題的手段也一樣的，也和鄧小平、彭真在文革前製造了那麼多冤假錯案的手段也是一樣的，即以領導的身份做批示。我們「迫害」的人都是教員，文化幹事，俱樂部主任這些小人物；你們「迫害」的都是元帥、大將，省部級以上的幹部，以及文化界、知識界、文藝界，民主黨派中最負名望的人物，還是他們的譜大呀！

爲什麼要人爲的決定一個「林彪反革命集團」？這是爲他們的政治服務的。大家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搞了一個「劉、鄧司令部」，搞了一個「彭、羅、陸，楊」，說他們是「資產階級司令部」，是「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對象。對此，鄧小平是懷恨在心的。而林彪事件又發生在文革之中，在毛主席並沒有最後處理就去世了，林彪的問題就成了毛主席生前遺留下的問題。因此，鄧小平爲了反對毛主席的需要，先編造出一個「林彪反革命集團」，再利用這個「林彪反革命集團」作爲毛主席的替身，或作爲他們反毛主席的靶子，是很方便的。這樣就把一切問題都可推到「林彪反革命集團」身上去了。公審是一個「政治垃圾坑」，無論什麼樣的東西，不論是歷史的，現實的都往裏倒就是了。

「兩謀」問題指的是林彪的兒子林立果一夥人，要謀害毛主席，南逃廣州，另立中央。這個「兩謀」問題，「九一三」以後的中央文件材料之一、之二、之三根本沒有給我們傳達過，我是保外就醫到越南後才知道

的。「兩謀」問題，《「五七一」工程紀要》問題，「手令」問題，究竟有沒有？如果有，和林彪是個什麼關係？多少年來也沒有搞清楚。不過，有一個問題是肯定的：如果林彪和「兩謀」問題、「五七一」問題沒關係，我們與之就更沒關係了；如林彪和「兩謀」問題、「五七一」問題有關係，我們仍然與之沒關係！

既然沒有關係，我們的問題就是文革中的黨內路線問題，我們在文革中的歷史地位和許世友、陳錫聯、韓先楚、楊得志等是一樣的。可悲又可恨的是，沒關係仍按有關係整我們。

造反派消滅革命派

六六年十月，軍委《緊急指示》後，軍隊各領率機關就大亂了，總後是大亂的典型。造反派住進總後大院後，和機關造反派一起，天天揪鬥各級領導幹部，搞打砸搶，黨辦被佔，各部辦公樓被佔，保密室被搶，造反派中午就到食堂搶飯吃。

六六年底，二醫大「紅縱」開始對我揪鬥。軍隊其他領導幹部，如張池明、饒正錫、吳法憲、余立金、李天佑、蘇振華、李作鵬、杜義德、趙爾陸、崔天民、陳仁麒、黃志勇等等都被揪鬥得很厲害，各大軍區的領導也被揪鬥。解放軍廣大幹部是反對造反奪權、反對打砸搶的，在這種混亂的時期，他們組織起來，和造反派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他們是真正的革命派！這種鬥爭不是像地方那樣，是兩個群眾組織之間的鬥爭，而是正確與錯誤的鬥爭，是保衛人民解放軍的鬥爭，也是在黨和國家生死存亡之時的鬥爭，試想，全黨全國都亂了，解放軍再亂了，將是個什麼結果？！在這樣一個關鍵時刻，林總堅決支持了革命派，「五一三」之後，軍內造反派就敗陣下來。軍隊要不要穩定？當然要穩定。軍隊各機關要不要恢復正常工作？當然要恢復正常工作。反黨亂軍、打砸搶的造反派要不要清理？清理勢在必行！這和鄧小平們上臺以後清理「三種人」是一個道理。當時的清理是在文革的環境之中，事事要按毛主席的戰略部署辦，當時毛主席的戰略部署就是「鬥批改」，清理階級隊伍，精簡機構，下放科室人員，「五七」幹校，三支兩軍，等等。全國都在清理階級隊伍，有歷史問題的同志都要清查，總後一家不清不成；全國都辦幹校，毛主席的女兒都上幹校，總後一家不辦幹校不成；全國都在精簡機

構，總後不精簡不成。關鍵是誰去？我總不能把反對黨委、反對我，搞打砸搶的人留在機關工作，把擁護黨委和我的人搞到幹校去吧！當然，客觀情況也是誰下去誰吃苦，生活條件差，要參加勞動，子女上學困難等等，這都是事實，但這是文革時期的總的政策決定的，不是我個人決定的。反黨亂軍、打砸搶的造反派首要人物要不要清理，當然要清理，比如總後政治部幹部陳政，是個不折不扣的階級異己分子，文革以前就是公安部的內控對象，他造反很厲害，上串下跳，煽風點火，完全是借文革之機解對共產黨的仇恨。這樣的人，公審時竟讓他到法庭去控訴我對他的迫害，豈不怪哉！再比如總後死的八個人中，有一個後勤學院教員王述臣是造反派的頭子（第一把手），此人當過國民黨的警長，他主持造反組織「星火燎原」開黑會攻擊毛主席被舉報了，我能不批示嗎？我不對反毛主席的人批示，我成了什麼立場？當時有《公安六條》，總後能不抓他嗎？《公安六條》有明確規定，他這種人根本不許參加群眾組織，更何況當第一把手搞反黨委，搞打砸搶，完全是對革命政權進行報復。他被抓起來後，他的同謀把他當過為警長的情況調查出來了，自知問題嚴重，怕王述臣把大家供出來，就把他當過為警長的情況通過他老婆告訴了王述臣，實際上是威脅。王述臣自知罪惡重大沒有活路，他讓他老婆在飯盒裏放了毒藥，他老婆送飯時，王吃後身亡。此人後來竟被鄧小平追認為烈士。他是誰家的「烈士」！？

七一年「九一三」事件之後，江青一夥對我們進行了殘酷的打擊和報復，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後，繼承了江青一夥的衣鉢，他不惜違背歷史事實，硬把軍隊造反派與革命派的位置顛倒過來了，從而把革命派變成打擊對象，把錯誤嚴重甚至罪惡纍纍的造反派變成革命力量。鄧小平是旗幟鮮明地依靠軍隊打砸搶、反黨亂軍的造反派的。在所謂清理「三種人」中，他們以人劃線，把革命派當成「三種人」清掉了，總後150餘名軍師級幹部全部下臺，隔離審查、開除黨籍、判刑勞改、清出軍隊；降級、降職、給予處分的就是「寬大」了。這麼一大批優秀的幹部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結果全給「割了韭菜」，總後機關及其所屬各單位成了清一色的造反派。那些反黨亂軍、打砸搶的造反分子又被作為反對我們的生力軍重用起來，鄧小平利用這個怨氣，根本不講黨性原則。鄧小平並不瞭解軍隊在文革中的情況，他也不願意認真瞭解這些構構，由

於鄧小平骨子裏對毛主席有怨恨，他不分是非，把文革中在臺上工作的人統統搞掉，使我們在打倒「四人幫」以後，失去了起死回生的機會，他以我們作為毛主席的替身，搞公審，反對毛主席。

一想起這麼多軍隊幹部因為受我的株連，蒙受冤屈，家破人亡，我就感到萬分痛苦。如果我一人坐了牢，殺了頭，能免除廣大幹部的災難，我是心甘情願的！我們這個黨冤冤相報太厲害，很多人沒有死在敵人的刀槍下，沒有死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事業上，卻成了黨內鬥爭的祭品。這是多麼大的教訓啊！

毛主席對黨、對人民、對國家的偉大貢獻是任何人也磨滅不了的。毛主席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史無前例的，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實行的政治路線、組織路線也確實犯了不少錯誤。我們說，對文化大革命是應當很好總結的，這對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是完全必要的，但利用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來反對毛主席、否定共產黨就是錯誤的，也是別有用心的。打著共產黨的旗子反對共產黨，也是毛主席身後某些領導人的一大「創造」。他們別有用心地把黨領導的文化大革命，說成毛澤東個人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儘管毛澤東個人對文化大革命起決定性的作用，但文化大革命還是黨的歷史的一部分。

惡毒株連是冤案的一大特點

惡毒株連是冤案的一大特點。在軍隊中總後勤部幹部受株連的情況是最為廣泛的。「九一三」前總後正副部級首長十三名，沒有受到大的牽連的有張天雲（當時患癌症）、封永順（整編時總參過來的）、張令彬（秋收起義的老同志）等；關進秦城監獄的有邱會作、王希克、戴金川、陳龐，還有三〇一醫院的正副院長靳來川、曹根慧等人；被趕下臺以後處理的有：張池明、邱創成、張明遠、嚴俊、伊文、丁先國等人。

各二級部和軍級以上各大單位的約有三十多個，軍政首長受株連的佔三分之二之多。師一級領導幹部受到株連的也很多，機關處一級幹部亦有不少人受到株連。我和其他領導幹部的家屬及身邊工作人員，包括：秘書、保密員、警衛員、司機、炊事員、護士等一律都受到株連。

他們進行株連，首先扣上「邱會作死黨」的大帽子，然後進行政治迫害。「邱會作死黨」的真實情況是怎麼一回事？其實這是以人劃線的借

口罷了。以人劃線的實質問題就是：凡是同邱會作在文化大革命中一起工作的都是反革命；凡是反對過邱會作的人都是依靠力量，對邱會作搞武鬥、砸爛總後機關的造反分子都是「革命」的領導骨幹。這樣一劃分，就陣線分明了，也是造反派株連革命派的政策依據，革命派的災難也就不可避免。

劃了這條線，總後的幹部受到株連的數以千計。對受株連人的處理：有的逮捕法辦；有的開除黨籍、軍籍，撤消職務；有的勞動改造；有的連降三級；有的以轉業、復員的辦法處理。不少應轉業的幹部強行按復員處理，削職爲民。

以我的秘書吳瑞雲爲例。吳瑞雲是五八年入伍的青年同志，表現一直很好，六八年選調給我當秘書。「九一三」後，林彪辦公室和黃、吳、李的秘書都進了中央專案組。總理原有把我分化出來的想法，因此我的四個秘書沒有進中央專案組，由總後代爲審查，這樣總後的造反派就鑽了大空子，對他們進行了瘋狂的迫害。林彪辦公室和黃、吳、李的秘書七五年經毛主席批示就解放了出來，分配工作，我的秘書反而被關到八〇年公審以後。吳瑞雲本應轉業，卻讓他復員，他愛人在北京工作，卻讓他回老家在屠宰場當工人。經過一段時間的工作，屠宰場認爲吳瑞雲是個不錯的同志，有點文才，就調到科室工作。總後知道這一情況後，派專人到屠宰場批評。屠宰場憤怒了，反問總後來人：「吳瑞雲是你們的人你們帶走，是我們的人，我們有權決定他的工作崗位！」

我們的冤案是個人作用造成的，他們對「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決定與處理都不是根據事實和政策辦理的，而是以他們個人的政治利益辦的。所以我們的問題，是政治問題，不是政策問題。鄧小平爲了政治需要，要對「林彪反革命集團」定成死案，這就是說，在他沒有死之前，不要說平反，連鬆動一下也是不可能的。比如說，黃永勝的死就很能說明問題。

黃永勝是大革命時代參加革命的，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一代名將，中外著名的戰將。我得知他去世之後，立即提筆寫了一篇悼文，現在把悼文記錄在這裏。

哭老戰友黃永勝總長

一九八三年五月十日，路光從北京發來電報說：「冬父四月十六日在青島逝世。」噩耗傳來，令人心碎，老英雄就這樣不明不白的死了！

黃永勝同志關了十年，患了肝癌，他留在人世的時間不會很長了，這我是能想得到。我異想天開地想過：希望在他去世之前，我們還能見一面！對黃永勝同志之死，祇有淚水為悼了！

我同黃永勝是同一個戰壕的戰友。當然，我們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我們的政治生命都是同年、同月、同日、同刻而「死」的。從政治生命來說，歷史上劉、關、張希望同時而死，未曾實現，我們可實現了！這樣的戰友，確實是少有的。四人幫認定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是林彪的「四大金剛」，後來鄧小平又決定，黃、吳、李、邱是「林彪反革命集團四大主犯」。不管是金剛也好，主犯也好，苦難兄弟也好，革命戰友也好，黃永勝都是處於「大哥」地位的。

我同黃永勝同志是一九四五年二月間，在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之前在延安偶爾認識的。我們都是七大代表，都住在中央黨校一部。但我們不是一個代表團，原來並不認識。一天，我的小孩患痢疾，我和楊梅生到友人張令彬家裏問有什麼藥沒有？正好黃永勝也在那裏，黃聽到之後，好像對待很熟的老朋友一樣對我說：「我可能還有幾粒痢特靈，是治痢疾的特效藥。」他馬上叫人拿藥去了。

因為我同黃永勝同志是第一次談話，根本不好意思回答他的話，當時也還不習慣說什麼道謝的話。我正在不知怎麼樣是好的時候，拿藥的人就把藥取來了。黃永勝手拿著藥對我說：「這是痢特靈，治痢疾病很有效，但祇有三粒了，估計可以治好你孩子的病。」他就把藥給我了。我祇是回答說：「好、好。」別的什麼話也說不出來。黃永勝自己有小孩，在延安這樣的條件下，能夠把特效藥贈給別人是了不起的，而慷慨贈送我這個初相識的人就更了不起了！我接過藥來之後，心裏久久不能平靜。我心想：黃旅長（他當時是教二旅旅長）是一個能誠懇幫助別人的人。他具有我軍高

級幹部典型的優良作風，是值得學習的。黃永勝同志的這種好作風，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

在延安同黃永勝同志一面之交之後，四六年六月間我們在熱河承德又見面了。我當時由軍調部北平執行部回到承德，黃永勝任熱遼縱隊司令員。當時冀熱遼分局決定把熱遼縱隊改為熱遼軍區，黃永勝任司令。他建議我任軍區政治部主任，我們就第一次共事了。此後熱遼縱隊改為熱遼軍區，下屬十六、十七、十八三個旅和熱中、熱東、熱北，遼西四個分區。這是準備國民黨軍隊佔領承德後的作戰部署，此後，在解放戰爭期間，我同黃永勝先後七次共事。我們之間，從共事開始，到同時關起來，同時投進監獄，同時受審，同時在鬼域世界度日都是親密戰友。現在，黃永勝同志成了一個冤鬼，我還是一個活著的冤犯。我應該留下一篇哪怕是很蹩腳的文字，也要來悼念我親愛的戰友，以表我的哀思！

黃永勝同志是一個有很多優點的領導幹部。擇其要者來說，他就是一個有領導能力，軍事指揮才能很高的高級指揮員，是一個軍政雙全的高級領導幹部。在這裏，我對他不能做全面的評述，祇能談幾個主要幾點。

自願參加革命，英勇奮鬥。黃永勝同志一九二七年六月就到武昌中央國民革命政府警衛團當兵。警衛團內有很多共產黨人。他去當兵是為了謀生，但從當兵開始就受到了共產黨的教育，到警衛團就成了革命戰士。一九二七年秋武昌國民政府警衛團參加了秋收起義並上了井岡山，成了中國工紅軍最早的部隊之一。警衛團出了一批紅軍高級幹部，黃永勝也是「井岡山的同志們」之中的高級領導幹部之一。

上井岡山的時候，黃永勝還是一個班長。後來在中央蘇區幾年的鬥爭中，他由班長、排長、連長、營長、團長，一步不缺地當到了師長。黃永勝在江西瑞金，還當過軍委特務營營長保衛中央，日夜與毛主席相處，很年輕的時候就得到了毛主席的親自教導。



黃永勝總參謀長。

中央蘇區的部隊並不很大，當過師長的也不多。黃永勝當然是紅軍中最為先進，最有能力的人物之一了，否則就不能成為年青的師長的。

黃永勝上井岡山的時候，武昌的形勢是比較混亂的。他是湖北咸寧人，離家不遠，地理人情都很熟悉。如果沒有自願革命，自願上井岡山，自願當紅軍的決心，他是很容易溜回家的。在當時的情況下，他能夠走上革命道路是十分可貴的。他革命的世界觀，在年輕的時候就確立了。

在革命隊伍裏，黃永勝是努力學習的。他參加革命後，能夠得到黨的器重，固然有時勢造英雄的一面，但與自己的努力是分不開的。六十年代初，羅榮桓元帥在談到高級幹部的優缺點時，其中就說到黃永勝。羅說：「黃永勝是武昌警衛團的，我們一起上井岡山。這個人有很多優點，其中最主要的是對工作很努力，不甘落後，打仗勇敢，同群眾關係很密切。當然他也有缺點，沒有缺點不是更好嗎？這是不可能的。沒有缺點的人是沒有的。」羅對黃永勝的評價是正確的。

一九三三年，在江西中央蘇區，黃永勝當團長時，他作戰勇敢，屢建戰功。為此黃永勝被授予紅星獎章一枚。當時，能得到這種獎章的人是很少的，這是黃永勝歷史上的重大光榮。據說這種獎章不僅榮譽很高，而且還可能「保命」，當時有不成文的規定：獲獎人如果犯了殺頭之罪可以降罪一等。一九五五年黃永勝授上將軍銜，還被授予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這是黨和人民給他的最高榮譽。可是在「林彪反革命集團」的冤案中，黃永勝所得到的是重刑，即十八年有期徒刑！

「討飯」過草地，艱苦奮鬥黃永勝同志吃過的苦，同紅軍、八路軍、解放軍、抗美援朝志願軍是一樣的多，一樣的苦。他一生的經歷，主要是艱苦奮鬥。

在共同的艱苦奮鬥中，黃永勝同志還吃過特殊的苦，長征過草地就是一例。差幾天就要走過草地時，發生了預料之外的情況，他的坐騎陷到草地裏去了，糧食、行李全部完了。當時，要得到補充供應是不可能的，怎麼辦？祇好將警衛員、飼養員兩人的口糧三人吃。這是無論如何不夠吃的。由於黃永勝人緣好，他的許多戰友都寧願自己少吃一口「救濟」他。就這樣他沒有餓死在草地裏。

黃永勝在中央蘇區，從當團長起就騎馬。長征開始後不久，他當時在一軍團，部隊減員很大，祇有縮編了，補充一匹牲口並非不可能，他是一個顧全大局的人，從「騎馬」變為自己走了。黃永勝同志過草地，基本上是步行的。後來一軍團的部隊打敵人騎兵，繳獲了一部分牲口，黃永勝才又有乘馬。

傑出的軍事指揮員，我軍的名將黃永勝同志是真正身經百戰的指揮員。在他一生的戰鬥生活中，打過的大小仗數以千計。他的指揮才能是全軍聞名的，熟悉他的人都稱他「黃忠老將」。這裏僅記述他在解放戰爭中的三個典型戰例。

第一個戰例，一九四七年九月在東北錦州以西的第二次楊家杖子戰鬥，是運動戰的典型。

當時，國民黨四十九軍，剛從江蘇北部增援到東北來。敵軍在葫蘆島登陸後即奉命掃蕩錦州以西地區，確保北寧路運輸線。我縱開始得到的情報是敵軍祇有兩個團出來那掃蕩，軍長王鐵漢率軍主力在錦西未動（戰鬥打響了兩個小時東北軍區才更正為敵人是兩個師各欠一個團）。我縱決心消滅出面之敵，戰鬥在楊仗子西南打響，經過七小時的戰鬥根本打不動。敵人不進也不退。我縱在數量上佔優勢，但火力很弱。當時，除本縱隊三個師外，還指揮冀察熱遼軍區一個獨立師。部隊的裝備，除了少量的迫擊炮和六〇炮之外，就是步槍和手榴彈了。我們對敵人的陣地多次攻擊也攻不動。我軍決心在黃昏時，撤出戰鬥，班師向北撤退，再尋找戰機。撤退命令下達後，黃永勝和我及參謀長黃鶴顯在指揮陣地上戲耍，搶香煙抽。就在此時，敵軍猛烈的炮火向我指揮所射擊，在我們跟前不到兩三米的地方就落了一發炮彈，但我們命大，那發炮彈是瞎火，我們三個人，都祇落得一身灰，並未受傷。黃永勝還沒有拍乾淨身上的灰塵，點燃一支香煙就哈哈大笑地說：「我們都沒有見馬克思。」但他對此時敵人炮火猛烈射擊，又有所思。此時四個師的指揮所同時報告：「敵人的小分隊向我出擊。」根據上述情況，黃永勝立即判斷：「敵人要撤退，是假進攻。我軍要力爭在運動中消滅敵人。」

黃永勝對敵情的判斷和決心，完全正確。一小時左右敵人果然開始撤退了，但我縱各作戰部隊已經奉令撤出戰鬥，電臺拆線了，電話收線了，現在又要部隊調回頭去追擊敵人，遇到難於解決的通信困難。黃永勝陷入了沉思，就在此時，我說：「現在立即集合司令部、政治部的科長，每人手拿縱隊首長的親筆命令，分頭出去傳達，所有部隊都要執行追擊殲敵的任務，我現在立即到

先頭師去。」黃永勝聽到我的話之後，把手上正抽的香煙向地上一摔說：「老邱，你的意見好極了，立即照辦。」這一招做對了。很快全縱所有部隊都轉為追擊了。我們縱隊部警衛連，除留下兩個班外，也參加了追擊。在追擊戰中取得了重大戰果，敵軍兩個師（各欠一個團）、一個軍部，全部被殲滅，共殲敵兩萬餘人，敵軍長王鐵漢祇帶幾百人逃跑了。這是東野殲敵過萬人的第一仗。

第二個戰例，一九四八年九月遼瀋戰役中，瀋陽以西新民的車家窩棚戰鬥，是阻擊戰的典型。

東北軍區決定攻打錦州之後，全軍區主力向遼西開進。長春到瀋陽之間祇留下一個主力縱隊（六縱隊）和一個新編起來的縱隊（十二縱隊），準備殲滅長春可能向瀋陽逃跑之敵。我軍開始攻打錦州時，瀋陽之敵廖耀湘主力兵團（蔣介石最精銳的部隊）向西出擊援敵錦州。錦州被我軍攻佔後，四野總部決心在瀋陽以西，錦州東北地區，殲滅廖耀湘兵團。

這一戰鬥的關鍵問題是阻止敵人西撤龜縮瀋陽。為此，總部命令六縱隊司令員黃永勝並指揮十二縱隊，急行軍星夜兼程南下，擔任阻擊廖耀湘兵團西撤的任務。

黃永勝向來執行命令是堅決的。他率部按命令規定的時間還提早一點到了指定的新民地區後，偵察員報告拒流河以西敵人有佔領鐵橋的企圖，他立即想到敵人有東撤瀋陽的企圖，現在關鍵問題是搶佔拒流河鐵橋，於是就命令縱隊先頭師，即該縱主力師第十六師立即搶佔拒流河西岸，並炸鐵橋。六縱副司令員兼十六師師長李作鵬同黃永勝的看法一致，他帶領先頭部隊猛插拒流河以西鐵橋附近的車家窩棚。我軍是一邊作戰一邊構築野戰防護工事，在我軍還立腳未穩的情況下，廖耀湘兵團東撤的先頭部隊就到了新民以東地區，都是主力對主力的戰鬥，都是成功或失敗的戰鬥，敵人搶佔不到鐵橋，退不回瀋陽就必遭殲滅；我軍不能阻住敵人東撤就不能殲滅敵人。因此，鐵橋的爭奪戰和反爭奪戰的就開始了，戰鬥打了將近兩天兩夜。在我軍的歷史上，這次戰鬥的激烈程度和傷亡之大，都是空前的。

六縱隊的阻擊戰是遼瀋大會戰全部殲滅廖耀湘兵團的關鍵。由於阻住了敵人，爭取了時間，打錦州的部隊極大部分都趕上了。車家窩棚阻擊戰的勝利，首先是戰場指揮的決心完全正確，其次是部隊英勇作戰，不怕傷亡，再就是部隊各級指揮員高超的指揮。黃永勝，李作鵬的指揮，阻住了廖耀湘兵團東撤瀋陽，對遼西會戰勝利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第三個戰例，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天津戰役，這是攻堅戰的典型。

天津戰役是「甕中捉鱉」，沒有敵情顧慮，照著上級的命令打就行了。指揮員的組織指揮才能，最主要的是減少自己的傷亡。黃永勝充分發揮了自己的作戰經驗，對戰役進行了細緻的組織指揮。天津城外都是開闊地，沒有任何可利用的地形地物，因此，在戰役準備階段，最主要的是改造地形。黃永勝命令部隊從東向西挖戰壕，並且要挖「之」字形的戰壕。這樣就能夠接近敵人城牆，進行突破。在戰壕挖好後，還要進行適當的訓練，使部隊能比較熟練地進行各種戰鬥。

天津戰役，我們八縱隊與七縱隊在東面的東局子、民權門並肩攻擊。二月十五日早上八時發起攻擊之後，我軍很快就突破了敵人的防線，但發展很慢。就在此時，黃下決心，將總部配屬我軍的三輛坦克用於擴大突破口作戰。結果發現敵人的防護工事是雙層的，就像舊城市的牆有內外兩層一樣，內層是主要防護陣地，這種防禦工事，過去是沒有見過的。查清情況後，黃永勝立即命令攻擊部隊轉為陣地防護，並立即使用預備隊另開突破口。因為除了民權門之外，其餘的地方可能都是單層防護，我們很快就突破了敵人的防線，並向縱深順利發展。黃永勝解釋說：「民權門的防護，不僅工事堅固，地段也比較寬，另開突破口，地段比較窄，工事也可能不會那樣的堅固，容易突破。」這樣我縱隊三分鐘就突破了民權門，黃永勝的判斷和決心都是正確的，我們勝利地完成了作戰任務，減少了傷亡。有經驗的指揮員，才能起到這種作用。

黃永勝同志除了是一個好的指揮員之外，也是個好的領導幹部。例如，他組織觀念很強，特別是對毛主席，林副主席感情很深，對人誠懇熱情，堅持原則，不怕打擊。

黃永勝同志在歷史上受過不應有的打擊。五二年的「三反」運動就是一次。在那次運動開始時，中南軍區（中南、華南軍區尚未合併之前）領導中就有舉足輕重的人，主張把黃永勝搞倒，抓住他「大手大腳」「愛花錢」的問題不放，華南軍區不同意，一直頂住。愛花錢屬於浪費，並非貪污。遵照中央的政策，浪費是屬於批評教育問題，不是打倒的問題。黃永勝這個浪費，其實也是為別人而「浪費」，解放了，大量幹部回家探親，當時機關有規定，師級幹部每人發60元，這些幹部不夠就去找黃永勝求情，黃認為這些幹部離家二十多年了，第一次探家要有點革命勝利光榮回家的味道，幫家裏修修房子，添些農具都在情理之中，他出於對下級的關心，來者不拒，總是多批些路費，這樣機關對他有意見。當時華南軍區的主要領導人葉劍英在外地休養，整個三反就是我負責。我頂了兩個多月，中南軍區政治部主任陶鑄來到了廣州。陶完全支持我的意見，我就對中南的意見頂得更緊了。不久，中央派公安部長羅瑞卿來華南檢查三反運動。我單獨向羅匯報了中南軍區準備打倒黃永勝時，羅當即回答說：「完全是胡來，我相信陶鑄同志也會同意我的意見。我馬上就向毛主席請示報告。」第三天上午羅就告訴我，毛主席批准了，「確保黃永勝同志過關」。當天晚上，華南軍區召開幹部大會，羅瑞卿以中央檢查團團長的身份，陶鑄以中南軍區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在幹部大會上講了話，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黃永勝的問題徹底解決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黃永勝同志堅持原則，堅持鬥爭，頂住了江青一夥一次又一次惡流。黃永勝剛來北京不久，江青就說總長選錯了。他任中央軍委辦事組組長期間和在總參謀長的崗位上，根本不吃江青那一套，中央文革江青一夥企圖插手軍隊，搞亂軍隊根本不能得手，黃對穩定軍隊、加強戰備都做出了很大的貢獻。過去奪取政權的「武戰」他是英雄、戰將，立了很大的戰功；現在為建設社會主義的「文戰」，又立了新功。在半個世紀的^{方塊字讀書社}革命

鬥爭中，他是一個立下很大功勞的高級領導幹部！

在反毛主席的惡浪中，少數別人有用心的人把黃永勝推上了反毛主席的審判臺。他在這場特殊的鬥爭中，頭腦是清醒的，看透了問題的本質，



胡敏拜見黃永勝陵墓。

沒有被法庭利用為反毛主席的工具，寧願自己認，也不往毛主席、周總理身上推。他在法庭上做了很好的鬥爭，我對他甚為佩服和尊敬！

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公安部禮堂，在受審判退場結束時，我們有機會互相看了一眼。我看到了黃永勝同志走路都很困難，背是駝的，小步向前走，真是可憐極了，可是他精神很好，沒有被壓倒。當我們兩個人的視線相交時，他的表情還是同當年一樣：先微笑後說話。不過這次我們互相「說」的話，沒有聲音就是了。但萬萬沒有想到，這竟是我們最後一次相見！我們是在「自己」的法庭上永別的！

老戰友，親愛的黃永勝同志，你是帶著傷疤，又是光著「身子」去見閻王的。

半個多世紀革命的光榮歷史一筆勾消了，什麼也沒有了，連勳章也被剝奪了。但歷史是任何人都勾消不了的，人民會永遠紀念你的！

老戰友，親愛的黃永勝同志，你死是默默無聞的。老革命，老幹部，老功臣為革命而死了，什麼也沒有得著，不僅在報紙上沒有得到立錐之地，連花圈也沒得到一個。但人民在讚頌你一生的功績。

老戰友，親愛的黃永勝同志，你是自己走路去見馬克思的，沒有人給你送行，也沒有人給你發一個錢的「路費」。這不要緊，你所經過的地方，人民會熱情歡迎你，很好招待你的。你到「家」時，你的老戰友，老同志，老上級會熱烈歡迎你的。毛主席、周總理、林副主席一定會同過去一樣，立即接見你的！

安息吧！親愛的黃永勝同志。我會永遠悼念我的老戰友黃永勝同志！

一九八三年五月十五日晚於西安



胡敏看望老首長李作鵬。

說幾句閒話

實事求是地說，剛剛發生「九一三」事件時，我心裏是非常震驚的，意想不到。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怎麼坐飛機到蒙古摔死了？！正因為我們當時知道毛主席和林總對文化革命，對江青、張春橋有不同看法。我們既是林彪的部下又是反對江青的，所以，「九一三」之後，毛

主席給林彪扣上什麼樣的帽子，編造什麼樣不實的話，我們當時沒有多想，更何況我們很快就被關起來了，也沒有條件和權力去爭辯什麼。

現在，「九一三」事件已經過去幾十年了，對於主席、對於林彪、對於總理、對於文化革命，我心裏是清楚的。但是到目前為止，在我黨的政治生活中還是不願意清楚的。其實，歷史已經讓「九一三」事件基本清楚了，再捂、再蓋、再說假話也就沒有太大意義了。人民解放軍廣大幹部，尤其是數以十萬計以上受冤枉、受株連的人，是希望黨能對「九一三」事件有一個實事求是的、公正的結論，對他們落實一點政策，使他們不要再過著家破人亡、極度困難的生活。何況，眾多受冤枉的人也快死光了。

有幾點看法留給後人，我想是有益的。

一、說林彪發動反革命政變、謀害毛主席，一直沒有證據，仍堅持原結論，這是不合法理。事實已經證明，黃、吳、李、邱是沒有搞政變的，即沒有參與「兩謀」（謀害毛主席、南逃另立中央）。所謂的公審，也祇是在起訴書中給我們戴上「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大帽子，審判時根本就沒有審這個問題。另外，林彪究竟和誰在搞政變呢？！事實證明，「九一三」之後，黨內、軍內秩序良好，社會平靜穩定。沒有發現一個排、連、營、團接到過林彪或黃吳李邱緊急待命或緊急戰備的指令，更不要說一個師、一個軍了；同樣沒有發現一輛坦克、一架戰鬥機、轟炸機，一艘軍艦接到過林彪或黃吳李邱緊急待命或緊急戰備的指令。林彪，黃吳李邱是軍人，他們政變不利用軍隊，不利用槍炮，不利用飛機、坦克，軍艦，這算搞什麼名堂？難道林彪祇和自己的兒子及幾個空軍的小幹部搞政變嗎？這根本不是林彪。況且政變是爲了活，而不是爲了死，可是按照官方的說法，好像林彪的政變就是自己在搞一場爲了把自己搞死的兒戲。目前還堅持這個說法，這就是不合情理。

二、說林彪摔死在溫都爾汗，就是叛國，這種結論是不對的。叛國有其定義和內容，並不是大人物說什麼就是什麼。批彭德懷的時候也說彭總「裏通外國」，其實也是亂說一頓，可是那些骨幹分子硬是堅持說彭總「裏通外國」。這些骨幹分子都是當時職務、地位比我們高很多的人。

三、林彪有政變或沒政變，林彪叛國或沒有叛國，都不能說文革中產生的錯誤，發生的問題都是林彪造成的。也就是說，那個《關於建國以

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裏講的，文革是好人毛主席發動的，被壞人林彪利用了，壞事都是林彪幹的，是犯罪；毛主席在文革中是犯錯誤；周總理是不得已做了違心的事，而不是犯罪。比如毛主席說，「二月逆流」、「楊、余、傅」事件、賀龍的問題等等都是林彪搞的，這是不對的。我們是過來的人嘛，這些事情都是毛主席做主搞的。

四、根本不存在所謂「林彪反黨集團」（後又稱反革命集團）。在文革中，不要說林彪領導我們搞「反黨」，搞「反革命」，其實，林彪幾乎都沒有領導軍委辦事組幹過什麼具體工作，林彪對所有文件的批示，無論是中央的、地方的、軍隊的都是在毛主席批示後他才劃圈或批上「完全同意主席批示」這樣無作為的話；而軍委辦事組也從來沒有給林彪單獨打過報告，軍委辦事組所有的報告，不論是作戰的、訓練的、部隊調動的、幹部任免的等等，都是報主席、林（副主席）、總理、政治局常委及政治局的。在這裏我要說林彪，說毛主席一些「難聽」的話。對林彪來說：林彪在文革開始是不想介入的，他知道毛主席要搞劉少奇，也深知毛的謀略，因此，他不想從大連回來參加八屆十一中全會，硬是被主席幾次電話叫了回來。文革初期林也說過頌揚毛主席，頌揚文化革命的話，但隨著文革的發展，混亂加劇，黨和國家嚴重受損，對毛主席的搞文革的一系列做法，對毛主席重用江青一夥，林彪有了看法。但他不說，對我們也從未說過毛主席半句不是（他心裏明白，我們是因為林擁護毛主席才擁護他的），他用「主席劃圈我劃圈」的辦法來應付，對我們也就是說「照主席指示辦」，「要堅決支持總理工作」這樣的話。實際上，林已經對文革「開小差了」。比如說，像三支兩軍這樣的工作，林彪從來也沒有像打仗那樣，指示什麼什麼部隊到哪裏執行什麼任務，什麼什麼幹部到哪裏完成什麼使命，林彪這個主持軍隊日常工作的軍委副主席，根本沒有具體管過三支兩軍工作，三支兩軍工作一直在毛主席和周總理手上，對軍委辦事組祇是操辦他們的決定而已。毛主席軍權在握，調動一個排都要毛主席批准，任命一個軍級幹部也必須毛主席批准，毛主席還對軍隊「締造的還不能指揮呀？」耿耿於懷，真是搞不明白。對主席來說，當時我們對主席是無限熱愛的，熱愛毛主席和熱愛黨是一體的，主席的指示就是黨的指示，主席在我們心中最崇高的。但在實際工作中，在主席處理的一些具體人和事中，尤其從主席對江青的態度中，我感覺到主席也有私

慮、私爲，這是非常痛苦的事，但當時想都不敢深想，更不要說去找誰傾訴了。比如說。主席是很看重看好軍委辦事組的，但主席又有他很大的私心，他想要把軍委辦事組拉在他的手上，並希望我們去遷就江青、維護江青、支持江青，爲此主席多次拉黃永勝，可黃永勝不爲所動，這不是說黃永勝不願意離開林彪，而是沒認識到主席的用意，毫無「悟性」。黃永勝把毛主席、林彪、總理，看成是黨中央這個集體的領袖，而軍委辦事組是爲黨中央工作的，爲黨的事業工作的。再有黃永勝對江青的人品特別反感，根本不可能搞到一起的。尤其是汪東興多次向我們講「毛和江完全是兩回事……頂她怕什麼！」因此，黃永勝和軍委辦事組抵制江青一夥的錯誤是很堅決的，支持總理的工作也是很堅決的。試想，如果毛主席拉動了黃永勝和軍委辦事組，並和江青一夥結合起來，那黨和國家的歷史就要改寫了。林彪、總理在主席那裏就是螞蟻一樣了，輕易就可以捏死。這一步難以實現，林彪是障礙，黃永勝是障礙，軍委辦事組是障礙。「九一三」之後，林彪死了，軍委辦事組倒了，主席就隨心所欲了，批林批孔就是證明，批周公就是證明，把第二號走資派拿出來就是證明，十大王洪文、張春橋、李德生都當了常委就是證明。

我想，以上這四個問題解決了，林彪的問題也就基本迎刃而解了。

第四十五章 全家株連

母親餓死在醫院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我被關起來之後，全家人先後都受到了嚴重株連，甚至連出生未滿月的孫女都無一倖免。我的母親活活餓死了，十三歲的女兒無家可歸，最後趕出北京。

七二年三月八日八十高齡的老母親活活餓死在解放軍總醫院。我的母親是我國農村貧苦勞動婦女的典型，勤勞一生。一九二八年，我們家鄉就開始了蘇維埃革命，當時，我爺爺是高興區長逕鄉土地委員會的委員，我父親是墩丘村土地委員會的委員，我哥是赤衛隊長，我自己是村兒童團副團長，我母親是婦女運輸連的排長，是蘇區土地革命時期，最早參加農村革命的基層幹部。我的家庭是革命之家，三代同堂幹革命！

一九三四年，紅軍撤離江西長征，國民黨軍隊立即進攻江西蘇區。國民黨軍隊用了很大力量修建公路，公路修到我的家鄉時，隨國民黨軍隊回來的地主還鄉團，指定要拆我家的房子取木料修碉堡。我的母親性格很剛毅，同拆房的敵人展開了鬥爭，被打得全身是傷，暈倒在地上。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我家當時三代老小五口人祇能棲身在山洞裏。我的父母一直在苦難中受煎熬。

全國解放後，第一次見到母親時，望著她清瘦的臉，我非常難過，她卻笑著說：「我相信紅軍一定會勝利。」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我因執行所謂的「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遭到了多次揪鬥，上海二醫大「紅縱」並不就此罷休，竟然跑到我的老家和當地造反派勾結在一起去殘害我的母親。

造反派在我老家，從室內到室外的所有牆壁上，院子裏都貼滿了大字報，甚至樹上都掛滿大標語，然後，即向我母親宣佈了三條：

一、邱會作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已由造反派實行革命專政。

二、這裏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邱會作的老巢，應當徹底摧毀。

三、造反派有權處理邱會作老家的一切問題。

我的老家自有革命歷史以來就是軍屬、烈屬之家。鄉親們、鄰居們對我的家向來都極為尊敬。除了國民黨和還鄉團搗毀過我家外，去我家的都是鄉親們和回鄉探家的老革命。他們路過我家時，都到我家去看看我的老母親，就連公審時審判我的副廳長黃玉昆也去看過我母親。造反派搗毀和抄家真是禍從天降！



邱會作的母親。

我的老母親跑到院子裏和

造反派論理，老母親話音未落，一個個子高大的造反派一腳把她踢倒在地，母親即不省人事了。母親在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成了一個瘋癲病人。一九六八年秋天，組織上把母親送到北京來治病。

「九一三」之後，總後的造反派同總醫院的造反派共同對我母親下毒手，他們首先把我母親搬出病房，搞到一個簡陋的小房子中，在房門上還特別張貼了什麼「通告」之類的東西：「對黑幫家屬，自即日起取消特殊護理。不准家屬探親」，停醫、停藥、停食，「九一三」之後不到半年，母親於七二年三月十八日離開了人間。

周總理知道我母親去世後，派人來瞭解過情況。總理對李德生還說過：「邱會作母親是紅軍的老根子，整死她幹什麼啊！？」

老伴受到殘酷至極的迫害

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我們被抓起來時，總理專門對我們說：「你們聽好，你們的夫人和孩子都是革命的。你們回來的時候，他們有什麼閃失，找我姓周的是問！」說完用手在自己的胸脯拍了一下。其實，沒過幾天，我們幾個人的老婆、孩子、親屬和秘書、司機、警衛員都抓起來了。總理已經不能控制局面了。

從七一年的「九一三」到八一年，我的老伴胡敏受到關押、管制、監督勞動，歷時十年有餘，在落實政策的過程中，又受到總後掌權的造反派的嚴重迫害，身心受到極大的摧殘，十多年胡敏都是在苦難和殘忍的折磨中苟延下來的。

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對我採取停職審查措施後，九月二十五日，我的家被衛戍區的部隊接管了。九月二十六日，我的炊事員被調走。國慶節前，中央辦公廳賴奎等人對我家和我的辦公室進行了搜查。九月二十七日，胡敏的管制組住進了我的家，胡敏同外界完全隔絕了，從此就失去了自由。十月六日，我的大兒子路光從家裏被抓走。接著，胡敏被押送到豐臺倉庫附近關起來了，對胡敏立即採取了突擊審訊的措施。

「九一三」之後，周總理指定當時的國家計委主任余秋里兼管總後的工作、國防工業和軍事外援。正是因為這種關係，余秋里就參與了審問胡敏。余秋里、李震、郭玉峰三人代表中央專案組曾經多次審問胡敏和誘供。比如，余秋里說：「我和邱會作的關係是很好的，過去我們是革命的關係，但他現在要殺毛主席呀！你必須揭發他，堅決站在毛主席一邊，你祇要很好交代，是一定會有出路的。」

專案組逼供、誘供，完全採用了造反派那一套「土辦法」對待胡敏。無非是「車輪戰」，有時一天二十四小時，胡敏滴水不進。

在胡敏心中，毛主席和黨是遠遠高於我的，但她肚子裏的確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問題，她一九六八年十月才調總後司令部工作，對我工作上的事，她確實知道不多。她所知道的事，即使是我同她個別講的事，她也都交代了。但千說萬說也說不到「兩謀」問題上。

一九七二年十月到一九七八年八月，胡敏被關押在中央專案組設在北京西山八大處亞非學生療養院的臨時監獄。在那裏度過了七個年頭的監獄生活。

進了監獄，胡敏就編爲第六號，從來不叫她姓名。監獄生活是很殘酷也很單調的，有戰士日夜嚴格監管。完全與外界隔絕。

首先遇到的問題是吃不飽。監獄規定：飯食多了，不准退回，不准留下，一定要吃掉，即使吃不了也硬要吃掉。爲了遵守規定，有時主食要多了一點反而誤事，吃不下也有人看著，硬要往肚子裏塞。爲了不受脹肚噁心之苦，胡敏領飯食的時候，就寧可要少點也不敢多要。這樣又常常吃不飽，就祇有喝開水充飢。

「準時」睡覺起床。監獄規定：每天六時起床，晚上九時睡覺。在規定的時間內，遲早幾分鐘都不行，要是違犯規矩，都得重來。例如，早睡五分鐘，看管的人要逼著起來，把衣服穿好，可剛剛穿好衣服，甚至還沒有穿好，睡覺鈴響了，看守人員又叫立即脫衣服躺下。同樣，早起幾分鐘也是不行的，必須脫了衣服上床再睡下，剛一上床，起床鈴響了，又必須立即起來。這並不是嚴格按時作息，而是不把囚徒看成人，隨心所欲要弄人就是了。除睡覺、起床要按時之外，拉窗簾的「規矩」也是特別嚴格。晚上睡覺，一定要先拉窗簾後開燈，早上一定要先關燈後拉窗簾。如果沒有按照規定的程序做，除了重來之外，還要受嚴厲的訓斥。

黃、吳、李、邱的夫人，都遭到同樣的迫害，沒有起碼做人的尊嚴。

中央專案組的審查，多得難以想像，審查的範圍也是無邊無際的。凡是同邱會作和胡敏有過關係的事和人，凡是去過我們家的人，都在審查之列。

一九七八年八月，匆匆忙忙給胡敏下了一個三開除（開除黨籍、開除軍籍、開除公職）的結論，趕出北京，押送到陝西大荔縣農場監督勞動。作爲一個自小參加革命的共產黨員，對黨組織無限忠誠和信任，她含辛茹苦地等待組織的結論，卻鬧了一個三開除和監督勞動的下場。不僅如此，關了七年，家破人散，連家人和子女的音信都沒有。

一九七八年八月，胡敏被押送到陝西渭南地區大荔縣農建師六連勞動改造，在那裏勞動改造將近四年。胡敏幼年參加革命，她自己並沒有什麼錯誤，因爲受我的株連，從囚徒又變爲勞改犯。

胡敏在農場管制勞動，分給她一個約六平方米的房子，房子是土地太潮濕，蟲子、老鼠太多，晚上，蜘蛛和蟲子常在面部及被子上爬，整夜無法入睡。

胡敏到大荔的頭一年，每月祇給生活費四十元，困難的程度可想而知。胡敏是一個極為堅強的人，也是一個克勤克儉的人，她自己養了雞，把雞蛋留起來等待子女們來看望時吃，也攢了幾斤大米留給子女，可是子女去時，雞蛋早變臭了，裝米的袋裏有一隻脹死的老鼠。

由於長期的關押，精神上巨大的壓力，再加上惡劣艱苦的生活環境，使胡敏心臟病、腿腫、哮喘常有發作，最重要的是，免疫力急劇下降，她全身各處得了白癜風病，本是一個白白淨淨的人，竟被摧殘到如此地步。

在農場一段時間之後，連隊的基層領導幹部和工人，對胡敏給予了人道主義的關懷。得到了大家的幫助和照顧，生活上的困難和痛苦也就減少了一些。胡敏對六連的幹部和工人是很感激的！

一九八〇年冬，當時的中紀委書記黃克誠就向中央提出了報告，認為對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四個人老婆的處理是錯誤的，要進行複查，重新處理。中央批准了中紀委的報告。

一九八一年七月間，胡敏回到了北京。在公安部招待所，公安部門的負責人當著總後的幹部和胡敏本人宣佈：從現在起，胡敏就不歸公安部管理了，還是總後的幹部。遵照中央的指示精神，胡敏政治上的問題由總後複查處理。本來，重新複查是一線希望，可又落入總後的「虎口」，反而使胡敏更加災難深重，當時總後操縱複查的是副政委李耀，一九八三年，總後黨委對胡敏的「複查」結束，結論是：開除黨籍，撤消職務，降為地方十五級，安置到西安市與邱會作一起生活。這個結論比「四人幫」時期下的結論還有過之。我還在服刑期間，胡敏怎麼能和我生活在一起？而且總後並沒有安排具體單位管理胡敏，那時的供應是以「票證」為主的時代，胡敏沒有任何副食票證和補貼，沒有烤火費，沒有公費醫療等等，一切都沒有，祇是在北京的兒子在總後按地方十五級每月領一百多元的工資。發放工資的人都感慨地說：「胡敏還沒有辦理離開軍隊的手續，她還應該享受軍隊的待遇。胡敏按軍人吧，沒有軍人的證件，按地方吧，沒有地方的戶口。」八一年起胡敏就等於是流浪在西安，變為

無人過問的「黑人」了，她從一個強制勞動的「勞改犯」，變為無人管理的「流浪者」了。

胡敏為什麼會受到那樣殘酷的株連？對這個問題從黨的政策來說，是無論如何不能理解，也不能得到回答的。因為株連是沒有任何道理的，也是根本違犯黨的政策。

關於胡敏同志所犯錯誤的結論和處理意見

總後司令部常委：

(82) 司黨字 28 號《關於對胡敏同志結論和處理的報告》，軍紀委 1983 年 5 月 19 日，(1983) 軍紀委復字第 60 號批復：同意對胡敏所錯誤的審查結論，決定開除其黨籍。撤消原中央專案組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五日《關於胡敏的審查結論》，其它處理，根據審批權限，由總後決定。

對胡敏的其它處理，根據中央指示精神，總後黨委決定，給予撤消總後司令部辦公室主任職務的處分；定為行政十五級（自結論批准日起按地方行政十五級發給工資，以前工資不再補發）。退出現役辦理退休，安置到西安市與邱會作一起生活，其政治生活按縣團級待遇。

中共總後勤部黨委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胡敏真正的錯誤是為葉群家「選美」跑了不少腿。「選美」是極壞的風氣，造成了極壞的影響，應當誠懇承認錯誤，接受教訓。當時，為葉群家「選美」的高級幹部老婆不乏其人。正因為這是一種壞風氣，中央紀委黃老就說過：「選美是工作關係，不是搞政治陰謀。」儘管如此，對「選美」胡敏從來也沒有推脫過自己的責任，早已向中紀委、軍紀委做過檢討，承認錯誤，並且認識到「選美」是一個嚴重的教訓。總之，胡敏在文化大革命中，除了「選美」有錯誤之外，其他方面根本沒有什麼錯誤。因「選美」問題對胡敏進行批評教育，甚至給予黨紀處分是可以的，但對胡敏給予「三開除」的處理，就是典型的株連！

其實，總後對胡敏的結論，與對我的「公訴」除文字上多少有些不同之外，綱目、基調、內容都是一樣的。幾乎每件事，都是從我的頭上搬過去，即是把對我的問題的帽子，戴到胡敏頭上去的。加到我頭上很多都是不折不扣的冤案，又加到胡敏頭上就是雙重冤案了。

從八一年下半年開始，在長達三年的時間裏，總後司令部辦案人員祇裝模作樣地對胡敏做過兩次很短的談話，每次談話之後，胡敏都有很多意見要說，但都被拒絕了，胡敏根本就沒有申明的機會。祇要對審查稍微提一點異議，就會立即被指責為「態度」不好、「對抗」、「翻案」等等，總後司令部有一個姓閻的參謀，是胡敏的審查人員，經常是謾罵，吹鬍子瞪眼訓胡敏。每次談話之後，即向胡敏宣佈：「沒有通知不准到北京來，即使來了也不接待。」八二年在西安又向胡敏宣佈：「結論就這樣了，你不接受是你的態度問題，不是結論本身的問題。你不接受，照樣可以給你做結論。沒有命令，你不准到北京去。」在「結論」中，還指出胡敏「態度」不好，因而加重了處罰。

總起來說，對胡敏的審查和處理不是把她當做一個老幹部，把問題搞清楚，實事求是地做出正確的結論，而是把胡敏當做「反革命主犯的老婆」，任意進行株連。

胡敏早在三六年就參加了西安地下黨領導的革命工作，三七年即由地下黨送上前線參加了八路軍。胡敏是抗日戰爭之初，有名的西北抗日醫療隊上前線參加八路軍的隊員之一。她三九年入黨，一直從事醫務工作，為人民解放事業積極工作，做出過自己的貢獻。

對胡敏的處理，對黃、吳、李、邱四位夫人的處理，對黃、吳、李、邱老戰友、老部下，甚至秘書、工作人員的處理，由於造反派在軍隊三總部、海空軍掌了權，偏離黨的政策是很遠的，大部分同志仍然是開除黨籍，降級降職，轉業復員。為此，中央再一次指示複查，落實政策。軍委張震副主席、國防大學段蘇權政委等老戰友對胡敏的複查問題進行了真誠的幫助。為了複查的公正性，不少單位都換了人，可總後還是原班人馬。好在總後黨委已經換了班子，在審查中，決定恢復黨籍，對胡敏的不實之詞也有所糾正，總後黨委也將結論上報總政。由於胡敏對某些問題堅持自己的意見，讓專案審查人員找到了借口，說胡敏態度

惡劣，拒不認錯，他們又鬧到總政。在黃、吳、李、邱四位夫人中，相對來說胡敏事最少，錯最輕，最後反而對她的處分最嚴厲。

五個子女無一倖免

我有四個男孩，一個女兒，五個孩子無一不受到株連。我的大兒子一九六七年畢業於北京工業學院，二兒子畢業於清華大學，畢業後他們都分到部隊鍛煉去了。兩個小兒子分別於六七年、六八年參軍，在基層也都提拔為幹部。他們在部隊，思想、工作等各方面都表現很好。一九七一年九月「九一三」之後不久，四個孩子都被先後被關押、株連，最後一律清除出部隊了！

我的大兒子路光，在文化革命中是學校反對中央文革，反對江青等人的骨幹。路光畢業以後，原北京工業學院軍宣隊收集到路光大批反江青、反中央文革的「黑材料」寄往部隊，被部隊頂住。「九一三」之後，軍宣隊又將路光告到江青那裏，總政治部主任李德生批示，將路光抓回北京關押，由總後負責審查，一關就是三年。而後又以「闖進釣魚臺，欲謀殺江青」的罪名，關進北京第一監獄，在那裏上了刑具，留下傷殘，經受了非人的生活，一關又是三年。

一九八〇年，經過近十年的磨難，兄、弟、妹五人第一次在北京見面，共同寄住在向朋友借的僅十平米的平房內。



一九七六年，路光被武裝戰士押送到甘肅河西走廊祁連山下的山丹軍馬場監督勞動。總後的造反派指令軍馬場成立了一個對路光六人監督小組。路光是強制勞動，常常是超負荷的。例如，搬運青稞麥麻袋，每袋160斤，從踏板裝上汽車。他每月祇有9元錢的伙食費，他又不能吃牛羊肉，嚴重的營養不足，身體被折磨得不成樣子。路光在軍馬場勞改了三年，真正成了一個勞改犯。

在中央專案組審查的人如林辦的秘書，黃吳李的秘書，及黃的子女，七五年在毛主席的批示下都解除審查，重新分配了工作，而由總後代管的路光，從七一年到七八年，總後對路光審查了將近八年，那時「四人幫」已經垮臺，他們認為：「攻擊中央文革，攻擊江青，不予追究，但仍有攻擊社會主義的嚴重問題，送回原部隊處理」。把人關押勞改折磨了八年，就送回部隊處理了之，這真是草菅人命的典型。

一九八一年，部隊決定路光轉業。他是從北京入伍的，按照國務院和中央軍委的有關規定，理所當然轉業到北京市工作。但軍隊轉業辦公室不准路光回北京，硬要他「回到」我的老家江西興國縣去，這是毫無道理的。路光祇能復員回到北京，後來在萬里副總理、北京市副市長葉子龍和商業部副部長張永勵、趙發生及邱國光副司令等老戰友的關心下，才把路光安排在北京商學院工作。由於路光是復員回來的，到了商



和京京，新平一家合影。

學院不能承認他原來的行政十九級的級別，給他定行政二十二級（降了三級），每月 60 元工資，生活極為困難。路光在商學院已經工作四年，但轉業手續都沒有恢復。由於白天要上班，對自己的事祇有在工作之餘奔波，不幸遭車禍，骨折八處，幾乎喪生。在困難無告之時，一九八八年趙紫陽總書記對路光的來信作了批示，恢復了行政十九級，並分配了住房。「做一善事如造七級浮屠」，我永遠感謝趙紫陽總書記對路光的關心。

溫玉成是我的老戰友，又是興國老倭，關係一直很好。但溫玉成到北京後，不知爲了什麼，一頭栽向江青。在文革打小報告盛行的時候，他向中央文革告了我三狀，其中之一就是有關程光在清華參加文化革命的問題。溫給江青打的報告說：「清華兩派之所以鬧得很厲害，邱會作的兒子邱承光是該派的重要成員，邱本人是 414 派的後臺。」這是純粹捏造事實的報告，承光哪一派都沒介入。幸好這個報告江青轉給黃永勝了。黃永勝知道底細，當天他就要我一起去向周總理把問題說清楚。周總理當即定了兩條：一，對溫的報告，如果有人追查就直接了當地指報告是誣告，根本不是事實。二，邱承光立即離開北京，到部隊鍛煉去。承光到廣州軍區去當兵，是周總理親自決定。

「九一三」之後，在十月底，周總理陪埃塞俄比亞皇帝去廣州訪問時，還有意專門召見程光等幹部子弟。但總理突然有急事回北京走了，



路光一家合影。



和承光一家合影。

特委託李先念談。李先念當著廣州軍區首長和程光等人說：「你的父親目前正在接受審查，他的問題會得到很好解決的，你要如同過去一樣相信毛主席，不要失去信心，在部隊很好學習鍛煉。」李先念又對軍區首長說：「現在就把孩子交給你們了，要一視同仁地對待，不得歧視。我們共同把孩子管好。」軍區首長當著李先念的面承諾了。由於周總理委託李先念有指示，承光本人也下決心堅決執行總理「在部隊很好學習鍛煉」的指示爭取在部隊呆下去。但承光後來得到的就不是「一視同仁」而是「另眼看待」了。承光受到了嚴格的審查和嚴重的打擊，但他非常堅強，沒有向整人的傢伙屈服。

一九七八年，承光請假去北京打聽父母、兄弟、妹妹的情況，他已經八年沒有假期。他費了很長的時間，才找到天各一方弟弟和妹妹。由於時間不夠，承光就發電報和寫信續假。但部隊以超假為由，使承光遭到了開除黨籍的沒頂之災。並強行以轉業處理到蘇北的小縣城當教員了。

承光女朋友陳雪巾，「九一三」前祇見過一兩面，她六九年參軍，在解放軍總醫院做藥劑護士。由於工作好，軍醫大學招收工農兵學員時，總醫院送她去第四軍醫大學學習。陳雪巾學習成績很好，「九一三」事件



和光光一家合影。

之後，她已經學習期滿，可以正式畢業了，但學校不僅沒有發給畢業證書，總後還把她抓去審查。一個女孩子，和程光祇是普通的朋友關係，也要關押，七六年承光都可以探親了，雪巾還在關押之中。她同樣是無家可歸的人，「九一三」後，僅因為女兒是承光的朋友，雪巾的父母竟被從無錫市趕到農村去了。

後來承光經百般周折來到雪巾的家鄉無錫。他們夫妻都是共產黨員，兩人都如同過去一樣努力工作，努力學習，在工作中做出了自己的貢獻。承光在無錫採煤機械廠將近十年時間，他和他的小組自己查資料，自己設計，自己製造主要部件，經過兩年多的時間，成功設計出薄煤層採煤機，這種機器填補了我國採煤機械的空白，機器的質量也相當好。為此，一九八七年春，國務院煤炭部授予承光科技進步三等獎，江蘇省授予二等獎。承光這個孩子天資較高，初中、高中、大學，他學習成績都是名列前茅。因為受我的株連，耽誤了孩子，一想起來，我心裏就很難過。

三兒子光光，於一九六七年當兵，當時祇有十五歲；四兒子小光於一九六八年當兵，當時也祇有十五歲。兩個小兒子在軍隊的大學校裏，



和小光一家合影。

學到了知識，得到了鍛煉，他倆都被提拔為基層幹部，光光任師司令部參謀，小光在連隊任排長。他們兩個人本來就出生在軍旅之家，是適合在部隊工作的。但他們當兵的權力被剝奪了，「九一三」後就以辦「學習班」的借口關了起來，後來又下放農場五年。部隊不是按黨和國家的政策安排他們轉業，而是叫他們復員，於一九七八年五月被攆出軍隊了。

他們在北京是無家可歸，舉目無親，真是痛苦難言。他們借住在同學祇有九平米的小平房裏，常常睡五六個人。他們在辦理就業的過程中，碰到了一個又一個困難，三兒子光光最後在工廠幹了幾年的裝卸工，小兒子在工廠幹修理工。

我唯一的女兒京京，一九五八年出生，文化大革命開始時，祇有八歲，七一年「九一三」事件時，還是一個尚未成年的孩子。但總後造反派對她的株連是十分殘忍的，女兒是我們全家最可憐的人！

「九一三」以前，京京住在西單小醬坊胡同，「九一三」之後，就被迫離開了。離開那天下著小雪，京京小小年紀，畏縮在卡車上，不知所措，因為去哪裏，她也不知道。我的全家都被抓起來了，總後的人把京京搬到一間放雜物的小房子，一個十三歲的孩子開始了獨立的人生道路。京京在總後五號院受盡了屈辱，房門上貼滿恐嚇和謾罵的大字報，

並聲稱「膽敢撕掉就採取革命行動」，京京上廁所時，調皮的男孩子經常裝神弄鬼，在廣場看電影也不得安生，經常有人向京京扔髒東西，甚至遭到小石塊和土疙瘩的襲擊，京京很少能夠看到一場完整的電影。

京京在精神極端痛苦的情況下，一天晚飯後，由她嫂子的娘家無目的地出走。當時已經是寒冬臘月，她身上穿得很單薄。她由住處走到了天安門廣場，在天安門轉來轉去，然後在一個角落裏坐下來了。當時想了很多的事，但主要是想媽媽，爲什麼不讓看媽媽，根本想不通。她想來想去，不知不覺地就睡著了。第二天早上，天安門廣場換早班的戰士，把她叫醒了，才知道自己在這裏睡了一夜。

七四年二月七日，總後竟然把京京攆出了北京，隻身到河北省井陘縣 3502 工廠繼續「上學」，每月給 20 元生活費，這是「九一三」事件之後京京遭到的第二次嚴重打擊。

京京高中畢業了，不予安排工作，在困難無告的情況下，京京給胡耀邦總書記寫了信，胡做了批示：「對子女的問題不能再不管了，要確切解決邱會作的女兒上學或就業的問題。」這個批件到了總後，在總後政委王平那裏就壓下來了，但終究要解決問題，最後不讓京京回北京，硬性

光光、小光同在一個部隊、一個城市。「九一三」時一個十九歲，一個十八歲，也被隔離審查，下放農場，五年後才讓相見。



第四十六章 在西安的日子

安置西安

八一年九月十二日，我被送到西安，到現在已經十年有餘。我是以「保外就醫」的名義被送到西安的，但是我在西安不僅沒把身體保護好，反而幾乎「保外送命」了。我對生活要求很低，能過得去就行了。就是這樣低的要求，也沒有得到滿足。

八一年八月二十二日秦城監獄的副主任（我稱之高個子主任）就開始同我談「保外就醫」的問題，連續談了兩三次，我記得最後一次談話是九月六日。

高個子主任說：「保外就醫的問題，中央已經定了。你是安排到西安，房子也準備好了。你如果沒有什麼意見，過幾天就走了。」

我回答說：「我服從中央的安排。不過剛公審完我們，馬上又搞保外，不知是爲了什麼！對於保外後的生活，我祇有一條要求：有暖氣，有衛生間，能在家裏洗澡。因爲戰爭年間我有傷有病；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造反派打得一身傷殘，一受涼就全身痛。」

高個子主任笑著說：「你的要求不高，是合理的，這些你就不要顧慮了。」

九月十二日早八時我到了西安。陝西省公安廳郝副廳長和公安廳八處張科長到車站來接我。我進到我的住房時，心就完全涼了。我在北京提出的住房要求一條也沒有落實，心裏很難過。

房子裏一共有四張木凳子，一張木板床，我們坐下之後，郝副廳長開口對我說：「房子不算好，但也費了勁才買到手的。今後你就同這位張科長打交道，他是專門負責你的事務的。」因爲當時還正是深秋期間，沒有暖氣的房子究竟是個什麼滋味，還沒有實際感覺，祇能這樣住下了。

我到西安後同公安廳的關係就是：每月一百元錢（扣去七元房租，祇剩九十三元），三十斤糧票，半斤食油。另外，還可以報銷藥費。

八一年十月間，中央公安部來了檢查組，檢查組的組長就是秦城監獄的主任（即光頭主任），據說他也是公安部八局局長。一天，公安部檢查組，陝西公安廳郝副廳長和張科長等六、七人都到我的住處來了。

光頭主任首先說話：「我們是經過濟南、青島到這裏來的，然後到太原去。我們看到的三個地方，房子的質量、設備、面積都差不多，都可以住下去……」

我說：「住下去，當然是可以的，比這再差的也可以住下去的。我在秦城監獄曾經向你們提過，住房要有暖氣和一般的衛生設備要求，一條都沒有做到！」我說得很激烈。

光頭主任避開回答我提出的問題，他說了一段解釋的話：「房子條件不是很好，但也來之不易呀！這個房子是由中央撥款專門買給你住的，取暖問題會解決的，保證你冬天不挨凍。至於洗澡和馬桶的問題，更好解決。你要有信心，情況會越來越好的。」

我說：「你們的話能不能落實，我不知道。趁你現在著這裏，我現在祇提一個要求：要求回秦城去。在秦城有暖氣，可以洗澡……。」



一九九五年，胡敏和老戰友項輝方在西安家中。



胡敏和林立衡（豆豆）在一起。

此時，光頭主任看到情況並不妙，他祇說一句話：「你不要多想那些不可能的事。」說完他起身就走了。臨走時，光頭主任還交代我的大孩子路光說：「你要同你父親好好談談，不要失去信心。」

從公安部檢查組在我住處談話的態度可以看出：檢查組是例行公事，不是來解決問題的。不出我的預料，檢查組什麼問題也沒有解決。

一九八二年春節，我們家是大團圓之日。全家除了大孫女未到之外，其餘五個孩子每家三口共計十五人全部到齊了。加上我們老兩口和女兒帶來的保姆共計十八口人。我們的住房沒有取暖設備，大家都是挨凍過春節。除此之外，我們過的真正是窮人節。當時，我祇有一百元生活費，孩子們的工資也很低，除了勉強度日之外，也是身無分文了。

生活問題

在生活上，我們經歷過的辛酸事是多得難於計算的。

取暖問題。八一年冬，公安廳八處在我的住房廚房內，安裝了一個小鍋爐，有兩個房間可以取暖。白天不停地燒著房間還暖和，晚上不燒就一點熱度都沒有了。由於燒的是煙煤，不僅廚房內牆壁熏得黑不溜

秋，而且整個室內煙灰很大，對人的身體傷害更大。我的鄰居，尤其住在樓上的鄰居，對我們燒煙煤也提出了意見。小鍋爐對自己對鄰居都不利，於是我就堅決不同意再用了。

從八四年冬起，他們把小鍋爐改爲燒爐子（又名土暖氣）。但仍然祇能給兩個房子供暖，溫度稍高一點，可以燒到19度，而且燒的方法也比較簡單。可是這種爐子祇能燒無煙煤，因爲沒有煙筒，中煤氣的危險很大，一次我們全家都中了煤氣，小阿姨爬到門口喊人才轉危爲安。鄰居都很關心我們，第二天早晨就有不少人來看我們。派出所也知道我們中了煤氣並報告了公安廳八處，過了兩天張科長才來了，他看到我躺在床上還沒有死，心裏也就「放心」了。

我說：「人中煤氣不好，但『中人氣』更難受。這次是你們公安給我的『福份』。你們常說，我的生活會越來越好，現在算是兌現了。如果多中點煤氣，我就享天福去了。」

改變燒爐子後，供應無煙煤就發生了很大的困難。因爲陝西不產無煙煤，加上八五年起，我的生活費用，是由中央撥款包干的，他們對我捨不得，供煤就更困難了。

八四年進入冬天之後，八處送過兩次煤。大約有兩個月了，煤也快燒完了，還不見煤來，我就向八處張科長寫信報告，但一直沒有見送煤來，我著急了。八五年一月一日一早在大雪紛紛的情況下，我到派出所去給八處打電話，向他們報告沒有煤了。接電話的人祇回答一句話：「我們這裏沒有煤。」電話就卡嚓一聲掛斷了。

不供應無煙煤，停了兩三天沒有燒爐子。當時正是寒冷天氣，凍得實在難於忍受，我的外孫女在我這裏，小孩凍得整天都哭。沒有辦法，我祇好去派出所，董所長即說：「這樣吧，我們給煤場寫個條子，要他們在煤票之外供應你們二百斤烽窩煤，以應急需。他們會辦的。」

我當時很感動！用勁先說出「謝謝」二字，接著我又說：「公安八處不會報銷的，我自己是無力負擔這筆開支的，去年的煤錢公安廳還沒有報銷。」董所長是帶有濃厚感情說這句話的。他又說：「這真真是怪事！」董所長是帶有濃厚感情說這句話的。他又說：「這次買煤，我們會給你報銷。你放心去辦就是了。」煤場離我的住處很近，很快就把事情辦妥了。當晚又燒起爐子來了，全家老小都高興。

由於公安廳八處對我的生活太不經心，八五年的秋天，我就向張科長提出：「今年冬天的無煙煤，由我自己找人採購。」他很乾脆地答應了。從此，連續幾年都是我自己找人買煤。給我幫忙的人很多，我對熱心的鄰居表示由衷的感謝。

冬天燒爐子，因為不會燒經常熄火，熄火之後要重燒，就要用柴火才能燒著。公安廳八處不給我們引火柴的費用，自己買又不起，祇好自己動手找出路。當時，我們小區裏就是建築工地，有不少木材下角料是上好的引火柴。我硬著頭皮向木工師傅說：「我的爐子滅了，你給我一點無用的木柴下角料，好嗎？」工人對我很客氣，他說：「隨時可以來拾嘛。」工地的負責人知道了我的「身份」後，特地為我預備了一堆劈柴，都是五、六寸長，並且還劈得好好的，這樣就解決了我很大的困難。

燒爐子取暖的時候，每半小時要向爐子裏加一次煤，是很勞力費神的，我家有個小阿姨，她要做飯搞衛生，還要帶我的外孫女，一天忙得不可開交，不能再讓她搞爐子了。我曾向公安廳八處提出要給我們配一個燒鍋爐的工人，他們聽到後祇冷笑了一聲，根本不理睬。我和老伴就自己動手，每天用破臉盆把煤一盆盆從一樓端到二樓，再把爐灰一盆一盆端下去，我們用自製的小鐵耙，把未燒盡的煤扒出來，西安人稱為拾爛炭，搞得我們老兩口滿身是灰，而且腰酸背痛。但每天拾十幾斤爛炭，對我的生活能夠產生很大的經濟效益，由此可見我當時處境的困難了。

洗澡問題。洗澡這個問題，對一般人來說，根本不是什麼問題，但對我來說，卻是大問題。我初到西安時，公安廳八處每個星期用汽車送我到城裏澡塘去洗一次澡。祇有一個月，他們就不來車了。不來也罷，因為我自己對坐汽車去洗澡心裏也不是滋味，總覺得這是一種浪費。

初到西安時，路光請了半年假，繼而我的女兒京京請了一年假來照顧我們。他們就用自行車帶我去洗澡，或者是借別人的三輪車，全家同去洗澡。孩子回去後是我老戰友的兒子邱煒用自行車帶我去洗澡。邱煒工作實在忙，我不忍心總麻煩他，我就提出不要他來接我去洗澡了。我自己每十天或半個月，背上一個包，帶上衣服就去洗澡。我總是洗大池子，因為窮，要多花一角錢都是困難的。洗澡有兩個最大的問題：一是擠不上公共汽車；二是洗澡之後必感冒。

西安公共汽車之擁擠是難於形容的。我每次去洗澡都要用很長的時間等公共汽車，常常因為擠不上去就回來，第二天再去。鄰居護著我上公共汽車的次數也不少，因為小伙子力氣大，我祇要跟著在他的屁股後頭，就沒有上不了公共汽車的。等公共汽車是件煩惱的事，但也有好處，可以聽到很多的新聞、怪話、笑話。

我是最容易因洗澡而得感冒的，幾乎每洗一次澡回來都要頭痛，咳嗽甚至發燒。這些情況張科長很清楚，但他就是不說話。八六年的冬天，我就直截了當向他說：「冬天，我半個月去洗一次澡，用你們的汽車可以嗎？」張科長回答說：「用油限制很緊，恐怕困難，我回去匯報一下。」實際上沒有答應。

我是偶爾遇到第四軍醫大學政治部一個姓周的幹部才真正解決了洗澡問題。那位周同志原是總後政治部的，文化革命中還是反我的造反派，現在他對我很關心。周同志為我辦了一個四醫大的臨時入門證，進去洗澡就非常方便了。

四醫大管澡塘的是一個姓李的年輕人，他知道我的「身份」後，不僅不要我買票，而且每次去洗澡，他事先把澡盆、房間都打掃得乾乾淨淨。小李祇讀過小學二年級，還寫不了信。小李每次回信都是我給他起草的，我們成了好朋友。

票證問題。八十年代是票證年代，當時的票證是數不清楚的，如糧票、油票、肉票、粉絲票等等。我沒有戶口，自然是「無證居民」，什麼票也沒有，連冬天貯大白菜的票也沒有。公安廳應該知道這個情況，但他們根本不管。我們吃的副食品就是靠鄰居、朋友、親戚給我們送點副食票過日子。除了票證之外，還有什麼補助，我們也是從來沒有享受過。例如，從七十年代開始，由於提高了糧價，吃商品糧的居民，每人每月都補助五元。關於五元糧食補助費之事，我向張科長提出過，他不回答我的問題，祇反問了我一句：「在秦城有吧？」他這是對我的挖苦，我也不客氣地說：「你們西安的公安機關什麼都是先進的，連地獄都是十九層，比別的地方深了一層。」

八三年十一月開始冬貯白菜了。我們沒有冬貯白菜的票證，一天，我同老伴在菜場看到賣菜的時候，掉在地裏的葉子很多，老伴隨手拾了

一些，拾白菜就是這樣想起來的。賣菜的工人師傅也很同情我們，有時把大片的好菜葉扒下來給我們，真是天無絕人之路！

我的孩子對我們非常孝敬，當時路光還在部隊，他也就請假不歸了，在西安照顧我們半年，忙裏忙外。我的女兒也請長假從武漢來照顧我們，雖然困難，大家心心相依，給了我們很多溫暖和安慰。

鄰居如親人。我在長樂路安仁坊住久了，群眾中大大小小，老老少少，官家百姓都認識我，鄰居碰到我幾乎都說：「注意身體，有健康的身體度過晚年是最幸福的事。」有些人在大街上相遇，不便多說，也要在我的耳邊小聲說：「不要想那些事，要注意身體。」我也總是點點頭，向他們致謝。

八十年代初，副食品還是國家統銷為主，當時採購副食品並不容易，買不到東西是常事。我要是在排隊買副食，人們總是讓我到前面去是很受優待的，我則堅持不搞任何特殊化，前面的人前進一步，我也跟著前進一步。每次買菜的師傅和買菜的鄰居非要我不排隊，我也就領情了。商店經理還決定一次賣給我兩包火柴。事情雖然很小，但從這裏還是看到了人民對我的照顧和幫助。

刷房子。由於燒了兩年的土爐子，我們房間的四面牆上都熏得黑黑的，尤其是廚房。我向八處提出來粉刷一下，他們沒拒絕但也不辦。

一天，鄰居三個小伙子，偶然看到我的房子黑得很難看，他們當時就合計要幫我們粉刷一下，並預定下個星期天上午九時動工。但到星期天那天，我忘記了這件事，出去散步去了，待我回來時房子已經刷好，小伙子們準備走了。當時我感動得不知怎樣是好，我說：「在我這裏做點飯吃了之後再走。」他們回答說：「我們不吃飯，我們三個人吃一頓夠你吃一個星期的，我們知道你招待不起。」

我又說：「你們爲我刷了房子，不付工錢，料錢總要付吧。」他們回答說：「既不要付工錢，也不要付料錢。因爲這點錢，你同樣負擔不起。我們爲你做點事，心裏很高興。我們這些工人子弟永遠不會忘記爲我們打江山的老革命，這就是我們的心意。」

幾個小伙子走了之後，我一個人坐在房子想了很多，真是思緒萬千，祇有人民才會叫我老革命，知道我爲人民打過江山。我想來想去想出來一個真理：人民萬歲！

有期等於無期

我的十六年徒刑一九八七年就期滿了。我和我的家人也都盼望到期之後生活條件能夠得到改善。我自己對到期之後，也不是一點想法都沒有。刑期到了，苦難也應該受盡了。革命本來就是自願受罪的，甚至自願獻出自己的生命，其目的就是爲了廣大的窮苦人民的解放，包括自己在內也得到解放。爲革命而受罪是應該的，是光榮的，我走上革命的道路是非常正確的，不管受過多少苦，永不後悔！但是除了革命的苦之外，我現在還受了另一種苦，一種更難於忍受之苦，是共產黨「自己人」給我的人爲之苦。這種苦是不應該的。我們黨對黨內幹部處理的傳統向來都是思想從嚴，組織從寬，在生活上從來也沒有把人搞到活不下去的地步。現在雖然毛主席、周總理都不在世了，但黨的傳統總還是應該存在的。何況我的問題究竟有多大，中央知道，我自己知道，我的戰友都知道。

我希望我們的黨，能夠從對我們的錯誤處理中取得教訓，糾正錯誤，能夠使後人再不受「自己人」之苦，這是我的唯一希望。到期釋放。八七年九月二十四日，是我十六年刑滿到期的日子，這對我個人來說是一件大事。

九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時許，陝西省公安廳突然到我家來了三個人。領頭的是公安廳馬顧問，他們三人坐下後說：「明天是九月二十四日，你的刑期到了。今天我們還未向你宣佈，就犯法了。今天我們正式向你宣佈兩條：一、按中央公安部的命令，你的刑期到期了，決定對你釋放。二、刑期到期後，對你的安置中央尚無決定，待後再宣佈。」上面的內容，他們照原來寫好的稿子，一字一句說的。

宣佈上面那兩條之後，他們接著說：「你有什麼意見可以提出來。」
「這樣就叫做釋放嗎？判決的時候，興師動眾，現在釋放是不倫不類，我們國家的法律就是這個樣子嗎？！」

對我提出的問題，他們不說話。

我說：「十六年來，無論關進衛戍區，押進秦城監獄，公審等，我都是服從中央決定的，並沒有多說過話。因爲我不是反革命，我是老革命。現在刑期到了，相信中央會按照政策，對我的生活給予安置的，但怎樣安置，我還是服從中央決定的。過去，我沒有多說話，其實，我有

很多話要說，現在沒有人聽我說話，祇要有一天有人聽我說話，我會說得清清楚楚的。」我的話音一落，馬顧問連忙站起來說：我們走吧。其態度真是冷若冰霜。宣佈對我釋放的「儀式」就結束了。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時，公安部八局處長姜耀山到西安來，在陝西省公安廳八處會議室找我和胡敏談話。

姜耀山處長是個年輕人，他的談話要點如下：

邱會作十六年徒刑已經滿期，九月二十三日公安部委託陝西省公安廳對邱會作宣佈正式釋放，這是完全按照國家的有關法律辦的。對你的安置，中央政法委有批示。按照批示的精神，現就有關安置的問題，向你宣佈如下：

一、安置的地點，原則上在保外就醫的地點，邱會作期滿後，即在西安安置。除京、津、滬和沿海地區、沿邊境城市之外，其餘的地方有親朋可投，可以去。要是自己自願，可以回原籍。

對邱會作在西安的安置，我們已經向省委省政府匯報了，由省政府負責安置。對要求住有暖氣的房子，並有衛生洗澡等設施，公安廳已經向省政府提出來了。政府的態度是好的，用積極的辦法把問題解決好。

二，生活費二百元不增加。國家的經濟改革雖然已見成效，但幹部生活水平還是不高的。你每月二百元，包括物價上漲因素在內，不僅可以過得去，還綽綽有餘。當然，生活好壞是相對而言的。

三，按照判決，從釋放之日起，即執行剝奪政治權利五年，並按照刑法有關條文執行。

姜耀山處長講話之後，我說：「對姜處長的宣佈，我不發表意見，祇提三點要求：

「第一點，要求回北京。回北京不是什麼政治權利，是投靠子女，我們老兩口隻身在西安，生活的確是困難的。你們可以關我，可以公審我，現在刑期到了，不讓投靠子女，這是什麼法律？

「第二點，要求改善生活條件。我現在每月二百元生活費，除了僱個人做飯，房租、水電、書報等費用佔去了一大部分，真正能落到生活上的就不多了。剛才，姜處長說了，『生活好壞是相對而言的。』這個道理我懂得，但我同誰相比就不清楚了。我相信，我的生活同你姜處長就不能相比。

「我現在住的房子條件很差，要求能搬到有暖氣、衛生間能洗澡的房子去住。」

「你們知道，我十四歲就參加了革命，時間快六十年了。我是以革命為職業的，除了依靠共產黨之外，其餘什麼辦法也沒有。對我這樣一個人的處理，比你們對真正反革命的處理嚴厲多了，對老革命和對老反革命的處理，你們真正做到了旗幟鮮明。例如，你們對沈醉的處理就寬宏大量，仁至義盡，對我的處理，你們就殘酷得不可復加了。」

「第三點，要求解決家屬株連的問題。我的全家老至八十歲的母親，小至十三歲的小女兒都受到了株連，無一倖免。株連是空前未有的，但現在無人過問，很多問題都得不到解決。我們真正叫天叫地也解決不了問題。」

姜處長並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百感交集

我的刑期到後，沒什麼動靜就算過去了。判決我的時候，當局是大張旗鼓的，全部招數都用上了，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釋放我，我同樓洞的鄰居都不知道。

在當時的情況下，我真是百感交集，思緒萬千。我認真回顧了歷史，在將近半個世紀內，我所知道的中央對其他人的處理包括對高級幹部的處理，我一個一個都想過了，以我的經歷來看，對我們這樣狠毒的先例一個也沒有。對我的處理，肯定是我黨有史以來最大的冤案。

我要求自己任何時候都要維護黨的利益。因此，我始終都把自己置於老革命、老黨員、老幹部的位置之上考慮問題。正是因為這樣，我就能正確對待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以來所遇到的一切苦難。而我能忍受一切苦難，最基本的一條就是相信黨、相信中央、相信自己。

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以後，自己對要下臺是有充分的精神準備的。但怎麼個下法？頂多也祇考慮過，與我的前任洪學智下臺大致差不多，其餘的都在預料之外。

進了衛成區之後，我想到：發生了林彪這樣大的問題，在事情不清楚的情況下，把平時同林彪工作關係比較密切的人進行審查是需要的。



一九九九年，和老戰友李作鵬在一起。戰友難友情意深重，市井布衣榮辱不驚。

即使對我採取了過激的審查措施，我還是可以想得通。於是我就很快就平靜下來了，對自己的前途並未失望。

真正意料之外是關進秦城監獄，我進監獄的牢房之後，自己也還是半信半疑的狀態。毛主席去世之後，華國鋒、葉劍英上臺，他們全力去對付「四人幫」，對黃、吳、李、邱的事摺在一邊。在這種情況下，就把我們投進監獄關進了「倉庫」。後來即使他們想管也管不了了，因為他們自己也被鄧小平拱倒了。

更可悲的是公審。這個問題除了專權的人能夠想到之外，任何人都絕對想不到，我自己也是沒有想到的。

刑滿釋放，就是「放」了而已，一切根本無人過問。釋放後同過去不一樣的就是：發了一張釋放證書，領了一個身份證，上了戶口，其餘一切都沒有變。

公安廳八處要把我推出公安，這當然也勢在必行，爲了把我移交給民政廳，八九年二月間，公安廳八處、民政廳復員轉業處，雙方都來人到我的住處談移交的問題。

公安廳八處說：「不管有什麼困難，公安廳是不能再管了，這是原則問題。」他說的中心意思是，我的徒刑期滿已經兩年多了，再由公安管就要違反法律了。

由於民政廳對我的移交毫無準備，也不瞭解中央以往的政策，他們祇能按一般政策對我。民政廳復轉處長張百發說：「由民政廳管，住房和生活費用不變，醫療費不能實報實銷，祇能補助。」他解釋說：「中央對老幹部的醫療費有規定：一種是實報實銷，一種是酌情補助，你祇能享受第二種。」

我聽到張的話之後，立即火冒三丈衝口而出說：「我們的黨中央對我決不會對我有這種規定，這是你們的『中央』的規定吧？這點藥費，對我這種受過大難的人也卡，實在沒良心。公審時兇得很，大張旗鼓，現在對我的生活安置就像打發一條狗一樣！對我的生活，在沒有解決我生活的問題之前，我不同意公安廳馬馬虎虎就把我交給民政廳。我堅持說，主要是解決有暖氣的房子、治病和改善生活等問題，祇要解決了，把我交到任何地方都沒有意見。我並非喜歡由公安管，而是要求解決問題。」後來他們經請示決定「藥費還是實報報銷」。

這次談得很不好，無結果而散。這次談話之後就沒有再談話了，公安廳沒有得到我的同意，也就把我交給民政廳了。

當時我的剝奪政治權利五年的附加刑尚未期滿，什麼權利和權益都沒有。從八七年到九二年四年多的時間，我看病太難了，看病要自己先墊錢，報銷時既艱難又麻煩。在省公安廳移交到民政廳之前，我生了一場病，由於沒有得到及時的治療，使我的身體越來越壞。到了年底，我又病了，由於發燒一直不退，老伴陪同我去四醫大門診部看病。醫生根據我的病情收留我住院。但在沒有單位介紹的情況下，祇能住普通病房。普通病房，一個房子住十多人。吃飯好辦，但睡不著覺就是大問題，上廁所也困難，我根本蹲不下去。醫院院長對我治病的問題很同情，但受制度所限，還是祇能住普通病房。

還有一次我發高燒到 39°C，天氣連續下雨，因為沒錢花了，我去八處報銷，但竟然沒人管，回來的路上還掉到溝裏去了，成了個落湯雞，幸好一個路過的工人師傅把我救起來，用三輪板車把我送回家，結果燒到 40°C，接著又看病打針，真是受盡折磨。

省公安廳把我交給民政廳管，但他們之間沒有協調好，九〇年冬天取暖煤就無人管了。我去找公安廳，他們的回答是：「我們早把你的關係轉到民政廳去了。」我去找民政廳，他們的回答是：「公安廳沒有向我們移交取暖的費用。」無奈之下，我向中央趙紫陽總書記發電報，要求解決取暖煤的問題。內容大致如下：「現在已經進入嚴寒，我的取暖煤還沒有解決，也無人過問。特向中央求救。」電報發出去之後第二天，民政廳就來告訴我說：「買煤的錢已經解決了。」十二月三十日，就開始生爐子了。

由民政廳管理之後，他們對我的態度一般的還是好的，像公安廳八處的「閻王神氣」沒有了。正是因為他們的態度比較好，我就抓緊請他們解決兩個問題：一是固定一家醫院看病並發一個醫療證，一是要調換一個有供暖的房子。這兩個問題後來都得到基本解決。看病固定在四醫大了，四醫大特診室對我很好，對我甚為尊重，我每次去看病都沒有遇到什麼困難。

二〇〇七年，胡敏看望老首長李作鵬。



調換房子的問題，費了很大的勁，差不多經過三年的時間才解決。對我要調換有暖氣的房子，民政廳是採取積極同情的態度的，他們認為我的要求完全合理。

省委辦公廳一位姓溫的處長首先去山西、山東考察過李作鵬，吳法憲的住房情況，對解決我的住房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李作鵬在山西從開始就是住的省政府幹部宿舍，房子條件尚好；吳法憲住的是省政府給他新建的獨門獨院一棟小樓，條件也好。根據山西、山東的情況，對我的住房省委辦公廳召集會議進行了討論。公安廳八處的意見是祇能調換普通住房，不能給較好的住房；辦公廳的意見是住房條件要同山西、山東大體相等。公安廳八處把我推出去很積極，現在又來多管閒事。

經過了五年含辛茹苦的生活，到九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我剝奪政治權利五年的附加刑也到期了，開始公安廳沒有動靜，我向他們寫了信後，陝西省公安廳發了一個文字通知。

通知全文抄錄如下：

陝公預發【1992】12號

陝西省公安廳關於恢復邱會作政治權利的通知

邱會作：

你因系林彪反革命集團的主犯，於1980年經最高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十六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1987年9月23日服刑期滿，已辦理了釋放手續。其附加刑剝奪政治權利五年（1987年9月23日起至1992年9月22日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規定，對你的剝奪政治權利已執行期滿，從今年9月23日起恢復其政治權利。特此通知。

陝西省公安廳
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接到此通知後，我做了批註：此件，九二年十月十一日上午九時半，由陝西省公安廳兩人送來的。這個通知可以說增加了我的附加刑十多天。

當省委批准我搬到朱雀路省政府省級幹部宿舍時，八處極力反對，甚至還提出要撤掉宿舍內原有的電話機。省委辦公廳對八處不合理的意見，甚為不滿。省委辦公廳說，你們都下了文件宣佈邱會作恢復政治權

利，爲什麼電話都都不讓用？他年紀大了，快八十歲了，子女都不在身邊，沒電話不成，更重要的是我們也不便管理，犯了病我們都不知道，總不能天天往他家跑吧。

陝西省公安廳欠我的冤枉賬太多了。現在我身上有三個大毛病，心臟病和腸胃病是在過去長期的革命戰爭中，國民黨給我的；一身傷殘、關節病，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毒打造成的；常年自己捅爐子得了肺氣腫是在西安「保外就醫」期間，陝西公安廳給我的。

落難中的情誼

八一年九月十二日，我到西安是居住在長樂西路安仁街 21 樓。爲了「保密」，公安部門要我改名爲邱季龍。在八二年之前，鄰居知道我「身世」的人很少，但不到兩年時間，知道的人也漸漸多起來了，大家都稱我邱老。

戰友子弟

西安有不少幹部子弟，他們都想認識我，也想見見我。原解放軍軍事醫學科學院院長桂紹忠的兒子就是其中之一。

在文化大革命中，軍醫科學院的造反派鄭洪泰，奪了軍醫科學院的領導權，把院長桂紹忠、政委程坤源都打倒了，並強迫他們勞動改造。六七年五月底，我向軍委報告，經請示葉帥、聶帥批准，立即決定對軍醫科學院進行軍事管制，鄭洪泰停職反省，院長桂紹忠，政委程坤源立即解放，並恢復工作。

小桂是四醫大的研究生，八二年回北京過春節，把我在西安的情況向他父親說了，他父親說了一句話：「有機會可以看看他。」在當時嚴酷的政治情況下，這句話也是值千金的。

八三年六月一個下午，我外出散步後往家走時，小桂在我的後面一個箭步走上來對我說：「我是桂紹忠的兒子，現在四醫大讀研究生，我來看看您。」小桂自從上了我的門之後，他幾乎每個星期都要來我家一次，他常買些東西，自己動手做飯給大家一起吃，實際上是在幫助我。

小桂給我做了很多事。例如，我讀的書就是他從學校的圖書館一次一次帶來的。我在西安進過兩次電影院，有一次就是小桂硬拉著我去

的。小桂一直把我當成尊敬的長輩，當成老革命看待，這給我的精神世界有很大支持。

小桂說：「您倒臺了但您的影響還是存在的。這是您的最大成功。全軍特別是後勤系統對你的印象一直是很好的。對你不懷惡意的人都說，你在主持後勤工作期間，做了很多工作，後勤戰線在全軍的威望最高。六七年三月三十日周總理在總後機關幹部大會上指出：『邱會作同志是我軍最好的後勤部長』，總理的話，代表了全軍共同的想法。總後機關除造反派之外，真正反對邱部長的並不多。」

小桂說，我們研究生中，有不少人認識邱部長，大家在閒談中一致表示：「希望邱部長保重，長壽！」

意外來客

一天晚上約七點鐘，有人敲我的門，進來一個紅光滿面的「老頭」，坐下後他反覆問我認不認識他？然後他又自言自語地說：「你不可能認識我啦，我是平津戰役時你的俘虜呀！平津戰役時，我們去收容所之前，你給我們講了話，有一句話對我終生受益。那就是『不要悲觀，努力就有前途』。我聽說你現在很困難，我也沒有什麼思想水平，祇想用你過去教育我的這句話來回贈給你。」我除了謝謝他也無言以對，臨走前他拿出五盒蜂王漿送給我。客人走了以後，我坐在椅子上突然不能動了，可能這件事對我刺激太大了，激起了難忘的征戰歲月。平津戰役，炮火連天，我四野八縱三分鐘突破民權門，第一個衝佔金湯橋……。我作為縱隊政委給敵人俘虜講話……。可我現在卻在困難中求生……，一切都顛倒了。

催人淚下

胡敏出身貧苦，十三歲就在陝西省立醫院做工。醫院有一對老夫婦都是醫生，但他們沒有孩子。這對夫婦看到胡敏（原名胡秀英）勤勞乖巧，就收養了她。這對胡敏來說是天大的喜事，胡敏就此有了溫飽。老兩口還教她識字，介紹她去當護士。三六年胡敏在醫院參加了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掩護過省委書記崔廷儒。三七年抗戰爆發後，胡敏參加了抗日醫療隊上了前線。臨走前並沒有給老兩口講，是偷偷跑掉的。事後老兩口受到國民黨特務的刁難。人生滄桑，幾十年後胡敏又回到了西

安，她是從這裏參加革命，反而作為反革命回到家鄉。他一生都惦記老兩口，解放初期有過聯繫，因為工作忙一直沒有見過面，文革中又斷線了。到西安後經多方打聽老兩口還健在，而且都是教授一級的專家。胡敏去拜謝時，進門就給老兩口跪下了。胡敏說：「我是感謝你們的恩情今天來拜恩，同樣，出於感謝你們的恩情，今後不能再來了。」老兩口愛憐地拉起胡敏，三個人都在落淚，臨走前他們留下了電話並送給胡敏500元錢。胡敏哭著到了郵局把錢寄回並留言道：知恩不能報，全做無此人。

戰友情誼

我的一生，除了公敵之外並無私敵。在革命隊伍內部，除了在文化大革命堅決反對造反派之外並無仇人。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我同上級、同級、下級都結下了友誼。我流放到西安後，來看我的人很多，凡老戰友到西安來，都要到我的住處來看我。

原中央糧食部副部長趙發生是我的同鄉。我們在長征的途中相識，到了陝北之後，見面的時間多些，解放之後在業務上的聯繫很多。我們是老戰友，他對我很尊重，很關心。

趙來西安是搞陝甘寧邊區解放戰爭時期的軍糧供應資料，準備寫一本軍糧供應的專著。他祇知道我在西安，但並不知道住址。為了要見我一面，他一到西安就打聽我的住址，但市糧食局也不知道我住在什麼地方。為了搞清楚我住的具體地方，市糧食局派專人到省公安廳才搞清楚，並到長樂西路派出所問清了我住的樓號和門牌號數。

一天下午，趙副部長在糧食局的工作人員和他的秘書陪同下，突然來到了我的住處，當時我真是不知所措了。趙怕我激動，一進門就說起笑話來。他觀察到我還平靜，我們才開始談話。

趙說：「我到西安來搞點資料。既然到西安來了，一定要來看看你。有一次開會後胡耀邦同志把我和張永勳留下說，你們有機會見到姓邱的，告訴他：『過去的事情就過去了，要向前看。我認為我們的黨不應把圈子搞得很小，要把圈子搞這麼大（兩臂張開），多團結一些人總是好的。這個意思你可告訴他本人。』耀邦同志還說：『有些人別人打他反革命，吃了苦，他委屈得很，可他上了臺，打別人反革命有下手很重，搞

怨怨相報。其實，很想發他們幾個的財（即給我們落實政策，在幹部群眾中贏得更好影響）。』趙說：「今天，就把話當面向你轉達了。」

孔瑞雲是原山東省軍區司令員，是福建的老革命。整個解放戰爭我們都戰鬥在一起，他是東野八縱的後勤部長，我們的革命情誼是很深的。他路過西安，決心一定要看到我。但不知道具體地方，找了很久也沒有找到，後來就乾脆到長樂西路派出所去問我的住處。

派出所的人聽他的口音和派頭就知道不是一個簡單的人。孔說：「邱是老革命，也是我的老領導，除了看看他之外，還要看看他有什麼困難可以幫助他。我們是一起出生入死打敗蔣家王朝建立新中國的人啊！」

派出所長說，我心裏想的也和你一樣。所長不到五分鐘，就把老孔領到我的住處來了。

孔瑞雲一進門就給我敬了個禮，然後緊緊抱住我不肯鬆開，我激動得也掉了眼淚，他說：「我們來看看你。今天我來看你同過去看你，在我們心裏是一樣的，你永遠是我的老首長！你不要難過，要高興！你要是難過，我們就更難過，你的許許多多老戰友，老部下，都很關心你！」

我聽了老孔的話，心裏有很多的話，都說不出來了。由於老孔找我花的時間過長，上火車的時間快到了，我們談的時間不很長他就要走了，臨走時，他給我留下幾百塊錢和糧票，我們互相熱淚盈眶地分手，我心裏的痛苦祇有我自己知道。

我的老戰友任思忠到西安，是卜占亞帶他來看我的。他一進門也是緊緊地抱住我，他說：「你過去是我的老首長，現在還是我的老首長！」我們談到了很多，從戰爭年代一直談到社會主義建設和文化大革命，也常常激動地雙雙落淚。老戰友的真情和友誼對我在困難時期支撐下去是巨大的力量。

我在北京郊區順義縣衛戍區警衛三師師部關了五年又三個月，防化H副連長同我相處了三年多，整個警三師對我都是關心和敬重的，同樣，H副連長對我也是關心和敬重的，這給我精神上是很大的支持力量。他能到西安來看我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一個看管你的人，還能來看我，而且是在公審之後，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們相識是因為我被打倒了，被他看管了，他從我身上得不到一點「油水」，他能關心我，這是為什麼？



真情實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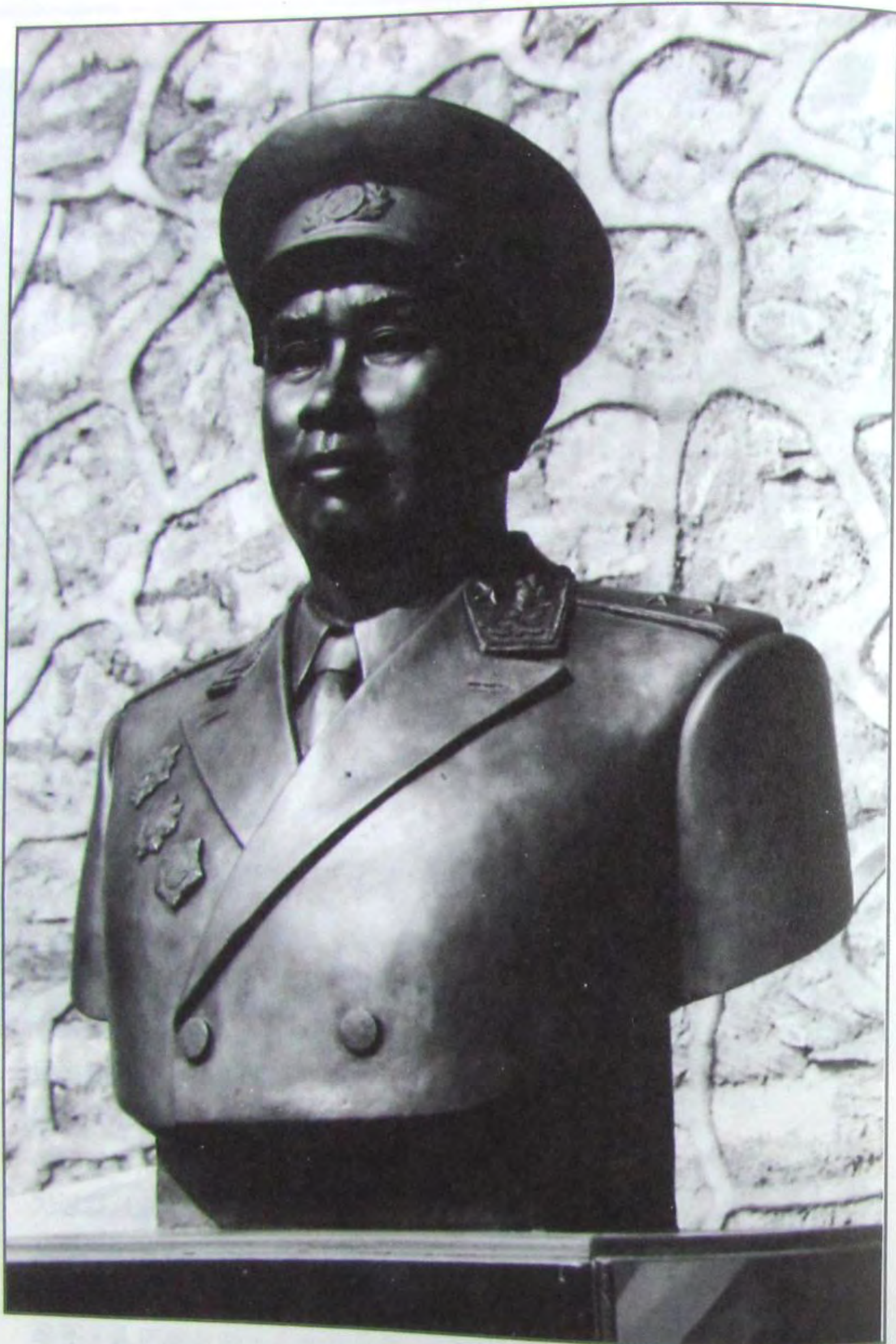
我想了很久，就是我們都是「一顆紅星頭上戴，革命的紅旗掛兩邊」的人民解放軍。我對H副連長是感激的，佩服的。

九二年我來到北京，張震和段蘇權知道後都看過我還請我吃了飯，之後段蘇權還多次看我。張震在國防大學請我吃了飯，他自己帶了一瓶茅臺酒，並對管理人員說：「我請我的老同學吃飯。」爲什麼是老同學，我真是不得其解，張震說：「我們是抗大的同學嘛！我們是一個隊，一個支部。」我笑了起來，他這個理由想得好。席間，張震對胡敏落實政策很關心，這不僅是因爲他們很熟悉，更重要的是他反對搞株連。他們對

我的老伴落實政策都盡了很大的力，使我非常感動。胡敏的戰友經常來看她，很多人都問寒問暖並給胡敏錢和糧票，給胡敏買衣服，胡敏每次都熱淚盈眶。段蘇權對我的關心，使我非常感動。我當時住在大兒子家裏，他幾次驅車來到寒舍看望我，說了很多關心和鼓勵的話，他還把我接到他家裏去敘舊，我對段蘇權同樣是感激的。

這一生使我永遠感激的是我的老戰友張文。張文同志是三七年參加革命的老同志，一生都兢兢業業、勤勤懇懇，為黨的事業貢獻了自己的一生。平津戰役以後，解放軍大舉南下，她愛人就犧牲了。她這一生是很不幸的，一生都很艱辛，日子過得很清苦。文化革命以前，我們兩家常有來往，但在那個年代，都是依靠組織，互相並沒有多少關照。「九一三」以後，我是家破人散，我的兒女無處可歸，尤其是我的小女兒，更是無人照顧。在我們全家最困難的時候，他對我們的幫助是很大的，她收養了我的女兒京京，我的幾個兒子到北京，沒有落腳之處，都是住在張文同志在家裏，她自己並不寬裕，但是她把家裏的好東西都拿出來給我的孩子吃，對他們問寒問暖，非常關心，使我的孩子得到很多溫暖和慰藉。她的身體不好，不幸走到我的前頭，我和胡敏及全家都很悲痛，我永遠都感謝和懷念老戰友張文同志。

九二年我搬進了省委幹休所，並由省老幹局管我，生活條件有了很大的改善，生活費也有所增加。九九年，幹休所還給我買了一輛紅旗車用。幹休所李所長，還有老幹局的文處長對我的生活十分關心，幾乎是有求必應，我們不吭聲他們也主動關心我們。我幾次住院都是安排很好的病房。幹休所的醫生、財務、司機及所有工作人員都對我尊敬和關心。幹休所還專門安排我和老伴回延安看一看，胡敏還找到了當年在半山坡上住的窯洞，我們站窯洞門口，望著熟悉的寶塔山和遠處延綿起伏的一道道黃土高坡，真是心潮起伏，熱淚奪眶而出。我想到在江西瑞金的日子，兩萬五千里到延安，想到抗大，想到七大，想到大生產……。我對老伴說：「我們參加革命是對的。我是江西人，你是陝西人，不參加革命我們怎麼能認識呢？我們共同革命，共同患難，為革命獻出了畢生，有這一點就夠了。榮辱都置之度外吧！」



邱會作將軍銅像。



邱會作將軍銅像揭幕。



邱氏宗親聯誼會會長邱家儒先生講話。



在邱會作將軍銅像揭幕儀式上。



在邱會作將軍銅像揭幕儀式上。左起：吳新潮、李亞寧、邱家儒、陳友西、黃春光、劉衛兵、邱建軍。



在邱會作將軍銅像揭幕儀式上胡敏和來賓合影。



路光（長子）、光光（三子）、京京（女兒）、胡敏、毛毛（四子）在邱會作將軍銅像前。



懷念父親（女兒京京）。



胡敏和老管理科長汪波（左）、警衛員蔣平安（中）在邱會作將軍銅像前。



京京、新平一家在父親銅像前。



胡敏一家和家鄉的親人在一起。

人民總理周恩來的評價

邱會作同志是個老同志，很小的時候就參加我們的紅軍，我還在江西的時候就跟他相識，差不多到現在來說三十六七年了。長征的時候我們就在一起，特別到了陝北。那時候，我們的領袖毛主席在前線作戰，我在後方主持工作，那個時候邱會作同志就參加後方的後勤工作，我們差不多幾乎每天要見面的，計劃為前方籌運供應的事情，渡黃河東征的事情，轉戰到西邊，所以那一陣子共事最密了，我覺得他是一個很能夠工作的同志，也是年輕有為的，是一個很有希望的同志，跟著毛主席走。這個看法到現在來說，已經超過了三十年了，我的看法得到證實，覺得我的看法是沒有看錯。三十年中，他做了很多工作。先在後勤，然後又做政治工作，在抗日戰爭中，特別是解放戰爭，轉到東北，然後南下，又做政治工作，最後他又來做總後的工作。接近四十年了，可以說，他是一個堅定的紅軍老戰士。應該說他是一個稱職的，而且做得出色的後勤部長，是歷屆後勤部長最好的一位。這不僅是我的看法，也是黨中央、毛主席的看法。

邱會作

讀白內政局干部大會上的講話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

人民總理周恩來的評價

邱會作同志是個老同志，很小的時候就參加我們的紅軍，我還在江西的時候就跟他相識，差不多到現在來說三十六七年了。長征的時候我們就在一起，特別到了陝北。那時候，我們的領袖毛主席在前線作戰，我在後方主持工作，那個時候邱會作同志就參加後方的後勤工作，我們差不多幾乎每天要見面的，計劃為前方籌運供應的事情，渡黃河東征的事情，轉戰到西邊，所以那一陣子我們共事最密了，我覺得他是一個很能夠工作的同志，也是年輕有為的，是一個很有希望的同志，跟著毛主席走。這個看法到現在來說，已經超過了三十年了，我的看法得到證實，覺得我的看法是沒有看錯。三十年中，他做了很多工作。先在後勤，然後又做政治工作，在抗日戰爭中，特別是解放戰爭，轉到東北，然後南下，又做政治工作，最後他又來做總後的工作。接近四十年了，可以說，他是一個堅定的紅軍老戰士。應該說他是一個稱職的，而且做得出色的後勤部長，是歷屆後勤部長最好的一位。這不僅是我的看法，也是黨中央、毛主席的看法。

代後記

家人在邱會作將軍骨灰安放儀式上的講話

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貴賓、各位老倭鄉親：

謝謝您們的光臨。

今天我們的母親帶著全家，把我們父親的骨灰送回故鄉安葬，魂歸故里。

八十年前，我們的父親不到十五歲，就從這個小山溝參加了紅軍。在共產黨、毛主席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領導下，踏上了革命的征程。

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是偉大的，是艱苦卓絕的，無數革命先烈獻出了他們寶貴的生命，許許多多革命前輩為中國的革命事業做出了很大貢獻，我們的父親就是這支偉大隊伍中的一員。

中國革命是英雄輩出，群星燦爛的。我們的父親生前說過：他只是燦爛群星中的一顆小星。但是，他從參加革命一開始，一直就是積極工作、努力奮鬥的，並貢獻了他的全部力量。

願我們的父親安息在故鄉，安息在生他養他的青山之中。

胡敏 率子孫：

邱路光、蕭瀟、邱承光、陳雪巾、邱光光、李卓雁
邱小光、龐淑凡、邱小京、吳新平
邱燕恆、邱小宜、程曉懷、胡曉愛、蕭楠、吳丹

二〇〇八年十月

北京讀書社區制售

邱會作將軍生平簡歷

- 1928年6月 參加兒童團
- 1929年11月 參加紅軍，在地方部隊「興泰警衛連」當戰士
- 1930年1月 在「興泰警衛連」當文書，參加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 1930年12月 參加第一次反「圍剿」腿部負傷
- 1931年5月 參加第二次反「圍剿」
- 1931年7月 參加第三次反「圍剿」
- 1931年11月 五軍團宣傳隊長
- 1932年10月 中國工農紅軍學校第五期學習參加第四次反圍剿
- 1933年2月 軍委總供給部會計、機要統計員
- 1933年6月 軍委總供給部政治指導員、機關黨支部書記
- 1934年8月 兼任軍事工業局的黨總支書記參加第五次反圍剿
- 1935年5月 軍委四局三科科長
- 1936年1月 中央軍委供給部糧秣處處長
- 1936年6月 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糧食部供應局長
- 1937年1月 抗大二期學習
- 1937年8月 中央軍委供給部副部長
- 1938年5月 中央軍委供給部部长
- 1940年1月 中央財經工作團團長
- 1941年3月 豫皖蘇邊區財政委員會主任兼新四軍四師供給部政委
- 1944年2月 中央黨校二部學習
- 1945年4月 參加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 1945年12月 熱遼軍區政治部主任
- 1946年4月 北平軍調執行部機關黨委副書記兼人事組組長
- 1946年8月 赤峰地委地委書記兼二十二分區政治委員
- 1947年8月 東北民主聯軍第八縱隊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 1948年3月 東北民主聯軍第八縱隊政委
- 1949年3月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45軍政委
- 1949年12月 廣西省桂東南軍政委員會主任

- 1950年12月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5兵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 1951年5月 華南軍區政治部主任
- 1952年7月 中南軍區政治部副主任
- 1954年10月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副部長兼副政委
- 1957年9月 高等軍事學院學習
- 1959年10月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部長、軍委辦公會議成員
- 1962年4月 兼任國防工業辦公室副主任
- 1967年8月 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
- 1968年10月 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總後勤部部長
- 1969年4月 中國共產黨第九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